

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新编

下 卷

(1985 - 2003)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新编 / 费孝通著. -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6. 10

ISBN 7-81108-288-8

I. 费... II. 费... III. ①民族学 - 中国 - 文集 ②少数民族 - 研究 - 中国 - 文集 IV. K2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14496 号

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新编 (下卷)

- 作 者 费孝通
责任编辑 满福玺
封面设计 布拉格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 100081
电话: 68472815 (发行部) 传真: 68932751 (发行部)
68932218 (总编室) 68932447 (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8.75
字 数 466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1108-288-8/K · 122
定 价 96.00 元 (上下卷)
-

目 录

1. 开展为内蒙古发展服务的调查研究 (1985 年 1 月 30 日)	(1)
2. 潘光旦先生关于畚族历史问题的设想 (1985 年 6 月)	(5)
3. 谈谈边区开发的科学研究 (1985 年 6 月 7 日至 11 日)	(10)
4. 包头篇 (1985 年 6 月 15 日)	(17)
5. 西部经济发展和各民族共同繁荣 (1985 年 6 月)	(33)
6. 人口与开放 (1985 年 7 月)	(40)
7. 开发甘南的意义和建议 (1985 年 8 月 16 日)	(42)
8. 定西篇 (1985 年 8 月 28 日)	(51)
9. 甘南篇 (1985 年 9 月 25 日)	(68)
10. 民族调查工作不能脱离实际 (1986 年 1 月 25 日)	(90)
11. 瑶山调查五十年 (1986 年 5 月)	(96)
12. 谈缩小差距 (1986 年 6 月)	(105)
13. 谈“民族” (1986 年 6 月)	(109)
14. 贫困与脱贫 (1986 年 8 月 4 日)	(113)
15. 为了西北地区更好更快地发展 (1986 年 8 月 13 日) ...	(124)
16. 对民族工作的一些看法和意见 (1986 年 12 月 24 日) ...	(140)
17. 海南行 (1987 年 3 月)	(148)
18. 发挥民族优势 开拓民族经济 (1987 年 4 月 11 日) ...	(163)
19. 《花篮瑶社会组织》重版前言 (1987 年 5 月 4 日)	(168)
20. 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战略 (1987 年 5 月 18 日)	(170)
21. 地区发展战略规划的若干思考 (1987 年 7 月)	(178)
22. 临夏行 (1987 年 10 月)	(185)

23. 民族区域自治和少数民族的发展

(1987 年 12 月 7 日) (197)

24. 海东行 (1987 年 12 月) (201)

25. 话说呼伦贝尔森林 (1988 年 4 月) (208)

26. 全国一盘棋——从沿海到边区的考察

(1988 年 5 月 9 日) (220)

27. 访骆驼之乡 (1988 年 7 月 18 日) (228)

28. 发挥民族优势脱贫致富 (1988 年 7 月 23 日) (238)

29.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1988 年 8 月 22 日) (244)

30. 保安三庄 (1988 年 9 月) (282)

31. 南岭行 (1989 年 1 月) (284)

32. 答问发展与发展研究 (1989 年 4 月 11 日) (292)

33. 四年思路回顾 (1989 年 4 月 14 日) (300)

34. 甘肃行 (1989 年 12 月) (338)

35. 开发大西北 (1990 年 5 月 7 日) (354)

36. 中华民族研究的新探索 (1990 年 5 月 17 日) (361)

37. 包头行 (1991 年 1 月 16 日) (366)

38. 凉山行 (1991 年 6 月) (374)

39. 关于内蒙古经济发展的一些意见 (1991 年 8 月) (387)

40. 武陵行 (1991 年 12 月 21 日) (391)

41. 边区民族社会经济发展思考 (1992 年 7 月 16 日) (409)

42. 对民族地区发展的思考 (1992 年 10 月 1 日) (427)

43. 个人·群体·社会——一生学术历程的

自我思考 (1993 年 7 月 24 日) (436)

44. 中央民族访问团追记 (1994 年 2 月) (459)

45. 农村、小城镇、区域发展——我的社区研究历程

的再回顾 (1995 年 1 月 1 日) (463)

46. 三访赤峰 (1995 年 7 月 25 日) (485)

47. 毕节行 (1995 年 8 月)	(501)
48. 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 (1996 年 8 月 20 日)	(509)
49. 小民族 大家庭 (1999 年 11 月)	(526)
50. “兴边富民行动”好 (2000 年 1 月)	(531)
51. 积极拥护、支持西部开发大战略 (2000 年 6 月 17 日)	(534)
52. 论西部开发中的文化产业 (2000 年 6 月)	(540)
53. 创建一个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 (2000 年 7 月 28 日)	(548)
54. 故地重游多新见 (2000 年 9 月)	(562)
55. 民族生存与发展 (2001 年 7 月)	(571)
56. 又一次访问定西 (2003 年 9 月)	(579)
后记	(591)

开展为内蒙古发展服务的调查研究

今天能在北京参加内蒙古地区的发展战略座谈会非常高兴，因为我们的研究工作重点即将转移到边远地区来。

几年来，跟着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形势，我们的研究工作从农村开始，然后进入小城镇，从小城镇的发展中看到了它对中等城市的依托，因此有必要研究以中等城市为中心的一个区域的发展。研究工作也是从基层开始，更上一层楼，提出了区域发展的问题。

就我国整个发展形势看，全国大体上可分为三个地区，沿海是我国的黄金海岸工业区，内地是大粮仓，边区是工业资源宝地。对如何加速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建设的战略研究，应注意地区间的差别的协作。

我过去是研究民族问题的，对少数民族很有感情，对民族地区的建设和发展特别关心。我认为一个民族大家庭如不能共同繁荣，就会出现严重的局面。这在西方国家已经发生了，那里的土著民族濒于灭亡，美洲的印第安人成了旅游参观的对象，这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中国历史上一向是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化。我们的民族工作就是要实现共同繁荣和民族平等，出现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的民族团结局面。团结是不能脱离经济基础的，民族矛盾的产生根本出于经济的原因。我们想从内蒙古入手来考察这个问题。我们的出发点是建立一个共同繁荣的民族大家庭，而不是片面地追求某一部分地区的经济发展。

去年我到甘肃省定西地区考察后，提出了一个十六字方针，即“以东支西，以西资东，互惠互利，共同繁荣”。我们的黄金

海岸有如东亚的四个“小老虎”（台湾、新加坡、南朝鲜、香港），还有一个现在已成“大老虎”的日本。它们都是靠智力发展起来的，本身资源缺乏。它们看来很繁荣但没有后劲，而我们的黄金海岸拥有极大的优势，既有肚子（指内地粮仓）、又有屁股（指边区资源），只要协作搞好，不但是老虎，还是一头大狮子，从远景看是一片光明。我们要从大背景着眼来设想很多问题，提出战略方针，但做事要脚踏实地，饭要一口口地吃。

内蒙古地形有如一只展翅飞翔的大雕，从经济结构上大体概括为“南农北牧东林西铁”八个字。在清朝康熙、乾隆皇帝在承德搞民族上层统一战线的历史事实启发下，我决定从赤峰地区开始我们的研究工作。

通过赤峰的实地考察，纠正了我过去许多不正确看法，了解到这里历史上有过两种文化，概略地说，春秋战国前曾是林木茂盛的农业地区，而辽、金、元、清初则是游牧地区。辽代时相当兴盛，辽上京、中京皆建都于这一带。各民族南北往来就在这里进行。情况逐步发生着变化，到了清朝后期经济上的农牧矛盾引起了民族矛盾。感情一定有它的物质基础。矛盾都是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发生的。粗放的五谷农业无疑会破坏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经济。农牧矛盾如何转变为农牧结合，这是我想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我认为在搞农业不合算的地方要退农还牧，以农养牧，把牧业提高到现代化水平，搞建设牧业。农牧协作搞好了，民族矛盾也就解决了，势必形成一个相互依存的新局面，在赤峰已经有了很好的事例。

第二个问题是在文化落后地区知识如何能传递下去，使之变成生产力。我们在驿马吐科技村调查中，总结了通过五级梯队把科技知识传到农民手中的经验。这里信息传递主要是靠口口相传，眼眼相看，而不是通过文字。我前年在加拿大看到一个大农

场，一个 40 多岁的农民独自经营 1000 英亩的农田。他靠机械生产，知识的更新靠看杂志，使用机器的技术靠说明书。两个例子对照一下，清楚地反映了文化程度对科技传递的影响，差别是那么鲜明。不过驿马吐的经验很重要，他们是从现有智力出发，做到了把科技知识传递到农民手中。从中可以总结出在现实条件下把科学知识合理有效地传递下去的组织和方式。驿马吐村的干部也从实践中懂得了普及初中文化的迫切性。这是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由此赤峰市和翁牛特旗都在研究一个切合实际需要的各级人才的培训规划。

第三个问题我准备到包钢去考察一下在经济上比较不发达的地区发展大的现代企业会发生什么问题。一是它对周围的影响，二是周围社会环境的反馈。建设包钢这样一个大企业，国家在人力、智力、财力上花了很大力量，至今技术力量并不薄弱。但我们不能只研究一个企业的效益，还要看这个企业带来的整个社会效益和社会环境的反馈作用。譬如说现在第二代已经成长起来了，包钢包了钢还包了人，人口泄不出去，包下来的人口使生产率上不去。所以我们搞企业要有社会经济区域发展的观点，总结包钢的经验教训，为今后边远地区开发建设大矿区、大企业做区域发展的规划提供经验。

类似的情况还有，如三线工程建成了封闭式的小社会，与外界无来往，企业本身之外仍是一片荒凉，这不是发展边区的方针，我们要有意识地搞开放式的企业。如日本的大企业把部件生产分散到无数家庭工场、小工厂去，自己成为一个经营和装配中心。我们为什么不能使千家万户靠国家的力量，搞有分有合有系统的社会主义组织，从家庭到大工厂，形成多层次的台阶。这是个城乡结合，城乡联系的台阶。

现在，我们正面临一场经济体制的大改革。通过改革和建设一定要做到农牧结合、城乡结合，筑成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道路。这是任何西方国家所没有过而且做不到的。边区有丰富的资源，内蒙古可以从采掘工业、农牧产品加工工业入手，走出一条边区开发的道路来。

商品经济发展了，东西差距会拉大，这是我们必须估计到的。我们不能要求发达地区等一等，只能针对这个问题采取措施，使边区迅速赶上去。在这里不可忽视发挥现有知识分子的作用和吸收发达地区智力、财力、劳力的支援。

我还有5年就80岁了，还希望能在实际研究工作中带出一批人来。这几年的实际经验说明，研究工作的依靠力量不是哪几个研究所或几个研究人员，而是要依靠能联系群众，有实际经验的实际工作者、政策研究工作者与理论工作者的结合。我自己懂得很少，但愿做一个忠实的“二传手”，把群众的经验总结出来，传递到更多的人手中，以促进和加速我们的四化建设。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要同心协力，为发展经济，提高生产力，密切合作，团结一致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民族大家庭而奋斗。

1985年1月30日

潘光旦先生关于畚族历史问题的设想

1981年12月，我在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的座谈会上，讲过潘先生对苗、瑶、畚民族关系的一段设想。这段设想的酝酿，始于潘先生和我一起，在1952年调来中央民族学院之后和1957年之前的一段时期。

座谈会上凭我的记忆总括了潘先生的这段设想，即“我们可以从徐、舒、畚一系列的地名和族名中推想出一条民族迁移的路线。很可能在春秋战国时代的东夷中靠西南的一支的族名就是徐。他们生活在淮河和黄河之间，现在还留下徐州这个地名。从这一时期的文献中也可看到这块地区被居民称作舒。潘先生从瑶、畚的槃瓠传说联系到徐偃王的记载，认为瑶族中的过山榜有它的历史背景，只是后来加以神话化罢了。这一批人，后来向长江流域移动，进入南岭山脉的那一部分可能就是瑶，而从南岭山脉向东，在江西、福建、浙江的山区里和汉族结合的那一部分可能是畚，另外有一部分曾定居在洞庭湖一带，后来进入湘西和贵州的可能就是苗”。

这篇讲话发表后，曾引起了不少关心东南一带少数民族问题的朋友们的注意。我感到不太放心，因为这段设想是全凭我的记忆复述的，所以一直有意找潘先生的著作校核一下。

施联朱同志送来了1955年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出版的《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4辑，其中有潘先生所写的《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巴人》一文。我又读了一遍，其中对苗、瑶、畚的历史有几段话。不妨抄录如下：

“辰沅以北，亦即洞庭湖以西……两千余年以来，各民族成

分的部位或分布情况基本上没有变动；拿这两千多年的首尾比较着看，瑶族是更向南方移动了，部分进入了广西，与瑶族有密切关系的苗族则向北进展了些，越过了辰沅以北。”

“长江中游沿岸，特别是南岸，在六朝隋唐年间称为‘莫徭’的一个族类，在周秦以降中原族类历次向南伸进的压力之下，退却了，分散了；南下的一群成了今日的瑶人，在过程中省去了一个‘莫’字音，其中很早就进入东南的一支后来称畚瑶，或单称畚；向西与西南移动的一群成为今日的苗人，过程中把‘莫徭’的两字音切成‘苗’的一字音；其少数留在原地而夹居在汉人中间的取得了‘猫’姓，声音改变的过程和‘苗’一样……我们是倾向于承认远古的三苗与今日的苗人，乃至瑶人与畚民，是有源流关系的。这样一个带有总结性的初步看法，姑且借此机会提出，将来研究苗瑶由来的问题时，可作参考之用。”

潘先生后来曾否把苗瑶和畚族的由来写成了专论，现在已无法确定了。我凭记忆听说的他的那段设想，似乎比1955年发表的文章更进了一些。我仿佛记得60年代初，潘先生和我曾一起到过罗源、福安等地访问畚族。他对畚族的传说信仰特别感兴趣，因为这种信仰可以从地方志的材料看出它的分布，并推测它的传播路线。如果潘先生的确没有把这个设想写成文章，或是写成了文章无处发表，而在动乱中遗失了，那只有等待后人去补足了。

我在这里想特别提一下的就是潘先生对于我国各民族历史的研究，一向不主张孤立地研究某一民族的历史。他在研究了土家和古代的巴人之后，在上述那篇文章里明确地说：

“我们也不能忘记，历史上绝大部分的巴人，今日湘西北‘土家’人的一部分祖先也不例外，在发展的过程中，变成了各种不同程度的汉人，终于与汉人完全一样，成了汉族的组成部分……因此，这种历史研究又必须与汉族，乃至全部中华民族的大共同体是如何形成的这样一个总问题密切地结合起来进行，至

少第一步也应该不断地互相参照着进行，才有希望把头绪整理出来，孤立地搞是绝对不行的。在祖国漫长的几千年的历史里，这样一个族类之间接触、交流与融合的过程是从没有间断过地进行着、发展着，我们现在还在这过程之中，从人文学的方面来看，但也不妨说，这过程就是祖国的历史。”

我在那次座谈会上称这种是宏观的历史研究。四年过去了，这类的文章我还是很少看见。今天我重读潘先生那篇力作，感慨很深。包括我在内，自叹远远不如前辈。现在，仅就我从这段设想中得出的关于民族研究的一些不成熟意见阐述如下。

正如潘先生所说的，我们祖国的历史是一部许多具有不同民族特点的人们接触、交流、融合的过程。这个过程从没有间断过，而且还在发展着。我们对汉族的形成虽则至今还没有科学的说明，但是它之所以能成为当今世界人数最多的一个民族，绝不可能是单纯靠汉族的祖先自然繁殖的结果，它是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原来不属于汉族的人们而壮大起来的。其他的民族实际上也多是由原来不相认同的人们逐步融合而成的。融合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有分化。在不断又合又分的过程中出现了我国现有的民族结构。

从这一点认识出发，我们今后的研究工作就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发展。从宏观方面发展就是拾起中华民族形成过程这个课题进行研究。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实体，因为他具有与世界上其他民族不同的特点，而且具有共同的民族意识。他是由许多互相不能分离的民族单位组成的。他是历史的产物，所以我们有责任把这个人们共同体的形成做出科学的论证。

研究各民族的形成过程就是向微观方面发展的研究工作。我们在广西大瑶山的研究就属于这个性质。我并没预料到在广西大瑶山的微观研究会理论上和宏观上与中华民族的研究是统一的。那就是说，在一个民族实体中可以存在若干在语言、生活方

式上各具特点的组成部分。广西大瑶山里的瑶族包括了茶山、花篮、坳、盘、山子等5种瑶人。他们尽管各有各的语言和生活方式，但是都具有瑶人的共同意识。这是和我们中华民族包括着许多不同民族成分相一致的。

我初步的想法，这并不是个别的现象，如果我们对各民族进行细致的深入的微观研究，很可能在许多现在所承认的民族单位里发现同一情形。它们都是由许多不同的民族成分逐步融合而成的，而且各成分融合的程度又可以不同。理论应当从观察实际的过程中形成，这是我对于今后的民族研究工作者的希望。

提高到理论上来考虑这个问题，也有助于我们提高民族研究的水平。我觉得过去多少年来把各个民族孤立起来研究的时期可以结束了，因为这已不适当当前我国新形势的发展，民族领域里当前主要的问题是怎样实现各民族事实上的平等。事实上的平等必须通过发展经济来实现，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方针同样适用于民族的范围内。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各民族的发展水平是不相等的，有些先进，有些落后。凡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民族必须向先进民族开放，吸收先进的技术和先进的文化，绝不能维持过去的封闭状态。特别是由于封闭状态所形成的精神上的自我中心和排斥外来的成见。各民族共同繁荣有待于共同走现代化的道路。在这共同道路上，我们固然必须从各民族的特点出发，而且保持民族形式；但是共同的东西必然会日益增加，在这个意义上就是加深了中华民族内部的融合。在这融合过程中一方面要防止大民族主义，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地方民族主义，我们正面临这种挑战。我相信，我们各民族一定能过好这一关。民族研究工作者也有责任在这方面出一份力量，通过科学的论证，向各民族讲清楚这个道理，使各族人民自觉地走上现代化开放的道路。

从回忆起潘先生对畬族历史问题的设想，引起了许多不成熟的想法，提供民族研究者思考。

1985 年 6 月

谈谈边区开发的科学研究^{* 1}

我作为这次边区开发科学研究工作会议的倡议人和课题的学术指导，首先应当回忆一下这个课题产生的经过。就是说为什么想到要在边区，并先在北部边区进行一次综合性的调查研究。

对一切事物的认识都有一个过程，我过去对西北和北方地区不熟悉。抗战时期在云南做农村调查。解放后要在西南和南方地区做民族调查。西北和北方到的地方很少。50年代到过呼伦贝尔，也只写了游记性的文章，不是科学调查。1981年暑期举办社会学讲习班时，我曾说过想研究一下东北的移民问题。大家知道中国的社会问题中，最基本、最严重和最引人注意的是人口问题。大体上说，解放前30多年增加了1亿人口，解放后30年则增加了一倍。从4.5亿发展到10亿。到2000年将超过12亿，后果是很清楚的。这么多年来我们生产力虽有较大的发展，但为不断增长的人口所抵消了。70年代中期，农村已明显感到人口的压力。城市人口采取了限制政策，商品粮也紧张起来。怎么办？抓紧推行计划生育已势在必行，由于不得不采用“急刹车”的办法，也出了一些问题。那么这是不是长远的和唯一的办法呢？从世界人口发展的趋势看，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了，文化水平提高了，人口是会下降的，但目前我们还不到这个时候。首要的是要赶快发展经济，在限制人口发展上采取“急刹车”的办法，也是为了给经济发展一个喘息的机会。

农村在改革前是一个人的事三个人去做。吃大锅饭的时候，

* 本文系作者在全国考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劳动力剩余问题并没有突出，只是希望不要再加入了，没什么别的解决办法。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农民觉悟到要为剩余劳动力找出路，要发展生产，因此创造了很多办法。生产力提高了，人口压力也减小了。就苏南地区讲，在尚未运用现代化生产手段的情况下，由于乡镇工业的发展已吸收了 $1/3$ 的劳力。有 $2/3$ 的劳力还留在农村，就目前情况看再拿出来 $1/3$ 也没有问题。可以预料，如果采取了先进的现代化的生产技术，劳动力必将继续转移。目前可以说只是初步的转移，一方面是转向乡镇工业，另一方面是劳务输出。江苏省劳务输出的人口已达 100 万。小城镇可以吸收大量人口，中央文件中曾设想下个世纪我国人口的 $1/4$ 将分布在小城镇里。这一情况在开始是很难预料的，正如农村体制改革所出现的效果出乎人们意料之外一样。现在小城镇的发展是一片繁荣，自然也有发展中的问题，需要不断研究，不断解决。几年来我跟着形势发展，进行了观察，感到应该从积极方面来对待人口问题，要为大量剩余劳动力寻找出路，不能只是消极地限制。

1982 年我在统战部的一次座谈会上提出了人口问题的“两个眼”的看法，即如果要下活人口的这盘棋，要做两个“眼”，一是发展小城镇，一是要开发边区。我国人口分布很不平衡，就人口密度看，西藏是每平方公里 1 人、新疆 14 人、内蒙古 16 人、赤峰地区是 40 人，而江苏是 600 人，人少的地方工业资源丰富，而人多的地方工业资源很少。1983 年我们到黑龙江去，了解到东北地区人口的发展情况，大体上是原有人口占 $1/3$ ，自然增长了 $1/3$ ，其他 $1/3$ 是迁移进去的。内蒙古也是如此。解放以来国家在开发边区和建设少数民族地区方面采取过不少措施，如向农牧区组织集体移民，从内地搬迁工厂到边区，建立生产建设兵团和大型国营农牧林场以及建设矿区、大工业基地等等。有的留住了，有的留不住。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没有稳住，一些地区

所谓“盲流”问题又相当突出，这样一些问题怎么看，要认真调查研究。

总的来看，要发展边区的经济，必须动用发达地区的人力、财力和智力。五六十年代在支边上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些年来“一江春水向东流”、“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人才流失很严重。这里有内因也有外因。由于边区经济不发达，而沿海内地经济发展较快、在人才问题上产生较大吸引力是个主要原因。如何开发边区，使边区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减少内地与沿海地区的差距是我们要研究的问题。

去年我到内蒙古赤峰地区考察，想去破个题。看到在农牧地区有个自然生态平衡被破坏的问题，农业没很好地发展，牧业又遭到了破坏。农牧矛盾是在一定生产技术条件下发生的。生产力很低的粗放农业和放牧为主的牧业使自然生态平衡失调，形成恶性循环。要想改变这种情况，只有发展生产，提高农、牧业生产技术。很多宜牧的地方要退农还牧，并要使现代化的农业服务于牧业，达到真正的农牧结合。当然这里又提出了另一个问题，现在农村的文化水平能否支持新技术的传播，因为技术的传播、生产力的提高是要靠人的。在边区，农牧民的文化水平很低，初中文化程度的干部和小学文化程度的农牧民如何接受和传播科技知识？科技如何下乡？宜牧地区如何退农还牧？发展工业并使农业为牧业服务，这都是要实地调查研究的。

这里提出了一个研究方法问题。第一步要破题。明确抓什么问题，为什么要抓这个问题，如在赤峰抓住自然生态平衡被破坏和如何扭转这个问题。进一步要总结群众的创造，抓住几个典型，解剖麻雀，从中看出它的意义，提高到理论。这样做对整个四化建设和边区开发都是有价值的，并会对领导部门和实际工作者有所帮助。破题要抓对问题，解剖麻雀则要提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看法。譬如在赤峰地区破了题以后，我们抓了驿马吐科技村的

科技下乡的问题。科技是生产力，但从科学院的成果传到农民手中还得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其传播方式、组织和条件都需要具体分析研究，与国外比较很不相同，与国内发达地区相比，也具有边区的特点。下一步调查专题要抓黑塔子村的退农还牧，又是解剖麻雀的一例。

去年我与民盟支边的几位专家到甘肃去考察种草种树问题。在这里看到了与内蒙古赤峰地区相似的问题，同时看到了“三线”工厂的问题。国家在边区曾经有过不少投资，建立起相当规模的大企业，目前人马还在，并且开始衰老。它们有没有成为推动当地工业的动力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次考察包头，看到了30年来在一个草原地区从一个8万人口的皮毛集散地建成为一个150万人口的较大城市。一个冶金和机械加工的工业城市的建设，确是很了不起的成绩，必有经验可取。但不论甘肃的“三线”工厂，包头的几个大企业，还是外地迁来的小企业，都是封闭式的。他们的技术和智力并没有能扩散出去。我们讲江苏的工业化靠上海的技工下乡，那么内蒙古的工业化靠什么呢？进一步讲，边区的工业化应该怎么搞？

有一点是肯定的，边区的工业化要靠外来力量的支援。而外来的力量如果搞封闭式的经济，不但不能带动当地工业化的发展，连自己也生存不下来。我到包头来就想破这么一个题。破题要找特点，每个地区都有其特点，不能用一个地方去概括一切地方。找特点必须要深入下去，要紧跟形势发展，要依靠地方实际工作的同志。所以我主张理论工作者要和实际工作者相结合。破了题，抓住有典型意义的专题，认真分析，解剖麻雀，取得了结果，再搞普查，取得定量的资料，这样的结果才有价值。

科研工作本身也是有发展规律的，它也是随着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入和提高了。小城镇的研究从农村到小镇，又发展到研究一个中等城市和它辐射的一个地区。一层楼一层楼地

爬上去。边区开发研究也一样，我们可以从一个地区的研究经验推广到另一个地区，并且可以进行比较研究。现在从北部和西北开始，逐渐向南，有条件时可以进一步研究西南边区。所以我寄希望于青年的一代。科研工作是十分艰苦的，是要吃苦的。我们年纪大的人没有条件深入下去做实地观察了，只有破题，帮助你们开一条路，希望你们扎扎实实地搞下去。

这次课题交流会议开得很好，我们从3家协作发展成了10家。如果这个课题符合四化建设的需要，就自然会发展起来。因为要建设就要科学研究先行，尽可能克服盲目性，少走弯路。尤其是在我国的经济建设战略重点转移到大西北边区之前，我们多做点脚踏实地的调查研究工作无疑是十分有益的。这次会议贯彻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研究工作方式是一种个体的脑力劳动。学术性的讨论，不应有什么限制，要各抒己见，自己认为正确的就可以讲，好的意见领导部门可以采纳，不好的可以不用。同样地，对课题的挑选也要自己去选。譬如我有我的想法，我选了题，并不要求大家都照我的做，这样才不至于走偏到一条路上去。

我介绍一下自己的研究方法，提供大家参考。总结我的科研工作经验，我认为抓住题目很重要。如前面所讲，我研究小城镇的几篇文章和边区开发的《赤峰篇》都是这种性质。即先破题，提出问题，再进一步深入研究。弄得不好，抓的不是科学命题，整个研究工作就会失去了意义。如我在赤峰地区从自然生态平衡方面找出问题，看农牧矛盾如何转变为农牧结合。这只是一种命题，一种看法，并不是结论。要反复调查研究，用事实来证实这个看法对还是不对。这次在包头地区提出一个人文生态问题，是否有人文生态问题存在？是否失调了？如何去调整它？这也是一个命题。当然也可以提出很多其他问题。如会上一些同志谈到我国东西部的不平衡问题，如何克服这种不平衡，国家的资金应如

何投放和分配等等。这里不仅是个东西差距问题，还有不同时期的政治形势乃至国际形势的影响，有些是不可预测的。如果科学资料不够，依据不扎实，多争论下去，虽然会引起不少人的兴趣，但不会有什么结果。当然作为讨论我不反对。可是我们做科研工作一定要强调从实际情况中去做调查，要做扎扎实实的研究工作。例如人口流动总是有原因的，过去是关内向关外移动，挡也挡不住。现在关内农业经济复苏了，是否还有人移出来？是否又有些人向回迁呢？今后开发边区所需要的人力、财力、智力如何解决等等都需要老老实实在地做些调查研究。

我过去没有在城市中做过调查，这次考察包头，对城市发生了兴趣。多接触新事物就会多想问题，思想才能更新，才会活泼起来，否则就会僵化。中国小城镇的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特殊道路。因为它有很多特殊条件。那么边区是否也走这条道路？我认为是可以走的，可是需要不少先行条件，否则不易发展起来。我们不能只凭推理，要跟上客观实际的发展去观察，要调查研究。我多次讲到“二传手”问题，打球要有“二传手”，科技知识的传递需要“二传手”，大城市向乡镇工业扩散技术也需要中等城市做“二传手”。同在一个江苏省，苏南和苏北的条件不同，乡镇工业发展阶段就不一样，就有不同的实践。我们需要观察分析和比较。边区乡镇工业的发展就是一个有意义的专题。

这次在包头的企业中看到为了企业自行消化人口增长，解决子女就业问题，产生的大集体、二集体等种种安置方式，这是个劳动力转移的问题。这类似农村劳动力转移时出现“农民工”新事物一样，都是群众的创造，都需要在实际中进行研究。有趣的是它们都保持着中国传统的血缘观念的影响。这些大集体、二集体就像没有分家单过的子女，虽然“独立核算”，实际与主企业保持着种种关系，不能不给予各种照顾。我们只在包头开关厂

看到了一个分了家的子企业，主企业给了它一个拳头产品，能够养活自己而真正独立了。

所以搞研究，心里要有个题目。要解决什么问题，心里要清楚。到不同企业中去观察要会做比较。一定要老老实地观察，善于比较分析。要和实际工作者商量，以诚相见。这样的研究工作是会受到欢迎的，因为多少会给人一些启发，去解决实际问题。我们的工作因此也会得到更多人的帮助，不致脱离实际。脱离了中国社会实际的社会学，又有什么用呢？

我希望有更多人这么做，但不等于只有这一种办法。还是要提倡八仙过海。不搞一家之言，提倡多家之言，搞“群言堂”。这就希望参加协作的各省的同志们各显其能了。这次会上，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和社会学系及各省区 10 个单位组成协作，只是个松散的联盟。各地还是要独立作战，分散进行。只是要创造交流的机会，互相借鉴，交换意见。科学是不分上下级的，学术研究不适用这种行政观念。没有什么“头头”。我们知识界和科学界要有这种精神，要自己努力去发展，但不脱离相互的帮助。怕的不是有无支持或经费，而是我们自己拿不出东西来，怕的是滥竽充数。科学的事业，只要走对了路子，肯下功夫，自会有正确的社会评价。现在有些不好的风气，如借开会游山玩水等，我们要注意避免。开个会就要有个收获，对边区开发做点有益的事。

我到北大去建社会学研究所，主要是想与社会学系配合，本着科研与教学相结合的精神，在工作和研究实践中，培养一批既有社会学理论水平，又能做社会调查的社会学工作者。这实际上也是师资培养的工作。我们老一代总是希望为培养年轻一代再多做点工作，多出一把力。

1985 年 6 月 7 日至 11 日

包 头 篇

去年我开始在内蒙古进行社会调查。内蒙古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地方，概括地讲是东林、西铁、南农、北牧，一个地区有一个地区的情况。农、林、牧、矿各有特点，要了解内蒙古只能分区分段进行。去年我去了赤峰。通过赤峰地区的初步考察，注意了解内蒙古地区农牧之间的关系。在当前传统农牧业经营方式和生产技术条件下，发生了农牧矛盾，破坏了自然生态的平衡，即广种薄收的农业破坏了草场，使草原沙化，牧业衰退。为了克服这一矛盾，只有改变生态环境的恶性循环为良性循环，群众在这方面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办法。

我们和当地领导一起，去观察和总结群众的经验。这些经验说明，只有提高农牧业生产技术水平，使农业为牧业服务，发展舍饲与放牧相结合的牧业，这个地区才能恢复自然生态平衡。同时农牧业生产的发展一定要有为农牧业服务的工业的支持，如饲料工业及各种农牧产品的加工工业，而且这些轻工业也要有机器工业为后盾。就全局看，是农、牧、林、工的系统结合。

如何发展自治区的工业是我们当前要研究的问题。“西铁”主要是指包头钢铁基地。所以去年我到内蒙古自治区就提出到包头考察的想法，并请包钢经济研究所的同志带了信息，着手做了准备，两个月前又派了两位同志当先行官到包头向各企业和有关单位请教，做了进一步准备。我自己于6月1日来包头，除参加“边区开发”科学研究工作会议外，参观访问了中央、自治区、市所属厂矿和研究单位，与干部、科技人员、工人举行了座谈讨论会，学习到很多新东西，也提出了一些问题，明确了一些看

法，为今后的研究工作做了准备。也可以说是做了“破题”的工作，为在包头研究边区开发抓出一些问题来。今后将针对提出的问题，选出典型对象进行“解剖麻雀”，并在一个或若干企业中进行细致的调查工作，用材料来证实或否定提出的看法，这样才能得到反映实际的基本观点。今天我讲一些初步的看法。

如果与赤峰地区所看到的情况做比较，那里是自然生态平衡的失调，要恢复它的平衡，种草种树是前提，然后发展为牧业服务的农业，才能使农牧业优势得到充分发挥。这里则产生了工业企业中人文生态环境失调的问题，要调整这一生态环境，需要把大型骨干企业的能量扩散出去，成为发展边区工业的发动机，在一个区域内扩散工业的同时建设城市，发展小城镇，使之形成一个由大小企业构成的群落，一个有生长活力的社区。

对包头，我们首先应当看到内蒙古人民在全国各地的支援下，30多年里，取得了在草原集市的基础上建立起这样一个具有较大城市规模的工业基地的宏伟成就，现在包头的中年人都亲身经历了这个伟大的创业而且都为此做出过贡献，所以一谈起这段历史都那么亲切和生动。他们告诉我们，包头过去是个富饶美丽但人烟稀少的草原。包头地名是蒙语“有鹿的地方”，到解放前还不过是一个人口不过7万人的“水旱码头”。水旱码头是指这地方由于地处黄河要津，形成了内蒙古皮毛、牲畜和药材汇集内运和内地输入商品的转运中心，有名的西北皮毛集散地。据说当时5月份黄河开冻，就不断有各式各样的船只汇集此地。在7月中旬达到高潮，码头上停驻有三四百条船只，长达10多里。包头城内大街小巷做短途运输的马车有500多辆，集市上车水马

龙，盛极一时。但除了一些小的手工作坊外，根本谈不到工业。

巨大的变化开始于 1953 年初中央决定利用白云鄂博矿产资源，在包头建设一个大型钢铁联合企业，作为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重点建设项目之一。随后中央还决定把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另外三个项目定点在包头。我当时正在做民族工作，听到中央把这些重点企业放在包头，首先就体会到这是一件意义深远的措施。为的是要使民族地区走上现代化的道路。

我深信如果民族地区不现代化，少数民族前途是不堪设想的。长期的封建统治和民族歧视已造成了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的结果。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要实现民族平等，不但在政治上、法律上要给予各少数民族平等的权利，而且要在物质基础上提高起来，使这些权利能得到实现。因此要大力发展各民族的经济、文化。这个道理现在大家都承认了。没有生产力的发展，什么事都办不好。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生产力，首先要发挥他们传统的优势，并且要引进工业以加快他们优势的发挥，因此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业化。

内蒙古地区以林牧为主、多种经营的方针，是着重在发挥边区的优势，与此同时必须发展现代化工业来予以支持。但是边区没有工业的传统，甚至手工业作坊都很不发达，试问在自然经济状态下，怎么样发展工业？所需的智力、资金和有技术的劳工从哪里来？不解决这些问题，谈不到边区的工业化和现代化。

客观条件决定了边区的工业发展要有外助，必须充分利用从外面引进的智力、财力和劳力来发展边区的工业。在这一点上，边区与沿海地区是不同的。沿海地区已有相当的工业基础，100 多年来已培养出了一支相当强大的技术队伍。这几年我在江苏南部的农村里做调查，那里乡镇工业所以能有今天的发展，原因之一是上海技工下了乡。上海近百年来培养的技术力量，在乡镇工业中开了花。当然这里还有内因起作用。江南历来存在着人多地

少的人口压力，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打破了大锅饭，农村剩余劳动力要找出路，找到了乡镇工业。城市工业技术向农村的扩散，引起了世界瞩目的苏南乡镇工业的飞跃发展，以无锡一县来说，工业产值已超过 20 亿元。

沿海地区工业的蓬勃发展是令人鼓舞的。但同时这也使我想到了沿海地区和边区必将出现更大差距，边区将如何对待这一挑战呢？我多年做民族工作，对少数民族有深厚的感情，因此特别重视这个问题，决定把我的研究的重点从江苏转移到了内蒙古，希望能与大家一起研究这个问题，为开发边区出一份力量。

中央领导早就看到了这个问题，50 年代周总理曾动员知识分子支边，内蒙古是我国民族自治区中最早建立的一个，希望在一定的时间里能建立成一个能起模范作用的民族自治地方。当时有大批知识分子响应中央号召，来到内蒙古工作。前年我到呼和浩特，看到那里有全套的教育设置，文、理、工、农、林、医、师范等高等院校，成龙配套，在全国的新兴城市中是少有的。这反映了开国初期周总理的一片苦心。

光是引进智力还不够，还要引进工业。边区的优势是资源丰富。我国大部分工业资源都在西部，这是中国自然地理的特点。从民族方面看。汉族人数最多。汉人善于耕种土地，5000 年来，在东亚的这一块土地上精耕细作养育亿万人口，地力迄今没有衰竭，这是伟大的业绩。但同时把从事其他生产活动的民族，不是吸收了进去就是排挤在外围，居住在不宜于耕种的地方，形成了当前民族分布的格局。那是在农业时代形成的，现在已进入了工业时代，工业化改变了这种情况。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工业化的过程中，要实现民族的共同繁荣，必须使开发的资源成为共同发展的基础。

依靠边区本身的力量发展工业是有困难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决定把重点企业放在边区，利用其资源优势发展工业；技

术、资金、劳力则从外地调去支援，这不是偶然的。这是适应中国特点的道路，看来今后还要这样做下去。我们现在所提“三力支边”实际上是继续开国以来开发边区的精神。

包头是一个很突出的例子，它是国家有意识在内蒙古这个民族地区建设的一个工业化的发动机。包钢、一机、二机厂的建设，都是在这一精神指导下进行的。当时的口号是：“全市支援包钢，包钢带动全市”，换句话说就是全地区支援重点项目，重点项目要带动全地区经济建设的发展，这个方针是很全面的。

现在要问，中央的这个精神是否贯彻了？原来要求的目标是否实现了？这里要看到30年来的曲折道路。包钢建设不久，中苏关系发生了变化。包钢是从苏联引进的技术，当时约有2万名苏联工程技术人员参加了规划和设计，但是后来他们撕毁了合同，使我们遭到了很大损失，然而我们靠自己的力量还是顶住了。进入60年代后又遇到了“十年动乱”。现在几个大企业的设备还是50年代的产物，30年来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浪潮，未能影响到我们边区的大企业，技术条件和水平基本上并未从50年代提高起来。

尽管如此，包头的那些重点国营大企业在广大职工的努力下，生产并没有停顿过。不论任务完成得怎样，成绩是必须肯定的。但是如果再看一看，这些大企业是否带动了本地区的工业发展，问题就比较复杂了。我们对这个问题还刚刚开始注意，不可能有较全面的看法。据我初步的印象，这些大企业在一开始就没有充分注意到带动地方发展工业的任务。不仅如此，在设计时采取了“先生产、后生活”的方针，对企业中职工的生活并没有全面考虑，因而企业和所在地方的社会关系也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以致职工生活设施一直跟不上企业的运行，至今仍处于被动地位，而且一上来就走上了企业自己办社会的路子，使这些企业和当地社会处于隔离的状态，而搞自身的“大而全”，形成一个封闭性的社区。这就严重地限制了这些企业向外的辐射力，限制

了它们带动地方工业化的作用。

二

企业不光是有机，而且还有人。人是要生活的，在短期内，时间紧迫的情况下，固然可以采取“先生产、后生活”的做法，但“后”到什么时候，就值得研究了。我早年就听说，包钢建成后不久，发现青年男工在边区找不到老婆，于是不得不在附近建设了一个棉纺厂。后来又发现结婚后要生孩子，不得不办起幼儿园来。随着孩子的长大，又办小学、办中学。大约在70年代就出现了新一代青年的就业问题。包钢不但要包钢还要包人，一步步地形成了一个封闭式的企业。随着人口的增加，需要企业自己去“消化”，于是出现了“顶替”的办法，把有技术的父母顶下来替上未受严格训练的小青年。这种办法是对企业原有技术力量的消耗。这些大型企业，除了没有火葬场和监狱，样样都有：有公安处，有经济警察，包钢教育经费达400万元。企业办社会在全国带有普遍性，但在边区更为显著，包钢的困难就比首钢要多些。

最近我去香港看了一下，那里1000平方公里的面积，人多了只有向高层建筑发展。一个居民社区有近百幢高层楼房，近10万人住在一起，楼房下层有全套的生活设施，人们居住在里面，到外边去工作，生活和工作互相配合得比较好。这样的人文生态环境是比较协调的。而边区则不然，大企业职工生活上衣食住行一直很紧张，吃菜、住房、儿童教育等等，经常出问题。厂长要当“家长”，劳碌终日，影响企业经营。这是企业与市政脱节的结果。明显地影响了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利润很少甚至长期亏本，以这种形态进入竞争市场是很困难的。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封闭性企业本身产生的人文生态失调。包钢建立已近 30 年，职工已进入第二代甚至第三代。由于封闭，职工子女的婚姻与就业问题，得由包钢本身解决，不断内婚和顶替的结果，车间里的工人很多已结成亲属网络，不称师傅，而称伯伯、阿姨。在车间管理上出现了新的复杂性，也影响了劳动生产率。人口在继续增长，近亲繁殖，封闭社区的活力不断消耗，这样形成了这类边区企业人文生态里的第一个恶性循环。

第二个人文生态里的恶性循环更为严重，这表现在地区之间。边区的大企业是做出了贡献的，但没有能带动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现在就全国来讲东西差距拉大了，引起了边区的智力外流，去年我在呼市讲话时曾强调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来确保边区的智力资源。这一年来自治区在这方面确实做了很多工作，但是还不能说知识分子外流的趋势已经扭转。主要的原因是在东西差距拉大了的影响。

江浙一带乡镇企业急需人才和技术，而大学毕业生一直分配不到集体企业和县级以下的机关，所以知识分子成了财神，登报招贤等种种办法都出现了。去年我在扬中县听说，他们在《光明日报》上登了一篇招聘技术人才的广告，收到 1000 多封回信。我让他们分析一下信的来源，结果看到大多来自边区。这说明沿海地区乡镇工业的兴起，产生了一个对人才的很大吸引力。另一方面目前有一大批知识分子还冻结在边区，有很多是 50 岁上下的老支边人员。在这种客观形势下，那边有要求，这边人想走，配合起来，就出现了“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局面，对于边区开发的影响十分严重，有如水土流失那样出现了人才流失的问题。唯一挽救的办法是发挥边区知识分子的作用，扩散他们的力量，把他们吸住在边区。封闭的、大而全的企业看来在新形势下是维持不了的，对内对外都难维持了，企业不能继续搞封闭模式了。回想起 50 年代“包钢带动全市”这个口号，就是重点企业要带

动地区经济发展，在新形势下，寓意更深了。

三

怎样扭转这人文生态的恶性循环呢？

第一，思想上要解决点问题。企业的领导以及一般成员要从大而全和封闭模式中解放出来，要看到不开放就不能生存，不能发展。但开放出去还要有人接应，包头市能否接受和吸收大企业的扩散？这里还有一个群众的思想问题。目前群众里还存在着前商品经济的思想，同样需要改变。

我在包头坐车到旧城所在地东河区跑了一趟，看到有不少成衣铺，挂出的牌子上都表明是江浙人的。一问才知道在包头除了成衣铺之外，还有修鞋、做家具、理发等各种各样的服务行业都是沿海各省的人开办的。这对沿海地区是一种劳务输出。这批人在边区劳动很辛苦，但一年可以赚到几千元寄回去。

这是一项触目惊心的现象：在当前的边区，一方面是知识分子外流，另一方面是手艺人的滚滚而来。这说明了边区的本地居民自己一方面缺乏现代化工业的技术，另一方面又不愿做第三产业。这样下去不但人才外流，而且资金也外流。是否可以下命令冻结呢，一面不许走，另一面防止进来？那就更不行了，边区会成了死水一潭，更谈不上开发了。要欢迎这些为当地居民服务的手艺人进来，设法使他们赚的钱留下来投资扩大再生产，那就得对他们采取开放政策，让他们落户。同时边区居民为什么不可以自己学一学，开些铺子呢？外地手艺人的涌进已经有5年了，当地居民就是没有人去搞。我想这是有思想根源的。那就是自给经济里培养出来的轻商和贱役的思想。

听说民主党派支边，把天津养鸡的经验传到边区，使粮食可

以进行转化。可是群众养了鸡不愿拿到市场上去出卖，觉得这样太丢人了。卖一条牛可以，很神气，卖鸡可不行。长期以来边区因为商品经济不发达，满足于低水平的生活，不愿做贸易，搞手艺。

这种观念一下子改变不容易，可是必须想办法改变。譬如说，办缝纫学校，请老师教，甚至给文凭，说是“成衣学校”的毕业生，地位高了，有了面子，就会逐步把青年引进第三产业里面去。要欢迎外面来人输入技术，外助自立，边区人民要从自给经济的思想中解放出来。

第二，体制得进行改革。目前，包头正在进行“三张皮”的结合，即中央、自治区、地方三级的协作，改变过去各管各的状态。这样做了，三级企业通力合作，发展地方工作，使已经聚集在包头的人才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来，使他们不再外流。发挥科技人员作用的方式可以各种各样：让他们出去帮助解决技术问题，筹办新厂，改造旧设备等等。这样他们干劲就起来了。

相对而言，当前包头还拥有相当雄厚的智力资源，只要采取一些措施是可以发挥更大作用的。我在首钢参观了他们的沙发厂、成衣厂、饼干厂，这些小厂吸收了首钢两万多职工，解决了首钢剩余劳动力的问题，也解决了待业青年问题，并以小厂养了大厂，把首钢搞活了。农村体制改革推行了联产责任制，打破了大锅饭，转移了大批剩余劳动力，出现了小城镇。大企业同样也有一个剩余劳动力和技术能力转移问题。技术和劳力留在内部发挥不出作用，还发生了人文生态失调，一旦转移出来英雄就有了用武之地。

另外要找拳头产品，包头耐火器材厂就是个例子。瓷砖是他们的拳头产品。这是从唐山传过来的，因为曾有唐山来的40多个技术骨干进入这个厂，维持了与唐山的关系。通过这些人传入了这么一个拳头产品，把这个厂搞活了。这就是外地的智力支

援。江苏省乡镇企业搞得好，开始就是靠上海技工，包头大企业里的技术力量并不小，要把这股力量释放出来。

目前包头正在进行城市体制改革，把“三张皮”结合起来，互相配套，着重在把地方企业发展起来。这个方向是对头的。但是包头还要看到自己有任务，要把工业扩散到外围乡镇中去。作为一个城市，150 万人口是够大了。苏州市 60 万，无锡市不到 100 万，这两个市的工业产值都已超过 100 亿元。包头没有必要搞得人烟稠密。人多了市政费用太大，要在市外搞成一个乡镇网络，一个大小企业的群落。

我还是主张在边区发展小城镇，能使基层人民生活较快地提高起来。但小城镇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苏南的乡镇发展得快是因为有上海作为依托。而南京附近的县就比较落后，南京也有大企业和军工企业，但长期以来和这里一样是封闭的，智力资源扩散不出去。去年南京市规定每个大厂要培养和带动一个乡镇上的小厂。这个行政命令是否行得通，我还不了解。

同一个道理，平地起家搞工业是很困难的，苏北就是这样，苏南的一位书记调到苏北去当书记，用同样的办法搞乡镇工业就发展不起来。为什么？就因为上海的技术没有辐射到这里。过去无锡人到上海当技工，不少是钣金工，十年动乱时，他们回家乡了，把无锡的小型机器工业办了起来。苏北的盐城地区也有大批人到上海去做工，据说上海 1/10 的人口来自盐城地区，但他们过去干苦力，而且因为生活贫困，大多是全家搬去的，不留根，所以很少人回家乡传技术。现在盐城正在努力发展成一个中等城市，作为工业向乡镇扩散的“二传手”。包头市也是这样，要把包钢这个工业发动机的作用扩散出去，以包头为二传手，把整个地区经济带动起来。技术人员有了事业，有了前途，这里对他们就有了吸引力，不走了。留人才要靠吸引力，不能靠行政命令。因此内蒙古要发展小城镇，我看还要补一课，不能直接学苏南，

先要把大企业中的智力和技术扩散出去，发挥中等城市的作用。

第三，工业结构要起点变化。包头的工业建设是从重工业开始的，这里有资源，从重工业开始是很自然的，但是如果停留在重工业的片面发展上，地区经济是起不来的。边区重工业从内地吸收了大股技术力量，有了这一股技术力量就应当设法培养轻工业。重工业投资多，收入少；轻工业搞起来快，回收力强，而且还可以搞小型的，投资可以量力而行。重工业小了不行。要有一定规模。轻工业则可大可小，甚至以小为宜。譬如纺织厂就是如此。我在日本看到一种家庭小工厂，夫妇二人管十几台织机，24小时不停，生产率高过大厂。所以包头要以重带轻，以轻养重，光有重工业不行。只要地区经济发展了，就业问题解决了，市政收入增多了，就可以加强对市民的服务。把当前这种以企业办社会的封闭状态才能逐步扭转过来，使人文生态形成良性循环。封闭的重工业是不能常葆青春的。

第四，要充分利用超距离辐射。包头这样地区的工业发展，一方面可以依靠大企业的扩散。另一方面要对外开放，从外面先进地区，尽可能引进智力、财力和劳力。现在技术的传递已不是口口相传和当面指点的时代了。通过各种信息系统可以把新技术传进来。前面讲过目前我国东西两部分的差距正在拉开，产生一种人文生态的恶性循环。边区人才和资金外流是个大问题。从资金方面说，由江浙手艺人赚走的还是少数，大量的的是购买外地日用品引起边区和沿海贸易逆差流出去的。要改变这种逆差，一方面要提高边区出产的原材料价格，一方面是发展轻工业和原料加工业，制造日用品。边区起点低，要发展轻工业还要外地支持，要善于利用外力，自己站起来。提倡外助自立，不能靠出卖原料过日子。要大量从外面引进智力、财力和劳力。多来一些为当地增加生产力的人是不可怕的，应该欢迎的。过去30年来，大概有600万人从内地移入内蒙古，一部分被称为盲流，过去曾采取

过挡的政策。现在情况有了变化，内地农村正在发展，正在富起来。有些去东北移民的人，现在已开始回去了，将来会有一天，请人进来都不容易了。所以人口移动不要怕，问题是在如何发挥他们的生产力，发挥他们提高本地区经济的作用。

第五，要大大发展第三产业，包头原是传统经济里的“水旱码头”。为什么第三产业不能发展起来呢？思想还没有转过来是原因之一，大企业封闭也是原因之一，主要恐怕是当地工业没有发展。但第三产业不是一下子发展起来的，是随着一、二产业发展而发展的。我们现在就应当提倡和注意培养第三产业的人才。

第六，国家在对边区的政策上要采取一些特殊措施，采取保而不护的优惠政策，一定要保住边区发展的条件，而不能护短，不保护落后。补贴是保护落后。为什么不向边区投资，去发展产业呢？现在的基本情况是边区廉价输出原料，中央从受惠的企业中收了钱，再补贴到边区。我的看法这是对边区输血而不是造血，造血的方法是由发达地区向边区投资，发展边区的产业。过去有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造成了边区依赖中央，伸手要钱；要了钱来不是造血，搞生产，而主要是维持边区的行政费用。对于这一点，我期期以为不可。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能在贴补中站起来的。

我认为对边区不应采取贴补政策，但是又必须看到边区发展一定要依靠外力支援，所以应采取优惠政策。优惠不同于贴补，因为这是扶植而不是救济。利税政策应当研究，边区的税率应动用《民族区域自治法》，由边区与中央协商决定优惠办法，并且给企业生产的原料定出留成比例，利用留下来的部分去发展当地的生产事业，层层地把企业搞起来。

现在的原料价格政策也要认真研究。我国的工业资源主要集中在边区，在少数民族地区，输出的原材料价格影响着这些地区资金的收入和积累。要照顾这些地区的发展，价格需要适当调

整。另外现在边区企业的设备还多是 50 年代配备的，已经相当陈旧，按目前的折旧率，需要 15 到 20 年才能更新，速度太慢了。

大企业老牛破车，无法发挥作为这些地区工业发动机的作用。我们的政策要有利于边区大企业设备和技术的及时更新，使大企业始终保持先进的根基。

还应当提出，现在内蒙古和北京的地区工资类别是相同的，我认为还不够实事求是，内蒙古的日用品价格一般高于北京。在民族地区支边的人们生活水平至少不应低于他们原地区的水平，否则人才外流是挡不住的。

在这种形势下，我们除了采取一些必要措施，保住边区现有的智力资源和加速发展边区经济外，还应努力提倡爱国主义，鼓励支援边区，恢复 50 年代的精神，而且要防止再走曲折的道路。我们要有计划、有信心地进行改革，使大型企业发挥发动机的作用，带动地方工业的发展，为现代化农、林、牧业发展做好后盾。

四

留下的问题是：边区大企业怎样扩散它们的技术力量，带动全区的工业发展？我带了这个问题去观察包头的情况，看到了许多值得注意的具体事例。

我在上面已提到，不论包钢还是包头的其他国营重点企业，过去基本上都是封闭性的大而全的单位，封闭性的企业的一个特点就是企业办社会，职工和他们家属的生活，包括孩子们教育和就业在内，企业全得管。我已提到了他们不得不采取“顶替”的办法来安置职工子女，但是包头这些大企业近 10 年来每年待业的职工子女都有上千人，只靠“顶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另一个解决职工子女待业问题的办法是办所谓“大集体”。

我起初听到这个名词实在不明白，一问才知道，他们先把待业的职工子女集中在厂里训练，然后把他们分散到各车间去帮师傅们操作劳动，实际上是当了工人，但是由于没有招工指标，所以他们只能是“计划外用工”，工资和福利待遇都低于正式工人。这就使我想起了苏南乡镇上的“农民工”，尽管事实上已是工人，但是工人的名册上没有他们，受到不平等的待遇。

人口在继续增长，大集体也不能无限扩大，于是又出现了“二集体”。这是把待业的职工子女组织起来，成立各式各样的加工厂承包大企业的活，和各种劳动服务公司为大企业打杂。二集体和大集体的不同是在这些公司是按“全民所有、集体承包、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原则建立的。这些二集体的工人每年还在增多，不得不一个个分出去，成了“三集体”。

从大集体到三集体，都是封闭性企业用来解决本单位由于人口增殖而发生青年就业问题的办法。由于这些青年都是职工子女，所以大企业和这些“集体”也是由亲属关系联系起来的。懂得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人一看就明白，这个企业实质上成了个大家庭。主干企业像是家长，“二集体”像是长大了的子女，分房自炊。分房自炊的集体实际上并不脱离主干企业，和没有分家的子女一样。

主干企业采取了“派、请、培、帮”的办法来照顾他们分出去的“集体”企业。“派”就是由主干企业选派有经验的技术骨干去担任“集体”企业的各级领导。而且明确规定这些领导干部是向主干企业负责，主干企业随时可以撤换他们。“请”就是聘请退休的老技工、老干部当“集体”企业的顾问和老师，进行传、帮、带。“培”是选择“集体”里的青年职工到厂内或厂外去深造。“帮”就是主干企业在资金、材料、设备等方面无偿贷予集体企业使用，并且协助后者开发新产品，推广销路。总之，是大家庭里家长对待分房自炊的儿女们的一套传统办法。他们做得那样自然，那是由于这种所谓大集体、二集体的设置实质上是按传

统家属模式行事的。

如果我们在包钢看到的有些集体可以称之为大家庭里的分房自炊的模式，那么我们在内蒙古第一机械厂看到的却是儿女分家自立的模式了。一机厂开始同样走上过分房自炊的道路，他们也是为了要自己“消化”待业的职工子女，办起了大集体、二集体。但是遵循中国亲属制度的轨道，更向前走了一步，就是这种集体企业在生产和经济上能够自立时，就让它们独立了。独立是指不再作为主干企业的一部分，名副其实地集体所有了。

我是初次在工厂企业里进行社会调查，没有料到一开始就会见到这样的经营方式。这不由得我不想起具有日本特点的所谓乙型经营模式了。看来现代工业引入东方国家，确是一下子离不开当地民族特点的。从包头见到有限的事实上，做出具有概括性的理论是为时过早，但是包头所见到的决不是一种偶然现象，用亲属原则来经营我们的企业，甚至其他社会机构，恐怕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近亲繁殖的现象显然不限于边区一隅，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课题。

且不论上述这种近亲繁殖的企业扩散的方式是否利少弊多，我们可以想像，只靠这种方式是很难贯彻“包钢带动全市”的方针。利用亲属关系来进行扩散实质上是企业封闭的结果，不能认为是一些开放的形式。真正大规模的企业扩散不能走亲属渠道。开放性的扩散，在包头我们也见到一些苗头，虽然还没有成为一种趋势。

包头地方企业拖拉机厂生产的小四轮拖拉机就是在包头国营大企业一机厂的帮助下投产的。一般说来，地方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经营上都不如国营大企业。一机厂为拖拉机厂提供技术资料，帮助做好生产准备，还派了技术人员协助解决技术难题，在投产过程中又培养了小厂的技术人员。这样才使“小四轮”在内蒙古成了一种畅销的产品。又如包头内燃机配件厂接受国营大

企业的外委任务，培养了一批技术力量，在这基础上用两年时间引进了美国内燃机活塞先进技术，成功地搞出了一代新产品。

包头的内蒙古第一机械厂还采取走出去的办法，主动与地方企业联系，对地方企业的设备状况、生产能力、技术力量、质量水平进行了调查分析，把适合于地方企业制造的零部件委托它们制造。同时还把一些地方企业的人员请到自己工厂里来，召开专门会议，把准备扩散的零部件提供给他们选择。在地方企业承担制造零部件时，一机厂还提供锻料、铸件毛坯等等。以大企业为中心，采取产品扩散的形式可使各级企业成龙配套，协调发展。在技术上、人才上、产品上以及经营管理上，国营大企业对方企业进行有系统的、有计划的技术扩散是一条边区发展工业大有前途的道路。

最后，包头的大企业是否具有扩散或辐射的能力呢？我们由于见到大企业里存在着人浮于事的现象，所以曾问过一些厂长和经理：如果允许他们精兵简政，在维持目前生产任务的条件下，有没有多余的人力可以转移？他们回答说，他们只要现有人力的一半甚至 $1/3$ 就够用了，多余的可以扩散出来不致影响现有的生产任务。而且这还没有把机器设备的更新估计在内。如果这个估计是实事求是的，那么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后，城市企业和农村里一样会发生劳动力的转移问题。由此看来智力和人力的扩散是边区大企业本身的需要。绝大部分有技术的人员可以转移到地方或乡镇企业中去，为边区工业化提供一支有力的队伍。其中一部分非技术人员则可以转移到方兴未艾的第二产业里去。这正是边区企业逐步由封闭走上开放的有效途径。

我在包头的访问只是为今后关于边区开放的调查研究做一些破题的工作，着重在提出问题，而不是在分析和解决问题，我按所见的和想到的如实叙述如上，仅供读者参考。

1985 年 6 月 15 日

西部经济发展和各民族共同繁荣

这几年，我多次在东部地区调查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情况，使我不能不联想到西部地区，因为我认为如果西部地区不同样迅速发展起来，东西之间的差距势必扩大，对全国的四化事业会带来不利的影响。从去年起，我曾带着这个问题进入西北地区。

我国西部地区是我国许多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其中还包括我国五个大的民族自治区。在这样的地区讲经济发展当然不能不考虑到民族这个重要方面。

从民族的角度提出问题，很不容易用概括的词句，因为不同民族存在着不同的特点。一概而论就容易顾此失彼。比如讲一个地方居民从事哪种生产活动来取得生活资料的经济结构时，就会看到西部各民族在这方面很不一致，有以农业为主的回族，也有以牧业为主的哈萨克族。在同一民族里，由于地区不同，也可以从事不同的生产事业，藏族里就有牧区的藏人和农区的藏人之别。在我们初步考虑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问题时，我们不能不略去许多细节，而从各民族大体上相同的方面着眼。

讨论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问题，还应当注意到民族杂居的情况，在我国少数民族中单独由某一个民族居住的地区并不多。由于历史上长期的人口流动，我国各民族常常互相渗透，混杂居住，形成一股以“小聚居、大杂居”来形容的形态。因此，我们不能孤立地去看少数民族的经济，而必须把它们放进复杂的民族关系中去考察。具体地说，大多数少数民族聚居区里都居住着汉人，而且许多地方汉人还占多数。因此，少数民族地区所存在的经济问题和今后经济的发展都和当地杂居和邻居的汉人有密切

的联系，从宏观上说，各少数民族的经济更离不开汉族。所以在探讨今后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时，必须着重注意全国的和当地的民族关系，特别是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关系。

我国多数少数民族聚居在西部地区，这并不是偶然的，而是长期民族流动的结果，同时也反映了经济差距的由来，笼统说：擅长于农业，特别是种植业的汉族，在相当早的时候就开辟了东南水利较好的平原和丘陵地带，取得了以农立国时代的经济优势，其他许多民族分别住在相对来说不宜于发展农业的西南和西北的山区和草原地带，他们中许多至今还维持着传统的牧业、林业和较为原始的农业，人口较少，在经济上处于相对的劣势。

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之前，这种形势加上了民族压迫和歧视，对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是极为不利的。而且由于各民族从事生产活动的不同，也引起种种矛盾。例如内蒙古历史上就存在的农牧矛盾。汉族由于人口增殖，农村衰落，曾有大量流入内蒙古不宜于种植的草原，进行广种薄收、随种随丢的粗放农业，严重地破坏了原来在草原上生活的蒙族牧区的生产资料，早年曾是汉族发祥地的西北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与由内地移民的进入而引起的人口增长也是有密切关系的。生态平衡的破坏造成了西部各族人民共同的贫穷状态。

解放以来，民族关系有了根本的改变，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已成为根本国策，去年颁布的《民族区域自治法》更以法律形式肯定了这个原则，而且提出了各少数民族自力更生的同时享受国家对他们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帮助的权利。这是西部地区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现在的问题是怎样贯彻这项基本国策，怎样改变历史所遗留下来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开展西部中国在经济上、文化上大发展的新局面。

过去使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处于劣势的自然条件在经济上的意义，现在已开始改变。在农业时代西部各族处于不宜种植的地

区，可说是造成经济落后的原因。现在我国已开始步入工业化的时代。在这个时代西部的自然条件的劣势已转变为优势，因为这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已是矿产和能源特别丰富的地区，而这些正是工业化所不能缺少的资源，所以在工业时代少数民族地区已取得了经济发展的自然条件。

要发展西部地区经济必须充分发挥这种优势，这就要求我们改变传统的经济结构，结束盲目扩大农业地区的历史，一方面因地制宜恢复林业、牧业，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工矿业。要实行这个方针，首先是在恢复自然生态平衡，制止水土流失所引起的经济上的恶性循环，就是要种草种树，退农回牧。这对于有牧业传统的少数民族是十分欢迎的，但是对杂居在少数民族地区务农的汉人该怎么处置呢？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我去年曾在赤峰对这个问题进行调查，看到过去农牧矛盾是在一定的农牧业的生产水平上发生的，那就是一方面是自然牧业，一方面是粗放农业。如果农、牧两方都在技术上提高一步，牧业方面改变单纯靠天然牧场来放牧而能部分地以饲养来补充，就是用种草或精饲料来喂牲畜；农业方面能改变低产粮食的种植，腾出土地来种植精饲料为牧业服务，这样，农牧就不仅不再矛盾，而且互相结合了起来，这是改变农民和牧民关系的根本办法，相应地民族关系也可由矛盾转向团结。

当然，这里还有个粮食供应问题，这样做不是会降低西部地区粮食产量了么？其实，西部干旱地区农业原本是发展不起来的，粮食不可能指望自给。“以粮为纲”的做法只会促进生态的失调。所以粮食问题应从另外的渠道去解决：第一，要从宏观经济着眼，加强全国性的区域分工，由内地供应西部必要的粮食，由西部供应内地肉食和工业原料，实行互通有无。第二，比较更根本的就是汉人要学习当地少数民族，采取适应当地条件的食品结构，就是减少粮食消费量而增加肉食和乳品。这固然一时会受

到习惯的阻力，但从营养上说是一项进步的措施。

西部当务之急是种草种树，恢复生态平衡，发展林、牧业，但还应当看得远一些。我看我们必须承认西部经济开发不可能单靠林、牧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有赖于工业的兴起。西部有丰富的矿产和能源已经是公认的事。以开采矿藏为先导，随之以加工、制造、外销，这才是西部发展的大道。

解放后，已经注意到利用西部的矿藏来发展经济的方针，包头钢铁基地的建立就是一个例子。但是到目前为止，建设这些大企业只做到了为内地提供建设的原材料。包头所产的钢铁绝大部分不是留在本地区，用来发展加工、制造等多种多样的企业，而是运到内地去的。这种做法实际是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精神不相符合的，民族区域自治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国家在民族自治地方开发资源，进行建设的时候，应当照顾民族自治地方的利益，作出有利于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建设的安排，照顾少数民族的生产和生活。”

在兴建包钢的时候，中央曾提出“全市支援包钢，包钢带动全市”的口号，这就要求包钢建成之后，在包头全市发生带动工业化的作用，但事实上，包钢是包钢，包头是包头，这两张皮一直没有很好地贴在一起，使人惊异的是包头工业所需的钢铁原材料还得由外地运进。少数民族地区其他所谓重点项目的建设，可能基本上是和包钢一样的，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

如果我们肯定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必须走工业化的道路，接着就应当问：谁来发展西部的工业？这个问题的提出也就是要明确少数民族在西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根据民族平等、团结、共同繁荣的国策，我们必须反对在西部经济建设中不充分吸收少数民族参与的做法。

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必须是少数民族的发展。这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特点。在帝国主义时代，一些发达国家以威胁利诱向

不发达国家掠夺资源，把当地民族只看成是开发的工具，榨取他们的劳力进行残酷剥削。他们把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当地民族的发展割裂了。最极端的例子是北美和澳大利亚。当前美、澳两国都是工业发达的国家，但是原来居住在这两大洲的民族却都在这个所谓“开发”过程中被逐步淘汰了。现在这两个国家对原有民族的残余固然采取了救济政策，几乎每个人都可以拿到一笔生活津贴，但是他们至今被排除在当地社会发展之外，以致丧失了生活的意志，日趋于死亡。他们是西方殖民主义的牺牲者，我们必须引以为鉴戒。

我们所走的是民族共同繁荣的道路。在这道路上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必须包括当地少数民族的发展。正因为这样，我们在讨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时，一刻不能忘记这是个少数民族的聚居区。当然，要贯彻我们民族政策的基本方针，确是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解决。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少数民族的经济和文化水平都比较落后，这是不容否认的。长期处于被压迫和歧视地位，使得社会经济发展受到严重限制，而且也因此养成了封闭自给的传统，在接受外来知识上存在着种种阻力。所以要完全依赖少数民族自己去发展少数民族的现代工业是不现实的。因为这个缘故，民族区域自治法一再强调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建设上的帮助。也是因为这个缘故，近年来，各方面都提出支援边区的倡议。这是说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必须获得汉族的支援。

汉族对少数民族的支援存在着有利条件，首先是现在各少数民族杂居区里已经有大量的汉族杂居在内，如果采取适宜的措施，已在少数民族地区居住的汉族可以成为带动少数民族发展的有效力量。更重要的是在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汉族地区，现在已经在智力、财力、劳力等方面有力量支援少数民族地区。现在迫切需要的是东西互助的具体安排。

汉族对少数民族的支援是多方面的，以发扬少数民族传统优势的牧业和土特产的培植来说，在品种的改良、技术的提高以及加上工业的发展，都需要现代知识，这些知识还需要从区外引进。工业的建设更不能缺少技术和经营上的帮助，因为现代工业在少数民族中可以说是没有底子的。这些都是需要汉族支援的项目。

支援不是代替，支援目的是在使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上能用自己的腿走路。怎样能培养出一大批办得好工业的少数民族人才呢？除了提高少数民族一般的文化水平之外，还得实事求是地、手把手地把少数民族扶起来。比较切实可行的办法是在民族杂居地区首先建立以汉族为主的企业，在这些企业里有意识地吸收大量少数民族人员，在实践中把他们培养成现代工人，然后有计划地以这些工人为骨干把工业扩散到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建立起一批在技术和经营上都不脱离母体的由少数民族自己的力量来办理的小型企业。这就是我们在包头倡议的，当地的重点企业应当利用现代化的工业设备，培养少数民族工人。这些工人不应当只看成是本企业的工人，而要看到他们是少数民族工业发展的种子。重点企业有力量可以扩散技术和工人到少数民族地区去，建立起以重点企业为中心的小型工业群落。要做到这一点，重点企业的领导思想必须明确地认识到他们有发展少数民族经济的责任。

接受汉族的支援，在少数民族意识上也必须克服一定的阻力。我说过，由于历史的原因，少数民族过去的生活养成了封闭和自给的意识，对不习惯的外来的新事物存在着怀疑和抗拒的态度。刚刚获得平等地位的少数民族自然会产生热爱民族的心理，这是可喜的，这种感情也容易寄托在一些传统的生活习惯上，成为改革和开放的阻力。少数民族成员必须看到一个民族不发展起来，不现代化，光靠民族感情在这个世界上是站不住的。热爱民

族的感情必须与改革和开放相结合，那就会主动地去找寻和接受一切有利于本民族发展的支援；我们也必须看到意识形态上的改革是需要条件和时间的，最有效的方法是通过实例。在少数民族中有一个地方有效地进行了技术改革，就会不胫而走，带动一片。支援少数民族经济发展切忌空谈，而要实干。

我在广西大瑶山看到有一位科技人员，找到了治疗灵香草的蜡烛病的方法，不到一年就在山里推广开了。这几年大大提高了这些山区少数民族的收入。古人说：“治大国如烹小鲜。”那就是说，办大事要有耐心地从小处入手。在少数民族里进行改革，更应当如此。要从实从小，才能见效。

少数民族经济发展有赖于汉族的支援，杂居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居民经济生活的提高，实际上也有赖于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这些杂居在区内的汉人大多住在城里或镇上，而少数民族居民则大多散居四乡。因此，这些地方的民族关系实际上是城乡关系。城是乡的中心，乡是城的基础，双方是分离不得的。在这个意义上，更使我们觉得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决不能忽视这个地区广大的少数民族同胞。

为此我提议：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一定要符合各民族共同繁荣的要求。

1985 年 6 月

人口与开放^{* 1}

我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面积占全国面积的 60% , 人口却只占 6% 左右。我们搞现代化必须开发这些地区。靠谁呢? 首先是靠当地人民和少数民族人民。但是, 单靠少数民族不行。因为, 那些地方虽然地大物博。但智力、技术和劳动力都缺乏, 需要从外边进入。我认为, 开放小城镇和少数民族边远地区, 正是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一个办法。这样可以使人口疏散, 不致过分密集于内地, 特别是东南沿海一带, 使全国人口分布(包括智力资源的分布)更趋合理。“文革”以来, 从毗邻内蒙古的各省盲目流入内蒙古牧区的汉人有 600 万, 占现在内蒙古人口的 1/3。从实际情况看, 人口流动是必然的规律, 但应该是有计划地进行。这就叫“定向移民”, 有计划地把人迁往边远地区, 但不意味着国家都包下来, 为什么开发北大荒一定要采取办国营农场的办法? 这种办法是国家都包下来, 花费很高。赫鲁晓夫采用办大农场的办法开发处女地, 取得成功, 但我们不能照搬, 要让农民自然地流过去。少数民族地区要发展经济就要有一批汉人进去, 单靠少数民族是不行的。这个道理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现在的问题是, 既要使人能够进去, 又要使汉族和少数民族人民和睦相处, 使汉人成为受欢迎的汉人, 达到地区发展、民族繁荣的目的。

要想解决这一问题, 那就要大力进行民族政策的宣传教育, 使进去的汉人都懂得民族政策, 那些不懂民族政策的汉人盲目流

* 本文的内容曾以访问记的形式在《民族团结》1985 年第 7 期刊登过。

入少数民族地区，会增加民族矛盾，使各地民族事务委员会陷入民族纠纷的调解之中。民族工作要转为主动，就要研究在新的形势下如何使少数民族和汉族谁也离不开谁的问题。

对这个问题，还要指出，必须要端正对人口问题的看法。少数民族地区要从封闭转到开放，少数民族群众的心理也要有个变换。少数民族解放前靠封闭获得生存，现在要靠开放得到发展。

举例来说，广西的汉人过去是从桂林和广州分两路进去的，同当地瑶族打了100年仗，瑶族打败了，就跑到山上，他们的生活必需品如盐、布还要靠汉人供给。国民党对瑶族“分而治之”，把大瑶山分割给几个县来管。解放后，我们把它们合在一起，成立了金秀瑶族自治县，范围是整个大瑶山，可是仍与市镇分离。这就割断了它与经济发达区域的联系，等于画地为牢。所以，我们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要考虑有利于民族的发展繁荣，行政区划要与经济区域结合。把瑶族与汉族完全划开，并不利于发展，这个问题至今还未完全解决。

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开放中，民族地区遇到了许多新的问题亟待研究、解决。希望从事民族研究工作的同志，重视社会实地调查，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把书本知识和实际结合起来，为民族地区的四化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1985年7月

开发甘南的意义和建议

这次到甘南来，短短三天，学到了不少东西，现在讲讲我的体会。

我搞了多年的研究工作，对少数民族也有过一些接触，多数是去西南一带，对西北的少数民族我接触很少。只是最近几年到新疆、内蒙古搞了些调查研究。这次下决心到甘肃来拜访拜访少数民族地区。对少数民族我知道得不多，对藏族知道得更少。藏族是个有 300 多万人的大民族，在国家中处于很重要的地位。我去访问西藏自治区看来是没有希望了，这次来到甘南藏族自治州，对我来说是很难忘的，也是很愉快的。

来甘南州以后，我想到一个以前没有想到的问题，就是甘南在甘肃、在全国所处的地位，有什么特点，重要性在什么地方。你们谈到甘南州每年给西藏提供 150 万斤酥油时，我就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从这件事我想到了许多问题。在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对藏族采取了控制，甚至于是消灭的政策。清王朝表面上联蒙联藏，实际上是控制、削弱这两个民族，如把蒙古民族给搞衰落下去，对西藏周围的 100 多万藏族，采取包围、封锁的办法，不让它发展。现在我们对少数民族采取支持、帮助、发展的政策，如何发展藏族？总而言之，是现代化。要使藏族现代化，先得发展藏族同汉族接近的地区。这些地区容易接受新知识，容易搞现代化。也可以说是反弹琵琶，西藏的现代化可从外围着手。

人们一讲到藏族，就想到拉萨。拉萨在政治上、经济上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可实际上同汉族接近的、接触多的还是你们这

个藏族自治州。我们可以设想从西藏周围的几个藏族自治州入手，建立西藏现代化的战略。这几个州是在甘肃、青海、四川。

这次来甘南，看到了甘南州的地位。甘南州有个拉卜楞寺院，它在藏族文化上的地位就很高。现在要建设现代化，它也可以作为一个中心，作为发展和建设藏族现代化的突破门。所以花力量进行甘南州的发展和建设，不仅是为了甘南州的 20 多万藏族群众，也是为了西藏自治区的 100 万藏族群众。可以设想，把你们这个州建成一个藏族现代化建设的发动机、根据地。甘南州对西藏的建设所起的作用，是其他地区不能比的，今后西藏经济、文化的发展可以从这儿流进去。你们每年有 150 万斤酥油进到西藏，对这件事不能只看作是酥油，而应该看到这是一股经济的力量，文化的力量。

你们这条通往西藏的路，我以前没有想过。当然坐飞机可以去西藏，但这只能是少数人，而广大藏族群众到西藏去这条路是一条现存的通道。我们必须充分利用这条通道，要从酥油扩大到各个方面。现在你们除了酥油还有挂面、啤酒、日用百货等运往西藏，有 302 部汽车跑运输。目前西藏的酥油价格靠甘南的酥油来调剂，以前我没有听到有人说到过这件事。我觉得这件事很重要。发展甘南是发展藏族地区的重要的门户，这一点是我来甘南后才有的一个看法。

从这一点出发，可以看到许多问题，第一点是甘南的地位，它的政治经济地位和作用。甘南州不是自治区，而是甘肃省的一个自治州，甘南要发展，局限性很大。不像内蒙古、西藏是自治区，地位不一样，人们一提到藏族，就想到西藏，往往想不到甘南，这就是它的局限性。甘南藏族自治州在甘肃省和在全国民族工作中的地位应重新加以考虑。西藏现代化问题，是关系祖国四化建设的大事。所以在甘南这个窗口上得花较多的力量，要有一套具体的规划、措施。这不光是为了甘南，更重要的是为了西

藏，为了整个藏族地区的发展着想。

在体制上、地位上，在自治权方面，在甘南州要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法，就要下放权力。对这方面的问题还得进一步研究。在一个省内，自治州的地位应当不同于其他非民族地区。我在临夏州、甘南州都听到有这个话，自治州形同虚设，空有其名。空有其名是不符合我们整个国家政策的。要落实我们的民族政策，实施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法，就得把许多具体的权力规定下来，要清楚职权。昨天我讲到森林法，森林法中有一条是民族自治地方可以制定变通或者补充规定，这已经开了口子，现在是你们如何去用它。民族区域自治法也有一条，你们可以经营本地区的资源开发，怎么经营，就要拿出具体的办法。根据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认真拟定一套条例，就是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森林应该怎么办。这个特殊的条例是有法律基础的，是符合法律的，内容则应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总的来说，发展这个地区，用这个地区来带动西藏，要加重发展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分量，就要加强对它的帮助。这是我来甘南几天一直考虑的问题。

甘南的优势在什么地方？我来甘南前去定西看了看，定西的面貌与这儿不同。定西是一片黄颜色，黄土高原的面貌很清楚，水土流失很严重。植被草、木都稀薄。坐汽车从兰州到甘南来，黄色不多，多是绿色，有草有树，可是这儿的草、树都在退化，在破坏。三年停止破坏的这个宗旨在这里也是适用的。树的破坏我听到了，白龙江林业局这些年伐了不少树，木材是拿到了，在国家建设中起到了作用，可这个地方却受了很大的损失，不能让它的损失继续下去。在甘南，种草种树应有它不同于其他地区的意义。昨天我看了看这儿的草，草长得很低。我前年到内蒙古看到的草原比这里的好。这儿的草是“浅草没蹄”不是风吹草低见牛羊。当然这儿也有更好的草原，明天再去看一下。对这样一个草原，如何使它恢复起来，在这方面还没听到很多具体措施。

内蒙古赤峰做了不少工作，草从这么低长到那么高，我写一篇文章叫《赤峰篇》，在《内蒙古日报》上发表了，以后给你们寄几份参考。如何恢复草原对你们是很重要的。

我所说的甘南两大优势，草原和森林，看来问题还没有解决好。林业有个政策问题还没有解决，林区 16 万多藏族群众有劲使不上，看着林木越来越少。这是一个人为的事情，应该想个办法出来。对这个问题我不太熟悉，但办法总归是有的。草原退化怎么办？你们讲牧区比林区富。林区人均收入只有 40 多元、60 多元、80 多元，牧区有二三百元，玛曲去年人均收入 396 元，相差是很大的。玛曲富不光是地利好，还有一个人的问题，应在这方面再了解一下。草原退化问题这是看见了的，你们这儿是草原退化，还没有到沙化，和内蒙古不同。内蒙古是治沙的问题，你们这儿是如何增加草量、改善草质的问题，即量和质的提高问题。这方面有什么经验、措施，再给我们讲一讲。昨天听说草场承包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作为一种经济形式要有人管，没有人管是不行的。还要有一套适应这个地区的承包办法。甘南州的自然生态平衡破坏的不太严重，但草原退化、森林破坏是一定要解决的。

在这里问了几户牧民，都有 30 多只羊，20 多头牛，一两匹马，可以解决温饱，大家很高兴，放放羊，唱唱歌。刚巧碰到藏族群众的香浪节，群众很热闹。这儿生活不错，空气又好，我很羡慕这里的田园生活，可这种田园生活在当今的社会里是很难维持下去的，应该说落后的帽子还没有摘掉。我们不能满足于 30 只羊，20 头牛，骑着马儿到处走的小牧经济生活。这同内地原来说的“二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农经济是一样的。这不是目标，目标是现代化。是搞现代化，就要搞商品化，经济越提高就越要商品化。现在小农小牧经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要打破它，也是很困难的。我个人从感情上是喜欢陶渊

明诗中说的田园生活的，可是现在世界变了，变成一个商品交换的经济，在生产力迅速发展的时代，维持一种快乐的田园生活是不可能的。到甘南来的这一路，没有什么小集镇，这就是商品交换少的原因。临夏州比你们稍好一点，临夏地少人多，商品交换就好一些。你们这儿商品经济也开始了，看到了用马拉车跑运输，一天赚10多元钱。你们这儿集镇很少，汽车跑一天到一个县城才有一个小镇。在江苏，走10分钟、20分钟就是一个镇。这儿集镇少，是商品经济不发达的一种表现。

你们甘南的两大优势，草原和畜产品原来都上缴，变成了原料供应地，怎么能商品化，最后只能达到现在这种生活，不到小康水平，是一个低级的自给自足经济。每年输出一些原料，换回些油盐酱醋、衣物，在这样一个交换中，是永远打不开局面的。畜牧业已经承包了，原料在群众手中，可以搞加工，先搞家庭加工业。你们生产酥油的方式一半是手工，一半是奶油分离机，是半机械化；再由半机械化向机械化发展。有300多部汽车跑西藏，这中间有汉族，也有藏族。这些藏族群众已经掌握了机器，是不简单的。你们州里有一半的牧民群众到过拉萨，这很好，因为要搞现代化，就要流动，一动就会发生变化。但人要和商品一起流动，为朝拜而流动变不出现代化的。

藏族群众能掌握汽车，说明他们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没有文化是不行的，这些就是有用之材。昨天见了多禾大队的支部书记，他识藏文，原来当过喇嘛。喇嘛也是教育嘛！我想为什么不可以利用喇嘛庙来进行教育，不要怕它嘛！宗教也会变的。对宗教我们自己有迷信，认为宗教是鸦片烟，我们就怕它了。其实，你不用怕，宗教有它积极的一面。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利用？这就要看我们的本领了。北京的回民，不敢买清真罐头，信不过。这次在临夏，我建议他们建立一个清真食品厂，生产真正的清真罐头，屠宰可以请阿訇来念经，生产出的罐头还可以运往阿拉伯国

家。这就可以利用宗教，使它变成经济因素。这是很重要的，因为现在人们还有宗教信仰，等到他们的生活提高了，迷信也就没有了。我们不排除宗教的用处。

现在讲一下工业，搞现代化没有工业不行。在这儿工业怎么办？你们有的是资源、矿产，现在开放了，如何发展，要有个长远的观点。搞工业、矿产比较复杂，靠甘南现有的智力基础是不够的，这要靠外面的力量。昨天看了毛革厂，从南京、上海、兰州请了三个技师。一年来几趟，不在甘南时每月发 200 元工资，在甘南时每月 500 元工资，这是个很好的经验。一年花点钱，但得到的东西很多，一是提供信息，如生产什么样式的服装，否则样式不对，就没有人要。二是提供新的技术和制革材料。我们要用东部的脑子来发展西部的经济，简单地说，用人家的脑袋自己发财。这脑袋不在这里，守株待兔不行，谁到甘南来啊，一听海拔 3000 米高度，心就慌了。要花一切力量去引进，要宣传。现在也有自然流进的，在马路边修鞋的，是浙江人，有 20 多个，在这里一天少则挣四五元，多则挣十几元，平均每天可以挣八九元，大约算了一下，这 20 多个修鞋的，一年就挣你们 4 万元，你们的毛革厂全年的利润才 8 万元。修鞋的把 4 万元拿走了，这是一个新情况，叫劳务输出。你们可以算一下，一年几十万元就这样出去了，可以到邮局查一下汇款就知道了。

我们要改变甘南的传统的自给经济，就要做工作。要有商品经济意识，要把封建的传统改变过来。这虽困难，但是必须做的工作。现在已经在起变化了，可以调查一下，总结一下。浙江人来这儿修鞋是很苦的，可愿意待在这里，这叫利之所在，艰苦不怕。所以我们要用商品化经济来改变自给自足的小牧经济，要把发展经济同群众的实际利益结合起来。现在总的发展方向是很清楚的，开放、改革、走现代化道路。毛革厂是 1980 年从夏河分出来的，这叫细胞分裂法，也叫母鸡下蛋。这样去发展，将是很

快的，现在有困难，市场问题，原料问题。我们的政府、我们的领导应该注意这个问题，要帮助，要做好服务工作。

我们搞支边已经几年了，这对发展民族地区大有作用。同外边挂钩，不是乞求。我有东西跟你们交换，有利益，可以搞联营、联办、补偿贸易等办法。我们不要一想就办个大工厂，要积少成多。藏族是很聪明的，昨天在毛革厂看见一个藏族姑娘搞裁剪，很不错。所以要以藏族为主办小型企业。可以到外面去跑一跑，看一看，学一学。省里的领导也应该帮助、支持你们。

在这里千万要注意一个问题，以前民族工作最大的问题是认为少数民族落后、穷苦，我们要帮助他们，要去救济他们。这不行，越救济越不行。关键在于要帮助少数民族自己发展起来。最近，耀邦同志讲，对西藏我们不能输血，要造血。对少数民族不能输血，更不能抽血，你们这儿的林业局是在抽血，这是不行的。少数民族不能光伸手要钱，认为只有上面给钱才能办好事。一切事业，首先要靠自己，江苏也是这样开始的。有了钱不要铺张浪费，要好好用，要办工厂，一个厂一个厂地搞起来，叫它们细胞分裂，几年也就起来了。江苏才5年，现在一派繁荣。在这件事上要认真地咬紧牙根搞下去。

最后讲一下人才问题。你们这里在人才问题上教训是很大的。靠外边不容易，来了就要走。现在不靠外边的帮助还不行，但真正的力量要靠里边长出来。那么怎么办？今天早上听了教育问题的汇报，我认为对什么是人才要有认识，不要依葫芦画瓢。你现在需要什么有用之才，就培养什么人，不要图名，要图实。比如要养兔子，要兽医，要一套设备。我的家乡养兔子，兔毛产量全国第一，全拿到国际市场，后来国际市场跌价了，一跌价就不得了，家家杀兔子吃。我说跌价跌得好，要懂得自己搞加工业，不做殖民地，不光卖原料，于是搞起兔毛毛织厂。自己站住了脚。现在江苏已有亿元乡，20亿元的县。这不是很难的，是

可以达到的。但是要从小处做起。你们有的是资源，有吃苦耐劳的藏族群众，还怕发展不起来么？

搞教育也是如此，要抓基本知识的教育，小学教育要普及。现在很难，没有好教师。搞好教育要有人，光房子好不行。在甘南第一要懂藏语，把知识能传达到藏族群众中去。要搞出一套藏语的系统教育。当然学习汉语是必要的，不能搞封闭，搞封闭只有自己吃亏，但真正要普及教育要靠藏语。要培养一大批真正为藏族人服务的教师。我想应抓一抓师范教育。你们现在有个师专，可以把师专扩大，质量提高，同外地的师专学院联办，请外面的教师来讲课。情愿拿钱去搞代培，培养好了，人家还不一定情愿回来，还不如请外面的教师来这里代课，培养的人才不是多一些嘛！我回去后可以作宣传，请省里支持一下。我知道西北师院的师资力量是很强的。请他们来帮助，待遇可以好一些，发挥知识分子、教师的作用。这也是帮助民族自治州发展的一个基础措施。请他们来把你们的师范教育办好，培养一批不往外地跑的当地的教师。甘南还应培养一批能用藏文藏语教中学的教师，向西藏输血，支援西藏。这是我的设想，请你们研究一下，看能不能实现。

关于技术引进问题，民盟可以考虑。你们提出具体项目，我可以发动民主党派来帮助你们。北京帮助定西搞了21个项目，定西的杏子很多，北京、天津来了几个专家看了，建议他们搞一个果脯厂。定西自己搞了个计划，要21万元，专家们看了只要8万元，今年8月上马，9月投产，春节前投放市场，8万元全部可以赚回来。所以你们要搞几个引进项目，我来给你们搭桥。我们是民族自治州，藏族要发展、要提高，是会有人来帮助的。人们是愿意帮助民族地区的。不要自己先心虚，说我是少数民族，怎么落后。而要说我要发展，请你来帮助，给你利益，不要你的东西。提出项目，我们可以组织专家组来，叫他们来具体帮

助你们。

来甘南时间短，但学到了不少东西。你们在这里责任很大，要看到自己不仅是藏族，而且是藏族现代化的先锋。要想到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重要成员，藏族地区现代化是我们国家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藏族地区的现代化要从你们这儿先走一步，用你们来带动西藏的现代化。所以，为了整个中华民族，为了党的事业，要一辈子做下去，干到底。

1985 年 8 月 16 日

定 西 篇

开发西部边区，面临两大问题。一是如何变自然生态的恶性循环为良性循环；一是如何缩短、消除西部与东部之间在社会经济上的差距。去年9月，我首次考察了甘肃省的定西地区。提出要用大系统的观点看待生态环境的改善和以东支西、以西资东、互惠互惠、共同繁荣的发展设想。今年8月，我再访定西。实际的变化使我认识到，定西人民正在走出一条改造山河治穷致富的现实路子。



地处甘肃中部的定西地区，就是历史上被人称作“陇中苦甲天下”的陇中。这块地方是在什么时候苦下来的？我没有考证。但贫困的原因和表现是显而易见的。高寒干旱，水土严重流失，生态恶性循环，使定西长期以来的灾荒不断。无以为生的人口，能走的就逃出去打工，要饭；留下来的便挖草根当柴烧，爬几十里山路去背水喝。解放以后，每逢遭灾年份，国家就得运粮解款。可年复一年的救济，仍未能使定西人民摆脱半饥饿状态。

1983年，该地区旱象减轻，农民收到了一季好庄稼，情况有了转机。然而久灾造成的问题还是成堆。1984年我第一次走访定西贫苦农户印象深刻。在一间除了炕和空锅别无他物的土屋里，一位中年农民流着眼泪诉说着他妻子的病况和断炊的困境。据说当时还有约1/3的农户与他一样不得温饱。干部还反映，一

面在落实种草任务，一面仍有部分植被在继续遭到破坏。

时过一年，再上定西，面貌有了较大的改观。

从粮食来看，在 1983 年全区总产 12.8 亿斤的基础上，1984 年达到 13.4 亿斤。今年的麦子正在收割，预计总产可达 14 亿斤上下。这三个数据表明，定西农村已连续有三年人均产粮在 500 斤以上。统计数字与我在走访时看到各家或多或少都储有粮食的情况是相符的。

在恢复生态平衡方面，定西的种草也初见成效。1983 年累计有草地 107 万亩，1984 年增加到 280 万亩。草的长势也不差，既提高了植被覆盖率，又产出了较多的干草。据估计，今年的干草和庄稼秸秆的收获量可达 21 亿斤。现在挖草根、铲草皮的现象已基本停止，路边还留着不少应当收割以待来年再发的柠条。

在日常生活用水方面，农民在这几年里修复了以往损坏的家庭水窖。据介绍目前全区的农户平均拥有的水窖在两眼以上，每眼水窖蓄有 30 到 40 立方的雨水。

有粮吃，有柴烧，有水喝，这是眼下定西农民对于温饱的理解。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在“苦甲天下”的定西，温饱问题初步得到了缓解，这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变化。

应当看到，在上述变化中，气候条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三年来定西大部分地区未受灾，平均降雨量都接近 500 毫米，这在干旱和半干旱地区是少有的。因此，定西干部在总结成绩时把“天帮忙”放在首位，并没有盲目乐观。

然而，我们必须充分肯定定西人民依靠自己去治穷致富的主动性，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躺着吃不如干着吃”。明知随时有灾荒的可能而不屈服，可以得到救济而不愿躺着吃国家。这种边区人开发边区的主动精神与基本的温饱条件相结合，便产生了进一步提高生活水平的要求和实践。

二

前几年，为了贯彻种草种树，治穷致富的方针，甘肃省拨出专门的款项和粮食，补助给种草种树的农户。在定西，按照耕地种草和三荒地种草的等级，种一亩草分别补助5元或2.5元。这种以钱、粮补草的办法在初始阶段是有效的，它起到了提高群众种草积极性的作用。可是随着种草面积的不断扩大，以钱、粮补草的效果却越来越弱，甚至还引出了新的矛盾。

据介绍，因种草同进一步的经济利益还没有挂起钩来，在初步解决了烧的问题以后，有许多农民种草的积极性不高。他们只是为了完成任务和可以拿到补助款还在继续退耕种草。因此，有个别乡、村虚报种草亩数，还有个别农户发生了上年种草，下年度又把草地翻过去种上了粮食。

由积极种草到消极应付，原因就在于草的价值在定西农民心目中发生了变化。过去，因缺柴草，有救济粮也变不成锅里的饭，因此，那时人们视柴如命，加上种草还有补助，种草的热情也就自然高涨起来。可是，现在的定西，柴垛成行，干草有余，人们也就不再用煮饭不大方便的节柴灶，而将大把的草丢进炉膛中烧掉。柴草余量较多的农民，还觉得储草是个不必要的累赘。听说干部在动员一位家中只养一头小猪、却有三年存草的青年农民完成种草任务时，他反问道：草不能当饭吃，你还叫我种，难道让我吃草？

草不能当饭吃，这句话说明了一个道理，那就是种草种树、恢复生态平衡这件大事必须与农民切身的经济利益相联系，成为群众致富的手段，才能得到切实的保证。

草固然不能当饭吃，可是在一定的条件下，草可以转化为吃

得更好的“饭”。在我的家乡吴江县，有好几个乡都腾出一些亩产超过千斤的好地栽种花卉和席草，还办了花木公司和编席厂，农民的收入远比种粮食高。在内蒙古，听说牧民不时为争草而发生纠纷，原因就在人食牛羊，牛羊吃草，草通过牛羊的转化成了他们生活的“食粮”。民以食为天，草的争执自然性命攸关。

因此，草的转化就不单是自然生态的问题，而是一个人文生态如何与自然生态协调平衡的大课题。这里所说的人文生态，是指社会劳动力，据其所处的经济地理条件和它达到的智力水平，形成何种生产结构以达到最高的生产率，以及劳动力的组织形式、劳动成果的分配形式等达到最佳配合的历史进程。说通俗一点，就是人们干什么最为有利？怎么干才最有效？

从定西的实际情况，该地区共有 1076 万亩耕地。其中在靖远、会宁北部和临洮、渭源西部有引黄河、洮河之水灌溉的水田 112 万亩，有梯田 260 万亩，其余绝大部分是广种薄收的坡田，坡田中已退耕种草的为 280 万亩。如果我们把在一般年份平均亩产粮食约 200 斤上下的梯田也算作适于耕种粮食的土地，再加上旱涝保收的水浇田，共计 372 万亩，只占总耕地面积的 1/3 强。除了水田，定西有 90% 的耕地要靠雨水滋养。然而据统计，全区耕地有 70% 以上处于年降雨量小于 500 毫米的干旱或半干旱地区，还有一小部分耕地在海拔 2300 公尺以上。

土地状况和自然条件表明，定西很大部分地区不宜种粮而适于种草。这两年栽种的 280 万亩草地长势良好也说明了该地区的种草优势。

有种草的优势，然而人们并没有在种草上得利。问题就在于草的转化还不具备条件，自然优势受到社会经济结构的制约，它不仅不能得到充分发挥，反而成了种草无用的证据。

鉴此，定西的干部意识到，以钱、粮补草的老办法应当改变。要发挥优势，就得从改变农村经济结构着手，大力发展畜牧

业，为草的转化提供条件。他们设想将原来的补助款粮作为牧业生产的基金，发放扶助性的低息有偿贷款，实施以牧促草的新措施。

三

在定西大力发展畜牧业，可以说是为生产力的提高找准了突破口，走上了正道。可是从原有的经济结构上看，牧业不是正业。因此，要实施以牧促草的措施，必须认识定西经济结构的现状及其形成的历史原因。

1983年，定西农村的经济结构是，乡镇工业占总产值的11%，农业占89%。在农业产值中，包括畜牧业的产值。1984年，据定西县的一个乡介绍，种植农业占总收入的比重为76%，牧业比重为1.5%。其余主要为工业收入。另据有关部门的统计数据计算，1984年，全区每个农户平均饲养的畜禽数为：牛、驴等大牲畜1头，猪2头，羊2只，鸡4只，兔0.1只。

由此可见，定西经济结构的现状仍是以农为本，以种植业为主的封闭自给性结构。在这一结构中，牧业不但微乎其微，而且完全是从属于种植业、为种植业服务的畜禽饲养。据介绍，在全区每户一头的大牲畜中，绝大部分是毛驴，因为毛驴是上山下坡最好的脚力，运送肥料、种子靠它，驮回粮食、柴草也要靠它，其发挥的生产作用比城市工人上下班的自行车还要大。养猪、羊也多半是为了生产有机肥。定西干部称这种牧业为农本牧业。

长期以来，在一个基本上不适宜种粮的地区，居然能形成以种粮为本，畜牧为种粮服务的生产结构，这不能不发人深省。

根据1982年的人口普查资料，全区少数民族人口只占总人口的1.26%，其余均为汉族。那么这些汉族人是从哪儿来的呢？

据考证，万历六年，整个西北地区大约只有 400 多万人口，清代大量向这一地区移民，使这一地区的人口急剧增长。我问了几个定西的老年人，他们都说自己的祖宗是从山西的“大槐树”迁来的。这使我联想到内蒙古的赤峰地区见到的情形。历史上汉族移民一到那儿，就在草原上抡起锄把开“荒”种庄稼，搞广种薄收，种一块丢一块，使土地大量沙化。游牧的蒙古族不得不一步步退缩，两种原始的生产方式的对立造成了民族之间的隔阂。据位于定西西南的甘南州的藏族同胞说，很早以前藏民游牧的地区比现在要广阔得多，后来才退却到现在这块海拔在 3000 米左右的甘南州。由此看来，在定西这个地区有可能是内地去的汉人，把自己数千年的农本传统，移植到定西这块不宜种植作物的土地上。

以农为本的传统发展到它的顶峰，便是不到 10 年前还普遍实行以粮为纲。这一政策在这地区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甚于其他地区。尽管不顾条件的以粮为纲使人们尝到了苦头，然而在以农为本的基础上培植起来的文化传统是不那么容易改变的。

看来，在思想观念里也要“反弹琵琶”，来一次意识领域的革新。要确认自然条件和商品经济规律是决定利用土地的原则。我在定西访问的几家农户，就看到他们中间已有一些专业户开始改变了见了土地就想种粮食的观念。

在定西县内官营乡，一户姓张的家庭由老兄弟三对夫妇及他们的子女组成，有 15 口人，10 个劳动力。管家的是老二，他分工搞家庭牧业，养着十几头猪、几十只羊、一群鸡和几个蜂窝，老大负责种植业。由于牧业的需要，他已抽出 5 亩粮田种上了牧草。老三则开粉坊、磨坊和负责饲料加工。这是一个种植业、牧业和农产品粗加工混成一体的家庭经济结构。这户农民在没有搞牧业和加工业之前，1983 年全家收入仅 1083 元，1984 年收入一年就翻了三番，达到 8470 元，今年上半年仅出售羊毛一项就收

入 800 元。

在同一个乡，有一户养兔专业户。那是一对有三个孩子的年轻夫妇，男的初中毕业，才 31 岁，他家的庭院内共有四个兔房，两个是半埋地下的泥土结构，每个混养着几十只皮肉两用兔；另外两个则是用砖砌成的分层隔笼式兔房，有 6 层，每层 10 个笼子，每个隔笼养一只长毛兔。在男主人卧室的墙上，一排挂着六种报纸，有《农民报》、《市场信息》等。他告诉我，为了学习养兔，他自费跑了好几个省去寻师取经。现在家里的 4 亩水田也种上了兔草，夫妇俩一心扑在兔子上，全家收入也只靠出售兔毛和小兔。

这两家农户具有的共同特点是，靠发展商品化的畜牧业生产发家致富，而且都把种植业作为畜牧业的基础，使其为牧业服务。这一特点在定西被称为牧本农业，即以牧业为主，农业（种植业）从属于牧业的需要。

在由农本牧业向牧本农业的转化过程中，我们看到这两家的程度是不同的。前者保留了一部分农本，后者则完全是牧业专业户。这或许反映了定西发展商品化畜牧生产的必经之路，即由农本牧业到半农半牧再转向牧本农业。

四

定西的乡镇工业起步并不晚，1976 年前后曾掀起过一阵工业的热潮，可此后又沉寂下去，走了一段弯路。

1983 年，是定西乡镇工业摆脱起伏，走上健康发展道路的新起点。从统计数字上看，1982 年全区的乡镇企业才 220 个，职工 2 万人，收入为 1925 万元。1983 年企业数增加到 766 个，职工 3.3 万人，收入为 4737 万元。去年地委书记带着各县县长

到江浙沿海去考察学习找差距，回来后办工业的劲头更足，到1984年底，企业数增至2913个，总收入为8000万元。

两年来，定西发展乡镇工业有三大特点。

第一是企业规模小。从现有企业数与职工数来看，每个企业不足6人。据介绍，定西对于发展工业提出了户办、村办、乡办、县办、区办五个轮子一齐转的要求，其中以户办为主。例如临洮县搞编织地毯的就有1000多户，今年该县的乡镇企业的收入正向亿元奔进。

以户办和户联办小企业为主，既符合现阶段资金薄弱、技术和经营水平较差等具体条件，也符合办工业要使千家万户富起来的根本出发点。因此搞工业的神秘感破除了，群众觉得工业不难办，在家里就可以干，热情一起来，门道也就越来越多。现在除了众所周知的农牧产品加工业，建设、运输、服务业以及小采矿业等，一些原来不为人注意的资源优势也正在利用起来。例如那些形状奇异的老树根被用来制成根雕艺术品，又如不少农家姑娘用新发现的一种低档玉做成可与酒泉产品媲美的夜光杯。据介绍，类似的工艺美术项目就有61项。由此可以说，办工业进一步挖掘了资源的潜在优势。

第二个特点是联系面广。听说渭源县有一姑娘嫁到陕西，她在那儿学到了刺绣技术，于是就动员丈夫一起回到老家，办起了刺绣厂。这是群众自发的联系。在定西的城关，我看了一个杏脯厂，女孩子坐在那儿一边剥杏核，一边说笑。这是去年定西与北京市议定的21个项目中的一项。北京市郊一家果脯厂派出一位女同志正在那儿传授技术，把质量关。这是政府之间的无偿援助。我到定西的前一天，该地区的专员领着各县县委书记刚从江苏回来，听说这次与镇江的四县一区已初步议定了大理石开采加工、猪毛加工等七个项目的联营或技术协作。这些项目还需要企业对企业进一步洽谈订立合同，这是企业之间的联系。在定西县

的一个乡，从济南市以技术转让方式引进厂一个项目，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一联系是《市场信息报》发生的作用。

现在，定西正在组织专门搞横向联系的干部队伍，准备用各种方式加强地区之间的经济交流。

第三个特点是再生力强。在内官营乡，有一家与兰州化工厂挂钩的塑料编织厂，原料由兰化提供，制成的塑料编织袋送回兰化装化肥，有趣的是这个只有 340 人的小厂却蕴含着另外 4 个生产项目：涂料、超薄型地膜、丙纶和化妆品。这些项目虽说都属化学工业，但它们在工艺上与塑料编织完全是两码事。听说这些生产项目上路以后，就要分厂了。像这样一个厂可以裂变、孵生出几个厂的情况是很普遍的。

上述三个特点是定西乡镇工业健康发展的表现，它来自干部群众对乡镇工业地位、作用的正确认识。地区干部算了这样两笔账，一是从 1953 年以来两地区农村的人均收入每年只增 5 元左右，而苏南乡镇企业发达地区这两年每年增长值为 100 元。二是即使在工业基础较差的情况下。几年来定西农民乡镇企业直接获利人均 55 元，乡镇企业利润用于支农和修建农村设施的总额为 2200 多万元，还吸收占全区 30 万农业剩余劳力的 1/5 以上进了工厂。由此他们认识到，无论从发展农、牧业商品生产的需要，或是从治穷致富、赶上先进地区发展水平的需要出发，定西必须大力兴办乡镇工业，而且非办好不可。

五

要办好乡镇工业，当前突出的问题是缺资金、缺技术。一位同志到无锡考察，看到那儿的乡镇企业把泥土变成了值钱的惠山泥人，联想到定西农民用大理石垫猪圈的情形，他深有感触地

说，有技术点土成金，没有技术金子化为土。

缺乏资金办不了厂，没有技术开不了工，怎么办？应当缺啥找啥，创造条件。那么技术资金在哪儿呢？首先要把眼光盯住东南沿海的城市和乡镇工业。

定西的干部这样做了，而且取得了初步成果。为什么会有成果呢？我认为那主要是东部的城乡企业到了必须向外扩展的时机。东部在这几年里发展很快，可是在城市受到土地、劳力（招工指标）的限制，在乡镇受到原料、能源的限制，使它们的技术与资金不能充分利用。然而市场的需求和竞争又不允许它们停顿下来，一停顿就意味着企业生命的终止。在这种两面夹击的情况下，它们要生存、要发展，就必须进行内部的改造和地域的扩展。这是工业发展的规律。所以西部的发展要到东部去找技术和资金，东部本身的发展也产生同样的需要，只不过需要的内容是场地、劳力、能源和原料。前两年苏南就有一些出资与边区共同开掘煤矿。今年由于宏观控制，在资金外流上表现不明显，但宏观控制不会是长期的，企业发展的经济规律还是在发生作用。因此，西部地区应不失时机地与东部地区挂起钩来。

当然，西部与东部之间的钩能否挂上，还得看采取什么样的原则。对东部来说，西部如果是穷亲戚上门，就不容易建立联系。定西的领导说，过去他们总有一个观念：我穷，请你来帮忙，结果就不那么理想，这就是说，只有单方面得利，联系不易建立，也不可能牢固。所以东西部之间的挂钩应遵循互利互惠的原则。

西部地区的主要优势在于资源和土地，要互利互惠就得提供部分资源或场地给对方。一句话，就是用资源换技术，借你的脑子，发挥自己的优势，共同致富。

最近，我听说西部地区的几个省为保护地方工业，相继采取了限制羊毛出省的措施，这种措施能否保住地方工业值得研究，

在这种措施下羊毛实际的流通状况如何又值得研究。而类似羊毛等资源的限制，对于东西部的资源、技术互助的影响倒是实实在在的。鉴此，我建议有关部门订立一条原则，只要在对等基础上的技术、资源互换，就应当允许流通。

东、西部之间的挂钩，建立在各自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这就要求在联系的过程中，采取企业与企业直接挂钩的方式。定西的干部就尝到过行政领导满口应承，跑到基层毫无踪影的酸果。当然，行政应当有领导权，可企业也必须有洽谈权和自决权。这二者并非一对矛盾。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东西挂钩要进行毛细血管活动，即企业与企业直接见面、商定，这样的互通有无才有基础。

六

在对外协作联系上，定西乡镇企业提出的要求是背靠兰州，面向全国。这就是说，除了上述与东部直接发生的横向联系，他们把兰州作为省内纵向联系的支柱和乡镇企业的中心。问题是在西部重镇兰州市，是否起到了它对地方工业的应有的辐射作用？从上面说到的那个塑料编织厂来看，兰州化工厂的确是背靠的支柱。可从总体上看，兰州的工业体系尚未充分发挥这种作用。有人认为兰州的技术力量本身薄弱，再要扩散是心有余力不足，对此我了解得还不够。但从苏（州）、（无）锡、常（州）、（南）通四个中等城市的经验看，前些年它们采取“产品脱壳”、“一条龙”等各种形式扶持乡镇企业，结果是越向下扩散，城市本身的企业素质越强。道理有两条，一是通过区域性的联结，使企业取得了规模效益，这叫以多取胜。二是周围的乡镇工业发展了，就迫使城市本身作结构调整，并向上海、南京等大城市伸手

求科技。这叫更上一层楼。

由此而言，兰州市的扩散是有潜力的。它不仅成为甘肃全省工业体系的核心，还能对整个西部地区的经济起到中坚、枢纽的作用。因此，兰州的地位十分重要，它有可能在将来建成“中国的芝加哥”，东部的经济力量通过兰州这块跳板，促进西部的开发和经济振兴。

由兰州市的地位，我进而想到甘肃各地区的首府、各县的县城乃至有条件的乡镇，都应当敞开城门，发散各自的力量，扶持乡镇企业。这种由上而下的层层扩散将造就一个错落有致的地方工业群落，这一群落的良性生长又能起到自下而上，层层保护的反馈作用。

五六十年代，中央各部在边远地区布了不少点，叫做三线工厂或二线工厂。这些企业现状如何？乡镇工业的发展是否也能借助它们的力量呢？这些问题值得有关部门深入调查。

今年我走访了就在定西城里的敬东机器厂。敬东厂是1970年由四机部投资1200万元办起来的三线厂，生产军用电子产品。地区干部介绍说，在1983年以前的十几年中，工厂与地区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地区的同志觉得自己是种洋芋蛋的，而工厂是搞电子的，高攀不上；工厂也自成体系，凡事不求人。

从1983年开始，地区和工厂的领导才互相走访，热络起来。就在那一年，工厂主动帮助地区扶持一家常年亏损、濒于倒闭的毛巾厂，改产由工厂扩散的电视机高频头的零部件，当年就扭亏为盈。1984年，这个已成为电子元件厂的小厂，产值达到140万元，实现利税15万元。现在小厂职工的人数已从最早时的100余人扩充到320人，今年计划产值为300万元，实现利税为22万元。

除此以外，在1984年5月，敬东厂又拉出一条生产线，与

地区劳动服务公司搞实体联合。即工人在总厂培训，技术由总厂指导，原材料供应、质量检验、产品销售等全由总厂负责。实际上是总厂的一部分，一年来该厂收入加工费 42 万元。

今年 3 月，敬东厂资助 7.5 万元给城关的乡办塑压厂，塑压厂为敬东厂加工零部件。4 个月来完成产值 30 万元，实现利税 3 万元，安排了农村社员 50 人。

听完地区介绍，我就到敬东厂，厂长和总工程师热情接待了我，他们坦率地说，扶持地方办厂是该厂发展的需要。原来，在 1980 年以前，这个中型军工厂按计划生产的产品销不出去，连年亏损，亏损总额达 137 万元。工资发不出，只得靠贷款吃饭，在这种情况下，工厂决定转军工为民用，生产电视机的高频头、偏转线圈以及骆驼牌收录机，这一转马上见了效。

1983 年，工厂生产高频头的数量达到了 50 万只，为初转产时的 8 倍多，这时再要提高产量，工厂感到力不从心。招工指标不足，场地、资金都受到限制。扩厂不可能。面对市场上越来越大的需求量，怎么办？于是，该厂打开大门，采取实体联合、协作加工、外协合同等多种形式，与省内外的 30 多家工厂挂上钩。其中有上述定西的 3 个，省内其他地区 8 个和浙江十几个。一搞对外协作，这个厂也就如鱼得水，迅速发展起来，成为全国的先进企业。1984 年生产了 185 万只高频头，今年有把握拿下 300 万只。工厂基本上只做总装，现在每天装配 5000 只。据说全国每天生产电视机为 4 万台，这就是说，全国 $1/8$ 的电视机采用敬东厂生产的高频头，1984 年该厂盈利 1200 万元，还招了本地职工 440 人，现在共有职工 2800 人。

敬东厂的厂长总结说，产品救了一个厂，发展带动一大片，如果不搞扩散，达到这样一个生产规模，工厂就要胀死。

敬东厂为所有的三线厂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它表明，国营大企业只有走开放扩散道路，扶持地方工业，形成区域性的工业发

展体系，其自身才能保持经济活力。

可是，只在生产上搞产品扩散仍然是半开放。敬东厂的企业结构仍然是封闭式的工厂办社会。对此，厂领导也颇感烦恼。职工宿舍要厂里造，分房纠纷还不少；职工子女要厂内包，托儿所、幼儿园、医务所都要厂来办。总之，职工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基本上都要由厂来管。幸亏这是一个年轻的工厂，老职工和成年子女还不算多。即便如此，厂领导仍必须拿出 1/3 的精力应付生产管理以外的事务。看来，长此以往，这里也会如同包钢那样发生人文生态的失调，即一个企业系统如果与环境割断了社会性的能量交换，那么由系统内部社会结构变化产生的力量就会形成内耗，内耗力量滋生到一定程度，原先的社会结构就会瓦解，系统也就崩溃。

定西地区和工厂的领导都赞同关于封闭性企业不能永葆青春的看法。我希望他们能够携起手来，再创造出一条好经验来。

七

要办好乡镇工业，必须有一大批精明能干的企业人才。这些人才从哪儿来？如果靠学校分配的大专生，定西每年只有百来名，其中绝大部分是教师，而且如果学校教育的内容与现实经济发展的需要不相适应的话，大学生也未必能顶用，如果靠引进，目前定西的人才流失尚未止住，而且从长远观点来看，必须要以边区人为主体的开发边区。那么，造就人才的途径在哪儿呢？

去年我曾谈到在定西的万余个体专业户里有一批能人，我还走访了其中几位，觉得他们很有前途，只要各级领导注意选拔培养，其中的一部分是可以脱颖而出，担当起发展乡镇企业重任的。

一年后，他们的情况怎样呢？我选择其中两位作了重访。

一位是姓谢的电焊工，去年他新盖了五楼五底的楼房，屋内还是空荡荡的。今年他让我在卧室边的会客室落座喝茶。一套捷克式的沙发，前面是茶几，书桌上放着四喇叭的收录机，沙发旁是18英寸的日立彩电。我注意到他手上的表也由“海鸥”换成了“英纳格”。除此以外，家门口还停着一辆价值2800元的“嘉陵”轻骑。不用问，我就可估出一年来他的收入不下万元。

这位初中毕业生告诉我，他妻子虽然还是在务农，但已学会了电焊操作，农余时间就做电焊工。可是他觉得家庭电焊工厂再办下去就要忙不过来了。因为从去年开始，他承包了县医院两幢大楼的建筑任务。他说，接受承包以后，他先后组织起了一支有120余人的农民建筑队伍，现在大楼已基本竣工，我听说承包合同签订后，建筑材料费涨了价。于是就问他有没有再向医院提出增加建筑开支的要求？回答说是既然订了合同，就得守信用。

从客厅出来，在他家的阳台上，看到不远处由他指挥盖起的那幢三层楼房，我同时看到一个经营管理人才的成长。

第二位是一个开磨坊姑娘的父亲，他叫刘仰吉，40余岁。去年他正在制作自己设计的提斗，可以用电把麦子提升到一定的高度。倒进磨斗中。据说后来他一共做了七部提斗，有一部就装在他女儿的磨坊内使用，为女儿省了不少力。今年，磨坊中增加了他的一个儿子，只有17岁。我估计那是为了女儿出嫁后，由弟弟来接班做准备的。

那么，刘仰吉本人现在在干什么呢？原来，他与另一位同村人一起承包筹建一个村办榨油厂。三大间新厂房，机器正在安装，预计到9月胡麻籽成熟后就可以开工榨油。

我听说县城早已有一家国营的榨油厂。我就问他，如果他们办的油厂竞争不过国营油厂，投资收不回来怎么办？他说，他有把握在一年内收回投资数。因为村办油厂与国营厂比有三大优

势，一是开工时间足，可以不受上、下班限制。二是他肯定即将招收的 20 来名工人的服务态度要比国营厂好。三是办厂初期工人工资可定得略低些，并节约开支。

如果地、县、乡各级领导能注意和重视类似谢、刘这样在基层成长起来的人才，用短期集训等各种方法为他们助长补缺，定西发展乡镇工业的人才是会层出不穷、源源不断的。

八

发展牧本农业要考虑肉给谁吃，毛为谁用，发展工业更要考虑如何开拓商品市场。那么，定西工业和整个西部工业发展起来，它的市场在哪儿呢？

从国内市场来看，至少可以在畜类加工产品和重工业产品两大类上占领全国的主要市场。在不便于运输的其他食品和毛纺产品上占领西部市场。我在甘肃三周，跑了三个地区，喝到的汽水都是上海生产的。我未曾作统计，但心想这样的瓶瓶罐罐，装运到数千里外的西北，所占的运输量比重一定不小。

从国际市场看，如果面向东面海外，则西部的产品恐怕很难冲出去。因为东面有两道关口，一道是与西部唇齿相依的东南沿海工业区，另一道则是环绕沿海的日本、南朝鲜、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等所谓东亚几只小老虎。这种格局至少在一段时期内相对稳定。

何立从东来，我向西方走，这是一句佛家寻找极乐世界的语言。西部能不能也向西方走，去找到西部轻工业产品的“极乐世界”呢？

我们的祖先曾用丝绸和瓷器，敲开过西部亚洲、中东、欧洲和北非各国的大门。这条陆上商道就是举世闻名的“丝绸之

路”。这是可以借鉴的历史。

南亚有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等，中东有两伊，与新疆接壤的北部有苏联、蒙古，再向西是东欧各国。这块广阔的地区都有经济结构失重的方面，正是我们可以分析的现实。

这次定西考察之后，我又到了临夏回族自治区和甘南藏族自治州。在临夏，回民制作的羊肉的确是地道的清真，完全靠得住，而且味道鲜美。我建议他们与阿拉伯国家建立贸易关系，开拓伊斯兰市场。听说他们已经有了这种计划，而且实施计划的可能性很大。除了这些，临夏与阿拉伯之间还有不少民间关系和往来。在甘南，听人介绍说，甘南藏族不仅几乎独占拉萨的酥油市场，而且甘南出产的极普通的塑料底布鞋在尼泊尔市场大受欢迎。这可以说是甘肃人民重开丝绸之路的尝试。

有历史，有现实，有尝试，重开丝绸之路不仅可能，而且应该说是势在必行。问题在于我们必须对西北的工业方向作深入的研究，抓得准，抓得早。那么西北市场的开拓或许比东南沿海更有发展的潜力。

丝绸之路得有路，公路、铁路和空运都应该有一个适应开拓西方市场的计划，尽快改变那种类似马帮式的赶着牛羊、驴驮皮毛进行交换的西北交通落后的现状。

1985年8月28日

甘 南 篇

一、上高原访藏族

一个人大概总是会有一些想要做而事实上又不大可能做得到的事。对我来说，上西藏就是这样的事。1956年，陈老总率领中央代表团去西藏，我当时还年轻，未过半百，而且又报上了名。但临行前却让医生给否决了，没有去成。我心里一直憋着一口气：不能上西藏，见不到藏族的实际社会生活，怎配得上说是个研究中国民族问题的人？时间过得真快，一瞬间已近30年，我亦老矣。年过70还要向医生乞求为我上西藏开绿灯，该认为不太有自知之明了吧。但是上高原，访藏族之心，我却并没有死。

1984年我伴随民盟一批专家去甘肃，在考察定西种草种树时，听说从兰州坐一天汽车就可以到甘南。甘南是高原又是藏区，已建立自治州，称甘南藏族自治州。于是又打动了上高原、访藏族之心。1985年我再一次跟这批专家去定西，回到兰州，就同他们分道扬镳，单独南行了。西藏去不成，甘南不妨试一试。

西藏是世界屋脊，海拔平均4500米，拉萨市区据说不到4000米。甘南在青藏高原的东北隅，是它的边缘，和西北黄土高原相接；在长江和黄河的分水岭上，海拔在3000米上下。4000米我高攀不上，3000米也许还有我的份。我说服了接待我的主人，在保证“有反应，即回头”的条件下，取得试一试的

机会。沿途还有医生同车，每天要检查血压三次。

1985年8月13日一早，我从兰州启程。同去定西考察的专家临行时还在汽车旁一再叮嘱：少说话，少活动，少劳累。为慎重起见，一天的路程分两天走，中途在临夏打尖休息，住一晚。临夏海拔1986米，离兰州160公里，刚逢有一段公路正在修整，车行近4小时。

第二天从临夏启程去甘南州首府合作。合作是个地方，藏语的意思是羚羊出没的草滩，音近汉语“作”字，取民族团结之义，加上了个“合”字，这样的地名和青海的互助土族自治县，无独有偶。

合作海拔3000米。比临夏高1000多米。行程107公里。地势逐步上升，很少陡坡，对新客威胁不大。我闭目静坐，一任车座颠簸，时而瞌睡，时而清醒，不知不觉中竟被提升了千米。

海拔高，空气稀薄，氧分低，所以不习惯高原生活的人，突然被提升会有头痛、憋气的反应，心脏弱的人更会心跳加速，难受，晚上不易入睡。说来确实出于意料之外，我这次在合作三天，在夏河三天，又几次越过3000米以上到草原家访，活动频繁而体检正常，除了每过几分钟，自然地深呼吸一次外，没有发生什么高原的特殊反应。

18日从甘南归来，所见所闻的记录比较杂散，不宜成文，因用杂文体裁写《甘南篇》。

二、陇西走廊南端的民族

我这次从兰州去甘南是沿洮河，靠着陇西黄土高原西部边缘南下的。到合作就跨入了青藏高原的东界。紧接青藏高原的这一线黄土地区出现了一条成分复杂、犬牙交错的民族地带，不妨称

之为陇西走廊。在现有的分省地图上，这条走廊正是甘、青两省接壤地区，往南延伸便到云贵高原的六江流域。这里是对民族研究工作者具有吸引力的地区。

我对西北各民族很不熟悉，过去只限于一些书本知识，书本上告诉我，在青海和甘肃接壤的地区居住着一系列的小民族。这些民族不但人数少，而且只在这地方有。其中不满 1 万人的就有撒拉族、保安族和裕固族。较大的土族不到 1.5 万人，东乡族不到 3 万人。为什么有这么多小民族挤在这个陇西走廊的南端呢？

这次路经临夏回族自治区，虽则只住了一个晚上，也没有下乡访问，但从言传口说中听到了许多富有启发的提示。临夏本身是个少数民族自治的地方——回族自治区，而在它境内却还包含了两个自治县：一个是东乡族自治县，另一个是多民族联合自治地方，即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这是一个少见的多民族聚居的地方。

从临夏到甘南的路上，汽车越爬越高，沿途我看到周围变化的景象，便开始体会到地形对民族分布的制约作用。海拔超过 3000 米之后，体质上不具备一些特有适应能力的人是住不长的，而且自然地理条件使高原上的生态环境与平原地带不同。这里一般不宜耕种；如要耕种，不长稻麦，只长青稞，但广阔的草原却适宜放牧。这些地方对于习惯农业生活的民族是不具有吸引力的。所以青藏高原长期以来几乎成了藏族所独占的生息之地。

当然，我不是说其他民族不能上高原或没有上高原的人，何况人的体质是有适应能力的。但是看来历史上许多来源不同的民族一上青藏高原，就会逐步接受已在这个地区创造了适应这个地方的生活习惯的藏族文化，而和藏族相融合。这段历史现在还没有被人发掘出来。但是我们知道不同地区的藏族自称不同：有自称“兑巴”、“藏巴”、“卫巴”、“康巴”；“巴”是藏语，译成汉语是人。在西藏北部、四川西北部、甘肃南部、青海地区的藏族

却自称“安多娃”。藏语依地区划分为安多和卫藏及康三个方言，前者没有声调，而后两者有声调。这些事实表明藏族也和汉族一样，是个在历史过程中融合了许多不同成分的民族统一体。

那些上了高原的民族，很可能还留下一些人在靠近高原的黄土地区，或是有些外来民族移动到高原脚下就停住了。这样，高原的外围地区，如陇西走廊，就会存在一些保留了自己原有面貌的民族集团了。

现在居住在这走廊里的各个民族的人，大多还说得清他们祖先并不是本地人，而是从别的地方迁来的移民。从历史记载来看，汉族进入甘肃的时代很早，甚至早在秦、汉之前。但是，现在在洮河流域的汉人却很多还是明代移民的子孙。我去甘肃前从朋友处借到一本顾颉刚先生写的《西北考察日记》。这本日记是抗战初期 1937 年 4 月至 1938 年 1 月间写的。日记里有一段话说：洮河流域一带的汉人都说祖先来自南京、徐州、凤阳三地，乃“明初戡乱来此，遂占田为土著。”许多人家如宋姓、李姓等都有家谱，记录着可以追溯到明代封过官的祖先。看来明代曾在这一带用过兵，中原的军队带进了一批移民，扩大了汉人在甘肃分布的范围。

至于这个地区的回族，一般都认为：13 世纪蒙古军队征服了中亚，回戈东征时把中亚信伊斯兰教的各族人民编为“探马赤军”签发东来，称“回回”。后来其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就在甘肃河州一带“屯聚牧养”，繁衍至今。临夏一带的回族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在回族前后移入黄河两岸的还有驻扎在这军事要地的蒙古军队和其他中亚移民集团。他们的后裔形成了目前居住在这个地区的一批小民族。土族就是蒙古军队和曾经统治过这地方的吐谷浑的后裔霍尔人相混杂而成，至今说蒙古语。东乡族和保安族都是信仰了伊斯兰教的蒙古人的后裔，说蒙古语。撒拉族说突厥语，

是另一群中亚的移民，信伊斯兰教。

至于这些外来移民进入之前住在这地区的究竟是什么民族？我现在还说不清。这次访问甘南时，听到当地藏族说，他们的祖先曾经在洮河流域居住过，后来回族进入才退居高原。这种传说是否有根据，我也不能判断。但联系我上面所说的话，可以设想，原来有一些居住在青藏高原外围的民族，在某一个时期，由于某些原因移上了高原逐渐为藏族所吸收，成为现在居住在青藏高原北部的藏族，即自称为“安多娃”的藏人。这只是一种设想，是否符合历史事实，还待进一步研究。

包含在一个较大的少数民族聚居区里的某些民族小岛有它们的特点。这种“少数中的少数”在民族工作上很容易被忽视。这个问题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更为突出。由于人少，他们必然要和其他较大民族紧密协作才能开展自己的物质和精神建设。而在这种协作中既能贯彻开放和改革的方针进行现代化建设，又要维持民族平等的地位，发扬民族特点，确是个必须重视的问题。

三、藏族现代化的跳板

甘南在甘肃的西南角上，西接青海，南通四川，占甘肃省总面积的 $1/10$ ，约 4.5 万平方公里。地方不小，但偏居于偏僻省份的偏僻地区，历来不太为人所注意。我本人对它也只有耳闻，多少有一点过高难攀之感。直到这次亲身到了这里，才发现地势不算过高，在现有交通设备下，离甘肃中心兰州也不算远，当天就能到达，而且在促进藏族现代化的工作上有它特殊重要的地位。

甘南是甘肃省内藏族聚居的地方，所以成立了藏族自治州。甘南藏族人口 24.7 万，占甘南全部人口的 46%。在甘肃省总人

口中虽然只占 1.9%，但在整个藏族 382 万人中却占 6%，而且相当于西藏藏族的 1/10。甘南的藏族重要性不仅在其人口比重上，而且还在于它地处藏、汉接触的前哨。它有条件成为藏族现代化的跳板。

我们一提到藏族，一般就容易想到居住在西藏自治区境内的藏族。其实西藏自治区里的藏族只有 174 万多人，不到全部藏族的一半。有一半以上的藏族住在自治区以外的青藏高原上，分别建立了 10 个自治州和两个自治县。这些自治州、县分布在甘肃、青海、四川、云南等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就是其中之一。

为什么各地建立起行政上不相隶属的同一民族的自治地方呢？这要回溯一下藏族的历史。在公元 10 世纪到 12 世纪期间，青藏高原分布着相互独立的许多藏族的部落，是一个分裂割据的局面。这时候甘肃中部和青海西部的藏族有些却已受中央王朝的册封，并发展了汉、藏之间的茶马贸易。元代结束了藏族的分裂局面，使其统一在中央王朝的统治之下。为了适应当时具体情况，设立了三个行政区域，平行地直属中央领导。现在的青海和甘肃的藏族属于一个单位。这里采取了土司制度，分别册封当地上层，受中央王朝管辖。明、清两代这些地区均沿袭这种行政区划，西藏地区则实行着和甘、青、川各地藏族不同的行政体制。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改土归流，取消了土司制度，西藏地区之外都实行了和内地一般的行政设置。各省区内的藏族早于西藏地区得到解放，先后在 50 年代按原来的行政区划成立了自治地方。嗣后西藏地区和平解放，1965 年西藏自治区才宣告成立。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藏族和汉族人民之间的接触最早是发生在青藏高原的西北部，也就是现在的甘青地区。我在这里提出这个历史背景是因为它还有现实的意义。藏族要现代化，必须和其他民族一样走开放和改革的道路。开放要有具体渠道。熟门熟路，甘南藏族聚居区的历史地位就值得我们重视了。

从地理上说，甘南离拉萨航空距离 1400 多公里，地形图上看去更使人吃惊；要翻越多座崇山峻岭，其中唐古拉山海拔 6000 米，真是比上青天更难。但是出乎我意料之外，听说甘南藏族竟有一半人到过拉萨，玛曲县的藏族去拉萨是人均 1.8 次。现在经常来往于甘南和拉萨搞运输的私人汽车有 302 辆，车上固然可以搭些人，但进藏的人并不都是坐汽车去的。他们和祖祖辈辈一样靠步行和骑马。

曾在拉卜楞寺住过多年的李安宅先生在他所著的《拉卜楞》一书中提到：从拉卜楞寺到拉萨共 28 个马站，就是说骑马要走 28 天，步行得好几个月。这样艰苦的路程对甘南藏族来说却并非畏途。这种勇气一般说来和他们的宗教信仰是分不开的。但是信仰后面却还有经济的动力。我已说过，在七八百年前甘南已经是汉藏茶马互市的中心。藏族生活上离不开茶叶，所以很早这个商品就成了汉藏接触的媒介。甘南也成了汉藏物质和精神文明流通的渠道。

甘南入藏的商道至今还是畅通的。上面所说 302 辆卡车主要是运输商品入藏的。其中单是酥油一项去年一共运出了 75 万公斤。这不是个小数目，试问在没有卡车运输的时代，要多少人、多少马才运得完？我们还听说，近来甘南运去的塑料底布鞋，在尼泊尔是项热门货。今天拉萨的自由市场据说基本上是由甘南藏族所控制的，拉萨市仅坐商中就有二三百人是从甘南去的。各种日用品都有出售，其中啤酒是重点。从西藏带回来的有不少从印度进口的手表、呢料，甚至西服。在拉卜楞，我们就看到有人穿印度制造的西装。

如果现代化和商品化是不可分离的话，甘南藏族已经在藏族地区起着商品流通的作用，为现代化开了门。我们看到合作市内有許多运输用的马拉板车，一问很多是藏族，不少原是住在郊区的牧民。他们这几年发现运输业容易致富，就投入了这个行业。

这不是件小事，藏族牧民开始变了。

少数民族的现代化必须由少数民族的人自己来搞。藏族的现代化就得在藏族聚居区里由藏族人民自己接受新的科学技术开始。从历史上看和从这次我访问的印象来说，甘南大有条件可以作为藏族现代化的一个起点。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集中一点力量。帮助这个地区的藏族在现代化建设上先走一步。

四、白龙江话林业

开发少数民族地区必须从发挥它的自然优势着手，以甘南来说，就是林和牧。先说林。

我这次去甘肃，先是重访定西。从定西回兰州，通过兰州经临夏去甘南。车出兰州，进入洮河流域，心神为之一畅，那是因为我已被光秃秃的黄土高原憋了一个星期的气。尽管说定西这几年种草种树大有成绩，但荒山面积太大，种上草、种上树的还不过是集镇附近的一些山头。沿公路看去，被急流冲刷成的条条深沟，把黄土割裂成为无数大大小小的丘壑，这些黄土丘壑像是剥光了皮，赤裸裸地撅起背脊，伏在大地上的大爬虫，看上去令人恶心难受。坐飞机去过兰州的人，谁也忘不了从机场到市区路上所见到寸草不生的一片荒山。想到这曾经孕育我中华民族文化的摇篮，现在被糟蹋到如此地步，怎能让人心平气和呢？！

一进临夏境内，景色焕然一新。四周山色，虽说不上郁郁葱葱，但满山浅绿宜人，我不禁回头和同伴们说，哪一天全甘肃都能装扮得这样就好了。山坡上有草、有灌木，偶尔还看得到一些范围不大的密林。地面上的村庄都有绿树为屏，公路两旁的穿天杨已粗壮成材。大田里的玉米长势正旺，割下的小麦，一垛一垛地排列成行。我好似刚从黄土堆里钻出来，看到这一派丰收景

象，真觉得换了一个世界。向导见我露出欢愉的情绪，也笑了，但是接着他便说：假如你能早来 20 年，到甘南白龙江去看看，不知会高兴成啥样了。

白龙江藏名舟曲，东西横贯甘南南境，主要在迭部和舟曲两县境内，系嘉陵江的支流。甘南南部的岷迭山脉（海拔 4920 米），是洮河和白龙江的分水岭。洮河流入黄河，白龙江通过嘉陵江流入长江，属我国的两大水系。这两条河的两岸往昔同是甘南的富庶之区。

白龙江流域是我国重要的林区，盛产云杉、冷杉，面积 220 万公顷，木材蓄积量 1.56 亿立方米。这地区分属甘、川两省，但海拔都是三四千米，居民以藏族为主。1958 年实现公社化，森林全部收归国有。1966 年建立了直属于林业部的白龙江林管局。1972 年下放到省，由川、甘分管。

自从林管局成立之后的 20 年里，林区的变化是很大的，向导所说白龙江媚人景象指的是 20 年前的事。据藏族人士告诉我，这个林区实际上并不同于东北的自然林区，绝大部分原来都属部落村寨所有。林区里住着 16 万多居民，90% 是藏族。他们历代以林为生，这片森林同时也就受到居民的保护和栽培，因而能经久不衰，保持了山清水秀、熊猫出没的胜地美景。以林为生的藏民生活向来优于甘南的牧民和农民。但是，这 20 年里却颠倒过来了，林区居民已退居末位。甘南在甘肃原来是个偏僻的不发达地区，1984 年全省人均收入是 189 元，甘南是 156 元，林区舟曲只有 83 元，最穷是 40 元。20 年来的变化和林管局的经营大有关系。

看来林管局并不是依靠当地藏族来经营白龙江林业的。在这 20 年里，这里已从东北和四川移进了一万几千名林业工人，加上他们的家属现在已超过 3 万人。据说林场和原来林区的藏民不同，对这个丰茂的林区除吸取经济收入外别无感情。砍伐很积

极，栽培则无心。想一想，一万几千工人整天用现代化工具在这林区里砍伐木材，像是用剃刀刮胡子那样，怎能不很快地把白龙江两岸的山坡一片片地刮得精光？林线后退，生态破坏。被撇在一旁的藏民，对这片有着深厚情感的森林，现在只剩下保护的义务，而没有染指的权利了。他们只能在高寒山坡上种青稞度日，日子当然越过越穷。

据统计，现在和 50 年代比较，森林面积已缩小了 $1/3$ ，木材蓄积量已少了 $1/4$ 。完全是过量砍伐造成的。因而白龙江的含沙量增加了 60%，流量减少了约 8%，生态平衡已遭破坏，白龙江成了“黄龙江”，这些变化使甘南白龙江流域水旱受灾面积达 60 万亩，仅舟曲岩石滑坡就有 260 处。上游犹如此，对长江中下游的影响更不言而喻了。

把破坏森林的责任全算在林管局的账上是不公道的。应该说，这主要是那个时代过“左”的政策造成的恶果。在少数民族地区这样对待当地资源，明明是违反民族区域自治原则的。1980 年有了一些改正，村寨附近的林木大约 4.3% 的面积已划给藏族群众作为护村林，归群众自己管理，其他的还是由国家、州、县企业来经营，情况并没有根本扭转。问题不是在林场所有权上，而是在林木的经营权上。群众得不到直接利益，很难使他们对森林起保护作用。市场上买不到木材，在急切的需要下，就会纷纷到林场来自行砍伐。所谓滥砍乱伐的现象当然也就挡不住了。看来要使白龙江变成名副其实的白龙江，还得从经济体制上贯彻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政策入手。这件需要下决心进行改革的事，在这“天高皇帝远”的地区，更需要有人替他们反映情况，说说话。

五、河源草甸的牧业

说过林，该说牧了。

甘南西部和青海接壤的边区，包括夏河、碌曲和玛曲三个县，地属青藏高原的边缘，海拔都在 3000 - 4000 米之间。这里是九曲黄河的第一曲，恰把玛曲县绕了个大半周。玛曲就是黄河的藏名。黄河的两条支流——大夏河和洮河都在这里起源。这里水源充沛，多开阔滩地。河谷宽广，形成一片片微有起伏的平岗。气候高寒湿润，适于长草，被称为亚高山草甸，是理想的优良牧场。甘南全州有草原 3700 多万亩，平均每亩产草 165 公斤，是甘南的一大资源，主要牧区就在上述三县。

这三个县坐落在高寒地区，常冬无夏，6 月里会下雪，而且阴晴变化无常，忽而晴空万里，忽而大雨倾盆。我到夏河草场赴宴，算是好天气，虽遇到两场雨，不算大，也没有冰雹，大家说我福大。这里没有无霜期可言。除了一些谷地外，显然不宜于种植其他农作物；农作物中也只有青稞适应这片土地。但是，青稞播下 20 公斤种子，也不一定能收到 100 公斤粮食。甘南全州在 1949 年只有 25 万亩粮田，后来强调粮食自给，毁草种粮，最多时达 110 万亩，总产量不过 1 亿公斤。现在政策对了头，已退耕还草 70 万亩，1984 年共收 8500 万公斤。看来，农业在这里是搞不好的，要发挥当地优势，只有发展牧业。

我们打算到牧业的重点县——碌曲和玛曲去访问，但是主人怕我吃不消，竭力劝阻，所以只能在夏河参观了牧场。车子离开市郊不远就是开阔的草地。空气清新，使人胸襟为之一敞。正值草花盛开之季，阵阵香风，令人心醉。

车子停下来休息时，我一阵高兴，弯腰摘了满手的草花，有

白、有紫、有黄，十分欣赏。不料主人却指着这些草花对向导说：“这片草地怎么退化到这样地步，你看满地是这样的花。”原来开花的不是好草，有不少还是毒草，牛羊不吃。草场退化是当前甘南牧业的一个严重问题。

当地主人支起了三个帐篷，就在帐篷里设宴招待我们。大家边吃边谈，使我了解到当前牧业发展上遇到的一些困难，草场退化据说主要是由于多年畜量超载。超载是指一片草地上负担的牲畜太多了，好草被吃掉，来不及长，毒草则蔓生，草场逐渐变质退化。

据统计，全州牲畜头数已有好几年超过了 90 万头。按每个羊单位需 7 亩草地计算（1 头牛合 5 个羊单位），现有草地面积实际上已超载 20 万头。牛羊多而草少，结果越吃越不够。发展牧业不能只看存栏的牲畜头数，牲畜多不一定好。这是个牧业效益问题，在商品化之前牧民是看不到这个道理的。

有效地利用草地必须从自给牧业转变为商品牧业。也就是说，养了牲畜不是为自己食用，而是准备出卖，换得货币来购买消费品，从甘南来看，这种转变还刚刚开始。过去这几十年来，藏族牧民已过上了没有剥削的太平日子。我在合作镇通过翻译和藏民谈话，发现他们对当前生活充满着乐观态度。一家人养两三口牛、三四十只羊，骑在马上扬鞭驰骋，真是其乐陶陶。当地民谚：“三十只羊、两头牛，骑上马，满山游。”当然在这种精神世界里讲求发展商品牧业是有困难的。

比如说要讲求效益，就得讲究畜群结构，多养那些强壮年轻的母畜，幼畜出生率就可以提高。及时出卖，以减轻草地负担。同样一片草地，同样定量的饲料，回收的价值就大得多了。这应当是很容易明白的道理，但是在自给牧业中就难以做到。牧民们只看谁家牛羊多就算谁家富，牛羊群里壮大的牲畜多就算养得好。而这种传统的标准恰恰与牧业效益相反。效益重在出栏率，

畜群结构重在生育期的母畜所占比重，要牧民从传统意识中转变过来，还得加强工作。

然而，现实却在教育牧民。草地超载，秋天牛羊吃不饱，抓不到膘，到冬天就容易死亡。这点牧民是清楚的。但是怎么办呢？近来甘南出现了一种新的办法，就是在严冬降临之前，就把畜群赶到北面的临夏去出售。关于临夏，我在前面已说过，是回族自治区。回民以务农为本，但各家各户都要养几只牛羊供自家食用。他们不从事放牧，而习惯于舍饲，各家各户把少数牛羊养在棚圈里，用饲料喂它们。这样到了冬天，既不怕寒冷的气候，也不愁饲料缺乏，因为这个地区种的是玉米，有大量的精饲料。他们在初冬从甘南牧民那里买回牛羊，舍饲一冬，长得肥肥的，过年上市，就可获得高利。这可说是商品牧业的开始。

我觉得这种区域间和民族间在牧业上的协作，是很值得有计划地推广的。这种协作可以使放牧和舍饲结合起来。甘南牧区闹牲畜超载，如果冬季把大批牛羊及时赶到临夏农区去催肥，不是可以减少目前畜群过冬大量死亡的情况发生么？看来发展牧业也需采用农牧协作的办法。这个办法会促进牧业的商品化。商品化使得牧民明白牧业效益的意义，而接受改良草地、防止退化的措施。不仅如此，这个办法也会在经济上把两个自治州结合起来，加强民族团结。这不是一举两得的好事么？

六、培养人才第一

按上两节所谈到的关于林、牧的情况来看，把甘南建成藏族现代化的跳板是不是空想呢？我看不能这么说，但得承认，要实现这个设想确是要费一番工夫。甘南要在藏族现代化上先走一步，就得恢复林、牧业和发展工业。发展工业一要原材料，二要

能源，三要技术，四要资金。我说的不是空想，是因为甘南在原材料和能源上底子好。得天独厚；我说还得费一番工夫是因为技术和资金两不足。

得天独厚的资源主要是指森林和牧场。现在情况诚然不那么好；森林还在破坏，草场还在退化。但是情况一明，扭转局面决心就大，领导上确实是在为改变恶性循环、朝着平衡生态的方向努力，并采取了一些有效措施。金饭碗中竟还是金饭碗嘛。

说到能源，甘南不用愁。它有两条江，即白龙江和洮河。它们分别是长江和黄河的上游，水势湍急，落差很大，大可发电。据估计可以利用的水力资源有 2400 万千瓦。现在只开发了 20 万千瓦，还不到 1%，可谓潜力巨大。

技术和资金不足是甘南发展工业的最大困难。技术要人去掌握。从目前情况来看，能够或已经掌握现代工业技术的人在少数民族中确是不多的，甘南也不例外。要迅速发展甘南的工业，第一位重要的是必须抓紧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培养人才之关键又在于教育。说到这里我们不妨了解一下甘南的教育情况。

民族地区办现代学校教育可不简单，民族间语言不同。如果缺少会说本民族语言的教师，上课时学生听不懂老师说的话，教学实际上是无法进行的。甘南在 1974 年前就碰到了这个困难。甘南人口几乎一半是藏族，但是连小学都找不到合格的藏族老师。请了汉族老师来，学生不懂汉话，教室里秩序很难维持。据说有一位老师在教学生念书时，学生乱闹，他大声喝了声“不要吵”，全堂顿时齐声跟着说“不要吵”，还以为是在念课文。这样的课堂自然吸引不住学生，学生到校率很低。有些家长索性不让孩子上学，入学率因之也很低。

1974 年以后，情况好些，少数小学里对藏族学生用藏语上课了。目前这个问题据说基本上已经解决了。但是教师质量不高，小学的入学率还不过 64%。我没有得到分民族的统计，说

不出在入学率上藏、汉的比例。

这里的中学，除了民族中学外，其余都用汉语上课。之所以可以请汉族老师，是因为藏族学生已经学会汉语，语言上没有隔阂了。但是要到外地去请老师上高原来执教又很不容易。尽管已经采取优惠政策，在甘南工作的干部一律有高原津贴。现在一个小学教师每月的工资可以有 100 元，中学教师 150 元。可是这点优惠吸引力并不大，甚至留不住人。从 1979 年到 1985 年这 7 年里，省里分配到甘南来的师资名额为 193 人，实际报到的只有 157 人；同期调走的教师为 96 人，结果实增仅 61 人，平均每年不到 10 人。分配来的是新手，调走的大多数是老教师。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要保证教学质量是很困难的。根据当地教育机关的统计，目前各中学共有教师 1400 人，缺额达 469 人，竟占 1/3。

另一方面，1977 年恢复高考以来，从甘南录取的大专院校新生共 605 人，每年约 75 人，这些学生毕业之后回来的极少。甘南不仅教育战线上人才流动出现出超，其他战线上同样发生人才外流的情况，主要是外地干部要求回原籍工作。

当地人才要当地培养最为可靠，这是这几年的一条经验教训。甘南教育战线已有打算。他们准备设立一所培养本地中小学教师的师范学院。这所学院的师资又从哪里去请来呢？这又回到老问题上了。但是，现在他们已经摸到教师的心理，要把他们调到高原来是困难的。有句话说：“上珠穆朗玛峰不怕，因为下得来；去甘南可不成，一去回不来。”因此，他们想出了个办法，这个学院筹划着要同兰州师范学院联办。教学部分由兰师负责，拨出一部分兰师的教师来甘南教课，每周、每月来回，半年、一年轮换都行，经费由甘南担负。

联办学校是一个提高民族地区教育的新构思，在甘南这样离开城市不远的民族地区是具有可行条件的。我想各地民族学院是

否可以考虑采纳这种创见，灵活机动地发挥民族教育师资的作用，在民族地区就地培养本民族的工作干部。当然这种设想能否实现，还有待于甘肃省当局和兰师是否有决心、肯出力把甘南迅速发展起来。

甘南藏族的现代化可能是整个藏族现代化的先行者，而走上这条道路的第一步是培养人才，教育要先行。要办好教育，师资的培养又是第一位的。我对甘南师院的创建寄托厚望。

七、外助自立建设工业

我们花了一个上午和甘南领导同志讨论教育和人才问题，会上空气并不那么令人舒畅。虽则我们找到了联办师院的设想，但目前人才似乎还在流失。甘南是不是真的吸引不了人、又留不住人呢？

饭后，和我一起去的同志说皮鞋跟脱落，走不成路了。一打听，市中心街头就有修理皮鞋的摊子。我午休起来一看，那位同志的鞋跟竟然已经修好了，他兴冲冲对我说：“谁说人们不敢上甘南，街上有的是内地来的手艺人。”接着他讲了以下的情况：

修鞋的是一位女工，浙江诸暨人，在这里设摊修鞋已经两年了。同她一起来的有 20 人，都是修鞋的。她和另外一个同伴合租一间房，月租 14 元，每天收入多则十几元，少则六七元，一年净收入可以达 2000 来元。家里有个孩子由婆婆带，每年回家一次，家里的田地请别人种。

从外地到甘南来做活的人并不只是修皮鞋，更多的是做成衣的、干木工活的、理发的，等等。做成衣的南方叫裁缝师傅，他们在甘南有的只替人裁剪款式时兴的衣服；有的来料缝衣，还有的是备好各种花色的衣料，供顾客选择。顾客可以不费事就做成

一件合身合意的衣裳，因此很受人欢迎。这些从内地来的手艺人，有摆摊子的，有租房开铺营业的，有的还挂招牌。木匠大多是流动的，由顾客提供膳宿，承做各种家具，一家完工，再走一家，似乎没有空闲的日子，收入比修鞋的要多得多。最艰苦的要算养蜜蜂的人。他们以同乡关系结成一个小帮，搭火车，包卡车，到这遍地是花的草原上来放蜂采蜜。在公路上我们常常看到放蜂的帐篷。我曾经下车访问过他们。他们操着四川口音告诉我，他们每年结伙来草原，住四五个，月，回家时可以净收 2000 多元，兼制蜂乳的人收入就更多了。采蜂的每人一个帐篷，食宿都在里面，基本上是各自经营，风风雨雨，生活十分艰苦。

这种流动的手艺工人，现在在边区各地都会碰到。1985 年我去赤峰，深入到小镇上去，就见浙江人挂牌的成衣铺。后来我在包头、伊克昭也见到这样的手艺工人。真想不到这次上高原，又遇到他们。他们分别来自浙江、江苏、四川等省，总数不好估计。从本乡来说，他们是劳动输出的一部分。我以前曾说过江苏省劳动输出大约有 1 万人，但只指地方集体单位同其他地方订立合同的建筑工人，并不包括这些单干的流动手艺工人。

这些流动手艺工人是以自己的劳力为边区居民服务的，所以受到边区居民的欢迎。边区城镇服务行业不发达，穿了皮鞋磨了跟没人修。有这些手艺工人前来不是正中下怀么？这些外地手艺人一方面是由于当前的户口规定不能落户，另一方面还有离乡不离井的习惯，所以他们有较大的流动性。通过这些流动手艺工人的手，边区每年要汇出大笔资金。我在伊克昭盟东胜市得悉，通过当地邮局每年汇到浙江去的小宗汇款总数达 40 万元。以每人汇去 2000 元计，50 个人就是 10 万元。东胜这个镇上的流动手艺工人不下 200 人。如果以此类推，整个边区通过这个渠道外流资金必然数以亿计。

从表面上看，这可以说是边区的资金流失。但事实上，这些

外地工人把手艺送上门来，比向外地购买时兴服装、家具等消费品，还是便宜些。归根到底，边区自己的工业还不发达，手艺人还没培养起来，第三产业尚未发展，资金外流是挡不住的。目前边区经济的实况只能用原材料到内地去换工业品，入不抵出，就要靠中央补贴。这绝不是长远之计，可说是一种输血的办法。

变输血为造血，就应改补贴为投资。帮助边区发展工业。工业发展了，西北自己就有钱维持自己的行政机构，而且可以积累资金，自己发展工业了。这才是造血，也可以叫作外助自立。

当前边区技术力量不足怎样发展工业呢？看来，是得在人才上采取造血措施。上一节所说联办学校的意义就在这里。学校教育是基础工作，但远水救不了近火。当务之急是要引进一些手艺人、工厂里的技工和工程师。手艺人虽然已经来了，但是属流动性质。变流动为固定，首先是使那些愿意落户的人落下来。更重要的是引进他们的手艺，培养一批本地工人。撒种出芽，落地生根。

我们那天下午参观了合作市的毛革厂。接待我们的是该厂负责人，一个藏族转业军人。这个厂原是夏河皮革厂的一个毛皮车间，1980年独立建厂，当年投产。现在已有职工286人，其中158人是汉族，73人是藏族，还有回族、满族，是个多民族的工人队伍。1985年产值达174万元，利润8.7万元。一年定制皮夹克2万件，远销东北。厂里甚至想向国外“伸伸腿”，已经和美商联系出口兔毛皮加工品和土拨鼠皮手套。我参观这个厂，看到这番情景很激动，这是甘南工业化的种子，生机勃勃，充满活力。我问起他们的技术状况。他们告诉我起先是从夏河制革厂里传下来的。这是我曾说过的乡镇工业细胞分裂法的例子。这位藏族转业军人，就在夏河厂里结识了三个上海同行，建立了联系。一个是南京皮革研究所的，一个是南京虹光皮革厂的，一个是南京黎明皮革厂的。靠这三个人，合作市的毛革厂得到了传递信息

的渠道和技术支援。他们每年来甘南几次，带来制革所需的机械和化学药剂。1985年这个厂为东北制造的皮夹克就是他们穿针引线的。这也是我曾说过的超距辐射。南京的技术能力可以直接辐射到甘南，不必经过中间梯度媒介。

我又问：南京人为什么愿意帮忙呢？他们说：一是有交情，二是靠优惠待遇，三是不要求他们长期住到高原上来。他们还在南京供职，每年来几次就行了。但是，到甘南来的时间，工资加倍。

群众是聪明的，他们在实践中创造了符合当时当地具体情况的行之有效的办法。上述三条，我看也适用于其他民族地区。这是一条兴办新厂、吸引技术的道路。交情一条可以扩大一些，超出个人之间的关系，代之以支边的各种渠道。

我们对甘南人才外流的担忧，至少已看到了解决的办法。也就是说，“造血”有门了。如果能推广毛革厂的经验，最近几年甘南的小型企业就能搞出个底子来。更值得提出的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少数民族工人队伍的形成。正是这支队伍在把甘南建设成藏族现代化的跳板。如果把这个实例和白龙江林区那种撇开当地藏民而去移入汉人来开采的情形相对照，何去何从，不是极为明白了么？

八、访拉卜楞寺

甘南行的最后一站是夏河拉卜楞寺。拉卜楞寺是甘青地区喇嘛教的圣地，每天有从各方来的藏族善男信女到这里朝拜。他们绕着寺院转经，口中念念有词，有些甚至每步一叩，四肢舒直，五体投地。拉卜楞寺门从开放以来又成了各国旅游者的胜地，他们手持相机，东跑西窜，寻觅新鲜镜头。

我去拉卜楞寺既非朝圣，又非猎奇，也许可说是还愿，偿还我很久以来的夙愿。人类学这门学科里最难念的一课应当说是宗教。一个无神论者怎样去认识另一个民族的宗教精神世界呢？耳闻不如眼见，我总想有个机会亲自访问一个藏族地区的喇嘛教寺院。这次既然到了甘南，怎能不去久已闻名的拉卜楞寺呢？8月16日午休后，我们从合作启程去拉卜楞寺的所在地夏河，行程只有70公里，但因正在修筑公路，傍晚才到达。

车子在曲折的山冈里走了半天，夕阳西下时刻，接近夏河，眼前豁然开朗。遥望山谷里一片人烟稠密之区，平顶土屋中矗立着不少寺院的金顶。公路穿过市区，一座座宏大的庙宇，闪过眼前。夏河市容别具一格，和临夏、合作迥然不同。直到此时，我们才真正感到身入藏区。

拉卜楞寺初建于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正是《平定朔漠方略》编成的一年。这一年可说是清朝统一版图的鼎盛时期。其时与清皇室联盟的青海和硕特蒙古前首旗黄河南亲王创议在他的势力范围内的甘青地区建寺，一方面迎合清廷“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的政策，一方面用宗教巩固他的地方势力，他物色到了本地出生、正在拉萨“留学”的嘉木样大师，迎他返籍选择扎希奇谷地建筑这个寺院。最早称扎希奇寺，后来因为嘉木样的名声大振，就用他住所专称拉卜楞作为一般习用的寺名，而且在拉卜楞寺的势力扩大的过程中又被用成该寺控制地区的地名。

该寺创始人嘉木样一世，从他的传记来看，是一个好学深思，在神学上颇有造诣的喇嘛教徒。他矢志要在他的家乡建立一个可以和拉萨匹敌的喇嘛教佛学中心。拉卜楞寺不只是一般祀奉神明的寺院，而主要是个喇嘛教的高等学府。从嘉木样一世起，拉卜楞寺在230年中不断发展，陆续建立了六个学院，不但在神学上，而且在天文、历算、医药、艺术等学科上都有专业设置，

在保持和发扬藏族文化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拉卜楞寺作为一个高等学府，它的主干部分是嘉木样一世创业时（1710 年）建立的闻思学院。在这里进行喇嘛教经典的基本训练，因而也是藏族文学的研究中心。学习时间最长，课程也多。解放前在学院学习的经常有 3000 喇嘛。其次是续部下学院，也是嘉木样一世 1715 年建立的，可称之为神学院。第三是时轮学院，1763 年嘉木样二世所建，可称之为艺术学院，学习宗教舞蹈和音乐。第四是医药学院，1784 年嘉木样二世所建。第五是喜金刚学院，可称之为历算学院，1881 年嘉木样四世所建，学习天文和算法。第六是续部上学院，是与续部下学院性质相同的神学院，1939 年嘉木样五世所建。在这 5 个专科学院里学习的喇嘛为数较少，最盛时也不过百余人。

作为一个高等学府，该寺有严格的学制、课程、班级、考试和学位。无论什么人都可以入学，但必须拜一个在寺的有学问的喇嘛为师。一个老师只收少数学生，负责指导他们参加各学院各班级的日常功课学习。学生的生活都得自理，对寺院或老师不交学费，但要为老师服役。师徒之间存在着亲密的关系，听来他们确有尊师爱徒的好传统。寺内所有喇嘛都是由自己家庭供养的，只在有人来寺布施时才能吃到“大锅饭”。每个学院的公共厨房里都有个大锅，可以煮几百人的斋食。普通喇嘛生活清苦俭朴，当然寺庙本身过去拥有巨大的财产，因为许多信徒甘心情愿地把一生劳动的积累，一下子都施舍给寺庙，自己再去过乞讨的生活。

这座藏族的高等学府在群众眼里只是一般的大寺庙。在这里进香朝拜、做功课、祈求来世的幸福。我这个世俗者的心里实在有说不尽的感叹。这是一种社会制度，一个人生出来就在这种制度里成长，把这种制度的一切思想和行为规范视作当然，封锁在这笼子里过一生。他们那种忠厚虔诚的性格只应引起人们的尊

敬，但是他们所得到现世的报答却是艰苦和悲惨，那又怎能使我心安呢？

我这次到拉卜楞寺做客被视为嘉木样大师的上宾。承蒙他和我同起同坐、同车出游，我对他的热情真是不胜感激。出行时，所遇到的藏民无一不毕恭毕敬地低着头，鞠着躬，摊开双手，站立在路旁。车子一停，他们就一拥而上，把头伸过来，意思是要我们摩顶，有人甚至用头冲撞我们的汽车，这些行为，完全是他们内心世界一片虔诚的自发流露。我对他们真是感愧交加。他们是值得尊敬的人，因为他们是有理想的人，没有理想怎能这么虔诚？但是他们自小从社会接受的理想又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呢？如果一个无神论者也可以用祈祷来表达他的心愿，我很想祈求他们所信奉的神明能允许他们在现世预支他们后世应得的报应。

我参观拉卜楞寺的藏书院和医药学院时，听到闻思学院1985年失火的事件。当我看到这么多珍贵的经书重屋叠架地堆积在黑黝黝的经堂里，想的却是这样一大批藏族文物的安全保障。与其受灾之后动用大笔款项去重建，实在不如赶紧采取一些防卫措施。亡羊补牢，未为迟也。

1985年9月25日

民族调查工作不能脱离实际^{* 1}

我自己对五种丛书^①的编纂工作出力很少。这五种丛书搞了6年，这是在三十几年工作的基础上的总结，真正踏实地搜集资料是在前25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有多少个民族，我们都不清楚。毛主席在他的文章中列举了中国少数民族的名称，最后用了“等等”两个字。这“等等”二字给我们出了个问题。对这个问题我们搞了30年，现在大有进步，心里有了点数。如果有人问我们，我们连老底都不知道，每个民族是什么来历也不知道，怎样交代得过去。现在每个民族都至少可以讲上几句话。这是个很大的收获。

回想起来，我们为此花费了很多劳动。不仅是脑力，还有体力，搞调查要爬山呀！我在广西访问时就骑死了一匹马。经过很多人多年的大量劳动取得今天的成果，是值得安慰的。对我个人而言，也可以自慰，总算为党、为国家做了一些事。我们应该善始善终，把五种丛书的工作搞完。

我们为什么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果？我想有以下几点：

第一是党中央的重视。50年代，毛主席关心，周总理亲自抓，还有李维汉同志领导着我们干。1950年就组织了民族地区的访问团，大抓民族工作。当时宣传民族平等、团结是件大事情。因为过去历史上民族是不平等的，也不那么团结。中国人民

* 本文是作者在国家民委五种丛书编委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① 五种丛书是：《中国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书》；《民族语言丛书》；《民族简史简志丛书》；《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

共和国成立，一开始就在民族平等团结上做工作，用力量。当时搞这个工作是很受重视的，上面抓得紧，在很短的时间里做了很多重要的事。访问团把党的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落实到千家万户，使少数民族听到党中央的声音，听到民族团结平等的政策，一级一级地做下去，搞登门拜访。

那时少数民族叫我们是“新汉人”，改变了对汉人的看法。有的少数民族同胞说你们的祖宗对我们做了坏事，现在来向我们道歉了。我们有的同志想不开，说我们不是来道歉，做坏事的是封建统治者，我们不是。总理说，人家这么看你的，就是你的祖宗嘛！何况我们还继承了好多祖宗的思想。访问团的工作对民族团结起了很大作用。

粉碎“四人帮”以后，李维汉同志有一段讲话很好，他说：有个现实问题可以研究研究。我们国家被林彪、“四人帮”推上了崩溃的边缘。但是它终究没有崩溃下去。为何没有崩溃下去？这个问题要回答。我们的兄弟民族大都居住在国境线上，所有这些民族在十年动乱中都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整得很厉害，死了很多人。这样全国规模的镇压和摧残，在我国历史上在封建暴君的统治下也少有过。历史上许多少数民族为了反抗残酷的民族压迫，常常举行武装暴动。但十年动乱中整得这样厉害，却没有发生大规模的骚乱，也没有大批外流。内蒙古自治区整了几十万人的所谓“新内人党”，他们不但没有暴动，据说也没有外逃。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国家没有崩溃，人民特别是国境少数民族没有造反，是什么原因？我认为，主要的原因在于以往几十年间，由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和它的革命政策与革命行动，在各民族人民群众特别是老一辈的人民群众中，生长了牢不可拔的根底，成为抵制林、江反革命集团侵袭的基石和砥柱。就是靠了这些基石和砥柱，国家没有崩溃，人民没有造反。正是由于我们搞了多年的民族团结工作，各族人民才能真正

做到了雷打不散，事实上证明了我们 50 年代所做的民族工作是有效的。

我记得刚刚成立中央民族学院的时候，有些学生不愿戴民院的校徽，怕人家说自己是少数民族，被瞧不起。现在不同了，民院的校徽戴出去，连买东西人家都招呼得好一些。说明民族平等的政策深入人心，这是个显著变化，我们确实建立起了一个人人平等的民族大家庭。

大家都参加了宣传党的民族团结平等政策的工作。我们的民族工作，是在这一指导思想下进行的，毛主席、周总理和李维汉同志都亲自抓过。当年组织访问团，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我们这些人全都下去跑，参加访问团的人也有献出了生命的。我们搞调查需要什么样的人？我看还得要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的人。

中央民院办语文系时我们规定学生都要下去在少数民族中生活一年，没有一个不下去。只有到实地去调查，和群众接触，向群众学习，我们才有知识。要形成这样的风气。过去我们这样做了，出了成果，现在还应该把这一条坚持下去。

第二点，我们从事的研究工作不是脱离实际的，不是自己脑子里想搞什么就搞什么。50 年代我们的调查目的很清楚，为制定宪法，搞选举。我们国家有多少民族？有多少人口？这是很具体的问题，我们搞民族识别不是空的。解放初，政协开会时，有的代表报藏族，有的报番族，有的藏族同志给毛主席写信说番族、藏族是一回事，应统一称藏族。我们政协会一开始就遇到民族识别问题。民族识别是我们当时必须做的事情。后来搞民主改革，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政策，哪一个民族发展到什么阶段，这首先要搞清楚，不能主观主义办事，人大开会时，彭真同志找我们，提出组织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对于宪法中写进去的尊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这一条，周总理就考虑了好久。帮助某些没

有文字的民族创造文字，要有一套发音的符号，基本上既适用于所有的少数民族，也适用于汉族。利用这套符号来为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创制文字，既可发展他们各自的语言文字，也便于他们学习汉语。我们各民族之间必须要加强精神文明的流通，语言文字是一种必要的工具，所以周总理是十分重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的。

我们的调查研究紧紧地围绕着党和国家贯彻民族政策、开展民族工作的需要来进行。不是凭哪一个人自己的个人爱好，不是为了成名成家。文章人人都可以写，但写文章时也得问一问：究竟对少数民族的进步和发展有什么好处？我们早期的调查，思想上清楚，目的明确，没有什么干扰。当时调查人员的知识水平不是很高，但研究方向、思想品质是好的。这种好传统，被“四人帮”给糟蹋了。我们是为党和国家制定政策提供实际材料和科学依据的，必须实事求是，真正的马列主义是讲实际的。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不正的学风影响很多人。有的青年怕了，躲远了，去搞一些小东西，那也要花费时间，在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上争论不休。我们国家的少数民族的现状怎样？实际生活怎样？便需要我们去调查研究。研究工作者的精力应当用到刀口上去。

去年，我跑了一趟甘南，去了一趟海南。海南岛的少数民族至少有1/3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广西、贵州、江西、湖北、四川的喀斯特地带共有5000万人口，其中少数民族人口2000万，由于土地贫瘠，发展农业生产的客观条件十分不利，至今温饱问题尚未解决，那里客观不利因素太大，我们已建议列入“七五”规划中的重点扶持对象。我们在海南岛，串了好几个村子，有些地方的生活条件仍与50年代我们见到的情况没有什么变化。三块石头支一个灶，一根竹竿顶个箱子用，吃的是一锅稀饭。我到过一家，女主人去世了，一个男人带一帮孩子，只存一口袋米。

我问他吃完这点米怎么过？他自己也不知道。这种情况真叫人看不过去。我们搞少数民族工作的，心里想到这些没有？

甘南那里有条白龙江，过去群众唱歌称颂是条清水河。现在两岸的树砍得差不多了，只砍不种，白龙江成了黄龙江。本来是很好的地方，现在成了很差的地方。这种情况没人讲。

少数民族怎样发展是个大问题，目前的趋势是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差距越来越大，这个问题我讲了一年。我在东南沿海地区访问，很高兴，农民生活的确好起来了。但一看到少数民族地区一根竹竿当箱子的情景，心里就过不去。我们好不容易搞出来一个平等团结的大家庭，怎么能让差距越来越大呢？列宁讲过落后的民族在先进民族帮助下可以超越历史的发展进入社会主义。这我们做到了。但生产力的落后状况，不是很快就能解决的。要有帮助，但帮助也要有个过程，现在是帮助不够。去年开会时就提到，现在不是缩小差距的问题，而是不要拉大差距的问题。第一步是不要落下，第二步是缩小差距。

我们要多下去了解情况。政策是清楚的，但具体怎么个做法，要下去了解情况。我在海南岛看见几个小姑娘，很聪明，一问没有一个进过学校。在甘南的一个制革厂见到一个藏族姑娘当了工人，就不一样，很有本领。在甘南，小学校没有藏族教师。说汉语，孩子听不懂。要培养懂藏语的小学教员，可没这种培养的地方。我们现在搞了学位，培养硕士、博士，是应该的，但是不要忘记少数民族地区还缺乏合适的小学教员。不要说当了博士、硕士，甚至中学毕业的人有很多就不回去了。这是人才上的“水土流失”，知识流失比水土流失为害更严重。少数民族学生考上大学就不回去了，不能怪他个人。我们的政策没有搞好，这是个大问题。

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还在搞封闭经济，怎样才能进入开放的商品经济？现在是“人往高处走”。越是文化发达的中心地区，越

往里进入。不只少数民族地区这样，汉族地区也有类似情况。知识人才往港澳跑，往美国跑。我们要采取有力措施，稳定少数民族地区的知识力量，要想点办法。少数民族地区需要什么样的人，要做到心中有数。

在现在的形势下，少数民族地区需要什么样的人？我到包头南边一个小城看过。那里都是浙江人在做服务行业，一年要汇几十万元回浙江去。现在有不少问题值得引起我们注意。不注意不得了。不要忘记前车之鉴，北美印第安人、澳大利亚土人都是前车之鉴。我们国家是绝不允许出现这种情形的。大家要想办法，适应新的任务。我们的研究人员是否想到这些问题？我们要注意眼前现实的问题。没有什么好怕的。现实问题到处都存在，要研究。不是我们哪一个人聪明，只要肯下去、肯看，就能抓住问题。我们做民族工作的人是否看到了少数民族地区存在的现实问题？普通的汉族人对此不注意。我们要宣传好党的民族政策，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是历史造成了各民族间的差距，这种差距对少数民族不好，对汉族也不好。要做工作，要缩小这种差距。

我们搞五种丛书，有了一个队伍，我们在民族工作方面培养起了一批力量，大家要有责任感。我们这代人怎样尽到自己的责任，就是要把50年代的精神，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传下去。我们老的要交班，怎么个交法，新的要接班，怎么个接法？我们要把自己好的经验告诉新一代，也把自己做错的事告诉新一代，让他们不再做。搞民族工作，不能麻木，要有责任心，要有牺牲精神。经过大家共同努力，积少成多，搞了五种丛书，出了这么多的书。下一步怎么走？大家要动动脑筋，把工作做好，再搞一套新的五种丛书，为少数民族现代化服务的丛书。

瑶山调查五十年^{* 1}

我自 1935 年偕同前妻王同惠初访广西大瑶山以来，已经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这 50 年来，我从一个学习人类学的学生到带领几个中年学者三访瑶山，今昔对照，感慰良深。旧地重游，所见变化之大，可以说是换了人间。

瑶族在旧中国是一个被歧视的少数民族，在很早的年代里就被撵入了南岭山脉的高寒山区。据说，他们的祖先在两千多年前的秦汉时代还定居在长江中游的洞庭湖一带的平原上，但是这个具有强烈反抗压迫传统的民族，拒绝反动统治者强加于他们的徭役，宁愿进入深山老林，靠双手开辟自己的家园，保卫自主的生活。有人以最早见于汉文《梁书》里的“莫徭”（不服徭役的意思），作为这个说法的佐证——尽管史学家对此不尽同意，但是瑶族不断受到历代反动统治者所实行的民族压迫政策的摧残而被撵入高寒山区，确是事实。

广西东部的大瑶山，处于柳江和桂江之间大约有 2300 多平方公里的高山区，海拔最高达 1900 多公尺。四围是平原或丘陵地带，山区边缘皆为几百公尺的陡坡悬崖。1935 年我在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后，接受导师史禄国教授的意见，在出国留学之前，先到国内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一次实地调查。当年秋季我偕同前妻王同惠一同进入广西大瑶山。我们的分工是：我主要测量瑶山居民的体质，她做社会调查。

当时的大瑶山里，老林密箐，羊肠小径，野草蔓生，道路不

* 本文是作者在香港召开的“第一届瑶族研究国际研讨会”上的论文。

辨。我们从10月18日开始进入瑶山工作，到12月16日从花篮瑶地区转移到坳瑶地区的旅途中迷失了方向。我不慎误踏猎人设下的陷阱，腿背受伤，王同惠下山呼援，天黑路险，溺水丧生。二人同行，一死一伤。后来我虽获救出山，这次调查却并未完成。我在养伤期间把前妻所遗材料略作整理，编成《花篮瑶社会组织》，而我的体质测量资料后来全部遗失在昆明。因此，我一直遗憾在心，觉得是一件此生不能还清的欠账。

新中国成立后，世代居住在被蔑视为化外之区的大瑶山里受尽民族压迫的瑶族人民，于1952年建立了金秀瑶族自治县。这是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获得解放后，最早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之一。瑶族人民再也不受民族压迫之苦，获得了当家做主的民族平等权利。

1979年10月，我趁参加祝贺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之便，重访了阔别43年的大瑶山。这里是我重新进行民族实地调查的起点，也是日夜令人魂梦神牵之处。当时虽然经过十年动乱，在林粮矛盾中，森林生态遭到破坏，但正在落实“以林为主”的政策，瑶山充满了希望。随着生产责任制的落实，瑶族人民张开了发展科学技术和开展山区林副土特产这双翅膀，向着民族繁荣、山区兴旺飞翔。

此后，我又带了几位中年瑶族研究者二上瑶山，在那里进一步了解了大瑶山瑶族的情况，支持那些比我年轻的学者深入山村，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进行研究，并期望从这种研究中，能对我们整个中国民族大家庭，尤其是对研究全世界人口最大的民族——汉族的形成问题有所启发。

瑶族分布得既广又散，他们内部在语言、社会组织、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甚至服装上都存在着显著的区别。根据这些区别，人们用各种不同的名称来称呼他们。其名称在全国多至几十种。如广西都安有自称“布努”的瑶族，汉族人称他们作“背

婆瑶”；广西南丹有自称“瑙格劳”的瑶族，汉人称他们作“白裤瑶”，仅广西大瑶山的瑶族就有五种不同的自称，汉族人也用了五个名称分别称呼他们，即：茶山瑶、花篮瑶、坳瑶、盘瑶和山子瑶。他们的汉名除了坳瑶外都不是自称的音译，比如茶山瑶自称是“拉加”，花篮瑶自称是“炯奈”，盘瑶自称是“勉”，山子瑶自称是“金迪门”，坳瑶则自称“坳标”。他们尽管有不同的自称与服饰，语言也各不相同，但是都共同承认是一个民族——瑶族。而在他们的自称中却都不加“瑶”字，不说“拉加瑶”、“炯奈瑶”等，却承认“拉加”、“炯奈”都是瑶。由此可见。瑶这个族名很可能是汉人对他们的称谓，在大瑶山，也是对这五个不同自称的人所形成的共同体的称谓。

30年代我初到大瑶山时，由于缺乏语言学的训练，没有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这五种不同自称的人们的关系，而简单地把他们看成是大瑶山瑶族的五个支系。所谓“支系”的意思是从一个根本上分出来的枝条。80年代我和学过语言学的同志们一起去调查，他们熟悉过去几年来语言学者对于这五种不同自称的瑶人的语言所作的研究。根据这些研究我才知道居住在大瑶山里的瑶族在语言上并不是统一的，而可以分成勉语、布努语、拉加语三种。它们虽然都属汉藏语系，但不能说是一个语言的不同方言。勉语属苗瑶语族瑶语支；布努语属苗瑶语族苗语支，接近苗语；拉加语属壮侗语族侗水语支，接近侗语和壮语。换一句话说，茶山瑶的话近侗、壮语；盘瑶、山子瑶和坳瑶的话属瑶语；花篮瑶的话接近苗语。

这些瑶族集团之间的关系在过去也是相当复杂的。在大瑶山的这五种不同自称的瑶民中，茶山瑶、坳瑶、花篮瑶分别占有一部分山岭，包括土地、森林、飞鸟和河水，所以他们又统称为山主瑶，或又因为他们的男子过去都留长发，在头顶上梳一个发髻，所以又有“长毛瑶”之称。这三个集团的瑶民住在沿河较

平的坝子里，以耕种水稻为主，因此他们可以世代定居在一个地方。用土木结构建筑经久的房屋，聚居成比较密集的村寨。而每个村寨大多有十几户人家。盘瑶和山子瑶则不占有瑶山里的土地，他们在过去只能向早已定居在这里的山主瑶讨山地，经营以刀耕火种为主的原始农业。每年须向山主瑶交租和服劳役。在刀耕火种的农业中，他们每过几年就要抛荒另开新地，不能定居，必须经常迁徙，所以，只能住在简陋的竹棚里。因此这两个集团的瑶族被统称为山子瑶或过山瑶，表示他们既没有土地又是居住不定的瑶民。过山瑶在严重的剥削下，生活贫困。我初访瑶山时，曾在冷冲住过他们的竹棚，晚上寒风透过竹墙缝寒气袭人。而很多家庭难得有一床完整的棉被，成人连衣裤都不全，他们吃的也是包米和野菜。

从语言上看，这五种不同自称的瑶人可能有不同的来源。或者说，他们很可能原来不是一个民族的人，进入大瑶山之后，在这个封闭的环境里，共同忍受着封建王朝的民族压迫。共同的命运、密切的经济关系，使他们凝聚成为一个民族共同体。根据对全国瑶族的研究，我们知道讲拉加话的茶山瑶，只在大瑶山所独有，他们人数不多，在全国瑶族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很小。讲布努话的花篮瑶，他们的语言和都安等地的讲布努话的背篓瑶等比较接近，属于苗语支，虽然有一定数量的人口，但在全国瑶族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并不是最大。而讲瑶语的盘瑶、山子瑶和坳瑶，他们与其他各地讲瑶语支语言的盘古瑶、顶板瑶、八排瑶等相近，也有共同起源于槃瓠的民族起源传说，他们的话属于瑶语支，其人口总数在全国瑶族总人口中所占比重是最大的。由此可以知道，讲瑶语的盘瑶等集团，很可能是瑶族中的基本成分，如同汇入大河的各条支流一样，他们是瑶族这条大河中的主流，是其中源远流长的一支。说他们是基本成分，是因为他们在游动过程中，不断吸收了其他游散的民族成分，构成其瑶族共同体。

大瑶山瑶族五个集团迁入瑶山的时间和路线，也是各不相同的。从盘瑶、山子瑶没有土地的事实来说，可以设想当他们迁入大瑶山时，山里的可耕地已经有人占据，而占有土地的茶山瑶、花篮瑶和坳瑶应当比没有土地的盘瑶和山子瑶早入山区。但盘瑶的传说却与此相反，他们认为自己是先进入瑶山的集团，只是由于游耕生活才没有牢固地占有山地。由此可见，在入山先后的问题上，各集团是各持己见的。从入山路线看，可以说是来自四面八方。据说茶山瑶是从广东经广西梧州，取道藤县、平南进山的，但也有说是从湖南取道浔州、贵县、象州入山的。盘瑶是在湖南被打散后进广西入山的。山子瑶是从广东进广西由平南入山。坳瑶从贵州进广西，经百色、南宁然后入山。

这些在不同时间、由不同路线进入大瑶山的各瑶族集团，他们彼此是不相混同的。但从姓氏来看，其中既有不同于别集团的姓，也有相同于别集团的姓，如都有槃瓠传说并讲瑶语的盘瑶和山子瑶，有盘、黄、赵、冯、李、邓六个相同的大姓，但也有许多相互不同的姓。像盘瑶的包、周、胡、唐、雷，在山子瑶中没有；山子瑶的蒋、卢、陈、谭、覃、郑、莫、冼、刘，在盘瑶中没有。同讲瑶语的坳瑶中有盘、赵二姓，没有其他四姓。而说壮、侗语的茶山瑶里却有莫、刘二姓。花篮瑶中有冯姓。各个集团又都有别的集团所没有的姓，比如茶山瑶的陶、金、龚、田、龙；盘瑶的唐、雷；山子瑶的卢、陈、谭、覃、郑、冼；坳瑶的罗、苏；花篮瑶的侯、相等。如果同姓之间有相同来源的话，则各集团之间在历史上就可能有相互渗透的部分。

值得指出的是，大瑶山在明代基本上属于大藤峡的范围，从15世纪初到16世纪30年代，这里曾爆发过延续100多年的反抗斗争。据《明史纪事本末》载：“中产瑶人，蓝、胡、侯、盘四姓为渠魁。”明朝统治者曾调动几十万军队，先后三次对瑶民进行屠杀。使四大姓的瑶民，死的死、逃的逃，有的隐姓埋名难于

查找。但是这四大姓中的盘姓，在现在的盘瑶、山子瑶、坳瑶中却普遍存在，蓝、胡、侯三姓在花篮瑶中也还存在。30年代我初入瑶山的第一站花篮瑶的王桑村，就是一个胡姓村落；后来在六巷住在一个叫蓝济君的花篮瑶家里。明代大藤峡瑶民的四大姓，在现今大瑶山的一些瑶族集团中还能见到，由此表明，早在明代，这里说瑶语的盘瑶和说苗语的花篮瑶都已经被统称为瑶族了。在长达四五百年的时间里，说不同语言的集团，陆续进入瑶山，由于共同的利益，团结起来保卫这个山区，汉人就因为他们统称为瑶族，终于形成了现代的讲不同语言、有不同服饰、在习俗上也有一定差异的，由几个集团形成的叫做瑶族的统一体。为此，我们不能简单地用语言一致的标准来进行民族识别。但我们也不能说大瑶山的瑶族不是一个民族的共同体，尽管它是由五个来源不同的集团所组成，而且还讲着分属三种语支的五种语言。于是这里便产生了诸多值得在理论上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即什么是形成一个民族的凝聚力？民族共同意识是怎样产生的，它又是怎样起变化的？一个民族的共同体在语言、风俗习惯、经济方式等方面能承担多大的差别？为什么一个原本聚居在一起的民族能长期被分隔在不同地区而仍然保持其共同意识？依然保持其成为一个民族共同体？一个民族又怎样能在不同条件下吸收其他民族成分，不断壮大自己的共同体？又怎样会使原有的民族成分被吸收到其他民族中去？这些问题的提出将为我们今后的民族研究工作开辟出广阔的园地。

从宏观来说，中华民族在几千年来，的确呈现着一幅规模宏大、成分复杂、既有融合、又有分化的历史长卷。中国各民族所在的地域，大体可以分成北部草原地区、东北角的高山森林区、西南角的青藏高原，曾被拉铁摩尔所称的“内部边疆”，即我所说的藏彝走廊，然后是云贵高原、南岭走廊、沿海地区和岛屿及中原地区。这是全国这个棋盘的格局，我们必须从这个棋盘上的

演变来看各民族的去和现在。从我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来看，各族人民流动的总趋势是北方民族的南下或西进，中原民族的向南，沿海民族的入海或南北分移，向南移的又向西越出现在的国境。我国人口最多的民族——汉族就是在这种迁徙变动中，逐渐融合许多古代民族而逐渐形成的。从金、元时代逐渐把中原地区的人称为汉人以来，汉作为民族名称使用了至少已有 1000 年的历史（在此以前，曾被称作“唐人”）。但是这个包括了历史上的许多民族成分的汉族，究竟是在怎样的情况下、由多少集团凝聚而成的具体经过和具体情况，我们却不甚了然。要对这 10 亿人口的来龙去脉作一个详细的调查，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对中华民族又分又合的历史过程，我们不可能作具体的观察，许多关键性问题只能通过文字记录、遗留的文物以及现存的风俗、习惯、信仰等去推考。但是如果从微型的具体实况来观察各民族间又分又合的关系，那就可以丰富我们对中华民族形成和变化过程的理解，充实我们对民族问题的理论认识。从大瑶山瑶族的研究中，是不是也可以得到启发，从中找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来。从这个角度看，大瑶山是研究这个问题的一个良好园地。我们今后的民族研究，既要有微型的调查，也要有宏观的总结。宏观和微观又是相对而言的。就大瑶山一个地区来说，它在当地是一个宏观的研究，而瑶山中一个村寨、一个集团的调查则是它的微型研究。而对整个瑶族或汉族或中华民族来说，这是一个更大程度的宏观研究，而大瑶山地区的研究就成为它的局部，是一个更大的宏观研究中的微型调查。

关于微型研究，过去我曾经作过一些。30 年代时初访瑶山的成果《花篮瑶社会组织》以及后来的《江村经济》、《禄村农田》等都是例子。但是总的来说，在民族研究中这种微型的研究做得还很不够。我曾经在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的一次报告

中说过：“‘微’是指深入到生活的实际，而不是泛泛地、一般化地叙述，要做到有地点、有时间、有人、有行为、有感情、有思想，这样才能说是‘直接的观察’。‘型’是把一个‘麻雀’作为一个类型的代表，解剖得清清楚楚，五脏六腑，如何活动作全面说明；而且要把这个‘麻雀’的特点讲出来，它和别的‘麻雀’有何不同、为何不同等等。这样的‘微型’研究是民族研究的基础，通过比较不同的‘型’，就能逐步形成全面的宏观的认识。”通过对大瑶山瑶族的调查研究，我想汉族也一定有一个自己的基本成分，也就是原来居住在中原地区，以黄河为自己的摇篮所哺育出来的那些人，也就是所谓“黄帝”的子孙。但是在漫长的历史里，它不仅包容了“炎帝”的子孙在内，而且还在一个长期封闭的封建国度里，又吸收了附近高原、山区、草原、沙漠上的各个集团或其中的一部分，也融入了不少古代的少数民族，终于形成一个复杂的民族共同体、一个人口众多的泱泱大族。正如周恩来总理 1957 年 8 月 4 日在青岛民族工作座谈会上所说的一样：“我国历史的发展，使我们的民族大家庭形成许多民族杂居的状态。由于我国各民族交叉的时代很多，互相影响就很多，甚至于互相同化也很多。汉族所以人数这样多，就是因为它吸收了别的民族。”这是我从事大瑶山瑶族调查研究以来所提供的—个看法。当然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大家来做。其中包括我在前面提出的，要开展从北部草原地区、东北角高山森林地区……直到沿海地区、中原地区等等地区的宏观与微型相结合的深入调查研究，然后在这样的基础上、在更大的宏观角度上予以分析和总结，科学的发展和客观实际的要求，将迟早会使我们走上这一步。目前我国西南地区已开展了六江流域的调查，贵州地区开展了六山六水的调查，都是一些很好的开端。

这 50 年中，从我们只有两个青年人跋涉于荒山野岭，初访大瑶山以来，到现在已形成一支相当广大的队伍。从国内到国

外，从亚洲到欧美，都有不少学者从事着瑶族的调查研究。我们知道，全世界各地的瑶族的祖先，都是从中国迁出去的，直到今天，瑶族人口的大多数也居住在中国境内，因此说，我们对瑶族的调查研究负有更大的任务。我们欢迎各国学者之间的文化交流、共同协作、增进友谊。也希望能从近年来的大瑶山调查开始，发展成为以南岭山脉的民族走廊为主的综合性调查。这里面有作为山居民族的瑶族的各方面问题；有瑶族和跟他接近的苗族与畲族的关系问题，这并不仅仅是历史上的渊源问题，也是对相类似的山居民族的比较问题。包括了苗、瑶、畲族与壮族、侗族、布依族以及土家族等在历史上的关系问题，它们之间的互相影响与有什么差异的问题以及长期历史上汉族在这个地区的作用问题，汉族与上述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等等。南岭山脉的民族走廊研究好了，不仅有助于上述各民族历史的研究，而且也可以大大丰富中国通史的内容，有助于我们对当前各民族情况的深刻了解。

50年在人类历史上只不过是短暂的一瞬，在瑶山研究方面，我们走过了艰难曲折的坎坷路程。我期望在未来的50年里，瑶族研究有一个新的更大的发展，并相信他们的路程也许会比我们坦荡一些，但是永远不要忘记在攀登科学高峰时，仍然需要那种勇敢的不畏艰辛的刻苦精神。

1986年5月

谈缩小差距

随着经济文化建设的发展，这几年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差距总的说来不是在逐渐缩小，而是在不断拉大。这个问题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

这个问题大家都已感觉到了。汉族温饱问题多数已经过关，一半人已经开始富起来，1/3 比较富了。可是少数民族在贫困线下的比例比汉族大得多。这种局面，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中华民族的振兴，中国的富强，社会主义四化的成功，没有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和建设是不可想像的。各民族共同繁荣是我们的目的，如果我们现在忽视这个问题，“七五”期间不去研究解决好这个问题，到了“八五”，工作难度可就大了。我们采取什么政策来解决这一问题呢？我建议：组织综合性的科研队伍进行分区调查，找出重点问题，在“七五”期间认真研究一些解决的办法。

对少数民族实行优惠政策是必要的，但如果只是给补助，养成了靠补助过活的心理是危险的。当前，树立民族自信心，靠自己站起来的气氛不够。一些地方，包括干部在内有伸手要钱的习惯。这实际上害了自己。多年来有些少数民族地区有了进步和变化，但不能说很普遍，和汉族比起来发展较慢。历史是不留情的，发展进步的会生存下去，不争气的最后就有被淘汰的可能。所以，少数民族一定要有自信、自强、自爱之心。

一般地说，少数民族容易满足于比较简单低下的生活水平。解放后消灭了剥削和压迫，关上门过自己的田园生活，精神状态是宁静、自足的。这甚至引起西方一些人的羡慕。但这是低水平

经济文化的反映。事实很清楚，依赖思想、满足现状和封闭的生活方式，限制了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发展，这么下去差距会越来越拉大，经济文化上的差距终究会变成政治矛盾。到那时就难办了。我们必须重视经济文化差距所产生的心理状态。自满自足必然会引起保守现状、抗拒外来影响的心理。而封闭和拒外，实际上保护了落后。少数民族不能画地为牢，自甘落后。这些话虽然不好听，但良药苦口，不得不说。总的目的很清楚，是希望少数民族发展起来，把差距减小乃至消灭，实现真正的平等。

少数民族要发展，不能封闭，要赶快开放，维持现状是不行的。对待这个问题，我们要有紧迫感，但又不能操之过急。民族地区的发展必须是少数民族的发展。建国30多年了，少数民族要“三十而立”，要同汉族更密切地结合，在一定外力的支援下，因地制宜地走自立发展的路。

少数民族要改革、求进步，需要有外来的动力，不帮一下起不来，但帮多了，又会产生依赖现象。必须使外力内化，变外力为内在动力，才真正有利于少数民族的发展。

那么，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呢？首先要从经济入手。国家还是要花些钱的，但如何花，怎样花得恰当，就需要认真研究了。中国的整个发展和富强要依赖少数民族地区内的资源。民族地区地上地下资源都很丰富，但过去这两方面优势都没发挥。在这一点上，林业部、地质部有责任。有些部门对凡涉及少数民族问题，不是看得太简单，就是觉得太麻烦，甚至无视少数民族的问题，在做地区规划时没有注意到这个地区还有少数民族。这说明他们的干部没有很好学习民族政策。现在，管少数民族事务的好像只有民委，而少数民族自己又不好替自己说话。只让少数民族搞民族工作，确有他们的不便之处。

我们为了国家的发展要支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要有远大的眼光，要为子孙后代打算。东部发达地区要把资金、技术输送

到少数民族地区，兴办企业。具体方式方法要适应少数民族地区的情况，要像50年代初期一样组织力量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做调查研究，同时，要带着技术下乡，有针对性地进行具体的帮助。我有几项具体建议：

第一，开发民族地区的资源要给少数民族一定比例的留成。他们可以用这些资源与沿海地区换取技术，这样双方都有利。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加强横向联系和协作。对东西部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以西资东，以东支西，互惠互利，共同繁荣”16个字。

第二，民族地区要继续吸收汉族人口，但必须是少数民族欢迎的人。所谓受欢迎的，就是指对他们有利的人才和劳力。在民族地区兴办大型企业时，首先要充分利用当地人力，同时可以有部分移民进入。特别是技术人员和技工，让他们来帮助培养当地人才。通过少数民族内在的要求，从外入内，化外为内。我们要遵循客观规律去改变现状，因势利导，不能靠行政命令。因此各部委都应进行民族政策教育，自觉地去做好化外为内的工作。

第三，少数民族一般都不会搞流通，很需要一个有效的为他们服务的流通机构。这一条很关键。要制定具体政策，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商品经济。

第四，要有计划地在少数民族地区投资兴建一批拥有现代化工业企业的城市，但不应是过去那种封闭性企业。这些企业和城市应该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带动起一个地区经济的发展。国家企业带动地方企业，地方企业支持国家企业；通过民族地区的工业中心，带动整个地区工业化。这样做对国家企业、地方企业和民族地区的群众都是有利的。

第五，对少数民族的政策也不能一刀切，要有区别，要分析可行性。譬如文字问题，一些没有文字的、人口又很少的民族，似可不必再创制文字。直接利用全国通用的汉文或当地通用的兄弟民族的文字，更有利其发展。又如文化水平较高的朝鲜族，则

主要应抓地方工业和乡村工业。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点，要分别对待，政策上也要有区别。

第六，社会主义时期，民族总是存在的，但是各民族的共同性也在不断增多。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各民族将来的方向大体上会是：大民族与周围小民族在经济上形成一个个地区性协作体，在全国形成若干大小不同的区域，大小民族间互相有靠有帮，都不会是各自孤立的。特别是在同一经济区域内的各民族，联系会更加密切，共同性将会增多。我们现在就应看到这个大趋势。

1986年6月

谈“民族”

什么是民族？在我国，“民族”这个概念似乎一直没搞得很清楚。50年代，我听毛主席说过：“这个问题要搞清楚。”可惜未能展开讨论，涉及民族的一系列问题也就无法深入探讨。

我们常说的中华民族，就用了“民族”这个词。同时又说中华民族包括汉族、满族、蒙古族、回族等56个民族。民族中包括民族，在概念上就不太清楚。在西方这样的说法，据我所知是没有的。这表明我国的民族和西方所谓的民族存在着不完全相同的涵义。

中华民族里包括56个民族，这张民族名单先是根据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列举的10个民族为基础，加上新中国成立初中央访问团提出的一批补充名单，后来又陆续增加而成的。整理这个民族名单的工作被称为“民族识别”工作。到现在许多一直报汉族的人还在要求改变民族成分，还有一些集体要求被承认为“民族”，部分原因就在于我们对民族这个概念至今没搞清楚。

我认为，这个问题一定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去研究。现在被承认的“民族”并不是像西方民族那样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形成的，因而我们不能直接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民族概念去认识我国的民族实体。所以，我国的民族事实上与斯大林提出的民族定义不可能完全相合。可是过去却总是想套用“民族四要素”，也没有人敢进一步去作历史分析，于是含含糊糊地混到目前。

我个人的看法，要搞清楚民族这个概念，完善民族识别工作，首先要从汉族的形成出发。中国的汉族实际上是长期由原有

语言、文化不同的共同体逐步混合而成的。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里提到过，“汉族人口多，也是长时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它是像“滚雪球”那样滚出来的。比如历史上汉代匈奴人在我国北方人数很多，以后一部分去了欧洲，一部分留下来，其中不少人变成了汉族。又如羌族，在宋代建立过西夏，现在只有几万人在四川边境，大多数人哪里去了呢？

看来我国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了一个经济和文化较为发达的中心，被当时人称之为“中国”。在这中心四周存在着许许多多经济文化上和中心有着差距的所谓“夷人”。“夷”字本身并不带有歧视或侮辱的意义。在这经济文化中心的人，并不划界自限，对外排斥。这条界线是按周围地区人民的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变动的。韩愈在《原道》一文中曾说：“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这里所谓“中国”，其实就是后来所说的“汉族”的核心。到了秦汉之际，“车同轨，书同文”，从这中心向四周辐射的经济文化力量日益加强，包括在“汉族”之内的地域和人数也日益扩大。汉族实际上是一个由许多来源不同的炎黄子孙共同混合而成的复合体，从种族上说是很复杂的混血体。

这个混合的过程也是复杂的。其中固然不能排除强制的同化。但我想主要是出于自愿的融合，前边引的韩愈那句话，就说出当时这片大陆上居住的人可以在夷夏之间做出主动的选择。我认为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表现了我们中国各族人民之间相互对待的基本态度。这种基本态度和西方的种族歧视相对照就更容易看得明白。欧洲大陆上的许多民族，至今还是各自为政，形成不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共同体。

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几乎所有的少数民族聚居区里都有汉族杂居在内。这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这些进入其他民族聚居区的汉族基本上与当地民族是和平相处的，而且有不少吸收进了少数

民族。事实上，我国的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分难解。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汉人，除了耕种土地外，不少是经商从事贸易的，从开店设仓到肩挑叫卖都有。少数民族地区的商品流通很大部分就靠他们的服务。在经济上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已经深深地联结在一起，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所以把中国的各民族看成是有各自的经济中心，形成了经济实体是不符合事实的。

这里还应当补充说明一点：过去历史上历代封建王朝都采取过民族压迫的政策，而且不论哪个民族的统治阶级当权，都是如此。这当然也影响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使各民族的发展很不平衡，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民族的不平等。这些都是事实。我上面所说的话，是从各族人民这方面来说的。封建王朝对民族压迫政策所引起的后果，我们固然应当重视，但不能不看到各族人民之间和平共处互相混杂的一面。

以上是就汉族的形成而说的。至于其他各民族的形成过程，我认为也是很复杂的。我在别处已说过藏族和瑶族等也都包括着语言不同的成分，很可能也表明不同成分互相混合的结果。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中华民族”我认为作为一个概念来说，这是近代各族人民共同抵抗帝国主义侵略中形成的。清末民初孙中山先生提倡的“五族共和”，实际上反映了长期以来形成的共同实体的存在。但是后来有人用这个概念来否定我国各少数民族的民族实体，把它们说成是汉族的“分支”，那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相反地，我认为汉族是吸收了各族人民融合一体而成的。

综合以上的意见，我认为在民族这个概念上是否可以设想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就是“中华民族”；第二是汉、藏、蒙、回等56个民族；第三是这56个民族中有些民族还包含着若干具有一定特点的集团，如藏族中的康巴人、安多人，苗族中的红苗、青苗等等。目前，提出要求民族识别的大多是这一层次的集团。

怎样对待这类民族识别的要求呢？我认为首先要尊重历史。如果历史上确是一个民族实体，那是应当承认的。如果原是一个民族的一部分，由于历史上有一段时期的隔绝，或其他原因，和其他部分发生了一定差别，为了这部分的发展，还是回归原来的民族比较好。至于有些不同的民族经过一段时期的混杂，但尚有融而未合之处，那就不必走回头路，而应鼓励他们进一步融合，对他们的发展更有利。总之，要充分照顾到历史的事实，更重要的是要看到未来的发展。

对于这些经济文化长期得不到发展的小集体，和少数民族享受同样的优惠是应当的和合理的。但不能因为需要优惠而认为应是单一的民族。因之，对第三层次的集团民族识别应特别慎重。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各族经济文化的大发展时期，我建议在民族调查研究和理论探讨上要重整旗鼓，改弦更张，解放思想，大胆探索。迅速组织各方面力量，继续开展工作。

1986年6月

贫困与脱贫^{* 1}

今天我来参加这个会，感到很高兴。可是叫我讲话有点发愁，讲什么问题呢？先讲“贫困”两个字。什么叫贫困？怎样才是贫困地区？贫困地区为什么有 12 片？我没有很好研究。但学术讨论会上，有什么意见都可以发表。有些问题不讲就不容易深入下去。究竟什么叫贫困？很多人认为，就是吃不饱饭，穿不上衣服，衣食不足。我写过一本书，叫《访美掠影》，在这本书里我讲到过美国有一条“贫困线”，凡是在这个贫困线以下的人就可以受到救济。究竟收入多少美元以下才算是在线下，一时我说不出来了，查一下就可以知道。我记得当时曾算了一下自己的收入，是在美国的贫困线以下。各国有各国的贫困线，这不是一个绝对的东西。

我国的贫困线是按没有解决温饱的概念来定的。我想要吃饱肚子一个人至少要 400 斤麦子，一天吃 1 斤过一点，一个强劳动力假若不吃别的东西，吃 1 斤粮食还不够。这是一个常识性的标准。至于一个人究竟需要多少粮，一下很难说出来。老少男女都不一样。以 400 斤粮作为一条杠杠的根据是一般的估计，大体上差不多，但不能说是科学标准。至于说吃饱了肚子还要多少钱过日子那就更难说了。美国可以用一个人的收入来划线，因为他们的消费品都是要用钱购买的。我们是个自给或半自给经济。我记得 50 年前去广西大瑶山调查，这个地区当时很少有人进去，山里的瑶族同胞的生活几乎完全靠自给，他们很少用钱买东西。在

* 本文系作者在全国考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自给和半自给的经济里要在现金收入上划一条贫困线是很难的。规定人均年收入在 150 元以下的属于贫困地区，这更是一种常识性的估计。现在我们把人均收入在 150 元及人均占有粮食在 400 斤以下的地区称作贫困地区，就是一个凭常识来决定的标准，那就是说这样地区的人民生活水平是很低的，可以称之为贫困地区。

我在 50 年前想过怎样去比较生活水平的问题。我看到人们心目中确是存在着贫富的概念，称一些人是穷人，一些人是富人。我在江苏的农村调查时，聚集一些老乡一起算账。我问他们在你们村子里边大家认为过得去的中等人家一年要吃多少、用多少粮，穿多少衣服，花多少钱，社会上红白事一年要送多少礼等等。大家听着有兴趣，议论的很多，结果议出了一个中等人家的标准。这条标准是其他费用大约相当于吃的费用，食用一半对一半。凡是在这个标准之下的属于穷户，在这个标准之上的属于富户。现在这个标准是不是合适，我不敢说了。因为在粮食上和居住上国家都有补贴，这笔账十分难算了。我不知道用家计日用账中各项支出比例来显示生活水平的高下，是否比用占有粮食加其他收入的绝对数量来规定贫困线更能反映实际，更便于计算？我们愿意请教大家。

贫困地区的含义到底是什么？我认为贫富是比较出来的。看来中国各地方农村发展很不平衡，有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比较差，大概占 8% 到 10%，也就是大约有 8000 万到 1 亿人生活比较贫困，这是分布曲线的尾巴。这也是我们国家农村经济发展上的地区差距问题。这可说是“贫困地区”这个概念的来源。

遇到荒年日子不好过，天灾人祸就要死人，这是偶然性的状态，不是经常性的状态。偶然性状态有点像一个人生了急病，要送医院抢救。还有一种是经常性的。经济上不发达，长期停滞在很低的水平上面，这是有点像身体虚弱，发育不正常，那是要调

养不是抢救。上面所说 8% - 10% 的贫困地区，两种情形都有。有些是由于特殊原因，如战争、地震等等，我们叫做灾区。对于这类原因造成的贫困我们有一套措施，就是救济。而大部分贫困地区却是生产水平过低，生产出来的东西还不够吃用，没有经济发展的能力。这些经济不发达地区，正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对象。发达不发达是比较而言的，我们是讨论中国现在经济发展中的差距问题。接着我们可以讨论这个差距是怎样产生的？原因很多，有自然的，有人为的，其中许多是自然和人为相结合的后果。1984 年我去内蒙古的赤峰市调查，这里原来是一片水草肥沃的牧场，但由于多年来盲目开垦，破坏了植被，很多地区严重沙化，又由于多年的战争破坏，使这个地区生态起了变化，成了贫困地区。这句话也适应于我们大西北的陇中地区。山头多是这样光秃秃的，未提出种草种树之前，自然生态严重受到破坏，而且正在恶性循环。有人说江西南部的贫困地区是我们革命的老根据地，由于多少次残酷的战争，人少地荒，水利失修，至今没有恢复过来，这种种是历史原因。还有一种原因是我们的政策失误。以粮为纲就是一个例子。我到甘南去，他们说以粮为纲，大炼钢铁，砍树砍得厉害，自然资源破坏了。这是我们政策的失误，以粮为纲，大炼钢铁，都不符合客观规律，所以受到惩罚。不是说我们动机不对，是好心做坏事。我们必须按客观规律办事，我们没掌握规律，而一味凭自己主观意志去猛搞，结果走向反面，招致倒退。现在看来，这些政策失误的后果还没有结束，有些地方生产还在下降。

此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也是历史造成的原因。那就是一些少数民族所特有的经济文化结构和特点。解放前藏族里实行农奴制，在云南还有比较更原始的社会，它们的文化停留在几千年前的水平上，生产水平很低。解放之后，采取了直接过渡的政策，想一下子使这些地区过渡到社会主义。现在，还有很多地方

生活水平依然很低。各个贫困地区其所以贫困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是它们也有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维持着对外封闭、对内自给的经济。有些在低水平上自给自足，有些自给不足，吃不饱，穿不暖。由于长期生活在自给经济里，很多少数民族还不习惯于较发达的商品经济。社会制度是改变了，意识形态还赶不上。

我在内蒙古时听到一件事，有一个蒙古同胞带着十几只羊，在集市上开了一个饭馆，亲朋过路的他都招呼到饭馆里来吃饭，但他依照蒙古人牧区的习惯不能向亲朋收钱，结果带去的羊吃完了，饭馆也只好关门。这里有个商品观念的问题。我们汉人对商人也是看不起的，说穿了我自己都有这种思想。一个人的思想意识是在一定的生产环境中产生出来的。意识形态对一种制度起着强有力的维持作用。在社会改革过程中，经常会碰到意识形态上的阻力，要从自给自足经济的基础上发展商品经济，意识形态上也要起一个转变，要有商品经济的头脑。贫困地区的不易发展也有意识形态上的原因。

自给经济既是对外封闭的原因，也是结果。它和外界往来很少，在经济上力求自给，分成一个个很小的封闭性的区域。现代工业、现代商业，现代的东西都不容易进去。形成这种封闭性的地区常有其历史原因。许多少数民族地区以前开放不得，一开放就会受到民族的压迫。他们千方百计要摆脱民族压迫，所以逃到了可以封闭的地方。50年前我到广西大瑶山去，大瑶山是瑶族聚居的山区，四围都是汉人，还有壮族，这里农业的技术还是相当发达的，山高路险，很少人能进山去。这是从明代起在这地区围攻少数民族的结果，剩余的瑶族被封锁在这山区。他们自己控制人口。依靠山谷里的土地生活下去。社会秩序很好，没有抢劫和偷窃。一个人把东西放在路上，只要打一个草结作记号就没人会去动它，精神文明是很高的。他们不能不这样，内部必须团结，才能维持这个小天下，大家才能生存下去。像瑶山这样的地

区，在经济上可以说是能自给自足的，也可说解决了温饱问题的。如果我们把它列入贫困地区，那是说这种地区如果继续封闭下去是发展不起来的。这种地区的性质不同于受灾地区，或生态失调地区。对于这些地区，我们应当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找出扶助它们摆脱封闭状态，走向发展。

在这些少数民族地区，假如我们不研究，不从实际出发，盲目地把现代农业、现代的东西弄进去，那是行不通的，但是，落后的东西任其维持下去也不行。他们是我们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不去支援他们怎么成？有些问题不是像我们在刚刚解放的时候看得那样简单，认为少数民族里剥削制度一旦消灭就可以发展起来，整个 30 年过去了，有好多问题应当重新考虑。

以上我是想说，我们所划出来的 12 片贫困地区，情况和性质并不是一致的，所以需要我们进行具体分析，不同原因造成的贫困要采取不同的方法去治理，这是我想提出的第一点。

第二点是怎么才能使这些贫困地区发展起来？总的说就是这些地区的人民生活要提高，生产力要提高，人均收入要提高。但是，怎么个提高法？我们得回顾一下历史。我们一直说苏南、温州、广州沿海是中国的发达地区，这几个地区是发展最快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可是苏杭的农村，在 50 年前我去调查的时候，还是很贫困的。我分析过这个地区的经济，发现了几条：第一条，这个地区人口太多，一个人只有一亩多地，即使是自耕农，也只是维持一家所需的粮食，其他的费用需要副业和手工业来维持。当时，这个地区有相当发达的农副手工业，家家户户养蚕、织绸，后来土丝不值钱了，那个地区的副业收入下降得很快，生活开始贫困，加上封建剥削严重，许多农民确实吃不饱，穿不暖。

解放之后，解决了土地问题，可是到了 50 年代后期，我们的政策只强调粮食，而排斥了其他副业和手工业。1957 年，我

去苏南农村调查，农民吃饱肚子了，可是没有钱花。就是商品经济被扼杀了。到70年代就更不行了，认为商品经济是资本主义的残余、尾巴、温床，而加以限制。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老太婆上街卖鸡蛋也不行了，都认为是资本主义。这样使我们一些农村实际没有摆脱贫困，很少地方农民人均收入达到150元。今年上半年，我再次去温州调查，他们讲在三中全会以前，人均收入才55块钱。人均才半亩地，粮食也不够，农民抢饭吃。三中全会后，农村实行了生产责任制，到现在只有四五年，这四五年里变化可大啊！我们要治穷，就要看这几年的变化。农村经济有了飞跃，主要是由于农村从自给到半自给经济开始向商品经济转变，发展了工商业。

以这里的定西来说，这三年就有了很大的变化。地方工业上得快，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工业刚开始起步，去年、今年已就有了个样子了。所以我们第一步要看看人家是怎么富起来的。问一问为什么有的地方富得快，有的地方富得慢，各地的具体做法到底怎么样，看来不同条件的地方要有不同致富路子。

第三点，不光甘肃穷，别的地方也穷，但别的地方有些是发展起来了，这是因为条件不同。具体地讲，现在农村的工农产值最高的要算苏南，苏南的模式是以工致富，在农村里发展了乡镇企业。他们走这条路是有客观条件的。首先是人多地少，农村里的劳动力超过农业的需要。在一个农村里面，在发展工业以前，至少有 $2/3$ 的劳力是多余的。一家5口人5亩地，有一个人去劳动就够了，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就得想办法找个出路。农村干部积极为农民找门路，找米下锅，办起了小工厂，农民得到了好处，拿到了工资。苏南发展之快是没有预料到的，他们差不多每年增收五六十元，去年一般达到了700元。这就靠乡村工业。这些乡村工业有乡办的、村办的，都是集体办的，苏南没有发展家庭工业，集体企业不受国营企业条条框框的限制，因为它自己找

原料生产，加工销出，自己招工人，自己定工资标准，有相当的自主权，这就比国营企业发展得快。他们办法多得很，创出了独特的模式，大多数是在简陋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它的技术人员主要靠大城市，并且把各地方的人才都吸收过去了，这是苏南农村经济发展的道路。

别的地方并不一定能照搬苏南模式，它是从集体经济基础上发展工业起家的，在公社制度没有解体之前，公社和生产队都已经办起了集体企业，有集体积累，越滚越大。公社解体时集体企业没有解散，集体经济实体没有削弱。有些地方，比如苏北就不同。公社和生产队的集体积累原本很薄弱，没有力量办工业，实行了家庭承包责任制，生活虽则改善了，但是缺乏集体积累，乡镇工业不容易办起来，农民致富的机会比较少。致富的速度各地的差距很大，内地比沿海就有较大的差距。不是说内地没有发展，而是发展的速度慢。定西地区的工农业产值现在才2亿元，相当于沿海一个工业发达的乡。

对地区差距有两种看法，一种是认为地域性的差别是客观规律无可奈何的。另一种看法是承认先富后富是事实，但先富要照顾后富，把差距缩小。我们开这个会，就是采取第二种看法。我们要尽力帮助不发达地区发展起来。帮助不是一种施舍。不发达地区发展起来对发达地区是有利的。我前年提出东部有技术、资金，可缺乏资源、缺乏原料。这儿有原料，可缺乏技术、资金。西部需要引进东部的技术和资金来发展自己的企业，不是靠增加补贴，不是靠救济，也就是不要“输血”，而要“造血”。当然，天灾人祸造成的贫困还是要救济的。但是对那些由于生产发展不起来的地方，却不宜用救济的办法或补贴的办法，只能用投资的办法，输血和造血这两种不同的措施，必须分清楚。在急救的时候，要输血。在生产发展不起来的地方，要投资，帮它一把使它的生产力发展起来。

甘肃和内地的这些贫困地区怎样治穷致富是我们这次会议最关心的问题。搞什么呢？看来要一步一步走。耀邦同志指示，先是种草种树，然后发展畜牧，多种经营，再兴办工业，现在前面几步，有些地方走得很好，可以开始农产品加工搞工业了，一个村里可以搞一样东西，叫“一村一品”。我在苏北看了一个村，用木头做农具，家家户户发动起来，有几个带头人，卖到山东去，一个要饭村一年里就翻身了。这个办法容易见效，甘肃农村里也办得到。靠村里的能人、技工，靠干部的力量在一个村里面推广一种产品，然后帮助他们推销出去。

原来温州很穷，许多人出去走四方，弹棉花、做木匠，不要资本，靠手艺到外地去讨活路。温州一市大约有几十万人在外边跑，这批人跑着跑着头脑就动了。在一个地方买到一些处理品，贩运到别地方卖出去，赚钱比卖手艺更容易。他们就成了专业的商人。有些回到家里摆个摊子，成了坐商。桥头镇纽扣市场就是这样搞起来的。香港称它为东方第一纽扣市场，我们用的纽扣有1/3是经过桥头来的。后来越来越发展，他们就办起了家庭工厂。桥头镇的新房子发展得很快，有的是三层楼，有的是四层楼。下面一层是铺子，用来做生意，第二层是工厂，第三层是宿舍。一座房子又是店铺，又是工厂，又是宿舍。家庭手工业没有一个大市场不行。他们不是做好了纽扣再去找市场，而主要是靠外面向他们订货，然后分到各家去制造。这个流通网络完全是民间的、自发的。温州有10大市场，除了纽扣，还有其他的小商品。一个小商品一个镇，成了专业的小商品、大市场。这些市场搞成后，温州就起飞了。才3年，他们人均收入比苏南还要高。从这里可以得到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说商品经济必须有市场，必须流通，搞好流通才能发展工业。这是一种最快的富民的办法。温州的经验还有一条就是以家庭为单位组织生产，必须有个产前产后的服务系统。温州有10万大军在全国各地搞流通，使

得家家户户的小机器能不断地转动，人均收入大大提高。

事实上，我们各地农村已经出现了很多治穷致富的道路，我们要充分地把这些信息传播开来，让各地根据这些信息，按自己的条件想出发展的办法。

综合各地的经验来看，有些地方着重集体企业，有些地方发展家庭工业。其实集体和个体必须配合，所以有些地方提出要几个轮子一起转，要分工。从家庭工业到村办工业到乡办工业，到县办工业到市、区办工业，各种工业都要办，而且要有分工。这就需要一套规划，不能盲目、无计划地做。这个是我们做科学研究人的一个任务，根据具体的情况来研究一个地区的发展战略步骤。

这次我在定西学到不少东西，主要有几条：第一，就是很多同志提出来的，我们对定西这样的贫困地区必须要扶持，要给钱，完全依靠这个地方的力量积累很慢。当然，国家也给了不少钱。问题是在怎么用法，必须强调要农民用这笔钱来发展生产，而且要有经济效益。比如说种草吧，草种出来了对他们有什么直接利益？你给他10块钱种1亩地，他不种你也不知道。所以他们提出来以畜促草，就是说用贷款鼓励农民养牛羊，农民养了牛羊就会自动地积极种草了。这就是使农民看到直接经济效益。我们不是搞救济，而是要用国家的资金促进这个地区的生产，使它能够自己发展。这是第一条。

我想到的第二条是必须在这个地区搞几个基本的、比较大的企业，用以发展这个地区的企业系统。我们要通过这些企业帮助这个地方发展每户人家的农业，要用工业促农，要用工业促畜牧。比如说他们提出来想搞一个亚麻厂。这地方适宜于种植亚麻，现在农民种了亚麻，只用亚麻籽来榨油，亚麻的秆子，却当燃料烧了，十分可惜。如果在这地区办一个亚麻厂不仅仅是为了发展工业，而且可以使农村的千家万户得到收入。不通过这个工

业系统，农业产品不会值钱。办厂要投资，这样投资是造血的投资，而不是输血的投资，但归结的问题是我们应当找一个使千家万户富起来的办法。办亚麻厂不过是一个例子，可办的不单是这一个，要抓一个规划，看哪个地方有什么特点，产胡麻的地方我们就在胡麻上下功夫，产其他的就在其他上做文章，以工来带农，使得农业产品值钱。以工来带畜牧，使得畜牧业值钱。以前是搞脱离当地经济的三线厂，尽管投了不少资金，对治贫致富毫不见效。我们应以此为戒。

第三个意见，我们要向沿海去要技术。这一条定西做得很好，叫“东引西进”，向东去引进，就是和沿海的发达地区的乡镇企业搞联营。他们说凡是办得好的厂子都是横向联合的项目。从前年我初次到甘肃来就听到知识分子外流，内地技术不足。这些都是事实，技术不足怎么办？很多人盼望国家多分配一些大学毕业生到西北来。定西的经验并不是这样，他们设法到江浙去请有实际经验的技术工人来作具体的指导。在苏州请来了三个会刺绣的小姑娘，来了三个月教会了定西的姑娘绣花，现在有一个村子专门生产绣了花的头巾和衣服，赚了大钱。又从北京请了一个工人搞果脯，几个月就办了厂，现在这地方的农民都愿意种杏树，因为杏子值钱了。外地这类有技术的工人多得很，只要多给一点工资就愿意来。当前甘肃农村里需要的正是这类技术工人，把他们引来确实能解决办乡镇小企业的需要。

我们不要小看了这样的乡村工业，乡村工业最大的贡献就是在过去几年里把几千万农民变成了工人了，这是历史上还没有过的，农民变成工人，这个人就不同了。这里我想到这一条，为什么我们现在改革这样困难，分析到底就是我们的“小农经济思想”顽固的厉害。为什么封建的东西去不掉，说到底是小农经济作怪。我们一步一步要把农民变成工人，最快的办法是农村里把工厂建起来，这样他不光一个人变了，一家人也变了。我们看到江苏出

厂一大批农民企业家，没有这一批人，不可能促进农村里生产力的发展。这一批人哪里来的，就是从实践里面培养出的，企业里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很少。这些是我这次来定西访问后的看法，不一定正确，我想再把它整理整理，在兰州再讲讲。

1986年8月4日

为了西北地区更好更快地发展^{* 1}

我是7月31日到兰州的，来到之后第二天，就到定西去参加全国贫困地区社会经济学术讨论会议。这是我第二次访问定西，我和当地的主要领导同志比较熟悉，也谈得很热乎，学到不少东西。从定西出来就直接到临夏。临夏是回族自治区。我有这个愿望，要在我一生的最后的年月里，留一点时间，从事少数民族工作的研究。我解放后就参加了这项工作，主要是在1957年之前，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工作。常想来西北，但一直没有来成，一过就是30年。最近3年，才有机会到西北来学习学习。在西北，我确是学到了很多新的东西。3年的时间不长，而且我每次访问都只有20多天。我对这一地区，当然不能说有什么认识。可的确我是走出了书本，进入了实际生活，看到了西北地区汉、回和其他各民族的实际情况。我还就他们今后怎么发展起来的问题，做了一点考虑。

西北的问题，在我来之前，耀邦同志已经做出了重要的指示：“种草种树、发展畜牧业、改造山河、治穷致富。”首先是种草种树，目的是在恢复生态平衡，再从生态平衡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畜牧业，这是一个正确的发展战略。什么叫生态平衡？这地区的生态平衡怎么破坏的？生态恢复平衡后，进一步怎么发展起来？这个地区将来在我国整个经济布局里面应当起到什么作用？

对以上这些问题，我有一些不成熟的意见想和大家作学术性的讨论。首先，我在定西开会的时候，就考虑这个问题：什么是

* 本文系作者在全国考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贫困？什么叫贫困地区？这个概念一般用两个指标来规定：人均口粮加上人均收入（不包括口粮）。凡是人均口粮南方在 600 斤以下，北方在 400 斤以下，人均收入在 150 元以下的地区被认为是贫困地区。

实际工作中，作为科学概念就两个指标很难准确地落实。我们粮食上的统计很不正确，一般是由基层政府核算上报，上报的粮食产量不说大跃进时期的浮夸，目前一般偏低，因为地方上要留有余地。真正的粮食产量不易算清。这次我去访问会宁的一个村子，同农民谈，他说，我们现在很好，有余粮了。有多少呢？大概有 1 万斤。我去看他存粮的地方，看到存麦满满地有三个草囤。与我一同去的县委负责人一看就说：“不到 1 万斤吧！”这里有一个心理分析，因为我是从中央去的人，农民倾向多报一些，县里的同志估计只有 8000 斤。两个数字相差 20%。这个统计上的误差很大。我说这个问题，不是批评什么人，而是说调查很困难，除非自己量，可我没有这个条件。如果采取询问法，就要看问什么人，不同的人可以做出偏高或偏低的估计。

至于一个人吃多少粮食才能“饱”，或能得到足够的营养，从事生产劳动。这又是一个科学的问题，而且是比较复杂的问题。以 300 斤或 400 斤为标准是凭常识规定的。一个人原粮 300 斤，不论是北方的麦子与南方的大米，一天吃不到 1 斤粮。农民壮劳力一天要吃多少粮食呢？我这次到农民家去看了看他们的灶房，看到了他们吃的一种烤饼，一块大概至少有半斤，据说一人一顿要吃三四块，是否说多了，不知道。我这样一算，很显然一个人一天 1 斤是不够的。要达到一天 1 斤粮，一年原粮至少要 400 斤。中国农民粮食吃得多，因为他们平时很少吃其他副食品。我 1970 年在干校的时候，下放到武汉附近的潜江县，住在农民家里，我和农民同吃同住，的确很少有菜吃，平时只吃白米粥。把贫困的标准划在粮食 400 斤以下大体上说是符合实际的。

用人均收入 150 元作为贫困杠杠，问题比较大。这是因为在自给经济里，用货币来计算人均收入谁也算不准。自给经济就是自己家里生产，自己消费。折合市价很困难。如果不把自给部分算入家庭收入，人均收入这个概念就成了“一家的现金收入”，并不能反映这家的生活水平。

在我们中国农村里要讲贫困这个概念，应当怎样讲？我很为难。我在定西发言前的一个晚上想这个问题，翻来覆去睡不着，后来吃了两粒安定才安眠。我说这段话是想说明对贫困下个科学定义是不容易的。但是为了把一些经济比较不发达的地区和其他地区区别开来，便于采取一些特殊政策，又不能不划一条杠杠。所以我们只好按常识规定凡是粮食在 400 斤以下，收入在 150 元以下划为贫困地区。实际上贫困地区并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只表示发展水平的差别。以我们中国的农村来说，解放以前，可以说绝大部分是在贫困线之下。从这一个出发点，经过 30 多年，有了差距，特别是 1978 年三中全会以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之后，起了一个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就是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有的地方发展得很快，有的地方发展得不怎么快，个别地区停滞不前，甚至有下降的。那些停滞不前甚至下降的地区，就是我们说的贫困地区。从农村经济不平衡的状态看，大概有 8% 到 10% 的人现在一般还在被称为“温饱问题尚未解决”。这些人也并不是真正的天天吃不饱，饿肚子，或是没有衣服穿受冻受寒。我想实际意义是这部分人对生活上的基本需要还缺乏保障。真正经常没吃饱的，我想是个别的，而且分散在各地方。至于整个地区的人都经常挨饿的情况，在中国已不存在了，所以，现在我们说贫困地区，实际是指农村经济发展不平衡，至今还有 8% 到 10% 的人生活水平很低。这种人各地都有，但大部分集中在边区，少数民族地区和革命的老区，一共大约有 8000 万到 1 亿人。这种较不发达的地区，也就是所谓

贫困区，主要分布在西北部和西南部，一般说有 12 片。有几片是在甘肃境内。过去说是“三西”，定西、河西、西海固，就是闻名的贫困地区。

我从前年起每年到定西去访问，目的就是想看看中国最穷的地方怎么样。三年前我在定西并没有直接看到没粮吃、没有裤子穿的人。我不是说这种情况已不存在，我只是说我没有亲眼看到。但是我相信在定西那时候那种经常挨饿和受冻的人已经很少，很个别。为什么我们说这地方是贫困地区呢？那是因为这地区多年来生态平衡被破坏了。植被逐年减少，水土流失，生产力下降，已丧失靠自身积累发展起来的力量。意思是说生态的恶性循环没有制止，生产力还在下降。人们劳动一年，生产的東西不够维持正常生活。每年要靠救济过日子。

如果把定西作为贫困地区的样本，我们可以说，贫困的标准实际上是在这个地区是否具有自力更生的力量，也就是说这地区本身是否具有积累以再生产的力量。丧失这种力量的原因很多，各地区各有特点。以西北讲首先是自然的原因，有些地区降雨量低，容易干旱，草木枯死，庄稼不收，造成灾情。其次就是过去政策的失误。在干旱地区，强制执行以粮为纲。老百姓开垦种田，破坏了植被，形成生态上的恶性循环。这些地区必须停止继续破坏，才能恢复生机。其他原因还有如缺乏燃料、缺乏能源，人们挖草根煮食和取暖，也加速了生态的破坏。

各个贫困地区治贫致富的办法，必须因地制宜，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具体计划。我在定西就了解他们这几年治贫致富的工作。别的地方我没有调查，不敢多说。先说定西这三年里行政区划有所变动，这也引起了研究上的困难。去年定西这个地区，在东北部划出两个比较发达的县，即会宁和靖远，在南部划进两个穷县，漳县和岷县，所谓比较发达的县就是在上述贫困标准以上的县，所谓穷县就是在上述标准以下的县。据去年的情形说，原来

包括在定西地区内的各县人均粮食和人均收入都已超过贫困标准，就是脱了贫困帽子，但经过行政区划上的调整，现在定西地区里还有两个县是贫困地区。总的讲来这三年是大有进步的，由于行政区划的调整没有完全解决温饱问题地区的人，在定西大约还占人口的 20% 上下，比全国平均数要高出一倍。

昨天《甘肃日报》上有个报道，说得很清楚，全国的三个部分：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包括甘肃在内的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正在缩小。总的讲人均收入东西两部相差 $1/3$ 。可是去年，西部长得快一点，快多少呢？是 15: 10，快了 $1/3$ 。正在逐步趋平，但还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平衡。很多同志很着急，希望快点平衡，对于所谓“梯度论”有意见。梯度论是说中国发展的形势是东部高于中部，中部高于西部，像个梯形。反对这个论调的希望国家加重西部的发展，以取得平衡，这是平衡论。我认为发展上的不平衡是事实。各地条件不同，有先富有后富，这是客观规律。问题实在是：让东部发展的慢一些，国家腾出一些力量对西部帮一把提起来呢？还是加一把力推动东部更发展，用东部的力量来提高西部？这是一个战略问题，可以展开讨论。一般说按经济规律投资的方向是以经济效益多少来决定的。现在投资在东部，经济效益比较高。国家当然可以根据社会效益，即从全局的发展，对西部加权。但是应注意到，东部的发展中有一个重要部分是靠民间的力量发展起来的。现在占江苏工业产值 $1/3$ 的乡镇企业并没有花国家一分钱。江苏所以能成为全国工农业产值最高的省，不能不说得力于乡镇企业。江苏的一个乡，就是以前的一个公社，工农总产值超过 1 亿元的有十几个到二十几个，而整个临夏回族自治州去年工农产值只有 1.7 亿元，等于我们江苏的两个乡。差距很清楚，一个地区赶不上一个县，我家乡吴江县去年工农总产值是 23 亿元，还算是个中等县。国家究竟在东部投资多少我不清楚，我看到的是江苏靠民间的力量去年创造了

300 亿元的产值。

今年上半年我到温州去，温州以前是个贫困地区，在 80 年代初期人均收入只有 55 元。穷到什么程度呢？大多数人的确吃不饱。在靠近福建的几个县，据说有 60% 的人出去讨饭。讨饭这句话也许用得过分一些，事实上是离乡出外谋生，主要是出卖劳力，有什么事就做什么事。据说这些县里，当时的县长、书记不敢上食堂吃饭，因为坐满了要饭吃的人。解放后，因为温州隔海是台湾，长期作为前线，国家没投过资。可是最近三年面貌大变。大概是 1982 年准许商品远距离贩运后，温州出现了奇迹般的现象。过去外出劳动的人，开始搞商品流动，变成各种小商品的采购和推销人员，建立起许多大市场。接着以商带工，发展了家庭工业。温州千家万户富起来了。温州的治贫致富确实不是靠国家投资，而是自力更生的结果。温州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靠农民自己积累资金兴办工业，提高生产力，治贫致富的典型例子。

我们中国工业起步需要的资金哪里来？这确是一个大问题。据我所知英国工业的发展靠在海面上抢西班牙的黄金，可说是海盗起家，日本是靠我们的赔款起家的。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的起步，都不是光彩的。我们没有地方去抢，赔款也不要。我们的工业怎样开始呢？靠农民。农民缩紧肚子积累资本。江苏乡镇工业发展时是靠公社的集体积累。所以当时叫社队企业，是农民劳动的积累。温州在公社时期没有搞社队工业，没有集体积累。他们是农民一家一户分别积累起来的。他们到外地去卖工，做木匠，弹棉花，卖破烂，挣了钱回家办家庭工业。

回到上面讲到反对梯度论的意见，我认为应当注意到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应当多看到本身的条件，不要太重视国家的投资，其实在 50 和 60 年代，国家为了三线建设，在边区确是投过不少资金，到现在并没有带来边区的繁荣。所以说，我们讲发展

战略必须从一个地区本身的条件出发。

我并不全部同意梯度论，因为我虽承认东西部的差距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是符合经济规律的现象，但是国家应当看到差距可能引起的后果，及时采取政策措施，为西部自力更生创造条件。而差距的缩小得多快，还得看西部人民的努力。当然首先要停止生态的继续破坏。然后考虑怎么来发展西北的优势，怎么引进东部的技术和资金，加快发展的速度，这是西北发展战略的主题。我这种看法对不对，请批评。

接下去我想谈谈，我对临夏这个地区怎样发展的看法。我自从从事民族工作以来，一直同情少数民族的处境，为他们过去受压迫、经济和文化都得不到发展感到不平。因之我常常要帮少数民族说话。可我帮他们说话时，我的心理状态是怎样的呢？总觉得他们委屈了，经济文化太不发达，所以要我们应当多多帮助他们。有一点像看见小弟弟被人家欺侮那样。在这个思想支配之下，对于少数民族应有的权利，它在发展上的积极因素就不容易看到。一个人的思想是会逐步变化的。不变化的话，思想也就僵化了。这次去临夏访问，我在怎样对待少数民族发展问题上有一些新的看法。

我在《甘南行》里曾说过在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交接处有一个走廊。这个走廊的特点有很多，许多小民族聚居在这里，如保安族、撒拉族、东乡族、土族、裕固族等。人数都不过几千人、几万人。从这儿向南是甘南，出甘肃境是四川的阿坝地区，这些都是藏族地区。其西南是怒江流域，民族情况更为复杂。在这条走廊里民族识别问题特别多：有些被划为藏族的提出意见，说自己并不是藏族等等。这些问题常把我考住了。因此我这次到临夏去转了一圈，想进一步理解这个多民族走廊的特点。

首先我看到这个走廊正处在以牧业为主的青藏高原和以农业为主的中原地区之间的夹缝里。从民族的角度来说，正是在藏族

和汉族之间。有意思的是从历史上看藏族以牧业为主，适应于高原草地的生活，多次扩张进入平原地带，但总是站不稳脚跟，绝大多数还是退回高原。汉族以农业为主，尽管有不少人个别地上这高原生存了下来，但是究属不多，说不上大规模的移民，至少汉族在这高原上还属少数。这在中国境内汉族占少数的地区是少见的。这两大区域却并不是绝缘的。在经济上自古就有密切联系，牧区和农区之间的商品交流。宋代起就称为“茶马互市”，茶是农产品的代名词，马是畜产品的代名词，互市是商品交流。交易需要个场所，有个地点。这地点必然在这两大民族和经济区域之间，所以就落在这带走廊里。查一查历史，明代以来农牧两大区贸易的中心设茶马司，其一就在现在临夏地区，称河州。

这条走廊第二个特点是多民族聚居区。现在临夏是回族自治区。回族又怎么会聚居到这个走廊里来的呢？回族历史简单地说：13 世纪初年，成吉思汗带了蒙古军队西征，直抵欧洲。后来忽必烈回兵通过云南再东进攻南宋时，军队中有一部分是从中亚细亚信仰伊斯兰教各族中抽调组成的。这支军队进入中原各地，和随后来的中亚商人、工匠一起定居下来，称色目人。除各大城市外，主要屯聚在陕甘云南一带，也就是我上面所说的那条青藏高原和中原之间的走廊里。甘肃的河州是一个屯聚的重点。到了明代，这些人的后裔已经和当地各族，特别是汉族相混合，通用汉语，但仍信仰伊斯兰教，被称为回族。

我在临夏访问时，发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回族大多数聚居在这带走廊里？这带走廊又为什么有这样多的小民族？我想这和回族所具有的特点是应当可以联系起来的。最初屯聚在这些地方的军队，按规定是“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他们原本不是善于耕种的农民。经商和牧养是他们的本业。至今临夏的回族还承认，农业上回不如汉，商业上汉不如回。回族善于经商，不仅可以溯源于早期的传统，也符合他们历代的处境，那就

是回族分布全国，社会关系四通八达，便于经商。在农牧两大地区的交接处正是他们的用武之地。人选择适于生长滋息的地方，地方也选择善于发挥其特点的人。我今天只提出这个观点，希望历史学家考虑这个观点是否抓到了要害。

我今天提出回族有善于经商的特点，首先是根据我在临夏观察到的事实。我串门闯户，接触许多现在所说的专业户，我总是要问一问是哪个民族，结果得出一个印象，大多数是回族或是信伊斯兰教的一些小民族。我也直接问熟悉地方情况的基层干部，汉人是否跑拉萨，是否也经商做买卖。我所得到的答案大多是现在汉人也开始跟着学做买卖了。意思是在出外搞贩运，回族居先，汉人正在跟回族学这个致富之门。我今天还拿不出数据来证明这个提法。希望对此可以进行一些计量调查。

回族善于经商是已有几百年历史的客观事实，我在这次访问中才对这件事有所认识，那是由于我的主观世界里有些成见阻碍我去认识这件事。我在上面已经作过自我批评，就是我尽管自认为对少数民族深有感情，而这种感情里还包含着对受过民族压迫以致经济文化发展不起来的少数民族的人道主义性质的同情，因而不注意少数民族在历史里培养出来的优势，并进一步去考虑怎样使他们的优势得到发展。这次我能看到回族经商的才能，而且认识到这种才能是回族的优势，实际上是由于我这几年对农村和小城镇的调查研究中看到了目前我们所进行的城乡经济改革中商品流通的重要性。我有一种看法，就是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的关键是在改变封闭性的自给经济为开放性的商品经济。在这个改革中调顺商品流动又是关键的关键。我从这个认识出发，看到了临夏回族这两三年里在沟通青藏高原的牧区和中原农区之间的贸易上自发地做出的贡献，就不可能不吸住我的注意力。反过来又明白了我过去许多观点的局限性。

让我讲一些具体的例子来说明自给经济的意识和商品头脑的

差别。我到会宁去看政协和民盟的支边试点米家峡村。这几年农民生活确是大有改善。在村长的家里坐下，问起他家的粮食。主人指着旁边的厢房里说我们大概有1万斤余粮，两年也吃不完。我说存久了是不是会坏了，卖掉些有钱多养些兔子好不好呢？主人回答得很干脆：“粮，不卖的。”粮食不是商品，留着备荒，烂掉也值得。后来我到了临夏，又听到了一个回族老乡的事。去年羊毛价钱高，可是他自己不养羊，手上没有钱买羊毛去贩卖。他想到家里还有几千斤麦子，下决心去街上把麦子卖掉，得了钱去青海买了一批带毛的羊皮。回家和老伴一起把皮上的毛剪下来，又在街上卖走，重新把麦子买了回来。一出一进，净挣了一批羊皮。会宁的汉族农民决不会做出临夏回民所做的事来，既不会这样去做，也不会想这样做。两个人的头脑不同，不同的根源大概可以回溯到不同的民族传统。

如果你们愿意多知道一些回族经商的本领，不妨和我一样坐车从兰州去广河看看，公路两旁已出现了不少新办的小企业，大多是个体户办的。一家男女老少全部发动，雇两三个劳动力，在这两年里办起了各种土产品的加工厂。由几千元的资金开始，经过一两年，许多已经盖起了新房子。不去看一看，不大容易相信。比如前天我去访问时看到的一家，侧房里满储一屋子的皮毛，气味很刺人。接待我的是个20多岁的青年。他说原来很穷，又不识字。去年他和个邻居听说四川藏区天气冷，需要毛皮的袍子。他就买了羊皮，缝制了几件皮袍，按地图跑到了甘孜。一下车皮袍就卖走了。从此他每个月跑几次。二十几元的本钱可以卖上百元的价钱。现在全家在缝制皮袍，他在甘孜地区几乎都跑遍了。一年下来，新房子已经盖好，一个小小的皮袍作坊也很像个样子了。

临夏的景象使我想到了温州。临夏全区大概有一百几十万人，在外做工和做买卖的去年约有16.5万人，今年要到20万

人，约占劳动力的 1/3。听来和温州相似：先是劳动输出，接着搞贩运，再进一步搞小作坊和家庭工业。我问他们主要到什么地方去做买卖。回答大多是青海和西藏。我遇到一个回族青年，几年前曾经跟人家搭股跑西藏，道路摸熟了，就自己经营，去年已经有了两辆卡车。运往西藏的有啤酒、民族服装、铁锅、肥皂、香炉、佛像和其他日用品，运回来的是牧产品。他说，一瓶啤酒可以赚 5 角，现在已销到尼泊尔和印度。他说，临夏人在西藏吃得开，长住在拉萨的有 600 多人，店子已有一条街。临夏在青海、西藏许多城市里设立了清真饭店、民族旅社以及办事处——三位一体的贸易中心已有 10 处。

我听到这些话，并由当地党政机关的工作同志证实了这些情况，明白了这两年临夏的确恢复了传统和青藏高原民间的贸易关系。我说恢复，那是因为过去二三十年来对民间贩运的限制实际上已把这传统贸易通道堵塞了。想不到此禁一开，在很短期间，大有一拥而上之势，我从这个势头里看到了回族的民族特点，也就是他们传统的优势。这个优势正是当前现代化所需要的“商品头脑”。

不仅临夏的回族正在大力开展青藏贸易，汉族也跟着参与劳务输出和出外贸易。其他几个少数民族又各有专长，大显神通。我们到临夏西北角和青海接界的积石山的滩谷里访问了三个村子，叫“保安三庄”，是保安族的聚居区，有 8000 多人。说是大约 120 年前从青海保安地方迁移到甘肃来的。原有语言带有蒙语的特点，信伊斯兰教。生活习惯和这里的回族相同。他们专长制造一种“保安刀”，是藏族牧民用来割肉就食的日常用品，有如汉族的筷子。保安刀制作精美，锋利耐用。刀把和刀鞘上还嵌上各种装饰的图形，实在是一种工艺品，保安族几乎家家户户兼做这种工业品。自产自销，是青藏高原的畅销货。

就在保安三庄，我去访问了和保安杂居的撒拉族，原有语言

带有突厥语特点。撒拉族一共有大约 6 万人，大多住在青海，在甘肃的只有 4000 人。他们的特点过去是从黄河上游伐木，把木排放到兰州和包头。一路要经过许多急流的山峡，是一项惊险的行业。据说从这种行业里培养出撒拉族耐得住重活，在艰苦的条件下劳动的民族特点。在修建青藏公路时，越过唐古拉山这段，海拔在 3000 公尺以上，撒拉族工人大显身手。甚至有人说没有撒拉族，这段公路是修不成的。

我访问了这些小民族后，更觉得我们必须从积极方面去承认各民族的优势，而把这些优势联系到他们现代化的前途上去。如果我们对临夏的这些民族，放手和鼓励他们发挥他们的传统特点，他们有充分条件担负起沟通青藏牧区和中原农区之间的贸易任务。再看一看青藏高原牧区，就会明白这一个适宜在这地区运转商品流通的队伍，正是帮助青藏高原牧民走上商品化经济的动力。

我去年去甘南访问，已提出青藏牧区商品化的必要。现在这地区的牧民还是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养了牛羊，只求能吃饱穿暖。牧民们用牧群的大小来比贫富，因此畜群里老弱牛羊占了多数，增加草地的载畜负担，而不发生经济效益。许多人认为藏民落后，我却认为这是这个地区缺乏商品供应，以致牧民感觉不到牲畜商品化的必要。要促进青藏牧区的经济发展，大量供应牧民所喜爱的商品是最直接的措施。我在一次电视里看到蒙古包里竟用钞票贴在墙壁上做装饰品，那是牧区缺乏商品供应的有力证据。商品自己是跑不上高原的，要有人把他们带上去。没有贩运的商人，也就谈不上商品流动。谁有本领上高原去做生意？谁熟悉青藏高原，能熟门熟路地拿商品去供应这地区的牧民？答案是清楚的，就是住在我上面所说的夹在牧区和农区之间这带走廊的人，特别是有经商传统的回族和其他那些信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汉人在他们的带动和帮助下也会跟上他们，参加到这个队伍

中去。

我的话还不能停住在这里。这里只说到了发挥各民族传统优势这一层意思。这还不够。临夏和它附近的地区，还应当像温州一样，“以商带工”，制造青藏高原牧区所需要的各种商品，而不要停留在贩运这个环节上。这就是利用西边这个大市场的需要，进一步使这个走廊地区发展起日用品制造业来。其实这就是保安族的历史经验。温州千家万户的家庭工业就是从开辟了小商品的专业市场带动起来。在这个走廊地区可以制造的商品，在品种上大大超过温州。温州是从市场的夹缝里，拾遗补缺地办起工业的。这个走廊面对的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青藏高原，在这高原上工业还没有发展，但是有丰富的牧业资源。这正是这个走廊发展日用品制造业的大好机会。这走廊经济发展了起来正可以成为帮助青藏高原经济发展的基地。我虽则由于身体条件没有去过西藏，但是我经常在思考，这个占全国版图 1/4 的青藏高原的现代化的突破口在哪里？我在《甘南篇》里提出了甘南藏区可能是个培养藏族现代化人手的前哨站。这次到临夏访问进一步看到了促进藏族牧业商品化的通道。总之，我的眼睛一直望着青藏高原，这样才发现了这个走廊所处的地理条件，这里居住的民族素质，和这个历史所启示的传统农牧集散中心。这一切都指向这走廊现有的任务，它完全可以成为促进青藏现代化的一个基地。这一地区要接受这个任务，还得解决怎样发展工业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临夏已提出“东引西进”的方针，就是从东部引进技术和资金，向西去开辟市场。我认为这是很好的方针。我几次到内蒙古和甘肃，总是有人要我注意人才外流的事实。事实是不容忽视的，不少早年从内地来支边的知识分子，年老了，要求回家乡。沿海乡镇工业的发展，也吸引了许多有技术的人才，一江春水向东流。我也同意这个趋向对边区是不利的。但同时，我却不止一次地指出另一个人口流动的方向，那就是大批缝纫工、木

工、机械修理工等等一直到弹棉花的、修皮鞋的杂工，数以万计地从沿海进入边区。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如果不受欢迎，那就是站不住脚的。他们能站住脚，能生活下去，能挣了钱寄回家乡，说明他们是适应当地人民生活的需要。他们正在提供边区人民生活所需要的服务，这些服务是有一定技术的，而正是这些技术符合当前边区发展的需要。

举个例子，我前几天在临夏去参观一个制造沙发的小作坊。这是个体户开办的小作坊，户主提供资金，出去购买木材及其他原料，接待来购买和订货的顾客。全部制造过程包给浙江来的一个青年工人。这个工人又从家乡请来了他的表兄，一共带上十几个学徒工，都是从家乡一起来的。主人计件给工资，并给他们膳宿。老板娘和一个姑娘管伙食和缝纫。这个作坊供不应求，看来很兴旺。工人们唯一的抱怨是伙食不够好。这个沙发厂正在增产室内家具、桌子、椅子等等，又另外请了一帮沿海的技工搞油漆。临夏市内正在兴建一个民间集资的百货市场。有几十个木工和十几个油漆工都是江苏、浙江来的。

定西有个村子，通过关系，从苏州请了几个姑娘教刺绣，一个月给150元的工资，另外招待膳宿和旅费，三个月村子里的姑娘们学会了简单的刺绣，替城里成衣铺在包头巾和衣衫上绣一些花。这个村子成了专业村，各家各户都增加了收入。运输需要汽车司机，修理工匠，又是从东部去请。需要什么样的技术，用比较高一些的工资到沿海地区去引进。这确是一个从实际出发引进技术的办法。这些技工不一定愿意长期落户，把技术留下，自己回去了。那有什么关系呢。两相情愿，互惠互利。人才技术我想就得这样流通。主要的一条是行政上只给便利，不要干涉。

现在边区发展小工业所需的技术并不是那么高的。沿海地区有充分供应的能力。而且本身已有扩散的要求。我认为“东引西进”的做法是切实可行，是总结这几年实践的宝贵经验。我

过去说过，这就是通过微血管活动，效果极大。所以我建议临夏的书记加强和已经来的外地技工的接触，安排他们，替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再通过他们去吸引这地区经济发展中所需的技术人才。通过他们去引进，比要求上级分配有效得多。

如果我们站得高一点，就可以看到成千上万的沿海初级技术人员正在季候性地向西北移动，而西北这个走廊里的人，又是成千上万地向青藏高原季候性地移动。这不就是所说“东引西进”的公式么？在这公式里如果引进的是技术，输出的是劳动和商品，这基地本身也就逐步形成了一个日用品生产基地。“东有温州，西有河州”这句话现在已经在临夏人的口中出现。这个提法对我有启发，传统的“茶马互市”的地点在明代是洮、河等州。洮州在今临潭，河州在今临夏。实际上当时河州还包括今青海海东地区，这个地区也是以回族及撒拉族为主，和临夏的属性相同。在发展上应当属于一个经济区，如果甘肃的临夏和青海的海东，行政区划不必变动，但进行经济上的密切合作，对开发青藏高原的大地区服务时，更方便也更有实力。

我同临夏的领导同志商量，他们赞同我提出的甘青民族经济协作区的设想，并希望能在原有自治州一级的地位上授予一部分自治区的自治权利。我很支持他们的意见，要从发展青藏高原的牧区社会经济出发来看待这个地区，应当享受一些自主权，使当地经济能更迅速地提高起来。我们不必加以特区的名义，只要能享受按民族区域自治法上规定的一部分民族自治区的权利就足够了。现在自治州的地位太低了一些。

我明年还来不来？不敢说一定来，可我的心还是在这儿，总得关心一个发展比较慢的地区能更快地发展起来。我展望西北的前途，如果能向西部的市场前进的话，不仅是青藏高原，还有新疆，甚至国外的中亚细亚和直到中东的那一系列伊斯兰国家。你们确有广阔的天地，比沿海地区更优越。我们可以在青藏高原沿

边的这个走廊，以家庭工业和乡镇企业为基础，发展成为一个背靠兰州这个大城市的轻工业区域。这个不成熟意见，盼望大家多讨论，多批评。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要求西北地区更好更快地发展起来。

1986年8月13日

对民族工作的一些看法和意见^{* 1}

这几年我跑了一些民族地区，老在想少数民族究竟如何才能发展起来？沿海地区这些年发展很快，真正起步都是在 80 年代，有的地方用了 6 年，有的地方用了 10 年。这样看，少数民族的发展，只要政策对头，真正搞起来，5 至 10 年也可见效。今年七八月份，我第二次到甘肃临夏，感到那里变化很大，但与沿海一带的发展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这些差距表面上看是经济差距，但是如果不重视，任其发展下去就会成为政治问题。我们要善于发现问题，真正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我从事民族工作几十年了，可以说，建国开始就搞这一工作。当时的民族问题与现在的问题重点有所不同。当时是民族平等的问题，反对压迫制度和歧视。现在性质转变了，主要是经济问题，要使各个少数民族都发展起来。随着民族压迫问题的解决，有些人在思想里认为少数民族问题已经解决了，不再存在了。因此，我看目前对少数民族有个忽视的问题，即普遍对少数民族不够重视。具体说，在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时，往往忽视了当地少数民族本身的发展。这问题从表面上看好像已经不存在民族压迫和歧视，但这种不重视少数民族如何发展的思想，搞不好会引发严重的后果。如 50 年代开发海南岛时，因为那时社会主义阵营发展工业急需橡胶，斯大林就对我们说，你们有一个海岛可以种橡胶，就这样在海南岛种起橡胶树。但当时开发海南岛没有重视岛上少数民族，没有教会当地的少数民族种橡胶，而只靠外面的人进去种植，这便出现了

* 本文是作者与国家民委、中央统战部同志的谈话记录。

国营农场与黎族农村的矛盾。国营农场建得很好，有房子，有场地，而农村里的黎族同胞还住茅草房。当时发展海南岛时，我们没有强调把发展黎族、苗族的经济文化考虑进来，而这一点又很重要。再如，内蒙古包头市现在有100多万人口，但蒙古族人口比例占多少？外地人把大工业引进去，地区是发展了，但吸收当地的少数民族很少，使得当地少数民族在工业人口结构中比例不适当。更重要的是包头这样一个工业城市，长期以来没有成为带动内蒙古地区工业化的中心。还有一些民族地区，在发展国家经济的名义下，把少数民族赖以生存的树林都砍光了，使这些地区的农牧经济蒙受严重的损害。少数民族的生活当然就上不去了。所以我认为，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必须同时考虑当地少数民族的发展。开发边疆，光依靠外来人发展是不够的，还必须包括当地的少数民族，必须将当地少数民族吸收进去。要把地区的发展同当地少数民族的发展结合起来，利用外来的知识和人才，把当地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带起来。

对贫困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采取照顾、扶持的政策，是好的。周总理讲过，我们是欠少数民族债的，要还债。但有些同志说，这债不是我们欠的，是封建地主阶级欠的。我记得总理接着说，少数民族并不像我们这样看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要从少数民族思想实际出发，解开民族隔阂的结。总理是从无产阶级和全民族利益的高度讲这话的。解放后，人民政府为了达到各民族共同富裕和发展，采取了对少数民族照顾、扶持的政策，这是完全应该和正确的。但如果只是看到少数民族落后，出于同情而照顾、救济、补贴，像可怜小弟弟那样，并且成为我们民族工作的一项主要工作，便大有问题了。少数民族有困难，加以救济，本身没有什么不对，可是从长远的效果来看，如果这种做法使他们养成一种依赖照顾、救济的心理，就不好了。在实际工作中，我们也不能单纯用照顾来体现发展少数民族的政策。我们的政策应该是

使广大少数民族真正能站起来，自力更生发展自己。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才在一定时期内采取照顾和扶持的手段。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对他们的少数民族是给了不少钱的，每人平均几千美金，而且还造了房子，结果少数民族丧失了为自身生存和发展奋斗自强的意志，不少人就拿了救济金去喝酒，混日子过活。这种性质的照顾，不是我们社会主义的政策，不能学。救济和照顾的目的是为了发展他们本身的优势，增强少数民族自力更生的能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需要很好地研究各个民族的优势和特点。

说起民族特点，过去只讲什么服装、歌舞、习俗，然而一个民族为什么能够生存发展下来，他们有什么特殊能力和素质，却很少有人注意。各民族的特长和素质，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是各民族所特有的。上面说的民族文化特点我们注意到了，但经济特点、产业特点，现在还没有人很好地研究。50年代，我随中央访问团到广西，看到苗族、瑶族都住在山上。有人说这是因为过去被统治阶级压迫才上山的，现在消灭了民族压迫，就应当请他们下来。当时有些地方真的把少数民族从山上请下来，但后来他们又都回到山里了。主要原因是当时我们思想上没有注意到少数民族的优势和特长，更不懂得必须根据各民族的特有条件，帮助他们走自己的发展道路。苗族、瑶族都有发展山区的特点，当时为什么不让他们在山上发展山林经济呢？所以造成了政策上的偏差。这几年对少数民族的照顾、扶持政策是不是养成了一些少数民族的依赖心理？现在民族地区的一些干部，眼睛总是向上，要钱，要照顾，而不下力气研究自己如何发展，如何自力更生。有这种思想的人还不少，其中包括一些从事民族工作的领导干部。用这种思想来干民族工作，我认为是有问题的，恐怕在思想上要改一改。可以请从事民族工作的汉族和少数民族干部一起讨论讨论，这样下去对少数民族的发展到底有没有

好处？

我这次到临夏，学到了许多新知识。临夏的回族不光戴白帽，他们还会做生意，有商品经济头脑。回族为什么会分布在全国并集中聚居在宁夏、青海和临夏这片地区生存发展，这不是偶然的，是有历史渊源的。从临夏的地理位置来说它处于农区和牧区之间，是农、牧区商品交换的中心，在历史上称作“茶马互市”。青藏高原上的牧民可以用马、毛皮和肉、乳制品，在这里换取他们所需要的农区生产的茶和粮食。这一历史根源形成了回族善于经商的特长。回族的来源大体上有两种说法：一是早期从海道进入中国的信仰伊斯兰教的人，他们聚居在沿海的泉州、杭州和扬州等城市。二是忽必烈回征华南时，从中亚西亚集合了当地的商人和工匠组成后勤部队带进来的。这部分军队是信仰伊斯兰教，称回回军，后来就驻扎在甘肃、青海一带，屯垦定居。这一带正处于农区与牧区之间，是“茶马互市”的重要商业地区河州。临夏就是过去的河州。它的西部是藏族、蒙古族、土族聚居的青藏高原区，东部是以汉族为主聚居的平原地带，河州介于中间，地理条件决定了这里的回族既能习惯和藏族为主的高原民族交往，进行经商贸易，又能和东部地区的汉族和睦相处，互通有无。生息环境决定了他们可以起到农、牧区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联系的媒介和纽带。他们以信仰伊斯兰宗教作为自己民族凝聚力的支柱，在汉、藏两大民族的相邻地带，求得生存和发展。回族种田可能不如汉人，但经商搞贸易比汉人强。这是在长期的历史活动中自然形成的。解放以后，商品交换都由国营、合作商业包揽了，回族的日子就不大好过了。现在一放松，一搞商品经济，回族又活跃了，又可以发挥他们的传统特长了。现在临夏做生意的有1万多人，主要是往返拉萨搞运输。

我从临夏回族到青藏地区从事贸易活动这件事，想到了青藏高原如何开发的问题。要把那里的藏族发展起来，必须要从发展

商品经济入手。光靠自然经济是不行的。但是有谁愿意把商品送上青藏高原呢？千百年来汉人很少愿意去，藏族自己又不习惯于经商。这次我看到那么多回族那么积极地上高原经商，我心里豁然开朗。回族在开发青藏高原上可以出大力。发展青藏高原固然要重视藏族，发挥他们的农牧业和矿产资源的优势，但是他们现在还是封闭型的经济，还是以自给经济为主的观念在从事牧业生产。只有用商品去打开封闭的大门，才可改变青藏高原的经济面貌。这就要依靠善于经商的回族来做这件事了。我们应当放手让回族上青藏高原去做生意，把藏族喜爱的日用品和牧业的生产用品送到高原上去，换取他们的畜产品，使藏族群众知道这些畜产品可以换取他们所需要和喜欢的东西。由此使他们重视发展这些畜产品，促进他们发展商品经济的意识。回族善于搞贸易是历史培养出来的，是客观存在，我们要发挥其长，用以开发青藏高原。

我有个设想，在临夏和青海的海东地区，以回族为主，加上藏族、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建立一个发展青藏高原商品经济的基地，专门供应青藏高原各种商品，并把青藏高原的畜产品运出去，与外面进行交换。这样就可以把青藏高原的经济搞活了。一部分商品可以从东部各省买来，然后卖到青藏高原去。还可以逐步在这基地上发展适合本地区的工业，自己生产了商品，销到西部去。这叫“东引西进”。向东面引资金、引技术，向西面开辟市场、购取原料，并且“以商带工”，逐步把这商品经济基地的工业带起来。这样西北的经济面貌可以得到较快的改变。

民委的工作，有许多事情要做。其中民族区域自治问题要切实重视。现在民族地区普遍反映他们没有自治特点，与其他地区没有什么区别。民族区域自治法及各种有关政策、条例都有了，但民族地区却没有感到与其他地区有什么不同，这就是问题。习仲勋同志在全国民委主任（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也谈到，要重视这个问题。民族地区各州、县需要什么权力才能发展？我们

能给什么权力？现在还不大清楚，还需要好好研究，需要具体化。例如，做生意需要有流动资金，但银根紧缩，银行不贷款，影响了民族地区的发展。这类事要在自治条例里有比较明确、具体的规定。当然，不是什么权力都要下放到民族地区，而是只给必要的权力。所制定的条例要适用于这个自治地方，真正促进当地的少数民族发展起来。还有民族自治州、县的横向联系也要重视。有些事情，一个自治州或一个自治县做不到的，可搞横向联系，民委要给予帮助，做牵线工作。对民族地区的乡镇企业和真正的农牧民企业家，也要帮助和扶持。搞活民族地区的经济需要资金，是不是这可以与国外伊斯兰海湾国家财团联系。这些伊斯兰财团的贷款，利息要的不多，这一点我们可以利用。据说，伊斯兰国际商业信贷银行这个财团是以帮助第三世界为主的，总部设在伦敦，工作人员许多是孟加拉、巴基斯坦人，在北京也设有办事处。据了解，他们是愿意与我们合作的。我们要建立联系，争取利用这笔钱。当然，这里面有许多政策性问题，需要我们搞出一套发展规划，拿出办法来，还要培养大批人才。这些都是我的想法，希望民委能着手进行这方面的工作。

还有几个具体问题，我也谈点意见。一是民族识别问题。我主张这类问题粗线条解决，不要搞得太细，不要回头看，要向前看，看这项工作是否有利于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民族的形成与发展是很复杂的，如果回头清算的话，可以没完没了。我们汉族可以说是杂拌，是几千年来多种民族融合而成的，有的融合早，有的融合晚。比如贵州的“穿青”人等，原是汉人迁移去的。对这类情况，李维汉同志有一个原则：过去算是汉族的就不要再改成少数民族了。当时有一种说法，称这类人为汉裔民族。后来，李维汉同志说这名称不能成立，既然是汉族的后裔，也就是汉族嘛。但是现在确有些早期移入少数民族地区的汉人要求承认是少数民族。这类问题如何解决呢？我是主张釜底抽薪，即发展

经济。经济发展了，曾经被孤立和封闭的移民集团比较快地可以和祖先认同了，也就不会有什么改变民族成分的要求了。民族形成是复杂的，不能简单化或“一刀切”。过去提出的识别标准，有的也不很科学，所以不能太认真。

二是语言问题。要尊重少数民族有使用自己语言的权利，同时又要鼓励他们学汉语，这是开放的需要。推广普通话，这对经济发展和商品交流有好处。我们提倡推广普通话，与台湾搞的国语化有本质区别。因为我们是以发展各民族自己的语言为前提的。汉族学习少数民族语言不容易，少数民族学汉语也一样，要创造学习条件，加强民族交流和团结。

三是文物问题。彭真同志过去讲，要把少数民族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东西保存下来。现在少数民族发展很快，要抢救他们的文物。一个人总要知道自己是从哪来的，要寻根。根子都是比较原始的，这没什么丢人。抢救民族文物，把其风俗习惯及文化遗产记录下来，写成各民族的社会文化发展史。文物学是博物馆学的一个方面，文物收集很多，如保护不好，还不如不收集，这是一门学问。我们是个多民族的国家，过去周总理一直这样讲，我们要从小学生起就进行民族教育，让娃娃们从小就知道我国有多少民族，为什么建民族宫？就是为了体现我们是个多民族国家。现在民族宫的性质有些改变了，没有原来建宫时的意识，搞成招待所、旅馆了。我不反对民族宫要力求经费自给，这是可以从民族文物的路子上想办法，而不应当从出租房屋上打算。另外，不要放弃建设中国民族博物馆，我希望民委研究这个问题。因筹建“民博”在国务院已挂上号了，在国外也都知名了。“民博”一下子搞不起来，可以慢慢来。可先在各地方发展，待经济条件好了，再搞个像样的博物馆。

四是民族教育的改革问题，办民院要有自己的民族特点。过去办民院都是照搬汉族院校办法，看来有问题，要研究。最初办

民院是为党培养政治干部，起了很大作用。现在对干部的要求提高了，要懂经济、懂管理的。过去那一套课程已经不适用了。目前，怎样搞好民族地区师范教育是个大问题，民族地区需要大量师资。我认为民族学院要抓这个重点。我曾主张在甘南搞一个藏族师范学院，因为甘肃的师资力量相当强。如果能和甘肃师范学院合作，建立一个藏族师资培养中心是有条件的。我希望民委能注意这个建议。

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需要人才，但不一定要很高级的人才，而是需要大批、有实用技术的人才。我看需要请些专业能人、中级技术人员下去。甘南有个乡镇皮革厂，请了上海的三名技术工人，一下子把厂子搞活了。此外，还要利用先进省、市的技术力量，为民族地区服务。我们要帮助做这个工作。当前东部发达地区有不少技术工人向内地流动，我称为微血管流动，见效快。比如海南岛黎族地区恐怕要到广州等地请技工，以解决适合当地经济发展的问题，光靠大学生是不够的。

最后是研究工作问题。调查研究要能解决问题，要有针对性，为现实服务，不要搞成学究式的。要注意培养二三十岁的年轻干部，不然年纪大了，下去也深入不了。

1986年12月24日

海南行

海南岛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全岛聚居着 30 个民族。在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居住着 90 多万黎、苗等少数民族兄弟。民族地区的开发无疑是整个海南岛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我倡议举行了这次有百位专家、学者参加的会议，来专门讨论一下民族自治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问题。

—

首先讲讲我为什么要倡议开这次研讨会。

1985 年我在广州参加一次学术讨论会，得知国家民委有关单位要收集文物，准备搞一个民族博物馆，要到海南岛去收集文物。再说海南岛冬天的气候很好，风景也好，因此也把我引进来了。来到海南岛后，这个美丽富饶的宝岛把我吸引住了，结果逗留了一个星期，跑了一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我们中国要找一个比海南岛自然条件更好的、资源更丰富的地方是很难的。海南部分地区属于热带，有着特殊的自然条件和自然优势，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当然风景也特别美，三亚地区的风光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但是，这个富饶地区的居民有不少还没有摆脱穷困，特别是自治州少数民族地区。

最近几年我在全国跑了不少地方，包括汉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从江苏沿海到西北和内蒙古。在我的印象中，最穷的要算海南岛的少数民族，有些黎族同胞住的还是草房，一根竹、三块

砖、一个炉子、一块板，其他什么都没有了。在这么一个资源丰富的地方，还有这么贫困的人，是我这几年跑过的地方中印象最深的一次。

海南岛这个有着丰富资源的地区至今还没有很好开发，潜力很大，开发起来有可能成为全国最富的地区。但眼下自治州还是比较贫困的，很多人还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全州还有 1/5 的人年均收入在 120 块钱、200 公斤粮食以下。这个地区客观上是具备了富起来的条件，可是还未富起来，我一直惦记着：怎样才能尽快地改变这种状况。

进入 80 年代以来，我们国家面貌大变了。就拿我的家乡长江三角洲苏南地区来说，从 80 年代开始，差不多每年人均收入都以 100 元的速度递增，而自治州的情况至今年人均只有 200 元，整个海南岛是 300 元，广东省是 400 元。就是说，自治州的人均收入是最低的，海南岛内地少数民族地区与本岛沿海汉族地区相比也相差一半。我们有条件富而为什么不可以富起来呢？问题不在天，而是在人，其中就包括我们这些人没有尽到力量。

80 年代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时期，我经常到农村去调查研究。这 7 年里我就去过苏南农村 10 多次，观察那里的农村是怎样发展的。那里不仅房子在变，人的生活也在变，而且头脑在变，精神面貌在变。这样快速的发展实际上还不到 10 年时间，显著的变化是最近 5 年。去年江苏的工业和农业都是全国第一，我看了很兴奋。家乡的发展就使我想到海南岛，所以就提出了发展海南的设想。

二

解放后我曾经做过民族工作，现在还是国家民委的顾问，我

还是关心少数民族的。少数民族地区如何发展起来呢？在全国来讲这确是一个大问题。

我在海口看到不少名胜古迹，如苏东坡的祠堂。海南岛在封建时代是充军的地方，封建王朝把反对他们统治的人流放到海南，是让他们在这里自生自灭。苏东坡居然没有死在这里，而是“改正”之后于回乡路上死在常州的。以前海南是一个蛮荒之地，苏东坡是个文人，给海南带来了当时中央的文化。

历史上海南岛虽然没有开发，但在靠近大陆的地方却受到大陆文化的影响，后一段时间还受到海外的影响。宋家三姐妹就是文昌人，文昌是出知识分子的地方。天不怕、地不怕，明代那个连皇帝也敢顶的海瑞也是海南人。但是大部分地区却是很落后的。这种不平衡的发展在相当长的时期以来就已经存在了。

解放后海南岛曾有个发展战略目标。50年代初，人们看到了海南的重要地位。海南是中国独有的热带地区，那时整个社会主义阵营还没有一块热带地方可利用来生产橡胶，因而想利用海南的天然优势，来种植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战略物资，所以当时只是考虑怎样利用这块土地而没有综合考虑海南的经济发展，没有一个全面的发展规划，但是能看到海南这块土地的优势就比以前前进了一步。

解放初发展海南的战略目标很具体，就是发展橡胶这个当时社会主义阵营急需的军用物资。橡胶在海南并不是传统的经济作物，也是引进的，从南洋、马来亚引进了专家，从大陆引进了农民，围绕着这个战略目标，建立了许多国营农场。由于上面讲到的历史原因，海南的经济长期以来一直是以单一作物为主的经济，缺乏一个全面综合发展的观点。

现在国内外的形势已经变了，工作的重点也变了。不同的历史时期，对海南岛应有不同的发展战略。我们有责任客观地把海南岛的真正情况调查清楚，提供决策参考。我想当前我们知识分

子可以在两个方面出力：一个方面是我们国家经济建设需要科学的资料。依靠个人意志做决策的做法已经过时了，现在搞经济建设，提高效益，就要靠科学的资料。中央领导同志明确指出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课题。这是对领导同志讲的，领导同志要处理当前的问题，不能像过去那样光靠个人的脑袋，要民主化、科学化。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新的局面，错综复杂，瞬息万变，常常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必须要有综合性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的、可论证的资料来帮助领导同志进行决策。

三

另一方面是知识分子也需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知识分子在过去一段时期唯书、唯上，不敢越雷池一步，怕当“右派”，养成了不敢接触实际的作风。不仅社会科学是如此，自然科学也如此。讲权威，权威说的都是对的，都跟着做。我的经历也是这样。我从1957年之后基本上没有说话了，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没有逃过，还挨了一番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策改变了，进入80年代变化就更大了。学术界的思想随着也活跃起来了，开始在实践中找问题，从实践中发现群众的要求、经济发展的要求。这是一个可喜的变化。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搞学术研究的人，要求走到群众中去，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但是联系实际要有一定的条件，没有条件不行。于是我就想到了民盟。民盟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政治集团，民盟的成员都是愿意为祖国贡献力量、为四化服务的知识分子，民盟组织有责任创造条件来满足他们联系实际的要求。作为一个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党，就应当发挥其成员为四化服务的作用。我找杨应彬同志商量，能否由

广东省政协带头，发动各方面知识分子来共同研讨开发海南岛的问题。杨应彬同志赞同我的倡议，决定由广东省政协带头进行这一项工作。这是这次会议得以召开的由来。

解放以来知识界有一个毛病，就是过于专业化。我们当学生时，知识面就比较广，不像现在从中学就开始分科了，分科后就开始专业化。这样，学生出了校门，接触实际时就感到吃亏了，这主要是其他学科的基础不够。特别是现代社会的发展，许多问题都是综合性的，不可能由一个学科单独解决，所以我们要提倡多学科、综合性的研讨会，使各科专业的学者能有机会听取其他学科的看法，从中得到启发，提高专业水平。我希望大家能提倡这样一种新的学风。首先要树立知识为国家服务、为四化服务的思想，这也是民主党派一项重要工作。第二是专业知识要联系实际，把多学科组织在一起，讨论一个地区具体的发展战略。我们这次研讨会就有从事水利、地质、经济、农业、工业、民族等研究的各方面的专家，大家一起来讨论，互相学习，提出一些有实践意义的意见。我把它叫作“决策的智力支持”。我们这次会议成果的好坏，不是个人说了算，首长说了算，要看是否在实践中有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要发动知识界的同志都关心当前的经济建设，要使他们有机会把学有专长的知识贡献出来，促进经济建设，提高社会生产力，这是方向。

总之，要通过理论联系实际这条路子培养出一批真正对国家有用的人才。人才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哪一个人封的，不是靠文凭，而是要靠真才实学。真才实学从哪里来呢？课堂学习固然重要，但仅仅如此是不行的，搞社会科学一定要接触实际，到实践中去锻炼，在民主讨论中，吸收别人的意见，逐步充实自己。我们不能老是埋怨别人不用自己，真的到了别人使用自己时就慌了。我自己也是这样。我写文章，当然希望别人说我写得好，但是听到别人说我写得好也就紧张了。因为我要负责，社会

影响究竟好不好，不能凭别人口说。这时候就会感觉到自己的知识越来越不够了，这是心里话。我在海南不能多说话，因为我自己没有很好调查研究。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希望大家一起努力根据可靠的事实说话，创立一种新学风，培养一批符合时代需要的人才。

四

接下去我讲一讲我粗粗地看了各位的研究材料之后的想法。这个材料使我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各个地区的发展有着不同的路子，需要承认因地制宜，多种模式。我国幅员广大，各个地方的历史发展不同，具体的条件不同，只用一套办法来搞必然要吃大亏。例如大寨，开始是不错的，在黄土山区搞出这样一个发展农业的办法来是了不起的，后来捧得那么高，要各地都来学，结果就出了偏差。这是一个教训，就是各个地方都要创造自己发展的办法，可从别人的模式中吸取有用的东西、经验和办法，但不能照搬。

我自己开始时对这一点也不清楚。没形成这一观念。这里作一点自我批评：我曾经说过“今天的苏南是其他地区的明天”，这句话说得很漂亮，但实际上是不全面的。其他地区都要发展，都可以发展，可是都要走苏南那样发展的模式却不行。不讲其他地方，就拿苏北来说也不能照搬苏南的办法。苏南包括苏州、无锡、常州等地区，他们在合作化时期已有集体工业，后来实行生产责任制时，集体工业并没有分散，至今还保持了社队集体经济实体。这个经济实体的集体积累就是苏南乡镇企业开始发展的基础。苏北没有这样的工业基础，公社时期没有集体工业，实行责任制以后筹集资金办工业就困难了，所以不能像苏南那么样发

展。今年3月我到温州，这个地区公社时期没有留下什么工业，但它发展起来了。他们近几年从家庭工业发展了起来，走出了一条温州的道路。温州模式也有它的前提，它的传统。温州人商业意识较强，农村里的多余劳动力很多在外地讨生活。这些在外地做买卖、卖手艺的几十万人在这几年里组成了一个流通网络、信息网络，发展千家万户的小商品生产。我在温州就意识到在不同基础上的乡镇工业，都可以发展起来。各个地方发展的模式可以各式各样，而且必须找到自己的优势、自己的办法，这样才能发展。这是我认识上的变化。

我在苏南总结了四个字，叫“无工不富”，农村不搞工业不会富起来；到了温州我又总结了四个字，叫“以商带工”。然而，各处农村的特点不同。“无工不富”在苏南完全对。可是如果只说“无工不富”，好像单靠农业就不能富了，其实也并不是如此。最近我到了湖南洞庭湖地区去访问，这个地区走农业商业化的路子同样可以富。他们种苧麻、种橘子、种油茶、种油桐等，利用丘陵地带来发展大农业。这两年发展真是惊人，他们盖了房子，买了家具，可以说富起来了，但是他们还没有搞工业，主要是靠种植经济作物富起来的，农产品靠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成为商品，所以说搞农业可以富。这里指的是大农业，不光是种粮食，只要真正走上商品化的道路，就有富起来的可能。当然这并不是说不要工业。洞庭湖地区现在还是小农经济，发展是有限度的，要进一步发展，还是要有加工工业，否则只能出售农产原料，好处给别人占去。

五

在湖南的调查中，我还注意到农民富了怎么办的问题。就是

说农民手上有了钱，钱怎样花法。我们的农民过去穷有穷的办法，现在开始富了，“富了怎么办”却成了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了。处理手上的钱，大体上不外三种办法，一是消费掉，二是放在口袋里，三是拿出来再生产。刚刚脱贫的农民首先是要吃饱、穿暖，然后造房子解决住的问题。洞庭湖地区的农民，正在从满足了温饱进入大兴土木盖房子的时期。有一部分农民衣食住基本上都解决了，下一步怎样呢？一般说，主要还在按照第一个办法，就是花钱消费。自己造了房子，再为儿子造房子，甚至已经有为孙子盖房子的了。手上钱多了，手面也宽了，自己吃饱了，就找机会请亲戚朋友大吃。听说有人结婚请客花了1万块钱，真把我吓坏了。我们知识分子就花不起。中国农村里的办法就是这样，讲热闹、讲场面。这是从小农经济养成的传统。土地有限，吸收不了多少资金，所以投资再生产的观念没有客观基础。不消费就只有放在口袋里，压在箱子里。旧社会农村里的地主，不都是把银子窖藏在地下的么？

我在甘肃会宁的农村里访问一家农民，他说：“我现在边房里都堆满了粮食，有1万多斤，三年都吃不完。”我说：“你吃不完可以卖出去呀。”他说：“不行，粮食怎么能卖出去呢？”他宁愿囤粮喂老鼠，也不愿上街卖粮食。后来我们到了临夏回族自治州，访问一家农民。他告诉我，去年看见羊毛值钱，就把粮食卖出去，拿了钱买羊皮，剪下羊毛又拿出去卖，得了钱把粮食买了回来，净得了一批羊皮。这家回民就有商品经济的头脑。在新的政策下，临夏回族自治州有许多人到青海、西藏去做买卖，买了汽车跑一趟就赚几万元钱，富起来了。为什么会这样？这就要讲到民族的特点了。简单地说，回族从历史上就是个会经商的民族。在新的条件下，他们发挥了传统的特点。相对来说，以农为本的汉族农民在这方面却远远不如回族了。

六

联系海南岛的具体情况，我想谈谈海南岛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大家都认识到，海南岛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假如我们能把握现在人类已经掌握的知识、科学技术利用到海南岛来，就可以把海南岛建设成一个很富的地区。海南岛具备良好的客观条件，问题就在于怎样把这一套新的知识、新的科学技术用来发展海南岛的商品经济。这是我们这次会议研讨的主题。在这个会上专家们提出的论文里，围绕这个主题提了很多好的意见和看法，有的很有价值。但我想指出一点，这些论文里，写“人”的不多，没有狠狠抓住这一关键。发展经济必须利用科学知识和科学技术，但科学知识和科学技术必须通过人的头脑，通过人的积极性才能发生作用。我们要改变海南岛的面貌必须通过人。可是对海南岛上有什么人、这批人有什么特点，却考虑得较少。

我们现在讲的自治州，是少数民族的自治州。我们一定要通过本州的人来改变本州的面貌。海南岛的自治州是黎族苗族自治州。自治州一共有 200 万人，其中 90 多万是少数民族，100 多万是汉族。汉族是怎么来的，想法是怎么样的，有什么本领？少数民族又是怎样来的，他们生活怎样，想什么问题？这些是我们都要摸清楚，要分析海南岛人的因素。

我在上面提到过，要发展回族地区的经济应该充分利用回族的特点。很多同志对回族的历史不熟悉，我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中国的回族是两个部分构成的：一个主要部分，一个次要部分。次要部分是从沿海一带来的。这一批是信伊斯兰教的商人，福建的泉州，浙江的杭州，甚至江苏的扬州都有他们的遗迹。这一部分后来都吸收到回族里去了。另一部分，也是主要部分来自

大陆。13 世纪成吉思汗西征，占领了中亚细亚，把当地的技工和商人组织起来为军队服务，这些人大多是信伊斯兰教的。后来蒙古人进入中原，这些信仰伊斯兰教的部队就掺杂其间，在西北沿青藏高原通往中亚的商道一带定居下来。他们主要是靠做生意，从事茶、马贸易，在牧区和农区之间进行商品交换。茶是指农产品，马是指牧区的产品，茶、马贸易代表了当时农业、畜牧业之间的流通。这种贸易在唐宋时代已经很发达了，元代统一了青藏高原，这种和内地的贸易也必然得到发展。定居在这个地区的回族主要做这件事情，并一直保持了这一特点。全国各个大城市都有回族，主要也是搞商业，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流通网络。现在我们要把农村的自给经济转变为商品经济，在这个转变中回族就可以发挥作用了。

去年我去了一趟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今年又去了一趟。这一年来临夏的经济发展得很快，对我很有教育。我发现自己过去对少数民族的看法有很多不正确的地方。我对少数民族很有感情，少数民族的朋友也这样说。为什么呢？我分析一下自己，主要是感到历史对少数民族很不公平，以致他们在经济和文化上落后了。我有一点“抱不平”的心情想去帮助少数民族。因为很少从积极方面去发现他们的优势，所以一谈到帮助少数民族，就变成了对少数民族讲照顾和补贴，而很少从扶助他们用自己的腿走路，去考虑使他们发展起来。

七

一个民族能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发展起来，这是一个基本问题。我到过加拿大，加拿大有很多印第安人，我到他们家里去拜访过。现在加拿大印第安人基本上吃得饱、穿得暖了，有房子、

有汽车，都是靠国家给的钱置办的。事实上印第安人已起了变化，一部分人不愿意接受这种被养活的机会，抛弃他们原来民族的特点，而要求参与到社会里面去。可是他们一进去就碰到很大的实际困难，大多数人只能留在社会的底层，很少人能爬上去。另一部分人接受救济和补贴，温饱问题虽然解决了，但却失去了精神支柱，活着有什么意思呢！拿到钱就喝酒，糊里糊涂地过日子。看来这个民族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国家养到它最后死亡，人越来越少；一条是被同化，作为一个民族就消亡了。这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少数民族的前途。我们需要走一条社会主义制度下各民族共同繁荣的道路，这是一个根本问题。一个民族首先要自己站起来，自己走路，自己发展，绝不能依靠别人过活，一切伸手。这方面的教训太多了。现在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怎样让各个民族发展起来，这个课题在历史上没有先例可供我们学习，要我们自己去创造。在中国历史长河里既要承认各民族的区别，又要各民族自己站稳脚跟，参加创建和丰富我们中华民族的共同事业。

我们建国以来，在民族工作上取得很大成绩的。首先是消灭了民族压迫，实现了民族平等。接着花了不少力量去帮助他们发展起来。帮助少数民族有两条办法，一条叫做“输血”，一条叫做“造血”。过去我们花在少数民族身上的钱不少，可是花在“造血”上的不多，用在“输血”方面的较多。“输血”是怎样“输”的呢？汉族的劳动者把自己的劳动成果通过税收等各种渠道集中到中央财政，再由中央财政分配到各个地方，包括海南岛这个自治州。海南岛自治州的财政一半要靠中央补贴，单靠自治州的经济力量是不够建造我们在这里开会所用的这个房子的。其他民族用他们的力量帮助建成这个大楼，自然是好的，应该做的。可是绝不能满足于这样的帮助，应当赶紧想办法帮助海南“造血”。怎样才能形成一个能自己积累资金的机体？请大家多

多考虑这个问题。

八

自治州的前途可能出现一种不太好的状况：一方面是自治州和岛上沿海的地区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是自治州里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差距越来越大。这两个差距如果继续扩大，就不是好现象，但是又不能叫走在前面的走得慢一点，等一等后进的队伍。我们要利用前进的力量来促进后进的加速赶上去。事实上，这几年我们已初步开辟了这样的路子。例如，现在西北开展横向联系，后进的地区不是靠上级补贴过日子，而是吸引外地投资来开工厂，提高社会生产力。人才不够就和先进地区搞合营，甘肃的定西就是这样做的。他们和江苏的镇江市结成了姐妹地区，由镇江派人带钱、带机器到定西来办合营工厂，这样就把定西的人培养起来，自己能办自己的工厂了。这是说在开始时要别人拉一把，这不是“输血”，是“造血”。苏州姑娘刺绣很好，定西就到苏州请了三个小姑娘来教刺绣，包吃包住包路费，每人还给3000块钱。三个月后定西的一个村子所有的小姑娘都学会了刺绣，为成衣厂的衣服、头巾上绣点花。就靠这个手艺，这个村子发了财，苏州的小姑娘拿了3000块钱回家也很高兴。这件事看起来很简单，但道理却很深。

过去我们并不是这样做的，少数民族生活苦，我们就给他们送东西。1950年，我参加中央访问团到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带了两样东西去，一是歌舞团（当时叫文工团），去唱去舞，把少数民族吸引来看；二是米，没有米吃的地方就当场发米。这个办法开始时应当这样做，但不是长期的战略方针。

九

现在民族平等了，歧视没有了，我们可以有条件、有意识地帮助少数民族站起来。我去年来这里时就感觉到这方面做得不够。责任不在地方，是在上面，口头上是讲重视少数民族，而头脑里缺乏真正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的观点，还停留在刚才讲的那种心理阶段，就是把帮助少数民族看成是救济和补贴，并没有真正帮助少数民族站起来的有效措施。有几位同志提到要教育、要人才，这很好。我的看法是教育一定要，但首先经济要活起来，然后少数民族自己才要教育。识字用来干什么？这个问题我们知识分子是不会多想的，我们不识字没有饭吃，教师不识字怎样教书？但事实上很多人不用识字也可以有饭吃，那他就不要识字了，而且识字还会影响他找饭吃，只有经济发展了，才需要识字。

少数民族要创造自己的文字我赞成，要满足他们民族的感情。可是少数民族要发展就得开放，向先进民族学科学、学技术、学文化。要向汉族学习就得学汉语，不懂汉语就容易孤立自己，不能参加到整个国家的大社会里边去。何况现在大家要进入商品经济，要做买卖了，要到汉族地区去占市场，这就更要懂汉语。民族语言文字是民族内部交往的工具，要和其他民族交往就需要懂得其他民族的语言文字。为什么现在我们要念英文？因为我们要向英语国家学习知识。

要考虑开发海南岛，不能不注意到海南岛发展的不平衡。不要一刀切。汉族、黎族、苗族的具体情况不同；黎族中靠近县城的和偏僻的地方差距也很大。如王下这个地方，中央民委几个同志都去过，回来告诉我，那里的确还是自然经济。有人说他们已经“从刀耕火种进入了科学种田”，这句话只是方向，目前还不

是事实。我们搞科学研究的不能只讲方向，不讲事实，在这样的地方现在离科学种田还遥远得很。像王下这些地区“刀耕火种”还很普遍，为什么他们还要刀耕火种呢？不是他们笨，他们和其他民族一样聪明，原因是他们的耕地太少了，不到当地去看看简直不敢相信。海南岛是个人少地多的地区，但他们每人却分不到1亩耕地。1亩地上种出来的粮食不够吃怎么办呢？只好上山去垦荒，于是“刀耕火种”就保存下来了。“刀耕火种”是落后的，但他们没有饭吃，不这样又怎么办呢？

十

我们一定要认真研究为什么少数民族的经济一直落后的原因。谁人愿意经济落后呢？经济落后固然有历史原因，但是解放已经30多年了，为什么还落在后面呢？不能不承认我们过去有些政策不对头。具体到海南岛，不能不看到过去决定在海南岛发展橡胶生产时，没有考虑到少数民族要发展，没有给他们留下足够的土地来发展农业。为什么会出现“富饶的宝岛，穷困的少数民族”，这正是我们在研讨海南岛发展战略时不能不注意的问题。

海南岛的情况使我深深觉得我们必须提出一条原则，就是民族地区的发展必须是民族本身的发展。不能离开民族的发展来讲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否则会走上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道路。这是条社会主义所反对的道路。海南岛的发展必须包括岛上各民族的共同繁荣。这是发展战略的前提，用这个原则来检查海南岛过去30年的历史，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汲取。我们要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正确处理从这段历史里出现的内部矛盾。对海南岛要有一个整体的看法，要实事求是地、冷静地看到我们应

当走的方向，排除阻力，才能理顺关系。要做到这点当然是不容易的。困难既有几千年来使少数民族仍处在自然经济水平的历史，同时，有些困难又源于 30 多年来少数民族基本上被封闭在现代经济之外的历史。这个长期历史造成的局面，要进入现代化的商品经济，就得花很大的力量。

总之，海南岛一定要发展起来，而且一定要摸索出一套最优的办法。这是大家的共同愿望。

1987 年 3 月

发挥民族优势 开拓民族经济

这几年我跑了一些民族地区，老在想少数民族究竟如何才能发展起来？沿海地区这些年发展很快，真正起步都是在 80 年代，有的地方用了 6 年，有的地方用了 10 年。这样看，少数民族的发展，只要政策对头，真正搞起来，这个世纪末也可见效。去年七八月份，我第二次到甘肃临夏，感到那里变化很大，但与沿海一带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这些差距表面上看是经济差距，如果不重视，任其发展下去就会成为民族问题。我们要善于发现问题，真正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我从事民族工作几十年了，可以说，建国开始就搞这一工作。当时的民族问题与现在的问题重点有所不同，当时是民族平等的问题，反对民族压迫和歧视。现在重点转变了，主要是经济问题，要使各个少数民族都发展起来。随着民族压迫问题的解决，有些人的思想里认为少数民族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不再存在了。因此，目前有个忽视少数民族的问题，即普遍对少数民族不重视。具体说，在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时，往往忽视当地少数民族的发展。这问题从表面上看不存在压迫和歧视，但这种不重视少数民族如何发展的思想，搞不好会发生严重的后果。

50 年代开发海南岛是一个例子。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发展工业急需橡胶，而我们有一个海岛可以产橡胶，所以对海南岛进行开发，但是没有重视这岛上的少数民族，没让少数民族人民学会种橡胶，而只靠外面的人进去种橡胶，这便出现了国营农场与黎族、苗族农村的矛盾。国营农场像个样子，有房子、有场地，而黎族、苗族的农村还是茅草房。发展海南岛时，没有强调把发展

黎族、苗族的经济文化考虑进来，引起后来一系列的问题。

再如，内蒙古包头市现在有 100 多万人口，但蒙古族人口的比例却很少，外地人把大工业引进去，地区是发展了，但由于没有注意吸引更多的当地少数民族，以致当地少数民族参与当地工业的程度至今很低。更重要的是包头这样的工业城市长期以来没有成为带动内蒙古地区工业化的中心。还有一些民族地区，甚至在发展国家经济的名义下，把少数民族赖以生活的树林都砍光了，使这些地区的农牧经济蒙受严重的损害。少数民族的生活当然就上不去了。所以我考虑，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必须包括当地少数民族的发展。开发边疆，光依靠外来人发展不行，还必须包括当地的少数民族，必须将当地少数民族吸收进去。要把地区的发展同当地少数民族的发展结合起来，利用外来的知识和人才，把当地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带起来。

解放后，我们人民政府为了各民族的共同富裕和发展，采取了对少数民族照顾、扶持政策，这是完全应该和正确的。但如果只是看到少数民族落后，出于同情而照顾、救济、补贴他们，并且成为我们民族工作的一项主要工作，便大有问题了。少数民族有困难，加以救济，本身没有什么不对，可是从长远的效果来看，如果使他们养成一种依赖照顾、救济的心理，就不好了。我们应当帮助广大少数民族真正能自己站起来，自力更生发展自己。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才在一定时期内采取照顾和扶持的手段。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现在对他们的少数民族是给了不少钱的，每人平均几千美金，而且还造了房子给他们住，结果少数民族丧失了为自身生存和发展奋斗自强的意志，不少人就拿了救济金去喝酒，混日子过活。这种性质的照顾，不是我们社会主义的政策，不能学。对少数民族救济和照顾的目的应当是发展他们本身的优势，增强少数民族自力更生的能力。

说起民族特点，过去只讲什么服装、歌舞、习俗，而一个民

族为何能生存发展下来，他们有什么特殊能力和素质，却很少有人去注意。各民族的特长和素质，这是历史形成的。这些特点是他们发展过程中可以凭借的优势。

50年代，我随中央访问团到过贵州、广西，看到苗族、瑶族都住在山上。有人说这是因为被压迫上山的，现在消灭了民族压迫，就应当请他们下来。当时确曾有些地方把山居的少数民族请下来了，但后来又上山了。苗族、瑶族都有发展山区的特点，汉族不如他们。那么，当时为什么不让他们在山上发展山林经济呢？主要原因是当时我们思想上不注意少数民族的优势和特长，更不懂得必须根据各民族的特有条件，帮助他们走自己的发展道路。所以造成了政策上的偏差。

我这次到临夏，接触了一些实际，临夏的回族不光戴白帽，他们还会做生意，有商品经济头脑。回族为什么会分布在全国并集中聚居在宁夏、青海和临夏这片地区生存发展，这不是偶然的，是有历史渊源的。以临夏来说，地理位置上处于农区与牧区之间，使它能发挥善于经商的特点，在农牧区之间从事商品交换。农牧区商品交换，在历史上称作“茶马贸易”。青藏高原的马、毛皮与牧区的肉、乳制品，可以到农区去换取牧民所需要的茶和粮食。回族善于经商的特长有其历史的根源。他们住在农区与牧区之间，发挥了他们原有的经商传统，在“茶马贸易”的重要商业地区河州一带，得到发展的条件。临夏就是过去的河州。它的西部是藏族、蒙古族、土族聚居的青藏高原区，东部是汉族聚居为主的平原地带，河州介于中间，地理条件决定了这里的回族既能习惯和藏族为主的高原民族交往，进行经商贸易，又能和东部地区的汉族和睦相处，互通有无。生息环境决定了他们可以起到农牧区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联系的媒介和纽带。他们以信仰伊斯兰宗教作为自己民族凝聚力的支柱，在汉、藏两大民族的相邻地带，求得生存和发展，养成了经商的特长和保持了传统

的商品经济概念。回族种田可能不如汉人，但经商搞贸易比汉人强。这是在长期的历史活动中自然形成的。解放以后，商品交换都由国营、合作商业包揽了，回族的日子就不大好过了。现在一放松，一搞商品经济，回族又活跃了，又可以发挥他们的传统特长了。现在临夏做生意的有1万多人。主要是活动在青藏高原，直达拉萨。

我看到了临夏回族到青藏地区从事贸易活动，因而想到了青藏高原如何开发的问题。要把那里的藏族发展起来，必须要从发展商品经济入手。一任自然经济维持下去是不行的。但是有谁愿意把商品送上青藏高原呢？千百年来汉人很少愿意去，藏族自己又不习惯于经商。这次我看到那么多回族积极地上高原经商，我心里豁然开朗。回族在开发青藏高原上可以出大力。发展青藏高原固然要重视藏族，发挥他们的农牧业和矿产资源的优势，但是他们现在还是封闭型的经济，还是以自给经济为主的观念在从事牧业生产。只有用商品去打开封闭的大门，才可改变青藏高原的经济面貌。这就要依靠善于经商的回族来做这件事了。我们应当放手让回族上青藏高原去做生意，把藏族所喜好的日用品和牧业的生产用品送到高原上去，换取他们的畜产品，使藏族群众知道这些畜产品可以换取他们所需要和喜欢的东西。由此使他们重视发展这些畜产品。这就是发展了商品经济。回族搞贸易是历史的培养，是客观存在，我们要发挥其长，以开发青藏高原。

我有个设想，在临夏和青海的海东地区，以回族为主，加上藏族、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建立一个发展青藏高原商品经济的基地，专门供应青藏高原各种商品，并把青藏高原的畜产品运出来，与外面等价交换。这样就可以把青藏高原的经济搞活了。商品的一部分可以从东部各省买来，卖到青藏高原上去，还可以逐步在这基地上发展适合本地区的工业，自己生产了商品，销到西部去。这叫“东引西进”。向东面引资金、引技术，向西面开辟

市场，购取原料，并且“以商带工”，逐步把这商品经济基地的工业带起来。这样西北的经济面貌可以较快地得到改变。

1987 年 4 月 11 日

《花篮瑶社会组织》重版前言

首先要感谢江苏人民出版社同意重版我亡妻王同惠的遗著《花篮瑶社会组织》。这本书的编写经过已在本书的编后记里交代明白，毋须重复。我建议重版此书主要是想借此纪念亡妻逝世50周年。这点私情想来读者是可以理解的，也毋庸多说。50年前我在编后记里说，我完全没有预想到会编写这本书；现在我又应当说，我也完全没有预想到会在这一生中能亲眼看到这书的重版。人间就是这样，有什么可说的呢！

也许应当在书前向读者提醒一下：这本书是半个世纪前，一对青年夫妇还在学生时期对所学习的那门学科——社会学，所作出的一个探索性的研究成果。这里所记下的是解放前内地一个少数民族的局部情况。过去50年中，星移物换，主观和客观双方都有了变化，这书只能看作是一本历史资料。

解放以后，我国少数民族已摆脱了被压迫和被强迫同化的地位，取得了民族平等，当家做主的权利，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正在为建立共同繁荣的民族大家庭做出贡献。我在本文之后附上两篇瑶山访问记，使读者看到一些瑶山的变化。

这书既作为历史资料，重版时除了族名改用解放后确定的名称外，一字未改。重读时发现原文中亲属称谓表记音没有用国际音标，而且由于我的语音学没有学好，记音中还有不正确之处，所以请胡起望同志写了一篇补充资料加以纠正，附在书后，在此向胡起望同志道谢。

作为一本我在青年时代和亡妻合作的学习成果，我也无意在此作自我评论，只想说在重读里不断发现我后来所发表的许多学

术观点的根子或苗头。因而想到这本书对于那些想了解我学术思想发展过程的朋友可能是有用的。

1986 年 12 月出版的《金秀文史资料特辑》有一篇关于我和同惠考察大瑶山的“轶事”，提供了不少本书里没有提到的事，所以也录附于书后。

1987 年 5 月 4 日

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战略^{* 1}

近几年，我到一些地区做了些调查。

农村，近期发展得很快，江苏南部有些地方已经翻两番了。苏南，从 80 年代始，人均收入 100 元，到现在 600 元。这 7 年中，增加 500 - 600 元，有的还超过了 1000 元。农村发展这么快，说明我们的政策对头了。

上月，我到了比较落后的、不发达的地区，是焦裕禄同志生前所在的河南黄泛区。那个地方过去很苦，人均收入不到 50 元。现在面貌完全改变过来了。

过去一些贫困的地区这三年脱贫了，现在还不能说富，但温饱问题已得到解决。

少数民族地区又怎么样？

前年，我去海南岛。在公路附近的村子里看了一眼。这里还很穷：三块石头一个灶、一根竹竿一块板。衣服都挂在竹竿上，没有箱子，一块板是睡觉的。我到了一家，只有这么一锅米，已经吃得差不多了。我说：“你还有米没有？”他说：“没有了。”我说：“你吃完了怎么办呢？”他说：“我不知道！”在这个自治州里，的确还有穷到这个样子的黎族。至于到深山里边去，那生活就更苦了。民委有一个搜集文物的工作组，翻了几座山，到比较偏僻的地方去访问，回来说：“还没有到过这么苦的地方。”就是说，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温饱问题没有解决。现在全国一共大约有 6000 万人，一年一个人的收入低于

* 本文是作者在中央民族学院干部座谈会上的发言。

120 元、400 斤粮。这些是贫困线下的人。其中少数民族占多数。

现在，汉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之间还存在着经济上的差距。这个差距是在扩大呢，还是在缩小？如果一方面发展得很快，而另一方面停在那里不动，或发展很慢，这个差距就会越来越大了。以前大家都穷，现在一部分人摆脱贫困了，抛掉了贫困帽子，发展起来了，另一部分地区没有发展起来，或者改变得很少，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差距。这个差距是当前摆在我们民族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问题。经济的差距必然会影响民族关系，导致政治问题，这是逃避不了的。假定这个差距延续下去，那么我很担心，所以我想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应当如何帮助少数民族发展起来？这是今天要谈的主要问题。

我自己参加民族工作总算有三十几年了。50 年代初领导上给我两年机会，参加访问团，到少数民族地区去调查、去体会。当时是什么问题？是民族平等问题，是改变历史上民族压迫的问题，是实现民族团结的问题。我们当时去讲：现在我们平等了！不要怕汉人了。我们的访问团有文工团，还带着米、布。到了贵州毕节，那天晚上，我们给从没看见过电影的少数民族放电影。在漫山遍野的人中，很多人没有穿裤子。我们团里的人对我说：“怎么办呢？”我说：“赶快把我们拿来的布做裤子。来一个没有裤子的就送一条。”少数民族感动得流眼泪。民族团结，以心换心！这在当时并不容易啊！当时周总理说：“你们不管怎么样，先向少数民族赔个不是。”但很多青年同志说，又不是我们欺负了少数民族，赔什么不是呀？总理说：“少数民族看见汉人就怕，历史上造成的这种心理必须要改变过来。”没有几年，少数民族的地位在社会上有了明显的变化。从不平等、民族压迫，变到民族平等友好，中华民族团结成了一家人。

但是，有一个问题还没有解决，我们曾叫它作“事实上的不平等”。在社会上各族人民的地位一样了，没有高低之分，民

族也没有优劣之别。可是，各民族虽有相同的发展机会，但发展的速度差距很大。因为，历史造成的起点不同，发展所需要的条件不同，所以各民族之间，在生活上面、经济上面、在精神文明各个方面都存在差距。现在的问题是，假如我们不做工作，那差距只会越来越大。那会出现什么结果？这一点大家还考虑得不够，还不够警惕，还满足于现状。汉族想，还有什么呀？我们不欺负少数民族了，我们很尊重他们啊！有人说，少数民族生活苦，我们拿点钱给他们就行了。我过去也是这样想过，看他们没裤子穿，就做裤子给他们，看他们没饭吃，我们送米、送粮。当时这样做是对的，使我们建立了感情。可是现在光靠这个不行！少数民族问题不是一个救济问题，而是一个发展问题。不是我们去养活少数民族，而是要让他们自己能站得起来。我这次到了甘肃，自己反思：人家都说我对少数民族很有感情，究竟是什么感情？说穿了，还是觉得他们很可怜，我要帮帮他们的忙啊！这个感情现在看来还很不够，不能解决问题。但是，汉族当中还有很多像我这样的人。

在过去的 30 多年里，我们在民族工作上花的钱并不算少。可是少数民族是不是经过了 30 年，真正能在经济上自己发展了呢？还不能说这个话。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提出来，我们国家的工作重点要放到经济建设上去，但这个重点的转移，在少数民族工作上还没有清楚地表现出来。这一转移，使汉族农村发展起来了，希望很大，可是少数民族地区仍然没有变，或者变化不大，而且老百姓变得更少。民族地区的招待所变得大了，漂亮了，可是，这些招待所不是靠自己劳动所得生产出来的东西，是人家送来的！自己怎么样啊？现在还有三块石头一个灶、一根竹竿一块板。这个问题是当前民族工作的一个中心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不行，讲团结不能老是送东西，这不是办法！

前年我到了甘南，去年我到了临夏，特别是去年这一次对我

的教育很大。临夏是回族自治区。我前年去了一趟，去年又去了一趟，亲眼看到在这一年里变化很大。我在公路上，停车访问了七八户人家。他们都是在 80 年代中发起来的，以前很苦。临夏地少人多，要讲种田，回族种不过汉人，要做买卖，没有机会，所以生活很苦。可是三中全会之后，到 1982 年包产到户，农业体制改革，实行责任制，经济搞活了。他们可以外出找工作挣钱，一年一人可以挣两三千块钱，有了钱就可以做买卖了。做买卖没有资金是不行的。有一家用羊皮加工成袍子，然后到四川、青海的藏区出卖，20 块钱的本钱，到那儿可以卖 100 块钱，跑一趟可以赚几千块钱回来。其他有的人家制皮革用品，做皮帽子等，这样使一批人富裕了起来。我看到这些情景，联想到许多问题：为什么这个地方能发展起来？为什么回族能够在这个地方住下来？繁衍成为这样一个相当大的聚居区？我想到了这个地方在历史上原来就是个茶马交易的地方。“茶”是什么呢？牧区需要喝茶呀！茶就是农区的产品，代表农。农区需要什么呢？需要马，过去马是种田用的动力。农牧之间这个来往谁在那儿流通啊？主要是住在这个地区的这一批回民。回族能在这个地区住下来和发展起来，就是因为这个地方是天然的商业地区，是农牧商品交流的地方。回族历史上就是一个会做生意的民族，丝绸之路通过临夏。这次我到河南去碰到一个历史学家，他说，当时在丝绸之路上跑来跑去的是信伊斯兰教的中东、中亚细亚、阿拉伯的商人。后来成吉思汗打到了中亚细亚，他不杀知识分子、不杀商人、不杀工匠。因为他要用这些人组成蒙古远征军的后勤部队。蒙古军队回兵打南宋时就把这个部队带进了中国，称探马赤军，也叫回回军。一部分就驻扎在甘青走廊里，他们的后代就是这些地方的回族。他们善于经商，所以在农牧贸易地区繁衍壮大了。

我们整天讲民族特点，讲心理素质，讲了有 30 多年了，这回我才有了些认识。我看心理素质是从长期的经济生活中长出来

的东西。回族有个特点，经过几百年一直保留至今，这就是他们善于经商的本领。我这次到河南去访问民权县。他们带我去参观，我说我要看看乡村企业，我看到的企业几乎全是回族搞的，我说你们是不是有意安排的？他们说没有。又说回族在这个地区一共有2万多人，他们的年收入平均比汉人高100元。为什么？他们说：回族对当前的政策反应比汉人快。让我讲一个具体的例子：我去看了个冷库，投资24万元，还买了一辆冷藏汽车，就是回族搞的企业。因为回族人要吃阿訇念经杀的鸡、宰的羊，所以他们把经阿訇杀的鸡、宰的羊放在冷库里，然后开车送到上海，卖给上海的清真食堂。从民权到上海要3天的时间。然后从上海带东西回来。我说：你钱从哪来的呀？他说：我们凑了二十几个人，一个人拿出1万元。我说1万元能拿出来么？他说1万元现在对我们来说算什么呀！这个同汉族农民想法就不同，他们对当前搞活经济的政策反应很快。什么东西使他们反应得这样快？政策一来，他们就立刻想出了这一套办法，这就是心理素质。我们过去讲心理素质，只看见他们跳舞，只看见他们穿的衣服，没看到他们生活中的动力啊！这样一看，我看到了各个民族都有他们的特点。蒙古族跑马放牧，大草原上他是王。这是多少年积下来的。他们歌声的宽广，就反映了这个放牧的特点。过去我们讲了这么多年心理素质，没联系实际，所以抓不住要害。这么一讲，大家说：“对呀！”回族为什么会做生意呢？他们是由于历史形成的。我们民族史讲了很久，没有联系现在，没有用处。如果联系了起来就可以解释当前的问题，看到发展的前途。

我到了甘南，我上了草地。牧区的草越来越差了，现在草地在衰退，不是欣欣向荣，而是越长越坏了。牲口越吃，草地越坏。牧区的牧民是不管的。他家里养的牛舍不得杀，老牛同他们有了感情不能杀了。牧区富不富，不是看有多少牲口，而是要看牲畜结构怎么样，牧业的效益怎么样。畜群的经济价值怎么样。

强壮的母畜的经济价值高，在畜群里应占较高的比例。把不生育的老牛养着是不合算的。畜群老化，是因畜牧业没有进入商品经济，使草场超载，日益退化，我在内蒙古和甘南都看到了这个问题。所以牧业必须走商品化的路子，使得养羊、养牛，不是为了自己吃，而是用来卖出去，挣钱来改善生活，促进生产。

我们在甘肃会宁县有一个脱贫试点。我到那儿去访问，他们高兴得很，说：“你们做了好事，我们这个村子里面生活好了。”有人对我说：“你看，我这房里就有1万斤粮食。”我说1万斤粮食你吃得完吗？他说：“三年吃不完。”我说你怎么办呢？他说：“没想。”我说：“你是不是卖掉2/3去搞副业呢？”他说：“这不成！卖粮食丢人哪！”这个思想很典型。这就是自然经济养成的头脑。在汉族农民里是根深蒂固的。

在临夏，我们现在已有一支搞商品流通的队伍活动在青藏高原，从甘肃、青海，一直到拉萨。现在牧民要喝啤酒，就把牛羊肉拿出来了。为了要求增加生活用品，牧民要多养经济价值高的牲畜了。这就促进了商品经济，也就是发展这个地区生产的一个突破口。这个流通队伍需要引导和帮助。怎么帮助他们呢？很简单的一条，就是有方向地贷款。做买卖要钱去买东西，钱从哪里来呢？自己的钱不够就得借贷，政府不借贷，就有人出来放高利贷。一个集一个集地算，比方你这个集借我50元钱，下个集就要还我80元钱，利息很高。有人说：我们可以出来搞一个“便民银行”，这就需要我们国家或集体插手进去，去推动它、促进它。今年我又去访问临夏，知道人民银行已经带头办了一个金融公司，专门给上青藏高原做商品流通的人低利贷款。

我提出一个建议：甘肃的临夏和青海的海东，组成一个发展民族经济协作区。这个地区历来是一个茶马交易的中心，这有它一定的地理经济的原因。现在我们可以好好经营这个地方，用它来促进西藏高原的经济发展。怎么促进西藏高原的经济发展呢？

主要是发展牧业，并必须使之商品化。这个基地可以建成青藏高原工业品的供应站。我前年去的时候这里还没有一个大的商店，今年我去，在市中心出现了一个五层楼的大百货商店，参观后我又学到了不少东西。第一条，知道了钱是从哪儿来的。它整整花了1000万元，全部是用集资的方法取得。凡是到这个百货商店里开一个门市部、占一个柜台的，都要投一份资金。第二条，知道了房子是请江苏、浙江的技工盖的。他们就是这样引进了东部发达地区的技工来进行建设的。我还参观了一条街，差不多全是卖西藏的东西：衣服、毯子等等。我说：“这些东西将来你自己制造一下好不好啊？有市场就可以有工业嘛！”他说：“我不会制造呀！”我说：“你请人啊！你就请江苏、浙江的技工来嘛！”前年我就提出了16个字：“以东支西、以西资东、互利互惠、共同繁荣。”就是东部用技术、用资金去支持西部。西部有的是原料。现在江苏、浙江要发展，原料不够了。西部可以用原料向东部去换技术、换资金，大家都有好处，不是说谁占谁的便宜，是共同繁荣。

我已经70多岁了，要做些实际的事情。我到家乡请人去帮助临夏办工业了。大概有人已经看到在前门原来的火车站，有一个门市部专门卖皮鞋。这个皮鞋厂是一个农民搞起来的，现在他有20个小厂，在上海、在江南一带。他到北京来开门市部让我去剪彩。我说我的目的不是来剪彩，我是让你到甘肃去。甘肃有的是皮呀！我说：“你的原料怎么样？”他说：“原料很困难。我就是想要解决原料问题。”我说：“好哇！你去临夏帮他们办一个皮革厂吧！保证你的原料供应，双方有利。”

前天我家乡的县委书记来看我。他说：“毛纺厂发展得很快。可是买来的羊毛很脏，要洗，洗后与原来的重量相差一半，有一半是脏东西。”我说：“你为什么不在临夏搞一个洗毛厂啊？”“对呀！”他说，“那我就把厂子搬到那儿去！”这些就是怎样去搭桥引线的例子。

少数民族怎么发展工业，要千方百计地想办法。我们要帮他们想办法。办成了一个厂就能带动一批，如办一个葡萄酒厂，那么，生产瓶子的、生产盖子的，很多小厂，就出来了。

我们做了30多年民族工作，出了很多书，这个不错，可是现在要兑现，要体现在少数民族生活上，要使他们的生活水平提高起来。

我们要扭转对民族工作的看法。一个人的脑筋要灵活一点。在少数民族地区不知有多少宝贝。如我随访问团去广西时，过桥时桥断了，我从马背摔下去了，腰不行了。后来把我弄到一个村子里面去，一个当地的医生到山上去找了些草给我一敷，第二天我就可以动了。于是我马上就给卫生部写信，请他们注意少数民族的传统医药。

我们为少数民族服务，要真的做点好事，提高他们的生产力。这是小平同志经常教导我们的。少数民族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有决心的，可是他们的生产力不够高，所以我们要向这个方向去努力。

我们用已有的知识可以帮助少数民族，我们今天不要好高骛远。真的想一想一生有什么贡献，要在少数民族事业上做些事情，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党。

我今天是开个头。归结几句话：现在是需要我们再好好想一下的时候了，因为形势改变了，不能再照以前的轨道把车开下去了。现在党和国家工作重心已经转移！要搞经济建设，提高生产力。生产力不提高，社会主义怎么能来？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生产力，不是容易的事情，这里有大文章，做好了很有意思。我们看准了，就要上，并要克服很多困难。我们少数民族的发展现在还有很多问题，我们应该深入实际，认真加以研究，努力帮助解决。

地区发展战略规划的若干思考

我就地区发展战略规划讲一些个人不成熟的思考，请大家一起来讨论研究。我这些思考的根据是我恢复调查研究以来，从1982年至1985年，跑了一些地方。访问时间短，去的地方在如此之大的中国也不算多，所以认识是逐步的，也可能是片面的。现在把我思考的问题讲出来，跟大家磋商。

发展战略规划的含义

战略规划在中国是个新名词，我念大学时和解放初期都没有这个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出现这个词，这以后用得就多起来了。战略规划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我的体会就是人类自觉的表现。自觉就是人们认识到事物的存在和变化，人类把来自客观的反映和感觉变成自己的意识。人们对周围的客观世界的认识是逐步发展的。人们的行为很多是不自觉的，无意识的。我认为，整个宇宙的发展就是宇宙自觉的过程。宇宙就是所有的一切的客观存在，我们人类是其中的一部分。尽管很多动物在某些地方可以比人强得多，但还没有发现任何动物有像人一样具有能自觉的意识。所以可以说宇宙本身是通过人的意识而自觉的。人们在事情没有发生之前就能有一套预测，这是人类自觉的表现。但是必须承认人们自觉的范围还是很狭小，甚至对于自己创造的社会还不完全知道，很多事情还是听天由命，或是“事后诸葛亮”。认识还是落后于实际。可是人一定要力求自觉，逐步扩大

自觉的范围。我们要使得自己的主观理想和目的如愿以偿，必须首先承认客观世界的存在，承认它的规律，要让客观规律变成我们的主观世界的一部分，回过头来，控制客观世界。什么叫控制？控制就是使客观规律的变化和人们的主观要求相符合。

今天，我们许多从事基层工作的同志处理人事、政事，管理一个地方，感觉到不能凭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了，不能乱发指示了，而要考虑一下我这么做会产生什么后果。能有这样的认识是很不容易的。既有这种认识，我们下一步就要学习一下造房子的人，把想做的事预先画个蓝图，这就是“规划”。把达到目的的每一个步骤都实事求是地考虑周到，然后开始行动。这就是我对战略规划的理解。

规划必须要有一个目标

我们的目标是要发展。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当前社会生产力落后于世界的先进国家。我们必须在较短的时间里赶上去。这就是目标。这个目标定下来还不到10年。以前的目标不是这样，而是想找个“天堂”，在“天堂”里人人平等，结果是吃大锅饭。现在我们的目标是实事求是的，是我们中国人民经过努力可以实现的目标。

我们真正走上发展经济的这条道路还没有几年。1982年开始农村经济改革，1984年才承认乡镇工业是合法的，1985年是最好的一年，1986年就碰到了一些新的问题了。虽然没有几年，变化是很大的。我们要有个长远打算，要看到今后这个世界还要存在下去。中国在今后世界里的地位，决定于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因之我们必须有紧迫感。

我们搞地区发展战略规划不能离开这个总目标，我们要在经

济上翻两番才进入下一个世纪。翻番的目的是我们中国人民要在这个地球上以先进民族地位存在下去。我们在过去历史上一直是这个地球上知识领先的人民。这是我们过去的光荣。过去的光荣不等于我们现在的光荣，我们要继续光荣地生存下去，需要迅速改变当前落后的状态。怎么办呢？我们要好好研究出一系列迅速发展的具体步骤。这就是发展战略规划。

因地制宜 多种模式

制定我们国家的发展战略规划，首先要了解困难在哪里。我认为最大的困难是中国地大，人多，历史长，各地发展不平衡，而这个不平衡还在继续扩大。要讲发展战略首先要解决这些难题。我去年年底在民盟举办的多学科讲座讲农业发展规划时谈到，解决的办法关键是在八个字：因地制宜，多种模式。

中国是个统一的整体，这是我们历史形成的优势。但一切事情有好的一面，就有它不好的一面。统一的国家是我们的宝贝，越到将来越能发挥它的作用。也正因为统一，造成了凡事一刀切，学大寨就是一个教训。一个地方走通了，其他地方都必须走，这是由于没有注意到统一之下的不平衡，只看见统一，没有看见统一下的多样性、地方性。所以，我们提出地区发展战略规划，“地区”这两个字就是根据这样一个情况提出来的。全国有全国的发展战略规划，但地方的一层必须有在统一之下的多样性、复杂性、个别性。我们不抓住这一点，就会重犯学大寨那样的错误。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错，错就错在只看到统一的好处，没有看到各地区的不平衡发展，各地区的特点。

我这点认识是花了好几年的功夫才得来的。我讲讲我自己认识上的经过。

我是1982年开始再到农村去调查的。50年前，我调查过我的家乡吴江的一个农村，我叫它“江村”，把调查结果用英文写了本书，作为我的博士论文。直到去年，我才请朋友把它翻译出来，叫作《江村经济》，今年出版了。1957年我又到这个村子去调查过，写了一篇《重访江村》。在30年代，我看到苏南农村有个特点，人多地少。人多地少是它的生态状况，工农相辅是它的经济结构，工农收入大体上是各占一半。当时的工业是手工业，养蚕制丝，这是地方的特产。解放后经过土改，1957年进入了合作化高潮。农村经济有了深刻的变化和巨大的发展，我去调查时，农民对我说：“我们别的都好多了，就是手上没钱。”这句话我现在懂了，说明从那时起我们抛开了商品经济，没有副业了。

“文化大革命”中，在苏南地区出现了乡村里的社队工业，虽然效率低，技术差，利润不高，可是有一点，农民的收入大大增加了，补上了人口增长之后发生的越来越少的收入差额。这样产生了苏南的社队工业。拨乱反正后不久，1982年我再去江村调查时看到，农村里实行责任制，同时各级政府“分灶吃饭”，从上级得来的财政收入不够地方开支，各个社队要自己想办法去搞钱，所以公社的负责人都积极去开个工厂，结果苏南出现了盛极一时的社队工业。可是国家不承认它，它不在计划之内，不给它原料，不给它市场，不包销，这样就培养出一批计划经济之外的企业和一批搞经济活动的人才，这批人才就是现在乡镇企业的骨干。

我跟着苏南乡镇工业的发展，每年到苏南去调查两次。最初从一个县做起，发现一个县里边各个镇都有它不同的特点。有的镇是农产品销售的中心，有的是乡镇工业的中心，有的是行政中心，这样形成了不同类型的乡镇。

我进一步把调查范围扩大到苏南四个市。这四个市是现代中

国农村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都受到上海市经济影响的地区。这些地区乡镇工业的主要特点是集体所有制，实际上是基层地方政府所办的工业。

接着 1984 年我到江苏北部去调查。苏北地区农业很发达，但是乡镇工业还刚起步。在这里我看到了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我当时用最简单的但不很准确的“工农产值比例”来表示各个地区的不平衡状态。例如，在苏北的丰县、沛县，1984 年工农业总产值为三七开，到连云港，差不多四六开，到扬州北部为对半开。过了长江农工比例倒过来了，吴江是倒四六，而太仓是倒二八，说明苏南四市工业产值都超过了农业产值。用这个指标可以衡量一个地区的发展水平。看出不平衡性的状况之后，我们得出：苏南和苏北各有它们不同的模式。

模式不是样板。模式是一个系统结构，表现出各经济社会要素间搭配起来的特有格局。所谓“苏南模式”是指苏南这地方经济社会诸要素所搭配成具有特点的结构。

去年年初我到温州去调查，看到了一个不同于苏南的模式。人们称它为“温州模式”。我们并不是要说哪一个模式好，各个模式都有它产生的历史条件，有它本身的矛盾，有它本身的长处和缺点。别的地方应当学它的长处，避免它的缺点，根据自己地区的条件来进行发展。下面我可以讲一讲已经看到的各种模式的各自特点。

我们称之为“苏南模式”的经济结构，主要是依靠了乡镇工业兴起的。乡镇工业越发达，这个地区的经济就越发达，并推动了农业以及其他方面的发展。根据调查表明，这个地区其他方面的发展也都是随着工业发展的比例而发展的。“无工不富”的结论就是这样得出来的。这个提法适合于苏南模式，后来有人把它作为全国性的一个指导方针，那就不完全了。

“温州模式”提出了一个不同的结构。这个地方的工业主要

是家庭经营的小型工业，这些家庭工业是靠个体商贩发展起来的。温州人均只有半亩地，不可能靠农业维持他们的生活，必须靠“劳动输出”，个体劳动者出去在外靠本领，靠手艺养活自己的一家人口。劳动输出在浙江是积累资金的一条主要渠道。有了本钱和市场办起了小型工业，就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企业。这和从公社及生产队起家的集体性质的乡镇企业不同。

后来，我又到了河南东部的民权县，那里地处黄河故道，过去是个穷苦的地方，现在大力发展种植葡萄，富了起来。种葡萄的是个体农户，一个乡的农民大约1万户合办一个集体经营的加工厂。这些集体所有的加工厂把果汁发酵后送到县办的酒厂酿酒。形成了个体、集体、全民三种所有制结合的一条龙。现在民权葡萄酒已经很有名了。这又是一个富民的具体办法，可以称之为“民权模式”。

甘肃定西原本是个贫困县，为了使老百姓富起来，正在设法学习民权模式把农民千家万户种的亚麻加工成纺织品的材料。如果有了一个亚麻纺织厂做龙头，并且把各级加工厂分别在乡镇里搞起来，现在农民当柴烧的亚麻秆子就值钱了，定西农民也就会富起来了。这说明我们要善于分析各地方的具体情况去吸收各种模式的长处，做出自己的发展战略规划。

不平衡状态如何逐步减少

我国不平衡状态如何逐步减少？不发达地区怎么能接近发达地区？一方面，每个地区要根据自己地区的具体情况，吸收各种模式的长处做出自己的发展战略规划。同时要看到全国的宏观经济是一个大系统。这个大系统内又有小系统，就是地区系统。小系统既要服从大系统，又要有别于其他小系统。各个地方要因地

制宜去做具体分析，找出发展地区经济的突破口。方法也很简单，就是善于结合实际，向农民学习。创造性的构思总是来自直接接触劳动者本身。上面讲的种种模式都是各地方农民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我们研究者只是去看出它的意义，讲出它的道理，并加以分析和推广，绝不能凭我们的主观愿望去创造任何模式。所以，做具体工作的同志最基本的一条，是要善于发现群众的创造。群众不能不创造，因为他们要改善他们的生活。这是最大的动力。真正的老师是基层干部，因为他们必须在群众中工作，懂得地方上的实际情况。真正行之有效的办法都在下面。

我上面所讲的一些关于地区发展战略规划的思考是很不完整的，但都是我自己的经验，对做实际工作的同志也许有参考价值。请大家多讨论。

1987 年 7 月

临 夏 行

过去两年里我曾到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访问过两次。第一次是1985年8月，访问甘南藏族自治州时，往返路上都在临夏停过，听到了一些有关这地方的情况。第二次是1986年8月，先去定西，再到临夏住了一周。时间短，还是走马看花，了解不深。但现场观察总有一些印象和想法。早想写篇访问记，一拖已过半。今天追忆可能还没有完全过时。



临夏回族自治州在兰州之南，甘南之北，东接定西，西连青海的海东。黄河自西过境北上，地处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之间的过渡地带。从经济上看，正是介于青藏牧区和内地农区之间的一条走廊上。我在《甘南篇》里称它作“陇西走廊”。这条走廊沿着甘青两省边界，北起祁连山，南下四川，接上横断山脉的六江流域。民族成分颇为复杂。临夏处于这走廊的中段和古代丝绸之路的交叉点上。它是个回族聚居区。总人口145万，其中回族有51.6万人，占该州人口的35%。如果加上同样信仰伊斯兰教的东乡族和保安族，总数略大于汉族。临夏回族自治州建立于1956年，州内包括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及另一东乡族自治县。

我初访临夏时，刚从荒秃的黄土高原进入洮河流域，精神为之一爽。四周山冈已染上淡淡的一层绿色，路旁农田里长着丰茂

的庄稼。当时我心里想，这地方农民不至于太贫困了吧。这次在州内转了一圈，才知道该州脱贫还只有三年。1983 年人均收入不到 100 元，1985 年才提高到 226 元。为什么呢？原来这个地方也是吃了人多地少的亏。全州耕地只有 220 多万亩，人口 1950 年约 70 万，1985 年增长到了 145 万，人均耕地从约三亩半减少到了 1 亩 7 分。粮食产量又不高。70 年代以来，老是在亩产 300 斤上下摆动。人均粮食相应下降，50 年代到过 600 斤，1985 年却只有 420 多斤。

临夏要靠农业致富看来很不容易。靠工业一时还困难。1985 年全州的工业产值，包括个体专业户在内，按 1980 年不变价格计算，约 7700 万元，为农业产值的 $1/3$ 。农大于工，八二开。人均工业产值在甘肃各州中为数最低，仅 33 元。这样说来，这几年来怎样脱掉贫困帽子呢？

当地居民给我的答复是：临夏居民大约一半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其中回族有 51 万多人。他们善于经商，农业搞不过汉人，在以粮食为纲的时期，吃了苦头。所以他们对农业体制改革最积极。临夏是甘肃最早落实责任制的一个州。这并不是因为农民承包了土地提高了农业的积极性，而是因为农村里的劳动力从此可以自由流动了。这几年来大批劳动力从农业里解放了出来，有的外出劳动，有的搞远距离贩运，一下子把农村经济搞活了，生活很快得到了提高。

劳务输出看来是贫困地区脱贫最快的路子。因为这种致富措施不需要本钱，吃苦耐劳又是中国各族农民的最大优势。临夏输出的劳动力大多是到青海、西藏、新疆、宁夏等地去承包建设，其次是到黄河上游去淘金。搞建筑的小工每月可以有 100 元的收入，淘金的每天可以到手 10 元到 15 元。还有不少是到各城市去串门走户的工匠。这些人得来的钱养家活口之外，还可以有些积蓄。出门惯了，熟悉了外地的门路，结交了朋友，不少人就搞贩

运。贩运所得又刺激了家庭手工业的发展。一些家庭开始制造商品运到别处去卖。这几年，不少个体专业户或家庭小企业发了财，造了新房子，改变着这一带的农村面貌。

我在广河县城关镇拱北村访问时，走进了一所新盖的楼房。楼房的边房里，贮满了一屋子的皮毛，气味很大。这家主人是个20多岁的回族青年，名叫杨麻尼。他家原来很穷，靠贩运蔬菜过活。1979年听人说四川藏区的人们需要穿毛皮袍子，肯出价钱。他就在街上买了一些羊皮，缝了几件袍子，一路打听，换了几次车，到了甘孜。一下车就被人围住，争着要买。一件皮袍成本不到20元，在那里可以卖到上百元。从此，他家里的妇女一有空就缝皮袍子。他跑单帮往来售货，四年来已走遍甘孜各地。现在新房子也盖起了，一个小小的家庭皮袍作坊也很像个样子了。

我一连走了好多家小作坊，几乎全是这样起家的。这使我想起了温州行。和温州相比，临夏的家庭手工业规模和水平还差几个档次，主要是缺少专业市场，还是停留在各家各户各自小本经营的阶段。

我曾问当前临夏在外地搞劳务和经商的人数。据估计，全州50万个农村劳动力中外出的约16万多人，占33%。其中从事建筑的有6万人，在陕西、宁夏、青海、西藏、新疆、内蒙古等地承包建筑房屋、桥梁、堤坝、公路、铁路等；从事淘金、采矿、伐木的约有3万人；经商的有5万人，大宗商品是茶叶和皮毛。拉萨有2000多人，已形成了有600多家商店的一条街。广州、北京、南京、西宁、拉萨、乌鲁木齐都有临夏人开的穆斯林饭馆，共有118处。这些饭馆也是他们提供信息的中心。另外零星外出，三五成群，搞收购、修理等业务的，约2万多人。临夏外出劳动力之多居甘肃各地区之冠。其中大多数是回族，当地汉人也跟着多起来了。看来就是靠这批人把临夏人均收入水平提高起来的。

二

临夏是回族在甘肃的一个重要聚居区。回族善于经商可以说是他们的民族特点。如果要问个为什么，那就得从回族的历史和分布上去找答案。回族的先人是中亚各地信伊斯兰教的人。他们很早就从丝绸之路进入中国内地，海运通航后又有不少来到我国沿海诸港口，定居下来，繁衍生息，当时被称为番客，至今广州、泉州、杭州、西安等地均有他们遗下的墓地。

回回这个名称最早见于北宋的文献，但到元代才通行。公元13世纪初叶，蒙古军队大举西征，横扫中亚各地。一路把所征服的各城市中的工匠、商人和文人编入后勤队伍，为远征军服务。据述撒马尔罕城陷落后被征的工匠即达3万多人。当蒙古军队回师灭宋，统一中国时，这支被称为“探马赤军”的伊斯兰教信徒的队伍随着进入中国，在各军事重镇“屯聚牧养”，定居下来。其后即和早来的番客混合，并不断吸收汉人形成了各地大小的回族聚居区。这段历史说明了回族善于工艺和经商是有悠久传统的。

甘肃临夏和青海的海东这个地区在唐、宋时称河州，正处在上述陇西走廊和古丝绸之路的交叉点上。从民族方面看正处在藏、汉两大民族之间。藏族一向在青藏高原上经营牧业。在历史上虽曾多次扩张到平原地区，但是很少能适应低海拔地区生活，久住下来。汉族自古以农为本，擅长精耕细作，尽管有些汉人上了高原而且生存下来，但为数不多，更谈不上大规模的移民。汉、藏两族杂居的情况比较少。这条陇西走廊可以说是汉、藏两族的分界，也是农、牧两大经济区的桥梁。

这两大民族和两大经济区并不是相互封锁和隔绝的。农、牧

之间经常互通有无，彼此依赖。这种经济上的往来在史书上称为“茶马互市”。茶是牧民生活必需品，并用以泛指其他农产品和生活用品。马是农区所必需的畜力，而且是重要的军用品，当然也包括其他如羊毛、牛皮等牧业产品。“茶马互市”是农、牧贸易的简称。这条陇西走廊为农、牧贸易提供了便利的场所。河州原是欧、亚交通要道，丝绸之路的商站，从历史和地理背景就不难看到这地方在商品流通上的重要地位。明代就在这里设立了管理农、牧贸易的行政机构“茶马司”。

明代挑选建立内陆商埠的河州正是元初以来已形成的回族聚居区。即使撇开这地方由于回族经营了近百年在事实上已成为农、牧贸易的中心不说，也可以设想河州经济地理上的地位原来就具有十分适合于回族发展的条件，建立“茶马司”之后更便于他们进行商品流通活动，因而巩固了这个民族聚居区。

以上这段历史回顾，给我深刻的启发，结合当前形势，似乎在眼前展开了一幅重兴“茶马互市”和重开“丝绸之路”的前景。

三

自从前年访问甘南藏族自治州以来，我心里老是惦记着怎样开发青藏高原广大牧区的问题。现在这高原上的牧民基本上还是在自然经济里过日子。饲养牲畜主要是为了自己的食用。他们衣食住行的日用必需品大多取自牧业产品。自给自足，和外界往来很少。他们用畜群的大小来衡量贫富，以致较大的畜群里老弱牛羊占了多数，增加了草地载畜的负担，一遇风雪，大批死亡。因为商品经济的程度太低，谈不上科学牧业。这是藏族牧民长久以来摆脱不了贫困的经济根源。

怎样改变这种自然牧业为商品牧业呢？怎样使牧民为了出卖牲畜去换取消费品和生产资料而经营牧业呢？这一条改变青藏高原经济面貌的必由之路并不是短期里可以走得通的。最初的一步，我认为必须有人把提高牧民生活所需的用品送上高原去换取牧业产品。也就是说要在流通上找出个突破口。看来只有商品的力量才能逐步打开封闭性的牧业大门，使其改变成开放性的牧业。治贫致富有赖于牧业的改革，改革则有赖于开放，开放主要就是让商品流通。这样说是容易的，但不应忘记藏族牧民是居住在 3000 米上下的高原和交通十分不便这一事实。商品自己不会走动，要有人去运输，还要有人去出售。这支流通队伍在哪里呢？藏族牧民还很少有商品意识，汉人又大多不习惯上高原去活动。我曾为此发愁。这次访问临夏，却见到了这支队伍事实上已经形成，而且正在活动。这支队伍主要就是我在上节里所谈到的历史上形成的、生长在陇西走廊里的回族。

访问期间，我在广河窦家巷乡王家村见到一家靠沟通甘、藏贸易而发迹的回民。他名叫马达吾，35 岁左右，全家 18 口人，三世同堂，兄弟四人没有分家，但都已成亲，父母健全。1978 年开始加工皮衣，销往四川、青海等藏区。1981 年积了钱，买了一辆卡车，贩运小百货上西藏，回程从拉萨运回羊毛、皮子和尼泊尔的呢料，摸出了一条经商之道。在拉萨和西藏的一个汽车队联办了一个门市部，后来又自立商店，有工人常住拉萨，接着添置了一辆卡车，每周有车往返一次，可收入 1 万元。去年在临夏县城里开了一个门市部，家里盖了一座二层楼的住宅。他从 1982 年开始和同村的马继业合伙经营，先带一户，逐步扩大，现在已有 70 多人参加甘、藏之间的流通活动。全村只有 42 户，所以这村子里家家有人上西藏做买卖。

据说这几年来像马达吾一样起家的人不少。确数不明。一般估计全州 6 万个出外经商的人中大部分是在藏区活动。有人告诉

我，现在拉萨的临夏坐商大约有 600 多家 2000 人，他们所开的铺子已形成一条街。他们在亚东有个站头，通过藏人和尼泊尔人做买卖。现在临夏街上可以见到穿尼泊尔运来的西装的人。看来，在过去不到 10 年里甘、藏之间的农、牧贸易已经在民间自发地恢复了。现在临夏的民间卡车有 1000 多辆，1985 年据说由卡车贩运的销售总额约 2.4 亿元。4 吨的卡车往返拉萨一次，可以获利 3000 到 4000 元。

目前甘、藏间的商品流动可能主要是靠这一支民间的自发队伍。他们还没有引起应有的注意和扶持。举例来说，商业活动需要资金。这些白手起家的企业家，一般是靠个体户劳动输出积累的资金开始营业的。要达到马达吾的经营规模至少要五六年。他们最感困难的是缺乏流动资金，现在唯一的办法是向私人借贷。利息很高，而且多是以市集周期计算，负担很重。1984 年在临夏出现过—个称为“便民银行”的民间金融组织，周转金只有 5 万元。当时很受到这些跑高原的商贩欢迎。但是不久这个“银行”由于不符合国家规定而被取缔。我同这些搞商品流通的个体户谈起这事，他们还迷惑不解，因为事实上是帮了放高利贷的人而让搞流通的人吃亏。从大处看，也就是限制了正在发展中的流通渠道。“便民银行”违法固然应予取缔，国家银行是否也可以做一些“便民”的事呢？

如果我们认为要促进青藏高原的经济发展必须推动农、牧贸易，那么我们应当对这支民间自发的流通队伍加以扶助和培养，不仅在提供流动资金上可以做些“便民”之事，流动过程中许多环节上都有“便民”之事可做。比如资源供应、仓库设备、交通设施、运输工具、市场信息以至各种保险，处处可以为这些搞流动的个体户服务。更重要的我认为是如果一开始就以国家或集体的力量为这些积极性很高的个体商贩提供服务，我们就可以通过服务使他们不越出社会主义的大道运行。

四

处在农、牧中间地带的陇西走廊，应当自觉地抓住经济地理授予它的特殊地位，来发展自己的优势。上面只提到了作为农、牧间互通有无的流动媒介，我还看到农、牧结合的具体实例。

在临夏拜家村我们访问了一位阿訇。他有个儿子，28岁，很精干，会驾驶卡车，从当司机开始，现在已买了车，自己搞贩运，上个月才从拉萨回来。去年这位阿訇出了个主意，从甘南买进架子牛55头，在家宅边起了一个饲养场。经过一冬把这些牛育肥后，屠宰了，由他的儿子把牛肉运到拉萨去出卖。本地1斤牛肉只有2元，在拉萨却可卖4.5元。贩运一次净收1万多元。这位阿訇兴冲冲地带领我们去参观他的饲养场，有100只羊买来不久，准备育肥后赶上古尔邦节出售。他说，只是牛奶一项，每月可收入350元。这几年来这位阿訇已成了一个面团团的农民企业家了。

这种从草原上买了“架子畜”到农区育肥是这地方的老传统，称作“养站牛”。在草地上放牧的牛或羊到了秋天骨架已经长成，肉层还没有肥厚，需要大量吃草的时候，由于已经超载的草地，供应不足，缺乏营养，到了冬天就有许多在冰天雪地里死去。牧民想出了一个办法，在冬天来临前，把牛羊赶到农区卖给当地的农民。农民有饲料，在冬天可在自己家里喂牛羊，使它们继续长膘，称作育肥。架子畜育肥是农、牧结合的一个方式，既充分利用了草地来放牧，又利用农田长饲料进行舍饲。放牧和舍饲相衔接，实际上是初级产品和再加工相结合，双方都可以取得较大的经济效益。我前年在赤峰访问半农半牧区时，曾提出过这种意见，主张在这类地区发展为牧业服务的农业，除了必要的粮

食作物外，尽量发展饲料作物。粮食作物和饲料作物并不互相排斥，麦子和玉米可以衔接成两季作物。想不到这次在临夏访问到了具体的实例。而且听说，在临夏这种经营“养站牛”的人家正在增加，那是因为这几年临夏的农民手上有了钱，能出去买架子畜了。采购架子畜的地区也正在扩大，从附近的甘南、海东扩展到了川北、海西，甚至内蒙古、西藏；销售的地区也同样扩大，远到银川、西安和拉萨。原因是现在有了现代运输工具。临夏千辆卡车在改变经济面貌上起着重要作用。

养架子畜育肥是商品牧业的一种方式，是促进牧业发展一个值得重视的信息。

五

如果在临夏市上走一圈，确会得到一派兴旺的印象。同样地，如果到传统皮毛中心的三甲集去赶一次场，那种车水马龙热闹拥挤的景象，令人直觉地感到这个地区的经济正在苏醒，前途宽广。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出，近几年来这个地方经济转机的关键是在一个商字。经商是这个地区的老根子，这个根子，在当前政策的雨露下，正在茁壮成长。但是如果进一步去观察他们所从事贸易的商品，却可以发现其中绝大多数并非本地特产，还没有突破近千年来“茶马互市”的老框框。主要商品还是农区来的茶叶和牧区来的皮毛。换一句话说，现在临夏是在以贩运为主的传统经济模式里取得复苏的，刚刚开始有了一些贩运和生产相结合的苗头。临夏要再进一步，我认为必须注意使这些苗头发展起来，简单地说就是“以商带工”。

我在上边已经说过，临夏的工业底子是很薄弱的。但这几年中却出现了一大批户办和联户办的家庭企业，为数在1万以上，

大多是我上面所说过的那种皮毛加工成皮袍一类的家庭小企业。业主既管企业，又参加劳动，还要从事贩运。劳动力来自家庭成员，全家老小人人动手。

我们在从临夏市经广河回兰州的路上，参观了七八个比较大的家庭企业，有少数是联户办的，并雇用一些工人：计有拖车厂、皮革厂、化工厂、翻砂厂、铁钉厂、食品厂、啤酒厂等。其中规模最大的有工人 20 多人，但资金总额没有一个超过 20 万元。厂房都是住宅的一部分，或在院落中搭了个工棚。据统计全州户办和联户办的企业 1985 年的总产值大约有 7000 万元，所以这还只能说是尚在初级阶段的一些可喜的苗头。

怎样才能把这苗头培育成长呢？我根据在温州所看到的情形来说，主要一条就是这种加工业必须与流通结合起来，工要联上商，也就是说，要掌握市场上需要什么，就制造什么。

临夏商品的市场在哪里呢？答案是很清楚的，现在是在西边，主要是青藏高原。我在临夏市上逛过一条街，几乎所有的商店全是出售藏族的生活用品，从妇女围在腰下的氍毹到代替念经的转轮，种类繁多，几乎像是置身于藏族文物馆里。我没有调查这些商品是在哪里制造的，看来大宗还是从别地贩来。

像临夏这样一个没有工业底子的地区，怎样从简单的手工业发展成较为现代一些的工业呢？这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主要的困难，一是没有资金，二是没有技术。

论资金，向上看确有困难，国家投资希望不大是事实。能不能向下看呢？不妨先看看现在这 1 万户家庭小企业的资金是从哪里来的。大体上说，最初是来自劳务输出，接着是来自贩运。目前那近千辆的卡车每天都带回来可观的利润。这些钱分散在千家万户。问题是怎样能把民间分散的资金集中起来。

我在临夏市访问时，市中心新建的民族市场正接近完工，我前往参观。这市场规模不小，是座有 7200 平方米建筑面积的五

层大楼。在临夏是最高的大厦了，造价 240 万元。这笔资金就是采取了民间合股集资的办法得手的。每股 2500 元，有 150 户入股。股东有在大楼里租设商柜的优先权。这座大楼全部启用后，商品总值约 1000 万元，全将由民间集资。我参观后觉得如果能发动群众，临夏要办小型现代工业，资金不会是个过不去的难关。

技术哪里来？这使我回想起前年在甘南看到的皮革厂。我在《甘南篇》里已经提到过，这个厂是由三个南京来的技术工人帮助建立起来的，现在这三个师傅已经回去，但是这个厂还是从他们那里得到信息和技术的支援。这个事例启发了我，为临夏提出“东引西进”的方针。从东部发达地区引进技术，在本地发展加工工业，向西开辟市场，为牧区服务。

现在“横向联系”这个名词已经不脛而走，确是这几年群众创造的一条发展较不发达地区有效的战略概念。横向联系的概念改变了过去想开发西北，眼睛总盯住国家投资的概念。现在看到资源丰富的西北地区如果能为东部工业保证原料供应，就能从对方取得技术支援。而且认为许多原料的初级加工可以在原地进行，把一批工业移到边区。这种内移的工业如果能和内地乡镇企业挂上钩，就能在内地培养出大批现代技工，边区工业也就生了根。

“东引西进”在目前向西固然还只能进到青藏高原，但是如果临夏这个地区工业果真能发展起来，西方的市场还可以大大地扩张。我们不要忘记了历史上的丝绸之路。这条陆路上的国际商道就是从长安通过包括现在临夏和海东的河州向西延伸的。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个商道经过许多伊斯兰教徒的聚居区。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这个商道上的临夏在伊斯兰教世界里被称为东方麦加，至今科威特和临夏还有民间的联系。这许多伊斯兰地区和国家正是一个待开发的市场。举例来说，如果临夏的食品工业能

以青藏高原的牧业为基础得到发展，它就具有在伊斯兰世界市场上的特殊地位。这个前景我们应当及早看到，成为促进我们加紧建设临夏地区的动力。这是重开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措施，希望我们不致坐失时机。

1987 年 10 月

民族区域自治和少数民族的发展

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是毛主席、周总理和李维汉同志等，经过了很深入的研究，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做出的一个基本政策。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个开头。毛主席亲自同我讲过，别的我们可以学苏联，这个我们不学。指的是苏联搞联邦制，我们搞区域自治。中国 2000 年来是个统一的国家，中国人民正在这么一个大统一观念下形成了中华民族。这个历史事实渗透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血里，不会改变。我们不搞联邦，联邦是欧洲民族从他们的特点里边产生出来的。我们的区域自治解决了一个基本问题：在我们统一的国家里具有不同特点的各民族，怎样互助合作共同繁荣起来。

民族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体会，毛主席当时说要民族区域自治，而不要直接去抄袭西方联邦制的办法，那是因为我们的历史和欧洲不同。欧洲形成的民族叫 Nation，Nation 和国家是联结在一起的，各民族要各自成主权国家，叫 Nation-State。因此直到现在欧洲各民族不能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中国不是这样。中国从秦始皇以来一直是个统一的国家，统一国家里的各民族有如大家庭里的兄弟。民族大家庭是象征性的说法，表明这个统一体是由不同成分兄弟般地组成的。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有包括各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我还不能说清楚中国语言里“民族”这个词的确切含义，但是经常感觉到套用西方的民族的概念确有许多困难。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四条标准，用到我们这里来就难于结合实际。我们希望理论界应当积极地从中国的历史过程，去理解中国民族的性质。离开了中国历

史和现实也就难于理解了。在统一国家里可以有不同的民族，但必须承认各民族有他们的特殊性——这就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出发点，承认统一之下的特殊。建国初我参加中央访问团到贵州和广西。在贵州凯里成立了解放后第一个苗族自治县地方。在广西龙胜看到在一个县的境内还有好多民族，根据我国多层次的统一体的特点，做出了“多民族联合自治”的建议，成立了龙胜各族自治县。在实践中我认识到充分承认统一体内各个成分的特点，是加强各成分间的团结和凝聚力的必要条件。

在执行这一民族政策过程中，在30多年里我们在民族工作上取得了很多成绩。第一是平等，第二是团结。少数民族在政治上得到了平等，在社会上受到尊重和友爱。汉族和少数民族平等相处，觉得很自然。这同西方常见的民族歧视根本不同。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即便是在文化相当高的社会层里，英、法两个民族之间还是互相歧视，法语区和英语区双方彼此都不愿用对方的语言通话。至于美国白人对有色人种的歧视和压迫就更不用说了。这些情形在中国确实是看不到的。

平等、团结，我们基本已经做到了。现在的问题是共同繁荣的问题，共同繁荣这篇文章不好做。一讲少数民族，好像所有的少数民族都差不多，实际上，不同的少数民族发展水平各不相同。有不到1万人的鄂伦春族，有上千万人的壮族，差别大得很。讲平等时，我们不论大小，可是一到共同繁荣上，就得承认差别。

讲民族差别就不大容易。各个民族历史上的遭遇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有得过天下称帝为王的，有一直被人统治的；有的住在高原，有的住在草原；有的以农为主，有的以牧为主。我们对各个民族的特点认识远远落后于实际。要讲共同繁荣就不能不接触这个问题了。经济发展是要根据具体情况采取具体措施来实现的。只是划阶段、定性质恐怕解决不了共同繁荣的问题。

在今后我国的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基础不同的地方，差距不可能没有，有个先富后富的问题。有的少数民族可以发展得快些，而大多数少数民族发展速度比较慢。有快有慢，差距就会拉大。过去民族间的差距可以说是平面的，就是这里高，那里低，分在两处。今后情况会发生变化。在同一块地方不同民族出现贫富上的差距，可以说是立体的。海南岛的差距就是立体化的一个例子：一边是高楼大厦，一边是用椰子叶搭的棚子，遥遥相望，扶贫又一时扶不起来。青海有那么大的盐矿，由什么人去搞，是否可以交给当地的藏族去发展？如果向外地引进人力和技术，也会发生现在海南岛的立体差距。当然我们可以规定一条，在少数民族地区搞企业必须吸收百分之几的少数民族。我在呼伦贝尔看到伊敏煤矿，他们依法办事，从当地的鄂温克族招了两百多牧民为工人。但是不久这些人又都离开了煤矿。他们觉得在草地上放牧比到地下挖煤要好。要请这些习惯于牧业生活的人去挖煤，要有一段时间适应。我还记得，当初我带访问团到苗族地区，曾请一些苗族下山来，但后来这些苗族又回到高山上去。苗族适应高山，高山也需要人去发展，为什么不能发挥他们的特点去发展山上的经济呢？

我讲这些，就是说要具体分析如何发挥各民族特点，让他们自己发展起来。几十年来，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补贴很不少。这些钱拿到少数民族地区，是否都用于发展生产力？我看，是发展了一点，但主要的不在那儿。各地方的招待所都很漂亮，少数民族很好客，这个心情可以理解，但是钱从哪儿来？商品经济不发展，怎么促进生产？

总之，归结到一点，过去我们对少数民族的认识不足，少数民族自己对自己认识也不足。认识落后于实际，落后于形势的要求。

民族区域自治法很完整地体现了党的民族政策，是总结了过

去的经验得来的结果。但是有了法不等于就成了事实。要在实际工作中发生作用，不然就是空文。我访问满洲里时，当地同志告诉我边境那边苏联人要买这边的土豆和大白菜，但是上边不批准。我说，自治法上不是规定你们有权可以进行边境贸易的么？这是说：不是无法可依，而是不知道法上有这一内容，不知道自己有权。也不知道怎样去行使这些自治权。如果上级不准，可以依法请求有关部门裁决，直至向法院起诉。大概肯这样做的干部还不多。现在是婆婆多，媳妇难当，所以，有法不行。

我们必须大力发展少数民族的经济以实现共同繁荣。民族区域自治法是发展的依据，而且可以说要发展就必须用自治法来保障各民族应有的权利。越发展，自治法的用处也越大。但是我们不能要求各地少数民族都懂得怎样使用自治法来保护自己的权利，所以要有一个咨询机构使少数民族懂得按照自治法各个自治地方能做些什么事。比如满洲里能不能搞边境贸易，这地方的自治机关在外贸上能享受多少自主权，对这类问题咨询机构就可以做出符合法律规定的答复。如果上级政府不予批准，这个机构就得替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去打官司，为他们撑腰。这个咨询机构，不仅要受理人家的询问，还要登门服务。

这次我到青海访问。一路宣传要使用自治法的权利，青海的副书记对我说，这回我懂了，自治法是我们的一个财源。这话说对了。自治法可以成为财源，可是要你自己去动用它啊！少数民族实在需要一个法律咨询机构为他们服务。这个机构谁去设立呢？我想人大民族委员会责无旁贷。光坐下来开会讨论原则，没什么用处，抓他几件实际事例，通报给各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看到了样子，就懂得怎样落实自治法了。各地照样去办，那就真正能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法了。

海 东 行

依照年初的日程安排，1987年8月8日至17日，我如愿第二次去青海。在10天里，我走访了少数民族聚居的海东六县，获得了一些新的印象。上次去青海，在整理《临夏行》那篇考察报告时，便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有些想法，后来到海南黎族自治州考察，这些想法深化了。这次再来，种种想法明晰起来，也丰富多了。

沟通农牧地区的商品交流 叩开青藏高原繁荣的大门

地处青藏高原、有400万人口的青海省，是中国西部一块多民族的聚居区，这地区的东部在西北开发事业中居于重要地位。它的特点和甘肃临夏一样，都处在中国的大农区和大牧区的走廊里边，是两大地区农牧产品流通的贸易中心。发展大西北，发展西北民族地区的经济，必须走商品化道路，从封闭的自然经济过渡到商品化经济，这就需要一支沟通农牧业地区商品交流的队伍。我这次访问互助土族自治县，就看到一支沟通城乡经济的“倒蛋部队”，也就是那些往来互助和西宁之间的一支贩运鸡蛋的队伍，大约有800余人。沟通城乡经济要有一支贩运队伍，沟通农牧区经济的发展同样需要有一支贩运队伍，以促进牧区的发展。在临夏考察，我看到了回族同胞有这样的本领。这次发现土族、撒拉族人同样也适于做这个工作。这是历史赋予各民族的人

才资源，这个人才资源不是短期造出来的，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财富，必须充分利用，把它发挥出来。

我还要谈到的是海东地区在青藏高原开发中的地位。这块地方人口集中，约 180 万人。在青海，这里就是农业最发达的地区了。同时，它又是历史上茶马贸易的中心。现在这里已成为农、牧业两大地区的接合部。我们在此地吃饭，桌上有肉有菜，不就是农牧结合的一种象征吗？这地方的少数民族在商业流通上确有能量。循化的撒拉族贩运青藏高原上的羊，在这里宰杀后贩运到商业发达的农区去，不到两年光景（1982 - 1984）循化成了一个惹人注目的转运中心。在商品流通上，海东的循化和临夏同样对开发和繁荣青藏高原有很大的意义。看来，这条用商品流通的渠道打开青藏高原繁荣的大门的路子可能走对了。

对整个海东来说，我想应该发展多种经营。这地方农业潜力很大，牧业搞饲养也不错。同临夏相比，两个地区的相同处是工业都不发达，乡镇企业刚刚开始，规模都很小，农畜产品的加工业也不多，应以商促工。农业上海东比临夏强，而在商品流通方面则不如临夏。所以双方的协作，既有取长补短的一面，也有共同发展的一面。

我希望临夏、海东地区能成为一个供应青藏高原牧区所需要的日用品生产基地，以促进牧区经济的发展。只有用牧民们喜欢的、适销对路的日用品来促使他们进入流通领域，才能搞活牧区经济这盘棋。用这个办法来改变牧区经济结构的路子，是否走得通呢？我在摸索，提出来供大家讨论。我希望临夏、海东这两个地区都发展乡村工业，是因为这两个地区具有发展乡村工业的条件。除了具备流通渠道、劳务、商业贩运的能力外，其实也有发展乡镇企业的资金。

进入 80 年代以后，这里的农民也和全国农民一样，生活至少提高了两三倍，过去每年人均不到 100 元收入，现在达到了

300 - 400 元。实际上已经有了不少资金散在民间，要想法子集中起来办乡镇企业。临夏成立了河州穆斯林融资公司，这是一个向私人筹集资金、专为个体和集体工商业服务的资金融通组织，很适应伊斯兰教群众的宗教信仰和习惯。这种集资的形式就可以借鉴。

这两个地区技术力量还很薄弱，必须从东部地区引进。我在海东看到不少成功的例子，当然也有教训，要好好总结经验，研究一下如何向东部地区引进技术、人才，也可以从东部吸收一部分资金。有了资金、技术，加上本地的劳动力，在短时间里有可能把乡镇企业搞起来。将来牧区的自然经济有了变化，牧区的市场比较广大而又稳定。

办好海东、临夏经济协作区 发展边区民族经济的试验田

在循化，《青海日报》记者曾问我：“看来您是把临夏、海东经济协作区当作一块开发边疆民族经济的试验田，是否打算用民族区域自治法给这两个地区带来好处，或者说给它们争得一定的优惠权利？”这问题提得好。我这几年就是想研究怎样把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起来，或者叫作“边区开发”。我一直认为民族地区的发展，必须是民族本身的发展，不能离开民族的发展来讲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否则会走上美国、加拿大等国的道路。这几年，我走了很多民族地区，到过包头，也去过海南岛，在一些地区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看来整个民族地区可能发展、进步了，但这些地区中的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这些地区的资源被开发了，但是少数民族没有得到多大好处。这些现象一定要避免。应该是通过发展少数民族本身，发展

民族地区经济，同时也不排除国家资源的开发，不排除用外边的劳力去开发，但是一定要把当地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提高起来。

少数民族人口在青海占了近 40%，在青海各项工作的开展必须考虑到这一地区民族的发展。每一个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都有它自己的优势。循化的撒拉族就很突出，虽然它的人口不多，但是它具有别的民族不具备的条件。他们有强健的身体，擅长在高原上做强劳动，又善于经商贩运，能上青藏高原做生意，搞劳务。将来在现代化高度发达的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不可能是封闭的，是要在共同繁荣的大家庭中，各自做出自己的贡献的。

为什么撒拉族具备特殊的优势？这要从历史上去研究。撒拉族的发展同藏族有姻亲关系，称藏族作“阿舅”。一个民族不能孤立、封闭、排外，民族越小，越要开放，否则人的素质就要降低。开放、搞活，同样也适用于民族经济的发展。开放对人的素质的提高，对民族的振兴是必要的。

中央在几年前制定民族区域自治法时就指出中国民族之间的差距，并制定了缩短差距的有关政策。这些基本政策，都在民族区域自治法中有所规定，有所反映。各民族无论大小，都要重视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实施，有了法不付诸实施，还有什么用？在少数民族地区，要依法办事，用法律保护民族地区和各民族人民的发展进步。

现在，少数民族在全国范围内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了。我们在临夏、海东搞协作区，就是想找出发展民族地区经济和促进少数民族繁荣的办法来。这是一个跨省区的试验田，有许多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探索、总结。同样，这个协作区的成立，作为具体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实验田，也需要进一步探索，要由两省的同志共同研究。不过，有了这块试验田，就可以利用自治法来

寻觅各自治区经济发展的途径。

看来，海东的发展既走不了苏南模式，也不能走温州模式，黄淮农业区的模式值得学习。豫东的民权具有一条龙的经验：全民、集体、农民个体户三种所有制结合起来，以千家万户生产的农产品为基础，搞集体加工，国营企业最后搞成品。这种方式最容易学，而且见效较快。我在湟源曾提出，发展工业必须从千家万户着眼，不是为办工业而办工业，办工业就要考虑当地的各族群众，着眼于当地各族人民的利益，使他们富裕起来。办地方工业切忌仓促上马，不要贪大，看着好看，弄不好可能一下子背上包袱，使自己长期陷入被动。

临夏、海东协作区的优势是看得很清楚的，它是将来发展牧区经济的纽带，搞流通的桥梁。不要狭隘地看待协作区，仅仅看到两个地区之间的互通有无的作用，还要把它看成是一个联合体，为整个青藏高原的繁荣服务。当然，协作区内部的各民族人民可以各有不同的分工，有的民族可以偏重农业、矿业、提供原料，有的民族可以偏重加工制造业，有的民族可以偏重流通，发展商业和运输。但是大家要共同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将来怎样打开青藏高原的市场，用什么办法使广大的牧区发展起来。

这几年，在流通活动中，自然形成了许多贩运和贸易中心，这是好事，因为老百姓愿意这样搞，符合客观需要。现在，铁路和公路已经连接了海东几个县，交通更方便了，如何发挥这里一些城镇的作用，还要我们做实事求是的调查。

大西北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还是以牧业为主的，牧业的现代化必然是最大的课题。改变牧业结构，第一步就是要发展商品经济，打破牧区的自然经济。这需要研究生活在青藏高原的主体民族——藏族的优势是什么？藏族可以在海拔 4000 米以上的高原上劳动生息千百年，站住脚跟，发展牧区，是其他民族无法比拟的优势。我们还要研究藏族生活的高原环境、气候、生态和他们

的文化传统。发展藏族的文化，必须先把经济发展起来；只有经济水平提高起来了，新文化才进得去，钱才不至于白花。

根本出路在深化改革和进一步开放

我还听说，像青海这样的省份，开放就要冲击现有的大企业，因此要采取保护性措施。有同志问我，怎样解决这一矛盾？我认为，目前阶段，出现这种现象并不奇怪，因为像青海这样的西部省份同东部省份相比，有很大的“落差”，“落差”大，竞争不过，只有保护原有的设备和原有的产业结构。西宁的毛纺业就采取了这种保护措施。我们首先要承认事实，不能不照顾本地区的利益，全行业 2000 万元的产值数目很大，不保护一下就会出问题，但要保持 2000 万元的产值，就得在毛纺企业改革上打算盘。现在实行的保护措施是在原料上打主意，就是控制较低的羊毛收购价格来降低产品成本。我想，既然人家可以用抬高羊毛价格把羊毛截走，而且能在高价原料的条件下取得利润，就是由于他们经营水平高。那么，西宁的毛纺业就应当赶紧改革技术和经营，去和外地竞争。改革才能开放，开放才能改革，这个道理在这里表现得很清楚。看来出路只能是改变企业的技术和经营，当然一下子做到这点不容易，要逐步调整，在保证羊毛供应的情况下，逐步改革。我们可以先搞几个毛纺厂，做个试验，或者对外联营，或者承包。从外边引进技术、机器，甚至资金。当地的毛纺业改革成功了，羊毛价格也就可以开放。羊毛价格调整了又可以促进青海的牧业，形成良性循环。当前，必须抓紧把毛纺工业经营质量提高。东部的丝绸业这几年变化很大，每年都在革新，其中有的办法可以借鉴。

我看青海的国营企业要赶上国内先进水平，抓企业经营的改

革不是一下子就能见效的，可以逐步展开，找出适合本地区可行的路子。但想依靠行政手段保持老水平，事实上恐怕维持不下去。黄金问题也是一样。这里的采金业要走现代化道路，现在还是老的采金方法，甚至是马步芳时代的老办法，采金人的生命都没有保障。今后要走现代化的经营道路，换言之，就是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使国家、集体和个人都受益。

青海是一个宏大而有魅力的地方，越观察越有意思，越有劲头。由于时间短促，许多都是一隅之见，偶有所得，用一句话概括我的观感：引人入胜，学而后知不足。我愿同青海的同志一道继续探索，争取再上青海高原来。

以上这些想法，曾与青海的一些新闻记者交谈过，并由索文清同志整理出来，这对最后成文是有帮助的。

1987 年 12 月

话说呼伦贝尔森林

有人描述内蒙古自治区的经济结构大体上是“东林、西铁、南农、北牧”八个字。东林，指的是北部呼伦贝尔盟大兴安岭的森林。我想去见识见识林区经济，于去年8月访问了呼伦贝尔盟（简称“呼盟”）。

“呼盟”过去与现在的人

呼盟幅员辽阔，有25万平方公里（比江、浙两省合在一起还要大），东靠黑龙江，西北隔江和苏联相望，西南是蒙古人民共和国。以纵贯南北的大兴安岭为主轴，全盟可分三部：中部是山岭林区，西部是草原牧区，东部是河谷农区，已发现的煤矿在西部。

西部草原有呼伦和贝尔两个湖泊，相连为盟名。两湖地区水土丰美。经考古学证实早在1万年前已有人类生息其地，称这时的人为扎赉诺尔人。然而曾在这草原上居住过，而且在这里发育成长的民族却是不少的。许多虽都成了历史的陈迹，如东胡、匈奴、鲜卑、室韦等，但其后人和当前国内各民族联系尚待考证。我这次曾到大兴安岭里的阿里河镇附近去游览嘎仙洞。洞巨而深，可容千人。洞口有一碑记载北魏在华北建国后，遣使到此祭祀其先祖。我以前不知道，这个以雕塑和书法碑刻著名于史的拓跋王朝，原来是兴安岭森林里猎民的后人。触景生思：看来我国历史上南下建国的北方民族中，可能有不少是走过鲜卑老路的。

他们从森林里狩猎开始，下山到草原上放牧，长大后驱骑南下，入驻农区，然后在中原的文化大熔炉里化成其他民族的一部分。

在两湖地区兴起的民族至今还有人居住在这里的只有蒙古这个民族。成吉思汗就是在这片草原上团结了许多部落，从而形成蒙古族。但是据历史记载，现在居住在呼盟的蒙古族则是在 18 世纪 30 年代迁入的。当时清朝政府为了防御帝俄继续入侵，调兵驻扎在呼盟草原，又移民实边，引进了蒙古牧民。调入的士兵中除蒙古族外还有鄂温克、达斡尔等族，总数约 7000 人，加上后来进入的家属和牧民大约 3 万多人。他们的后裔在这片草原上繁衍生息，形成了今天呼盟民族分布的基本格局。

兴安岭林区早年就有以狩猎为主的居民，上述鲜卑族的先人就是一证。17 世纪初期，帝俄开始侵入黑龙江北岸的广大地区，原在该地区居住的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族人被迫越江南迁，一部分进入了兴安岭林区。现在还在林区居住的是鄂伦春族，人数已不多了。

目前呼盟人口中占多数的还是汉族。清朝末年东北地区对汉人开禁之后，闯关东的移民数量很大，但很少进入呼盟这个偏僻的山区和草原。1903 年东清铁路修通，才使大量移民迁入成为可能。铁路西头有俄国人移入，近几十年来这些俄国人几乎全部遣返。铁路东头不断有汉人移入，主要居住在沿线的城镇里。我们没有掌握人口逐年增长的数字，只了解到 1949 年呼盟解放时总人口约 31 万。原有 3 万多人经过 47 年的自然增长可达 10 万人。那么可推算出，在铁路修通后到解放前夕这段时间大概移入了 20 万人。可是，据 1984 年的统计，呼盟人口已达 239 万，如果其中原有人口的自然增长以 60 万人估计的话，那么在解放后的 35 年里约移入了 180 万人之多。

由盟外移入的汉人至今仍然只有很少一部分从事牧业。50 年代我初次访问呼盟，曾在海拉尔草原上了解到一些情况。那时

给我留下的印象是，这里从事牧业的几乎都是蒙古族和鄂温克族。当时还是游牧性质，畜群按节气在草场间流动，人跟着牲畜逐水草而居，几乎都住在可以移动的蒙古包里。过去草场都有一定的归属，由部落所有，汉人是插不进去的。至今呼盟西部牧区里的汉人仍然集中在市镇和矿区。所以在西部草原上汉族是少数。以新巴尔虎左、右两旗为例，蒙古族人口分别占 74% 和 68%。

大批移民进入呼盟的一个原因是林区开发和矿业发展。1945 年冬在呼盟开始建立国家林业机关，其间机构的名称改变过多次，现称林业管理局，所属各局、场、厂、站、队形成一个行政系统，称林业系统。这个系统的职工和家属初期约 4 万人，1984 年已增至 55 万人，占当时全盟人口的 23.8%。1958 年后呼盟煤炭工业有较大发展。1984 年这个系统的职工和家属估计已有 5 万人。

呼盟的农业原来是不发达的。早期的居民中只有达斡尔族经营一些农业。多在嫩江河谷一带，当前大部分耕地是解放后外地移民开垦的。60 年代内地农村凋敝，大量农民移入呼盟东部各地。这些移民都是个体自发流动的，被人称为盲流，实际人数很难统计。一直到 80 年代才逐渐减少。1984 年呼盟农业人口约 80 万。

严重隐患与青山长在

大兴安岭是我国东北重要的林业宝地，仅就呼盟范围而言，林区就有 1200 万公顷，占全盟土地面积的 48%，占全国森林面积的 1/10。1984 年估计林木总蓄积量 8.8 亿立方米，占全国总量的 9.5%。到 1986 年止累计提供木材 1 亿立方米，现在每年可提供 360 万立方米。至于森林里可开发的其他资源就无法估计

了。从宏观上看，其经济价值更值得重视。我认为，这片大森林是我国整个东北部生态系统中的主要环节。我们进入山区就注意到公路两侧山坡暴露的土层很薄，大多不到 $1/3$ 米，土层下面就是碎石。这样薄的土层如果没有林木覆盖，很容易被雨水冲蚀而成为现在西北所常见的光秃秃的山头。我们现在就靠这片林海保护住了大兴安岭的土层，吸住流水，为东北的河流提供水源，灌溉我国最富饶的东北粮仓。怎样利用和保持大兴安岭这个大森林，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大事。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回溯一下痛心的历史，以便从中吸取教训。

本世纪初清朝在帝俄强迫下同意修筑从呼盟的满洲里起穿过我国东北境内到海参崴的东清铁路。应该说修建铁路当时对发展经济是有利的，但是这条铁路毕竟是为帝俄掠夺我国东北资源服务的。首先遭到破坏的是沿线的林木。筑路时要就地取材，大肆砍伐。当时俄国人的住宅也是大量用木材构筑的，甚至墙壁都用完整的巨大木材修建。这种房屋现在在满洲里等城市里还能看到。帝俄利用这条铁路将木材不断地输出，以致沿线原有的森林几乎完全砍光。我们现在坐在火车里已完全看不到、也想不到这里曾经是丰美的林区。30 年代到 40 年代，日本侵略军占领及伪满统治时期，森林被肆无忌惮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掠夺性采伐。这两次大破坏估计损失木材达 1.5 亿立方米，几乎占全部蓄积量的 $1/6$ 。

1946 年起呼盟的林业才开始由国家管理。1953 年林业管理系统改由林业部领导，并规定了“采伐与更新并举”的方针。从此，掠夺性的采伐得到扭转，并且开始进行了有计划的采育。这里首先修建起林区铁路，以便利木材的运输和人员的交通，然后组织林业工人进入林区作业。同时，林区成立了队和站，建立起工作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据点。随着铁路的延伸，这里不断建立起新的林场，采伐也逐步深入。我们这次访问就是坐正规的火车

直到额尔古纳左旗的满归镇——呼盟林区铁路最北的一站，已接近边界。也就是说呼盟林区南北的运输主轴现在已经修成，木材就是通过这条铁路不断运到外地。据说，为了开辟新林区，铁路线还计划继续延伸。其实到 1984 年止，沿铁路线已有 124 个林场、296 个小工队，星罗棋布于呼盟的林区里。

周恩来总理生前曾提出的要做到“青山长在，持续利用”。林业资源的开发必须有长期打算，有伐有育。如果只伐不育，青山变成荒山，林业资源就遭受破坏。呼盟森林在解放前的两次大破坏就是只伐不育造成的。再说，呼盟地处高寒山区，树木长势缓慢。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在这里树木如树人，一棵树要长 100 年才能成材，所以更需要做到采伐数量和树木生长周期相配合，即使有伐有育，也必须控制在和总蓄积量的一定比例之下。

呼盟林业资源在国家实行管理之后是否能做到不再受到破坏呢？单就国家林业系统的采伐和培育的比例来看，呼盟林业并没有真正做到“采伐与更新并举”的方针。据介绍，1976 年到 1984 年的 8 年里采伐量超过生长量达 80%。有大片已采伐过的林场没有进行次生林的培育。

国家伐多于育的数目是可以查得到的。无法计算的是非计划内的采伐。100 万的林区居民，生活上所需要的木材，实际上都是就地砍伐的。最大一项消耗是日常需要的燃料。高寒山区室内取暖的时间又长，家家户户门前成堆的烧柴都是用成材的树木劈成的。我们这些外地来访问的人看了真是心痛。平时木材的消耗还情有可说，盲流大量进入林区的时期里，为了建屋和偷运，损失的木材更无法估计。而这样被砍伐光的林区根本谈不到培育新林。呼盟大兴安岭的森林正在不断破坏和销蚀之中。看来这已是难于否认的事实。对于我国东北宏观经济中的这个严重隐患，不能不引起足够的警惕啊！

行政上的双重结构与多种经营

我们这次访问特别注意了林业管理体制问题。

林区在有计划采伐之前原本没有基层地方行政设置。现有的行政管理制度和设置是在林业开发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进入林区伐木和运输的工人由林业系统的基层单位——队和站负责管理，同时由于森林里荒无人烟，职工的生活必须由林业系统自身经营。因此林业系统不得不担负起经营、管理职工和家属的各种社会需要的职能。从孩子出生到老人死亡所需的教育、就业、婚嫁、退休、疾病、娱乐以至丧葬等一切社会职能都得由林管局统筹。换一句话说，林业系统既包了林，又包了人。由企业性质开始，终于成了一个“大家庭”，而且“大家庭”的成员越来越多。50年代招来的职工，到80年代，都已子孙满堂了。林业系统也跟着扩张，除建立起队、站、厂、场、局上下各级的组织外，还有种种专门机构。1984年牙克石林业管理局所属单位共44个，其中17个局（公司）、7个厂（局），所属林场124个，小工队296个。另外还有20个事业单位，包括林业研究所，各级学校（233所）、医院（24所）、防疫站、森林警察（1000多人）、公安部队（1000多人）、物资局、文工团、日报社、宾馆等等。这个庞大的系统到1984年已有职工13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和不在编的工人据估计有50多万。50年代总共不过4万人，30多年里增加了8倍。这个“大家庭”是个基本上“不求人”的自给自足、独立封闭的社会单位。真可谓企业办社会的典型。

林业系统是我国实行计划经济时期里建成的国营企业。这个企业全部由国家投资，按国家规定下达的计划采伐木材，所采木

材全部由国家调拨，属一类物资，价格由国家规定，没有计划外的合法销售渠道。同时，它又是一种专业企业，只有为国家提供木材的任务，不兼行其他“分外”的生产。它的收入除按规定价格向国家支取木材售价外，所得利润还要按成上缴，亏空由国家补贴。国家规定的木材价格一般偏低，影响林业管理机关的收入。但支出方面却由于企业办社会，人口越多支出也越大。在这样的体制下，林业管理机关不得不紧缩育林投资和加速木材的采伐。这不能不认为是采伐率超过育林率的根本原因。但是林业系统供养这一大群嗷嗷待哺的人，不多砍些木材又怎能维持这支庞大队伍的生活呢？！

企业办社会加重了企业的负担，其他国营企业也有这种情况。但是，林业还有其特殊情况，林管局能管的只有林业系统里的人。那些住在林区的还有林管局管不到的其他居民，他们是在林业开发过程中移入林区的各业人员和他们的家属，为数往往超过林业系统的人员。林业局是无法包下这整个社会的。呼盟全部人口中林业系统只占 1/5，在林区里比例虽高一些，但还是占少数。林业系统之外的人是由盟旗这个地方行政系统管理的。因此在林区里存在两套并行的行政系统。这两个系统却又不能都完全划地而治，因为两个系统的人多混杂和交叉居住，甚至一家人分属两个系统。这种状况引起行政上的复杂性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我曾向双方领导谈起这件事，他们都说现在双方很讲交情，问题不大，就是说，大家是靠人情而不是靠制度来解决问题的。人情碰着实际利益时就不易生效了。据说地方上曾提出愿供煤给林业系统做居民的燃料，把省下来的木材作价给地方派用处。这本是合理的建议，用木材当柴烧实在可惜，但是至今没有成议。今后地方和林业两个系统都要发展多种经营，在林区资源的分配上双系行政之间的矛盾也就更难免了。

在林区开发之初，由林业系统代行地方行政的职能是难免

的。在一个时期里出现行政上的双重结构也是可理解的。这应当看成是过渡阶段，企业办社会原本是不可取的体制。企业的利润用来维持社会福利，削弱了自身的积累和活力。何况企业不能包社会全体，企业所包的和包不下的两部分居民之间的矛盾滋长起来必然会损害企业的正常运行。现在由于企业系统之外的居民得不到木材和燃料，已经引起严重的偷伐和滥伐，前几年所谓“盲流”问题一时闹得很紧张。

目前林业系统急于要解决的问题是自身收支平衡，以保证伐育并重。现在已经实行的办法是改变单一经济为多种经营。林业系统技术力量是相当雄厚的，只要政策开放，允许他们利用科技知识进行多种经营，满地的财宝都会加倍增值。

但是，如果不解决行政上的双重结构，在开发林区资源的过程中难免互相牵掣，互相扯皮。行政上的统一领导问题迟早会提出来的。二者怎样合而为一呢？一个办法是由林业系统统一林区的管理，不但管现在林业系统的人，也管在林区住的居民，就是政企合一。据说黑龙江伊春的林管局就是这样办的。地方行政领导由林管局的领导兼任，林区的地方行政费用由林区自给。据说伊春林管局在地方行政上，每年要花费 8000 多万元，影响了企业本身的发展。再说，这种体制事实上是把林区划成行政特区，直属林业系统，对省一级的经济发展也是不利的。看来并不是一个可取的方案。

另一个可行的办法是林业企业化，行政归地方去管理。理论上讲是个较好的办法，但是结合林区开发的特点这个办法也有它的困难。我们曾就林区的学校能否由地方统一管理的问题和双方一起研究过。林方愿意继续承担一定数额的教育经费，作为对地方的补贴，但对于保证教学质量却不放心；地方则顾虑自己无力负担学校的发展。双方的这些顾虑一是出于两个系统的人员来源不同，文化不齐，对教育的要求不一致。林业系统里有大量技术

人员和工人，而一般居民则是各地来的农民。更重要的是地方在经济上不如林方。林方想卸的包袱地方没有接过来的实力。所以要实行政企分开，还得从提高林区的经济着手。在现有的水平上是难于做到的。

改善林区经济状况，最根本的一条办法是开放多种经营，发展多种多样的小企业，个体、集体、全民一齐上。以小企业来保护大企业，使森林资源能持续利用，青山长在。从呼盟的实际出发，看来目前必须由林方采取主动，在技术上、资金上协助当地居民兴办各种小企业，而且要开放林区资源，在规定的范围和条件下，使全体居民，包括林业职工的家属，都能投入到利用林区资源的生产事业里去。这样才能人尽其力，物尽其用。林区这块宝地可以比较快地使居民富裕起来。地方的财政雄厚了，林管局才有条件从办社会里脱身出来，专心一致去发展林业。

鄂伦春人的前途

最后我还应当提到的是原来在大兴安岭居住的鄂伦春人。他们是我国人数最少的民族之一，1978年共3200人，现在为4000人，有一半居住在呼盟的兴安岭林区。1951年成立了鄂伦春自治旗，当时全旗只有778人，其中4人不是鄂伦春族。1986年该旗的鄂伦春人增加到1572人，超过一倍，但是该旗的总人口已达29万人。相对来说，鄂伦春人只占全旗人口的0.6%。这里林区铁路已经修通，镇集已经形成。鄂伦春人的生活也起了很大的变化。

鄂伦春人什么时候进入兴安岭林区，我们还不清楚，至少其中有一部分是17世纪帝俄侵占黑龙江北岸时渡江而来的，现在隔江还有他们同族的人。这个民族原本是森林里的居民，衣食住

行都取之于森林资源。森林里多野生动植物，他们以狩猎和采集得到食物，以白桦的枝干和树皮搭成尖顶的小棚称“仙人柱”，用兽皮做衣穿。他们饲养驯鹿，供驱使和运输。多少世纪以来他们就过着这种自给自足的生活。森林以外的世界的变化，打破了他们封闭的安定生活。最早就因为外地的人看中了他们猎得的毛皮，清朝政府强迫他们进贡貂皮。帝俄的哥萨克、亡命的商人冒险进入林区欺骗和掠夺毛皮，最后实行武力侵略，占领我们的国土。森林里的猎民为了提供贡品和商品引进了火枪，林区的生态平衡开始被破坏。但森林尚无恙，他们的生活来源还有保证。主要的也是根本的变化，开始于这片广阔的自然森林变成了供应外地的林业资源。树木砍了，他们的生活也就不能不变了。因此发生了鄂伦春这种以林为生的民族怎样生存和发展的问題。

我们访问了林区的鄂伦春自治旗。自治旗所在地阿里河完全是个新建的小镇。我们见到的是一排排崭新的住宅、学校、商店、医院、银行、电影院。“桦皮做房地当炕”的日子已经看不见了。在额尔古纳旗的奥鲁古雅猎民乡的一个小型博物馆里，我们初次看到“仙人柱”和“四不像”。“四不像”就是驯鹿，博物馆里陈列着一具装饰得很美的标本。在远处的密林里是否还有过着传统生活的鄂伦春人呢？我们不知道。眼前见到的这个小镇和林区其他的小镇基本是一个样子。如果说有区别的话，这里更整齐更中看些。据记载，国家对这个自治旗从1951年至1978年的建设投资累计达1.1亿元。

按照民族政策，这里十分注意培养鄂伦春族的干部。据说现在已吸收为国家干部和职工的，就是在国家编制里的人数约占全部呼盟鄂伦春人口的1/3。学生从小学起就有补助金，不是干部和职工的成年人可以领取护林费。鄂伦春族同胞的基本生活是有保证的。但是据介绍，四个猎乡共200户中却有120家贫困户，也就是说这些人生活还没有超过年收入120元和粮食400斤的贫

困线。这个情形不能不引起我思考了许多问题，其中最严肃的问题是一个民族假如脱离了生产，会不会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呢？

我一向认为，一个民族，不论大小，要发展和繁荣起来，必须有个坚实的经济基础。一个民族要在发展中保持其民族特点，那就必须利用民族特具的优势来发展其经济。不然的话，这个民族难免要衰亡或失去其原有特点而名存实亡。如果用这样的认识来看现在鄂伦春族的情况，我不能不为他们的前途担心。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个几千人的民族，国家是供养得起的。但是怎样使鄂伦春人作为一个民族发展和繁荣起来，还要多加思考。

在森林里以狩猎为生的时代，对鄂伦春人来说是一去不复返了。但世代生活在森林中所养成的特点，也就是其他民族不具备的优势，如果能加以发扬和提高，促使经济实力增强，鄂伦春族的前途是光明的。我看他们的优势就在熟悉怎样利用森林资源的这点上。在正确的林业政策下，森林是能持续存在的。鄂伦春民族的用武之地应当是常在的，需要提高的是利用森林资源的手段，从原始狩猎到科学利用。

我们知道，解放后国家就帮助鄂伦春族建立养鹿场，自治旗曾有三个养鹿场。鹿全身是宝，即以鹿茸一项就可以使家家户户富起来。养鹿原是鄂伦春人的传统特长，如加以扶助，养鹿业应当、而且可以发展起来。但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自治旗的几个养鹿场据说已经关闭了，有些领导同志说驯鹿由于长期近亲繁殖，已经退化。总之，我认为鄂伦春人应集中力量奠定本民族的经济基础，我们的政策也应从这方面去多考虑。当前这里的产业结构对这个民族的发展是不利的。近一半的人家还没有富起来，就足以说明这点。

最后我愿意再一次强调，大兴安岭林业的发展，必须考虑到林区经济的全面开发，而在开发林区资源的过程中绝不应忘记了

原来居住在森林里的鄂伦春民族。我们不仅要保证青山长在，还应保证各民族共同繁荣。

1988 年 4 月

全国一盘棋

——从沿海到边区的考察

中央沿海发展战略提出后，东、西部发展的关系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从种桑养蚕业北上谈起

东部地区这一年半来变化很快。以江苏为例，我们曾经把江苏省分为苏南、苏中、苏北三个发展程度不同的地区。我们看过“苏南模式”，也看到了苏北发展中的一些问题，但是对苏南、苏北的关系问题却谈得不够。其实，苏南、苏北的关系最近也发生了很多变化。就拿“丝绸之乡”的江南来讲，近来这里的丝绸工业大呼原料紧缺，埋怨苏北不肯出卖蚕茧。这种类似“羊毛大战”对原料的争夺，反映了地区之间关系的变化。过去苏南自己种桑养蚕，原料自给。这几年，桑蚕跨过长江在苏北安家落户，苏北的桑蚕产量已经超过苏南。苏北、苏南有了更密切的经济联系。

桑蚕北上，是商品经济规律的必然结果，像世界经济产业结构目前发生的变化一样。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转移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人口转移来实现。表现为人口向城市的大量集中，工业在城市高度聚集，如当前的墨西哥城、新加坡等。中国的上海也发生过这种现象。另一种是通过工业转移来实现。表现为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向外扩散，苏南的乡镇企业的兴起就是这种

扩散的结果。由于商品经济的规律，苏南农民不愿意再种桑养蚕。这就促使种桑养蚕向经济相对落后的苏北转移，当然，目前这种产业转移程度还很低。

我们在小城镇研究中，曾经提出“离土不离乡”的概念，这是根据当时的经济发展情况提出来的。现在随着经济发展的变化，我们认为农民“乡”、“土”都可能离。前提有两个，一是农业规模经营，二是社会保险制度。我在苏南进行了规模农业的研究，一般认为，一个农村劳力如果有产前、产中和产后的社会化服务，又能利用机械耕种，经营10-20亩土地，收入就可以等于务工的劳力。另一方面，土地对于农民长期起着社会保险的作用了。但是，在新的社会保险体系建立之前，农民轻易不肯放弃土地。

苏南要上新台阶，出路仍在乡镇企业的深化发展。苏南的丝绸工业不仅要有丝织，而且要有印染，进而发展成衣生产。这几年成衣时装发展很快。过去认为时装表演是有伤风化的事，现在虽然开禁了，但苏南目前仍以初级产品生产为多，以成衣为最终产品的比例还很小。只要苏南乡镇企业向技术密集型方向发展，种桑养蚕等劳动密集型的北上就不可避免；苏北完全有可能成为新的桑蚕基地。这个例子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国际、国内经济产业结构的变化和转移，完全不是人为设计安排所引起的，而是商品经济规律的必然结果。对商品经济规律，我们只能努力去认识它、尊重它，而不是想当然地人为干扰它。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处理好各种关系。

中部地区也是如此，湖南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东部沿海地区的变化直接冲击着中部地区，形成一个“次沿海地区”。湖南和广东交界的湘南，目前就成了一个弹性过渡地带。例如广东市场需要大量生猪，湘粤边界的几个县就兴起了“养猪热”。目前广东和湖南形成了一个“接力赛”的有趣现象。湖南的生猪卖到

广东供广东人消费；广东人的生猪卖给香港出口创汇，因为广东养的是香港市场所需要的“瘦肉型”猪。

广东接受香港的经济辐射，并向内地传递。例如广东的来料加工企业中有许多工人是湖南人。这些工人之中有的成为继续扩散的媒介。目前这种“接力赛”和梯度扩散还在由沿海向内地进行着，过了韶关就直接进入湖南。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种扩散不是无限制的，它是由商品经济规律决定的，也是由国际市场的变化情况所决定的。广东吹来的“南国风”，也受香港经济繁荣与否的影响；而香港的经济又受世界经济起伏的影响。而面对瞬息万变的国际市场，我们又缺少经验，外贸体制还很不适应。因此，我们的“大进大出”还是攥在别人的手里的“大进大出”。这是目前外向型经济发展中最大的问题，比如，我们还没有自己的面对世界市场的信息中心，信息中心在香港，在日本。我们只能通过别人的信息中心得到订货单。这种被动的情况不是短时期能够解决的，只能在实践中不断提高自己的对国际市场的适应能力，同时还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努力削弱对外的依赖性，才能减少大起大落的损失。

西部地区的发展同样应该尊重商品经济规律，而我们对商品经济规律的认识还很不够，跟不上事物的发展变化。西部的路子还在探索之中。

市场导向与经济运行的启动

现在首先应该解决经济发展的启动问题。我常比喻，一个地区的经济运行要有一个“发动机”。这个“发动机”的功能就是启动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西部地区现在出现了“富饶的贫穷”现象，资源丰富，但经济落后。西部的企业如果搞得好，可以带

动资源开发，带动当地各业发展，形成良性循环；搞不好就会成为沙漠中的“孤岛”，与周围社会自我隔绝。这个“发动机”的启动关键在哪里？我认为是市场导向的确立。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体现了国际市场导向，但是也不能忽视国内市场导向，这就是我常说的“两个市场，左右开弓”。

在甘肃临夏，我提出“以商带工”的启动战略。我在那儿考察时，发现了一支农民流通部队——“倒蛋部队”。他们在农村收购大量鸡蛋，用自行车运往兰州出售，搞活了流通，促进了生产。我认为西部各地都要有这么一支“倒蛋部队”，由这种贩运队伍引火启动整个地区的经济运行。我进一步考察了这个地区回族的历史，提出发挥回民善于经商的优势，搞活区域经济。这个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更大区域联合的趋势，需要更大的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甘肃、青海、宁夏三省（区）的协作应运而生。这个“协作区”在历史上就属一个经济地带。以河西走廊为主的黄河 1000 公里流域，善于经商的回族就在这个地带长期生活。现在我们把这 1000 公里黄河连起来看，提出建立 12 个大型水电站，以解决这个地带的能源问题。由水电产生能源；能源推动矿山资源开发。通过资源开发带动这个“协作区”3000 万人民的致富，从而促使整个区域的商品经济的良性循环。这个经济启动的结果，将形成西北地区一个经济发展中心。

这个经济中心的恢复和发展，更长远的意义就是重开向西的“丝绸之路”，打开西部国际市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西部国际市场比东部国际市场更有潜力。东进的外向型经济发展，势必受到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这道屏障的阻遏，而西进中亚、西亚和中东地区，我们却具有一定的优势。充分发挥回族的民族优势，提供伊斯兰国家所需要的各种生活用品（包括热水瓶、毛巾等在内），我们完全可能建立一个很大的西部国外市场。这方面，苏联正在同我们赛跑。总之，外向型经济不是单一的，同样

要发挥各民族的优势去开辟国际市场。

市场导向，国际市场亟待开发这是没有异议的，但是目前国内市场的潜力远远没有发挥，特别是国内农村这个大市场。这几年全国各地农民的收入都有所增加。1980年前，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农民收入在100元以下，而现在的贫困线已提高到200元。全国虽然还有6000万人口在这条线以下，但绝大部分地区农民的收入都超过400元，有些地区发展更快。例如湖南沅江县1986年一年农民通过苎麻种植就有2亿元的收入。这些钱是怎么花的？苏南农村是通过集体积累发展了乡镇企业，这笔钱转化成工业积累。但是大多数地区的农民拿这些钱盖房子或吃掉了，没有转化成生产力。

农民手中的钱主要有两条出路，一个是生产性，另一个是生活性。农民刚刚从自然经济里出来进入商品经济的环境之中，出现了许多奇奇怪怪的现象，包括农民生活消费的奇异现象。我们参观沅江农民的新房子，房间里几乎看不到任何配套家具用品，但是很多农民却买了收录机、电视机甚至高级音响设备。这些电器给农民多少益处，很难说清楚。很多地方现在还没通电，或电力不足，农民看电视，不是图像不清，就是老看“再见”（因电停止）。有些地方的农民用洗衣机装稻谷。尽管如此，农民还是大买家用电器。可见，我们对于农民手中的钱，既不重视，也不注意引导。

农村大市场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农民需要的生产资料，另一个是农民需要的生活资料。现在农民有钱想买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但买不到。这怎么能使农民手中的钱转化为生产资金？农民新房里没有合适的生活用品配套，这怎么能合理地引导农民用手中的钱去改善生活？

总之，对于农民手中的钱，农村这个大市场，我们应该给予充分重视。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要有国际市场导向，而且应有国

内市场，特别是农村这个大市场的导向。

扩散效应与东西联营

我以为西部各地区经济发展都要以内外市场为导向，但各地又要因地制宜，选择自己的启动模式。例如，甘、青、宁“三省协作区”就是以“能源先行”为启动模式的。总之，经济运行急需启动，而启动方式又要因地制宜，切忌“一刀切”。根据西部地区的具体情况，我主要谈一下与启动西部地区经济有关的两个问题，一个是发挥国营及军工企业的作用；二是发挥“东西联营”的作用。

国营和军工企业，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三线”企业，是西部地区的技术堡垒。30年来，国家花了上千亿元的投资在西部地区兴建了这批企业。这批企业在计划经济僵化的体制中，不讲效益，不计成本，大部分亏损由国家补偿。特别是这些企业自建社会，自成体系，与周围社会几乎隔绝，没有形成带动周围地区经济发展的强大力量。例如包钢，企业办社会，包袱越背越重；而自己生产的钢材全部外运，包钢所在的内蒙古所需钢材却要到外地去采购运进，形成所谓“飞地现象”。

这些年来，这些国营和军工企业有了一些变化，但是远远没有发挥它的能量。国营和军工企业最大的优势是它的技术优势。兰州、西安等地中级职称以上的知识分子所占比例比上海还高，西部很多企业的技术优势和设备优势在全国也处领先地位。我一直在考虑，这些企业如何能把自己的技术优势扩散出去，在周围地区产生扩散效应（或外部效应）的问题。

这种扩散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品种变型，即“军转民、重带轻”，把过去计划经济中的部分军品生产转为商品经济中的

民品生产。把“包销经济”转为市场经济。让重工业带动轻工业，让全民所有制扶助集体所有制，让大企业结合中小企业。这种变型符合中央有关企业改革的精神。第二步是地区扩散，品种变型后，国营大企业和军工企业为周围地区的横向联合打下了基础，大企业的技术优势和地方的资源优势、劳动力优势结合起来，将会产生综合效益。发挥国营和军工企业的优势，启动西部地区的经济运行，是一种重要的启动模式。

我一直主张“东西合作，互惠互利”。内蒙古的呼伦贝尔盟近几年经济发展很快，牧业从粗放改为舍养，农业从乱垦改为机械化规模经营。但是那里的森林资源没有很好地利用，浪费很大。我在那里做了“红娘”，介绍他们与江苏联营。江苏派人帮助建立木材加工厂；内蒙古用木材换人才，换技术。通过这种东西联营，在西部建立少数民族自己的工业基础，这是一种“国内补偿贸易”的形式。我在满洲里市也做了“红娘”，让江苏和他们联营外贸出口，组织货源出口苏联，进而换汇进口“以东支西，以西资东”，在国内“大进大出”。

“地区间的合作”是多方面的，内蒙古既然可以和江苏合作，当然更可以和东北三省合作联营，使各地的优势通过合作得到优化。总之，加强地区间的合作，形成合成优势，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又一个重要的启动形式。

事实上，这一年半来东西部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何正确处理东西部地区不平衡的关系，促进东西部地区的协调发展，正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大家都清楚，全国东部、中部、西部三大经济地带发展是很不平衡的，东西部反差尤其强烈。世界上有“南北问题”，中国有“东西问题”。从发展观来讲，绝对平衡发展是不可能的，但“平均主义”也不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中国的发展，从地区来讲是一个先发展和后发展的问题，从个人来讲是一个先富后富的问题。“共同富裕，协调发展”，这

一指导思想我们不能动摇。我常说，中国不是“大鱼吃小鱼”，而是“大鱼帮小鱼”。那么怎么帮？我认为主要有两条：一是国家支持，二是自己走路。赵紫阳同志说过：对东部地区，我们给政策；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我们不仅给政策，而且要给切实的帮助。这说明发展西部地区，国家的参与是必要的，但是最根本的发展动力来自当地的人民群众。国家支持的目的是帮助西部少数民族站起来走自己发展的路。我一直呼吁发挥各民族的优势，用自己的腿走自己的路。例如藏族，他们比其他民族更适应青藏高原的高寒气候和低气压。又如黎族，他们在海南岛则有经营热带植物的传统和经验。我们只有帮助少数民族在自己的经济基础上站起来，才能避免少数民族名存实亡的后果，才能使我们的国家真正成为一个民族大家庭，各民族才能在这个大家庭中共同繁荣。

东西部协调发展的关键是深化改革。例如我们在西北地区筹建一个亚麻厂，几年不能上马，这个“发动机”一直启动不了。为什么？因为它只走上层路线，被层层的结构所羁绊。所以眼睛不能光向上，而且也要向下，上下结合才有活路。再如，青海对羊毛原料进行地区封锁，不许外流。因为青海的羊毛纺织厂需要原料，而当地政府靠这些羊毛纺织厂能得到巨额税利。这些税利是在压低羊毛收购价，低成本的前提下挣得的。“羊毛大战”使羊毛外流，政府通过行政手段设卡堵截，结果出现了牧民用游击战来保护这支“倒蛋部队”，羊毛仍然出去，堵卡的行政队伍也难免腐化。真正的解决办法不是维持原料低成本，而是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为什么别人可以用较高成本的羊毛原料生产仍有利润，而青海却不行？所以，改革才能开放；开放才能改革。这里归结到一点，就是要遵循商品经济规律办事，在改革中找出路，求发展。

1988 年 5 月 9 日

访骆驼之乡^{* 1}

我很感谢阿拉善盟的党政领导同志和工作同志，特别是内蒙古自治区的乌力更副主席陪我到这儿来，很愉快地住了几天，也碰到了这里多年没有的大雨，心情很愉快。我们这次来的目的，是想了解阿拉善的情况，最初我是从乌力更同志的话里边听说的，叫我到骆驼之乡看看。我们一起工作了5年，从赤峰到包头，又到了呼伦贝尔。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农林牧铁我都看了一下，先后4年，最后我们一起到阿拉善来看看骆驼。这几天学到了不少东西。原来阿拉善并不是一个很荒凉的地方，它资源丰富，已经开始现代化的建设了。我们看到了腰坝，一个人造的绿洲。用电把地下水提起来进行灌溉，没有电是不可能的，有了电，抽了水，就可以种庄稼，经营饲料基地，可以发展牧业。我们也看到了吉兰太盐湖，是个人口比较密集的工业区，开始了现代化的化工建设，势头很好，走上了路子。尽管工农牧业发达的点还很少，而且刚刚开始，但集点成片，今后一定能建设成一个比较繁荣的地区，我感到高兴。

前几天我们在兰州开了一次会，想在西北搞一个大的课题，即准备建立一个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这个开发区包括1000公里黄河，1000万人口，包括两省一区（青海、甘肃、宁夏），实际上应该把内蒙古纳入进去，成为两省两区的协作。此事已经酝酿两年了。过去各省、区都各自为政，我管我的一省，你管你的一区。我们的行政区划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主要从财

* 本文是作者在阿拉善盟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

政观点来规划的。例如清朝，建立一个省，总是要一个好地方，搭配一个坏地方，江苏的苏南要搭配个苏北，苏北很穷，而和苏南相接的钱塘江流域却划给浙江，又搭配上荒凉的西部山区。实际上苏南、浙北是一个经济区，为了财政上的平衡分成两个省。总之，行政区划不是以地区经济为基础的，这种行政区划已不符合当前发展的需要了，甚至成了一个限制发展的东西。甘、宁争一个水坝，所谓大小之争，已争了 20 年，因之现在应当从整体发展出发进行各省、区之间的协作。

去年我访问了甘肃临夏和青海的海东两地，这两地在历史上本来是一个地区，一个经济区，叫做河州。河州原是一个农区和牧区互相交易的地方，是茶马贸易的中心。牧民要喝奶茶，茶在西藏是没有的，都要农区运去。农区需要马来耕地，要马来打仗，而马主要的产地是西北草原，农区和牧区之间的产品就在那里交易。我们后来搞了“以粮为纲”，这种贸易就断了，三中全会后，才重新放开，那里的商业马上就发达起来了。

这个地区还是回族的聚居区，回族是经商起家的。我建议青海的海东和甘肃的临夏，搞一个经济协作区，经过领导批准，协作区于去年这个时候成立的，这是第一步。西北两个省的主要领导人在临夏开了个会，会上一致认为，同一个经济区域里的开发工作必须大家一起来想办法进行协作，中央也支持这个观点。

今年在开人大、政协时，甘、青两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领导同志一起到民盟中央开了一个座谈会，在会上决定大家来搞一个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民盟组织了一次专题调查。前几天在兰州开了一个研讨会。

这块是个穷地方，可是水利和矿产资源很丰富，在这 1000 公里黄河上游从龙羊峡一直到青铜峡已经过测定，有些已经设计了的，可以搞 15 个水坝，也就是 15 个发电站。在中央的支持下，我们想办法一个一个地把它完成，以此作为开发大西北的基

本能源。另外，还有很多的矿藏，青海的盐，甘肃各种各样的金属矿，宁夏的煤，就可以用电转化为多种产品，在此基础上发展加工业，不要把原材料全部都送出去，而要就地加工，再加工。农牧业上，黄河水可以灌几百万亩。你们靠电抽地下水，开发了腰坝，就是很好的例子。但地下水干涸了怎么办？所以必须要工业跟上去，你来原料我制造，工业不容易有限制，农牧业限制很大，今年靠一点雨可以多养一些羊，明年雨不多饲料就不够吃了。需要把自然的局限打开，就要抓工业，搞原料加工，原料自己没有可以从外边引来，这样，这里的经济就稳了。这是一个设想，有待实现。

为什么这样想？为什么要西北有一个大的、更大的发展？那是因为这10多年来我们东部、沿海发展了工业，特别是乡镇工业，沿海的乡镇工业的产值已超过了农业，与国营工业差不多可以并驾齐驱，相等了。可是乡镇企业发展这么快，原料跟不上，这几年开始抢原料，原料十分紧张，价钱高，但它还可以赚钱，主要是管理得好。沿海地区发生了一个问题，原料怎么办？这里有，没开发，运不出去，再这样下去他们就要遇到更大的困难了。有人提出了个新的战略方针，就是从外国把原料搞进来，产品卖到外国去，叫大出大进，使我国沿海的工业不致被原料来源限制住。三来一补是我们广东珠江三角洲搞出来的一套经验，广东三角洲的乡镇企业与我们江苏不同，江苏主要是用自己的原料制造产品。比如说绸，是用自己出产的丝织成的，卖到国外去换外汇。广州不搞这个，它搞来料加工，你拿材料来我加工，成品由你去出卖，这就是“三来一补”。用这个经验来扩大我们沿海的经济发展战略，这是今年年初提出来的。

这个战略目前很需要，也很重要。长期来看，最多走到南朝鲜、台湾、香港、新加坡这四个小龙今天的地位。可是我们比它们强，应该超过它们，因为我们背后有个大的资源在西北，而它

们没有。台湾都是靠“三来一补”，它自身没有资源，都是向外商买了原料来加工，最后再到外国去销售。它们这几个小龙很厉害。我到美国去看，人家家里的用具，吃的、喝的、听的，都基本上是台湾的、南朝鲜的、新加坡的、香港的。当然最厉害的是日本，日本把美国都掏空了。美国不搞这一套，不搞这些小东西，主要靠资本输出和金融来控制。

我们分析四小龙的经验，看到了我们正逢到世界经济的又一次大调整。有机会可以用廉价劳动力去接受一些劳动密集型工业转移到我们中国来。

工业品的成本里工资很重要，越是经济发展了，生活水平高了，工人要的钱就多了。比如，江苏苏南的农民现在已有不愿意养蚕的了，因为种桑树养蚕太费劳动力。所以，农村里部分地方的养蚕副业就转移到了苏北，因苏北劳动力便宜。就是这个差额使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要向劳动力价值低的地方走，不是你要不要，这是经济规律。我们沿海地区有廉价劳动力，可是原料没有，怎么办？就要利用这个规律，采取“三来一补”的战略，这样，我们的工业发展就稳住了。目前香港的工业已在向广州扩散，台湾的工业也会向大陆转移。可是，我们工资马上也要涨，沿海工业发展起来，就形成一个西部与沿海地区的经济差距。为此，西北必须要趁这个机会发展工业，不能再等了。

我在甘肃跑了四年了，看到这地方大工业是有底子的，乡镇企业还刚刚开始。在定西有一个专员是苏南人，他到江苏去取经，带回来三个乡下的小姑娘，搞刺绣。她们一到定西，教会了几个村子的人绣花，这几个村都富起来了。甘南有个皮革厂到南京请了几个师傅，以前一张皮硬得要命，像你们的蒙古皮靴重得很，南京师傅教了他们把皮分割几层，皮变得软了，鞋也好了。这几个人教会了甘南工人，就回南京了，每年来指导一次，他们把新的办法、技术传授给了甘南藏族，这个厂子就发展起来了。

我说要用西部的资源、材料去帮助沿海地区；沿海地区要用技术力量、设备来支持西部。要请技术能人，不一定要请大工程师，请老师傅、小姑娘都行。不要都想搞大的，厂子带出来了，收入也大了。光搞大的，官可以富，民还是贫。临夏有一家请五六个江苏木工，家里老婆管饭，女儿管账，他自己出去联系销售，这个家没几年就变样了。

只搞大工业，老百姓是富不起来的。内蒙古的包头是个例子，我们做什么事都要先想到让老百姓富起来。比如腰坝，就是好榜样。每家有一块地，一块地就有 20 亩，我看了都眼红，我们江苏哪里有呀？如果工业净搞大工业，搞单打一，这个地方就不会富，盐场搞了很久了，几百年了，可老百姓很苦，穷人不少。必须要大小配合。我们需要搞大的，但光有大的没有小的，结果地方资源是出去了，从中央拨回来的钱只够养活政府里的工作人员，至多建起几个漂亮的大楼，老百姓分不到多少。这就是我们西北地区的毛病。过去我们在大西北投资很大，三线工业总共投了有 3700 亿元，但是这个地方还是摆脱不了贫困。所以需要一个大改革，要开放。我上个月到了宝鸡，宝鸡是重工业城市，他们就积极地搞军转民，大帮小，利用集中在大企业里的科技力量去发展乡镇企业。不要以为西北技术力量少，宝鸡技术力量从比例上说高于上海，职工中工程师一级的人员占到 15% 以上，但这个力量过去没有充分利用。最近这几年开放了。这一批技术力量发挥了作用，工资也高了，整个地区也富了。

总之，要看准一条，最后考验成功不成功，要看你这个地区发展起来了没有？人均收入是不是提高了，如腰坝人均 709 元，赶上了我们苏南。你们人均收入不低，但你们是吃资源优势，还没有很好地利用资源。你们不能满足于地广人稀，自然资源充足，这是低层次的富裕，还要发展加工工业。不要怕人多，如果每个人都增长经济价值，这里会更富。我还没见过这样一个地广

人稀的地方，连甘肃也不是这个样子。昨天坐车一路在草原上见到了一些骆驼和羊，但一个人也没看见，这也说明这里发展前途很大，要更快地发展起来。现在条件好了，改革开放带来了发展的机会，但要自己想办法，像过去那样按红头文件办事，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不行了，要自己用头脑，拿主意了。

对民族自治地方，国家已经有了很多政策，主要包含在民族区域自治法里，但现在大家还不会用它，没有看到这里边给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带来多少好处。前几天会上同志们就讲，政策里面也有含金量。民族区域自治法给了这么多发展的机会，下放了许多权力，就看你会用不会用。一个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工作人员中要有多少少数民族这一条大体上是普遍做到了，可是发展经济上的优惠条件却并不明白，也不懂怎样去落实。去年乌兰夫同志说：“我们这么多年争取了一个民族区域自治法，可是你们不用，不会用呀。”民族地区多少林木和其他原材料以最低的价钱卖给了国家，而用高价去买进工业品。这些地区怎么能富呢？大工厂、大企业建立起来了，但老百姓没得到好处。民族区域自治法里规定了开发少数民族地区的资源要给当地自治机关留成，用来发展地方经济。法律上规定留下原材料，马上可以用来发展当地的工业。这个法定了好多年了，先是区域自治条例，后来是纲要，一步一步升级，到现在民族区域自治法已公布了好几年了，可是呢，这个含金量大家看不出来。所以，你们要好好研究民族区域自治法，最近我听说你们几个自治区打算每年开个会，交流经验，我很赞成。

去年我去呼伦贝尔盟，满洲里靠近苏联，他们要到我们这边来买蔬菜等等。可是对外贸易的上级机关却不准他们去做这项生意。我说你为什么不去告他违背民族区域自治法，他们说不敢，实际上是可以拿出民族区域自治法去争的。这是绿灯，让你走，结果人家一挡，你就不敢走了。据说苏联、蒙古那里很需要土豆

和蔬菜，我们这里很多，他们主动到内蒙古来要了，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和他们搞贸易呢？如果你哪个部门不允许我搞，我可以依法告到国务院或全国人大，人大应当过问，任何部门都不能违法。所以你们要研究自治法里有多少“含金量”。这里面有许多有利于自治区经济发展的条件和权力，当你们认识到它的作用后你们就知道怎么行动了。

你们要大胆地依法办事，把民族区域自治法赋予你们的权力充分使用出来。思想要开放，少数民族地区要开放，不开放不行。不要怕人进来，但有一条，你要来，要对我们有好处，帮助我们发展生产力，而不是来白吃饭。特别是要请有技术的人进来，不一定非要有文凭的，有些老师傅、有专业技术的人正是你最需要的人才。我们江苏的乡镇企业都是上海的一些老技术工人帮助当地搞起来的，使江苏的经济发展名列全国第一。现在更有条件了。东部的发展已越来越趋于饱和，有许多技术要向西部转移。我认为你们应该千方百计地去找那些有专长的人才，出大价钱，把他们请来，帮助你们发展生产，实际上有的厂子有两三个人就行。只要他们来工作就可以，不一定让他们迁移户口。听说阿左旗请来河南的三位老师傅帮助办起了一个雕刻厂，现在有50多人，这很好，你们这里不是还有3000多待业青年吗？如能像这个雕刻厂一样，多请一些区外有专业技术的老师傅来开办一些能使千家万户都能受益的中小企业。问题不就解决了吗？这里需要我们各级领导首先转变观念，要发现和聘请那些有专业技能的人来。而不一定非强调要有什么文凭的人。当然，像你们阿盟要发展碱化工需要科技人员，这是另一个层次的事。现在你们更需要发展基础工业，要有一批中低级的专业技术人员来帮助你们发展成为一个区域性的经济整体。

我看首先是领导思想要开放，要国营企业、集体企业、个人企业一起上，特别要鼓励发展乡镇企业。现在形势发展很快，我

们有些跟不上，弄不好就会影响群众的积极性。要打破旧框框不断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就叫改革。要充分发动群众，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检验我们工作的标准。甘肃全省正在开展发展生产力标准的讨论，划清是非的界限，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们不从思想上搞清这个问题，就不能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

近8年来我一直对江苏进行观察。江苏各级干部基本上换了一茬。在那里，不懂经济不懂管理，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根本不能当什么长的，有不少乡长、村长都是农民企业家。

当然，少数民族地区也不能发展得太快，因为商品经济的观念差。在内蒙古，到别人家的蒙古包里吃东西，还是不掏钱的。这里人好客的背后有个道理。由于地域辽阔，荒无人烟，过客进入任何一个蒙古包都可以有吃有喝。这是因为你自己今后也要出去，也可能会遇到像他这样的情况，也希望能得到别人的帮助和接待。这样形成了风俗习惯，所以一下子让蒙族牧民去经商摆摊，还不适应，要慢慢来。你让他变得比汉族还快，不大可能。因此，在民族地区发展经济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些民族的民族意识会增强。这是由于与其他民族的经济差距造成的。这个差距使他们在心理上感到有一种压力，于是就形成民族意识，特别是生活在海南岛的少数民族，由于他们和农场住得很近，而生活差距太显明，这种民族意识反映得更突出。相比而言，在阿拉善盟这里，蒙族同志的民族意识反映不是太强烈的。但是，你们要注意不要把汉族与蒙族之间的发展差距搞得太大了。阿盟地广人稀，有很多的资源，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牧区还有很大发展潜力。在赤峰有个明显的农、牧矛盾的问题。而阿盟发展了饲草料基地，农、牧矛盾解决得就比较好。农业为牧业服务，解决了农、牧矛盾问题，内蒙古的民族矛盾就不突出了。但从今后阿盟的发展前景来看这个问题，还是应该引起注意的，将来引黄河水发展农业，发展工业，

肯定会进来不少汉人。怎么解决好与当地农、牧民的关系，要提前考虑到，把它解决好。因为我们是民族地区，这个问题事关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计，要认真对待。

同时，在阿盟要实现牧业现代化和蒙古族的现代化，不能满足于搞土特产贸易，单纯卖驼绒、羊绒，说得不好一点，那是一种殖民地经济。因此我认为应该有你们自己的小规模的一系列加工工业，将来把驼毛在多层次、多种类的企业里进行深加工，创造较大的经济社会效益。

这里有一点，就是你们始终不要忘记在实现牧业现代化的过程中要实现蒙古族的现代化。你们不能安于穿袍子、吃羊肉。要搞现代化的牧区，要对得起祖先，要把这里的蒙古族建立在现代化牧业的经济基础之上，要有自己的特点。我认为阿盟的蒙古族牧民可以把养骆驼、山羊作为自己经济发展的特点和优势。

阿盟是骆驼之乡，你们应该加强对骆驼的科研工作，把骆驼的品种改良好，在骆驼身上多做文章。并在发展牧业的基础上发展加工业。同时要紧紧抓住盐、煤等资源的开发利用，这就会形成你们地区民族经济的特点。如临夏的回族善于经商做生意，我在那里提出一个“以商带工”，让他们放手去干。任何民族都要找到自身生产的经济基础，而且这个经济基础要现代化，不能满足于传统的办法。

为了发展养驼业，我建议你们可以到养驼好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去考察一下，搞好品种改良，把养驼发展起来。你们应该和蒙古国进行经常的交流，学习人家先进的东西。要把这个作为你们蒙古族发展的经济基础，拿出办法来搞良种，增加生产加工，有了各种加工，这就靠得住了，不能满足于做官。少数民族做官不容易，做官责任大呀。

我最后再总的说一下：一是今后要进行深入的系统调查，由北大和内蒙古的研究机关合作进行。希望当地党政机关能支持，

给他们条件，把这几个点深入调查下去，不能走马看花。二是重视提高骆驼的素质，引进良种，加强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联系。最好派人出去，看一看，尽早组织些人去考察一下，把骆驼搞得胖胖的，壮壮的。三是昨天和晋盟长一同去看了驼绒厂，提出了如何去改进，打入国际市场，我们民盟中央社会服务部可以帮助和苏南的针织厂联系进行技术协助，甚至进一步搞联营。总之，要找出一条路子，发展养驼事业，使牧区的千家万户得到好处。碱厂做得很好，希望你们发展起来胜利完成。四是水的问题。把它包括在黄河上游多民族开发区的计划里，把内蒙古的阿盟包括进去成为二省二区的协作计划。

1988年7月18日

发挥民族优势脱贫致富^{* 1}

10年前，就是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的时候，我到这里来过一次，但没有到下面看。那次到了固原，可能因为太累了，医生说我是高原反应，把我送了回去。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在我的脑子里回族在少数民族里应该是走在前面的。但是老实说，这几年耳朵里听到的一直是和“扶贫”联系在一起。西海固在这方面真是有点名气了，“三西地区”嘛。这也好，把我吸引来了，因我是打定主意，哪里穷就到哪里去。我先去了定西，已经去了三次。这次来西海固，然后再去定西。在来这里之前，我不知道西海固原来是西吉、海原、固原三个地方的名字加起来的缩写，这次来看一看，时间很短，有什么说什么，不一定正确。我看到这么几点比较突出：

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里，回族的分布是很不平均的。过去我一直以为银川是这地区回族的中心，实际上银川的回族不算多。北部河套地区回族也不多，真正集中的是在南部地区，最集中的县是同心、泾源、海原。回族在西北另一个集中地区是甘肃的临夏。为什么回族会集中在那么几块比较大一点的地方，全国其他地方也有人数不多的集中点，形成“大分散小集中”的格局呢？要了解这个问题第一离不开历史，第二离不开民族特点。

你们回族是怎么形成的？你们的祖先是哪里来的？其实这个历史不算太远，回族最早是因为做买卖，从丝绸之路上的阿拉伯的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有不同的民族信奉它，主要在阿

* 本文是作者在宁夏西吉县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

拉伯半岛、中东、中亚一直到印度和南美。很早有一批信伊斯兰教的人通过丝绸之路来中国做生意。海运通了以后，由海路来了一批，主要在泉州、杭州、扬州这些沿海口岸做生意。但这时还没有形成回族。

到元朝的时候，成吉思汗西征，剽悍的蒙古人骑在马上——冲，冲到了中亚细亚。这些军队都是骑在马上的牧民，随身带着粮食。粮食吃完怎么办？只好打到哪里，抢到哪里。可是部队越来越大，人越来越多，老是抢不行啊，他们就要搞一个后勤供应部队了。成吉思汗的宗教政策是很开明的，不论信什么宗教，只要不抵抗他，都能存在。如果反抗他就杀。但是有几种人不杀：商人、技术工人，像木匠、铁匠等不杀，学者也就是知识分子不杀。他把这些人组织起来为他服务，搞后勤，这就是“探马赤军”。到忽必烈时，出兵攻打南宋，这时他已经带有大批后勤部队为他服务。占领了中国后，这部分军队规定，不打仗的时候就让这些入自己耕田放牧，打仗时就随军出征，他们主要分布在沿黄河一直到云南这一带。其外，军队所到之处，都有一部分人留下来，人数不多。这样就形成了全国广大地区都有回族的一个个大大小小的聚居点。

这些回族团结在一起，坚持下来，这是很不容易的。那时候在西北黄河上游地区回汉比例有人说是回七汉三。可是到了清代出兵西北，一路屠杀回回，杀得很惨。甘肃正是从内地到新疆的一条军事通道。这么一来，这里的人口发生了变动。大批汉人从内地冲了进来，把中间这条通道冲开了，只留下两头，一头是甘肃的临夏，一头就是这里的宁夏。那时候这里已经荒芜，是个缺水干旱的贫困地区。有人说左宗棠是想把回民都赶到这里来，用自然淘汰的手段镇压回回的反抗。我这样讲对不对，请历史学家研究。

回族的老祖先能够进入中国并站稳脚跟，是靠他们先人传下

的本领，就是为蒙古远征军服务的善于经商，善于管理的素质。对于农业他们是不擅长的。为什么呢？这里有一个宗教问题，回族不吃猪肉，然而养猪同农业是分不开的，因为猪可以吃人吃剩下的东西，称作副业；而羊、马要吃草，属于牧业。因此回族一直存在一个不适应中国农业经济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回族很少搞农业，而长于经商，并搞屠宰业。在西北较大的聚居区不能不搞农业，但是搞不过汉人。西海固地区就是这个情形。但是他们搞农业的同时还担负着农业地区和牧业地区之间的贸易工作，这是历史上最大的贸易。

中国是一个小农经济的国家，是以自给自足的家庭作为经济细胞的，他们不需要发展贸易。但是有几样东西是必须用农产品去交换来的。以华北地区来讲，那里需要马，因为马是耕地的动力，南方可以用牛，北方要用马，打仗也需要马。而牧区也不能只吃肉，也需要一点粮食，特别是可以帮助消化的茶需要量很大。所以从经济上看，农牧区是不可能绝缘的，要交换，要流通。这个工作是要人去做的，谁在做这个工作呢？在内蒙古、新疆、青藏高原这条丝绸之路上做生意的，很多是回族。

回族做生意有许多长处和方便的地方，做生意要有市场，要了解信息。出门要有地方住宿，要吃饭，这些问题都是很难解决的。但是在回族之间就很好办，只要按伊斯兰的方式问候几句，真主保佑，几句话就可以接上头，而且互相信任。靠着一个信仰、一个真主就可以到处跑。所以我们说宗教这个东西，不能简单地说是信仰，它还有其他的作用。这里面有含金量。

汉人这方面就不太行，汉人主要搞农业，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他们最讨厌做生意的人，认为“无商不奸”，生意人是占我的便宜，刮我的钱。因为自给自足，所以对贸易产生一种对抗力，商业观念格格不入。汉人因之一般说来缺乏商品经济头脑。这样两个民族在一起就容易产生摩擦和矛盾，这是回、汉间隔阂

的一个原因。

我们可以看出来，回族在全国的分布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天下没有偶然的事情。这次我到同心一看就说同心很像甘肃的临夏。后来我才知道，同心有 80% 是回族，为什么宁夏的同心和甘肃的临夏在这样漫长的历史中能够坚持下来，形成据点，这里一定有一个相同的基础，那就是农、牧之间的贸易。同心可能在历史上是内地向陕西、内蒙古去的交通和贸易中心。我在包头的时候，看到那地区以前的运输是靠黄河，所有的木材都从包头起岸。包头的码头多是回族经营的，这里有一个比较大的回族区。这说明当时黄河上游的商业活动是靠回族。可是河套地区回族就不算多，很清楚，因为这是个农业区，“黄河百害，唯富一套”嘛。从秦、汉以来汉人就进入这一地区。汉人凡是见到农业好发展的地方就占住不走，搞不了农业的地方他们是不去的。内蒙古河套地区汉人就是多，总之在农业上同汉人争，回族是争不过的，这不是他们的优势。

我去临夏，一路上一家一家地看，只要是房子比较好的人家，我就叫车停下来进去访问。有的房子很考究，雕梁画栋，进去一问都是回族，他们都是这 5 年里做生意富起来的。他们跑西藏、青海，发了财，起了家。这些人实在能吃苦，从临夏跑拉萨昼夜兼程，轮班开车。三天三夜，一辆卡车跑一趟赚 1 万元。啤酒在兰州买只值几角钱，到拉萨可以卖一元半，价格差额很大。据说到前年为止，已经有 1000 多辆私人卡车来往在西藏、青海高原。

回族会做生意，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在临夏见到有一个人穷得没办法，他就拿了剩下的麦子到街上卖了。然后到集上买回一些毛皮，叫老婆缝成袍子。他一个人提了两个包包到藏族地区去卖。开始跑得不太远，只到阿坝、康定一带。藏民一看袍子很好，问他多少钱。他心里盘算买皮子花了 20 元，就开口要卖 80

元。想不到马上就卖掉了。第二个人向他来买，他就提价卖了100元。其实100元的东西还没有80元的好。就是这样开始他学会做生意。到我见到他时，他家毛皮已经存了一个房间，但是还是由老婆、女儿用手工缝成袍子再拿出去卖。其实大可以买个缝纫机，搞个小作坊，然后再找几个帮工，慢慢可以发展成个小工厂了。这个地方前途很大。所以我说，国家可以不花一分钱，只要有一个好政策，一个开放的政策就行。当然光有商业还不够，必须联上工业，以商促工。

甘肃的临夏同青海的海东，也就是古时候的河州，去年联合了起来，形成一个经济协作区，发展成一个商业中心，面向青藏高原。一面搞流通，做生意，一面生产制造青藏高原上牧民需要的日用品，发展小工业。牧民需要像电筒、收音机、风力发电机这些东西。牧区很富啊，他们卖一头牛、一群羊一下子就有钱了。我们供应他们日用品，他们不用再到上海去买这些商品了。我们可以在这里制造嘛，这就是以商促工。这样在打通、开发青藏高原方面，回族对我们中华民族的贡献就很了不起了。

我们的面前还有一个大市场，就是向西。从我们这里向东的话，要碰到一道道的困难。一出去就碰到北京、天津，再往南是上海。他们比你们厉害，挡在那里。再过去是日本人，他们连美国市场都占领了。从这里向东去搞外贸要打通多少屏障啊！所以说你们眼睛要向西看，你们要上西天取钱去。从这里一出国门是巴基斯坦、阿富汗，还有产油国家伊朗、伊拉克、科威特等，这些石油国家很有钱，市场大得很。西边还包括苏联的几个共和国。这些国家都信奉伊斯兰教。他们普遍地感到轻工业产品不足，电子表、收录机、压力暖瓶对他们来说都是宝贝。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制造。在这里可以开辟一个轻工业基地，搞出一个大伊斯兰市场。所以我们说应该搞成两个外向型的大循环，一个是沿海，面向东；另一个是大西北，面向西。

当然要在这里搞外向型企业，还有很多困难。去年我去访问内蒙古的满洲里。它的对面是苏联，那里没有蔬菜，没有土豆、西红柿，我们这里很多。苏联那边想来购买，但是这边却又不肯卖出去，说是上面不批，不准搞对外贸易。今年好了，呼伦贝尔成了个试验区，这样一来满洲里的门就打开了，蔬菜出去换回来的都是好东西。你们也要向西打主意，这个门一定会开的。你们这里不仅有小市场，还有那么一个大市场，前途是广阔的！但是我们要把流通部队组织起来，发挥回族的优势，带动汉族跟上来，搞成一个向西发展的流通队伍。

1988年7月23日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我想以这次香港中文大学邀请我发表 Tanner 讲演的机会，提出我多年来常在探索中的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问题向各位学者请教。请容许我坦率地说我对这个格局的认识是不够成熟的，所以这篇讲演只能说是我对这问题研究的起点，并没有构成一个完整的见解。

为了避免对一些根本概念作冗长的说明，我将把中华民族这个词用来指现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 11 亿人民。它所包括的 50 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它们虽则都称“民族”，但层次不同。我用国家疆域来做中华民族的范围并不是很恰当的，因为国家和民族是两个不同的又有联系的概念。我这样划定是出于方便和避免牵涉到现实的政治争论。同时从宏观上看，这两个范围基本上或大体上可以说是一致的。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我这篇论文将回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这也许是世界各地民族形成的共同过程。中华民族这个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还有它的特色：在相当早的时期，距今 3000 年前，在黄河中游出现了一个由若干民族集团汇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称为华夏，像滚雪球一般地越滚越大，把周围的异族吸收进入了这个核心。它在拥有黄河和长江中下游的东亚平原之

后，被其他民族称为汉族。汉族继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而日益壮大，而且渗入了其他民族的聚居区，构成起着凝聚和联系作用的网络，奠定了以这个疆域内许多民族联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基础，成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经过民族自觉而称为中华民族。

这是一幅丰富多彩的历史长卷，有时空两个坐标，用文字来叙述时有时难于兼顾，所以在地域上不免有顾此失彼、方位错乱，时间上不免有前后交叉、顺序倒置的缺点。让这篇论文作为我在这个学术领域里的一次大胆的尝试吧。

一、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

任何民族的生息繁殖都有其具体的生存空间。中华民族的家园坐落在亚洲东部，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太平洋西岸诸岛，北有广漠，东南是海，西南是山的这一片广阔的大陆上。这片大陆四周有自然屏障，内部有结构完整的体系，形成一个地理单元。这个地区在古代居民的概念里是人类得以生息的、唯一的一块土地，因而称之为天下，又以为四面环海所以称四海之内。这种概念固然已经过时，但是不会过时的却是这一片地理上自成单元的土地一直是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

民族格局似乎总是反映着地理的生态结构，中华民族不是例外。他们所聚居的这片大地是一块从西向东倾侧的斜坡，高度逐级下降。西部是海拔 4000 米以上的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东接横断山脉，地势下降到海拔 1000 - 2000 米的云贵高原、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其间有塔里木及四川等盆地。再往东是海拔千米以下的丘陵地带和海拔 200 米以下的平原。

东西落差如此显著的三级梯阶，南北跨度又达 30 个纬度，

温度和湿度的差距自然形成了不同的生态环境，给人文发展以严峻的桎梏和丰润的机会。中华民族就是在这个自然框架里形成的。

二、多元的起源

生存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最早的情况是怎样的？这个问题涉及了中华民族的来源。任何民族都有一套关于民族来源的说法，而这套说法又常是用来支持民族认同的感情，因而和历史上存在的客观事实可以出现差错。关于中华民族的起源过去长期存在着多元论和一元论、本土说和外来说的争论，直到本世纪 50 年代，特别是 70 年代以来，由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我们才有条件对中华民族的早期历史做出比较科学的认识。

在中华大地上已陆续发现了人类从直立人（猿人）、早期智人（古人）、晚期智人（新人）各进化阶段的人体化石，可以建立较完整的序列。说明了中国这片大陆应是人类起源的中心之一。

这些时代的人体化石又分布极广，年代最早的元谋人（距今约 170 万年）是在云南发现的。其他猿人的化石已在陕西蓝田县、北京周口店、湖北郧县及郧西县、安徽和县有所发现。生活在 10 万年 - 4 万年以前的古人化石，已在陕西大荔县、山西襄汾县丁村、山西阳高县许家窑、辽宁营口金牛山、湖北长阳县、安徽巢县及广东曲江县马坝等处发现。生活在距今 4 万年 - 1 万年以前的新人化石已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山西朔县峙峪、内蒙古乌审旗、辽宁建平县、吉林延边州安图县、黑龙江哈尔滨市、广西柳江县、贵州兴义县、云南丽江县、台湾台南县左镇有所发现。我列举这许多地名目的是要指出在人类进入文化初期，中华大地上北到黑龙江，西南到云南，东到台湾都已有早期人类

的活动，他们并留下了石器。很难想像在这种原始时代，分居在四面八方的人是出于同一起来源，而且可以肯定的是这些长期分隔在各地的人群必须各自发展他们的文化，以适应如此不同的自然环境。这些实物证据可以否定有关中华民族起源的一元论和外来说，而肯定多元论和本土说。

即使以上的论断还不够有说服力的话，考古学上有关新石器时代的丰富资料更有力地表明中华大地上当时已出现地方性的多种文化区。如果我们认为同一民族集团的人大体上总得有一定的文化上的一致性，那么我们可以推定早在公元前 6000 年前，中华大地上已存在了分别聚居在不同地区的许多集团。新石器时期各地不同的文化区可以作为我们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起点。

三、新石器文化多元交融和汇集

近年来，我国各省区发现新石器文化遗址总共有 7000 多处，年代从公元前 6000 年起延续到公元前 2000 年。根据考古学界的整理和研究，对各地文化区的内涵、演进、交融和汇集，已有比较明确的轮廓，尽管有不少专题还有争论。我在这里不可能详细介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只能就中原地区的有关资料择要一述。

新石器时期黄河中游和下游存在东西相对的两个文化区：

黄河中游新石器文化的序列是前仰韶文化（前 6000 - 前 5400）- 仰韶文化（前 5000 - 前 3000）- 河南龙山文化（前 2900 - 前 2000）。继河南龙山文化的可能是夏文化。因仰韶文化以彩绘陶器著名，曾被称为彩陶文化。仰韶文化分布以渭、汾、洛诸黄河支流域的中原地区为中心，北达长城沿线，南抵湖北西北部，东至河南东部，西达甘青接壤地区。但在河南龙山文化兴起前它

在黄河中游地区已经衰落了。

黄河下游则另有一序列的文化和黄河中游的文化不同。它们 是青莲岗文化（前 5400 - 前 4000）- 大汶口文化（前 4300 - 前 2500）- 山东龙山文化（前 2500 - 前 2000）- 岳石文化（前 1900 - 前 1500）。继岳石文化的可能是商文化。龙山文化以光亮黑陶著名，曾被称为黑陶文化。

公元前 3000 年当仰韶文化在黄河中游地区突然衰落时，黄河下游的文化即向西扩张，继仰韶文化出现的是河南龙山文化。虽则考古学者认为河南和山东的龙山文化具有地区性的区别，但中游地区在文化上受到下游文化的汇聚和交融是明显的。

长江中下游在新石器时代同样存在着相对的两个文化区。长江下游的文化区是以太湖平原为中心，南达杭州湾，西至苏皖接壤地区。其文化序列大体是河姆渡文化（前 5000 - 前 4400）- 马家浜·崧泽文化（前 4300 - 前 3300）—良渚文化（前 3300 - 前 2200）。良渚文化大体和河南龙山文化年代相当，文化特征也与山东龙山文化有密切的联系。

长江中游新石器文化以江汉平原为中心，南包洞庭湖平原，西尽三峡，北抵河南南部，其文化序列分歧意见较多，大体上是 大溪文化（前 4400 - 前 3300）—屈家岭文化（前 3000 - 前 2000）—青龙泉文化（前 2400），因其受中原龙山文化的影响亦称湖北龙山文化。长江中游和下游相同的是在后期原有文化都各自受黄河下游龙山文化的渗入，而处于劣势地位。

关于新石器时代北方的燕辽文化区，黄河上游文化区及华南文化区留待下面讲到这些地区时再说。

上面所述新石器时代中原两河流域中下游这个在生态条件上基本一致的地区的考古发现，已可以说明中华民族的先人在文明曙光时期，从公元前 5000 - 前 2000 年之间的 3000 年中还是分散聚居在各地区，分别创造他们具有特色的文化。这是中华民族格

局中多元的起点。

在这多元格局中，同时也在接触中出现了竞争机制，相互吸收比自己优秀的文化而不失其原有的个性。例如，在黄河中游兴起的仰韶文化，曾一度向西渗入黄河上游的文化区，但当其接触到了比它优秀的黄河下游山东龙山文化，就出现了取代仰韶文化的河南龙山文化。考古学者在龙山文化前加上各个地方的名称表示它们依然是从当地原有文化中生长出来的，实际上说明了当时各族团间文化交流的过程，从多元之上增加了一体的格局。

四、凝聚核心汉族的出现

中国最早的文字史料现在可以确认的是商代的甲骨文，而相传由孔子编选的《尚书》还记载一些夏商文件和上古传说。早年的史书中，把上古史编成三皇五帝的历史系统。这些文字史料已有部分可以和考古资料相印证，使我们对新石器时代末期到铜器时代的历史能有较可靠的知识，特别是 80 年代初期发掘的河南登封王城岗夏代遗址，一般认为即是夏王朝初期的“阳城”遗址，夏代历史已从神话传说的迷雾中得以落实。商代历史有甲骨文为据，周代历史有钟鼎文为据，相应的后世的文字记载都可得而考。而夏、商、周三代正是汉族前身华夏这个民族集团从多元形成一体的历史过程。

河南夏代“阳城”遗址所发现的文物显示了它是继承了新石器时代河南龙山文化，发展到了铜器时代。从黄河中下游遗留的文物中也可以看到这些地区都早已发展了农业生产，这和夏禹治水的传说（河南龙山文化的中晚期）可以联系起来，表明了这地区早期居民当时生产力的发达水平。我们还记得河南的龙山文化正是在仰韶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山东的龙山文化而兴起的。

所以可以说华夏文化就是以黄河中下游不同文化的结合而开始的。

传说的历史中在禹之前还有尧、舜和神话性的始祖黄帝。留下的传说大多是关于他们向四周被称为蛮夷戎狄的族团的征伐。黄帝曾击败过蚩尤和炎帝，地点据说都在今河北省境内。据《史记》所载，舜又把反对他的氏族部落放逐到蛮夷戎狄中去改变后者的风俗，也可以说就是中原居民和文化的扩张。到禹时，如《左传》所载：“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禹贡》将这时的地域总称为“九州”，大体包括了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下游的地区，奠定了日益壮大的华夏族的核心。

继夏而兴起的是商。商原是东夷之人，而且是游牧起家的。后来迁泰山，再向西到达河南东部，发展了农业，使用畜力耕种。农、牧结合的经济使它强大起来，起初臣属于夏，后来取得了统治九州的权力，建立商朝，分全国为中东南西北五土。《诗经·商颂》有：“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商代疆域包括今河南、山东、河北、辽宁、山西、陕西、安徽以及江苏、浙江的一部分，可能还有江西、湖南及内蒙古的某些地方。

继商的是周。周人来自西方，传说的始祖是姜嫄，有人认为即西戎的一部分羌人，最初活动在渭水上游，受商封称周。它继承了商的天下，又把势力扩大到长江中游。《诗经·北山》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它实行宗法制度，分封宗室，控制所属地方；推行井田，改进农业，提高生产力。西周时松散联盟性质的统一体维持了约300年，后来列国诸侯割据兼并，进入东周的春秋战国时代。这时的统一体之内，各地区的文化还是保持着它们的特点。直到战国时期，荀子还说：“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夏是指中原一带的一个核心，不论哪个地方的人，到了越就得从越，到了楚就得从楚，可见楚和越和夏还有明显的差别。

无可否认的是，在春秋战国的 500 多年里，各地人口的流动，各族文化的交流，各国的互相争雄，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文化高峰。这 500 年也是汉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的育成时期，到秦灭六国，统一天下，而告一段落。

汉作为一个族名是汉代和其后中原的人和四周外族人接触中产生的。民族名称的一般规律是从“他称”转为“自称”。生活在一个共同社区之内的人，如果不和外界接触不会自觉地认同。民族是一个具有共同生活方式的人们共同体，必须和“非我族类”的外人接触才发生民族的认同，也就是所谓民族意识，所以有一个从自在到自觉的过程。秦人或汉人自认为秦人或汉人都是出于别人对他们称作秦人或汉人。必须指出，民族的得名必须先有民族实体的存在，并不是得了名才成为一个民族实体的。

汉族这个名称不能早于汉代，但其形成则必须早于汉代。有人说：汉人成为族称起于南北朝初期，可能是符合事实的，因为魏晋之后正是北方诸族纷纷入主中原的十六国分裂时期，也正是汉人和非汉诸族接触和混杂的时候。汉人这个名称也成了当时流行的指中原原有居民的称呼了。

当时中原原有的居民在外来的人看来是一种“族类”而以同一名称来相呼，说明了这时候汉人已经事实上形成了一个民族实体。上面从华夏人开始所追溯的 2000 多年的历史正是这个民族诞生前的孕育过程。

汉族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形成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中产生了一个凝聚的核心。

五、地区性的多元统一

秦始皇结束战国时代地方割据的局面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件划

时代的大事，因为从此统一的格局成了历史的主流。当然所统一的范围在秦代还只限于中原，就是黄河长江中下游的平原农业地区，而且这个统一的格局也是经过长时期逐步形成的。在春秋战国时代各地方的经济都有所发展，他们修筑道路，发展贸易。战国时的列国通过争雄称霸已把中原这片土地四通八达地基本上构成了一个整体。秦始皇在这基础上做了几件重要的事，就是车同轨，书同文，立郡县和确立度量衡的标准，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为统一体立下制度化的规范。

车同轨和度量衡的标准化是经济统一的必要措施。传统的方块字采用视觉符号把语和文分离，书同文就是把各国的通用符号统一于一个标准，也就是把信息系统统一了起来，在多元语言上罩上一种统一共同文字。这个信息工具至今还具有生命力。废封建、立郡县，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政体，这个政体延续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关于中原地区的统一我不再多说。在这里要指出的，这只是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又一步。第一步是华夏族团的形成，第二步是汉族的形成，也可以说是从华夏核心扩大而成汉族核心。

我说秦代的统一还只是中华民族这个民族实体形成的一个步骤，因为当时秦所统一的只是中原地区，在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里只占一小部分，在三级地形中只是海拔最低的一级，而且还不是全部。中原的周围还有许多不同的族团也正在逐步分区域地向由分而合的统一路上迈进。让我先讲北方的情况。

到目前为止，我国考古学的工作主要还是集中在中原地区，因此我们对中原周围地区的上古历史相对地说还是知道得很少。陈连开教授提出过一个值得重视的观点，我的另一位同事谷苞教授经过几十年在西北的实地考察，也提出了同一观点，他们都认为和秦汉时代中原地区实现统一的同时，北方游牧区也出现了在匈奴人统治下的大一统局面。他们更指出，南北两个统一体的汇

合才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进一步的完成。我同意这个观点。

南北两大区域的分别统一是有其生态上的基础的。首先统一的中原地区是黄河长江中下游的平原地区，从新石器时代起就发生了农业文化。黄河中下游的新石器遗址中已找到粟的遗存，长江中下游的新石器遗址中已找到稻的遗存。从夏代以降修水利是统治者的主要工作，说明了灌溉在农业上的重要地位。小农经济一直到目前还是汉族的生活基础，至今还没有摆脱汉族传说性的祖先神农氏的阴影。

这一片平原上的宜耕土地在北方与蒙古高原的草地和戈壁相接，在西方与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相连。这些高原除了一部分黄土地带和一些盆地外都不宜耕种，而适于牧业。农业和牧业的区别各自发生了相适应的文化，这是中原和北方分别成为两个统一体的自然条件。

划分农、牧两区的地理界线大体上就是从战国时开始建筑直到现在还存在的长城。这条战国秦汉时开始修成的长城是农业民族用来抵御畜牧民族入侵的防线。农民占于守势而牧民处于攻势。这也是决定于两种经济的不同性质。农业是离不开土地的，特别是发展了灌溉农业，水利的建设更加强了农民不能抛井离乡的黏着性。农民人口增长则开荒辟地，以一点为中心逐步扩大，由家而乡，紧紧牢守故土，难得背离，除非天灾人祸才发生远距离移动。

牧业则相反。在游牧经济中，牲口靠在地面上自然生长的草得到食料，牲口在草地上移动，牧民靠牲口得到皮、毛、肉、乳等生活资料，就得跟牲口在草地上移动，此即所谓“逐水草而居”。当然游牧经济里牲口和人的移动也是有规律的，但一般牧民不能长期在一个地方定居，必须随着季节的变化，在广阔的草原上转移。牧民有马匹做行动的工具，所以他们的行动也比较迅

速，集散也比较容易。一旦逢遭灾荒，北方草原上的牧民就会成群结队，南下就食农区。当双方的经济和人口发展到一定程度，农、牧矛盾就会尖锐起来，牧民成为当时生活在农区的人的严重威胁。对这种威胁，个体小农是无法抗拒的，于是不能不依附于可以保卫他们的武力以及可以动员和组织集体力量来建筑防御工程的权力。这也是促成中央集权政体的一个历史因素。长城表现了这一个历史过程。

牧区经济的发展同样需要有权力来调处牧场的矛盾，需要能组织武力进行自卫或外出夺取粮食、财物和人口。我们对于北方草原上民族的早期历史知道得很少。当在汉代的史书中看到有关匈奴人较详细的记载时，他们已经是北方的强大力量，拥有长城之外东起大兴安岭，西到祁连山和天山这广大地区，就是这里所说北方的统一体。到汉初已形成“南有大汉，北有强胡”的局面。

实际的历史过程不可能这样简单。考古学者从 30 年代起已陆续在长城外的内蒙古赤峰（昭乌达盟）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这地区的先民已过着以定居农业为主，兼有畜牧渔猎的经济生活，近年又发现了距今 5000 年前的祭坛和“女神庙”，出土的玉器与殷商玉器同出一系。铜器的发现更使我们感到对东北地区早期文化的认识不足，而且正是这个东北平原和大兴安岭及燕山山脉接触地带，在中国历史上孕育了许多后来入主中原的民族。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下面再提。

中原和北方两大区域的并峙，实际上并非对立，尽管历史里记载着连续不断的所谓劫掠和战争。这些固然是事实，但不见于记载的经济性相互依存的交流和交易却是更重要的一面。

把游牧民族看成可以单独靠牧业生存的观点是不全面的；牧民并不是单纯以乳肉为食，以毛皮为衣。由于他们在游牧经济中不能定居，他们所需的粮食、纺织品、金属工具和茶及酒等饮

料，除了他们在大小绿洲里建立一些农业基地和手工业据点外，主要是取给于农区。一个渠道是由中原政权的馈赠与互市，另一个渠道是民间贸易。

贸易是双方面的，互通有无。农区在耕种及运输上需要大量的畜力，军队里需要马匹，这些绝不能由农区自给。同时农民也需牛羊肉食和皮毛原料。在农区对牧区的供应中，丝织物和茶常是重要项目。因而后来把农牧区之间的贸易简称为“马绢互市”和“茶马贸易”。在北方牧区的战国后期及汉代墓葬中，发现很多来自中原地区的产品，甚至钱币。

在日益密切的相互依存和往来接触中，靠近农区的那一部分匈奴牧民于公元1世纪已逐步和附近的汉族农民杂居混合，进入半农半牧的经济。公元前1世纪中叶这些匈奴人在汉武帝的强大压力下南北分裂后被称为南匈奴的，他们后来并没有跟北匈奴远走中亚，而留原地，即今内蒙古境内，并且逐渐进入关内和汉人杂居混合。

在战国到秦这一段历史时期里，农、牧两大统一体之争留下了长城这一道巨大的工程，这是表示了早期牧攻农守的形势。但是当农业地区出现的统一体壮大后，从汉武帝开始就采取了反守为攻的战略。这个战略上的改变导致了汉族向西的大扩张，就是在甘肃西部设置河西四郡：敦煌、酒泉、武威、张掖，移入28万人，主要是汉族。

河西四郡是黄土高原通向天山南北的走廊。这个地区的平原地带降水量是很少的。但是祁连山山区降水量较多，而且有积雪融化下流，供水较足可以灌溉农田。这是汉族能大量移入开荒种田的经济基础。这条走廊原来是乌孙和月氏的牧场，匈奴把他们赶走后占领其地，并和羌人联合起来，在西方包围了汉族。汉武帝于公元前122年迫降该地区的匈奴，置四郡移汉人实边，把这个包围圈打出了一个缺口，即所谓“隔绝羌胡”。这条走廊也给

汉代开辟西域铺下通道。后来汉代又利用这条通道，联合天山以南盆地里的被匈奴欺压掠夺的农业小国和被匈奴放逐到中亚的乌孙，形成了对匈奴的反包围，并且击败匈奴。

从蒙古高原经天山北路直到中亚细亚是一片大草原，这对游牧民族来说是可以驰骋无阻的广场。游骑飘忽，有来有去，牧场的争持，你占我走，你走我占，所以这个地区的民族是时聚时散的。哪个部落强大了就统治其他部落，而且以其名称这广大草原上的牧民。所以在史书上所见的是一连串在北方草原上兴起的族名：匈奴之后有鲜卑、柔然、突厥、铁勒、回鹘等等。他们有时占领整个大草原，有时只占其中的一部分，最后是蒙古人，其势力直达西亚。

曾在这片草原上崛起的民族，许多还有其后裔留在这个地区，但又多和其他民族结合，其杂其混、其分其合，构成很复杂的历史过程，我们在此毋庸细述。大体上说，新疆现有民族中有五个少数民族所说的语言属于突厥语族。他们是维吾尔、哈萨克、乌孜别克、塔塔尔、柯尔克孜。他们都是早期就在这片大草原上活动过的民族的后裔。

六、中原地区民族大混杂、大融合

汉族形成之后就成为了一个具有凝聚力的核心，开始向四周的各族辐射，把他们吸收成汉族的一部分。紧接汉魏在西晋末年黄河流域及巴蜀盆地出现了“十六国”，实际上有20多个地方政权，大多是非汉民族建立的。在这大约一个半世纪（304 - 439）正是这个地区民族大杂居、大融合的一个比较明显的时期，是汉族从多元形成一体的一幕台前的表演，而这场表演的准备时期早在汉代开始，匈奴人的“归附”即是其中的一幕。

在这些地方政权中，匈奴人建立的有3个，氐人建立的有4个，羯人建立的有1个，鲜卑人建立的有7个，羌人建立的有1个，汉人建立的有3个。它们所占的地区遍及今陕西、山西、河北、河南、甘肃、宁夏及四川、山东、江苏、安徽、辽宁、青海、内蒙古等省区的一部分。实际上是中原地区的全部都曾波及。

北方及西方非汉民族在上述地区建立地方政权表明有大量的非汉人进入了这个地区，由于混而未合，所以这时“汉”作为民族标记的名称也就流行，而且由于汉人的政治地位较低，“汉人”也成为带有歧视的称呼，但是进入华北地区的非汉人，一旦改牧为农，经济实力最终还是要在社会地位上起作用。在这个时期就开始有关于“胡人改汉姓”的记载，到了统一华北的北魏还发生了改复姓为单姓的诏命，也就是要胡人改从汉姓。有人统计，《魏书》“官氏表”中126个胡姓中已有60个不见于官书。杂居民族间的通婚相当普遍，甚至发生在社会上层。非汉族的政治地位又不易持久，你上我下，我去你来，结果都分别吸收在汉人之中。汉族的壮大并不是单纯靠人口的自然增长，更重要的是靠吸收进入农业地区的非汉人，所以说是像滚雪球那样越滚越大。

经过南北朝的分裂局面，更扩大了中原地区重又在隋、唐两代统一了起来。唐代的统治阶级中就有不少是各族的混血。建国时，汉化鲜卑贵族的支持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之他们在统治集团中一直处于重要地位。有人统计，唐朝宰相369人中，胡人出身的有36人，占1/10。《唐书》还特辟专章为蕃将立传。沙陀人在唐末颇为跋扈，在继唐而起的五代中后唐、后晋、后汉三朝都是沙陀人建立的，以中兴唐朝出名的庄宗本身就是出自沙陀人。所以有唐一代名义上是汉族统治，实际上是各族参与的政权。从唐到宋之间的近500年的时间里，中原地区实际上是一个

以汉族为核心的民族熔炉。许多非汉族被当地汉人所融合而成为汉人。当然融合的过程是复杂的，但结果许多历史有记载的如鲜卑、氐、羯等族名逐渐在现实生活中消失了。

唐代不能不说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高峰。它的特色也许就是在它的开放性和开拓性。这和民族成分的大混杂和大融合是密切相关的。

七、北方民族不断给汉族输入新的血液

如果北宋可以说经过了五代的分裂局面，中原又恢复了统一，它的力量究竟是微弱的。它的北方，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在公元 916 年兴起了一个强大的民族契丹，作为中国的一个王朝称辽，它的疆域从黑龙江出海口到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中部，南面从天津，经河北霸县到山西雁门关一线与北宋对峙。统治了 210 年才为另一北方民族女真所灭。发源于白山黑水的女真人，公元 1115 年立国称金。1125 年灭辽，接着灭北宋，先后在今北京和开封建都，疆域包括辽的故土并向西扩张到陕西、甘肃与西夏接界，向南扩张达秦岭和淮河与南宋接界。宋只有 300 年的历史，这期间给中原北部这个地区混杂居住的许多民族成分有一个消化和融合的阶段，并为汉族向南扩张积聚了力量。这是后话。

这里应当讲一讲大兴安岭以东的松辽平原。这个平原和广大草原之间当时存在着一个大兴安岭的屏障，广阔的森林可能挡住了游牧民族的东进。看来有一些游牧民族可以溯源于这个森林里的狩猎民族。

最近我到大兴安岭林区实地观察，在呼盟阿里河镇西北 10 公里见到林区里的一个山洞，称嘎仙洞，洞里还保留着公元 443 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遣使树立的用以纪念他祖先的石刻祝文。这

表明鲜卑族早期曾居住在大兴安岭的森林里。鲜卑族后来从山区西南迁到呼伦池的草原上，然后继续向西南迁，徙居阴山河套之间，形成鲜卑拓跋部，其中一部分进入青海，大部分则在4世纪初活动在今内蒙古和山西大同地区。公元386年建立魏国，439年统一中原北部地区。

建辽国的契丹人原是活动在辽河上游的游牧民族，曾臣服于唐，916年阿保机称帝。建国前后都有大批汉人迁入，农业和手工业得到发展，但被金灭后，契丹人多与汉人及女真人相融合。

建立金国的女真人也是在松辽平原上兴起的，他们走上与契丹人由弱到强，由强而亡的同样道路。当他们占有中原北部地区后，曾把所征服的地区的居民用汉人、燕人、南人等名称和女真人相区别，但是后来也有许多女真人开始改用汉姓，见于《金史》记载的有31姓，而且他们的改姓并非出于诏令，而是民间的自愿。尽管改用汉姓并不表示他们已完全成了汉人，只能表明他们已不再抗拒汉化了。

不论是契丹人还是女真人，尽管在中原北部政治上取得优势，但都没有统一中国。北方民族囊括中国全部版图成为统一的政权是从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开始。其后还有女真人的后裔满人建立的清朝。元朝统治了97年（1271 - 1368），清朝统治了267年（1644 - 1911）。蒙古人和满人是非汉民族，而且至今还是有人口百万以上的少数民族，但是在他们的统治时代，汉族还是在壮大，当他们的王朝灭亡后，大量的蒙古人和满人融合在汉族之中。

元代蒙古人统治下的人分四等：蒙古、色目、汉人和南人。这时的女真人、契丹人、高丽人都被包括在汉人之中，与汉人的待遇是一致的。又据《元史》记载：“女直（即女真）、契丹同汉人。若女直、契丹生西北不通汉语者，同蒙古人；女直（其

下当遗“契丹”二字)生长汉地,同汉人。”^①看来女真人和契丹人中已有分化,或融合于汉族,或融合于蒙古族。元代把汉族分化为汉人和南人两类,以宋、金疆域为边界。凡是先被蒙古人征服的原属金的区域里的汉人仍称汉人,后来征服了南宋,曾属南宋的人称南人或宋人、新附人或蛮子。看来其中也包括长江以南的各非汉民族。这样也加强了这些非汉民族和汉族的融合。

继蒙古人之后统治中国的是汉族,称明朝,初期曾下令恢复“唐代衣冠”,禁止胡服胡语胡姓。用行政命令来改变民族风俗习惯和语言都是徒劳的。据《明实录》引用公元1442年的一奏折中有当时“鞑装”盛过唐服的话。但是民间交流却起作用。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在他的《日知录》里关于当时民族混杂的情况曾说:“华宗上姓与毡裘之种相乱,惜乎当日之君子徒诵‘以夏变夷’之言,而无类族辨物之道。”又说:“今代山东氏族其出于金、元之裔者多矣。”这表明在当时的社会上层各族间的通婚已经通行,而且大量地汉化了。

蒙古人融合于汉族的具体例子见于梁漱溟先生最近出版的《问答录》。他说:“我家祖先与元朝皇帝同宗室,姓‘也先贴木耳’,蒙古族。元亡,末代皇帝顺帝携皇室亲属逃回北方,即现在的蒙古,而我们这一家未走,留在河南汝阳,改汉姓梁……说到种族血统,自元亡以后经过明、清两代,历时五百余年,不但旁人早不晓得我们是蒙古族,即自家人如不是有家谱记载也无从知道了。但几百年来与汉族通婚,不断融合两种不同的血统,自然是具有中间的气质的。”^②在看到这段话之前,我从来不知道梁先生的祖先是蒙古人,他并没有报过蒙古族,而安于自认及被认为汉族,但是有意思的是他这500年前的血统渊源还看成是他

① 《元史·世祖》纪十。

② 《问答录》第2页。

的“中间气质”的根源。可见民族意识是很深的。解放之后，原来已报汉族而后来改报蒙古族的人数还是不少的。

这里可以提一下，由于蒙古人先统一了北方地区，后来才西征中亚，然后回师从甘肃，经四川，入云南，沿长江而下，灭亡南宋。在这一场战争中却在中华民族的格局中增添了一个重要的少数民族，即回族。1982年普查人数达722万人，在少数民族中仅次于壮族，而且是其中分布最广的民族。主要聚居于宁夏和甘肃，并在青海、河南、山东、云南等省及全国各大城市有大小不等的聚居区。

大约在7世纪中叶，从海路有大批阿拉伯和波斯的穆斯林商人在广州、泉州、杭州、扬州等沿海商埠定居，当时称番客。13世纪初叶蒙古人西征，中亚信仰伊斯兰教各国被征服后，大批商人、工匠签发为远征军，称“探马赤军”，后随军进入中国征伐南宋，其中有汉人称他们为“回回军”的。回族就是在番客和回回军基础上大量和汉族通婚后，形成包括所有在中国各省信仰伊斯兰教的人。除了随蒙古军队在大城市落户的中亚商人和工匠外，还有大量中亚军人分驻各防区，主要在甘肃、云南，奉命屯垦，“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①，定居了下来，他们在元代列入色目人中享有较高的政治和社会地位。明代他们在政府和军队中还保持了较高地位。其时在甘青宁一带人口众多，曾有“回七汉三”的说法。在云南大理一带其人数也很多。但由于后来清代的民族仇杀使西北和云南的回族人口大为减少。

由于这个民族具有商业传统，早在唐代丝绸之路上的来往商人，番客就占重要地位。回族形成后，在黄土高原上，北和蒙古、西和青藏牧区接壤地区，即甘青宁黄河上游走廊地带，依靠农牧产品贸易，即所谓“茶马贸易”，善于从商的回族得以发

^① 《元史·兵志》。

展，所以现在最大的回族聚居区还是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和甘肃的临夏回族自治州。

回族现在通用汉语。海上和从中亚移入的穆斯林什么时候和怎样失去他们原来的语言已经难说。有人认为商人和军队中妇女较稀少，所以为了繁衍种族，势必和当地妇女通婚，由母传子，改变了民族语言。经商也应当是他们必须掌握当地语言的一个原因，何况回回一般是小聚居、大分散的格局和汉人杂居。在语言和生活各方面和汉族趋同是很自然的社会结果。但是他们坚持伊斯兰教信仰，用以在汉族的汪洋大海中保持和加强自己的民族意识。他们一般的习惯是回族可以娶汉族妇女，嫁后须信仰伊斯兰教。回族妇女不嫁汉人，除非汉人改信伊斯兰教，成为回族成员。

清代满族并没有轶出过去进入中原的北方民族的老路。这是大家记忆犹新的历史，可以不必在此多说。我在解放前的确没有听到过语言学家罗常培、文学家老舍是满族，他们都是在解放之后才公开他们的民族成分的。当然，我们这些汉人和他们相处时并不会感到我们之间有什么民族差别。在没有公开他们的民族成分之前，他们都知道自己是满族。这又说明了在一体的格局中多元性还是顽强地存在。

北方诸非汉民族在历史长河里一次又一次大规模地进入中原农业地区而不断地为汉族输入了新的血液，使汉族壮大起来，同时又为后来的中华民族增加了新的多元因素。这些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都起了重要的作用。我在本文中只能做出上面简单的叙述，指出它的梗概而已。

八、汉族同样充实了其他民族

在我国古代民族中，除了月氏、乌孙、匈奴、突厥等民族的

大部或部分迁居他国外，绝大多数的民族都长期在中华大地上居住，他们之间的交流和融合是经常的。上节里我着重讲了在不同时期汉族曾融合进了为数众多的其他民族成分。在这一节里，我要略述汉族融合到其他民族里去的情况。

汉族被融合入其他民族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被迫的，有如被匈奴、西羌、突厥掳掠去的，有如被中原统治者派遣去边区屯垦的士兵、贫民或罪犯；另一种是由于天灾人祸自愿流亡去的。这两种人为数都很多，有人估计“匈奴有奴隶约30万，约占匈奴人口的 $\frac{1}{7}$ 或 $\frac{1}{5}$ ”，还有人估计“匈奴有奴隶50多万，占匈奴人口的 $\frac{1}{3}$ ”^①，这些奴隶主要是汉人，也有西胡、丁零等族。永初三年（109年）南匈奴曾一次“还所钞汉民男女及羌所掠转买入匈奴中者合万余人”^②。

西汉时，侯应曾列举十条理由反对罢边塞、毁长城，其中的第七条是：“边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时有亡出塞者。”可见当时时有汉人自愿逃亡匈奴游牧区。东汉末年，仅逃亡到乌桓地区的汉人就有10万多户。西晋亡后，中原板荡，汉族人民逃亡辽西、河西、西域和南方的人很多。据《晋书·慕容》：“时二京倾覆，幽冀沦陷，刑政修明，虚怀引纳，流亡士庶众多襁负归之。乃立郡以统流人，冀州人为冀阳郡，豫州人为周郡，青州人为营丘郡，并州人为唐国郡。”流人之多可以想见。

移入其他民族地区的汉人很多就和当地民族通婚，并且为了适应当地社会生活和自然环境，也会在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方面发生改变，过若干代后，就融合于当地民族了，比如，在公元399年在吐鲁番盆地及邻近地区建立的殉麹氏高昌国原是一个以汉人为主体的建立的国家。这些汉人是汉魏屯田士兵和晋代逃亡到

① 《匈奴史论文选集》第12页，第10页。

② 《后汉书·南匈奴传》。

这地区的人的后裔。正是《魏书·高昌传》所说的“彼之氓庶，是汉魏遗黎，自晋化不纲，困难播越，世积已久”。当时这个高昌国的人胡化已深，如《北史·西域传·高昌传》所说：“服饰，丈夫以胡法，妇人裙襦，头上作髻。其风俗政令与华夏略同……文字亦同华夏，兼同胡书，有《毛诗》、《论语》、《孝经》……虽习诵之，而皆为胡语。”麹氏高昌国存在了 141 年，曾先后臣属于北方游牧民族柔然、高车及突厥。公元 640 年为唐朝所征服，设西州。公元 866 年回鹘占领西州，从此长期受回鹘统治，当地汉人的后裔就融合于维吾尔族了。同时生活在天山以南各个绿洲操焉耆—龟兹语（吐火罗语）和于阗语的属于印欧语系诸民族也先后融合于维吾尔族。

又比如：在战国时，楚国的庄曾率数千农民迁居于云南滇池地区，自称滇王。其后，汉晋时期均曾派汉人进入云南，但明朝以前迁入云南的汉人大都融合于当地各民族了。迁居于大理洱海地区的汉人成了白族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我们过去对于历史上民族之间互相渗透和融合研究得不够，特别是对汉人融合于其他民族的事实注意不够，因而很容易得到一种片面性的印象，似乎汉族较杂而其他民族较纯。其实所有的民族都是不断有人被其他民族所吸收，同时也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人。至于有人认为经济文化水平较低的民族必然会融合于经济文化较高的民族，也是有片面性的，因为历史上确有经济文化水平较高的汉人融合于四周的其他经济文化较低的民族。民族间相互渗透和融合过程还是应当实事求是地进行具体分析。我在这里特地加上这一节，目的就是要指出，在看到汉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大量吸收了其他各民族的成分时，不应忽视汉族也不断给其他民族输出新的血液。从生物基础，或所谓“血统”上讲，可以说中华民族这个一体中经常在发生混合、交杂的作用，没有哪一个民族在血统上可说是“纯种”。

九、汉族的南向扩展

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作为汉族前身的华夏族，其势力已经东到海滨，南及长江中下游，西抵黄土高原。这个核心的扩展对周围的其他民族，即当时所谓夷蛮戎狄，采取了两种策略，一是包进来“以夏变夷”，一是逐出去，赶到更远的地方。匈奴分南北两部，北匈奴走了，南匈奴同化了，是具体的例子。北匈奴沿着直通中亚和东欧的大草原走出了后来中华民族的范围，其他民族能走出这个范围的不多。很可能早期居住在山东半岛上的“东夷”，有部分渡海出走，或绕道东北进入今朝鲜半岛和日本群岛。但绝大多数的非汉民族不受融合的只有走到汉族不愿去居住的地方，大多是不宜耕种的草原和山区。有些一直坚持到今天，在中华民族的一体中保留了他们的民族特点，构成多元的格局。

这个过程如果要作历史的回顾，一直可以推到三皇五帝的传说时代。被认为是汉族祖先的黄帝，就曾在黄河北岸和炎帝和蚩尤作过战。炎帝后来被加入了汉族祖先之列，所以现在通常认为中华民族是“炎黄子孙”。蚩尤在传说中却一直被排斥在“非我族类”之中。但是他所率领的“三苗”却还有人望名构史地和现在的苗族联系了起来。这固然是牵强的推测，但蚩尤之后有一部分被留在汉族之外却可能是事实。

从考古的资料来说，如上所述，长江中下游的新石器时代和黄河中下游一样存在着东西不同的文化区。从山东中南部到徐淮平原的青莲岗—大汶口文化（前5300 - 前2400）是有近3000年历史的相当发达的农业文化，这使人联系到史书上所称的东夷。在东夷中无疑还包含着不同的族团。东夷是殷商的先人，当他们

被西方来的羌人之后的周人击败后，一部分和周人一起融合进入了华夏族团，也有一部分是被驱逐出走他方。这一部分中可能有上面说到过出海的和绕道东北去朝鲜半岛和日本群岛的人，但大部分却走向南方。

我这个假说的根据是我在 30 年代对朝鲜族人体类型的分析。在我的硕士论文里，我曾在朝鲜人体质资料中看到有大量和江苏沿海居民相同的 B 型，即圆头体矮的类型。这种类型又见于广西大瑶山瑶人的体质测量资料中。如果这些资料的分析是可信的话，就容易做出把这两个地方的人在历史上联系起来的推想。由于我自己的体质类型分析的研究工作中断已久，资料又都遗失，只能凭记忆做出上述的提示。^①

我这种推论受到我的一位老师潘光旦教授的支持。他根据文字史料和在福建畬民地区的实地观察，曾提出过一种见解，凭我的记忆简述如下：

我们可以从徐、舒、畬一系列的地名和族名中推想出一条民族迁移的路线。很可能在春秋战国时代的东夷中靠西南的一支的族名就是徐。他们生活在黄河和淮河之间，现在还留下徐州这个地名。据《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徐国在西周时期曾是一个较强的国家，春秋时仍然不衰，公元前 512 年被楚灭亡。近年在江西西北部接连出土春秋中期徐国铜器，应该不是偶然，或许与徐人的迁徙有关。^② 从这一时期的文献中可以看到这块地区被居民称作舒。潘先生认为畬字和徐是同音，徐人和舒人可能即是畬人的先人。他又以瑶畬都有盘瓠传说，这个传说联系到了徐偃王的记载，认为过山榜有它的历史根据，只是后来加以神话化罢

① 关于瑶族的体质及推论，作者已有修正和补充，见《费孝通文集》第 13 卷，《从史禄国老师学体质人类学》。

②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 317 页。

了。这一批人，后来向长江流域移动，进入南岭山脉的那一部分可能就是瑶。从南岭山脉向东，在江西、福建、浙江的山区里和汉族结合的那一部分可能是畲，另外有一部分曾定居在洞庭湖的一带，后来进入湘西和贵州山区的可能就是苗。潘先生把苗和瑶联系了起来，是因为他们在语言上同属一个系统，称苗瑶语族，表明他们可能是从一个来源分化出来的。

如果东夷中靠西的那部分经过 2000 年的流动，现在还留着一些后裔，保留了他们的民族特点，成为瑶、苗和畲，那么东夷中靠东的那一部分又怎样了呢？这一部分可能联系上苏北青莲岗文化直到长江下游的河姆渡—良渚文化，也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吴、越人的活动地区。这地区在三国时期经常使得统治这地区的孙氏政权头痛的是山区里到处都有的越人。这些不能不使我联想到这一系列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就是吴越文化的底子。

浙江南部直到广东沿海，考古资料还不够完整。但是广东石硖文化的发现，使考古学者得出一种见解，它和赣江流域、长江中下游甚至远达山东沿海等地诸原始文化，不断发生直接、间接的交往和相互影响，并且越到后来联系越广越远，而断定这沿海地区始终是紧密相连的。^① 这些线索使我产生一种设想，这种相连不仅是民族间的交往，而且有相近的种类的底子，就是说，从山东到广东的整个沿海地带曾经是古代越人或粤人活动的区域。三国时吴国有山越，其先浙南有瓯越，福建有闽越，广东在汉代建有南越（粤）国，其西到广西还有骆越，都以越或粤名其人，可以认为是一个系统的人。

许多民族学者把古代的越人联系到现在分布在西南各省壮侗语族民族，直到东南亚，如广西的壮族，贵州的布依族、侗族、水族，云南的傣族。如果这个历史联系是可信的话，则可以把他

^①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 166 页。

们联上历史上沿海的越人。现在沿海的越人已经都融合成了汉族，而这个越人系统至今还保住了西南一隅，主要居住在山区的盆地从事农业，这些地区的山腰和山上却住有苗瑶和其他山地小民族。这样一个分布颇广，人数又众的越人系统究竟怎样形成的历史，我们还没有具体材料来予以说明。

以上是长江下游、沿海和带到一点西南边境上的情况。现在让我们看一看长江中游的情况。

从新石器时代江汉平原的大溪—屈家岭—青龙泉文化之后，从地区上说，接下去就是楚文化了。春秋战国时代的楚国还保留着相当强烈的地方色彩。著名的屈原《楚辞》还是“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楚在中原人眼中还是南蛮，连楚建国后五代孙熊渠自己还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在楚国统治下有许多小邦，有人计算达 60 个之多，也就是说它曾是一个与中原华夏并峙的多元统一体。它的地域很广。《淮南子》里有言：“昔者楚人地南卷沅湘，北绕颖泗，西包巴蜀，东裹郢邳，颖汝以为沔，江汉以为池……中分天下。”楚还派人西进云南，占有滇池地区。

楚是一个农业经济发达，文化高超的国家。但是秦灭楚后，楚汉相争事实上还是存在，项羽是在四面楚歌之中，无面目见江东父老而自杀的。楚汉合并在统一体中也是经过一个相当长的过程的。

早在秦代，汉人已越南岭进入珠江流域，广西桂林还有秦渠留做见证。但是汉族文化越岭入粤尚在汉代，当时的南越王事实上还是一个强大的地方政权。但是南岭山脉以南地区要成为以汉人为主的聚居区，还需要近千年的时间。从海南岛的民族结构可以看得这地区的历史层积。最早在该岛居住的是黎人，语言属壮侗语系，自成一语支，表示和同一语族的其他语支早已分开。由此可以推测在沿海还是越人居住的时代，有一部分已越海居住

到了这岛上。继着黎人迁入的是另一部分说壮侗语系的人定居在海岛北部，称临高人，语言和今壮人相同，至今自认是汉人。其后，大约在明代，又有说瑶语的人移入，他们被人称为苗人，至今也自称苗人。按我上述的推测，他们是向南走得最远的瑶人了。其后到了宋元才有大量汉人移入，主要是住在该岛的沿海地区。

十、中国西部的民族流动

让我们回到中华大地的西部，至今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即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加上天山南北的新疆。这个广大地区考古资料比中原及沿海地区为少，远古的历史还不太清楚。但是已经知道的是在中国找到最早的猿人遗骨化石是在云贵高原（云南元谋县），加上上面已说过的旧石器及新石器的遗留，可以断定在这些西部高原上很早已有人类居住。

从史书的文字记载中，早期在中原之西居住的人统称戎。贴近中原，今宁夏、甘肃这一条黄河上游的走廊地带，正处在农业和牧业两大地区的中间，这里的早期居民称作羌人，牧羊人的意思。羌人可能是中原的人对西方牧民的统称，包括上百个部落，还有许多不同的名称，古书上羌氏常常连称。它们是否同一起来源也难确定，可能在语言上属于同一系统。《后汉书》说他们是“出自三苗”，就是被黄帝从华北逐去西北的这些部落。商代甲骨文中有关羌字，当时活动在今甘肃、陕西一带。羌人和周人部落有姻亲关系，所以周人自谓出于姜嫄。在周代统治集团中羌人占重要地位，后来成为华夏族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历史上看，作为一个保持着民族特点的集团来说，羌人和中原一直维持着密切关系，是甘陕一带戎夏之间的强大集团。其

中党项羌在公元 1038 - 1227 年间曾建立过西夏国，最盛时包括今宁夏、陕北和甘肃、青海、内蒙古的一部分，与辽、金先后成为与宋代鼎峙的地方政权，从事农牧业，有自己的类似汉文的方块文字。自从西夏政权被蒙古人击溃后，羌人的下落在汉文的史料中就不常出现了。可能大多数已和当地汉人及其他民族融合。至今仍自认是羌人的有约 100 万人（1964 年普查时只有约 5 万人），聚居在四川北部。

羌人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起的作用似乎和汉人刚好相反，汉族是以接纳为主而日益壮大的，羌族却以供应为主，壮大了别的民族。很多民族包括汉族在内从羌人中得到血液。

让我从西端的藏族说起。据汉文史籍记载，藏族属于两汉时西羌人的一支。西藏有“发羌”，发古音读 bod，即今藏族自称。发羌是当时青藏高原上许多部落之一，而且和甘青诸羌人部落有来往。藏语族有三个语支，即藏语、嘉戎语、门巴语。有些语言学者把羌语、普米语、珞巴语都归入藏语支，也有把嘉戎语归入羌语支。一说西夏语实际是嘉戎语，即羌语。这说明在藏语和羌语间存在着密切关系。嘉戎语主要分布在四川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说嘉戎语的人都被认为是藏族。

藏语本身还分三种差距较大的方言：卫藏方言主要分布在西藏自治区大部分地方；康方言主要分布在四川的甘孜、云南的迪庆及青海的玉树等藏族自治州；安多方言分布在甘肃的甘南、青海的一些藏族自治州。藏语的复杂性反映了这个民族的多元格局。即使不把羌人作为藏族的主要来源，羌人在藏族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也是无可怀疑的。

藏族在历史上是一个强大的民族，它不仅统一过青藏高原，而且北面到达帕米尔高原，占领过新疆南部，东面到达过唐代的首都长安和四川的成都平原，南面的滇北和当时的南诏国对峙。在他们的强大时期，当地各族人民受到他们的控制。这些人也就

被称为藏人。现在阿坝地区还有一种被称为“黑番人”，有些学者认为他们是古代氐人的后裔。在六江流域的走廊里还发现出门说藏语，回家说另一种语言的藏人。这些显而易见的是融而未合的例子。

如果语言的系统能给我们一些民族间历史关系的线索，汉语和藏语的近亲关系也支持了我在上面所提到的羌人是汉藏之间的联结环节的假设。从这个线索再推一步，我们又看到了和藏语近亲的彝语。而彝语的来源有许多学者也认为是羌语。胡庆钧教授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彝族条目里是这样说的：“约在 4000 - 5000 年以前，羌人早期南下支系与当地土著部落融合为僰（濮）。僰系‘羌之别种’……公元 4 世纪初，羌人无弋爰剑之后自甘、宁、青一带河湟地区南下，到岷山以东，至金沙江畔，发展为武都、广汉、越嶲诸羌……是羌人南下的较晚支系。”

彝族在 1982 年人口普查时有 545 万人，如果加上彝语系统的哈尼、纳西、傈僳、拉祜、基诺等族，将有 755 万人。在少数民族中仅次于壮族，超过了回族。彝族所居住的横断山脉，山谷纵横，构成无数被高山阻隔的小区域，其间交通不便，实际上属于同一族类的许多小集团，分别各自有他们的自称，也被他族看成不同的民族单位。现在说彝语的人已被认为是属于不同名称的五个民族。即是包括在彝族范围之内的人，也还有诺苏、纳苏、罗武、米撒泼、撒尼、阿西等不同自称。

当蒙古军队进攻南宋，道出四川、云南、贵州时，彝语系统的各集团大多联合起来进行抵抗，出现了一个统一的名称：罗罗。这个名称在民间一直沿用到解放时。但因为被认为是一种歧视的辱称所以被废止了，而采用彝这个名称。

彝族在云贵高原长期在各地掌握过地方权力。元明两代均利用彝族本族的统治者作为臣属于中央政权的土司，是一种间接统治的方式。清代通过“改土归流”，进行直接统治，部分交通方

便的地区，由于大量的汉人移入，在公元 1746 年有人记载在四川、乌蒙等地已经是“汉土民夷，比屋而居……与内地气象无异”。

彝族的社会发展是很不平衡的，即使在解放前夕，在城镇上还自认是彝族的社会上层和汉人往来中表面上已辨不出有什么差别，而且在地方政治和经济上还掌握着实权。但在偏僻的山区如四川的凉山，却还保持着其特有的奴隶制度，并成为独立的“小王国”，不受区外权力的控制。

从客观上看，云贵高原的民族格局中实际上存在着六种民族集团。一是在南部及西南边境上多属壮侗语族的民族，主要是傣族。他们是早就住在这地方的土著，还是由东方沿海地区移入这山区的人，现在还难说。二是从北方迁入的彝语系统的民族。三是早在这地区居住的土著民族。按考古学上的遗留来看，这是一块人类的发源地，不大能想像没有遗留人种。但是现存的知识，还不能明确他们和现在的民族有什么关系。但可能大多已淘汰，或是和外来的移民同化了。有人认为现有的仡佬族和佤族，散居于贵州、广西一带，系旧称僚人的后裔，可能是这地区较早的居民。四是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已开始从中原来的移民，见之于历史的最早有楚国的庄带兵进入滇池地区。到汉代从四川进入云贵高原的交通已经开辟，《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就到过云南，滇池附近还发现了汉代的金印。明代及以后大批汉人移入云贵各省是有史可稽的。五是以上各种人的混血，白族可能是其中之一。六是一些跨境的说南亚语系的民族，如佤、德昂、布朗等族，很可能是从境外移入的。

为了提供西南部分更完整的面貌，还得简单说一说处在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及云贵高原之间的那个四川盆地。这个盆地适于农业，很早就有蜀人和巴人在此生息。根据现有的历史知识说，早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已见到“蜀”字，那是四川盆地的古国。

在周人伐商的战争中已有蜀人的参与。蜀人主要活动地区在四川西部。建立过地方政权，后来被秦所灭，而且据说置蜀郡后中原有大量移民入蜀，蜀人也就并入了汉族。

巴人的来源历史上没有明确记载，传说是廩君之后，起源于“武落钟离山”，有人考证在今湖北境内。他们的活动地区是在四川东部、陕西南部、湖北和湖南西部。西周初期在汉水流域建立巴国，被秦灭后，巴人作为一个民族集团也就湮没无闻了。50年代潘光旦教授考察湘西土家族，认为是巴人的后裔。土家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并没有被列入少数民族中，因为当时被认为是汉族的一部分。他们在生活和语言上和汉人已极相近。但是自从承认他们是一个民族单位后，湘、鄂、黔接壤地区很多过去自报汉族的，申请改正为土家族。1964年人口普查时自报土家族的只有52万人，1982年普查时达280万人，在18年中增长了五倍。这说明有许多已长期被吸收入汉族中的非汉民族，在意识上还留有融而未合的痕迹。

十一、中华民族格局形成的几个特点

以上我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过程择要勾画出一个草图。中华民族的近百年和西方列强的对抗中成为自觉的民族实体，但是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是经过上述的历史过程逐步形成的。说到这里，我可以把从这个格局里看到的几个应注意的特点简述如下：

（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存在着一个凝聚的核心。它在文明曙光时期，即从新石器时期发展到青铜器时期，已经在黄河中游形成它的前身华夏族团，在夏、商、周三代从东方和西方吸收新的成分，经春秋战国的逐步融合，到秦统一了黄河和长江两

大流域的平原地带。汉继秦业，在多元的基础上统一成为汉族。汉族的名称一般认为到其后的南北朝时期才流行。经过 2000 多年的时间向西方扩展，融合了众多其他民族的人，到目前人数已超过 9.34 亿（1982 年），占中华民族总人口的 93.3%。其他 55 个少数民族人口总数是 6720 万人，占 6.7%。

汉族主要聚居在农业地区，除了西北和西南外，可以说凡是宜耕的平原几乎全是汉族的聚居区。同时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交通要道和商业据点一般都有汉人长期定居。这样汉人就大量深入到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形成一个点线结合、东密西疏的网络，这个网络正是多元一体格局的骨架。

（二）同时值得重视的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占全国面积一半以上，主要是高原、山地和草场，所以少数民族中有很很大一部分人从事牧业和汉族主要从事农业形成不同的经济类型。中国的五大牧区均在少数民族地区，从事游牧业的人主要是少数民族。

我们所谓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这个概念是指有少数民族聚居在内的地区，所以并不排斥有汉族居住在内，甚至在人数上可以占多数。少数民族占当地人口 10% 以上的有 8 个省（区）：内蒙古（15.5%）、贵州（26%）、云南（31.7%）、宁夏（31.9%）、广西（38.3%）、青海（39.4%）、新疆（59.6%）、西藏（95.1%），其中占一半以上的只有两个民族自治区。在这些地区，有些是汉族的大小聚居区和少数民族的聚居区马赛克式地穿插分布；有些是汉人占谷地，少数民族占山地；有些是汉人占集镇，少数民族占村寨；在少数民族的村寨里也常有杂居在内的汉户。所以要在县一级的区域里，除了西藏和新疆外，找到一个纯粹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区是很不容易的，即在乡一级的区域里也不是常见的。在这种杂居得很密的情形下，汉族固然也有被当地民族吸收的，但主要还是汉族依靠深入到各少数民族地区的这个队伍，发挥它的凝聚力，巩固了各民族的团结，形成一体。

（三）从语言上说，只有个别民族，如回族，已经用汉语作为自己民族的共同语言外，少数民族可以说都有自己的语言。有些民族，如满族，在日常生活中还经常用满语通话的已经很少，认得满文的普通老百姓则更少了，他们都用汉语汉文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杰出的，有我在上面提到的语言学家罗常培和文学家老舍。还有些民族自称有自己的民族语言，但经研究其实已经使用汉语方言，如畚族。有自己语言的民族中有 10 个民族有自己的文字，但群众里用文字的则只有几个民族，如藏文、蒙文、维文、傣文、朝鲜文等，有些虽有文字，但识字的人很少。少数民族中和汉人接触多的大多已学会汉语。我 50 年代初到广西和贵州访问少数民族时，当地各族的男子大多能和我用当地汉语方言通话，但是他们和同族的人通话时则用自己的语言。80 年代我去内蒙古访问，就遇到有不会汉语的蒙族，也有不会蒙语只会汉语的蒙族。在不同少数民族间通话的媒介也多种多样，有以汉语交谈，有各用自己语言交谈，也有用对方的语言交谈，也有用当地通用的某一种少数民族语言交谈。这方面还缺乏具体的调查，但一般来说，汉语已逐渐成为共同的通用语言。解放后，人民政府的政策是各民族都有使用自己语言文字的权利，并列入宪法。

（四）导致民族融合的具体条件是复杂的。看来主要是出于社会和经济的需要，虽则政治的原因也不应当忽视。即在几十年前的民国时代，在贵州还发生强迫苗族改装剪发的事，但是这种直接政治干预的效果是不大也不好的，因为政治上的歧视、压迫反而会增加被歧视被压迫的人的反抗心理和民族意识，拉开民族之间的距离。从历史上看，历代王朝，甚至地方政权，都有一套对付民族关系的观念和政策。固然有些少数民族统治者，如北魏的鲜卑族，入主了汉族地区后奖励甚至用行政手段命令他们自己的民族和汉族同化，但大多数的少数民族王朝是力求压低汉族的地位和保持其民族的特点。结果都显然和他们的愿望相反。政治

的优势并不就是民族在社会上和经济上的优势。满族是最近也是最明显的例子。

在历史上，秦以后中国在政治上统一的时期占 $2/3$ ，分裂的时期占 $1/3$ ，但是从民族这方面说，汉族在整个过程中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而且在国家分裂时期也总是民族间进行杂居、混合和融化的时期，不断给汉族以新的血液而壮大起来。

如果要寻找一个汉族凝聚力的来源，我认为汉族的农业经济是一个主要因素。看来任何一个游牧民族只要进入平原，落入精耕细作的农业社会里，迟早就会服服帖帖地、主动地融入汉族之中。

重复提一下，现在那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大都是汉人不习惯的高原和看不上眼的草原、山沟和干旱地区以及一时达不到的遥远的地方，也就是“以农为本”的汉族不能发挥他们优势的地区。这些地区只要汉族停留在农业时代，对他们是不发生吸引力的。在农业上具备发展机会的地方，汉族几乎大都占有了，甚至到后来还要去开垦那些不适宜农业的草原，以致破坏牧场，引起农牧矛盾和民族矛盾。这一切能不能作为农业经济是汉族得到壮大的主要条件的根据呢？看来正是汉族的两腿已深深地插入了泥土，当时代改变，人类已进入工业文明的时候，汉族要从泥土里拔出这两条腿也就显然十分吃力了。

（五）组成中华民族的成员是众多的，所以说它是个多元的结构。成员之间大小悬殊，汉族经过 2000 年的壮大，已经有 9.34 亿人，是当今世界上人数最多的民族。其他 55 个民族人口总共 6720 万人，其中还包括“未识别”的大约 80 万人，所以把他们称作少数民族。其中超过 100 万人口的一共 15 个民族，人口最多的是壮族（1300 万人），人数不到 100 万而超过 50 万人口的有 3 个民族，人数在 50 万以下 10 万以上的有 10 个民族，10 万以下 1 万以上的有 15 个民族，1 万以下 5000 以上的有 1 个

民族，5000 以下的有 7 个民族，其中在 2000 人以下的有 3 个民族，人数最少的是珞巴族（1066 人）。高山族因缺乏台湾部分的统计，没有列入计算。

各民族人口从 1964 年普查到 1982 年普查均有增长，少数民族总人口增长 68.42%，平均年增长率 2.9%，高于汉族（分别为 43.82% 及 2.0%）。增长最多的是土家族，18 年中增长 4.4 倍。这很明显，并不是出于自然增长，而是由于在这几十年中大批以前报作汉族的改报了土家族。这种情形，在其他少数民族同样发生。汉族原是有许多非汉民族融合进来的。如果追溯其祖先所属的民族来规定自己的民族，那就可以有大量人口从汉族中划出去。当然，问题是在怎样来规定“所属民族”的标准了。

同样的难题出现在所谓“未识别”的民族，意思是这些人的民族成分还不明确。这类人总数约有 80 万。其中包括两类，一类是不能确定是汉人或不是汉人；一类是他们属于哪个少数民族没有确定。这种辨别工作我们称为“民族识别”。这并不是指个人而言，而是指一些集团自称不是汉族，但是历史资料证明是早期移入偏僻地区的汉人，因种种原因不愿归入汉族。又有一些集团是从某些非汉族中分裂出来，不愿接受原来民族的名称。这些人就归入“未识别民族”的总类里。这说明，民族并不是长期稳定的人们共同体，而是在历史过程中经常有变动的民族实体。在这里我不能从理论上多加发挥了。

（六）中华民族成为一体的过程是逐步完成的。看来先是各地区分别有它的凝聚中心，而各自形成了初级的统一体。比如新石器时期在黄河中下游都有不同的文化区，这些文化区逐步融合出现汉族的前身华夏的初级统一体，当时长城外牧区还是一个以匈奴为主的统一体和华夏及后来的汉族相对峙。经过多次北方民族进入中原地区及中原地区的汉族向四方扩散，才逐步汇合了长城内外的农牧两大统一体。又经过各民族流动、混杂、分合的过

程，汉族形成了特大的核心，但还是主要聚居在平原和盆地等适宜发展农业的地区。同时，汉族通过屯垦移民和通商在各非汉族地区形成一个点线结合的网络，把东亚这一片土地上的各民族串联在一起，形成了中华民族自在的民族实体，并取得大一统的格局。这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在共同抵抗西方列强的压力下形成了一个休戚与共的自觉的民族实体。这个实体的格局是包含着多元的统一体，所以中华民族还包含着 50 多个民族。虽则中华民族和它所包含的 50 多个民族都称为“民族”，但在层次上是不同的。而且在所有承认的 50 多个民族中，很多本身还各自包含更低一层次的“民族集团”。所以可以说，在中华民族的统一体之中存在着多层次的多元格局。各个层次的多元关系又存在着分分合合的动态和分而未裂、融而未合的多种情状。这就提供了民族学研究者富有吸引力的研究对象和课题。

十二、瞻 望 前 途

放眼未来，中华民族的格局会不会变？它的内涵会不会变？这些问题只能作猜测性的推想。

首先应当指出，中华民族在进入 21 世纪以前已产生了两个重大的质变。第一，过去几千年来民族不平等的关系已经不仅在法律上予以否定，而且事实上也做出了重大的改变。自从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民族平等已成为了根本性的政策，而且明确地写入了宪法。为实现民族平等制定了民族区域自治法。凡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都实行区域自治，建立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由各少数民族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少数民族的语言和风俗习惯要受到其他民族的尊重，改革与否由各族人民自己决定。少数民族由于历史原因一般说来经济文化过去缺乏发展的条件，

所以国家制定了一系列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这些政策的落实，使很多过去隐瞒自己民族成分的人敢于和乐于公开要求承认他们是少数民族了。

第二，中国开始走上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开放和改革成了基本国策，闭关锁国的局面已一去不能复返，从“以农立国”转变到工业化的过程中，对各民族的发展提出了新的问题。如果我以上的叙述和分析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话，依靠农业上的优势而得到壮大起来的汉族首先遭到了必须改变经济结构的挑战。在他们聚居的地方原本多是在适宜于发展农业的地区，这些地区工业所需的原料是比较贫乏的，而过去对汉族缺乏吸引力，一向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却正是工业原料丰富的地区。同时，工业的发展需要科技和文化知识，而在这方面少数民族一般说来低于汉人的水平。要由少数民族自己利用本地地区的资源去发展本地地区的工业是有很大困难的。这些具体情况会怎样影响民族的格局呢？

如果我们要坚持在中华民族里各民族平等和共同繁荣的原则，那就必须有民族间互助团结的具体措施。这正是我们当前必须探索的课题。

如果我们放任各民族在不同的起点上自由竞争，结果是可以预见到的，那就是水平较低的民族走上淘汰、灭亡的道路，也就是说多元一体中的多元一方面会逐步萎缩。我们是反对走这条路的，所以正在依“先进帮后进”的原则办事，先进的民族从经济、文化各方面支持各后进的民族的发展。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不仅给优惠政策，而且要给切实的帮助，现在我们正在这样做。

第三，还可以提出一个问题：少数民族的现代化是否意味着更大程度的汉化？如果是这样，各民族共同繁荣是否指向更大的趋同，而同样削弱多元一体格局中多元这一头呢？这固然是存在的一种可能性，但是，我是这样想的：一个社会越是富裕，这个社会里的成员发展其个性的机会也越多；相反，一个社会越是贫

困，其成员可以选择的生存方式也越有限。如果这个规律同样可以用到民族领域里的话，经济越发展，亦即越是现代化，各民族间凭各自的优势去发展民族特点的机会也越大。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各民族人民生活中共同的东西必然会越来越多，比如为了信息的交流，必须有共同的通用语言，但这并不妨碍各民族用自己的语言文字发展有自己民族风格的文学。通用的语言可以帮助各民族间的互相学习、互相影响而促进自己文学的发展。又比如，各民族都有其相适应的生态条件。藏族能在海拔很高的高原劳动和生活，他们就可以发挥这项特点成为发展这地区的主力，并通过和其他地区的其他民族互通有无来提高各民族的经济水平。我想到这些情况，使我相信只要我们能及早注意这个问题，我们是有办法迎接这个挑战的。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通过发挥各民族团结互助的精神达到共同繁荣的目的，继续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中发展到更高的层次。在这层次里，用个比喻来说，中华民族将是一个百花争艳的大园圃。我愿意用这个前景鼓励自己和结束这篇论文。

1988年8月22日

参考书目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2. 陈连开：《关于中华民族的含义和起源的初步探讨》，载《民族论坛》1987年第3期；《中华新石器文化的多元区域性发展及其汇聚与辐射》，载《北方民族》1988年第1期；《我国少数民族对祖国历史的贡献》，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
3. 徐杰舜：《汉民族历史和文化新探》，广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4. 贾敬颜：《汉人考》，载《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6期。
5. 谷苞：《论正确阐明古代匈奴游牧社会的历史地位》，载《民族学研究》1985年第3期；《论中华民族的共同性》，载《新疆社会科学》1985

年第6期；《再论中华民族的共同性》，载《新疆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论西汉政府设置河西四郡的历史意义》，载《新疆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

6.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委会《中国少数民族》编写组：《中国少数民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7. 国家民委财经司：《民族工作统计提要（1949 - 1986）》，1987年版。

8. 《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

9. 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

保安三庄

1986年7月，我去甘肃访问临夏回族自治州，专程去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从县名上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区。在一个县境里居住这么多不同的民族，在全国是少有的，就因为这个特点吸引了我的调查兴趣。其实在甘肃和青海的接境地区，人数不多的小民族还不只上述三个。他们的北面还有土族和裕固族。由于这两个民族不在临夏回族自治州境内，我这次没有去访问。

这几个人数较小的少数民族按1982年人口数字排列是：东乡族279523人，土族159632人，撒拉族69135人，裕固族10568人，保安族9017人。从地理位置上说都在祁连山东北麓，是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接壤地带。从民族分布来说，杂处于藏族和汉族之间的回族聚居区里。土族和裕固族与藏族一样信喇嘛教，在临夏境内的其他三个民族都和回族一样信伊斯兰教。

我访问的积石山自治县正处在甘肃和青海的交界上。黄河从青海绕了几个大曲，向东直下青藏高原，被南北走向的积石山挡住去路，只留一个峡口可以通过。过了积石山就是有名的刘家峡水库，坡陡水急，落差巨大，是西北的电源。我们在巍峨的积石山高处，俯视黄河滚滚东来，入峡后流进一片起伏的滩谷，正是历史上著名的河州。时值秋收，禾堆密密地成行排列在坡田谷地上，点缀出丰年的气象。形如棋局的耕地中间显而易见地有三个为重重绿树所包围的村庄。这些是保安族聚居的地方，称“保安三庄”。

保安族的族名来自他们早年聚居的地名。据传说，他们的先

人是蒙古军人，元明时代驻扎在青海同仁县一带垦牧，信奉了伊斯兰教。明朝万历年间，在他们的住地修筑了保安城。他们就被称为保安人。清朝同治年间因受当地喇嘛教势力的欺压，被迫东迁，进入甘肃，定居在积石山山坡和靠山的谷地上。他们和回族一样现在已通用汉语。

不到一万人的保安人还保持着他们的民族特点，主要表现在他们能工巧匠的锻造技术。他们几乎家家户户制造的“保安刀”是一种牧民用来割切牛羊肉的日常用具，有如汉族每餐用的筷子，畅销藏族和蒙族地区。我在他们村子里家访时，看到他们锻造的设备十分简陋，全部是手工，但制成的刀却锋利耐用，精致美观，特别是两把刀插在一个鞘子里的“双垒刀”，刀把上还用黄铜、紫铜、牛骨加以装饰，图案美丽。中外游客，都以民族艺术品来收购。

晚宿自治县首镇吹麻滩，乘兴写了一首纪事诗：

黄河天上来，冲折积石轴。
过峡入河州，起伏多滩谷。
坡田如棋局，麦黄牧草绿。
车绕山村过，儿童竞相逐。
遥指三庄落，保安自成族。
首镇名吹麻，宰羊留客宿。
插刀嵌彩玉，蒙藏畅销速。
富民仗特技，户户有余谷。
挥手依依别，请留我福祝。

1988年9月

南 岭 行

去年我参加中央代表团到广西庆祝壮族自治区成立 30 周年。这是我第六次访问广西。在 50 多年前，也就是 1935 年我就到过广西大瑶山，就是现在的金秀瑶族自治县。当时我年纪很轻，只有 25 岁，连马都不骑，天天在大瑶山里面跑动。大瑶山相当大，没有公路，都是人走出来的小路。而这次去，公路从桂林可以一直通到金秀，从北京到金秀去，当天也可以到达，交通方便多了。我从学生时代开始，最早接触民族问题，实地考察少数民族就是从这次开始的。直到去年，我对瑶族的感性认识还只限于大瑶山，而且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名叫花篮瑶。我的前妻王同惠死后，我根据她调查的记录写了一本书，去年才重行出版，书名叫《花篮瑶社会组织》。解放后，我去了金秀几次，写了有关瑶族的文章，也收在这本书里面。

我早就有心为瑶族发展经济和文化出点力，但我明白靠这一点知识是不够的。我想多走走，了解些实际情况，但瑶族分布太广，而且都在山上。我老了，爬不了山，能在瑶家喝一杯茶，已经很不容易了。这次到广西，我仍决定去金秀访问，接着又到了瑶族聚居的恭城县，其后还从广西到了湖南的江永县，因为那里瑶族人数也很多，占全县人口的 40% 上下。后来还到了江华，最后到了广东的连南。连南也是瑶族自治县。这一趟一共走了二省一区的六个县。



走了这一趟，我想知道瑶族究竟有些什么特点，同其他少数民族有些什么不同的地方？我以为瑶族最大的特点是住在南岭山脉里。这个山区是瑶族主要聚居区，现在居住在这地区的老百姓，瑶族可能移入得最早。从记载中能查到的资料来看，在南岭山脉附近，甚至北及洞庭湖，南到广西的西江和广东的北部，隋唐时期，就是瑶族的主要聚居区。

广西和湖南的瑶胞，有很多传说，认为瑶族是从千家峒迁移出来的。有人在江永县一个乡里找到了一个“千家峒”。这次我特地去看了一次。峒是什么意思呢？有人把峒字写成了三点水的“洞”，就像陶渊明写的《桃花源记》那样，好像是个水洞。其实这里是指一个四面都有高山围住的小盆地，盆地里有山上流下来的水灌溉农田，所以可说是一个和外界隔离的农业社区。在瑶语里，峒是指一块盆地，到了汉族文人手上才变成了“洞”字。瑶族传说中说他们是从千家峒里分散出来的，很可能和历史事实符合。大概在隋唐之后，从北方涌入了大批移民，进入江南的两湖地区（湖南和江西），把平地都占了。原来在这些地方居住的瑶族先后被迫移入山区，占有那些偏僻的小盆地，经营农业，可能是种稻，到现在瑶族还是种稻能手。到元末明初，这些“峒”也守不住了，或更向南、向西迁移，或上高山，成了到处为家的“过山瑶”，也形成了南岭山脉里“无山没有瑶”的分散格局。陶渊明写的《桃花源记》，并不是一种文学的虚构，而是当时现实生活情景的写照。在这种和外界隔绝的小天地里生活的人，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外面的变化既不知道，也不关心，所以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对他们来说，哪一个人当皇帝都没关

系，可以不管。只要这个小天地守得住，就不怕。这里面人情味很浓，友好往来，和睦相处。我 30 年代在大瑶山，行路时，天热了，衣服一脱，插一根草，打个结挂上，就没有人会来动它。这种风气给我很深的印象，至今不忘。

那时在大瑶山调查，我就有个问题：这样一个封闭的社会，如果人口增长了，土地又扩大不了，怎么办呢？后来才知道花篮瑶里有控制人口增长的习惯，每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多了就不留了。后来又知道他们的妇女都懂得避孕的方法，而且听说是用灵香草作为避孕药物。人口得到了控制，这个小天地就不容易被涨破。几百年来，这大山里就住着这个保存着自己传统习惯的小集团。这在瑶族中很可能是有代表性的。

交通不便，闭关自守，现在讲来是不好的，但当时，如果不是交通不便，山势险恶，也可能现在已经没有他们了。就靠这层层的大山，瑶族同胞才能长期深藏在偏僻的、封闭的山区里。从明朝中期开始，封建统治者曾动用大批武装，进攻这个地区的瑶族。最严重的一次战役发生在广西的大藤峡。这次战争大约长达 100 年，一直到清朝中叶才停止。瑶族从那时开始就分散到各地去了，并且出现了不同的名称。当然有一部分留在平地，同汉族结合了，结合得较深的由通婚而变成了汉族，结合得较浅的常同汉人来往，并学会了汉语，甚至丧失了原来的瑶语。

我们在江永就看到这种情况。在那里瑶族大概可分为三类：高山瑶、平地瑶和已经和汉族混合了的瑶胞。瑶族中还有一部分是在山区靠刀耕火种谋生，无法长期定居，成了“游耕”的“过山瑶”。流动的这部分分成几条路线：向西向南迁移，最远的到了越南、老挝、柬埔寨和泰国。泰国北部有很大的瑶族聚居区。这些地区的瑶族，在最近的几十年里，由于战争，许多变成难民，被各国收留。美国有 1.4 万人，法国、加拿大、新西兰都有。所以目前瑶族已散布在世界各地了。

二

瑶族的共同点是山地经济。以林为主。国内约有 170 万人，分布很广。以广西、湖南、广东为主，云南、贵州也都有。瑶族作为一个民族，解放前就已经肯定了，不发生识别的问题。在瑶族是怎样形成的问题上，存在一个认同的过程。大概有两种情况：一是从瑶族里面有些部分分了出来，一是由别的民族成分变成了瑶族。这就是说瑶族并不都是同一个来源。这次从桂林到连南所看到的瑶族，多数是说勉语的瑶族。但他们有不同的名称，衣饰也有差别，比如，排瑶、盘瑶、过山瑶等。勉语系统看来是瑶族的主体。它吸收了其他的成分，也分出了一部分。他们之间有些有矛盾。过去的封建统治者“以夷制夷”，有些瑶人被官方利用来对付其他的瑶人，受到的待遇也有差别。比如有些允许留在平地，有些被赶上山地等。因为这个原因，瑶族内部也形成了差距。瑶族内部矛盾直到解放之后才得到解决。

解放后，解决了民族不平等的问题。这在我国民族关系上是一项根本性的变化。可是，还有差距问题，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差距还有。50 年代，我们访问团首先抓的是民族平等问题，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对怎样解决经济上、文化上的差距问题还认识不足。那时的做法是，没有饭吃就送米、送盐；要表示文化上的平等就带文工团去学习民族歌舞，还建立各级民族学院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至于怎样去发展少数民族经济、教育、文化，怎样把知识送到少数民族地区，当时还没有重视，至少我自己的认识就不够。直到 1978 年，我们才有了新的认识。一个民族自治地方如果不具备发展经济的条件，还是改变不了落后的状况。大家都已看到解决民族问题，首先要发展各民族的经济。单靠少数民族

自治是不够的，还要有国家的帮助。

我这次到南岭山脉瑶族地区访问的目的就想怎么帮助瑶族更好地发展。我访问的六个县，生态条件基本一致，瑶族生活习惯也基本一致，讲话都能懂。这地区瑶族近 100 万人，占瑶族总数的 2/3。对这近百万瑶族居住的地方，能否想些办法，把它先发展起来呢？

三

从广西踏进湖南境内时，我们在一个瑶族村子前停车休息。这个村子原来是个穷村，人均年收入只有 70 元。这几年脱贫了，原因是他们学会了栽培夏橙，一种价值较高可以外销的柑橘。今年人均收入已经超过 1000 元。我们参观了他们的橘园，长势喜人。后来到一个瑶家去访问，恰遇这家的女儿要嫁到广西瑶区去做媳妇，在热热闹闹地准备宴席。我当时就想如果这位新媳妇把培植夏橙的技术带到广西去，不是也可以使广西的瑶族富起来了么？瑶族之间不是可以通过交流，自己走上发展的道路么？这时我就想到了南岭瑶族协作区的建议。

其实，这一路上我已经看到不少瑶族脱贫致富的好经验。广西的恭城县现在已列入全国农村电气化的前列。他们利用山区地势的落差，安置小型发电机，解决了家家户户照明、烹饪的燃料。如果这带山脉的各个县里都采用这个办法，不是可以解决生活和生产上的能源问题了么？可是后来我们到江华见到由于缺电，以致大量很好的木材被用做燃料烧掉。我当时就想到，为什么他们不去向恭城取经呢？

一路看，一路想，越来越觉得南岭瑶族应该很好协作。南岭山脉瑶族地区的自然资源十分丰富。同时由于这里靠近亚热带地

区，无霜期短，植物生长得快，质量又好。据说由于地下稀土金属丰富，烟草的质量特别优良，至于稀土金属，更是少有的价值极高的矿产。可见，这个地区是大有可为的。但是，现在大量瑶民处于贫困线下，人均收入还不到 200 元，他们还在穷山角落里种老玉米和其他杂粮，连粮食都不能自给。其实，这种情形是不难改变的，只要每个村子都找到一种拳头产品（夏橙、烟草、锡矿、锌矿等等），收入就能很快增长，生活也就可以好起来了。如果再引进加工的技术，发展乡镇企业，那就更好了。

当然，我们不能忘记这地区原是西南的木材产地。南岭山脉的森林比大兴安岭长得快。这里的杉木 10 - 15 年就成材，大兴安岭却要 100 年。可惜的是这里的森林破坏得比大兴安岭更早。所幸的是剩余的森林正在瑶族地区。发展林业和瑶族的发展是分不开的。我们比较了江永和江华，两个地方管理林业就有区别。江华搞得好些。他们把林地包给当地的瑶族，不但森林管得好，瑶族的生活也有改善。我们离开江华之前还在瑶胞家吃茶。这家这几年已建了新房子，人均年收入超过了 800 元，可以和苏南一般农民相比了。江永却不然。那里的森林大部分划给国营林场，从外地吸收林农进来，而把瑶胞搬到半山贫瘠的地区。过去在公社里吃大锅饭时还可以生活得好一些，土地承包以后，他们就苦了。山上回不去，山下好地分不到。更令人听了难过的是这里还有个“自然保护区”，在这个林区是什么都动不得的。而生活在这个“保护区”里的瑶胞的生活却得不到“保护”。他们不但没有树木，连树下的一草一菌都不准采集，只能靠分到的一些山地种杂粮过日子，怎能不贫困呢？江华和江永的干部都反映，对林农征税太多，光种类就有十几种。木材在市场上卖出得到的钱，林农拿到手的不到 1/3。这个情形应当及早改变。从这些事实看，这个瑶区存在着共同关心的政策问题。大家可以互相讨论，共同提出合理的建议。

总的说来，要讲瑶区的发展，第一步是各地瑶区互通信息，交流经验，结合本地具体情况，吸取别地行之有效的脱贫方法。第二步是共同研究各项政策的实施情况，提出改革建议。第三步是总结经验，找出几条山地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再根据这些规律拟出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不在于搞大项目，主要是搞能使千家万户得到实惠的小项目。

四

搞经济发展没有资金是不行的。资金从哪里来？我每到一个地方，当地的干部一定要我先听汇报。我听到的都是实情。地方上资金不足，要建设是迈不开步子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几乎大多眼睛向上，伸手要钱，好像解决建设资金只有政府补助这一条门路。因此，我总是说，少数民族地区的脱贫和发展，国家肯定要出钱来补助，自从开国以来，国家对民族地区的补贴不算少。但是，国家能拿出的钱是有限的，所以下面的干部不能只把眼睛向上看，还得向旁、向下看，多找出几条搞到建设资金的门路。民族地区的情况我知道的不多，但在沿海的农村里，我确实看到这10年来农民的收入有了很大的增加。农民手上有了钱，怎样花就成了一个大问题。大体说来是先讲温饱，接着就要造房子。这些都是消费性的用途，是应当满足的。但是这些要求满足之后怎么办呢？很多人并不看重再生产，没有把手头的资金投入农业、工业和商业，而是继续用在消费上，去购买生活上还没有迫切需要的用具。在电力供应不足的地区，甚至还没有通电的地方，农民已开始购买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等等。这些大多是为男婚女嫁时购买的。很多地方已形成风气，没有这八个“机”，就娶不到老婆。这就不是走生产致富的路子了。钱多了，就讲排

场，大请其客，婚丧做寿，甚至儿子考上大学，小孩满月都要大摆酒席，一请就是十几桌。这就有点挥霍浪费，不是正道了。这种情形在民族地区可能已经发生。如果事先不多加注意，收入增加了也难免不走这条路子。我一路上总是提醒大家，讲生产是必要的，可别忘了指导正当消费，有了钱首先要投资再生产。

在民族地区讲经济建设，不仅资金不足，更大的困难是缺乏有关生产的知识，即科学和技术。少数民族由于历史的原因，发展的起点低。过去长期封闭，不容易从外地引进新知识，这是发展的大障碍。可是现在我们已在改变过去的封闭状态，先进民族和先进地区都乐于帮助穷困的少数民族脱贫致富。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给我们的有利条件，少数民族同胞必须充分利用这个条件，接受外来的知识和技术。我们一路上看到正在富起来的瑶族村子，都是由于接受了新的生产技术，开辟了新的生产门路，其中主要是接受汉族同胞的帮助。

最后，我想提一个南岭山脉瑶族地区的交流协作的建议。不同省区之间地区性的协作在别的地方已经开始了。我们这里可以六个县为基础搞协作，具体可仿照甘肃临夏和青海海东的协作区的办法试行一下，只要广东同意，广西同意，湖南同意，可搞一个南岭山区瑶族的经济协作区。初办时范围不要太广。试行一个时期，有了成效可以逐步扩大范围。

我把这意思讲出来，请大家讨论。

1989 年 1 月

答问发展与发展研究

学生：费老，您从解放前就提倡乡村建设和发展乡村工业，可学术界有人认为不经济，特别是经济学界的一些人说农村工业没有规模效益。

费：这个问题多年来一直在争论：什么叫效益？现在都讲经济效益，就是平常所说的算经济账。经济账要不要算？我说要算。过去“四人帮”提出“要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这一套是不行的。但是除了经济账外还有没有其他账？人除了经济人外有没有其他本质的东西？所以算账要算总账，这就比单算经济账复杂了。经济学的发展是一个进步，是从人性里的理性部分抽出来以逻辑化、概念化。经济学理论确实很有用。但是人性并不完全是理性的。意大利社会学家帕累托就早已提出：绝大多数的人类行动是非理性的，不是由逻辑而是由情绪支配的。我认为：人类行为理性成分和非理性成分这两方面都有，但是在不同时代比重不同，二者的比重是根据生活变化的。中国的发展从思想深层来看，一直是在理性和非理性两端中间摇摆。“四人帮”时期不讲理性，大讲主观性、随意性。这10年要纠偏，要提倡理性主义，中国理性主义还远远发展得不够。但是就是在现在时期，我们也要记住人除了理性外还有另一面，要记住人类本身的意义和最后的目的。说到乡镇工业（农村工业），我的出发点就是要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两个角度来评价的。更重要的是，对于乡镇企业不是学者的评价起作用，而是千百万人的实践起作用。

80年代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起来后引起了什么变化？它冲击了旧的体制，它冲击了“吃皇粮的人”！实际上真正不计算经

济账的还是那些躺在国家身上“吃皇粮的人”。他们不需理性计算，不考虑对国家的贡献，吃大锅饭没有竞争压力和淘汰危险。国家多少年来背上了这一大批“吃皇粮的人”的包袱，甩也甩不掉。乡镇企业不吃皇粮。国家不背这个包袱，乡镇企业是农民自己的企业，农民需要它。乡镇企业使中国农民最终成为工人，这种人的变化可以说是乡镇企业最大的综合效益。

学生：我们最近在甘肃、山东调查了乡镇企业的发展，有的发展得好，有的濒临破产，大部分仍在徘徊，乡镇企业发展路子究竟在哪里？

费：对于客观事物（例如农村发展）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我认为应该怎样，实际是把自己看成神仙，给农民开处方；另一种是要了解农民认为怎样，农民自己怎样摸索、怎样干的。解决问题的路子差距就在这里。

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的发展是农民自己找出来的路子，它的特点表现为隐显相辅。例如农村责任制，一开始的名称是很拗口的，叫作“联产计酬家庭承包责任制”，实际上这个名称当时没多少农民懂。但是农民需要这种方式，这种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经营方式如果直讲“包产到户”就出不来，而当时名称的不清楚使这种经营方式冲出来了。而现在仍有这种现象：土地规定是集体所有的，而实际上是农民在使用，并且希望能长期经营。理论宣传和生活实际，就一直处于这种名实不符或名实不清状态之中。实际上新事物要出来时常常是这样，有的事太清楚了不行，不清楚才行。对于乡镇企业的路子也是这样，很多地区还很不清楚，农民在找，我们也要帮助一起找。路子不清楚虽然使人很苦恼，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中国农村正在变，农民也在变，现在正处于重要的转变时期。我们要总结农民自己找到的路子。例如前几天听到内蒙古的卓资县解决“吃皇粮的人”的好经验，我们就可以总结。对于乡镇企业现在要重点研究解决几个基本矛

盾：原材料、能源、市场等。江苏的乡镇企业有的就很危险，没原材料、没电；而这些西部地区有。广东乡镇企业搞外向型，靠香港。而最重要的是跟着具体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找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

学生：我们在甘肃临夏调查，看到农民（回族）经商比前两年有些冷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商业停滞现象？

费：我前几年去过临夏，提出过温州和临夏的共同点：以商兴工。“东有温州、西有河州”。它们的区别在于温州面向全国市场，而临夏市场主要在西部。临夏回族有经商的历史，开放以来，他们发挥自己传统优势，搞活流通，农民收入增长很快。临夏有2000辆汽车搞运输，农民在流通中有些人已积累了一些资金，但现在的问题是这些钱为什么转不到生产上来。流通促进生产，“以商带工”，商业要带出工业来，把本地工业发展起来才是出路。当然现在仍要继续搞活流通，发挥回族的特殊作用。临夏商业的发展停滞，没有大力地带动工业的发展可能是一个原因。此外市场有限，西部牧区的经济发展跟不上。

学生：我在山东乡镇企业搞调查，看到一些企业处在行政干预影响之下，日子很难过。

费：企业要发展不应受过多的行政干预。减少行政干预必须解决政企不分这一老问题，也是目前改革中的关键问题。乡镇企业与国营企业争原料、争市场，是正当的经济竞争机制在起作用。乡镇企业不断冲击着国营企业，这种冲击还在发展。行政干预是要保这些国营企业，行政不干预乡镇企业，就保不住国家包下来的几千万“吃皇粮的人”的吃饭问题。现在改革最大的问题是如何解决这几千万“吃皇粮的人”的生活问题。我们这些人也属“吃皇粮的人”，实际上我们的思想也是很复杂的，现在我们还靠吃皇粮，改革开放继续发展，知识分子也面临抉择。

学生：我在陕西宝鸡搞调查，看到陕西军工企业“舍近求

远”不与当地乡镇企业联营，而到东部地区找“伙伴”，西部乡镇企业出路何在？

费：这里提到了发展的关键问题——人的素质问题。在西藏，国家投入了几十个亿，但当地人的素质没有提高，西藏还是发展不起来。在内蒙古我也看到牧民离不开旧的生活方式的现象。国家安排他们做矿工，可没做几天就要回去，回去放他们的羊，但他们总不能永远牧羊吧。从牧民和农民到工人的转变，已成为中国发展的关键。陕西军工企业“舍近求远”，原因是复杂的，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地乡镇企业人的素质比沿海地区要低的情况。西部地区人的素质低下，问题越来越严重。当地素质好些的升学都走了，毕业了又回不来。回不来的原因是多样的，有他本人主观不想回来的原因，也有当地吸引不住他的原因。几十年来，我们为西部培养了成千上万的人才，但回去有多少？我撰文提到人文生态失调，就是指这种现象。这就像水土流失一样，人的素质也会流失。人才流失是世界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也发生了人才大量流向美国的现象。对于这个现象，英国朝野上下一片惊呼：“英国人正在花钱为美国人培养人才！”就从算经济账来看，人一走英国教育投资落空，本钱都回不来，更不要提效益了。对于这个问题，也只有改革开放推动发展才能解决，只有开放才能发展，只有发展才能留住人。

学生：在陕西的调查中我们看到，一方面行政对乡镇企业发展的干预影响了企业发展，另一方面政府行为在有的地区对企业发展有帮助，这怎么理解？

费：政企不分是改革的障碍，这个问题最终要解决的。但是任何地区的发展都割不断历史，丢不了传统。许多落后地区的发展利用了传统的渠道来起步是正常的。前面讲过，很多新事物就是新旧交叉中出现的，有些传统的东西是有用的。乡镇企业启动和发展都得与外界联系，与外界的技术、原材料、市场等要素联

系。我们现状是双轨制，因此这种联系不能单一轨道。有些乡镇企业是利用旧的行政渠道起步的，政府行为对它有帮助。乡镇企业的发展主要靠市场经济，否则会走上“小国营”，依赖政府的老路。

学生：费老，您提出的“社区所有制”概念联系到了过去的人民公社制，能否加以说明。

费：这里值得研究的是在我国农村里实行了20年的人民公社的实质。公社不是马克思脑子里的巴黎公社，也不能只看毛泽东脑子中的“人民公社”，而更重要的是要看中国农民怎样接受这种制度，也就是农民脑子中的人民公社。现在有不少人认为人民公社已经取消了。作为国家的制度，人民公社是不见了，但是我认为，在农村现有的实际活动中，公社并没有消灭，因为“公社”是在传统的农村社区的基础上出现的，它带着强烈的传统性质，所以不可能一下子消灭的，而是名废实存，这个“实”却在不断变化中。这也就是说，中国农村里，公社这个名称已不用了或说废除了，但几千年传下来的“公社”的思想以及农民行为还在起作用。

学生：研究农村发展和社区分析，我们接触了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等几个主要模式，但如果无限穷尽下去会有成千上万的模式，应该如何把握？

费：科学的社区研究应从几个基本模式入手，通过分析比较来不断发展人的认识，这个过程是没有止境的。从典型研究，即从一些基本模式入手，可以用不同的理论构架来阐述。例如，可以从生产结构来阐释（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等），可以从社会结构来阐释（家长制、民主制等）。不论用什么理论构架和指标体系，都要从实际中来，要依靠和相信自己的眼睛，把现实生活加工上升到理论层次。基本模式的研究是在社区研究中最基本的工作，在这个基础上才能从个别上升到一般，实现对事物的全面

了解认识。

我对苏南模式、温州模式都已有过较多的分析，而珠江模式的出现和总结是新的也是目前很重要的。珠江模式不局限于广东四个县，它实际包括福建，以至正在开放中的海南岛的发展中的很多特点，值得特别重视。广东、福建开放后，台湾在经济上与这些地区的交往频繁了，日本也表现得很积极。珠江模式不是短期行为，而预示了长期发展的很多基本因素，反映了现在是中国发展的关键时期。珠江模式对中国影响很大，表现最明显的是“港风北上”。珠江模式依靠着与香港的联系，而香港在中国人眼里已成为“时髦”的代名词，“港式”成为很多大陆人生活方式的样板。珠江模式的研究再深一步就是文化层研究。过去我们常有“海派”之说，就是上海在中国当代文化里一种模式。现在“港风”压过了“海派”，这是中国文化的变化，社会风气的变化。过去说上海的宁波籍人会做生意，现在公认受香港影响最深的广东人最行。这一些的变化根源在哪里，可惜没人钻下去研究。香港的变化也仅是这 20 年来发生的。实际上是我们的封闭政策把上海的地位送给了香港。香港本身不构成独立文化，它原是殖民地文化，但时势，特别是世界经济中的地位（location）使香港发展成国际信息中心、金融中心、商业中心。所以珠江模式的研究还要深入，要看到它的深层影响。

学生：我们在西部搞调查，对西部的发展模式还没有摸到路，对往西部移民争论也很大。

费：西部经济的发展还处在启动阶段。我们民盟向中央提了一个方案，想以黄河上游水电开发启动区域发展。中央也同意了，但是现在的阻力不在外部，而在内部。黄河上游开发引发了条条块块的利益追求，各条块的利益冲突在内部就给这种牵连多方的计划带来抵制的因素。我们不能再走过去的老路。过去是国家根据计划用低价调拨西部的原材料，然后用国家补贴形式返还

给西部，而这些补贴大部分并没有投入生产，而只维持着一大批“吃皇粮的人”的饭碗。

西部开发应以现有基础起步。国营企业应开门，把集聚的技术能量释放出来。在这个基础上开发西部的资源，生产出东部企业急需的原材料，直接同东部进行交易。自己手中有了东西就可以同东部讨价还价，互通有无。

我过去讲过，人口这盘棋我有两个“棋眼”，一个是乡镇企业对农村剩余劳力的容纳，二是西部开发对人口的吸收。目前经济收缩有其必然性，但还应考虑这种经济收缩对中国人口问题的影响。现在剩余劳力转移每年不过 1000 万，而人口净增长 1500 万，随着城市企业改革深入可能也要抛出上千万劳动力，人口压力是对中国经济最大的压力。过去我提出过发展乡镇企业可以发展“离土不离乡”的形式，一直有争议。现在却因为人口流动太大，盲目性大，宣传上重新提倡“离土不离乡”形式了。再看我国计划生育工作，国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不能说没有成效。但是有一个问题可以提醒我们：日本人多资源更少，但在一个岛国上养活一亿多人并使国民生活得很好，这说明什么？所以，计划生育目的不在于人多人少本身，而在于人与资源最佳的结合。我国西部开发潜力很大，西部移民是一条人口分洪的出路。当然要创造条件，首先要种草种树，恢复人的生存环境。天底下的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没有不可改变的。西部要移民，就必须改变条件，包括自然条件和人文条件。改变条件是个艰难的过程，现在三峡工程的争论，我们考虑的是几百万移民的利益，而一些人考虑到的却是几万“吃皇粮的人”的利益。过去很多工程都是“钓鱼工程”，国家一直追加投资，成为维持这批“吃皇粮的人”的生活来源。西部开发最不容易解决的是两个问题：“吃皇粮”的问题和民族关系问题。

学生：请费老谈谈对社会学与发展研究的看法。

费：我最近写了一篇《四年思路回顾》，就是我的研究发展过程。我是从一个典型调查开始，通过不同的模式比较，从而反映出中国 10 年来的发展图像和一些规律。我的研究有两条主线，一个是从农村到城市的社区研究主线，另一条是从东部到西部的全国协调发展主线。我的研究关注着中国 10 年的变化，特别是人的变化，包括理性和非理性两个层次的变化。通过我的研究还可以看出一个知识分子在客观事物变化中认识上的变化，实际上我一直在学习之中，向实际学习，向基层干部群众学习。中国的发展最终动力在于千万农民的自觉行动，开放是发展的保证。

我的研究并不是想解决很多问题，而是想提出一些问题。我已经开了一个头。一个人一生中做好一个题目已经很不简单了，不可能是全知全能的多面手。我的责任是开辟出一个研究领域，提出一些有意义的、值得研究的问题，并提供一套研究思路和方法，这些都要靠后来的学者接下去。这种研究工作物质报酬不多，所得的是丰富的精神报酬。这是一项增添人类知识库的工作。人各有志，青年人可以自己选择自己的路子，我不强制任何人。我现在能帮你们的事是：出题目、想思路，听不听是你们的自由。我认为青年人现在应当抓基本功，要深入实际生活。青年人要学会思考问题，要学会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如果你能在脑子里生发出别人生发不出的问题，你就算入门及格了。

1989 年 4 月 11 日于北京大学社会学所

四年思路回顾

1984年七八月间，我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中央组织的“暑期多学科学术讲座”，对我过去的社会学调查做了一番回顾，一共十讲。后来以《社会调查自白》为书名出版，又收入《边区开发与社会调查》这本文集里。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又是四年多了。1989年新春，我应日本友人鹤见和子教授之约写这《自白》的续篇，追述这四年来我在社会学研究中思路上的开拓，以参加中日两国学者合编的一本有关农村和小城镇研究的文集。

我早期社会调查的对象是中国农村。30年代我所调查的只是一个坐落在太湖边上约360户的小村子，我称它作“江村”。以这个小村子做窗口，我想去观察中国农民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基本情况。尽管当时的农村在社会生活上自给自足的程度很高，但是它绝不是和一个四周脱离的封闭社区。它在各方面都和外界有联系，特别在经济上依靠着附近那个农产品和工业品交流的集镇。我在江村调查时虽已明白这个情况，并已看到城乡联系的重要性，但限于时间和条件，我的实地观察还只能自限于这个小小村子，没有跟踪寻源到集镇。直到80年代初我恢复了学术工作后才有机会走出农村，进入集镇，把我的研究领域逐步扩大。

由于我是从农村出发去研究集镇的，因而我的着眼点一开始并没有限于集镇本身，而首先把它看作是城乡的结合部。从这个

角度我提出“类别、层次、兴衰、分布、发展”的10字研究课题。我还是主张采取实地观察，“解剖麻雀”，由点及面，从定性到定量的研究方法。这次调查不像50年前那样单枪匹马地一切都由个人操作，而组成了一个可以实行分工合作、集体讨论的研究队伍。我们先从江村所在地的吴江县的各集镇调查起。根据各集镇功能上的特点分出了五种不同类型。又从商品流通及行政系统上分出三层五级。然后注意到它们的分布的兴衰过程，最后探索农村经济发展的模式。

80年代初期，正是中国各地小城镇开始复兴的时刻。我们注意到吴江县的这些集镇人口无不在迅速增加。追究过去，了解到它们都曾在50年代进入过一个衰落时期，人口下降；70年代后期陷入谷底，出现了冷冷清清的局面。嗣后前前后后出现了生机。当我们去调查时，这些集镇的面貌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势头。

各地方的集镇怎么会兴旺起来的呢？这个问题吸引我们注意到当时正在有如异军突起般发展着的乡镇企业，当时因为这些是公社和生产队所办的工业，所以一般都称作“社队工业”。集镇是社办工厂集中的地方。这时集镇上新办的工厂纷纷到农村里去吸引农民出来当工人，集镇的人口也就多起来了。工业带来了繁荣，集镇上新的建筑一座座盖了起来，面貌大变。农村里也由于生产大队或生产队办了工厂，收入增加了，农民生活改善了。这种令人兴奋的景象，很自然地吸住了我们的研究兴趣。

这里也不应当忽略我私人的因素。我30年代调查江村的兴趣是被当时该村举办的生丝产销合作社引起来的。我在江村调查里得出了“人多地少，工农相辅”这个对当地农村经济结构的概括。从此也得出了发展农村工业是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必由之路的观点。这种观点我又在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初期的云南内地农村调查里得到支持。时隔30年，事实证明我早年的主张并

没有错。我对此自然十分激动。这股出自内心的动力很容易把我推向这个研究课题。

回顾从 1982 年到 1984 年这三年，我的调查活动几乎全部放在江苏境内，从吴江一个县开始，扩大到包括吴江县在内的苏南四市（苏州、无锡、常州、南通）；接着从北向南，访问了苏北四市（徐州、连云港、盐城、淮阴）；再从南京沿江而下，访问了苏中三市（南京、镇江、扬州）。这样，对江苏这个沿海省份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概观。在这三年的调查里，我看到当时江苏各地的发展是快的，但也不是平衡的。而且，可以看出经济水平由北而南逐步提高的趋向，并可以用各个地区总产值中的工农比例在数量上表示出来。北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工农比例是“工三农七”；逐步向南，经济水平逐步提高，工农比例也随着发生变化，工升农降。接近长江北岸，工农比例持平；过江偏东，已达到“工七农三”；靠近上海一些乡村，当时已出现“工九农一”的比例。综合这些情况来看，发展乡村工业确是农村经济由贫致富的有效途径。这对我这三年的思路有深刻的影响，表现在我这个时期发表的《小城镇四记》（《小城镇大问题》、《小城镇——苏北初探》、《小城镇新开拓》、《小城镇再探索》）里。

1984 年我结束了对江苏的初步调查后，除了继续在江苏各地跟踪观察外，我的研究重点跳出了江苏。一路是沿海南下，经浙江、福建到两广；一路是进入边区，从东北过内蒙古入甘肃、青海，并访问了新疆和宁夏。此外还在沿海和边区之间中部地区的河南、湖南和陕西了解一些情况。到 1988 年底的足足四年多里，我东西穿梭，南北奔走，使我的思路得以开拓和提高。真觉得行万里路胜读万卷书。接触不同的人和事才能有所比较。有比较认识才能深入。我在这调查过程里，也不断把所见的情况和苏南比较，因而对“苏南模式”有了较深入的认识，突破了原来

的一些观点。下面我将择要一述我的思路。

二

“苏南模式”这个词是我在1983年所写的《小城镇再探索》中提出的。那时我刚从苏北四市调查回来，感觉到苏南这个地区在农村经济发展上自成一格，可以称为一个“模式”。至于其特点是什么，和其他地区有什么不同等等，在我的认识上还不很明确，所以也没有具体地交代明白。

由于当时我对“经济发展模式”这个概念不明确，甚至还认为其他农村在今后会上苏南一样的路子，所以“模式”一词包含了“模范”的意思，甚至带着“样板”的味道。这是不正确的。其实苏南农村由于其特有的历史和地理条件，它们在发展过程中既有和其他农村相同之处，又有其独具的特色。把它看成一种模式主要是在显示它的特点，不同于其他地区的个性。模式在概念上应当和样板区别清楚，不然会带来不良的后果。因为今后中国农村的发展，应当避免强制不同条件的农村仿效一个样板。“文革”期间的“学大寨”是一个不应当忘记的教训。1986年当我在温州看到了和苏南不同的另一种在农村里发展工业的路子时，就警觉到我所提出的“苏南模式”的概念不够明确，而且带有成为“样板”的危险性，所以着重提出“因地制宜，多种模式”的主张。

我所说的“模式”是指在一定地区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特色的经济发展过程。苏南和温州是两个地区，具有相同和相异的历史条件，而在经济发展上走出了两条不同的路子。我们这些研究者有责任把这两条路子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不同，做出具体分析。分析的结果可以突出各自的个性，称之为不同模式。下

面可以简单地以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比较来作说明。

这两个地方有相同的背景。自从 50 年代后期都实行了公社制度和“以粮为纲”的政策。这是全国农村基本一致的历史事实。这两个地方都是地处沿海，人口密集。人多地少是它们的共相。但是两地的历史条件却有区别，苏南历史上是个农村手工业发达的地方，是以“工农相辅”来维持农民生活的。即在计划经济下还曾有过一段时期为了外贸的需要，维持了一定限度的传统家庭副业。温州则是个侨乡。这地方的农民一向到海外去经营小商业，用侨汇补贴家用，解放后，国门封锁，外出受阻，逼得人口大量到全国各地去卖工卖艺度日。两地的传统因而相异。同样在人口压力日益增长下，苏南农民抓住“文革”时期大中城市工业停顿、大量技工回乡的机遇，在原有“工农相辅”的传统下，由公社和生产队办起了小型工业。农业体制改革中农村里的大量剩余劳动力解放了出来，吸收进了社队工厂。这就是我在 80 年代初期看到的情形。温州没有办工业的传统，也不靠近工业城市，没有发展社队工业的条件。在“文革”期间大量外流的人口分布在全国各地，起初是卖工卖艺并偷偷地按他们经商的传统本领在地区间进行贩运。1984 年改革的政策承认了长途贩运的合法化。这一大批流动的人口摇身一变竟成了一支公开的流通大军，在国内开辟了大市场。就是这支流通大军回乡来分别开办家庭工厂，制造小商品以供应已开辟的市场，在短短的两年里在温州一市出现了有名的十大小商品市场。两个地方由贫致富是一致的，但是境遇不同，所走的路子也不同。结果两地的经济结构也各有特色。

先说苏南模式。苏南模式的初期是社队工业。社队工业产生在农业体制改革之前。当时这种社队工业究竟是什么性质的企业呢？这些小型工厂实际上是公社或生产队经济结构中的一部分，由公社的书记或生产队长领导和管理。这种工厂里的工人是从本

社或本队的社员家中招收的，记工分不拿工资。工厂的利润到年终结算，除了一部分作为公社或生产队的财政和公益开支外，归入生产队的工分基金，平均分配给社员。这种工厂如果有利可图，上级政府还可以上调作为自己一级政府的企业。

当时牌子最硬的是国营企业，属全民所有制，有属中央各部管的，有属省、市管的。县办企业有的还够不上称地方国营，就称作“大集体”，于是就把公社或生产队办的企业称作小集体。我当时也跟着把社队企业视作集体所有制的企业。新生事物的称呼难免含糊不清。事实上苏南的乡镇企业初期是公社体制胎生的产物，它应当说是社队所有制，所以最初都叫它社队工业。

在苏南，公社体制改革后，农工分了手。农业经营承包到户，而社队办的企业却没有分，照原样办下去。公社名称改成了乡，生产队改成了村，社队企业的名称也得改。一般称作乡镇企业。这些乡镇企业还是由乡长或村长领导和管理。一直到现在，一些村办企业，还是由村长说了话才算数。在这个变动中，由于取消了工分制，工厂不能不按工人发工资了。但是一般工资还不是直接发给工人本人，而发给工人的家长。后来加发奖金时，在厂的工人才真正有现钱分到手上。我曾把这种在改革中常见的情况比喻作蝌蚪变青蛙的过程，脱掉尾巴要有一个过程。到目前苏南的乡镇企业里还可以看到公社制留下的尾巴：乡办企业利润归乡政府支配，村办企业的利润归村里支配；管理上还是乡长和村长掌权。实事求是地说，我想这种乡镇企业可以称作地方干部经营的社区所有制。社区是指一定地区里共同生活的人。社区所有制是指名义上所有权是属于这个乡或这个村全体居民的，而事实上由于利润由管理这个社区的行政机构所支配，所以性质和“地方国营”相类似，它跟国营企业不同只是一是全民所有，一是乡村居民所有。在当前阶段不论是全民所有或乡村居民所有，实际管理权都握在各级行政领导手上，政企还没有分。

这一点说明白后，苏南模式就可以和温州模式在所有制上作出区别了。温州当然也有和苏南类似的乡镇企业，但是主要是家庭企业，就是所谓个体户，属个体所有制。严格说，如果个体的意思是指个人，温州街上的作坊也并不真是个人所有的，而是家庭所有的。家庭里有不少成员，而且通常并不限于直系亲属组成。许多是已婚的兄弟甚至亲亲戚戚合组成的家庭作坊。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各人的责任和收入都有事实上的规定，有时甚至可以说是股份制的雏形。但是通常我们却说这是“个体所有制”或私有制。

当我在温州调查的时候，这些家庭作坊已出现“走向联合”的趋势。我用“联合”一词，是为了避免用那个可能会引起心有余悸的人反感的“合作”这个词。其实在外文里称“联合”不如称“合作”更确切。不同的个体企业联合起来按“合作社”的原则来经营，这是一种合作性质的集体所有制。这种合作组织常是以“亲戚”或街坊关系组成的作坊，也可以说是家庭所有制顺理成章的发展。在这里我们可以体会到个体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只在概念上可以有严格的界限，这种界限在现实中是相当含糊的。家庭企业和各级政府所办的企业基本的不同是在一般所谓官民之别。

如果允许我在这一点上再作一些发挥，我想说在苏南模式中的社区所有制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家庭所有制的发展。公社和生产队一般都认为是社会主义时期的新事物。在历史过程中确是应当这样认定的。但是如果再一想，为什么公社这个制度能这样容易为中国农民所接受，而且运行了20多年？过去很少人敢于提出这个问题，但是我想是值得加以思索的。在生产队的具体运作中，我看到了传统大家庭的影子。一大二公，何尝不是大家庭甚至推而广之到一个家庭的指导思想？家长做主，统一指挥，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又岂不是一个家庭或家族的根本组织原则么？

从这个角度看，社队企业的发生，它的经营方式，招工和分配原则，无处不能从传统的大家庭模式里找到对应。社队企业是社队的副业。我并无意贬低新生事物新的一面，只是想指出新生事物似乎都不能和传统模式相脱节，而且常常是脱胎于传统模式的。我指出这一点体会，很可能和鹤见和子教授的“内发型的发展论”有相通之处。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从乡土社会发展到工业化后的现代社会，这条道路上传统文化会起什么作用，消极的和积极的两个方面，都值得我们平心静气地加以分析和评估。要能做到这一点，我们不宜从概念到概念地作理论上的纠缠，而应当从活生生的一个个人的具体生活、思想和精神状态中去观察和体会，以求得深刻的理解。

三

沿海各省这 10 年里农村的发展，总的说来都是走兴办小型工业的路子，但各有各的办法。办法之所以不同都和各地特有的具体条件相关，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上述的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可是在最近三四年里，珠江三角洲又出现一种和上述两种模式不同的发展路子，不妨称之为珠江模式。我对这个模式虽则还没有深入调查研究，但这个模式对我的思路却起了有力的冲击和推动。

我到广州附近的东莞去访问是在 1988 年底。但是在和这个发展模式接触之前，1985 年我在访问香港时已有所感觉。我在访问回来所写的《港行漫笔》中有这样一段话：“从观塘的蜂窝厂家出来之后，我突然产生一个奇特的念头：如果我有孙悟空的本领，真想一口气把这密密麻麻挤在多层大厦里的许多工厂，吹散到内地广大的农村去。那么，这些蜂窝厂家不就成了无数的乡

镇企业了么？我们除了无需建筑多层工业大厦之外，香港的小型工业在经营上确实是我们乡镇企业的一个范本。这范本里写着乡镇企业下一个发展阶段的文章。”

香港原来是个国际港口，在过去 20 年里利用大陆上移入的劳动力和世界各地的原材料和市场发展了多种多样劳动密集型的小型工业。这些小型工业在我去访问时已有 4.7 万家，一家工厂是一个核算单位，职工达 85.5 万人，平均一家只有 20 人。这些工厂都挤在多层大厦里，一层楼里可以有好几家小工厂。一个老板可以有好几家以至几十家工厂，所以我称之为“蜂窝厂家”。当时就想大陆上的乡镇企业如果能像香港这样办，原料、市场两头在外，农村里的劳动力加上先进技术和管理，不是可以又跨上一层台阶了么？

我当时只想摇身一变，变成个孙悟空，把香港工业大厦里的蜂窝厂家一口气吹到大陆上去。没有定下神来再思考一下，怎样吹起这阵风来。时过三年到东莞一看，我那时的奇特之感却已成了事实。是哪一阵风把这些小工厂从香港吹来的呢？并不是真的出了个孙悟空，而是香港和大陆两地工资和地价的差额所构成的那一个气流，当隔着两地的政治屏风一撤走，不可避免地刮起了这阵经济风，在短短的两年里，珠江三角洲大大变了样。香港工业正在扩散。

我去访问东莞是应一位亲戚之邀去参加他办的一个成衣工厂的开张典礼。这个厂就设在东莞专为外资办厂的工业区里，从签约到开工只有半年。这位亲戚原来就在香港观塘办有一个成衣工厂，我访问香港时曾去参观过，也就是我发生奇特念头的地方。事情是够巧的，也因之对我思路的启发特别强烈。

更有意思的是就在当天，我在香港的报纸上看到一条报道，说是香港有一家工厂的职工静坐在厂房里不让老板把机器运走。至于这个老板为什么要搬走机器，把机器搬到哪里去，报道里没

有说明，只说是这个工厂的职工怕失业，反对把机器搬走。我那位亲戚在香港的工厂并没有关闭，但他和我说，香港工人的工资一个月要 3000 港币，而在东莞只要 300 元人民币。他加了一句说，大概相差十倍。这是风源。这阵风会不会把他在香港的厂刮走，我不敢预料。香港怎么变，我们暂时可不管，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阵港风在大陆上吹起的变化。1988 年大陆上的沿海发展政策就是这阵港风吹来的。大出大进，两头在外，三来一补，外向型企业，外贸权下放等等，已变成了经济改革中的流行名词，我已应接不暇。

从香港吹来的这阵风，也唤起了我的记忆。我记起了前几年我曾请那位亲戚到吴江去参观，目的是想在江苏和香港之间搭座桥。我建议他在我们家乡开个分厂。他看我的面子，把办厂计划都搞了出来，可是快要签约前，他的几个合伙的朋友却退缩了，原因是吴江离香港太远，能不能按期交货没有把握。失信事小，赔钱事大。我的面子毕竟大不过经济规律，这个项目吹了。不料事过几年，原来可能在吴江见到的这个工厂却在东莞出现了。这件事说明了人情世界已经过时，面临的是个我还不熟悉的、也不习惯的由经济规律决定的社会经济秩序，一个韦伯所阐述的理性世界。珠江模式的出现看来谁也挡不住的。

令人深思的是上述三种模式的差别。如果我们可以说苏南模式多少带着浓厚“内发型”的意味，珠江模式应当可以说是“外向型”了。当然苏南模式中也包括接受从上海这个大城市扩散出来的技术和信息，但是在程度上和珠江模式相比却大有区别。我所看到的这种珠江模式的主要特点是不仅两头在外，而且可说主体也部分在外，因为掌握着经营管理权的并没有脱离它原来的中心，而且利润主要部分是吸收到外在的中心里去的。苏南模式是当地农民利用城市的协力自己创造出来的企业，而珠江模式则是外地企业在当地农村自愿接受的条件下输入的企业。在所

有制上苏南模式可说是社区所有制，而珠江模式是什么所有制，我还说不清。它们在发展我国农村经济上都起着重大的作用；今后怎样发展下去，二者是否还会发生新的区别，还是留待以后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后再说吧。这里我只记下一些初步接触时，思想上所发生的一些启示。

四

自从我接触到了“珠江模式”后，我对发展模式的概念又有了深化，在多少带着一种静态意味的“因地制宜，多种模式”上加了个“随势应变，不失时机”的动态观点。

我在比较苏南和温州这两个模式时，已注意到前者背靠上海这个大城市和苏、锡、常、通四个中等城市。而温州却背山面海，是个被备战形势封闭的港口，没有大中城市可以依靠。这个区别可能是这两种发展模式分道扬镳的起点。当我接触到珠江模式时，心里不得不想到它和苏南模式之间的区别是不是出于各自的靠山不同，一是上海，一是香港？上海在抗战前原本是个仅次于日本东京的东亚大港。那时香港只是国际航运线上的一个船只靠岸、加水、加煤的码头，在这里上下的旅客和装卸的货物是有限的。当时中国的南大门还是在广州，所以广州的市面比香港更为繁荣。自从新中国成立，大门紧闭，对外实际上只留了香港这一个借道的出口，香港却因此发迹了。

香港在近10多年来简直是像张开了满帆，在顺风中破浪前进。香港现在的大亨们有多少不是这些年头靠地价上涨而发起来的？香港已成了个东亚可以和东京并立的现代化国际商业和金融中心了。近年来又发展了近5万家工厂。看来香港的工业基本上和温州模式一样是由商业带出来的，相同的是都属小型制造业。

不同的是温州的市场在国内而香港却面向世界，小巫见大巫。珠江模式是抓住了香港和内地工资差和地价差，不失时机地兴起的，是香港经济的扩散。

苏南靠近上海。而上海，30年来已是个封闭性的工业城市。上海的工业主要是按计划经济经营的国营企业。国营企业原材料供应和产品分配都由国家包办，自身不会发生向外扩散的作用。上海的经济扩散力因此不能和香港相比。长江三角洲在这方面比珠江三角洲也就相形见绌。如果不是“文革”把上海这种封闭状态打开了一点缺口，在“停产闹革命”中大批老技工回乡，苏南当时的“社队工业”，看起来也成不了“异军”而突然兴起的。

近年来在改革开放政策下，苏南企业才逐步靠上这个比较开放的大城市。后来居上的昆山县乡镇企业在近两年里的发展，就是例证。苏南乡村企业要进一步发展还得紧靠上海这样的工商业中心。但是上海却比不上香港，因为它自身还需要转轨，而转轨不是容易的。何况现代世界经济中心已经不以工业为主，而是以信息为主了。上海要恢复它原来的国际地位，要补的课是十分艰巨的。上海发展得慢，扩散力量小，它对苏南的带动作用现在还是有限的，这匹老马已拉不动更远的车了。在苏北就能见到上海力所不及的情况。

香港在经济扩散上有多大能耐呢？我带了这个问题前年到海南岛，去年去广州西北的梅县，最近又去了广西的桂东。我看到的是这股港风正在吹向珠江三角洲的外围。翻开地图来一看就可以明白：从香港这个中心向大陆扩散，像波浪般形成了若干层次的同心的环形地带。第一环是深圳和珠海，这些地方现已成立了经济特区。再向里，第二环是广州附近的东莞、中山、顺德、南海这四个县。它们已被称为突飞猛进的“四小龙”。以年纪论，还不出两三岁，它们都是两年前广东列入沿海开发区之后兴

起的。香港的这阵风已经吹进了第二环，但是会不会吹遍全省呢？我的看法：继续扩大是可以肯定的，至于扩大得多快和多大，看来并不决定于香港的实力，而决定于我们的政策和投资条件。香港是个国际金融市场，资金是唤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其来其去决定于利润的高低和风险的大小。如果我们国内安定，开放政策不发生变动，最后限制这阵港风的将是具体的投资环境，其中水电和交通是决定性的条件。这个机遇能否抓得住，那要看我们自己是否有随势应变的能力了。

我在广东的梅县和广西的玉林及梧州都已微微地感到这阵扑面而来的港风。梅县在粤东山区，过去是早年从中原移来的被称作“客家”人的中心。由于土地贫瘠，很多人不得不出海谋生，所以成了有名的侨乡。客家人爱乡观念很强，过去是用侨汇来接济留在故乡的亲人，现在很积极地想投资开发家乡的山区。但是，由于地处偏僻，离开广州、厦门和汕头都有相当距离，他们心有余而条件不够。去年集资开辟广州到梅县的航空交通，极力争取香港工业的扩散。但到目前为止，这里还只能说是香港工业扩散区的西部边缘。

香港工业如果会进一步扩散，看来从广州沿西江西去较为便利。从梧州出发的轮船，顺西江东下，当天可以过广州到香港，而且梧州正在积极筹建机场，在接受投资条件上比梅县为优越。后来我听说港风已吹到了处在广州和梧州之间的肇庆市。可惜我交臂错失了去现场参观的机会。无论怎样，西江可能具有迎接香港工业扩散的有利条件。但目前看来还没有形成第三个环形地带。

五

上节所讲到围绕香港这个中心的三个环形地带只是从香港工业扩散的角度来说的。如果进一步分析这些地带的产业结构，还有各自的特点和相互的关系。目前这个地区各种产业正在发生地域性的分化。我们已看到的是香港把许多劳动密集型的工厂或车间向珠江三角洲转移，因而引起了珠江三角洲原来用在农业上的劳力和土地在向这些新兴工业转移，同时也引起了珠江三角洲附近地区农村的变化。由经济中心向四周的辐射，像波浪形地一层层扩大，已到了广东的邻省，构成了我们的研究新课题。

1988 年底我曾从广西的南宁，经玉林、梧州北上，从恭城入南岭山脉，穿过湖南、粤北回到广州。这个地区正处在上述工业扩散区的外围，看到了不少值得注意的变化，使我感觉到这里正在形成一个为香港和珠江三角洲这个经济中心服务的农副产品的供应地带，将发生独具一格的发展模式。先说几件启发我这个想法的经过。

当我坐的车离开南宁不久，公路旁有一个很惹眼的新建的村子，村子四周丘陵两侧全是成片的菠萝田。同行的人告诉我这是个安置从高山上迁移下来的瑶胞的村子。自从引进了菠萝这项“一村一品”的拳头产品，现在这里瑶胞平均收入正在逐年上升，目前每人已超过 500 多元。我追问之下，知道了这里培植的菠萝产量高、质量好，而且近年来发展了商品经济，打开了销路，供不应求。最近又发展了加工工业，生产便于运输的菠萝罐头和菠萝饮料，大量供应香港。这番话不仅打破了瑶胞不愿下山定居的传说，而且显示了只要沟通香港这个市场，像南宁这样的地方都能大量培植经济作物了。

我带着这个印象到了玉林，在席间尝到了这里著名的三黄肉鸡。主人又告诉我，这几年来农村家家户户饲养这种肉鸡，每天有汽船拖着一串串装满了肉鸡的木船运往香港。香港人就爱吃玉林的肉鸡，一年要收购 500 万只。这番话使我回忆起四年前在苏北考察时看到的“百万雄鸡下江南”，长江北岸里下河地区近年来盛产的粮食，农民自己吃不完，发展了饲养业，为上海居民提供肉鸡，每天成百上千辆自行车载着鸡笼向上海进发，形成奇观。

我从广西恭城出境进入湖南，在江永县边境下车休息。一望公路旁全是橘林，村里有一家瑶胞正在办喜事。主人对我这个不速之客分外殷勤，而且告诉我，他们全靠引进了夏橙，这个村子的瑶胞已经全成万元户了。夏橙是一种在树上挂果长到一年的橙子，在夏季收获。它不仅质量优良，而且赶在秋橘的前面，市场畅销。近年来几乎全部被香港商人包下了，有多少要多少，价钱又高。不到四五年，这个穷山沟里的瑶村，家家户户住上了砖房。

我在南岭山脉里，一路上就看到了一旦抓住供应城市市场的机遇，大搞对路的种植和养殖业，不消几年就脱贫致富了。这个规律是很容易明白的。香港和随着兴起的深圳、珠海以及珠江三角洲新兴的“小龙”，有近千万人口已完全脱离了农业，他们日常所需的粮食和副食品均需市场供应。这个市场随着工商业的发展正在迅速扩大。珠江三角洲原来是供应广州和香港的粮食和副食品基地，现在发展了工业，农田面积每年缩小，农业劳动力逐步减少。而且依靠市场供应粮食和副食品的人数大增。这种产业结构的改变，给外围地区提供了机遇。正和每个都市近郊都有个蔬菜供应区一样，这样一个大香港经济区必须有一个庞大的粮食及副食品基地为它服务。这个以种植和养殖为主的供应地带的位置，将按它和经济中心区的交通条件来决定，而且将随着经济中

心区的扩大而向外延伸，现在正在由珠江三角洲沿西江和北江延伸出去，前哨已达到粤北和桂东地区。对桂东和粤北来说就应当不失时机地改变自己的产业结构，向生产瓜果、蔬菜、禽蛋、肉乳发展，充分发挥它作为经济中心区的副食品供应基地的作用。

我带着这个想法，进入湘南的南岭山脉。这是瑶族的主要聚居区。瑶族分布在山地居住，所谓“无山没有瑶”。但是出于我意外的是在江永县看到在都庞岭和萌渚岭之间，沿公路有大片的荒地，据说有几万亩之多。联系到南宁附近种菠萝而定居下来的瑶村，不由得我不产生让瑶胞下山来开辟这片平地的设想。如果这片大荒地变成了良田，不就成了珠江三角洲工业发展区的供应基地么？

瑶族是善于农耕的民族，他们在上千年前就住在像我在江永看到的千家峒那样四围高山的小盆地里，过着“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生活。30年代我自己在广西金秀瑶山里，曾尝到过平生最可口的粳米。这是说在农业技术上，瑶族同胞是有基础的。还必须看到这个山区由于地形的落差大，有充分发展水电资源的条件。现在广西的恭城县已经是农村电气化的先进县。如果能利用潇水上游的水和电，建设水库和灌渠，发展水电，这个地区无疑可以开辟成粮油禽畜的农业基地。

我穿过湘南一角进入广东，在这个有近百万瑶族聚居的南岭山脉里，遍山林木，正适宜于培植果树；上面所提到的夏橙就是一例。而且有山必有水，山谷里都有培植蔬菜的坡地。我在日本东京附近山区曾参观过他们培植山地蔬菜的作业，这种蔬菜在欧美称没有污染的自然食品，价高而畅销。这段山区里，公路业已修通，今年底从连南到广州走高级公路只有四小时路程。具备了这样的交通运输条件，成为香港和珠江三角洲的供应基地是可以实现的前景。

我看中这条南岭走廊，不仅是从经济发展的规律着眼，而且是从民族政策出发的。这里如能建立起一个美丽富裕的瑶族自治县，正可以为体现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里民族平等团结、共同繁荣的政策树立一个可供世界各地旅游者参观的例证。

要实现经济中心区外围的供应地带，由于地域广阔，必然会超出现有省区的行政界限，政策上不加以调整，就会出现困难。前年我去湖南访问时，就知道当时广东和香港对粮食和副食的需要大、价格高，湖南的郴州地区的粮食和生猪大量外流，提高了当地的米价和肉价，甚至外流人口的增加引起了湘南各县农业劳动力不足，怨言很多，去年因湖南粮食歉收，这些问题更为严重，导致湖南用行政手段封锁粮食输出。但是行政手段每每挡不住价格差的冲击力，陡然增加了边境上的纠纷。这里可以看到随势应变的必要，政策必须灵活，才能不失时机。广东由于吸收香港的工业扩散开辟为开放省，那是随势应变的例子，结果出现了珠江三角洲的“四小虎”。广东的经济发展就会辐射到靠近广东的几省的边缘地区，也必须及时制定配套政策，才能转变消极影响为积极影响。这是客观规律决定的事，迟做不如早做。

被省、区行政界线分割的这条南岭山脉，地形、生态甚至民族构成，基本上是一致的，在经济发展上又是处境相同、休戚相关，所以我认为首先应进行密切合作，为将来联合发展的前景做出准备。

以上是我在沿海诸省调查中的思想活动的缩写，下面继续讲我的边区调查。

六

1984年我扩大研究范围，除沿海诸省外，还包括了西北边

区，主要是内蒙古、宁夏、甘肃和青海，两个自治区和两个省。在过去四年里，我在开发边区这个课题里开始着重做了农牧结合和城乡结合这两个题目，进而产生了“全国一盘棋”的观点，被我国的东西差距和民族差距吸引了我的研究兴趣。

西北边区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拥有广阔的牧区。我国牧区草原一共约 43 亿亩，占国土面积约 1/3，主要就在西北边区。历来牧业是这个地区的经济基础，而且具有极大的潜力。从事牧业的又都是少数民族，从发展少数民族经济的角度看去，牧业的现代化更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我认为要研究边区开发问题，应当从牧区入手。

早在 1956 年我曾去过一趟内蒙古东北角的呼伦贝尔盟。当时这地方的牧业还保持着传统的游牧方式，就是牲畜在草原上自己找草吃，一块地方能吃的草不够了，就换一块地方，不断移动。冬季另有避寒的草场。所以牲畜并不能长期住定在一个地方，牧民跟着牲畜移动，也不能有固定的房屋，更不能有固定的村落。呼伦贝尔是内蒙古有名的草原，牧业比较发达，50 年代又在苏联的协助下，建立了现代化的奶粉厂和屠宰厂。这是我初次和牧区接触，印象很深。

以整个内蒙古来说，牧业是当地蒙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主要传统经济基础，但是它的南部与汉族杂居地区，引进了农业，草原在退化，牧业也在衰落。这里存在着农牧矛盾，同时也正是过去发生民族矛盾的地带。因此我这次打算从农牧交错的地区入手去研究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问题。我选择了现称赤峰市的昭乌达盟为观察的对象。

从赤峰的历史上我们发现这个地区曾是个农牧和民族拉锯的地带。从考古学者发掘到的古代遗物来看，有理由相信在春秋战国之前这里曾经有过较发达的农业文化，但是后来被北方的游牧民族所占领，农业荒废，成了林草丰美的牧业地区。它地处燕秦

长城和明长城之间，留下了南方农业民族逐步南迁的记号。这里即在宋代，还有“平地松林”之称，并不是一片荒凉的草原。自从18世纪初，清朝允许汉人出关之后，200年来，赤峰成了蒙汉杂居的地区，也是农牧并存的经济。

农业和牧业原本都是从采集经济里发展出来的，一是驯养了牲畜，一是培植了农作物。不同民族因自然条件的差别，因地制宜地分别以农或以牧为主导生产方式。但事实上没有一个民族的农业或牧业能成为单一性的经济。农民需要肉食和畜力，牧民需要粮食和日用品，所以农牧总是相互补充的。农业和牧业在一定条件下才发生矛盾，那就是粗放型的农业向牧区扩张，破坏了牧民生存空间的草原。

赤峰西拉木伦河流域广大的草原就是一例。在清末开始有汉人移入这个地区，到民国初年军阀割据时，当时盘踞在这里的军队，强占了这片草原，招募关内农民进行开垦。当时的所谓开垦实质是一种广种薄收的对土地的掠夺。开垦几年，地力耗尽，就丢荒另开。这片被丢的土地不久就沙化，严重的寸草不生，成为流沙，进一步侵入附近的草场，形成难以抗拒的破坏力量。同时人口增加，建屋、取暖和起炊，都需要木材。由于只砍不植，年久日长，原来森林茂密的草原，到近几十年已成了一片树木稀少的旷地。森林破坏，引起水土流失，加速了沙化。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所形成的三角地带的草原一半已经沙化，赤峰市的其他地方情况更为严重。这是粗放农业和自然牧业碰在一起所发生的“农牧矛盾”。从外地进入开垦的人都是在本乡不能谋生，在这里又受到军阀苛刻剥削的穷苦农民，但因为他们是汉人，而牧民是蒙古人，因而农牧矛盾转化成了民族矛盾。

上述民族矛盾从50年代起，在实行民族平等团结的政策下是结束了。但是滥砍、滥牧、滥垦、滥采等破坏森林和牧场的现象并没有根本扭转。我在访问赤峰的旅程中，才初次看到沙化了

的草场和移动中的沙丘，深刻地意识到如果要开发边区首先必须用大力来恢复自然生态平衡，治沙、防风、种草、种树是最基本和最迫切的措施。

解放以来 30 多年，在恢复自然生态平衡上是做出了成绩的。但至今还是属于小面积的实验性质，只能说在扭转生态恶化上已找到了有效办法。但科研成果要成为一个个地区成龙配套的治理方案，还有待创造各种必要的条件才能实现。

从已有的种种实验中，我得到了启发，认识到开发边区必须走以牧为主、农牧结合的道路。在像内蒙古那样广阔的草原上，如果能大力发展现代化的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贡献是难以估计的。要认识到这一点首先须破除汉族传统的“以农为本”的狭隘观点。历史上的汉人确是个墨守神农氏传统的民族，每到一地就想法开垦种植。要知道粮食只是人类得到营养的一种来源，肉类不一定是“副食品”，也可以成为主食的。如果占有国土 1/3 的草原能充分利用，成为全国人民肉食供应基地，就可以减少对粮食的需求，而使农业地区的土地能从粮食的压力下解放出来，向培植经济作物转移。在宏观上去看，这是一项提高国民生产力的大战略。

在内蒙古一样的有牧业传统的草原，要提高畜产量，看来必须逐步改变让牲畜自己在草地上找草吃，人跟着牲畜移动的原始性游牧方式，而把牲畜固定在一定的地方，由人去找适合牲畜生长的饲料来喂它们。简单说是由放牧改变成饲育。

我在赤峰的巴彦他拉看到过去因开垦而破坏的草场已开辟成牧草生产基地，每年提供大量牧草给其他地方去饲养牲畜。又在黑塔子听到“退农还牧”的计划。他们打算建立奶牛基地，把原来开垦成的农田改种牲畜的饲料，做到一头母牛有“一亩青贮、一亩草料”。我在这里得到了“发展为牧业服务的农业”的概念，用来说明“农牧结合”的具体内容。

我又去参观了韩丁创建的接受联合国援助的翁牛特旗示范牧场。这个牧场利用现代化机耕设备种植青饲料，为各地送来的牲畜催肥，然后外运出售。这是一种放牧和舍饲相接力的方式。放牧的牲畜长到一定阶段，送到这个“催肥工厂”里实行舍饲。看来这是牧业改革的一个重要试验。

现在国内的牧场一般发生了草场退化的现象，主要是出于超载的原因。一块土地上的草是有定量的，如果供应过多的牲畜，必然会影响到次年的草产量，年复一年草场就退化了。现在通行的对策是设置“草库伦”，就是用铁丝把一块草场围起来，防止牲畜进入；使草场有休息生长的时机。如果再加上放牧和舍饲接力的方式，草原超载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这就是说，把一段时间里供应牲畜饲料的负担，由草场转移到“催肥工厂”，由这工厂的精耕青饲料去饲养牲畜，使草场有休养生息的机会，不致退化。

我后来到甘肃临夏去调查，看到了当地传统里就有和联合国协助的示范牧场一样的放牧和舍饲接力方式。临夏靠近青海的牧区，每年秋末从青海有大批羊群赶到临夏来出卖给临夏的农民。临夏的农民种玉米作青饲料，分别在自己家里喂养买来的架子羊，喂肥了，趁古尔邦节出售给当地回民。这不就是放牧和舍饲的接力方式么？

从接力方式再进一步就是结合方式。我去年又去访问呼伦贝尔，看到了30多年来的变化。我在上面说过，50年代在海拉尔建立了一个现代化的奶粉厂。当时为收买牧民的牛奶发生过许多困难，原因是牧民住处分散，厂方要用卡车到各个蒙古包去收奶，费时费力。而且当时还没有冷冻车，如果卡车在草原上抛了锚，一车的奶就坏了。这次我去访问时，却看到了牛奶业的发展已推动了牧业的改革。

我去参观了几个定居的牧民点。他们所有的牲畜已改以舍饲

为主，只在附近地区放牧做补充。他们用拖拉机到远处收割草料回来喂养圈在住所旁的牲畜。他们许多家聚居在一处，所以奶粉厂收购就方便了。同时这些定居的牧民已开始奶粉厂的协助下，开办小型的自负盈亏的加工车间。他们从培养草料实行舍饲，已发展到自己建厂进行原料加工。这些定居的牧民由于有了聚居的村落，村落里有公共的社会化的服务事业，包括小学和医院。这里看到了牧业改革带来牧区的新气象。这也许是牧区通往现代化的一条有效道路。在这里，我看到了少数民族发展的前途，开拓了我的思路。

七

内蒙古幅员辽阔，经济上地区差别很大，概括地说是东林、西铁、南农、北牧。我在赤峰着重了解农牧的情况。接着，1985年到包头，想继续了解西铁的情况。如果说赤峰调查看到了该地自然生态的失调，在包头的初步调查却看到了过去在边区建设的大工业所产生的人文生态的失调。人文生态是指一个社区的人口和社会生产结构各因素间存在着适当的配合以达到不断再生产的体系。人文生态失调是指这种配合体系中出了问题，劳动生产率日益下降，以致原有生产结构不能维持人口的正常生活和繁殖。在整个西北边区，人文生态失调和自然生态失调同样值得注意。

我们都明白西北边区在经济发展上现在是落后于沿海地区，而且这个差距还在扩大。但是说来不大能令人相信的是，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从50年代到80年代的30年中，国家工业建设的重点曾经放在中部和西部之间的走廊地带，从内蒙古经陕西、甘肃到四川，投资达3700亿元。在我们这样一个工业不发达的国家，这个数目是不算小的。用这笔钱建成了九条铁路和几千个

大中型国营企业。但是这几千个大中型企业，却并没有成为这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启动力。至今西北地区的人民生活还停留在人均年收入 400 元以下的水平，“老少边”地区还有几千万人在贫困线以下生活。这是为什么呢？

我从这几年的实地观察中才了解到西北地区的工业建设，可以分两个时期：最初是第一个五年计划里苏联协助的建设项目，我在上面提到呼伦贝尔的屠宰场和奶粉厂即属此类。这类项目大多是大型的国营企业，并以重工业为主，有些就建设在西部和北部的少数民族地区。当时还希望通过这批重点项目的建设在开发这些地区资源的同时，使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得到发展。接着，60 年代起由于备战需要，国家工业建设还是集中在西北地区，并采取了“散、山、洞”的方针，就是把工厂分散到山区，机器放在山洞里。这些工厂一般称之为“三线建设”，主要是国营的军工企业。不论早期或后期这些工厂都不是在当地社会经济的基础上生长出来的，而是从上而下，由外投入的。

我们如果从社会学的角度去看这些企业，就能见到它们的特点，首先是“企业办社会”，也可以说是“社企不分”。企业的从业人员和他们的家属组成了一个在社会生活各方面力求自给自足、对外很少联系的封闭性社区。这在少数民族地区更为突出。这些人员绝大多数是从外地招集来的，他们和当地居民原来不存在社会关系。他们的生活需要，又是大多由企业负责调运供应。所以企业不仅要管理工厂里的生产，还要管从业人员的生活，从吃到住，从壮到幼，从生到死，企业都得管。

这种国营企业又都是直属于中央或省的政府部门，它们按所属上级调拨的原材料、指定的计划进行生产，产品上缴并由上级分配。这叫产品经济，不是商品经济。它们和所在地的基层地方政府没有从属关系，当地基层政府管不着它们。具体情况当然要复杂得多，基本上这种企业是个独立于当地基层行政系统之外的

“小王国”，因而时常发生“条条和块块”的矛盾。企业的上级政府部门又都是专业性的经济部门，它们也管不了各企业从业人员复杂的社会生活，于是产生了“企业办社会”的结果。一个厂长同时是一个“市长”。这种社企不分的封闭社区，人文生态关系就容易失调。让我举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这种现象，那就是1985年我去调查的内蒙古包头钢铁厂。

包头在解放前是一个人口不到7万的“水旱码头”，黄河上游牧区产品的集散地。1953年在苏联帮助下，我们国家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大型的钢铁联合企业，简称“包钢”。它利用包头附近白云鄂博的铁矿，生产钢铁，供应国家的需要。接着国家又在包头兴办了三个重工业性质的大中型企业。这些企业的成员，从工程师、管理人员和技术工人，甚至到一般工人，很少原来是包头地方的居民。30年里包头市人口已经达到157万，其中在这几个企业为中心的市区约有80万人，形成了蒙古草原上解放后出现的一个新兴城市。

当初建厂时为了争取时间，所以定下了“先生产、后生活”的原则。在设计这些企业时，对从业人员的生活设施并没有预先打在规划之中。比如开工之后才发现工人大多是外地来的青年男子，他们在当地解决不了婚姻问题，于是不得不办一个纺织厂，在内地招收女工。男女结了婚就要生孩子，于是这些企业又要为孩子办托儿所，办幼儿园。孩子长大了，又要办小学、中学。1985年包钢所提供的教育经费达400万元。办了学校还不够。中学毕业生只有少数能到内地去升大学。于是约在70年代就已发生了青年就业问题。这些待业青年要企业自己“消化”。包钢不仅要包“钢”，而且还要包人。

包钢自从中苏关系发生变化后，这几十年是在艰苦中维持下来的。它们的物质条件还是50年代的，但是人文条件却不同了，单以人口来说已经翻了几番。现在已是个有几十万人的社区，而

这个社区并没有和当地的社区融合，还是“两张皮”贴不拢。50年代的生产力却要背上80年代的社会包袱。即以“消化”这些待业青年来说，他们先是采取“顶替”的办法。工人的人数是有限额的，编制由上级规定，企业本身无权增减。他们只能让老工人退休，由他们自己的儿子来填补，这叫“顶替”。“顶替”显而易见不是个好办法，因为这等于是用“生手”去代替“老手”，必然影响生产效率。而且顶替也解决不了每年要增长的待业队伍。于是不得不又采用了编外增员的办法，把这些青年作为“集体工”，即临时工，分到各车间去做工。各车间人员太多时，只能另辟规划外的车间，巧立名目，扩大人员。于是出现了“大集体”、“二集体”、“三集体”各个层次的附属体。形式尽管不同，都是为了“消化”这个封闭性社区里的一代代增长的劳动力。这些“集体”都依附着这个大企业，是断不了奶的孩子。总之，这个企业像个大家庭，不得不一代一代地养活不断增长的字子孙孙。而这个大家庭却并不是个不断生长中的母体，而是个生产力受限制的封闭社区，所以不可避免地进入了恶性循环，包袱越来越重，母体越来越弱，这就是我说的人文生态失调现象。

80年代，又出现另一种使母体亏耗的情况。这些像包钢这样的企业，过去历年是亏损的，靠国家补贴维持，原因且不去说它，结果是技术人员的实际收入和社会福利很难提高。到了80年代，沿海各省乡镇企业发展得很快，由于缺乏技术人员，愿出重价招聘。结果在西北这些老大的国营企业里舒展不开手脚、待遇又微薄的技术人员就像春江水发大批东流。这等于是企业里的水土流失，又成了一种严重的人文生态失调现象。

人文生态失调形成了对企业的压力，这些企业不得不进行改革以求生存。首先是以开放代替封闭。在社会方面说，就是企业的小社区和所在地的大社区这两张皮，必须贴在一起，向社企分

离的目标迈进。第一步是大企业以它技术管理的优势去协助当地政府办各种企业，增加当地政府的财政力量，使其有能力接管大企业过去所包下的种种社会服务工作，为大企业卸下包袱。这也就是使这些大企业开放出来促进广大地区的经济发展。大企业的开放不但发生了西北工业化的启动作用，而且也是自己解放自己的唯一办法。对地区经济和企业本身是两利的。这个改革过程已经开始，但是必须根据具体情形采取不同形式进行。应当承认这并不是一个轻易的过程，也为我们的社会调查提出了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我在包头看到的问题，实际是西北地区共同的问题。这促使我1988年去西安和宝鸡访问时特别注意了解“三线”企业的情况。“三线企业”就是上边所说的分散在山区，把机器装在山洞里的那些军工企业。自从政府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这些原来不计盈亏，不愁市场的国营企业，就面临一种没有经历过的要自负盈亏的新情况。它们必须转型以求适应。适应之道主要是以开放代替封闭，从产品经济走向商品经济。

国营大企业和远近乡镇企业联合起来是开放代替封闭的一个路子。我在宝鸡看到了许多具体例子。联合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西北地区国营大企业所含蓄的巨大科技潜力，形成了发展乡镇企业的启动力。我曾经在前面讲过，苏南模式的启动力得之于公社时期乡村的农业积累和“文革”时期的技工回乡，温州模式的启动力是得之于劳动输出所形成的国内流通网络和商业积累，珠江模式的启动力是得之于香港和内地工资差和地价差所造成的港风登陆。那么“三线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启动力是否可以说应当着眼于20年来国家在这地区投入的巨额资金和集中的大量科技人才上去寻找呢？关键是怎样使已经存储在西北的巨大经济能量释放出来，使其成为西北这个多民族地区共同发展的推动力。这个问题开拓了我在西北的研究思路。

八

怎样缩短、消除西部与东部之间在社会经济上的差距的问题，把我带向西北去进行观察和思考。1984 年我除了去内蒙古调查外，还去访问了甘肃的定西地区。从那年起，我连续三年到定西追踪观察。我挑这个地点去调查的原因在于它是扶贫工作的重点区之一。历史上就有“陇中之苦甲天下”，定西就在陇中的中心。

陇中高寒干旱，水土流失，生态恶化，三年两荒。每逢灾年，这里的居民能走的就外出打工、讨饭，留下来的挖草根当柴烧，爬几十里山路去背水喝，靠救济粮糊口，长期以来摆脱不了半饥饿状态。

我下乡进行家访时初次看到老百姓家里的水窖，一家人一年用水就靠这窖里储存的雨水。一个窖大约有几十立方米的容量。一家有两窖水的就算是当地的富户。天旱窖竭就得远出背水，否则就住不下去。近年来在严重时得用汽车送水来救济。这种苦景对我这个在水乡长大的人来说是无法想像的。

干旱原来是自然现象。定西地区年降雨量只有 480 毫米，如果植被丰满，蓄得住雨水，还是能经营农牧生产的。不幸的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生态平衡业已破坏。许多地方不仅树木伐光，甚至草根都被挖尽，成了赤地千里，一片黄土。再经雨后激流冲刷，条条沟壑把大地割裂成高坡深谷。远远望去活像是剥光了皮，赤裸裸地掀起背脊的大爬虫，令人恶心难受。定西这样地方的居民就在这些山沟里过生活。靠近河流的还能种一些水浇地，面积很有限。大多是靠雨水长庄稼的梯田和坡地。据估计，这地区无灾之年亩产在 100 公斤以上的农田，只占耕地面积的

1/3。本地所产粮食不能养活本地的人口。

定西这样的地区如果坚持粮食自给，必然会进一步破坏自然生态平衡，导致灾难。从自然条件来说，大部分不宜种粮的土地却可以种草，只有发挥该地种草的优势去恢复生态平衡。所以从1983年提出了种草种树的政策方针后，加上一连三年雨水好，定西大力发展了畜牧业，使这地方有了脱贫的起色。

三次访问定西，我一直被“怎样脱贫”这个问题占住了心思。我深切感到逢灾放赈的办法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所以一再呼吁扶贫工作要改变“输血”为“造血”的方针，就是说要扶助贫困地区恢复生态平衡，自力更生地建立有发展前途的经济基础。但是怎样才能建立起造血机能呢？我开始时总是鼓励定西发展乡镇企业，但是在这个既缺资金，又少企业传统的地区，即便办了一些工厂，也难于发育扩散。在这里我才认识到经济发展中启动作用的重要性，也因而使我回头分析沿海各种模式不同的启动机遇和凭借的力量。怎样启动贫困地区的发展，成了我极想探索的问题。

1986年我有机会去河南东部商丘地区的民权县访问。自从黄河改道后，给这个地区留下一片贫瘠的沙土。民国初年连年的天灾人祸不断地逼使这个地区民不聊生，解放后还得靠救济过日子。到了60年代，当地干部惨淡经营，绿化了黄河故道，使这片土地恢复了活力。70年代农民发现这里的沙土适宜种葡萄。葡萄是一种高价的经济作物，很快在农村里推广开了。但是经济作物必须有市场作依托。葡萄熟后，保鲜期很短。在交通不便的商丘一带，不久就发生了大批葡萄运不出去而烂掉的情况，农民连成本都收不回来。这时，当地政府做了件好事，集资办了一个葡萄酒厂。为了易于在短期间收购葡萄及时榨成果汁，贮存起来供应酒厂酿造，各乡不久又建立了自办的加工车间，兴起了乡村企业。当我去访问时，已经形成了一个从果农、乡办加工厂、县

办酒厂一条龙的生产线，使几万户农民可以安心种葡萄。酿造出的民权葡萄酒成了名牌商品。从户、乡到县，各个层次都得到了相当充裕的收入，把这个穷乡变成了殷实地区。这次访问给我启发很大，因为这不就是穷乡怎样造血脱贫的现实经验么？

那年我再去定西时就了解到这地方盛产亚麻，他们种亚麻是为了麻籽可以榨油，留下麻秆却用来当燃料烧掉。我碰巧见到一位麻纺专家，知道用亚麻的纤维纺织的技术问题在近10年来已经解决，国际市场上需求比苧麻更旺，而且麻纺的前景也比较乐观。我立即想到如果能按民权模式在定西办麻纺厂，不就可以使现在当燃料烧掉的麻秆得到了利用？计算一下，每个种麻的农户每年可以增加几十元的收入。这不是一个千家万户可以脱贫的路子么？

在一个刚刚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的地区，民间没有能力积累足够的资金来兴办乡镇企业。地方政府同样缺乏这种能力。过去西北地区实际上是个向外地工业提供原材料的基地。在计划经济下，原材料的价格偏低，和外地输入的工业品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剪刀差。这种差额一向是用中央补贴的办法来弥补的，而事实上财政补贴只够用来维持行政机构的开支。西北地区的工业历来是依靠国家投资，地方的乡镇企业沾不上边。资金不足显然是西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大困难。其次，还缺乏一个有辐射力的工商业中心能为民间的企业提供技术力量。现有的技术还封闭在大中型的国营企业里，要经过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才能开放出来。

面对西北地区广大城乡发展上所遇到的困难，我不由得不联系到沿海地区的情况。一相对照，就不难看到双方正可以互补短长。东部沿海地区的乡镇企业经10多年的发展，原材料和能源越来越跟不上，成了进一步前进的瓶颈。西北的资源如果能开发出来，正可满足东部的需要。如果能动用东部的资金和技术来开

发西北资源，在互惠互利的原则下应当是可以两厢情愿，共同合作的。我看到了这一种可能，所以提出了“以东支西，以西资东，互惠互利，共同繁荣”的说法。“支”是指资金、技术上的支持，“资”是指原材料和能源的供应。

这个思路使我产生“全国一盘棋”的观点，1988年我提出“黄河上游多民族开发区的设想”是从这个观点中发展出来的。

九

我在内蒙古和大西北进行的社会调查，使我感觉到沿海和内地，特别是和边区的不平衡发展会给我国现代化的进程带来越来越多的困难。从全国一盘棋的观点看来，我们有必要重视这个有关大局的东西差距。同时也想把我从50年代中叶起中断的民族研究工作在大西北调查中继续下去。

中国的少数民族大部分聚居在中国的西部。西部和东部的差距包含着民族的差距。西部的发展战略中必须考虑到民族因素：一方面要动员这地区少数民族参与这地区的开发事业，另一方面要通过这地区的经济开发使这地区的少数民族发展成为现代民族。这个观点在过去实际上常被忽视，以致“三线”建设只在西部增添了一些“新兴城市”，而没有使西部人民的生活有显著的提高。不少在少数民族地区兴建的大型国营企业根本没有考虑到和当地少数民族的联系，甚至眼中只有这地方的资源，而忘记了还有生活在这地方的人。我看到这些现象，心里总是觉得十分难过，认为这是过去政策上的失误。

为这种失误辩解的人说，少数民族缺乏现代科技知识，没有力量自己来开发本地区的资源，而且他们现有的生活习惯，也不适宜于现代工矿企业里的生活，不是不让他们参与而是他们参与

不进来。我在呼伦贝尔访问伊敏煤矿附近的蒙族聚居点时也听说，这个煤矿曾按政策招收过附近一部分蒙古族居民进矿山做工人，但是不久几乎全部告退了。这些从小骑着马在广阔草原上放牧的小伙子，不愿意钻到地下挖煤，请他们做职员则文化程度又不够。我相信这些都是事实，但是并不应当以此来否定少数民族参与西部地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只是提出了怎样才能把西部的少数民族吸收进开发西部的事业里去的问题。同时也说明了像伊敏煤矿那样想直接把牧民一下子变成工人是做不到的。应当怎么办呢？对少数民族的发展问题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我在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区的调查中得到了一些启发。要促进少数民族的现代化，看来必须从它们所有的民族特点出发，循序渐进地向前发展才能见效。我这点认识的形成经过是这样的：我在从广河县通往临夏市的公路上，一路停车访问了近 10 家新兴的富户。我一家家访问他们怎样脱贫致富的。其中绝大多数是这几年到青藏高原牧区贩运起家的。例如有一家筹得了一小笔款子，去市集上买了几张羊皮，回来把羊皮缝成袍子。坐公共汽车去四川的甘孜藏区，把羊皮袍卖给藏民，得到了比成本高好几倍的利益。赚了钱再买羊皮，制成袍子去藏区出售。就这样“滚雪球”不到两年，已经有力量造了一座楼房。一家人男女老少共同操作，俨然是一个小作坊。还有些人家租车贩运啤酒到拉萨出卖，赚了钱自己买辆卡车往返拉萨做买卖。他们告诉我，一辆卡车跑一趟拉萨，昼夜开车，5 天可以打个来回，净挣 5000 元。我在 1987 年第三次访问临夏时，据说这个地区已有上千辆卡车奔驰在青海和西藏的公路上。有几个原来很破烂的穷村，已焕然一新。这样快的脱贫致富，给我极深的印象。

我这天访问的近 10 家新兴户，一问竟全是回族。沿着这个线索，我发现了回族善于经商的特点。我又把这个特点联系上了回族的历史，找到了这个民族特点的历史根源。回族所信奉的伊

伊斯兰教起源于阿拉伯，扩散到西亚和中亚。早年通过“丝绸之路”和海道有不少信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和中亚商人进入中国。他们被称为“番客”，一部分就定居在沿海和西部商路上的城市里。到了13世纪，蒙古人入侵中亚，掳掠了大批信伊斯兰教的商人和工匠编入军队，为他们做后勤工作。后来蒙古人带了这些人回师中国，灭了南宋，建立元朝。这些人的子孙就留在各地，和早先来的番客结合而成回族。从这个民族的形成中可以看到他们的祖先不仅信伊斯兰教而且是有经商传统的人。他们在和汉族接触中虽则部分已接受了农业生活，但在不同程度上还是保留了善于经商的特点，直至今日。

回族的经商传统可以用来说明他们分散聚居在全国各大城市里的原因。但是为什么他们最大的聚居区却落在黄河上游的宁夏和临夏呢？这个问题的提出使我注意到了这个地区在经济地理上的地位。它们正处在广大牧区和中原农区的交接地带。

这条农牧贸易走廊正是回族可以发挥其特点的用武之地。这可能是上述问题的答案。临夏旧称河州，历代是一个农牧贸易的内陆商埠。它是丝绸之路上的一站，宋代是茶马司的所在地。从临夏目前商业比较发达上使我联想到了沿海的温州，因而是说“东有温州，西有河州”。当然两地是有区别的。但是它们近几年都是自发地从参与商品流通而致富的。温州走在前面，已经“以商带工”，形成了众多的家庭作坊式的乡村工业。临夏还正在扩大流通网。直到去年我再去访问时，才看到有不少小型工业正在起步建厂，有可能走上温州这个模式而发展起来。临夏这个标本给我的启发主要是在进一步认识到少数民族的发展必须抓住它们的特点作为起点。在牧区则要像上面已提到的海拉尔附近的牧民那样，从改良牧业出发，使放牧和舍饲结合，并进而利用畜产品作原料发展加工工业。我认为这个原则同样适用于林区和农区。

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大兴安岭的林区里，我看到一个反证的例子。大兴安岭原始森林里原来住着以狩猎为生的鄂伦春族，解放前只有几千人。解放后，由于开发林业，外来的人口大量涌入林区，几千人的小镇在原来荒凉的森林里一个个建立起来。鄂伦春人的生活环境起了变化。按民族政策的规定成立了鄂伦春自治旗，国家拨款为他们建立了新村。这几千人改变了过去狩猎为生的经济，而在不同的名目下，从小到大得到国家的津贴。他们的生活是有保障的。但是失去了传统的生产手段后，他们没有能找到靠自己劳动来从事生产的新路子。结果是物质生活的保障反而引起了精神生活的衰颓。因此，我建议及早发挥他们饲养驯鹿的传统本领，帮助他们在林区里建立新的养鹿场，让他们自食其力，发展起来。不然，这个几千人的小民族的前途是十分可虑的。大兴安岭里的鄂伦春族给了我一个和临夏回族的强烈对比，无疑深刻影响了我的思路，能不能这样概括地说：一个民族的发展主要靠善于发挥自己的传统优势，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外在条件，提高自身的社会生产力和发挥自身的精神文化。

临夏商业的繁荣不仅给我提供一个怎样利用传统优势来脱贫致富的例子，而且也使我看到这是个促进青藏高原现代化的重要环节。我在上节提到了黄河上游多民族开发区的设想。这个开发区包括从青海的龙羊峡至内蒙古的托克托段黄河上游沿岸地区，正处在西藏、新疆和内蒙古、宁夏四个民族自治区的中心。这个中心地区可以利用黄河上游的落差，建立一系列的水电站。再利用这巨大的能源，开发黄河两岸的矿产。制成的原材料，不仅可以支援沿海工业地区，而且可以用来发展西部地区的中小型加工企业，分散在各行各业，使千家万户都富裕起来。

这个中心地区工业的发展需要广大市场。这个市场首先应当是西部的牧区，也就是三面围绕着这中心的四大少数民族自治区。西部牧区的发展成为广阔的市场正是这个多民族开发区能繁

荣起来的一个重要条件。我们有条件可以利用这条介于牧区和农区之间的走廊地带，发展畜产品和工业品之间的贸易。过去曾在这里进行过的“茶马贸易”只是用有限的农产品去向牧区交换畜产品，规模是有限的。如果多民族开发区建成了工业基地，就可以用加工后的生活日用品和发展牧业所需的生产资料去向牧区交换畜产品，从而促进牧业生产，把国土 1/3 的广大草原的巨大潜力发挥出来。这并不是个主观的空想，因为在目前临夏的回族商人已经自发地进行这项探索活动。他们已成了沟通这地区的工业和少数民族的牧业的前哨队伍。

中国西部的牧区直到目前基本上还是停止在封闭的自给经济水平上，牧业的现代化必须从封闭的经济改革成开放的经济。商品流通是促成这种改革的基本力量。只有把牧民喜爱的日用品运到牧区，才能使他们乐于把畜养的牲口拿出来进行交换。这就是牧业的商品化。牧民所饲养的牲口变成了供应市场的商品时，牧业在技术上也会顺利地走上改革的道路。牧业的发展不仅为工业中心提供了毛、皮、奶等畜产原材料，而且为工业中心开辟了广大的市场。这正是我心目中发展西部民族地区的前景。面对这个前景，我们作为研究工作者，看到了许多富有意义的课题正在等待我们去钻研，心情难免有些紧迫。

写到这里，思绪万千，回顾到此告一段落。

1989 年 4 月 14 日

后 记

因有波兰之行，匆匆把“回顾”打住。这篇文章从春节写起，写到清明过后，经常受到公务私事不断的打扰。上面的九

段，没有一段一气呵成。在我一生中这是罕见的。无可自宥，只能默认岁月催人老。

东欧归来，重读“回顾”，总觉得这篇拖拉积续的文章，像一条画龙未成的长蛇，甚至结尾都没有。但既不愿重写，又不忍撕掉。只能说，各言尔志，本无定型，诚而已矣。加此后记又未免为蛇添足。

我一向认为一个人的思想总是对当时当地社会的一种反映。具体的社会有如如来佛的手掌，谁也跳不出去。各人的反映可以千姿百态，但总是为他的处境所局限。至于反映得有多么宽广，有多么大深度，那又是被各人社会经历所决定。超过了这个界线就不免志大才疏，忘乎所以。各人的成就应当归根于社会的投入和个人天资的吸收能力。评人论己看来应以这点认识出发。

上面的“九段”文章，实在是想向读者交代我这四年思想活动的线索。这四年我陆续在各种刊物上发表了不少文章，我曾说这是一生中第二个旺季。把这些文章综合一下，前后连贯起来，多少可以看出我这一段时期思想活动的取向。知我者当然愿意我这样梳理一番的。

我一路回忆搜索这个思路，自己也清醒不少。反省至少可能起自觉的作用。我重读这九段“回顾”，似乎又呼吸到了这四年农村中欣欣向荣的气氛。这气氛不仅感染了我的笔调，也浸润了我这一段垂老的生命，我相信后来的人会对这四年中国农村的发展做出公正的评定。我身在庐山自不可能见其全貌。这四年对我来说，应当肯定说是一生中兴奋点最高的四年。我之所以兴奋，是在于看到了个人的思想不仅可以反映社会现实，也能对社会改革发生推动作用。我的热情是来自我所接触到的群众。广大农民所初步释放出来的巨大生产力和所表示出来的激烈的要求，构成了推动中国80年代大变革的动力。我见到的不过是这股巨流里的一些小小浪花，所能反映出来的也只是其中很小的一个局

部。但也得承认，不论怎样小，怎样局限，总是属于这股巨流的一部分，因为没有这一滴一滴的水，也形不成巨浪的。从毫末辨流向是应当可以做到的。

人总是人，要能恰如其分地看清楚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更能利用这个地位去拓大自己的视野、提高自己的境界是不容易的。我自知远没有做到这一步，只能说梦寐以求的是这种自觉。我像其他人一样，所具有做学术研究工作的条件都跟着个人的经历，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30年代我住在江村，尽管时间不长，但能随意穿门串户，老中青少见面即能交谈诉说。这种我认为最有利于社会研究的条件，得之既非偶然，一去也难以再返。我以后50年的经历使我和周围社会环境的关系逐步发生了各方面的变化。

年龄是不饶人的，此其一。当年我徒步往来于崇山峻岭之间，只要深睡一晚，第二天又是精力充沛可以跋山涉水了。现在呢，连上两层楼还会喘气。50年不能说长，体力却判若两人。

社会地位也变化多端。早年那种自由自在的学生身份已捡不回来了。解放后，上山下乡都得有任务，言行都有框框，而且终于由于思想出了格而打入了另册。另册者，在社会中被孤立之谓也。60年代后期更下沉一个梯阶，生活和工作失去自由有10多年之久。到80年代初才正式“改正”，重新列入社会正册，恢复了我正常的社会生活，解除了孤立。那时我已年届七十。

当时我在一次会议上公开表白“我手上只有10块钱了，我不能随意花掉”。意思是我自己估计如果一切正常，我能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时间至多也不会超过10年。这10年珍贵的时间一点一滴都必须充分利用，才有可能夺回我失去的20年。时光易过，言犹在耳，匆匆又过8个年头，再有半年我就进入80岁了。在口袋里的钱即将用尽之际，回头看看这八块半钱怎样花的，得到了多少收益，可以说是及时的和必要的。这是我写此《自白》

续篇的用意所在。

现在要说的，我这段时间里固然得到了正常的社会生活，但在恢复了社会地位之后，却没有在“另册”里那样孤独和清闲的条件了。接二连三地多种多样的公务加到我的身上，其中有些是和我为学的宗旨相符的，更多的社会活动却超出了这个范围。那就是说我此生已经不太多的时间，能用在我学术工作上的却越来越少得令人寒心。而且近年来由于我所担负的社会公职，也使我日益脱离群众。尽管我这几年中至少有一半时间在各地访问，但被“名位”所累，已无法进行30年代学生时期那样的实地调查了。这个损失，也不能全归咎于客观因素，主观方面也存在着满足于粗枝大叶的毛病，而且读书不勤，不求甚解，特别是20年来由于怕留“罪证”的余悸，失掉了及时作笔记的习惯。加上年老易忘，以致我思想的投入不足，累积费劲，只能靠老本过日子，智力难免枯竭。这是恢复工作后，未能突破我30年代达到的水平的主要主观原因。

在中国复兴社会学是我这10年中的一个自觉的任务。在这方面，在主观上我是尽了力的。但是一门学科可以挥之即去，毁于一旦，要重建时却不能呼之即来。重建就只得造砖造瓦，从头做起。我这10年，特别是最近的6年，深刻体会到精神文明的建设不是设立一些学校或研究所等教育科研机构就能成事的。设立机构固然必要，这些机构里必须要具有科学头脑的人，实事求是地进行细致艰苦的脑力劳动，才能积累起精神文明实质。我自己如果不能率先做出学术成果，又怎能谈得到重建社会学这门学科呢？

凭我这点认识，我是这样做了，以身作则，带头下乡，足足花去了我这八年半岁月中最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正如我在《社会调查自白》和这篇《四年思路回顾》中所表明的，我取得的科学成果很不结实。如果能说我这心血没有白费的话，我只

在这门学科的建设中做了一些开路 and 破题的工作。我在客观和主观的种种限制下，尽力之所及为研究我国城乡社会发展勾画出一些素描和草图，并跟着实际的发展不断提出一些问题，开辟一些值得研究的园地。这些也就是在上面九段里所叙述的内容。说这是科学成就，可能夸大了一些，最多能说是一些科学的探索。说是社会学的内容，我想是可以的。因为我所认识的社会学范围比较广泛，一切企图对社会现象进行理解的探索都可以包括在内。同时，应当提请注意：社会学本身远比我这一生中所探索的范围为广阔，我决无用我自己研究的范围来作社会学界限之意，社会学研究的方法也是八仙过海大可各显神通。我这一生所采用的只是其中之一，而且又限于学力和社会的条件，并没有能够充分发挥这种方法的长处。

人生有限，社会绵绵，后浪推前浪。但愿新一代早日成长，后继有人。

1989年5月6日于陇海路旅次

甘 肃 行

兰 花 出 口

我每次去兰州访问总是住在名叫宁卧庄的招待所。这个名称很雅，事实上也很安静。旅途劳乏，在这里确可不用药物，安眠终宵。最近我又去访问兰州，目的是了解一下去年建立的黄河上游多民族开发区的进展情况。到兰州一问，最使我惊喜的是就用宁卧庄这个名称成立了一个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小区。原来甘肃省为促进黄河上游两省两区的开发事业，先在省内成立了五个小区进行试办。宁卧庄是其中之一。

我并不知道宁卧庄这个名称的来历，很可能是从那个招待所开始的。这个招待所周围大约有3平方公里的区域正是兰州市许多科技院校和机关集中的地方。各学科专门人才有7000多人，其中有职称的约1500人，还配备有高精尖仪器设备。1988年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办了这个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大概看中了宁卧庄这个名称，所以就叫它作宁卧庄小区。

首先是这个名称吸引了我，其次是我很想看看科学技术怎样转化为生产事业，了解一下知识分子怎样直接和国家的经济建设挂上钩。因此，我就抽空到宁卧庄小区进行了访问。这次访问印象最深的是已成为出口产品的兰花幼苗。

说起兰花，它是我从小熟悉的花卉。由于我妈妈的名字里有个兰字，我爸爸一直喜欢培养兰花，可能是用以表示他们夫妇的恩爱。后来妈妈逝世了，可是我老家的兰花依然盛开。开花时

节，一进门就有一阵幽香扑人。年复一年，兰花也就自然地联系上了我早年温暖的家庭。现虽年老，其味犹存。

讲到宁卧庄小区，就听说“兰花出口”，是好奇还是旧情，使我急于一睹。

地点是在兰州大学生物系的实验室，接待我的是副教授谷祝平同志。他就是兰州兰花研究开发公司的经理。招待我们就座的办公室并不大，桌子上已陈列了一行兰花标本。这些兰花和我小时候熟悉的有点不同。我熟悉的是苏州的品种，叶多于花，有如许多水墨画里所绘的那样，一枝瘦兰总有大丛兰叶相护。眼前陈列的可能是引进的洋兰，或是已经杂交改造过的新品种。花朵大，色彩多，花纹细，一株株亭亭玉立的细枝上挂着一串串花朵，上下连成层次分明的行列。每一个品种的花朵样式不同，最出奇的是叫兜兰，形似拖鞋挂枝。至于那些形似多彩纤纹蝴蝶的花朵，在这里已属很平常的了。一问才知道兰花品种多至两万以上，在这个实验室里培养的就有 280 多种。

随着，我们进入了他们的“车间”，一行行架子上层层满储着尖形的玻璃瓶。这些就是兰花幼苗的培养瓶。花苗培养到一定程度就可以连瓶带培养液一起出口了。

培养兰花幼苗出口不能不说是件新鲜事。这事的始末是这样：谷教授原在兰大生物系细胞研究室工作，1984 年作为学术交流去美国加州大学访问。在那里开始接触到兰花，参加了该校培育兰花的实验，并且了解到培育兰花在美国是一项产业，有广大的市场。1986 年他回国时就有开发兰花产业的设想，向兰大提出作为科研课题。实验有了成果后，在兰州市科委的支持下，开始大量培育。接着他和加州大学联系，商定了出口方案。

恰巧这时甘肃省委决定成立宁卧庄新技术开发试验小区。这个原是实验室的研究课题便顺理成章地转化为开发区生产项目，于是一批批兰花幼苗在 1988 年开始出口了。1989 年 9 月我去参

观时，已经外销了 2600 瓶（每瓶 30 株苗），创汇 2 万多美元。据说他们每月可产 2000 瓶。今年还将外销荷兰和南朝鲜，定货量已超过 1 万瓶。星星之火，前途可观。

兰花也能成为一项产业，我是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在国内兰花原是一种野生花卉。我从小听说有人到山里去掘兰花。兰花却喜欢长在人们难于攀登的山阴险处，正如我在武夷山看到的，大多挂在悬崖峭壁上，或溪旁大石的裂缝里。品种越好，生得越僻，采掘的人不冒一点风险难于到手。一般人家供赏的兰花大多是从深山里采来的老根上分出来的，要养三五年才开花，繁殖很慢。

我小时候就想为什么兰花要分根而不直接下种培育呢？这次问了专家才知道，兰花并不是不结果实的，但是一颗果实里有 10 万多粒种子，每粒种子小到肉眼看不清楚。由于颗粒太小，几乎不含营养物质，所以自然条件下难以萌发。兰花种下后，怎样使它能茁长成苗，也就成了生物学实验室里的一个课题了。谷教授从加州大学引进的就是这一手。这一手，就用得上生物工程了，也就是说可以通过细胞杂交的技术培养新品种。新科学技术就这样把兰花的培养从采掘经济发展成了产业经济。现在已进入大批量人工生产的阶段，并进入了国际市场。

“知识是财富”。会说这句话的人不少，而兰花出口却真的使它变成了事实。出国交流者多矣，有几个能像谷教授那样把生财之道带回国内呢？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两西”移民

黄土高原名声不太好，连黄色都被连累成了贫困的象征。其实黄土高原就是怕旱，只要有水不难成为郁郁葱葱的绿色海洋。

有点历史知识的人必然会明白，如果黄土高原自古以来就赤地千里，那就不可能有今天的中华文化了。令人痛心的只是这块我们民族的发祥地在历史的演进中不断地被破坏了，出现了水土流失，生态失调。高原上大部分地区树木砍光，草根挖尽，留下了一片片沙化的荒漠。

在这历史演进的过程中，甘肃的气候当然也起了变化，但是天还是下雨的，至今还有 $1/3$ 的地区降雨量在 400 毫米之上。问题是没有了树木，没有了草皮，天上下水就留不住了。一阵大雨，短时间里汇成的无数急流，把黄土层冲刷得龟裂破碎。

只要留得住天上下的雨水，只要用得上黄河里的流水，只要积得够祁连山上泻下来的雪水，只要提得上大片土地下的潜水……总之有了水，黄土高原还能养育我们的子子孙孙。

看来历史开始出现了转机，人们自己破坏的生态，开始自己修复。种草种树抵住了水土流失，电力提灌用上了黄河的水源，开渠修坝积住了高山的雪水，广挖深井，处处出现了绿洲。

我最近这 5 年，年年去甘肃，目的是看看这篇复兴黄土高原的大文章是怎样写的。今年又看到了一小节，起个小标题叫“‘两西’移民”。

据说，80 年代初中央有位领导同志到甘肃视察，从陇中到河西走了一趟。陇中是以定西为中心的甘肃中部干旱地区，有名的贫困典型。我在 1984 年也去访问过，留下了水贵如油的深刻印象。像我这样从小在水乡长大的人，不亲眼看一看决不会相信一家人全年的用水只靠一个不过几个立方米大的积水地窖来供应的事实。这里的人，日常生活全靠雨水维持，庄稼就不必说了。他们的农活没有我苏南家乡那样紧张，反正下了种，能收多少算多少，全靠老天，人是使不上劲的。而这片干旱地区，人口却特多。人越来越多，分得到的地却越来越少，怎能不成为贫困的典型？！

据说，那位领导同志从定西出来，又去河西。河西是指甘肃省黄河以西的地区，从地图上看去就是伸向新疆那个长脖子，一条狭长地带，北面是内蒙古的沙漠，南面是和青海分界的祁连山。就是这座绵长的祁连山山顶上积的雪，每年融化时流下的水，使这片雨量特别少的长廊，变成了辽阔肥沃的绿洲。

这条有 1000 公里长的河西走廊，在中国历史上做出过巨大的贡献，远在汉代之前是乌孙人、后来是匈奴人的牧场。汉武帝为了抗拒匈奴，首先占领了这个绿洲，开辟农场，成了他开拓西域的军粮基地。后来也就成了联系中西交通的丝绸之路的咽喉。直到海运取代了陆运，以往的若干世纪里，河西走廊一向是繁荣兴旺的。迄今名闻世界的敦煌莫高窟正是它的历史见证。不幸的是其后天灾人祸不断。解放前不久，我的朋友谷苞曾在调查报告中说：这里已是“农民的地狱”。但是山犹在，水长流，解放 40 年社会安定，兴修了水利，农业生产还是较快地恢复过来了，到了 80 年代已成了甘肃的商品粮基地。其实，这里毕竟人少地多，还有大片没有开辟的荒地。

可以想像，刚从定西出来，进入河西走廊的那位中央领导同志，面对这样显著的对照，很容易把“两西”——定西和河西——联结了起来，提出“以西济中”的两西计划，让人多地少、活不下去的中部干旱地区的农民，搬出一部分来，成为开发河西新开辟的灌溉区的劳动力。

正是这几年，黄河上游的水电站陆续投入运转。甘肃得天独厚，具备了利用电力就近把黄河里的水提升到地面进行灌溉的条件。原来中部干旱地区的荒地开辟成了肥沃的水浇田，称黄灌区。黄灌区和河西的粮食基地一样需要劳动力。于是“两西移民”里添上了“山川互济”的一条，就是将部分住在干旱地区山沟里的贫困农民转移到附近的黄灌区去定居。实际上两西计划就是由政府创造条件，在农民自愿基础上，有计划地在省境内进

行人口调整。此举两得，一方面解决干旱地区的贫困问题，另一方面，解决了新辟的灌溉区所需劳动力的问题。

自 1985 年起的四年多来，从中部干旱地区迁出了 17 万穷困农民，其中在新开辟的黄灌区里就近安置了 13 万人，往千里外河西迁移的有 4 万人。据当地的经验，在贫困区里“移走一人，缓解两人，等于解决三人的贫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四年一共解决了 50 万人的温饱问题。估计甘肃中部干旱区到本世纪末，需要另找出路往外迁移的约 60 万人，实际受益达 180 万人。现在打算在今后三年内，再移出 30 万人。

两西移民在解决贫困地区农民的温饱问题上起了作用的。绝大多数移民都做到“一年搬迁，两年定居，三年解决温饱，四年迈开致富步伐”。我分别访问了靖远的黄灌区和河西张掖市的移民村。上面这句话基本上是符合事实的。下面说几个实例。

离定西不远的靖远县兴堡子川灌区有个景滩子移民村。这个村子的 304 户全是从本县永新乡 9 个贫困村迁移来的，一共移出了原地 20% - 30% 的人家。我访问了三户，是老汉吴恒的三个儿子的家。大儿子在附近煤矿工作，儿媳介绍说全家五口人，种 10 亩水浇地。劳力不够，给大女儿从宁夏中卫县招了个上门女婿。1986 年盖了新房，材料主要是原地拆运来的。1988 年收小麦 6500 斤，玉米 2600 斤，还有蚕豆、胡麻等。温饱已没有问题。堂屋里有一台六喇叭的收录机，还放了一段秦腔给我们听，最近家里还添了一台 18 英寸长风电视机。二儿子家四口人，种 7 亩水浇地，家景也很好。老汉和刚刚成家的小儿子住在一起，都住进了新建的砖瓦房屋。他们对移来后生活的变化都十分满意，一再说：“不回去了，回去没吃头。”

我到河西张掖市后就到甘浚乡速展村去看望由临夏州东乡县迁来的移民。移民章宪东在 1986 年单身先来河西，当地政府按他家原有三口人计算分给他 20 亩田。他用政府给他的周转金购

买了小牲畜和农具，扎下了根。第二年再把全家接来，当年口粮就够自给，还盖起了7间新房。1989年可以收粮上千斤，还养了20只羊，1匹骡子，1头牛，3头猪。我到他们的厨房一看，锅里炖着一锅羊肉，桌上堆着一大叠白面馍馍。看来日子是好过的。这村35户，全从东乡迁来。

贫困户移出了贫困村，缓解了贫困区人口压力，让出地来种草种树，发展畜牧业，生产和生活都得到改善；迁入的地区有了劳动力，农业生产也提高了，加上成套的扶贫措施，甘肃两西的面貌有了显著的变化。据统计，1988年和1982年相比，河西粮食总产量由17亿公斤上升到20亿公斤，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23元增加到445元。中部地区粮食总产量由8亿公斤上升到13亿公斤，农民人均纯收入由72元增加到280元。当然这样大的变化，不应当全归功于“两西移民”计划的实施，但是不可否认“两西移民”在这个变化中也是起了相当作用的。

我们必须为黄土高原恢复名誉。黄色是绿色的底子，贫困可以征服。两西移民不过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迈出的一步。我乐于写此小记。

一 厂 两 制

1988年甘肃、青海、宁夏、内蒙古两省两区共同提出了建立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设想和方案，经过中央批准，各省区都分别开始进行具体的开发计划和工作。我通过这次去甘肃考察，对这个方案的实施很乐观。甘肃已经开动了。看来，开发大西北已不是学者们的空谈，而是千百万边区人民扎扎实实在干的大好事了。同时，我认为他们还搞活国营大企业找出了一条可行的路子。这条路子就是国营大企业通过城乡结合、城乡一体

化建立他们称为“一厂两制”的办法。

早在1984年我在包钢考察时就提出“人文生态失调”的观点。所谓“人文生态失调”，简单地说就是一个企业受到来自设备和制度的种种限制，无法消化企业内不断增长的人口现象。当时，我看到像包钢这类大企业，为了自身解决这个失调问题，在大厂里办了许多层次的集体所有制的小厂。这其实就是“一厂两制”的雏形。这几年我访问了甘肃和陕西，看到了不少国营大企业存在着同样的情况。也许可以说，“一厂两制”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群众性的创造，也是目前阶段国营大企业用来解决这个普遍存在的问题的办法。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营企业一直是我国经济的主要成分，好几千亿元的投资，好几千万的职工和大量的科技力量都集中在这些企业里。怎样搞活这个巨大的力量，是有关国家兴衰的大事。甘肃历来是国营大企业集中的地方之一。一提到经济开发，首先就应当解决这个问题。甘肃采取的“一厂两制”的办法，把孤岛式的国营大企业和地方结合起来，开办很多集体性的中小企业。预计到1990年，几个开发小区里，仅一厂两制这一块的产值就可达10亿元。

我在这次访问中，先后和白银公司、稀土公司、805厂、金川公司、酒钢公司、厂坝铅锌矿的经理人员和这些企业所在地的地方党政领导，多次讨论了“一厂两制”的经验和问题，很受启发。

给我深刻印象的是，这些事实里所显现出大西北开发过程的某些特点。

从历史上看，这些地方的重大飞跃几乎都是由外注入的。汉代大批汉人进入河西，把农业带了进去，改变了这里单一放牧的经济，出现了繁荣的粮食基地。新中国成立之后，现代大工业进入西北，大批企业由中央定点，投资设立。我听到一个典型的事

例，据说有一位将军奉命来甘肃建厂。他摊开地图，找到了一块他认为即使发生战争，原子弹都影响不到的地方，用笔一圈。现在已有几万人的与四周隔绝的稀土公司就是在荒无人烟的山沟里建起来的。

这些注入式的大企业，一开始就和当地的老百姓是分隔的。它们如同一个个自给自治的小孤岛。工厂重地，行人止步；门禁森严，设有岗哨。大西北每年报表上工业产值都不低，这些企业确实也为国家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这些厂的产品几乎全由国家调走了，留给地方上的极少。工厂周围的老百姓看不到，分不着，几十年来面貌变化极微。

大西北的广大农牧民受不到现代工业的惠泽，只是这种经济格局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这类孤岛式的大企业自身也难于发展和维持。在原来的体制下，除非国家继续不断地投资，企业自身无力更新和扩建，而国家又哪里有这样大的力量呢？日子久了，企业老化。然而，企业里边的人却一代代地生长，越来越多。50年代办的厂，到70年代那些办厂后出生的孩子都要就业了。这批新生力量，这些孤岛式企业自身是消化不了的。这个问题成了这些企业领导者最头痛的一件事。在这种很具体的压力下，“一厂两制”萌芽了。

但是，“一厂两制”在孤岛里实行还是解决不了问题。1984年我在包钢看到的那些为职工子弟开办的集体小厂就是关在孤岛里办的。它们实际上又成了大厂背着的一个个小包袱。这次我在甘肃参观了几个开发小区，看来他们已经闯过了这一关。他们把厂门打开，伸出手去和地方结合，搞城乡联系。就是说，大企业提供技术、管理、运销的经验和人员，地方提供土地、设备和劳力，双方联合开办各种中小型企业，利益均沾，共同负责。这种打开厂门办一厂两制的做法，为企业职工的子弟提供了出路，人文生态失调得到缓解。

这种形式的扩散企业对西北地区的工业化具有深刻的意义。我们不能指望西北边区能像苏南或珠江三角洲那样由农民自动地引进新技术，发展自己的乡村企业。大西北工业的发展还得顺着地方特点，由上而下地注入。试想，如果不是大企业打开大门，原来的边区农民怎能接触到外来的现代工业？“一厂两制”不仅使大企业卸下了自己的包袱，同时工业之风也吹向了广大农村。真可谓一举两得呀！甘肃就是这样做的。他们以原有的国营大企业为核心，建立了四个“一厂两制”的经济开发试验小区：白银、金昌、西成和连海。另外还有一个性质和“一厂两制”不同的宁卧庄科技产业开发区，我在《兰花出口》一文中已经做了报道。

金昌小区里的金川公司总经理王德雍同志向我谈了他的体会：“公司在产品经济体制下的27年里，一直是单打一地搞镍和钢的生产，路子越走越窄，困难重重。自从成立镍都实业公司，发展‘一厂两制’的企业以来，三年间与地方合作，共建了96个集体经济的工厂，其中几个年产值1000万元的厂，只用10个月的时间就建成投产，发展速度很快。1988年这些集体企业的产值达2亿元，1989年可达2.7亿元，正好是全公司1983年的产值。这不也正好说明‘一厂两制’发展集体经济，不仅三五年工夫就可带出一个公司的产值，而且对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十分有利。”

孤岛式的大厂打开大门和地方结合办中小型集体企业之后，企业和周围的群众关系也搞好了。过去厂内、厂外的差距太大。墙外看墙内是另一个世界。四年前金川公司职工的年人均收入是2000元，而公司周围的农民年人均收入不到100元。1986年开始搞“一厂两制”，公司从技术上、设备上、资金上帮助地方发展乡镇企业，1988年农民的年人均收入达到了600元，农民和公司的关系很和谐。

我在路过永登县时，参观了一个甘肃铝业公司和该县合办的碳素厂。永登县的西部大通河两岸就是连海小区。这个碳素厂就是从小区核心辐射出来，国营和地方结合办起的企业。铝业公司提供技术和管理，派有经验的人员当该厂厂长。地方提供土地、厂房和劳动力。流动资金由双方分担。70%的产品由公司包销用于公司所属的铝厂。利润分成，公司得5.5，地方得4.5。全厂有300名工人，全是当地农民，月工资120-180元，比当地一般农民的收入明显提高。据魏县长介绍，永登县有不少像碳素厂性质一样的乡镇企业，全年产值达1.7亿元，全县44万人口中已有11万从事乡镇企业。永登县的面貌这几年有了显著的改变，可见开发小区的“一厂两制”已经在农村里发生作用了。

1984年我在包头看到的厂内搞小集体和1988年甘肃看到的开发小区，使我发现“一厂两制”本身有了发展，从企业闭门扩大走向企业开门扩散。扩散显然比扩大前进了一步。这条搞活国营大企业的路子是群众走出来的，“一厂两制”不失是一条很有前途的活路。

“两南”兴牧

今年国庆前，我抽空去甘肃访问，横穿了河西走廊。河西走廊是指黄河以西夹在内蒙古腾格里沙漠和甘青分界线上祁连山中间的一块狭长地带，东西1000多公里而南北最短的距离只有100多公里。这是一块黄土高原上有名的绿洲。

河西走廊久已闻名，它是古代丝绸之路所经之地。其后海运畅通，贸易改道，丝绸之路也就成了怀古的对象。但是现代铁路和公路的兴建，特别是空运的开拓，欧亚商品流通的路线正在再度调整之中。重开丝绸之路，大有前途。我虽年老，犹有赶热闹

的兴趣，总想在有生之年，至少在这条路上踏上几个脚印。所以这次去甘肃，重点就放在河西走廊。

访问河西走廊除了想看看这个绿洲的农业怎样发展外，我还有一个私愿，就是想去看望聚居在祁连山麓的裕固族同胞。甘肃本身是个多民族省份，特别引人注意的是沿着甘肃和青海的边界上聚居着一连串人数较少的民族。我前几次访问甘肃时去看望过南部的撒拉、土、东乡、保安等族的同胞。这次既去河西，就下了决心要去看望裕固族的同胞。

说起裕固族，研究中国民族的人大都知道它，因为它曾引起过一个理论上颇有意义的问题。简单地说，裕固族分东西两部分，语言上有相当大的差别，有人认为可划分成两种语言。据专家考证，西部的裕固语留有明显的古代回鹘语的痕迹；而东部的裕固语却留有古代蒙古语的特点。但是不论说哪种语言的人都认为自己是裕固族的人。那么没有统一语言的人能构成同一民族吗？这就成了个问题。

用“裕固”这两个汉字来做族名是解放后该民族群众自己提出来的。他们口语自称“尧呼尔”，这两个汉字近于音译。名从主人，这个族名就这样定下来的。至于一个民族的人说不同语言的情况，在中国少数民族中，并不是只有裕固族是这样。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来源不同的人群在一定的具体条件下，各自带着原有的口音和语言，认同为一个民族的事实并不是个别的。在民族识别工作里，这可以说是中国的历史特点。

裕固族这个名称虽则是新提的，但作为一个民族实体已有悠久的历史。据比较可靠的历史资料，加上一直流传至今的民间传说都认为现在的裕固族人的祖先是曾经聚居在蒙古高原上的回鹘人，在史书上也称回纥人。回鹘人所建立的汗国大约于公元840年被推翻，大部分人向西迁移立足在今天的新疆吐鲁番一带，是现在维吾尔族的祖先；另有一小支东迁到河西走廊，就是现在裕

固族的祖先。

聚居在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流动比较迅速，幅度也比较宽广。某一个游牧民族强大了，常会去攻击其他民族，占据其草原，原来的民族如果不迁走让开，也就被并吞了。就拿河西走廊这块绿洲来说，有历史记载可据的，已经几易其族。这地方最早是乌孙和月氏所居，后来匈奴把他们赶走了。到公元前 1 世纪，匈奴降汉，汉代在这地区建立了政权。北方的一些民族和屯居其中的汉人就开始在这个走廊里杂居，共同开发这块绿洲。从那时起，统治过这地方的民族除汉族外，前后还有吐蕃、羌、蒙古、满等。他们都带来了一些不同的民族，也排挤过一些民族。这段历史使这地区形成了一个多民族的杂居区。

以裕固族来说，他们是在这块土地上居住较长的一个民族，从公元 9 世纪中叶回鹘人东迁进入河西算起至今已有 1000 多年。这个民族在 9 世纪末曾控制过这地区，长达 140 多年。这段时间也正是丝绸之路繁荣的时期。11 世纪初才亡于西夏。看来裕固族臣服了西夏后并没有撤离河西，而坚持在祁连山麓的草原上，发展牧业，并在和藏族和蒙古族接触中信仰了喇嘛教。

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是 1954 年成立的。以现在的行政区划来说，这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县：东西长 650 公里，南北宽 120 - 200 公里，土地面积达 2 万多平方公里。人口总共有 3.5 万多人，其中裕固族 8000 人，藏族 7000 人，汉族 1.7 万人，其他如蒙古、土、回等分别不过几百人。这 8000 多裕固族人聚居在面积达 1.4 万多平方公里的祁连山草原上，主要从事牧业。这片草原牧草丰美，水源充足，至今是著名的牧场所在地，是甘肃省重要的牧业基地之一。

我向主人提出看望裕固族的意愿时，确实给他们出了个难题。因为裕固族的牧场都在海拔 3000 米至 4000 米的高坡上。对于我的年龄和体质，主人们多少是有点过虑。最后只好同意我从

张掖去酒泉时绕道自治县府所在地的红湾寺。我由此进山几十公里，在附近的一个小草场上和裕固族同胞在白天共度了一个中秋佳节，晚上到酒泉安宿。这一天的安排使我看到了裕固族同胞的生活面貌，领受了他们好客的热情，在以传统形式招待我的酒会上，不断的歌声和真挚的笑容让时间飞驰过去。直到我不能不告辞时，单是留客告别的“上马酒”还得唱上半个多钟点。我在感情上受到的激动远过于我想对他们牧业建设的了解。因而在这篇杂写里我能报道的眼见事实不多，但是从我听到多方面的介绍却启发我对发展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青藏高原的牧业有了不少想法。

在汽车上我贪婪地倾听关于肃南草原的开发情况。从怎样用草库伦扭转在退化中的草场说起，一直讲到怎样建设“基本草场”，大大增加了收割饲草的总量。关于牲畜，他们从50年代开始绵羊改良工作中遇到种种阻力后又怎样步步进展，讲到80年代被确定为“甘肃高山细羊毛”育种基地的经过。这片草原上所产羊毛的长度、细度、密度和油汗质量都属优级，能纺60支纱。听来，肃南牧区现有的特点是在生产高质量的细羊毛，振兴牧业的指标当然不能只看存栏牲畜的数量，主要是在看牧业的基础建设，要在饲料、品种、畜群结构和防治灾病等上下功夫来保证畜群数量和质量的优化。关于这些，我从在汽车上所听到的介绍里得到了一个很深的印象：肃南的牧业不仅有历史的传统，而且近几十年来的改革工作也是有显著成绩的。现在的问题是怎样在已有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目标是为广阔的青藏高原建立一个牧业现代化的前进基地。

关于牧业改革我是外行，在这方面用不着我多说了。我想到的是如果在肃南这片草原上能有效地做出兴牧的榜样，不仅在经济效果上会大大改变当地的面貌，而且在西部中国许多少数民族的发展和团结上将带来深刻的影响。我一向认为我国西部地区的

民族团结最后还得依靠减少到消灭民族地区间的经济差距，而经济差距的缩小主要在于发展西部高原的牧业。我自己这几年在西北边区观察得到的印象总的说来是，从草到畜，从原料到加工，一项项地分开来讲，各地方都有了切实可行的办法了。但是从原始性的放牧发展成为为加工工业提供畜类原料的饲养业，作为一个系统工程，还缺乏综合性的规划研究。这就是说，怎样把已经行之有效的各项牧业改良工作，从饲料到加工工业直到制造成品看成是一条龙，一节节地加以衔接配套，提供一个可以给各牧业区开发作示范的模式，还有待我们去试验和实践。

我之所以看中肃南这块草原，觉得它具有良好的条件可以作为现代化牧业的试验场所，首先是上面提到的牧业基础，其次是它正处在河西走廊工农业重点建设的附近。而靠近现代化农场和工业中心都是促进牧业现代化的重要条件。

我这次是从武威绕道进入裕固族地区的。武威正是甘肃金昌开发小区的所在地。金昌亦称镍都，是我国产镍的一个重要基地。我在《一厂两制》这篇杂写里已讲过，这个开发小区这几年采取国营和地方结合扩散工业的方针，一批中小企业已经成长。中小企业的扩散已可以为各地方特产的原材料提供加工的机会，同时也就推进了当地原材料生产的发展。牧业现代化主要是在使畜产品成为加工工业的原料。发展纺织、皮革、食品工业才能把牧业带进现代化经济。但是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工业最大的困难是缺乏资金、技术和经营人才。既然肃南靠近武威、酒泉等国营大企业的基地，那么就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这些现存的条件摆着不利用是十分可惜的。

从客观上讲，振兴肃南牧业条件是具备的，当前所欠的“东风”是主观上对这种发展的可能性和重要性的认识。只要“争”到这股东风，肃南兴牧在不久的将来是可以成为事实的。

在离开肃南时，我不禁联想起了三年前我去访问过的甘肃另

一片广阔草原，那就是甘南。关于甘南那次访问，《瞭望》的读者可能还记得我那篇《甘南行》。肃南和甘南是甘肃的“两南”，这并不是名称上的巧合，它们在发展西部民族事业上有着密切联系。它们都紧靠着青藏高原的边缘，都是藏族和与藏族有长期历史关系、甚至已信仰了喇嘛教的其他民族（如裕固族）共同聚居的地方。这“两南”能不能看作是青藏高原的少数民族和中原地区各民族联系的两架桥梁？我在《甘南行》里曾提出过通过甘南这架桥梁可以把现代化科技知识送入藏族地区。这次肃南之行又启发我想到加上这架桥梁，把现代化的牧业送入藏族地区。因而我把这“两南”联系了起来，称这篇杂写为《“两南”兴牧》，并加上这一小段题解做结。

1989 年 12 月

开发大西北

我很高兴能参加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第一次协调会，盼望已经很久了。去年筹备这个会，民盟中央也派了同志参加。我是上星期在江苏南通得到开会消息的，虽然离得很远，我还是及时赶来了。

今天，我想主要讲一讲为什么要建立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对这个问题，我个人的思路是如何形成的呢？80年代初，我重新工作以后，首先在我的家乡苏南搞调查。当时我有一个愿望就是四个字“志在富民”，目的就是让中国老百姓尽快富起来。80年代前四年，我基本在江苏，考察的对象是农村和小城镇。我也不断发表意见。事实证明，这些意见对于江苏、对于全国农民来讲是得到好处的。我自己也很高兴。

上星期我还在江苏张家港，看到了全国农民最好的房子，三层小楼，别墅风格，这个水平已经可以和目前日本农村的水平比一比。这个变化没有经过多久时间，就是这10年嘛！从80年代初期人均收入只有100来块钱，现在到了1000多块钱了。其主要原因是把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都用上了，搞乡村工业、产品出口、创取外汇，使大量劳动力变成了财富。

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80年代初期，全国农民真正在经济上翻身的只限于沿海，而沿海又仅限于少数几个地区，如长江三角洲、浙江温州、福建侨乡以及珠江三角洲。为什么其他地方没有较快地发展起来呢？是什么原因？所以，我就转移我的研究对象：从沿海到边区，到最穷的地方去看看怎样才能发展起来。我到了内蒙古，从兴安岭到包头又到阿拉善，后来听说最穷的地

方是在甘肃定西。最初到甘肃的目的和动机是来看看这地方究竟穷到什么程度，如何让它转贫为富。从1984年起，我每年到甘肃来一次，今年这一次已经是第六次了。

全国农村我跑了不少地方，定西的贫困是比较典型的。主要是干旱，没有水，水是非常宝贵的。人靠天吃水，庄稼靠天生长，缺水就富不起来，使我感到农村真正穷的地方在西北。但西北不应当这么穷，为什么呢？因为历史上西北是不穷的，没有西北就没有现在的中华文明。大西北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后来由于生态破坏了，逐步变成了满目黄土的状况。贫穷也就由此开始了。因此可以说，是贫穷把我引到西北来的。

如何改变这种贫困面貌呢？我刚到甘肃的时候也曾想把江苏发展乡镇企业的经验搬过来。后来发现并不简单，主要是缺乏基础和条件。但是我同时也发现搞多种经营是个好办法。我在定西考察时看到一家农户，家里种粮、养猪、养羊、养兔，搞得很好。可见，在当地是以家庭为基础的，尽量利用劳动力，想多种办法使劳动力变成财富这一原则还是可行的。这种经济的形式，现在有人称之为“庭院经济”。

从发展乡镇企业来讲，必须具备一定的基础和条件。工业技术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苏南所以能够把乡镇企业搞起来，是因为有大中城市为依托，又有长期的手工业传统。没有这个基础，发展乡镇企业就比较困难。但是以家庭为基础搞各式各样的副业，农民积极性很高。利用农民勤俭持家的传统做基础，使每个人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是个实际可行的富民之道。各地各户努力从事各种适宜的副业，千家万户也就随之富起来了。从坚实的农副业基础上逐步发展集体性的乡镇企业是一条农村经济发展顺理成章的道路。

目前，已经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虽然面临收紧的局面，环境很差，困难很多，可是并没有发生大的动荡。这使我感到这种我

叫它作“草根工业”的企业生命力确是很强。上个月我到江苏去看了一下，紧缩的影响比较严重到关停并转的大概有1/10，可是这个打击并没有引起农村里的恐慌。为什么呢？这批亦工亦农的人，工厂关门停产后还是可以回家搞农业、搞副业，等气候转好，再出来开厂做工；这样就有了伸缩性、灵活性，也就是弹性。农村家庭这个经济单位是个强有力的调节机构。在现代化的城市里没有这种弹性，也就经不起这个风浪。

当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的基层，看来不能离开家庭这一基础。离开这个基础在理论上是可以讲的，而实际上却行不通。工业刚刚起步的时候，经济上由穷到富要有一个过渡。在这一时期要充分重视家庭这一基础。在经济上比较落后的农村里要搞“庭院经济”，以家庭为基础，农、林、牧、副、渔，能搞什么就搞什么，小规模地家家户户搞。

“庭院经济”不妨看作一个过渡阶段。归根到底它还是小农经济，具有小农经济的各种弱点，农民的小农意识也不易改变的。所以为了向社会主义发展，必须加上一个集体服务机构。搞这个服务机构不难办，因为生产的东西多了，自己吃不了用不完就必须想办法，把产品推向市场成为商品，而这是个体户不容易搞得好的。在农产品基础上搞加工工业是要农户联合起来。所以他们会容易接受集体性的服务。从流动和加工开始，逐步向产前、产中、产后的集体服务工作方向发展。这样顺势而行，容易为群众接受。这样集体主义就来了，就向社会主义发展了。这就是我们在农业体制改革中所讲的双层结构。它利用“庭院经济”为起点，发挥农民的积极性，然后引导他们向集体主义发展，使个体经济的作用越来越小，集体的作用越来越大。这是条值得充分利用的道路。以上是我这几年来对怎样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使老百姓早日富起来的一点体会。

我第二次来甘肃，经过临夏到甘南，这些都是民族地区。去

后我想了很多问题。中国现在真正穷的是少数民族，民族问题的根源也就在此。以前民族问题的根源是民族压迫，现在民族压迫从根本上消灭了，可是穷还是存在的。贫富差距还很显著，也可以说十分严重。

大体讲来，我国面临三个差距：一个是同发达国家的差距，一个是东南沿海同西部的差距，一个是汉族同少数民族的差距。这是我研究社会问题的出发点。为什么我们要搞四个现代化？就是要克服第一个差距，这点大家都已经看到了。但是东西差距和民族差距的严重性一般来说还是认识不足。我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地区差距和从此带来的矛盾是当前我国的基本问题之一。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及早地注意并加以克服。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地域辽阔，它的经济特点主要是牧业。不想方设法使这片草场的牧业发展起来，这地区的少数民族经济就很难发展起来。这是一个发展民族经济的基本问题。同时历史上农、牧是从没有隔断过的。在西部高原和中部平原之间一直存在一个农、牧交流的过渡地带，甘肃的临夏就处在这一过渡地带上。这里住着一批善于搞流通的人物，其中很多就是有商业传统的回族。汉族由于受传统意识的影响，不善于做生意。所以我主张发挥回族的特点，帮助他们发展青藏高原的流通事业，以促进藏族牧业的商品化。关于这方面我上次在这里已谈过，不多谈了。我去年来甘肃又提“两南兴牧”的主张，希望同志们能继续研究。

以上讲的是我怎样从治贫致富的出发点，逐步注意到少数民族的发展。关于怎样发展少数民族经济的问题，希望今后还有机会作专题的讲话。

这次来又有了一些新的看法。现在离 21 世纪只有 10 年了，因此我们必须要有个概念，现在不是 80 年代了，是 90 年代了，从现在起就应该考虑 21 世纪的问题。因此不能不想 21 世纪的世

界是一个什么样的格局。去年一年的变化是世界根本格局的变化的开始。用简单的话来讲这个变化是“二降二升，四分为多”。两降就是美、苏控制世界的格局去年开始发生动摇，实力下降了。债主国已成了债务国，这两降还要继续降下去。两升，一个是东方的日本，目前已成为经济大国，一个是西方的欧洲共同体。当前可以说已经出现了四强。东德一倒过去，德国处于统一的前夕，德国统一后拥有很强的实力。欧洲共同体很可能发生分化。我们中国能不能在下个世纪在东亚崛起，成为世界的强国，就得看我们今后 10 年的努力了。所以前景是“四分为多”，也可以说我们要争取的目标是“多中有我”。

从国际形势分析，5 到 10 年内世界大战是打不起来的，在这 10 年之内我们能不能在东方崛起，与日本比一比？在这段时间内，如果我们不能积蓄力量，我们起不来，那么，我们在 21 世纪的地位就很成问题了。这些年是对我们这一代人的考验。只要我们振兴工业，加强农业，控制人口，搞一个强大的中国是可能的。要实现富强也是有条件的：一是大局稳定，二是到 2000 年国民经济要翻两番，三是 1997 年收回香港。我们将会有一个“一国两制”的“跳板”，为出口创汇创造更便利的条件。但是，我认为，从东到西，还要一条龙，一条经济上有实力的龙。现在这条龙的骨脊已经具备了，那就是有一条从东至西的干线铁路。这条龙的一头是上海，它要成为一个大陆上的香港，我们要有个自己的外贸、航运、金融、信息、科技的中心，为全国各地工农业服务。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窗口。

上海正在浦东进行开发建设，搞成以后对大家都有利。历史上，上海是我国的经济中心，香港原来只是一个相当落后的、轮船装水上煤的口岸，和上海相比差得很远。我国东方的大门一直是开在上海的。后来，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搞封锁，我们也关了门，只能以香港为跳板搞出口，可以说，香港是靠了作为我们大

陆的出口后门才能繁荣发展起来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在其他地方搞几个自己的香港呢？现在，我们正在借鉴香港、深圳经验开发浦东，复兴上海。上海比香港条件优越，上海人才多，头脑灵，无论技术力量还是科技力量都比香港强。香港没有农业，一点耕地都没有。浦东开发区绝不仅仅是为了上海而建立的，而是为了整个中国从西到东这条龙的腾飞。上海成为这条龙的头，为这条龙的腹地服务。

民盟中央有见于这个形势提出了一个意见，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协作区，包括一市两省。目前的问题是江、浙、沪一带工业企业有趋同性，企业趋同，产业结构趋同，没有一个通盘的规划，缺乏一个照顾全面、为各地工商业服务的机构，致使长江三角洲以及所联系的腹地的优势发挥不出来。当然，要建立这个中心困难很多，缺乏资金，但是建立这样一个大陆上的香港是十分必要的。这条龙的另一头是黄河上游地区，它是提供原材料和发展加工业的基地，这一地区是大有发展前途的。这里原有一批三线的大企业，近来又发展了一大批基层的、民间的中小企业，开发是有基础的。长江三角洲和黄河上游这两方面结合得好，搞成一条龙，大家为一个目标，看成一盘棋，看到21世纪整个局面，我们的经济实力就会大大加强，这条龙就会腾飞。假如我们不这么办，将会是什么局面，大家是很清楚的。我们必须为下一代积蓄力量，打好基础，创造条件。主要的是要把两头沟通起来。一头是长江三角洲，一头是黄河上游。要真正搞好沟通，还要花大力进行研究探讨，以得到一个共同的认识，得到一个正确的决策。在共同认识的基础上搞共同规划，分头实施。

这次会议很重要，黄河上游这一地区是资源丰富的地区，同时又是一个生态失调的地区。现在已经找到了一个可行的发展方向，那就是发展能源、原材料工业，除供给全国之外，发展自己的中小企业。小区建设也走出了一条城乡结合、一厂两制的路

子，发展很快。我相信，只要走上正轨，5 年就会见效。在这次会议上，我希望大家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看到 21 世纪，看到全中国。既看优势又看可能性，振奋精神，增强信心，根据“共同规划、分头实施、互惠互利、共同繁荣”16 字方针的要求，让黄河上游这块宝地，这个中华民族文化的摇篮恢复其本来面貌。与长江三角洲的开发配合起来，成为一条中华巨龙。只有这样，我们才无愧于下一代，我们就可以比较宽松地迈入 21 世纪。

1990 年 5 月 7 日

中华民族研究的新探索

感谢国家民委组织这次学术研讨会来评论和发挥我前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所作的 Tanner 演讲——《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这是对我的鼓励和督促。

在进行讨论之前，请容许我把发表那次演讲的动机和经过表白一下。

1933 年我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后，由于受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派的影响，接受了应用人类学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的主张，考入了清华大学研究院专攻人类学课程。所谓人类学方法，就是指当时在英、美盛行的对人们集体生活所形成的具体社区进行实地观察和分析的研究方法。社区这个名词，最初就是由当时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们提出来用以翻译英文 community 这个名词的。芝加哥学派创始人 Park 教授用 community 这个名词的意义和我们通常翻译为社会 society 一词是有区别的。社会是泛指人和人在经营共同生存时所发生的关系。而社区则是指人们在一定地域里经营集体生活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是在一定时间和一定空间内由一定的人口进行集体生活时有一定社会组织的具体人群，例如村落、乡镇、城市、民族、国家等等都是不同层次的人们共同体，也就是所谓社区。

在研究人们集体生活时提出社区这个概念，就是要使我们能体会到种种社会关系间的相互依存，把人们的集体生活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这种观点在人类学中被称作功能观点。最著名的先导就是 Malinowski。他最初把这种观点应用于研究大海洋里和外界相当隔绝的岛民。Park 教授把这种研究方法推广到高度现代

化城市芝加哥，形成了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这个学派的社会学在我看来已经把人类学和社会学打通了。它们之间如果还存在着一定区别的话，那是在以不同层次和性质的社区为研究对象。人类学是研究与研究者本人不同民族的不发达社区，社会学是研究研究者自己的发达社区。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和功能学派人类学传到中国，最初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为中心汇合了起来，由中国人自己来研究国内不同层次不同民族的社区。这是被西方学者称作中国学派社会学的特点。

我的学术生涯是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开始的，所以我对国内的少数民族、农村、小城镇以及城市里工厂的研究都采取同一的观点和方法，把它们看成不同层次和不同性质的社区，进行亲自的观察和分析。正因为这个缘故，在我的研究工作中社会学研究和民族学研究是一脉相通的，甚至认为毋需加以分科的。但是在近 40 年来中国的学术界一般还是以两种学科来处理，对此我在这里似乎应当加一点申说。

自从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国家否定了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主张实行民族平等。但是历史上形成的许多民族各有其民族特点和民族意识，而且社会经济的发展又不平衡，为了实现民族平等，国家有许多工作要做。要进行这些工作，制定相应的政策，又必须对存在的情况以及形成当前情况的历史过程有足够的知识。这种需要向学术工作者提出了新的研究任务，要求他们对当时了解得很不够的各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进行科学研究。这项工作当时即称作民族研究。我在 1950 年就参加这项工作，并于 1956 年到 1957 年参与组织了全国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

民族研究这个名称就是这样开始的。这项研究事实上并不包含对汉族的研究。理论上原是说不过去的。但是在我国，汉族长期以来一直占人数最多，经济文化最发达，关于它的社会历史情况已经有现存的各学科在研究。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却一向被忽

视。所以解放后迫切需要的是了解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由此而产生的民族研究实际上成为不包括汉族在内的少数民族研究。后来民族研究又被称为民族学。这是中国民族研究和民族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

这样历史背景里产生和发展出来的民族研究和民族学有它的长处和短处。长处是突出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对象，对当时的民族工作是适应的。比如说，1950 年配合中央访问团所进行的关于少数民族的调查，帮助了国家规定民族成分的工作；1957 年开始的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为当时正在进行中的少数民族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政策上的科学根据。民族学的实用性是极为明显的。而且也因此而使这门学科取得了学术界的重视和国家的承认。

把民族研究和民族学的对象限于少数民族自有它的缺点。缺点在于把应当包括在民族这个整体概念中的局部过分突出，甚至从整体中割裂了出来。中国民族研究限于少数民族，势必不容易看到这些少数民族在中华民族整体中的地位以及它们和汉族的关系。而且如果对这些少数民族分开来个别加以研究，甚至对各民族间的关系也不易掌握。民族学这个学科也同样受到局限。从严格理论上来说是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只能是民族学范围内的一个部分，而不能在二者之间画等号。

人们的知识，甚至较有系统的学科知识，无不和当时的历史需要相结合的。过去 40 年中我们在民族研究或民族学的名义下积累了相当多的知识和形成了许多有益的概念，这是必须肯定的，而且将成为今后发展这方面知识的基础。但是由于上述的局限性所引起的缺点也应当及时自觉加以改进。怎样改进和提高是我过去相当长时间以来耿耿于怀的问题。

我明白，要从中华民族整体出发来研究这个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规律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由于我自己的知识容量

过小，思维宽度有限，要为民族研究或民族学推前一步，总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我记得1953年我在中央民族学院负教务上的责任时，为了要为学生提供有关中国各民族的基本情况。曾四处求人讲授，最后只能自己担任，利用有限的历史资料和中央访问团的调查资料，编出了一本讲义。在编写时就深切体会到中国的各少数民族在族源上，在发展中都是密切相关联的。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就是由这密切相关的各部分，在复杂的历史过程中结合成的。但是怎样以这个过程为纲，把中华民族这个民族实体讲清楚，我没有把握。这门功课我只试讲了一年就停止了。但是我的愿望并没有熄灭。

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就过去了有30多年。我自己个人的经历也发生了许多变化，以致长期不能专心于学术工作，更不能集中力量去编写这本讲义。前年我接到香港中文大学的邀请担任1989年Tanner国际学术讲座的讲员。这是一项荣誉。我很想利用这个机会，把这一生中的一些学术成果提到国际上去讨论。这时又想到了中华民族形成的问题。我自思年近八十，来日无几。如果错失时机，不能把这个课题向国际学术界提出来，对人对己都将造成不可补偿的遗憾。因之，我抛去暴露自己浅陋的顾虑，利用这年在烟台暑休的时间，一口气把我在这问题上所有的知识整理成章。我曾把草稿分送多位热心于民族研究的朋友，请他们帮助我修正和补充。帮助我的许多朋友，我不再一一提名道谢了。有些朋友今天也在座。我从朋友的反应中得到了鼓励。同时这篇讲稿也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得到了许多比我年轻的一代学者热烈的评论和补充，还有许多朋友为我指出了该讲稿中所引用史实的谬误。国家民委鼓励这种学风，同意召开这次国际性的研讨会，我再一次表示感谢。感谢的不仅是对我个人学术工作的支持，而是对这篇演讲所表现的那种勇于探索精神的支持。

最后，我想说，这个探索是初步的尝试，中华民族不仅有它

辉煌的过去，还必然有它更辉煌的未来。我们回顾过去的目的是在为创造未来做准备。我们民族的祖祖辈辈在东亚这片大陆上形成了这一优秀的民族是付出过无数代价的。为了前进，为了在今后年代中能使我们中华民族继续成为世界上的一个优秀民族，为人类的不断发展做出贡献，我们的任务比祖祖辈辈更为艰巨，也更为伟大。所以我希望这个尝试性的演说能把我们的眼光导向未来，更自觉地为中华民族做出贡献。

1990年5月17日

包 头 行

我在 1985 年曾参观过包钢（现名为包头钢铁稀土公司），并在《瞭望》发表了一篇《包头篇》。

包钢是 50 年代在苏联援助下在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建立的一个现代工业的大企业。真可说是平地起家。包头原来是一个 7 万多人的黄河上游农、牧集散地的水旱码头。在过去近 40 年里，由于以包钢为首的一些国营大中企业的勃兴，现在已发展成为一个拥有 178 万人口的边区新兴城市。包钢这类大中企业的建成，在启动和推进我国边区工业化事业上所起的作用是不应低估的，而且还将在今后边区开发中发挥骨干作用。

最近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提出要特别注意搞活大中企业和全国一盘棋缩短东西差距，我不禁想起 1990 年 10 月再次访问包头时见到的包钢情况，不妨围绕着这个主题讲一点体会。

“堤内损失堤外补”

这次重访包钢令人兴奋的是见到它在这 5 年里变化很大。企业发展在同行中可说已名列前茅。1985 年钢、铁产量是双 155 万吨，1990 年已达双 250 万吨，增加 60%。上缴利税可达 4 亿元，做到了扭亏为盈。

包钢是怎样搞活的呢？简单地说是增加计划外的产量，填补计划内的亏损并略有余利。靠这点余利，维修了设备，提高了职工收入，还回了部分福利欠账。职工年平均收入，1983 年是 990

元，现在已达 2400 元，新建了一批职工宿舍，1.2 万名职工已迁入新居。职工感到满意，包钢有了起色。

按计划经济的体制，像包钢这样的国营企业有责任按国家计划完成定额产品任务。与此同时国家按计划向它提供设备和调拨原材料，并按规定价格收购产品。但在实际运行中，调拨的原材料数量和规格常和实际需要不相协调，出现缺口时要企业自己想办法补足，以致产品的成本有时会高于国家的定价，出现亏损。包钢直到现在，计划内的产品，少数除外，绝大部分是赔本的，一年总共要赔 1 亿元以上。

包钢扭亏为盈是靠了这几年增加计划外的产品。这些产品不是计划定价，可以投入市场以议价出售。议价一般高于成本，有利可图。以盈补亏，尚有余利。但是计划外产品的原材料哪里来呢？包钢为了取得计划外的原材料，这几年和附近固阳县的各乡采取各种形式合办小煤窑和矿点。现在已有 10 多处。利用这些自筹的原材料制成的商品，通过市场取得利润。这可说是一条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办法，也是计划外补贴计划内的办法。而从企业整体来说还是扭亏为盈的办法。

不管怎么说，包钢计划内的产品至今大部分还是赔本的。因此，单纯经营赔本产品，企业就难以维持，只得依靠国家补贴过日子。当然，最好的办法是使计划内的产品成本不高于调拨的定价。这样就牵涉到整个计划经济的改革，实际困难很多，短期内不易实现。包钢这种以计划外补贴计划内的办法，一方面维持了企业的正常生产，也保住了计划内产品的完成，同时还争取了改善计划经济所需的时间和资金，有利于企业的改造。

包钢采取的这个办法使它和包头市乡镇企业的结合迈出了新的步子。过去包钢和许多大中型企业一样，走的是“小而全，不求人”的路子，它和包头市是两张贴不紧的皮。这次访问我看到这种情况有了改变。我参观了一个设在包钢附近农村的小型

轧钢厂，它利用包钢提供的下脚料和废品拉成钢锭。包钢还派人指导技术和设计，并且投入部分资金。听说包钢正在和包头经济技术开发公司合作，在南郊筹建一个炼钢厂。看来，包钢已经破墙而出和厂外世界挂钩了。

包钢拥有比较先进和强大的技术优势。它从 1989 年开始对地方企业进行设计和咨询服务，仅工程项目总额就达 100 多万元。同时还为内蒙古地区 24 个单位解决 50 项生产难题，并以原料和技术协助地方企业的兴建和发展。比如，帮助包头万宝稀土金属厂的技术改造已取得效果。又如，包钢规定优先采购当地生产的零配件和辅助材料，以支持和推动乡镇企业的发展。

仍然背着沉重的人口包袱

上述这些横向联系对于包钢这样的大企业来说固然只是些小钱小事。但是这条路子如果认真地和有计划地扩大和推进，对搞活大企业可以起很大的作用。

我在 1985 年发表的《包头篇》里特别提到这些大企业人文生态失调的现象。说的是像包钢这样的一些大企业，大多背着一个沉重的“人的包袱”。它们要养活越来越多的人，不仅增加了企业的开支和产品的成本，而且影响生产效率，要搞活大中企业必须妥善解除这个包袱。

现行国营企业的职工人数原是有编制定额的。但实际上存在的“铁饭碗”制度，使职工总是有进无出，越积越多，企业内部人浮于事，一个人的活几个人做。企业不仅要给大家工资和奖金，而且还要承担他们以及他们家属的生活福利，要造宿舍、建医院、开学校、办食堂等等。这些设施都得企业包办，所以在包钢有句话流传：“包钢、包钢，不仅包钢，还要包人。”对企业

来说，包人可要一笔不小的开支。更使人头痛的是所包的人，由于自然繁衍，不断在增加。职工要结婚；结了婚要生孩子；孩子要受教育，成了人要就业。一代又一代，人丁兴旺，企业可就成了一个不断增长和膨胀的小社会。对这种小社会的管理就成了企业摆脱不了的“业务”，结果就形成了所谓“企业办社会”的局面；办不好还会影响职工情绪，引起社会问题，牵连到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这个包袱在边区的大中企业里特别沉重，因为他们几乎都是平地起家的，职工绝大部分是外地支援到内地的。50年代进包钢的职工和他们的家属，开始不到1万人，现在仅职工就11万人了，加上他们的家属和其他靠包钢养活的人，算在一起估计有27万人。这些就是自成一个“小社会”的“包钢人”。这40多年来，包钢的经济实力并没有增长多少，而所背的人的包袱却增长了20倍。它的处境自可想见！

其他诸如住所、医疗、教育、治安等问题且不说，只是待业青年问题就足够使包钢的领导伤透脑筋。包钢初建时的职工几乎都是年轻小伙子，到80年代已经到了或快要到退休年龄。他们的子女大多已经成年，有的已经有了第三代。60年代起包钢就开始发生待业青年的问题，每年大概有2000 - 2500名青年需要安排就业。

包钢和边区其他的大中企业一样，或多或少是个小而全、不求人、与企业外部缺乏联系的半封闭的小社会。在这里生长出来的新一代劳动力基本上只能自身消化。这就为难了。包钢在编制的限制下，千方百计地替新生力量找出路，大体上采取了以下几个办法：一是加快职工队伍的新陈代谢，请老工人提前退休，让他们的子女顶替。二是扩大编外工人，如合同工、临时工等等。三是开办名义上和母厂分开的附属的小企业，一般称之为集体工厂。

破墙而出才能走上康庄大道

包钢在 60 年代为解决待业青年问题，就办起了“大集体管理处”。后来由于安排职工子女的任务越来越重，这个处就改为“劳动服务公司”。1983 年又建立起“包钢综合企业公司”，将 49 个小型附属企业管了起来。公司所属的小厂名义上都是自负盈亏的，实际上是些“没断奶的孩子”，处处靠大厂照顾过日子。现在这些小厂已安排了 4 万多人，几乎相当包钢正式工人的一半。这两年来由于治理整顿，“消化不良”，目前包钢职工家属中已积压着 1.5 万名待业青年，其中女性居多。这些待业青年分布在大约 8000 个职工家庭，对职工的影响和压力相当严重，已成了企业本身的大问题。综合企业公司的领导向我介绍情况时，一再强调这个问题必须及时解决，但是怎样解决还是一筹莫展。

听到这里，我想起了甘肃的几个大中企业如白银的铝厂、金川的镍厂。它们在前几年分别办起了开发小区，安排了当地的待业青年。这个问题可以说完全解决了。所谓开发小区就是在大厂附近开辟了一个工业区，并搞好基础设施，和地方各乡镇联合办起了近百个独立经营的集体工厂。大厂负责设计和提供技术，把大厂多余的劳动力输送到小区，成了小厂的骨干。我曾在《瞭望》发表了一篇《一厂两制》的文章，介绍过甘肃这些开发小区的情况。甘肃的开发小区与包钢的综合公司有所相同，也有所不同。相同的都是国营大企业办集体性质的小企业；不同的是甘肃小区是大企业开门走出去和乡镇企业结合联办；而包钢的综合公司则是关门在包钢围墙里自办。其实包钢的围墙在与附近乡镇合办煤窑和矿点时就已经打开了缺口。可惜他们没有意识到和乡

镇企业结合也是解决待业青年问题的一条好办法。他们依然沿着“劳务公司”的传统来办小厂，没有把大门敞开，把新的一代放出去开辟新天地。

当然，如上所说，包钢近年和地方已发生了横向联系。不过，还刚刚开始，不仅规模小，而且路子也窄，多限于为大厂服务的项目。甘肃小区里的小厂经营的项目却是多种多样的，不限于为大厂制造配件或原料加工。凡是当地有发展前途的项目都可以进入小区。这样就大大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路子也越来越宽了。

这条打开大中企业的围墙，扩散大中企业的能量，与地方结合办集体企业，发展多种多样产品的路子，据我所知，并不是甘肃的独创。我这几年在西安和宝鸡就看到不少军工企业甚至和外商结合，制造摩托车、电冰箱等产品进入市场流通。记得还在好几年前，我参观首钢时，看到过他们办的家具厂和饼干厂，还听说他们在北京办了个高级旅馆。当时我就想，如果沿着这条路子发展下去，不是就会出现多行业的企业集团了吗？这不就是国外产业发展的大趋势吗？经过这几年的考察，我觉得我们值得在这条路子上多做些研究，说不定这一条以国营企业为中心和集体企业相结合的路子还是很有前途的康庄大道。

发掘和依托“隐蔽的上海” 边区经济就有了奔头

大中企业的扩散并和乡镇企业结合，不仅有助于搞活大中企业本身，而且对于边区的经济发展意义更大。中国的大西北原是个以粗放的农牧业为基础的多民族不发达地区。在这种基础上，自身是很难发生现代工业的。现在这些地区的大中企业都是靠国

家的力量办起来的。资金、技术、经营都是外来的，甚至一般工人也大部分是外地支援的。比如，“包钢人”至今说话还带东北口音，因为包钢的主要骨干力量来自东北鞍钢。

这种历史条件，加上国营企业的体制，边区这类大中企业当然不易和当地的社会经济结成一體，只能成为贴不拢的两张皮。这种分隔对企业、对地方都是不利的。对企业来说，引起上面所提到的人文生态失调；对地方来说，依托不上先进的企业来发展当地的工业。

包头虽是个新兴城市，但经济繁荣的地区只限于市内的几个工业区，即几个大中企业所在的地区。包头市属的乡县最近两三年才有了些乡镇企业，而工业产值在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例还没有超过工农业总产值的一半，基本上还是以粗放的农、牧经济为主。包头市的工业区远远看去像是一片汪洋大海里突出的孤岛，或是广阔沙漠里的绿洲。这说明过去40年国家投入边区的工业化种子，还是孤立在于若干点上，而没有蔓生扩散成片。这些孤岛式的大中企业在边区的经济发展上所起的作用并不大。

我们的国家为开发内地和边区经济所投入的资金是不少的，就包头一市来说，国家累计投资就是100多亿元，整个西北地区国家投入的资金，有人估计达3700亿元。但是，效果却不很显著，边区还是那么落后，原因就在于所建立起来的大中企业被困在孤岛上，发挥不出推动地方经济的作用。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这几年在甘肃贫困地区的考察。我曾去过定西这个有名的贫困重点区。每次去到那里，我总是劝他们兴办乡镇企业。地方干部确实十分努力地去办，但由于缺乏资金，又缺技术，办乡镇企业确实很吃力。计划中的一个亚麻厂，筹备了四年还没有建成。前年我去白银市访问，原来属于定西地区的会宁县现在划归给白银市。上面提到的白银铝厂这几年在这里成立了一个开发小区，又承包了推动市区各县乡镇企业的任务。听

说，原来比定西还落后的会宁在白银公司的协助下，这两年办起了乡镇企业。我在河西走廊的路上，经过永登县看到沿路新建了不少小工厂，就是附近大中企业扩散的结果。

我记得在宝鸡市考察时曾经在一次讲话里说过：这里有一个“隐蔽的上海”，现在大部分还埋藏在山沟里，如果能发掘出来，关中广大农村就能变成西北的“苏南”。我的意思就是指望他们去依托这一带国家投下了大量资金和聚集了众多科技人才的“三线工程”。这是一个潜伏着巨大工业能量，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还没有发生推动地方经济起飞的启动作用。苏南的乡镇企业发展得较早，就是因为有上海可以依靠。乡镇企业缺乏城市工业的依托是不容易平地起家的。现在西北新兴城市里的大中企业就是广大边区可以依托的“隐蔽的上海”。隔断这些企业和地方结合的那堵墙一旦拆掉，这股潜伏在墙内的力量一旦在广阔天地里有了用武之地，边区的发展就有了奔头。

这次包钢之行对我有很多启发，怎样缩小东西差距一直是我心头的课题。现在看到边区的大中企业自己也感到不能继续走“小而全、不求人”的路子，而且实际上由于亏损所迫不得不破墙而出，寻求缓解之道。有些地方已尝到了“一厂两制”、“城乡一体化”的甜头。许多地方也认识到大中企业藏着他们急需的先进技术和经营人才。企业和地方走到一块儿了。这是两厢情愿，双方有利的好事啊！

中央提出搞活大中企业和全国一盘棋先进帮落后正是及时的东风，希望乘风破浪，让边区开发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1991年1月16日

凉 山 行

开发大西南是我关于边区开发最近给自己提出的研究课题。这也是我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宏观格局思考的继续。为此我“五月渡泸”前去四川凉山进行了一次初步考察。考察回来为《瞭望》读者做以下这个汇报。

开发大西南：边区开发研究的新课题

在这里不妨把我这几年来对我国社会经济宏观格局思考的经过简略说一说。

去年初夏，我从长江三角洲考察回来的第二天就飞往兰州参加黄河上游多民族开发区的第一次协调会。11月份又去了一趟福建。今年暮春回吴江老家一次。仔细想想，近年来这种大跨度的考察、长时间的追踪调查使我得益不少。最重要的收获是逐步形成了我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宏观格局的认识。从全国来看，各个地区几乎都在结合本地区的自然条件、地理位置以及历史文化传统摸索适合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路子。这不能不认为是我国经济发展逐步发育成熟的表现。

先看看沿海地区。珠江三角洲的发展格局已经大体定型。它主要依靠香港辐射，搞两头在外，“前店后厂”的经营，上得很快，5年工夫就大见成效。福建则靠打“侨牌”，效果也比较明显。现在加上台资进闽，有了更多的建设资金，上得会更快一些。温州搞的小商品、大市场，已在全国建立销售网络，在市场

疲软的压力下，把产品质量、品种压了上去。他们这种以流通促生产的机制为全国各地乡镇企业树立了榜样。山东强调科技兴省，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大办乡镇企业。胶东半岛上有的乡村办的工厂，规模不小，水平不低，赢利创汇能力都较强。至于长江三角洲的苏南、浙北两翼，由农业集体积累兴办起来的乡镇企业，已左右开弓开辟国内外市场，正在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上海的浦东开发区这个龙头一旦发育成熟，将使这个地区有了可借之“梯”，更上一层楼；有了可借之“船”，扬帆远航。我看，沿海地区照这个路子走下去，今后10年一定会持续稳步发展，但在发展过程中，我也意识到这些地区的能源和原材料的供应将成为日益严重的问题。这个考虑也使我转眼去看我国的西部。

事实上，眼前能源和原材料的短缺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从长远来看，中国作为11亿人口的大国，不能没有自己的能源和原材料基地，而矿藏和水利资源富集之处又多在中国的西南和西北地区。建国之初，国家曾大量投资在这些地区建立起颇具规模的骨干企业。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努力，他们对国家固然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由于体制的限制，这些企业长期没有与地方“搭界”，内部巨大的潜能发挥不出来，对地方经济的推动和改善周围农民生活都没有产生应有的影响，效果未能尽如人意。

西部现在的情况怎样？改革开放同样也给西部带来契机。那里的一些大企业、大厂矿，也有不少已冲破限制，打开厂门，走出孤岛，路子越走越宽，与地方不仅“搭上界”，而且结合的形式也多种多样。例如宝鸡，提出了城乡一体化的方针，几年来，他们不断地将三线企业扩散到附近县镇，从人员、技术、设备、资金多方面帮助地方兴办乡镇企业和县属工业。又如内蒙古的包钢则是与地方联营扩大计划外的生产，不仅弥补了计划内的亏空，而且还补贴了部分福利欠账。效果更明显的例子是甘肃的金

川、白银、兰州等大企业创办的开发小区，全面扩散，多种经营，实行“一厂两制”。仅经过两三年经营，这些小区的产值、利润几乎与母厂相等，附近的农村也因此富了起来，贫困面貌大有改善。

通过对西北边区的多次考察，民盟中央于1988年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建立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建议》。《建议》的中心意思是利用甘肃、青海和宁夏、内蒙古两省两区丰富的水利和矿藏资源，在这个狭长地带建立起一系列能源和原材料基地，除满足东部以至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外，划出一部分给当地用来发展乡镇企业。看来这条路子对边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摆脱贫困、发展经济是走得通的。今后10年，西部进一步开发大有希望，尤其是欧亚大陆桥接通，加之最近发现储量为世界级的油气田，西部的后劲是充足的。

去年5月底至6月初，我抽了20天时间重访50年前在云南滇池周围我和张之毅同志一起调查过的禄村、易村和玉村。这次重访云南三村，提醒了我还有大西南这一个资源丰富的地区需要开发。我想到自己虽则年事已高，可能还有几年时间可以用来思考这个问题，心里动了研究大西南山区经济的念头。

从云南回京不久，就接到四川省委、省政府的邀请，约我入川考察，正中下怀。我阅读了杨超同志《关于在我国西部将攀西及滇西北金沙江沿线列为资源经济开发区的建议》以及中国农学会与四川省科协的《关于加快攀西地区农业综合开发的建议》后，我决定以攀西地区作为我研究开发大西南这个课题的突破口。所谓“攀西地区”，就是攀枝花市加凉山彝族自治州。

6月2日深夜，我们从北京乘火车出发，4日清晨到达成都，当天傍晚即换车南去西昌。从5日至13日，我们乘坐汽车盘旋在横断山脉深处，从西昌到盐源县，又到云南省宁蒗县，还抽空去游了泸沽湖，在摩梭人家吃了午饭。后来转到攀枝花市，再折

回西昌，去昭觉县。我这八十老翁，在海拔 2000 米以上的崇山峻岭中连续 9 天跑了 1300 多公里，竟然还能在彝胞家里踏歌起舞，欢笑畅叙，确有点出乎自己预料的。看来此生还可以为开发大西南多做点事情。

关于简称“一点、一线、一面”的开发设想

大西南自有大西南的优势。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又形成了自己的特点。这里的开发与其他地区的开发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还是那句老话，既不能割断历史，也不能超越现实，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制订出切合凉山、四川及至大西南实际的发展战略和对策。

就四川全省来说，可分为盆地、丘陵和高寒等三个地带。平原地区居住的主要是汉人，丘陵地区是多民族杂居之处，而高山峡谷地带则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它们的社会经济发展不在同一水平上，有的相距甚远，不可能采取同一规划、同一政策，比如，我们这次考察凉山，给人印象最深的是这里的汉、彝干部和少数民族同胞要求摆脱贫困、走上富裕之路的愿望就比其他地区更为强烈，而且上上下下都寄希望于攀西地区的开发。

他们所说的攀西地区是很明确的，就是指凉山彝族自治州与攀枝花市合作建立的开发区。“西”指的是西昌市，因为它是凉山彝族自治州的首府。我以为，攀西地区的开发实际已涉及整个西南开发的中心问题。后来又与攀枝花市的同志交换了意见，返京后再与去年曾去那里视察的钱伟长同志商量之后，对于开发大西南的思路似乎越来越清晰，内涵越来越丰富，并逐步形成了这样一个设想：由凉山彝族自治州与攀枝花市合作建立攀西开发区。以这个开发区为中心，重建由四川成都经攀西及云南保山从

德宏出境，西通缅、印、孟的南方丝绸之路，为大西南的工业化、现代化奠定基础的设想。我把它简称为“一点、一线、一面”的设想。

设想中的这“一点”，就是拟议中的攀西开发区，总面积约 6.75 万平方公里，人口 450 万。这里地处横断山脉东缘，是青藏高原向云贵高原和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是金沙江和雅砻江的金三角。由于独特的地质演化，形成高山深谷相间的特殊地貌。矿产水能资源得天独厚，居全国之首，为建设以钢铁钒钛为主的现代工业基地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这里地处南亚热带，热量丰富，光照充足。科学家说这里有南方的温度、北方的日照；老百姓说这里“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都认为这里是发展立体农业的理想地带。加之，土地辽阔，宜垦荒地又多，农业资源的潜力也是全国少见的。这个地区的工农业资源经过多年的勘探和调查，各方面都认为攀西地区是我们现代化开发所需自然资源的“聚宝盆”。所以我的“五月渡泸”，不是“深入不毛”，而是初探宝地。

不过，这里确实偏僻荒凉，人烟稀少。但是，早在公元前 4 世纪之前却已是通往亚、欧各地的必经之路了。后经历代不断经营，沿途设栈道、架索桥，到唐、宋时开辟成了有名的南方丝绸之路。尽管如此，绵延 2000 多年之后，直到本世纪 60 年代中叶，在大规模三线建设中，这个地区丰富的资源才受到重视。在历来只有几十户人家居住的金沙江和雅砻江汇合的渡口建成了西南钢铁基地。这个荒山野渡顷刻成了人口稠密的新兴工业城市。为这个新兴城市服务的成昆铁路 1970 年全线通车。1987 年渡口市易名为攀枝花市。从此，声名鹊起，誉满全国。这个平地起家的攀枝花市经过 26 年的经营，现在已是拥有 40 多万城市人口、年产铁 270 万吨、钢 180 万吨的西南工业原材料的重要基地了。

我之所以把攀枝花市和凉山州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就是因

为攀枝花市的前身渡口，原本为传统所称的大小凉山中小凉山的一部分，只有首先承认这个地理和历史形成的民族区域的一体性，才能理解后边我还要详细说明的关于这“一点”的具体涵义。

重振南方丝绸之路 辐射内外两圈

关于这“一点”的设想，我还有另一层意思，那就是想把攀西地区看成今后开发大西南能够发生起动作用的经济心脏。接着我要说明的就是设想中的“一线”。这“一线”指的是以攀西开发区为中枢的一条我国大西南通往缅甸、印度、孟加拉各国的交通动脉，也就是指历史上的“南方丝绸之路”。

据历史学家的意见，这条南方丝绸之路是我国通往亚、欧各国最早的国际通道，形成的时间可以远溯至秦、汉之前（即公元前4世纪之前）。这条路线北起长安，越秦岭，到成都，然后大体上沿今天的成昆铁路，经西昌、攀枝花，入云南境内，穿过丽江和大理之间的山路，到保山、腾冲，从德宏出国境，入缅甸、转印度和孟加拉国。古时称成都到大理这一段为灵关道；称大理到德宏出境这一段为永昌道。显然，在海运开通之前，这是我国西南的一条重要的国际交通要道。它绕过了西藏高原，通过横断山脉南部出国境。汉代张骞出使大夏（今阿富汗）时见到的“蜀布”和“邛竹杖”，就是从中国西南通过这条商路经印度运到阿富汗的。在这条路上，历来就有成群结队的马帮往来不绝，在抗战时期这是我国通向国外的唯一通道。

看来这条国际交通线在今后开展陆上的国际贸易方面还会起重要的作用。这条商路到达的缅甸、印度和孟加拉地区居住着上亿人口，而且现代工业都不很发达，正是我国轻工业品的一个巨

大的潜在市场。现在，这条路上的出口处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
的芒市，边贸市场已经出现相当繁荣的景象。这条商路开通后，
必然会促使攀西开发区发展轻工业，落实“轻重结合”的方针。

重建南方丝绸之路实际上已经有了现实的基础。成昆铁路和
滇缅公路都已畅通。两路之间也有了省级公路相连。当然如果进
一步为发展沿线的工业与服务行业，现有的交通条件还应加以提
高和改修。有人提出成昆铁路电气化和修筑攀枝花通往大理、下
关的一级公路，以便与滇缅公路相接。这些都是今后十年规划值
得考虑的工程项目。远期打算，在抗战时期已提出过的“滇缅
铁路”也应早日列入国家的建设计划。

有了攀西开发区做心脏，南方丝绸之路做大动脉，大西南工
业化和现代化建设就能由点及面地连成一片。这就是我们设想中
的“一面”。经济的辐射作用将如波浪式地由中心向四周扩散开
来。大西南这个“面”基本上包括川、滇、黔三省，即云贵高
原和四川盆地。

按扩散的层次说，可分内外两圈，内圈包括杨超同志在他的
建议里提到的滇西北金沙江沿岸的迪庆、丽江、怒江等民族自治
州和永仁、元谋两县，还可以加上中国农学会建议中提出的攀西
- 六盘水金三角，东到贵州水城。为了便利攀西及其内圈所产丰
富的工业原材料向我国东部工业地区的运输，还应充分利用长江
水道，加强其水运能力。同时还可以将金沙江和长江汇合处的宜
宾建成水陆转运码头，修筑攀枝花和宜宾之间的铁路，或修筑成
昆铁路支线沿岷江通宜宾。

攀西开发区内圈之外的云贵高原和四川盆地是扩散的外圈。
在这个外圈范围里，现在已有重庆、贵州和昆明 3 个工业城市。
他们实际上已成为一定范围内的中心城市，正在分别独立发展之
中，将来完全可以和攀西这个中心联系起来成为一个大西南的工
业体系。

不难看出这“一点、一线、一面”的初步设想，是一个比较全面和长期的设想，只能在实践中由点到线、由线到面，循序渐进，逐步实施。在这里提出这个宏观的粗线条设想是因为我认为有了这个设想为前景，对建立攀西开发区的重要性可以看得更清楚些。

以攀西地区为中心的发展对策

现在，就让我们回过头来再仔细分析研究攀西这“一点”的现状和发展对策。

从这次考察的情况来看。这个地区由于过去发展不平衡，社会经济结构都存在一些十分突出的问题：一是州市分隔，未能配合；二是工农失调，农业滞后，而且没有注意到配套的贸易工作；三是重工业特重，轻工业畸轻；四是民族之间生产和生活水平差距较大。妥善解决这些问题是这个地区进一步发展的必要前提。针对这些失调，我们认为可以提出“四个结合”为对策，即州市结合、工农贸结合、轻重结合和各民族结合。

应该充分肯定，过去集中力量建立攀枝花钢铁基地取得了显著成绩。问题在于这个工业基地是从原本经济不发达的少数民族地区的中心勃兴起来的。从四面八方集中到这条山沟狭谷里来从事工业生产的大量居民，一旦和周围农业地区隔绝，他们生活上的需要几乎全部得依靠铁路从外地接济，吃的是舟山的鱼、烟台的苹果，仅粮食一项 25 年累计调进 149 万吨。而凉山地区农业资源的潜力又如此之大，如果能及时加以开发，使它负担起这个工业城市人民农副产品的需求，应该是绰绰有余的。目前工农失调的困境，从这种意义上看，就是由于过去没有把攀枝花市和凉山彝族自治州结合起来作为一个经济地区进行规划的结果。

现在我们提出“州市结合”，并不仅仅是从解决工业中心居民的生活需要出发，更重要的是为整个地区工业发展前途着想。从长远来看，这个地区的工业建设不可能限于现有市区。现在已在审议中的一些重点工程，如大桥水库和二滩水电站都在市区之外。实际上“州市结合”不仅为工农贸结合、轻重贸结合提供了条件，而且也为民族结合打下了基础。

毫无疑义，攀西开发区目前的主要任务首先是为全国工业化、现代化提供原材料，特别是钢铁钒钛等矿产和原材料。但是，我还想说的是这里特别丰富的水电能源和潜力很大的立体农业，完全有条件建设成为我国西南部的轻工业基地，为本地区以及西南各省提供生活用品，并为扩大向东南亚各国出口做准备。

在当前调整轻重工业比例的过程中，在州市结合的前提下，那些集中在市区里的大中型重工业企业的技术实力，正好可以有组织地扩散到四周广大的乡镇去发展中小型轻工业。这样做，将使大小凉山的各族同胞在较短时间内摆脱贫穷落后，千家万户尽快富裕起来。从各地的经验和历史的教训来看，那种走集中发展重工业的路子是做不到这点的。

像大小凉山这样自然资源丰富的少数民族地区迟早是要开发的。在开发过程中一定要时刻注意引导少数民族同胞充分参与，不能只见资源不见人。也就是说，开发少数民族地区的资源必须和发展聚居在这个地区的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结合起来。

我之所以一再强调开发攀西地区要“民族结合”的原因也是从这个地区的现状出发的。攀枝花市自开始建立以来，城市居民一直以汉族为主。现在全市包括划入市境内的两个县的90万人口中，少数民族只有11万。而它毗邻的凉山各州县，在集镇以外的山区居住的几乎全是彝族同胞，共有154万人，是全国彝族最大的聚居区。在当地彝族同胞的心目中，包括渡口在内的这个地区是他们世代居住的地方。现在他们看到这块古老的土

地上出现了现代化的工业城市自然很兴奋，同时也巴望着能够多方面地参与到现代化建设的行列之中，让这个新兴城市在多方面带动本地区、本民族的发展。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重点工业必须照顾当地少数民族的利益，并通过工业的兴起培养大批少数民族工人，原是我们国家的民族政策。最近党中央一再提出先进帮后进、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方针，十分切合这里的实际。我深信在开发攀西的过程中，各项具体的民族政策将得到落实，并在民族结合方面做出令人信服的榜样，进一步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凉山发展的先决条件和启动力量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攀西地区的开发，尤其是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发展，目前还面临着种种困难，需要创造先决条件和启动力量。

凉山这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现在住着 100 多万彝族同胞。他们曾在红军北上时为各族人民的革命事业立过功。解放后在政治上已翻了身。但是经济上的落后面貌至今还没有完全改变。凉山州所属 17 个县中有 9 个县是贫困县，近百万人尚未越过温饱线。与全国各地横向比较差距越拉越大。1990 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 336 元，比全国 630 元低了一半。我们走访大小凉山的一些村寨，只有少数人家先富了起来，即使较富裕的坝子或村落也不过刚刚开始累木为墙，营造新屋，人畜分居。但室内有床铺的还不多，一般是家徒四壁，一个火塘，生活还是比较困苦的。有不少人家粮食不够全年吃用，还得靠卖猪卖羊的钱买粮。

像这样起点低的民族地区要发展起来，没有国家的资助是很难起步的。解放以来，各级人民政府对民族地区的投入是相当多的。这对各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的推动也是相当大的。但是四川少

数民族地区与中央直接领导的其他民族自治地方又有不同之处。我们在凉山一些县里了解到，他们的“吃饭财政”大部分依赖省里补贴，而现在省级财政并不富裕，再伸手向上要钱搞建设项目越来越难，多半是纸上谈兵。依我看，办法只有在攀西开发区的大账里列上凉山开发启动基金，专项专用，滚动发展。其实凉山当前发展农、牧业所需的初步投资，算下来还不到攀枝花大企业投资的2% - 3%。这么一点投资如果使用得当，凉山的农、副、牧业很快就可能上一个台阶。有了充足的农、副、牧业产品，不仅可以就近供给攀枝花市区生活所需，而且发展州县地方轻工业和乡镇企业也有了原料。全国许多地方这几年的实践经验都说明，这是提高少数民族农、牧民生活，增加地方财政的有效路子。

事实上，这些年凉山的农、牧业还是有较大发展的，无论是科技兴农，还是办乡镇企业都摸出了一些门道，并有成功的试点。这次考察虽说坐汽车跑路花了不少时间，但沿途所见所闻收获倒不少。一路上我们经常能见到一条条铺在玉米或马铃薯地里的塑料薄膜在阳光下熠熠闪光，为山川添色不少。县里干部告诉我，开始老百姓不相信盖一层薄膜能增产，后来做出样子，粮食增产一倍，大家就传开了。现在已争着买塑料薄膜。这个事实充分证明，科学是能进彝寨的，彝胞同样能接受科学种田。当然，这里有个条件就是要有人把先进技术送进去，做出示范。

改革开放已经给凉山带进了许多新鲜东西。广泛种植经济作物，发展商品生产就是发展经济的重要突破口。当地干部自豪地对我说：这里的烤烟色泽好、纯度高、干性好，可与云贵烟媲美。这里一年可养四季蚕，生丝质量不比您的家乡江苏差。这里的“天然温室”可生产早市蔬菜，在冬春蔬菜紧缺时提前上市；现在就已销往北方城市，并出口香港、日本、苏联。可见凉山立体农业的潜力有多大，真是得天独厚！但是到现在为止，这些还

只是有待开发的潜力。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帮助彝族同胞早日把这潜力开发出来，成为国家和人民的财富。再举个例子来说，当我们在高山或半山地区公路上行进时，在车里还能见到一群群羊只在山坡上吃草撒欢。据州里的同志介绍，畜牧业在彝族地区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凉山有着丰美的牧场。从 50 年代这里就注意绵羊品种改良和建设草场的工作，进展较快的是最近十几年。州、县因此办起了皮革制品厂，生产的皮夹克等式样和质量还不错。但成本下不来，做了赔本生意，而且农、牧民得不到多少实惠。听了这话，我们一行中的一位蒙古族同胞当场就传递了一条信息：内蒙古的牧民培养长绒的山羊，山羊绒是国际上的抢手货。凉山能否从内蒙古引进这种山羊，如果可能的活，凉山的牧民不一样能增加不少收入么？我也告诉他们，江、浙一带采用先进工艺，一张牛皮现在剥到四五层，手感好，而且可以降低成本，使皮革厂转亏为盈。这些例子都说明通过横向联系，引进新品种、新技术，各项事业都有发展前途。

同时，我也感到像这样一个偏僻的山地，信息和技术是何等的重要。这里的乡镇企业办不好，不就是信息闭塞、技术落后和缺乏市场等原因造成的吗？由此我觉得，凉山的各级政府一定要把做好服务工作放在重要位置上。在整个攀西开发的过程中，都要十分注意为农、牧民发展商品生产和兴办乡镇企业做好产前、产中、产后的服务。凉山各级政府的这个职能显得比内地更重要。这里山高路远，居住分散，集体经济基础很脆弱，农、牧民商品意识又淡薄。有个县根据自己的条件搞起了庭院经济，农民在房前屋后种了苹果，收成相当好，却运不出去，烂在山里家中。县里很担心以后农民还种不种水果，庭院经济能否搞下去。

事情很清楚，流通不畅，必然影响生产。一路上，我们听不到铃响，也见不到马帮，看到的是彝胞人背车驮，少数自行车和小马车，步履维艰地上山下坡。在山大沟深的条件下，用这样的

运输工具，让一家一户出来搞流通怎能搞得通呢！看来，只有政府发挥职能作用，帮助农民重新建立民间运输组织，包括自愿结合的马帮和运输合作社等等。同时，还应采取民办公助，多方集资的办法，修建通往村镇的公路，甚至现在可着手与科研单位合作研制适合山路的小型简便的机动车辆，使农、牧民买得起，用得上。如果花几年或者十几年时间，改善运输条件，把流通搞起来，一头能接上攀西地区内外圈的市场，一头接着千家万户和工厂企业，以后有些事情就好办多了，攀西地区的开发就有了较好的准备。

我们讲的这篇大道理，凉山的各级干部都点头称是，但是事实上心里都明白，这些事办起来确实有点力不从心。必须承认封闭千年的偏僻山区，要一步跨入商品经济是做不到的。如果要赶紧走上这条路，必须有人去帮助和合作。这些人就在附近的攀枝花市。州市结合了，凉山就有了靠山。所以我对凉山的朋友们说，你们必须牢牢地攀住这枝花，开放才有发展之路。

总之，大西南的开发有赖于攀西地区这个中心的启动。在国家的支持和帮助下，加上千家万户投入商品生产，少数民族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活动中受到锻炼，得到提高，才有可能在真正意义上参与大西南的工业化、现代化建设。

写到这里我应该停笔了，开发大西南又是一篇大文章，不是一两篇短文可以说尽的。好在我希望还有机会再去实地学习。只要我还能写作，我是会继续向读者汇报的。

1991年6月

关于内蒙古经济发展的一些意见

怎样开发内蒙古是我深深关切的问题。我已先后在内蒙古地区，从呼伦贝尔到阿拉善，访问过八次，可以说我和内蒙古人民是老朋友了。1985年，我曾在包头进行了视察，并且写了《包头篇》。去年又去包头，目的是想了解在这5年间，包头有些什么新的发展。

我是汉族，但很早就和我国各地的少数民族接触、交朋友，对他们有着深厚的感情。我亲自看到解放以来我国各民族间出现了民族团结和民族平等的新气象，非常兴奋。但是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和富裕还是有待于我们努力实现的目标。以当前的现实来说，民族间经济水平上的差距还是相当大，而且由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速度较慢，发展起点又低。一般说是落在后面了，甚至还有不少人生活在温饱线之下，贫困状态尚未摆脱。怎样帮助各少数民族早一些追赶上先进民族是我经常思考的问题。

要帮助少数民族加快发展，首先是要搞清楚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情况。摸清情况必须进行调查研究。针对实际的处境，利用本民族和本地区的优势，选择突破口，做出有实效的榜样，来启发群众的积极性，循序以进，由点及面、由小到大地把能使千家万户富起来的办法推广开来，取得成效。我在内蒙古的八次访问就是为了这个目的。由于我年纪大了，行动不便，访问的时间有限，调查得不够深入，所提出的建议不一定切合实际，能收到实效。但是我的用心内蒙古的朋友们是理解的，也是支持的。我非常感激。

去年我到包头，重点想了解这个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业化问

题。内蒙古各地的情况并不一样，有“东林、西铁、南农，北牧”的说法。包头属于“西铁”那一部分，就是说这地区矿产丰富，50年代就已建立了我国的一个重要工业基地。有包钢等一些大企业，其中有不少是早年在苏联帮助下搞起来的。从时间上看，有些已有40多年的历史了。这是内蒙古工业化的起点，也是当地各族人民搞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意义十分重大。

我在1985年首次到包头调查时，看到在这个自古以来本是广漠牧场的地方发展了一个人口密集的新兴工业城市，心情很激动。很清楚，如果不是各族人民共同努力，没有强大的国家有计划地统筹，这个新兴城市是不可能发展的。我国的工业资源绝大多数是在我国西部的少数民族地区，要开发这些资源，只有走包头这样的路子：由国家投资，由国家计划，并调集各地区各民族的技术力量，在资源丰富的地区，就近建立起现代化的工业城市。

同时，我也看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在少数民族地区走这条路子，必须注意到民族共同繁荣这个社会主义原则。也就是说不仅是开发资源为国家创造财富，而且要通过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现代化工业，使当地的少数民族发展起来，不仅要使这地方的少数民族在经济上富裕起来，而且在文化上也要提高起来。

怎样才能使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的国营大企业和新兴城市成为推动少数民族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动力，是一个我们必须认真研究的问题。如果忽视了这个问题，就会使已经建立起来的大企业和新兴城市成为被经济不发达地区所包围的孤岛。尽管这孤岛上人口稠密，10多万人甚至几十万人，但是由于脱离了周围地区的支持和调剂，不免发生我称之为人文区位失调的现象。

我在《包头篇》里提出了这个见解。说来也很简单，以包钢为例。这个企业是50年代建立的，为了这个企业的运转和发展，从各地调集了一定的人员与这个企业的设备相配套，使之能

按国家的要求和计划生产定量的产品。在 80 年代以前的 30 年里，这个企业的设备并没有不断更新，计划的产量也不可能不断增加，但是当初集中在这个企业里的人却按人口增长规律不断多起来了。人丁兴旺对企业来说，如果生产力不能随着扩大，绝非好事。这个企业背上了一个放不下的包袱，“要包钢还要包人”。这个企业既要养活工人和他们的家属，还要照顾他们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承担一系列社会服务职能。这些事都要花钱，钱只能从企业的生产过程中去挖掘。结果是增加了生产成本，企业要盈利就难了。在国家承担得起这些企业的亏损时，这些企业还能维持，一旦要求它们自负盈亏，这些企业就难办了。这是一个人文区位失调的例子。孤岛上办企业迟早会面临这个局面。归根结底是人口和生产力的失调。

怎么办呢？只有压缩人口和扩大生产力两法。压缩人口，一是计划生育，但远水不救近火；二是迁移，或说疏散，如果找不到新的能开发的地区，迁移疏散还是难于实行。所以主要还得靠扩大生产。本企业能扩大生产当然好，但不容易跟得上人口增长。最切实可行的办法是这些企业主动地打破孤立状态，和周围地区相结合，扩散科技能量，发展多种生产行道。说到这里，我的话就和上面提到的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企业必须与当地少数民族相结合的点子连上了。

我看到包钢已经和附近的乡镇有了联系，开了若干小铁矿，取得了一些原料，炼成计划外的产品，增加了收入，帮助包钢转亏为盈，增加了职工的社会福利。我想这是一条路子，是值得开拓的。现在包钢还有上万的待业青年，看来还得扩大城乡结合，多办些集体企业，为这些待业青年找出路。

国营大中型企业帮助地方上多办些联营的乡镇企业，双方都有好处。举个例子来说。包钢扩大厂房，占用了郊区南排村的地。原来住在这些地上的农民，尽管得到赔偿，但是经常到厂里

去拿东西，找麻烦。后来包钢帮这个村办了一个小轧钢厂，并且供给他们一些下脚料做原料。这个小厂每年产值达 90 万元，村里有了一笔可靠的收入，农民也就安定了。现在包钢和南排村的关系搞得很好。这就是城乡结合、国营和集体结合的好例子，值得注意和推广。

我在甘肃访问时，看到白银市和金川市的大企业都和地方结合搞了开发区，区里有几十个集体的小企业。一年来，这些开发区的总产值都超过了大企业的产值。我希望包头的一些大中型企业派人去甘肃参观一下，如果有条件，也不妨学着办些和地方结合的小企业。这样，包头也就不再是个草原上的孤岛了。它对自治区各族人民的生活都会起提高和现代化的作用。

还有一点建议，就是像内蒙古这样的地方，最好能和工商业比较发达的沿海地区多发生一些横向联系，争取那些地方的企业到内蒙古来合办些小型企业，给他们一些优惠条件，把资金和技术引进来，让他们有利可图，合作也就容易办到了。过去号召发达地区支援欠发达地区，效果并不很显著。原因是太强调“无私援助”。我看还是着重于“互惠互利”为好些。要沿海各省的人到内蒙古来办企业，必须要使他们有利可图。我希望包头在这方面摸出些经验来，起带头作用，带动内蒙古其他地方多多向外开放，引进资金和技术，大大地开发边区的资源。

今天就写到这里，其他的问题今后有机会再谈。我上面所说的意见只供同志们参考，不对的地方请多指正。

1991 年 8 月

武 陵 行

为了继续探讨西南多民族山区经济发展问题，我于 1991 年 6 月凉山之行之后，又于 10 月访问了长江三峡之南的武陵山区。武陵山区地跨湘、鄂、川、黔四省，连成一片，包括湖南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和大庸市，湖北省的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四川省的黔江地区和贵州省的铜仁地区，共计面积约 8 万平方公里，1300 多万人口，其中少数民族占 53%，约 710 万人。

我这次武陵之行只在这山区的腹部里转了一圈。从湘西凤凰、吉首，进川东的秀山、酉阳、黔江，入鄂西的咸丰、恩施、来凤，又转到湘西的龙山、永顺，然后从大庸市出山。一共走了 21 天、1100 多公里。一般认为也属于武陵山区的贵州铜仁地区，我没有到，只在由湘入川时在铜仁境内穿过几十里公路。因此我下面所讲的除了说明是“全山区”的情况外，只限于所访问过的三省二州一地一市。

地貌和民族

武陵山区是云贵高原的延伸地带，从海拔千米以上的高原边缘向东北倾斜，约 250 公里下降到海拔几十米的江汉平原，形成的一片处于乌江和沅江之间的褶皱断裂的二高山区。境内山势巍峨，危岩突起。有山顶略平，四周悬崖的高地，俗称山盖；有群山环抱，山坡梯田层层，山间地势较开阔的小型盆地，除了川东的秀山和湖南的大庸外都难有称平坝之处。在公路两旁见到的多

是夹在众峰之间溪流弯曲的沟壑和槽地。

这个山区的风光正如晋人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一文中的描述，确实是奇峰狭谷，林壑幽美。近年来开辟成国家级旅游点的大庸市张家界就是个典型景观。但在铁路公路没有修通之前，这里的交通极不便利。水溪危道，曲折陡峭，置身其中不能不感到山穷水尽，如入迷津。难怪当时的山区居民与世隔绝，“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就是这种地貌使早期先后进入山区定居的各族人民，在千百年中积淀在各平坝、狭谷和高山上，形成一个个封闭性的大小社区。武陵山区在接纳了多次的人口波浪，才成了个多民族地区。

武陵山区形成这样一个多民族地区的过程，还有待后人去发掘追溯。从现在的格局来看，人数最多的是汉族，其次是土家族和苗族，人数较少的有侗族、仡佬族和白族。此外在城镇上还有一些散居的其他民族成分。

以我们所访问的二州一地一市来说，人口总数约 1000 万，其中少数民族约 463 万人，占总人口的 46%，略少于汉族（比整个山区的百分比略低）。如果仅限于湘西自治州，则汉族人口少于少数民族，汉族占 44%。

在我们的访问区里，少数民族中土家族共 370 万人。1990 年普查土家族共 570 万人。这个地区就占总数的 65%，可以说是土家族的主要聚居区。土家族多数聚居在川东南、鄂西和湘西北部和大庸市，即我们访问区的北部，主要分布在酉水和清江流域，尤其以永顺、龙山、秀山、酉阳等县最为集中。

苗族在我们访问区里共 138 万人，占全国苗族总人口 739 万人中的 18%。从全国来说，是在苗族分布地区的东部边缘，主要在湘西自治州的南部，酉水以南的花垣、凤凰、吉首、保靖、古文等县。苗族的主要聚居区不在武陵山区。

至于侗族和仡佬族主要是在贵州省境内，我们没有去访问，

所以暂略。

总的说来，武陵山这个多民族地区里，汉族的分布在平面上南北较匀，即四处都有，但在立体上，多在平坝和交通线上，少数已深入狭谷和高山。土家族则北多于南，苗族则南多于北，是个小聚居、大杂居、交错穿插的格局。

说一点历史

武陵山区的历史，说来话长，我在这里只能长话短说。在这个山区东部湖北长阳县发现的旧石器中期人类化石和湘西泸溪、龙山、大庸等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都说明远古时代这里已有人类居住，但这些远古的人类和现有的民族还挂不上钩。

现在居住在这山区的少数民族，进入山区的时间和先后也还没有定论。从史料记载来看，春秋战国时代在川东鄂西有个巴国，曾被楚所并，后又灭于秦。秦统一中原后在这地区建立了个黔中郡，纳入了它的统治范围。我们现在还不清楚巴国所占的地域是否早已包括武陵山区，在这山区里住的是不是巴人？据潘光旦先生考证，现在的土家族是巴人的后裔。这些巴人有可能是在巴国被灭亡后留在或移入武陵山区的那一部分。我们不能排斥在巴人入山之前这山区里还有其他居民。我提出这个可能性是出于这山区里现在还住有居处比较分散的侗族和仡佬族。侗族和仡佬族的来历和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不清楚。有人认为他们和古代“僚人”有关，曾经在汉代建立过“夜郎国”，地点在贵州西部，魏、晋时还大批由黔入川；巴人属彝语系统，而“僚人”可能属壮语系统。一自北上，一自南下，可能在某一时期相会在这个多山地区。谁先谁后，那就难说了。

另一个是有关苗族的问题。一般认为曾从江淮南移，在洞庭

湖区落过脚的苗族，在秦、汉之际曾住在被称作“五溪”的湖南西部武陵山区。他们很可能有一部分就在湘西留下，定居至今。主流则向西迁移，进入了云贵高原，甚至远到泰国北部山区。在湘西留下的那一部分，由南向北在山区里移动，和由北南下的土家族先人穿插杂居，形成现在武陵山区民族分布的基本格局。

至于汉族进入山区的经过，可以说得具体一些。首先可以说和上述这些少数民族相比，汉族进入较后。但也不能排斥如陶渊明所记下的秦、汉之前有从中原避乱入山的人。当然，这些人也不一定是中原去的汉族先民。秦、汉以后，武陵山区已建制立郡，必须有从中原派入的官吏和军队，还有利用水道入山的商人。这些人中大多可以说是汉人，但为数不易估计，他们大多聚居在交通要道、军事要地和易于屯垦的平坝。从此，山区内外民间的往来也增加了。据地方志记载，宋代因山区地广人稀曾“诱客户举室迁去”。这些客户“入境随俗”接受了当地民族的风俗。显然这时中原去的人尚属少数。这些情况也反映在这地区和中央的行政关系上。历经唐、宋两代中央王朝都采取“羁縻（音 jī mí，此词意笼络不使生异心）”政策，和地方各民族保持和睦亲善关系。到了 13 世纪后期，元代才实行“土司”制度，明确了地方和中央的隶属关系，但还是委任当地民族的人担任地方的官职，称“土司”，是一种间接统治的方式。当时汉人在山区想来还属少数。

土司制度在这地区实行了有 400 多年。据当地传说，在土司时期，有“蛮不出境，汉不入洞”的禁令，限制山区内外民间的交流。但是事实上每当中原动乱，改朝换代之际，就有大批汉人入山避祸。山区民族的居民也有出山的。据历史记载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 年）中央曾调动武陵的士兵几千人到东南沿海抗击倭寇，建立战功。清雍正时（1723 - 1735）废除土司制度，

民间流动不再受限制。大量汉人从江西、湖广迁入山区开荒。如《秀山县志》所说，1737年“设县以后，吴闽秦楚之民，悦其风土，咸来受廛，未能合族比居，故颇五方之俗”。这是说这些外来的汉人，穿插地和当地民族杂居，各自保留了不同的风俗。当地少数民族出山的也同样增加，参军入伍的很多。清道光六年（1826年）在讨伐新疆张格尔叛变中立功的将军杨芳就是秀山的土家族人，他带领的军队也称“土家兵”。后来在鸦片战争中坚守广州的也就是他。这些事迹表明，居住在武陵山区的各族人民之间的亲密关系是有久远的历史基础的。

还应当提到的是抗日战争时期，武汉和长沙沦陷后，湘、鄂两省的政治中心都退入武陵山区，同时还迁入了大批沦陷区的大学和中学。湘、鄂、川、黔边区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已经成为革命根据地，无数革命志士云集武陵山区。

这个山区在历史巨浪不断冲击下实际上早已不再是个偏僻的世外桃源了，已成为从云贵高原向江汉平原开放的通道。这条多民族接触交流的走廊，一方面由于特殊的地貌还保住了各时期积淀的居民和他们原来的民族特点，另一方面又由于人口流动和融合，成了不同时期入山定居移民的一个民族熔炉。他们长期在一个地区生活，在不同程度上已形成了一个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你我之间既有区别、又难分解的多民族共同体。具有这种特色的多民族社区，面临着怎样进一步团结一致向现代化社会发展的共同问题。这也正是我们这次入山想要探讨的课题。

贫困的生活和富饶的资源

这个“八山一水一分田”的武陵山区，地域虽广，人均耕地却不到1亩，而且大多是山坡上的梯田和旱土。除了少数平坦

的坝子和山沟里的水田亩产较高外，一般年产粮食不过几百斤，人均口粮只有 300 公斤上下。包括铜仁地区在内的武陵，全区工农业总产值在 90 年代初估计只有 170 亿元，人均产值 1300 元，人均纯收入 380 元。80 年代还要低，1983 年贫困线下的人口占总数 80%。这是国务院确定的重点扶贫地区，经过几年的努力，取得不少成绩，但至今还有 400 万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而且不少已经解决温饱的地区还常常出现返贫现象。

到现场去一看，贫穷的原因是不难明白的，那就是田少人多，广大土地不宜于种粮食。看到像在山坡上贴大字报般的耕地，立脚锄地都困难，听说每年都有失足跌伤的事件。在这种客观条件下，要求山区粮食自给是极难做到的。事实上，湘西一州即便风调雨顺，每年缺粮也要上 1 亿公斤，一逢灾荒那就缺得更多了。

这里发生了个两难的问题，一方面是在运输不便的山区必须重视粮食自给，而另一方面单靠粮食生产山区居民生活难望富裕。既要吃饱肚子，又要富裕起来，长远打算必须加强交通运输，依靠省内调剂解决山区粮食供应。目前来说则仍须通过提高单产确保粮食基本自给。但是为了山区的经济发展，我们的着眼点必须从单纯重视粮食生产的角度转变到充分利用山区资源的方向。实际上，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这里的干部和群众在观念上已发生了变化。他们告诉我：“过去坝子比山好，现在是山比坝子好。”我很赞赏这句意味深长的话。因为这说明了他们已跳出了粮食是唯一财富的圈子，认识到山地潜力比平原还要大，山区农民走出贫困，跨过温饱线，迈向小康，要“靠山”、“吃山”、“用山”、“养山”，过去开门见山是指“闭塞”，没有出路，而今天要打开山门，开门见财了。

这个“山”字，包括着山上、山下、山里的丰富资源。就山上而言，要走出种植水稻、玉米、红苕等粮食作物的小天地，

走进宜林宜牧、大搞多种经营的广阔山水之中。山区的特点之一就是可以立体开发。在不同高度的山地上可以种草、种树、种茶、种烟、种药材，所谓“山顶松杉戴帽，山中药材系腰，山下粮烟搭桥”。从整个武陵山区看，可以种植的品种繁多，数不胜数。用材林中的松、杉、柏、椿；经济林中驰名中外的传统产品桐油、茶油、坝漆；药材中俗称三木的黄柏、杜仲、厚朴，外加五倍子、党参、黄连、天麻、白芍；水果中产量最丰的要数柑橘，干果中以板栗最出众；二州一地都是各省里重要的山区特产基地。茶、烟都有历史悠久的名优品种，如自助烟、晒红烟、云贵型烤烟、毛尖茶等都因质地优良而大有发展前途。目前烤烟已成为农村经济支柱产业之一。蚕桑及草食牧业作为山区新兴产业前景广阔，这里的家猪大约因为有玉米和红苕喂养，个大如牛。长毛兔的兔毛产量就石柱一个县已占全国的 $1/8$ 。跑在草山草坡上能吃到优质牧草的山羊，必将后来居上。

说到山里的矿产资源，每州、每地都能列举出几十种。只说储量在全国名列前茅，在省内居首位的就有汞、锰、铝等矿石，其他非金属矿如煤、重晶石、大理石、陶土均有相当规模。武陵山区历史悠久，山水奇特。有众多的自然风光、人文景观、名胜古迹和浓郁的民族风土人情。构成了丰富的旅游资源。最著名的是前面已说过的大庸市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此外，我们在湘西永顺县参观土家族民族文物博物馆时，看到的不二门景区空间不大，却集自然美景、佛门意境、民族风情、温泉沐浴于一处，实令人叹为观止。那日正值重阳佳节，人家帮我登上 155 级台阶后，给博物馆留下了“攀登何嫌高，求真不二门”的题词。一路上还听说猛洞河景区集山、水、洞为一体，从老司城至猛洞河口近 50 公里的漂流，是国内独具特色的不可多得的体育旅游项目。那里还有五代十国后晋天福年间的“溪州铜柱”，是难得的古迹。不由得想到若能把民族历史文化的发掘弘扬与今日民族经

济发展结合，给旅游事业更深一层的意义，这在武陵地区是有得天独厚的条件的。

山区的地表起伏不平，深谷型河流形成巨大水位落差，水能资源格外丰富，蕴藏量可观。全山区估计可供开发的水电有 850 万千瓦，而且分布广泛，各县都可发展小水电，加上不少地方有煤，能源供应充沛。

除了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更为可贵的是山区有大量的人力资源。因为可种的田太少，山区的人口问题似乎比平原地区的包袱更重。据湘西统计全州劳动力近 100 万人，从事农业的占 94%，而农业剩余劳动力就有 40 万人。跳出小农业的圈子去开发大农业，并进而发展工业，把剩余劳动力利用起来，山区才能真正“见财”。

武陵山区穷就穷在劳动力没有充分利用，开始脱贫致富的最简单公式即劳动力与当地丰富资源相结合。咸丰县组织劳动力开垦可耕荒地，开辟新经济小区，在二仙岩 10 万亩荒地的综合开发计划中，仅用 135 天修通四级路面的公路 22 公里，拓荒 7000 余亩，接着种上烤烟等经济作物，当年县财政和农民都增加了收入。这是个值得效法的例子。

发展庭院经济培育内在活力

我们从湘西过川东进鄂西到大庸，在武陵山区里一路上看到基层干部和群众发展经济的劲头很大。对如何抓紧提高生产力的方针相当明确，而且这几年来也取得不少经验和不小成绩。但从整体来说是刚刚从贫困线上走出来，眼下还不能说已经站稳了，和沿海发达地区相比，差距还很大，而且有愈拉愈大的趋势。

对在经济发展上尚处在低级阶段的山区农村，存在着怎样启

动内部活力，就是怎样使它们自身有发展能力的问题。发展经济的起步不仅要有脱贫致富的迫切要求，而且还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做基础。长期处于贫困线上的农民，柜子里没有余粮，袋子里没有余钱，很难走上发展经济的道路。所以对像武陵山区这样的农民，目前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怎样切切实实地增加他们的收入，使他们具备自我积累的能力。这就是经济发展内部活力的启动问题。

实事求是地考虑，山区农村的发展看来还得从发展庭院经济起步，就是以家庭为基础，在抓紧粮食生产的同时，充分利用山区资源的优势。因地制宜地大搞多种经营，使各族农民不仅有饭吃，而且从副业里能取得越来越多的收入，具有省吃俭用优良传统的农民就可以有自身的积累，扩大生产。这条路子是为一般农民所乐于接受的，而且在武陵山区里我们已经看到了不少这样脱贫致富的具体例子。

在凤凰县拉务村我们访问了一家苗族农户。他们夫妻二人在山上种了一大片杉树，在坡地上种了 2500 株五倍子、730 株杜仲、100 株黄柏，又在平地上种了烟草，还养了母牛和猪，育了鱼苗。今年种养业收入超过万元。预计那 700 多株杜仲在 5 至 7 年后可以收入十几万元。

在来凤县，我的两位研究生到岩朝门村访问了一家土家族农户。这家 60 多岁的老妇人和她的儿媳两人种 5 亩多地，除稻谷、玉米、土豆、红薯外，还种有油茶、柑橘、杜仲、桑树等，还养了 6 张蚕，4 头猪。又在桑田里套种土豆，用养蚕的废料和红薯养猪。稻谷供自家食用，全年收入 1 万多元。我们还在酉阳县永墙村访问了土家族李姓农民。他种了玉米、土豆、红薯、烟草。用玉米、红薯喂养了 30 头猪，同时配套办了一家面粉饲料加工厂，自家方便也为大家服务，全年收入约 2 万元。

以上所说的都是一家一户多种经营的例子。武陵山区已有进

一步发展以一业为主的专业户。秀山县有一个老农从 42 只种鹅起家，现已发展到 193 只，明年可出卖雏鹅 3 万只。鹅以食草为主，他的 405 亩地都种了草，公粮用鹅抵交，成了种鹅定点专业的万元户。

这些农户不论是一业为主还是多种经营都是以一家一户为经营单位的，所以我们称之为“庭院经济”。这里所说的庭院经济并不是仅指一家一户在住宅周围或自留地四边所经营的生产活动，而包括了农民承包的荒山和林地。只要有了长期承包和鼓励开发的政策，家家户户就有可能在山上田里大显身手，成为激发他们内部活力的基础。

外助内应 扶贫致富

庭院经济可以使千家万户增加收入，激发农村发展内在活力。家家户户搞副业，产品多了怎么办？我们经过宣恩县当阳坪村时，看到沿公路户户都在晒粉丝。加工粉丝是这地方的一项传统副业，收入不少，但是却因为销路不畅，不能大量生产。村里原想办个粉丝厂，也不敢上马。农家副业产品必须有个市场才能变成值钱的商品。市场打不开，庭院经济还是兴旺不起来的。

我们在来凤县时去桂花树村访问农民胡仁孝，他曾经当过推销员，在外地学会了加工皮蛋的技术。这几年他一家六口人，除了种 4 亩稻田外，就在村里收购鸭蛋加工成皮蛋出售。去年卖出 10 多万个皮蛋，净赚 1 万多元。我问他怎样卖出去的呢？他说除了在街上摆摊子外，主要是因为外地有熟人，介绍当地的厂家派车来运，运一趟就要上万个皮蛋。他又说现在外地工厂时兴在过节时给职工低价出售副食品，皮蛋很受欢迎。除了湖南本省外，西安、哈尔滨都有人来运。明年他准备为村里办个皮蛋加工

厂，把全乡 700 多农户的鸭蛋都加工成皮蛋出卖，预计每户可以增加收入 150 元。当我问他上百万个皮蛋有没有把握都销出去时，他表示就为了这个问题，一时还不敢上马。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这地方的农民已经在打算办乡镇企业了。他们也已经明白“无工不富”的路子。但是尽管有此愿望，却还缺少必要的条件。胡仁孝已经学会了加工皮蛋的技术，也激发了当地农民养鸭的积极性，内在活力是有了，缺的是个可靠的市场。这个市场里靠他本人在外地的熟人是撑不起来的。这里如果有个外力来帮助一下，不就比较容易把乡镇企业办起来了么？

需要外力的帮助才比较容易发展起来，也许正是内地欠发达地区的特点。这是因为在这种长期以来处于小农自给经济的地区，事实上缺乏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营大生产的本领，而且没有可靠的市场。这种地区的农民要一步跨入工业时代难免困难重重。要加速这种过渡，不能没有外力的帮助。但是，没有内在的活力，要帮也帮不上；不过，有了活力，没有外助也难于启动起来。这就是国家提出扶贫这项工作的原因。

武陵地区是我国重点的扶贫开发地区。鄂西自治州民委总结民族地区扶贫工作，提出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治贫先治愚”。愚指的不是这里的人智力低，而是缺乏科学种田和发展多种经营的必要知识。治愚的具体措施就是发展技术教育，用当地的话说，为一家一户培养一个“明白人”。明白人就是指懂得新技术，能当脱贫致富的带头人。1989 年以来该州民族职业中学培训了一批农业技术人员。毕业生中已出现了像咸丰县的覃茂胜一样，能在他的指导下使本村农民中出现一批当地称作“科学致富户”的带头人。这种由政府的力量有计划地开展实用科技教育，造成大批“明白人”的方法，当然比上面所提到的胡仁孝那种靠个人机运在外地学到加工皮蛋技术的路子开阔得多了。

采取先办试点再进行推广也是外助的有效办法。来凤县在

10 年前以科协为中心，免费为农民培训种植杂交水稻的科技骨干，并依靠他们在各乡建立科普小组网络，使当地农民看得见，摸得着，争着仿效，使杂交水稻能在来凤县普遍推广，大大提高了水稻的亩产量，一般超过 1000 斤。该县用同样方法在水田乡推广蚕桑副业，已使这个从来没有见过蚕桑的地方成了有名的蚕桑乡。这个乡人均收入已从 1982 年的 130 元提高到了 1990 年的 510 元。

从科技入手帮助农民发展庭院经济是一条值得重视的经验。但是如果农民副业发展了不跟上去解决推销的问题，一家一户的庭院经济还是巩固不了的。这里使我们看到了个体经济的局限性。要进一步发展必须发挥集体的力量，而在公社已经解体的地区，又怎样能建立起集体的经济实体，组成统分结合的体制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看到了吉首民委兴办的一个桠柑开发服务公司使 4000 农家富起来的实例，值得一提。

吉首是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首府。该市人均有 8.5 亩山地，一般海拔在 300 米上下，气候温和，雨量充沛，适宜种柑栽橘，而且历史上就有这种习惯。但是过去不讲科技，不讲质量，摆摊零售，效益不大，农民对利用山地种柑的积极性不高。吉首市有个林木山村，原是个穷村，人均收入仅 67 元，口粮不到 200 公斤。后来村里办起了一个 125 亩的柑橘园，3 年挂果，6 年累计收入 50 多万元。这个榜样激起了全村农民的效仿，纷纷办起家庭小果园。1990 年人均收入达 720 元，口粮达 289 公斤，山村一派兴旺。这个村子的经济发展引起了吉首市政府的注意，决定由民委支持开办桠柑开发服务公司，拟出了万亩柑园的扶贫计划。现在已有三年，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这个公司定为独立核算，定额补贴，自负盈亏的地方企业，在该市 74 个村，4000 多农户，1.8 万多村民兴办万亩桠柑商品基地。在新植桠柑挂果之前，由市财政及民委支持和农行贷款共

投资 178 万元，公司利用这时间由技术人员深入农村培训 100 多名农民技术骨干，并建立 115 个示范村。1990 年底已有 550 多户农民的 1100 多亩开始受益。有的农户收入已达万元。这个公司是个统分结合的专业化产业集体。现在产品多了，已在修建能贮藏集运的中转库，拓宽流动渠道负责向州内外推销产品。它提示一个外助内应的扶贫模式，值得鼓励。

从温饱到小康

上面我着重讲在武陵山区怎样启动发展经济的内在活力，特别提到发展庭院经济的重要性。我认为对一个刚刚走出贫困线还没有站稳的多民族山区来说，应当首先着眼怎样使广大农村里家家户户每年能增加一定收入，激发他们脱贫致富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为进一步从温饱跨入小康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

看来走上从温饱到小康的道路，在农村里发展乡镇企业还是必要的。“无工不富”这句话在内地和山区也是适用的。我在这次访问中，已注意到这山区里各级干部对发展乡镇企业的积极性很高。我也参观了一些已经建成的市办、县办、乡办和村办的工厂，其中有些是很成功的，特别是各县的卷烟厂，设备比较先进，产品质量也好。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几乎有一半之上靠这些卷烟厂的利税。但是总的说来乡镇企业还是在起步阶段。

凭我的印象来说，当前的武陵山区和 1983 年苏北的面貌近似，工农业产值的比例还很接近，大多数地方是农大于工。所办的工厂也大多是集中在城郊区的地方国营企业。农村里的集体企业还少，在公路上行车，看见烟囱就知道到了县城。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最发达的首府吉首市来说，14 个乡镇中还有 7 个没有工业，192 个村中只有 4 个办了工厂。以全州来说还有 2062

个村没有集体企业，占全州总村数的 76%。

尽管如此，在过去的 10 年中，这山区里乡镇企业确是已经起步了。还是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例，1980 年乡镇企业只有 3 万多个，到 1990 年增加到 4.7 万个，收入也由 5700 万元增加到 4.4 亿元。全州乡镇企业总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比例 1990 年已上升到 28.7%，其中农村工业产值上升到 15.4%。这些数字说明武陵山区乡镇企业已经起步，但和国内较发达地区相比，差距还是很大的。

乡镇企业不能呼之即来。农村里要办一个加工工厂，即使农民有了积极性，地方上也有原料供应，还得解决内地山区农村一般不具备的，或还十分短缺的资金、技术、信息、运输、市场等条件。我在上面提到的几个庭院经济办得好的例子也由于缺乏上述的条件而办不成乡镇企业。要在这类地区发展乡镇企业，看来还得走我上边所说的外助内应的路子。当前国家提出的扶贫政策，实际上就是要解决对这些比较贫困地区怎样加强外助的问题。

扶贫工作可以有不同层次。在饥寒交迫、特别贫困的地区，采取对灾区一般的救济措施还是必要的，但当前这已是极个别的情况了，所以扶贫工作已经着重在扶助贫困地区的人民发展生产的措施。就是人们常说的“从输血转为造血”。在造血的措施中还有短线和长线的区别。短线是指对具体的生产项目予以资助。这里有许多行之有效的例子。上边所提到的吉首万亩橘园的计划就是其中之一。长线是指对一个不发达地区采取一系列的基础建设，为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创造必要条件。我想在结束本文之前，在长线考虑方面提出一些看法。

简单地说，贫困山区的发展，就是要抓住开发和开放四个字。开发就是充分利用山区的资源。山区之所以贫困和发展迟缓主要是闭塞和落后。开放是针对闭塞落后而说的，在物质上是发展交通运输，以加速产品流通，精神上是发展科技文化以加速知

识流通。

先说交通运输。我从凉山之行回来，深切感到诸葛亮的高明。传说“木牛流马”是他的发明，姑且不问木牛流马究竟是不是后来的那种手推独轮车和是不是诸葛亮发明的，他能抓住交通运输作为发展这被群山包围的四川盆地的要害，确是个极有见识的人。从闭塞的巴蜀，能六出祁山和中原较量，不能不看到群山中纵横栈道网络所起的作用。这条经验应当牢牢记住。开发、开放首在开路。

从这方面来看武陵山区，一方面要肯定这 10 年多来已跨出了一大步，启动了这地区的发展。自从修通了湘黔铁路和枝柳铁路，这个山区至少它的边缘已经进入了全国的铁路网。从吉首和大庸坐上火车就可以通往全国各地，甚至出国。这就基本上改变了武陵山区原来的封闭状态。但铁路建设对武陵山区还只能说是开了大门，大门之内的区内交通运输主要还是靠公路和乡道。

武陵山区内的公路比大小凉山好得多。我坐在旅行车里必要时还能打个盹，不像在凉山路上经常要在车内跳老年迪斯科。但是我走的都是县城之间的通道。听说县乡之间大多也有了公路，但村乡之间能通汽车的还不多。可说武陵山区已有了大动脉，微血管则还没有畅通，这反映了村乡级企业不发达的原因。

武陵山区交通运输的瓶口是在交通工具不足，公路的利用率不高。小型拖拉机的拖车上挤满老老小小一大堆，我一路上为他们提心吊胆。看来，我们还得学学诸葛亮，多多制造一些适用于山区各级道路的轻便机动车。

道路是便利人流物流的物质条件。但这只是经济活动的硬件，软件还是在贸易和市场。上面提到的皮蛋起家的胡仁孝，由于外面有熟人开汽车来购买他的产品才能成为万元户，但还是因为没有稳定的销售市场不敢把一村一品的想法落到实处。吉首万亩橘园到了大部分栽种的橘树挂果时，不能不计划建造中转库和

拓宽市场。市场有多大，生产力才能提到多高。

和农村乡镇企业还刚刚起步相应的是武陵山区农村的贸易活动，基本上还停留在传统的“日中为市”定期赶街的农贸市场的水平上。我们在旅途上经常被拥挤的街集所阻塞。到了所谓乡镇上，沿街又摆满了日开夜收的摊子。农民大多还只是在这里出售农副产品来换取必要的工业品。他们使用的主要是村乡间的小道。城市间的公路和铁路，对山区农民来说利用率还是不大的。

如果从武陵山区已有的交通网络来看，开拓市场的潜力还是很大的。现在还谈不上已经充分利用，我在咸丰县看到当地特产的乳猪，立刻就想到当前在香港和广州宴会上缺不了的名菜烤乳猪。咸丰的这种特产如果有个贸易网络为它服务，只需两天时间就可以由现有的公路加铁路送到广州和香港市场了。

我在吉首附近的河溪镇参观了一家镇办的再生橡胶厂。这个厂是1986年用50多万元资本兴办的以利用废旧黑白胶原料生产再生橡胶的工厂。他们收集废品的范围远及附近各省。经过再生产，产品又远销重庆和贵阳。现在年产能力已达3000吨，净值近90万元，被誉为垃圾里出了凤凰。这个厂除了技术外，依靠的就是现有的交通运输网。我在参观时曾想到，过去不穿鞋走山路的西南各省的少数民族男女现在都穿上胶鞋了。如果这里生产的再生胶加工成胶鞋，决不会销不出去。可是缺乏信息和技术，并没有利用起这个市场。

从乳猪和再生胶所提示的潜在市场正是武陵山区今后发展的广阔天地。武陵山区的位置正处在云贵高原和江汉平原之间，正好是东西交流的走廊，加上南通广州和香港的便利，这个区位优势的价值目前还无法预估。

及时抓好流通环节是目前促进武陵山区发展的关键。首先是加强发展城镇的商品集散中心，着重在建立以贸工为主的中等城市。吉首市今年夏季召开了有18个省、市、区参加的商品交易

会，商品成交额达 3.5 亿元。值得注意的是参加的地区除了武陵山区的四省外还有上海、南京、浙江、江西等单位，这说明东大门已经打开。看来下一步应当是敞开西大门和南大门了。而且眼睛还要看得远一点，不仅南边要看到香港，西边还要看到越南、缅甸等东南亚国家。从国内看到国外，根据市场的需要发展对路商品，信息是关键。建立武陵山区的集散中心应当早日提到日程上来。

不论发展乡镇企业或是加强流通渠道，都需要有技术和有商品头脑的人才。这是经济发展的软件。软件的培育比交通道路等硬件建设要困难得多。武陵地区从过去历史上讲是人才辈出的地方。清代就出过科举中试的文人大吏，民国时代还有过总理级的政府要员，革命时期英雄人物更是不胜枚举。但是当前所需发展工商业的人才却感到很紧张。据当地反映说，能兴办乡镇企业的技术和经营人才本地却“育不出，回不来，引不进，留不住”。事实上是当地学校里不培养当前急需的能动得了手、办得成事的企业骨干。中学毕业的高材生进了大城市的高等学校，学得了高级科技知识，很多不愿回乡；回乡的又许多不对路、不抵用。据鄂西自治州的统计，过去 13 年里从农村里出去的学生中仅有 6% 受到了农村实用技术教育。区内需要的技术人员从外地调进十分困难，进来了的也大多待不长。人才紧张看来是实情。从我看到的在农村里能带头搞庭院经济的所谓“明白人”，还都是当地按需要短期培训出来的。

针对这种形势，从长远来看，希望只能寄托在教育改革上。但是，为了近期需要还只能走外助内应的路子。那就是采取和先进地区的企业“接枝”的办法，使外地的技术力量为我所用。可采取以原料换技术的互惠方式，在内地兴建一批和外地联营的企业。跟外地企业接上了枝，本地的技术力量就容易培育了。如果省际联营的方式一时还不易做到，退求其次，可以请外地先进

企业有报酬地招收内地“学徒”，也就是为内地通过参与实习、代培技术力量。这也可以说是把培养农村里“明白人”的经验提高一步，有针对性地为乡镇企业培养技术和管理人员。这条路子也许比较容易见效。从解决发展农村的人才问题上看来，内地还得争取先进地区的支持。

总起来说，武陵山区要加速发展乡镇企业，从温饱走向小康，优势是在资源和劳动力，缺少的是使二者结合成为生产力的硬件和软件，即资金、技术、信息、流通和市场。为了加速发挥优势和克服困难，还得认真地走外助内应的路子。对武陵山区本身来说只有强调开放，改变过去闭塞的状态，大力开发丰富的人力和自然资源，以求得更快地发展，做到后来居上。

我在大庸登车返京时，想起了在凤凰城沈从文故居里写下的几句话：“旧雨写边城，风行几十春。湘西今比昔，可以慰故人。”让我以此语结束此行。

1991年12月21日

边区民族社会经济发展思考

我作为“边区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研究”的课题倡议者，首先应当说明一下提出这个课题的原委和想法。

我一向认为中国的社会问题中，最基本最严重的是人口问题。70年代中期，农村已明显感到人口的压力，引起了政府的注意，开始实行计划生育的政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实行了家庭承包生产责任制。但人口已经如此庞大，怎样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寻找出路，成了当时农村急迫需要解决的问题。

1982年，我对当时的人口问题提出了做“两个眼”的意见。即如果要搞活人口这盘棋，必须要做两个“眼”，一是发展小城镇，一是要开发边区。从此，在“六五”期间开展江苏小城镇研究的同时，提出了“边区开发”的研究。在此期间，我国东西部发展的不平衡问题，进一步引起了我的注意，加深了对这一问题研究的紧迫感。到1986年“边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研究”课题由我牵头列入了“七五”国家重点项目。

我是这个课题的学术指导，任务是“破题”和“开路”。我亲自到内蒙古、甘肃等省区的一些地方进行实地考察，提出具体的研究课题，讲清它的意义和进行调查研究的方法。然后由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负责人潘乃谷、马戎等同志负责组织具体调查工作，分别为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定题、定人、定点、定任务，规定他们必须进行实地调查，根据取得的第一手资料撰写论文。5年来他们完成了多项研究课题，现将他们所写的部分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汇集成这部学术专著，这本书不仅代表了他们努力的成果，而且还实现了我们培养年轻一代教学研究人员立足本

国、联系实际、深入基层做调查工作的愿望。

我很想借这本书出版的机会，根据我本人在中国民族研究工作经历，表述一下我在这个研究领域里的思路。



各民族在平等的基础上共同繁荣和进步是我国解放以来一贯奉行的基本国策，它影响到我国“四化”建设的大局，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繁荣昌盛。何况目前民族问题已成为世界上突出的矛盾，在欧洲尤为尖锐，这会为人类带来多大的危害性现在还难说。因此民族研究的意义已越来越显得重要了。

民族研究工作是我不一生学术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我的社会调查工作就是从少数民族开始的。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民族调查可以说是认识社会和文化的基本功，要认识人类的社会与文化的基本面貌，最好能从对各种不同民族的社会与文化进行比较研究入手。有比较才有鉴别，对不同个性的综合分析才能得到共性的认识。

1933 - 1935 年我在清华大学研究生院攻读人类学，导师史禄国先生在我毕业后准备出国深造时，要求我先找一个同自己生活习惯不同的少数民族社区进行实地调查。我接受他的建议并在他的指导下和前妻王同惠选择了广西大瑶山地区的花篮瑶人作为调查对象。王同惠在此次调查中不幸牺牲，我也受了重伤。这次调查计划没有完成，我所搜集的关于各村瑶人人体测量数据，后来又全部遗失，我只根据王同惠的调查材料，写成一本《花篮瑶社会组织》。其后我在回家乡养伤时进行了“江村”调查，转向了农村调查，直至解放之初。

1950 年我参加了以宣传新中国的民族政策和对各地少数民

族进行初步调查为任务的中央访问团，并担任贵州分团和广西分团的团长，深入贵州和广西两省的少数民族地区工作，有两个年头。1952年我调到中央民族学院工作。1955年到贵州进行民族识别研究。1956年参加了人大常委会组织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这一段时间大约有7年之久，我一直和国内各少数民族发生接触和联系，并且有机会进行一些比较深入的研究，到1957年反右运动时才告终止。

又过了20多年，到80年代初，我恢复了正常的社会地位，并以“三访江村”重新开始我对社会调查的工作。就在这时我提出了上面提到的为中国人口这盘棋做活两个眼的观点。为了开发边区，看到了民族研究工作的重要性，再次激起了我对民族调查的热情。1984年我初步完成江苏省的小城镇调查后，决定把研究的重点转移到边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以后着重做了农牧结合和城乡结合两个题目，进而产生了“全国一盘棋”的观点。民族研究成了我们社会学研究中的重点项目之一。

从此我利用一切条件在大江南北、东西穿梭，每年多次在全国各省进行重点的现场调查。在这12个年头里，除西藏和台湾外，我遍历了全国各省，其中有不少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区，所以有机会又和各地少数民族同胞往来接触。我对中国民族问题的认识以及对民族地区发展的一些设想，其中许多是不够成熟的，愿意提出来和大家商榷。

二

解放后，我国消灭了阶级剥削和民族压迫，这是民族解放和发展的先决条件。首先在法律上承认各民族一律平等，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并在宪法上予以明文规定；同时主张各民

族间坚持平等、互相团结合作以达到共同繁荣的目的。然后在行政体制上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这些是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为了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我国在各少数民族聚居地方，省一级的建立自治区，市、县一级建立自治州、自治县，形成了一套民族自治的行政体制。最后在1984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这是把这种制度确定下来的一项基本法律。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贯彻执行得好，既有利于发挥少数民族振兴中华的积极性，又有利于巩固国家的统一。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民族工作中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民族识别问题。各民族都有权利当家做主，宪法规定每个民族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里应该有自己的代表。但是我国有多少民族，有哪些民族，各民族分别有多少人，聚居在什么地方等等，在开国之初，我们还不很清楚。中央派出赴少数民族地区的访问团，初步探清了情况，但是具体情况又相当复杂，有若干疑难问题，需要深入调查研究。因此民族调查研究不仅是个学术问题，而且还是一项与国家的政策和行政体制密切结合的工作。

我们开始进行民族识别工作时，主要理论根据是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斯大林的定义指出，一个民族有四个要素：共同的地域、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经济和共同的心理素质。这是个符合于欧洲大部分地区资本主义时代民族实际的概念。一切概念都是从历史的经验里总结出来的，总是同一定的历史条件相对应的。我们在应用这个概念处理我国的民族实际时，常常遇到困难。

根据我国民族现实的客观特点，我认为“民族”这个概念本身应包括三个层次的含义。第一层是中华民族的统一体。这个民族统一体在近代各族人民共同抵抗帝国主义侵略中表现得十分具体和重要。清末民初孙中山先生提倡的“五族共和”，实际上反映了长期以来早已形成的这个民族共同实体的存在。这个统一

体是经过长期历史形成的，其形成的具体经过还有待我们研究和说明。但是中华民族确实是一个民族统一体是不容否定的。

第二层是组成中华民族统一体的各个民族，即现在组成中华民族的56个民族。这些民族，各有自己的特点。所谓民族特点，是一个民族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适应其具体的物质和社会条件而产生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个性。在统一体的内部，应当承认各组成部分的个性，相互尊重，友好相处，以实现民族平等和团结。

第三层是组成中华民族统一体的各个民族内部还有各具自身特点的部分，现在称作各种“人”，如我调查过的瑶族里还有若干种不同名称的瑶人，如花篮瑶和茶山瑶等。

由于民族这个概念具有中国的特点，在理论上还需要更深入的研讨，所以在民族识别上，还时常发生疑难的问题，至今仍有个别情况难作定论。但总的来说，民族识别工作已基本完成。

民族调查和识别工作对了解各民族的基本情况，各少数民族参与人民政权及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建立民族区域自治，提供了必要的事实依据。同时进行的各少数民族的语言调查，为各少数民族改革和创造文字打下了基础。

三

宪法既规定了民族平等的基本原则，行政上又落实了民族区域自治的体制，接着是各少数民族分别根据其具体情况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我国的少数民族，由于历史原因，解放时所处的社会经济水平差别很大。有人说几乎是一部活的社会发展史，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直到各期的封建社会都可以找到活的标本。但不论以哪个发展阶段为起点，都要由他们自己进行社会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为了了解各少数民族的社会的性质，1956

人大常委会主持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我在 1956 年参加组织这项调查工作。依据社会发展史上的几个阶段，作为一个共同参照格局，定出各项指标来衡量每个民族的发展水平，确定它的社会性质。我们的目的是通过这项调查，国家可以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民族，采用不同的方针政策，来帮助他们进行社会改革，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

作为社会科学工作者，我在这一阶段的工作中受益很多，最主要的是接触了实际，了解了情况，同时认识了不少问题。就我国少数民族发展、演变的历史，我得出一条认识：我们不能从抽象的定义出发，不能离开一定的历史条件去了解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社会，否则就会偏离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既无法有区别地对待各种具体民族问题，又看不清各个民族发展的前途。可惜在这项工作过程中，我个人由于反右运动而被停止参加，未能有始有终地完成这项任务。但是这项工作本身是有成绩的。虽然经过反复折腾，但在“文革”之后，留下的调查资料终于由民委编成“五种丛书”出版，为民族研究工作打下初步基础。

四

70 年代末，我国跨入了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从 80 年代初，由于在政治上得到了改正，可以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和条件继续做社会调查，力图紧紧跟上社会大变革的形势，尽力之所及为研究我国当前的社会发展勾画出素描和草图，并根据实际的发展不断提出一些问题，开辟一些值得研究的园地。

1978 年我从中央民族学院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1979 年中央决定重建社会学，指定由我主持这项任务。我在 1981 年完成了社会学学科的基本建设，随即开始继续我的农村调查，并

且从沿海的较发达地区做起，这些都是汉族聚居区。所以，从1957年起到1984年的近30年中我实际上没有进行少数民族地区的现场调查。

我在全国各地城乡调查中，看到了我国境内地区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沿海发达地区的开放和发展，势必与边远地区拉大差距。差距的扩大势必会产生种种问题，而特别是我国的许多边远地区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区。这些想法促使我关切到民族地区前景如何的问题，激发了我对少数民族的发展进行研究的决心。1984年开始做出我研究工作重点的转移：从沿海转边区到内地；从东南移到西北；从农村小城镇转到民族地区。我以内蒙古为重点历访了除西藏以外的四个自治区，又以甘肃为重点考察了边区各省，最近又进行以发展山区经济为重点的调查。从1984年起，至今有8个年头，重新多次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对少数民族的发展问题产生了一些观点和设想。这些观点和设想也为年轻一代的学者起着“破题”和“开路”的作用。

我在内蒙古和黑龙江最初遇到的还是人口流动这个老问题。内蒙古解放时只有600万人，80年代初是三个600万，而黑龙江是三个1000万。也就是说30年中原有的人口占1/3，自然增长的人口占1/3，外面进入的人口也占1/3。我感到这是一个应由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及其他学科共同来研究的问题。人口流动是个现实存在的问题，要因势利导，不能硬挡，应当发展这个趋势的积极方面，防止并矫治其中的弊害。

首先我们应当找出不同性质的各种形式的人口流动，然后分析哪种流动会和当地社会发生矛盾；再进一步观察、了解矛盾产生和发展的过程，研究如何使人口流动为发展经济文化服务，符合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这就是我们当时提出的研究任务。我们打算在一两个省区开始做局部调查研究，探索出经验，逐步扩大到其他省区，摸出大西北的人口流动的总规律。

我们研究的目的还是在于开发大西北。开发大西北，人口是开发的主要因素之一。人力资源问题有两方面：一是当地的力量应该怎样使用，一是还需要吸收什么力量。要有全国一盘棋的观点，从大局着眼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对人口流动问题的研究是从黑龙江省盲流问题入手，然后转入内蒙古自治区。

五

我国西部边区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拥有广阔的牧区。我国可以放牧的草原共有 43 亿亩，占我国土地面积的 $1/3$ ，主要是在西北边区。牧业历来是这个地区的经济基础，而且具有极大的潜力。从事牧业的又都是少数民族，从发展少数民族经济的角度看，牧业的现代化更有重要意义。因此我认为要研究边区开发问题，应当从牧区入手。

以整个内蒙古来说，牧业是当地蒙古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主要传统经济基础。但是它的南部又是与汉族杂居的地区，引进了农业，草在退化，牧业也在衰落。这里存在农、牧矛盾，同时也正是过去发生民族矛盾的地带。我们就选择了现称赤峰市的昭乌达盟这个农、牧交错的地区做观察对象。

赤峰成为蒙汉杂居的地区，也是农、牧并存的经济，自清朝允许汉人出关之后，已有 200 多年历史。由于外来粗放农业向牧区扩张，破坏了牧民生存空间的草原，农、牧发生了矛盾，外地进入开垦的人都是背井离乡的穷苦农民，他们是汉族人，牧民是蒙古族人，因而农、牧矛盾就转化成了民族矛盾。

粗放农业和自然牧业的矛盾以及长期的滥砍、滥牧、滥垦、滥采，使自然生态平衡遭到了破坏。开发这样的边区，首先必须下大力来恢复自然生态平衡。治沙、防风、种草、种树是最基本

最迫切的措施。这在西部其他地区也不例外。

目前在恢复自然生态平衡方面已做了不少工作，也有了比较成功的经验，但尚属小面积的实验性质，有待进一步做出配套的和可推广的治理方案。从群众创造的经验中，我们看到，开发边区必须走以牧为主、农牧结合的道路。而这条路只有打破目前牧区的封闭自给经济状态，实现牧业现代化才有出路。无论采用哪一种经验，如建设饲草饲料基地以发展饲育，或采取放牧与舍饲相结合的方式搞“催肥工厂”等，都首先要解决牧业的商品化问题。商品流通是促使牧业改革的基本力量。

大力开发广大草原地区的牧业，是我关心的又一课题。在内蒙古、新疆那样广阔的草原上，如果能大力发展现代化的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是难以估计的。要认识这一点，首先须破除汉族传统的“以农为本”的狭隘观念。要知道粮食只是人类得到营养的一种来源，肉类不一定是“副食品”，也可以成为主食。如果占有国土 $1/3$ 的草原能充分得到利用，成为全国人民肉食供应基地，就可以减少对粮食的需求，并使农区的土地能从粮食的压力下解放出来，向培植经济作物转移。从宏观上看，这是一项提高生产力的大战略。

六

如果说在赤峰调查中看到了该地区的自然生态的失调，在包头的初步调查却看到了过去在边区建设的大工业所产生的人文生态的失调。人文生态是指一个社区的人口和社会生产结构各因素间存在着适当的配合，以达到不断再生产的体系。人文生态失调是指这种配合体系中出了问题，劳动生产率日益下降，以致原有生产结构不能维持人口的正常生活和繁殖。在整个边区，人文生

态失调和自然生态失调同样值得注意。

自建国以来，国家工业建设的重点曾经放在中部和西部之间的走廊地带，从内蒙古经陕西、甘肃到四川，投资大略估计有3700亿元。在我们这样一个工业不发达的国家，这个数目是不算小的。用这笔钱建成了九条铁路和几千个大中型国营企业。但是这几千个大中型企业并没有成为这些广大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启动动力，这是为什么？

我们如果从社会学的角度去看，基本上这是个人文生态失调的问题。在边区新办的大企业里就能见到它们的特点。首先是“企业办社会”，也可以说是“社企不分”。企业的从业人员和他们的家属组成了一个在社会生活各方面力求自给自足、对外很少联系的封闭性社区。这在少数民族地区更为突出。

这种企业又都直属于中央或省的政府部门，他们搞的是产品经济，不是商品经济。它们和所在地的基层地方政府没有从属关系，当地基层政府管不了它们。企业的上级政府部门又都是专业性的经济部门，它们也管不了各企业从业人员的社会生活。于是产生了“企业办社会”的结构。一个厂长事实上同时是一个“市长”。在这种社企不分的封闭社会里，人文生态关系就容易失调。

这样的企业像个大家庭，不能不一代一代地养活不断增长的字子孙孙。这个大家庭并不是个不断生长中的母体，而是个生产力受限制的封闭社区。所以不可避免地进入了恶性循环，包袱越来越重，母体越来越弱，这就是我说的人文生态失调现象。80年代，沿海各省乡镇企业发展很快，由于缺乏技术人员，愿出重价招聘，使得在这些大企业里舒展不开手脚、待遇又微薄的技术人员就像春江水发大批东流。这等于是企业里的水土流失，又成了一种严重的人文生态失调现象。

人文生态失调形成了对企业的压力，有些企业不得不进行改

革以求生存。首先是以开放代替封闭，向政企分离的目标迈进。大企业的开放不但发挥了边区工业化的启动作用，而且也是自己解放自己的唯一办法。对地区经济和企业本身是两利的。

这个问题，实际是西部地区共同的问题。在陕西、甘肃、四川的“三线”企业都面临这样一个改革问题。它们必须转型以求适应。适应之道主要是以开放代替封闭，从产品经济走向商品经济。改革的方式则是多样的。陕西宝鸡的经验称“城乡一体化”，使国营大企业所含蓄的巨大科技潜力，形成了乡镇企业的启动力。甘肃的经验称“一厂两制”，扩散大企业的技术、资金的力量，开发了与地方结合、集体所有的工业小区，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呈现出一片生机。

这个改革过程已经开始，应该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不同形式进行。应当承认这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而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关键是怎样使已经存储在西部边区的巨大经济能量释放出来，使其成为西部这个多民族地区共同发展的推动力。

七

中国的少数民族大部分聚居在中国的西部。西部和东部的差异包含着民族的差距。西部的发展战略要考虑民族因素：一方面是动员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参与他们本地区的开发事业，另一方面要通过这些地区的经济开发使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发展成为现代民族。这个观点在过去实际上常被忽视了。不少在少数民族地区兴建的大型国营企业根本没有考虑到与当地少数民族相联系，甚至眼中只有这地方的资源，而忘记了还有生活在这地方的人。

怎样才能把西部少数民族吸收进开发西部的事业中来，我在甘肃临夏调查时得到启发，主要是进一步认识到少数民族的发展

必须抓住它们的特点作为起点。在临夏，我提出“以商带工”的启动战略。他们的农民流通部队在城乡间搞活了流通，促进了生产。我认为西部各地都要有这种贩运队伍，来点火启动整个地区的经济运行。

我考察这个地区回族的历史，提出发挥回族人善于经商的优势，搞活区域经济。这个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更大的区域联合的趋势，需要更大的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甘肃、青海、宁夏、内蒙古四省（区）的协作设想应运而生。以河西走廊为主的黄河上游 1000 多里的流域，在历史上就属同一个经济地带。善于经商的回族长期生活在这里，现在我们把这 1000 多里黄河流域连起来看，构成一个协作区。我们提议建立 12 个大型水电站，以解决这个地带的能源问题。水电产生能源，能源推动这个地区丰富的矿产资源的开发。通过资源开发带动这个地区 3000 万人民致富，从而促进整个区域的商品经济的良性循环。这个经济启动的结果，将使这个协作区成为西北广大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个经济发展中心。

这个经济中心的建立和开展，更长远的意义就是重开向西的“丝绸之路”，通过现在已建成的欧亚大陆桥，打开西部国际市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西部国际市场比东部国际市场更有潜力。西进中亚、西亚和中东地区，我们具有一定的条件。充分发挥回族的民族优势，提供伊斯兰国家所需要的各种生活用品，我们完全有可能建立一个很大的西部国外市场。

如何开发藏族地区是我一直关心的另一个问题，由于年老，亲自到西藏自治区考察是没有可能了。但在甘肃访问甘南和肃南时，我得到很多启发，甘肃的“两南”并不是名称上的巧合，它们在发展西部民族事业上长期以来有特具的关系。它们都紧靠青藏高原的边缘，历史上都与藏族有长期的密切往来，甚至有些民族在这里定居后还接受了藏族的影响，改信了喇嘛教，裕固族

就是一个例子。这种关系正给了他们“反弹琵琶”的条件，在藏族的四周边缘地区开辟几个藏族现代化的窗口。

这些地区处于藏区和汉区之间，容易接受新知识，容易搞现代化。西藏的现代化可以从外围入手，逐步向中心伸张。所以，发展甘南、肃南，对发展藏族地区有重要意义。这“两南”能不能看作是青藏高原的少数民族和中原地区各民族联系的两架桥梁？通过原属藏族重要文化中心的甘南这架桥梁可以把现代化科技知识送入藏族地区。通过在牧业改良上已取得成绩的肃南这架桥梁把现代化牧业送入藏族内地。因此我称它为“两南兴藏”的设想。

八

我们在访问凉山彝族自治州及攀枝花市后，提出的建立攀西开发区、重建南方丝绸之路、开发大西北的设想也是从区域发展入手来推动民族发展的例子。我建议由彝族主要聚居区的中心西昌凉山和 60 年代起发展成为钢铁生产中心的攀枝花联合建立攀西开发区；并以此为中心，重建由四川成都经攀西及云南保山，从德宏出境，西通缅、印的南方丝绸之路，为大西南的工业化、现代化奠定基础。这可以简称为“一点、一线、一面”开发大西南的设想。“一点”就是指攀西地区，它资源丰富，能源充沛，是对今后开发大西南具有强大启动作用的经济心脏。针对当前该地区在社会经济结构上存在的突出问题，我们提出“四个结合”的对策：州市结合、工农贸结合、轻重结合和民族结合。“一线”则是指以攀西开发区为中枢的由我国大西南通往缅、印、孟的一条交通动脉，也就是重建历史上的“南方丝绸之路”。有了攀西开发区作为心脏，南方丝绸之路作为大动脉，大

西南工业化和现代化就能由点逐步扩散成一片，这就是我们的设想中所提的“一面”。经济的辐射作用将波浪式由攀枝花的工业中心，从凉山地区向四周扩散到大西南的整个地区，基本上可以包括川、滇、黔三省，即云贵高原和四川盆地，使这一片少数民族聚居区逐步走上工业化的道路。

我在上面提出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设想，我想还必须提出一条应当注意的原则，就是民族地区的发展必须是民族本身的发展。不能离开民族的发展来讲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分散在各地区的少数民族。在改革的浪潮中，他们往往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有些地方甚至反把他们当作被“照顾”的对象。这些少数民族成员虽然得到了生活的保障，但是失去了传统的生产手段，没有找到靠自己劳动来从事生产的新路子，结果引起了精神生活的衰颓。

就一个民族的发展来讲，必须强调善于发挥该民族本身在体质上和文化上特具的优势，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外在条件，发展其经济，提高自身的社会生产力和发扬自身的精神文化，在一个地区的发展中，贡献其应有的力量。

九

当前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从地区来讲存在着较发达和欠发达的差距问题，从个人来讲有一个先富后富的问题。“共同富裕，协调发展”，这一指导思想不能动摇，在发展上求绝对平衡是不可能的，但各地的差距也不能拉得太大，特别是对少数民族地区更不能忽视这一点。我常说，中国不是“大鱼吃小鱼”，而是“大鱼帮小鱼”。怎么帮？我认为主要有两条：一是国家支持，二是自己走路。

我在考察湘、鄂、川、黔四省交界武陵山地区的土家族和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时，总结当地扶贫致富的经验，就看到欠发达的地区需要外力的帮助才比较容易发展起来。这也许正是内地欠发达地区的特点。因为这种长期以来处于小农自给经济的封闭山区的各族居民，事实上缺乏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营大生产的本领，而且没有可靠的市场。在这种地区，要它一步跨入工业时代，难免困难重重。为了加速这种过渡，看来不能没有外力的帮助。固然，如果没有内在的活力，外力要帮也帮不上；但是即使有了内在的活力，没有外助，经济发展也难于启动起来。因之我想到在这类少数民族地区，首先还是要培育内在活力，比较容易见效的可能是发展庭院经济，就是从家庭副业提高一步，成为商品生产的家庭企业。

对发展地区，国家要给政策，对少数民族地区，国家不仅要给政策，而且还要给以切实的帮助。国家支持的目的就是要帮助少数民族站起来，走自己发展的路。我们只有帮助少数民族发挥各自的民族优势，在自己的经济基础上站起来，才能避免少数民族名存实亡的后果，才能使我们的国家真正成为一个民族共同繁荣的大家庭。

东西部协调发展，还要靠“东西合作，互惠互利”，“以东支西，以西资东”的方针来推动。地区间的合作是多方面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但关键是深化改革。改革才能开放，开放才能促进改革。这里归结到一点，就是要遵循商品经济规律办事，在改革中找出路，求发展。

十

改革开放是中国各民族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由于种种原

因，少数民族地区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产业结构很不合理，交通不便，信息不灵，长期以来处于相当封闭的状态。建立新的体制和运行机制，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具有刻不容缓的紧迫性。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加快了开发的步伐，民族间的接触也日益增多，这种状况有利于各民族增进了解，互相帮助，加强团结，但也必然会出现新的问题和新的矛盾，需要更加重视加强民族工作。

我国的少数民族人口虽少，但少数民族地区地域辽阔，约占全国总面积的 64%；草原面积占全国的 89%，我国著名的五大天然牧场都在少数民族地区；林木蓄积量占全国的 46%；水力资源蕴藏量占全国的 54%；此外还有大量的矿藏资源以及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在全国 2.1 万多公里的陆地边境线上，少数民族地区占 1.9 万多公里。因此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地大物博，战略位置重要，担负着重要的使命。

没有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同样，没有中国少数民族的现代化，也就谈不到中国的现代化。认真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法，充分发挥少数民族地区的优势，把少数民族地区资源开发和社会经济发展妥善结合起来，逐步改变民族地区经济相对落后状况，使之同全国经济发展相适应，这是发展我国综合国力的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在振兴中华的共同事业中，各民族都有自己的优势，都应在现代化建设中各自做出自己的贡献。同时我们所走的是共同繁荣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必须包括当地少数民族的发展，这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所决定的。

就我国各族人民居住情况来看，汉族主要居住在内地和沿海各省、市，少数民族主要居住在边疆各省、自治区。但是各民族的居住情况不是整齐划一的，而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大

杂居、小聚居和聚居中有杂居、杂居中有聚居的交错局面。一方面，汉族遍布全国，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一般都有汉族；另一方面各少数民族又大都有自己的或大或小的聚居区，和汉族或其他少数民族交错杂居。各民族在社会经济建设和发展中是相互依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我们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正是允许和要求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民族在一起共同参与，取长补短，互相帮助，共同发展。民族的特点也因此得到发展和发挥作用。

所谓的民族地区，即少数民族聚居区是一个若干民族共同聚居的地区。它不仅具有特殊的地理条件和独特的丰富资源，而且还和其四周地区存在着不可分离的物质和社会关系。因此我从来主张民族研究的对象不应仅限于单一的民族，而应是一个区域，而这个区域也常常是多民族的区域。

当然，由于少数民族分布在山区、林区、牧区的居多，而且其经济结构也常常具有特殊性，所以我们在对待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时要区别不同情况，根据其特点分类研究，加以帮助。如前所述，边区与内地的少数民族有所不同，聚居、杂居和散居的情况又有所不同，人口多少的差别也很悬殊，历史文化、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更是错综复杂。因此民族研究必须着重现场调查，并要因地制宜地采用多种研究方法。

对少数民族本身来说，为了早日发展成为现代民族，最关键的是要转变观念，打破封闭状态，摒弃传统保守意识，主动接受发达地区外来的先进科学、技术，寻找一切有利于本民族地区发展的支援。

汉族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正如毛泽东所说，汉族人口多，这也是长时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所以它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凝聚的核心。由于汉族主要分布在我国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所以在中华民族统一体中，政治、经济、文化都比较先进，

应该成为少数民族实现现代化的先驱。对少数民族的发展，无论从智力、劳力、财力等多方面，必须尽力支援。支援的目的在于使少数民族能用自己的腿走路，建立起有发展前途的经济基础，形成一个能靠自己不断发展的机体，在中华民族统一体中名副其实地成为一个平等互助的成员。

邓小平同志说得很明确：“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当前的问题是怎样才能较快地实现这个目标。这必须有一个脚踏实地的过程。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由于长期历史的原因，各地区的物质条件和文化水平相差很大。起点不同的各地区民族现在虽则都进入了社会主义时期，但贫富不均的状态仍然不可避免。我相信通过国家提倡先富帮后富的办法，欠发达的地区迟早是会赶上来的。

当前全国形势大好，少数民族地区只要积极地发挥自力更生的精神，大力进行改革开放，与发达地区在取长补短、互助互利的原则下联系合作，共同富裕、共同繁荣的社会主义目标是可以逐步实现的。

作为民族调查研究者，我们应当自觉地承担起帮助各地发展中的少数民族总结经验，把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经验实事求是地予以传播，使各地少数民族能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参考采用。这也是为振兴中华民族统一体做出的一点贡献。

1992年7月16日

对民族地区发展的思考

民族研究是我一生学术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我的社会调查工作就是从少数民族开始的。近 10 多年来，我又对民族地区的发展进行了调查研究。1984 年开始，我以内蒙古为重点访问了四个自治区，又以甘肃为重点考察了边区各省，最近又进入以发展山区经济为重点的调查。在这 8 个年头里的调查研究过程中，对少数民族的发展问题产生了一些观点和设想，我很愿意在这次民族理论研讨会上提出来请大家予以指正。

一、边区的两个失调

自然生态失调

1984 年八九月间，我在考察内蒙古农、牧交错的赤峰市（原昭乌达盟）时发现，赤峰是农、牧并存的经济，自清朝允许汉人出关之后，已有 200 多年历史。由于外来的粗放农业不断向牧区扩张，破坏了牧民生存空间的草原，农、牧发生了矛盾。而外地进入开垦的人都是背井离乡的穷苦农民，但因为他们是汉人，而牧民是蒙古人，因而农、牧矛盾转化成了民族矛盾，直到解放后，民族矛盾才得到解决。但是由于粗放农业和自然牧业的矛盾以及长期的滥砍、滥牧、滥采，致使这一地区的自然生态平衡遭到的严重破坏，都依然存在。开发这样的边区，首先必须用大力来恢复自然生态平衡，治沙、防风、种草、种树是最基本最迫切的措施。这在内蒙古的西部其他地区也不例外。开发边区看

来必须走以牧为主、农牧结合的道路。而这条路只有打破目前牧区的封闭自给经济状态，实现牧业现代化才有出路。

在像内蒙古、新疆那样广阔的草原上如果能大力发展现代化的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是难以估计的。要认识这一点，首先必须破除汉族传统的“以农为本”的狭隘的观点。如果占国土 $1/3$ 的草原能充分得到利用，成为全国人民的肉食供应基地，就可以减少对粮食的需求，并使农区的土地能从粮食的压力下解放出来，向种植经济作物转移。从宏观上去看，这是一项提高国民生产力的大战略。

人文生态失调

人文生态是指一个社区的人口和社会生产结构各因素间存在着适当的配合，以达到不断再生产的体系。人文生态失调是指这种配合体系中出了问题，劳动生产率日益下降，以致原有生产结构不能维持人口的正常生活和繁殖。在整个边区，人文生态失调和自然生态失调同样值得注意。

1985年6月，我在考察内蒙古包头钢铁厂时看到封闭企业本身产生的人文生态失调。包钢建成近30年，人口在不断增长，近亲繁殖，社区的活力不断消耗，这样形成了这类边区企业人文生态的第一个恶性循环。由于东西差距拉大，又引起了边区的智力外流，出现了“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局面，人才不断流失，这是人文生态的第二个恶性循环。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工业建设的重点曾经放在中部和西部之间的走廊地带，从内蒙古经陕西、甘肃到四川，投资大略估计有3700多亿元。用这笔钱建成了九条铁路和几千个大中型国营企业。但是这几千个大中型企业并没有成为这个广大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启动力，它们的生存和发展几乎和当地尤其是少数民族没有太大关系，民族地区的开发并没有和少数民族本身的发展密

切结合起来。我认为民族地区的发展必须包括少数民族的发展，不能离开民族的发展来讲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我看到边区所办大企业的特点之一是“企业办社会”，也可以说是“社企不分”。外地移入的从业人员和他们的家属组成了一个在社会生活各方面力求自给自足、对外很少联系的封闭性社区。这在少数民族地区更为突出。这种企业又都直属于中央或省的政府部门，他们搞的是产品经济，不是商品经济。它们和所在地的基层地方政府没有从属关系，当地基层政府管不了它们。企业的上级政府部门又都是专业性的经济部门，它们也管不了各企业从业人员的社会生活，于是产生了“企业办社会”的结构。这样的企业像个大家庭，不能不一代一代地养活不断增长的子子孙孙。因为这个大家庭并不是个不断生长中的母体，而是生产力受限制的封闭社区。所以不可避免地进入了恶性循环，包袱越来越重，母体越来越弱，这就是人文生态失调现象。

人文生态失调形成了对企业的压力，这些企业不得不进行改革以求生存。首先是以开放代替封闭，向社企分离的目标迈进。大企业的开放不但对地区工业化发挥了启动作用，而且也是自己解放自己的唯一办法。对地区经济和企业本身是两利的。这实际是西部地区共同的问题，所有的“三线”企业都面临改革问题。它们必须转型以求适应，主要是以开放代替封闭，从产品经济走向商品经济。改革的方式则是多样的，陕西宝鸡的经验叫“城乡一体化”，使国营大企业所含蓄的巨大科技潜力，形成了乡镇企业的启动力量；甘肃的经验叫“一厂两制”，扩散大企业的技术、资金的力量，开发了与地方结合、集体所有的工业小区，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呈现一片生机。这个改革过程已经开始，应该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不同形式进行。关键是怎样使已经存储在西部地区的巨大经济能量释放出来，使其成为西部这个多民族地区共同发展的推动力。

二、西部的发展战略构想

中国的少数民族大部分聚居在中国的西部。西部和东部的差距包含着民族的差距，西部的发展战略必须考虑民族因素：一方面是动员这地区少数民族参与这地区的开发事业，另一方面要通过这地区的经济开发使这一地区的少数民族发展成为现代民族。

关于建立“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设想

从龙羊峡到青铜峡之间 1000 多公里的黄河上游地区，有着丰富的矿产、水电资源，是西北回、藏、蒙古三大少数民族和汉族聚结部的核心区。自 1988 年 5 月起，我们先后两次到这一近 15 万平方公里的地区进行了考察，并提出了建立“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设想。这一设想得到了甘、宁、青、内蒙古四省区党政领导的大力支持。

黄河上游流域在经济发展上应当连起来看，构成一个协作区。这个“协作区”在历史上本来就属于一个经济地带。我们的设想是在黄河上游建立 12 个大型水电站，以解决这个地带的能源问题。由水电产生能源，又由能源推动这个地区丰富的矿业资源的开发。通过资源开发发展该地区的工矿业，带动这个地区包括各少数民族在内的 3000 万人民的致富，从而促进整个区域的商品经济的良性循环。这个经济带启动的结果，将使这个协作区成为西北广大少数民族地区一个经济发展中心。我们认为这个经济中心的建立和发展，更长远的意义就是重开向西的“丝绸之路”，通过现已建成的欧亚大陆桥，打开西部国际市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西部国际市场比东部国际市场更有潜力。西进中亚、西亚和中东地区，我们具有一定的优势。充分发挥回族的民

族优势，提供伊斯兰国家所需要的各种生活用品，我们完全有可能建立一个很大的西部国际市场。

关于建立攀西开发区，重建“南方丝绸之路”开发大西南的设想

为了调查大西南山区的经济，去年我在四川、云南海拔2500米以上的大小凉山地区连续跑了1300多公里。考察结束后，我提出了《关于建立攀西开发区 重建“南方丝绸之路”开发大西南的设想》的建议。这个设想是由彝族主要聚居区的凉山和60年代起发展成为钢铁生产中心的攀枝花，建立攀枝花和西昌联合开发区，并以此为中心，重建由四川成都经西昌和攀枝花及云南保山从德宏出境西通缅、印的“南方丝绸之路”，为大西南的工业化、现代化奠定基础，简称“一点、一线、一面”开发大西南的设想。“一点”就是指攀西地区，它资源丰富，能源充沛，是对今后开发大西南具有强大启动作用的经济心脏。针对当前该地区在社会经济结构上存在的突出问题，我提出了“四个结合”的对策：即州市结合、工农贸结合、轻重结合和民族结合。“一线”则是指以攀西开发区为中枢的一条我国大西南通往缅、印、孟的交通动脉，也就是重建历史上的“南方丝绸之路”。有了攀西开发区作为心脏，“南方丝绸之路”作为大动脉，大西南工业化和现代化就能由点逐步扩散搞成一片，这就是我设想中所提的“一面”。我想，经济的辐射作用将像波浪式一样由攀枝花的工业中心，从凉山地区向四周扩散到大西南的整个地区，基本上可以包括川、滇、黔三省，即云贵高原和四川盆地，使这一片少数民族聚居区，逐步走上工业化的道路。

临夏的发展模式

在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考察时我提出“以商带工”的启动

战略。我看到临夏有不少农民在城乡间贩运，搞活了流通，促进了生产。我认为西部各地都要有这种贩运队伍，来点火启动整个西部地区的经济运行。我曾四次到临夏考察，称它是“西部温州”、开发青藏高原的“跳板”。据新华社记者今年8月13日报道：长期受人多地少、资源贫乏困扰的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从流通入手，以商兴州，个体、私营经济迅速崛起。如今这个州以其辐射全国的流通网络和吞吐量巨大的专业市场，已成为我国东西部商品流通的“旱码头”。这是令人鼓舞的信息。

“两南”兴藏的设想

如何开发藏族地区，一直是我关注的一个问题。我已年老，亲自到西藏自治区去考察是不可能了。但在考察甘南和肃南时，得到了很多启发。我认为，甘肃的甘南和肃南，合称“两南”，并不是名称上的巧合，它们在发展西部民族地区上都具有特殊的有利地位。它们都紧靠青藏高原的边缘，都是历史上与藏族有长期的密切往来，现在还有藏族聚居于这些地方，而且其他民族有些在这里定居后接受了藏族的影响改信了喇嘛教，裕固族就是一例。这种密切关系正给他们“反弹琵琶”的条件，可以成为藏族现代化的窗口。这些地区处于藏区和汉区之间，容易接受新知识，容易搞现代化。西藏的现代化可以从外围入手，逐步向中心深入。所以发展甘南和肃南对发展藏族地区具有重要意义。“两南”能不能看作是青藏高原的少数民族和中原地区各民族联系的两架桥梁？通过原属藏族重要文化中心的甘南这架桥梁，可以把现代化科技知识送入藏族地区；通过在牧业改良已取得成绩的肃南这架桥梁，把现代化牧业送入藏族内地。因此我产生了“两南兴藏”的设想。

三、充分发挥各民族的特长和优势

我认为我们应该特别注意那些分散在各地区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的发展。在改革的浪潮中，他们往往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有些地方甚至把他们当作被“照顾”的对象。这些少数民族的成员虽然得到生活的保障，但是失去了传统的生产手段，没有找到靠自己劳动来从事生产的新路子。结果引起了精神生活的衰颓。我一向认为，一个民族，无论大小，要发展和繁荣起来，必须有一个坚实的经济基础。一个民族在发展中保持其民族特点，那就必须利用其民族特有的优势来发展经济，不然的话，这个民族难免要衰亡。所以就一个民族的发展来讲，必须强调善于发挥自己在体质上和文化上特有的优势，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外在条件，发展其经济，提高自身的社会生产力和发扬自身的精神文化，在整个地区的发展中，贡献应有的力量。例如长期从事狩猎采集经济的鄂伦春族，他们不可能在今天仍以传统生产方式来谋生了，但他们世代生活在大森林并善于饲养驯鹿，具有丰富的林业知识和驯鹿经验，如果顺应其文化传统，让他们从事森林培养看护、举办鹿场等，或许就可能为这个民族找到发展的根基。

四、共同富裕、协调发展

当前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上，从地区来讲存在着较发达和欠发达的差距问题。当然，在发展上求绝对平衡是不可能的，但各地的差距不能拉的太大，特别是对少数民族地区来说更应重视这点。我常说，中国不是“大鱼吃小鱼”，而是“大鱼帮小鱼”。

那么怎么帮？我认为主要有两条：一是国家支持，二是自己走路。

去年我在考察湘、鄂、川、黔四省交界武陵山区的土家和苗等少数民族聚居区时，深切体会到内地欠发达地区确实需要外力的帮助才比较容易发展起来。这是因为这种长期以来处于小农自给经济的封闭山区的各族居民，事实上缺乏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大生产的传统，而且没有可靠的市场来发展商品经济。在这种地区要他们一步跨入工业时代难免困难重重。为了加速这种过渡，看来不能没有外力的帮助。固然，如果没有内在的活力，外力要帮也帮不上；但是即使有了内在的活力，没有外助经济发展也难于启动起来。因此，我认为这类少数民族地区首先还是要培育内在活力，比较容易见效的可能是发展庭院经济，就是从家庭副业提高一步成为商品生产的家庭企业。

我认为对发达地区，国家要给政策，对少数民族地区，国家不仅要给政策，而且要给切实的帮助。国家支持的目的就是要帮助少数民族站起来，走自己发展的路。我们只有帮助少数民族发挥各自的民族优势，在自己的经济基础上站起来，才能避免少数民族名存实亡的后果，才能使我们的国家真正成为一个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大家庭。

东西部协调发展还要靠“东西合作，互惠互利”，“以东支西，以西资东”的方针来推动地区间的合作，这种合作是多方面的，形式也可以多种多样。但关键是深化改革，归结到一点，就是要遵循商品经济规律办事，在改革中找出路，求发展。

五、民族地区的改革开放和民族的现代化

改革开放是中国各民族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少数民族地

区的农村和牧区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尚占主导地位，产业结构很不合理，交通不便，信息不灵，长期以来处于相当封闭的状态。建立新的体制和运行机制，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具有刻不容缓的紧迫性。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民族间的接触也会日益增多，这种状况有利于各民族增进了解，互相帮助，加强团结，但也必然会出现新的问题和新的矛盾，需要更加重视加强民族工作。

过去被看作是荒凉贫瘠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很多却蕴藏着丰富的地上、地下资源。这是中国走向现代化，实现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地大物博，战略位置重要，担负着重要的使命。没有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同样，没有中国少数民族的现代化，也就谈不上中国的现代化。认真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法，充分发挥少数民族地区的优势，把少数民族地区资源开发和社会经济发展妥善结合起来，逐步改变民族地区经济相对落后的状况，使之同全国经济发展相适应，这是发展我国综合国力的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在振兴中华的共同事业中，各民族都有自己的优势，都应在现代化建设中各自做出自己的贡献。同时我们所走的是共同繁荣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必须包括当地少数民族的发展。这正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性质所决定的。

邓小平同志说得很明确：“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当前的问题是怎样较快地实现这个目标。我认为，这必须是一个实事求是的过程。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各地区的物质条件和文化水平由于长期历史的原因相差很大。起点不同的各地区各民族现在虽然都进入了社会主义时期，贫富不均的状态还是不可避免的。我相信，通过国家提倡先富帮后富的原则，欠发达的地区，迟早是会赶上来的。

1992 年 10 月 1 日

个人·群体·社会^{* 1}

——一生学术历程的自我思考

年近谢幕，时时回首反思多年来在学术园地里走过的道路，迂回曲折；留下的脚印，偏缪杂呈；究其轨迹，颇有所悟。趁这次老友会聚，略作自述，切盼指引，犹望在此生最后的尾程中勉图有所补益。



对“社会”历来有两种基本上不同的看法。一是把社会看作众多个人集合生活的群体。严复翻译 sociology 作“群学”。众人为群，一个个人为了生活的需要而聚集在一起形成群体，通过分工合作来经营共同生活，满足各人的生活需要。人原是动物中的一类，衣食男女、七情六欲等生活需要，来源于自然界的演化，得之于个人的生物遗传。在这些方面人和其他动物基本上是一致的，只是生物界演化到了人这个阶段出现了超过其他动物的智力。人被生物学者称之为 homo sapiens，sapiens，就是智力的意思。凭此特点，人在其满足需要上具备了超过其他动物的能力。人和其他人能通过共识和会意建立起分工合作的体系，形成了聚居在一起的群体。

* 本文是作者在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联合主办的第四届两岸三地中国文化与现代化研讨会上的发言。

严复把 sociology 译作群学，以我的体会说，是肯定活生生的生物人是构成群体的实体，一切群体所创制的行为规范以及其他所谓文化等一切人为的东西都是服务于人的手段。

另一种看法却认为群体固然是由一个个人聚合而成，没有一个个个人也就没有群体，这是简单易明的。但是形成了群体的个人，已经不仅是一个个生物体，他们已超出了自然演化中的生物界，进入了另一个层次，这个层次就是社会界。在这个层次里一个人不仅是生物界中的一个生物体，或称生物人，而是一个有组织的群体里的社会成员，或称社会人。社会是经过人加工的群体。不仅不像其他动物群体那样依从生物的繁育机制吸收新的成员，也不像其他动物一样，每个人可以依他生物遗传的本能在群体里进行生活。在人的社会里，孩子须按社会规定的程序出生入世，生下来就得按社会规定相互对待的程式过日子；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对待不同的对象，都得按其所处的角色，照着应有的行为模式行事。各个社会都为其成员的生活方式规定着一个谱法。为了方便，作个不太完全恰当的比喻，像是一个演员在戏台上都得按指定了的角色照剧本规定的程序进行表演。每一个歌手都得按谱演唱。社会上为其成员规定的行为模式，普通称为规矩，书本上也称礼制或法度。它确是人为的，不是由本能决定的；是经世代不断积累和修改传袭下来的成规。通过上一代对下一代的教育，每个人“学而时习之”获得了他所处社会中生活的权利和生活的方式。不仅如此，如果一个社会成员不按这些规矩行事，就会受到社会的干涉、制裁，甚至剥夺掉在这个社会里继续生存下去的机会，真是生死所系。

社会在自然的演化中是继生物世界而出现的一个新的但同样是实在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以生物体为基础的，正如生物体是以无生的有机体为基础一样。生命的开始，出现了生物界，生物群体的发展，出现了社会界。人还是动物，但已不是一般的动物，

人的群体已不是一般的群体，上升成为社会。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本身是个实体，生物人不能认为是社会的实体，而只是社会的载体。没有生物人，社会实体无法存在，等于说没有有机物质，生物实体无法存在一样。有机物质是生命的载体，生物人是社会的载体。实体和载体不同，实体有自己发展的规律，它可以在载体的新陈代谢中继续存在和发展。正如一个生物人是由无数细胞组成，个别细胞的生死，不决定整个人的寿命。个人的生命正是靠其机体细胞的不断更新而得以延续。同样的社会里的个别成员，因其尚属生物体，还是受生物规律的支配，有生有死，但并不决定社会群体兴衰存亡。因之，生物实体和社会实体是属于自然演化过程中的两个层次。人有两个属性：生物人和社会人。

这一种把社会看成比生物群体高一层次的实体和把社会只看成是人的群体的生活手段，从理论上说是两种不同的看法。

二

我初学社会学时，并没有从理论入手去钻研社会究竟是什么的根本问题。我早年自己提出的学习要求是了解中国人是怎样生活的，了解的目的是在改善中国人的生活。为此我选择了社会学。现在回头看来，我是受上述第一种看法的引导而进入这门学科的。把社会学看作是一门研究人们群体生活的行为学科，很符合严复翻译的意思，社会就是人类的群体。更符合我的主观倾向的是社会所规定的一切成规和制度都是人造出来，满足人的生活需要的手段，如果不能满足就得改造，手段自应服从人的主观要求。中国人民在我这一生中正处在社会巨大变动之世。如果社会制度不是人类的手段，那就好像谈不上人为的改革了。

我第一本翻译的社会学著作是乌格朋（Ogburn）的《社会

变迁》。那时我还刚刚和社会学接触。这本书给我的印象很深，因为我很同意他的科技进步引起社会变迁的理论。科技变迁了，社会的其他制度也得相应地变迁，不然就出现社会脱节和失调。科技的进步是人为的，是人用来取得生活资源的手段，其他部门向科技适应也得出于人的努力改造已有的制度。这个理论对我很有吸引力。我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也可算是我进入社会学这个学科的入门标记。今天提到这件事是想说，我是无意地从上述的对社会第一种看法进入这个学科的，我说无意地因为我当时还没有领会到还有第二种看法，所以并非有意的选择。

接着我在燕京大学学习的最后一年，适逢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派克教授来华讲学。我被他从实地观察来进行社会研究的主张所吸引住了，据说这种方法来自人类学，我就决心去学人类学，虽然我当时对人类学还一无所知。我从燕京大学社会系毕业后，由吴文藻先生介绍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跟史禄国教授学人类学。史禄国原是帝俄时代国家科学院里的人类学研究员。十月革命时他正在西伯利亚和我国东北考察，研究通古斯人。当时俄国发生了革命，他不愿回国而留在中国进入了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后来又和同事们合不来，转入清华大学教书和著书。人类学在中国当时还少为人知，我投入他的门下，成了他所指导的唯一的研究生。

他依据欧洲大陆的传统，认为人类学所包括的范围很广，主要有体质、语言、考古、社会和文化，可说是人和人文的总体研究。他为我定下了一个6年的基础学习计划，包括体质人类学、语言学和社会人类学三个部分，规定我以两年为一期，三期完成。我从1933年先修体质人类学，同时补习动物学，作为第一期。按清华大学的章程，研究生学习只规定至少两年，没有限期。我就准备按他的学习计划进行，预备修完三期。到1935年暑假我结束了第一期，学会了人体测量和体质类型分析，写出了

两篇论文，经过考试委员口试及格，按清华的章程，两年后考试成绩优秀可以取得清华公费留学的资格。1935年正逢史禄国的休假期，而且他自己又另有打算，决定休假后不再继续在清华任教。所以他为我做出了新的安排，1935年暑假后到国内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一年，然后1936年由清华公费出国进修，他不再自己指导我第二和第三期的学习计划了。

我按他的意见，1935年暑假到广西大瑶山，即现在的金秀瑶族自治县去进行实地调查。我携带了人体测量仪器以进行体质调查，并有前妻王同惠同行，共同进行社会调查。该年12月结束了大瑶山里的花篮瑶地区的调查后，准备转入附近坳瑶地区时，在路上迷失方向，遭遇不幸事故，我自己负伤，前妻单独离我觅援，溺水身亡。我在医伤和休养期间按和王同惠一起搜集的资料写成《花篮瑶社会组织》。这是我第一个社会实地调查的成果。

按史禄国所设计的学习进程，这是我超前的行动，因为社会人类学这一部分是安排在第三期学习计划里的。在编写这本书之前我只阅读过史禄国关于满族和通古斯族的社会调查，印象并不深，而且我对社会学理论也并没有系统地学习过。回想起来，从史禄国老师学到的也许就是比较严格的科学态度相对各个民族在社会结构上各具特点、自成系统的认识。所谓各有特点、自成系统就是指社会生活的各部门是互相配合而发生作用的，作为一个整体就有它独特的个性。我通过瑶族的调查，对社会生活各部门之间的密切相关性看得更清楚和具体了。这种体会就贯串在我编写的这本《花篮瑶社会组织》里。我从花篮瑶的基本社会细胞——家庭为出发点，把他们的政治、经济各方面生活作为一个系统进行了叙述。

瑶山里所取得的体质测量资料我没有条件整理，一直携带在行李里，最后在昆明发生李、闻事件后仓促离滇全部遗失，花篮瑶的体质报告也就永远写不出来了。但这并不是说我这两年体质

人类学的学习对我的学术工作上没有留下影响。除了我对人类的生物基础有了较深的印象外，在分析类型进行比较的科学方法也为我以后的社会学调查开出了一个新的路子。

我原有的学习计划既然发生了改变，1936年暑假我就准备出国，并由吴文藻先生安排，决定到英国LSE跟马林诺斯基学习社会人类学。比史禄国给我预定的计划，免去了语言学的一节。

从瑶山回到家乡我有一段时间在国内等候办理出国入学手续，我姐姐就利用这段时间为我安排到她正在试办农村生丝精制产销合作社的基地去参观和休息，这是一个离我家不远的太湖边上的一个名叫开弦弓的村子。我利用在村里和农民的往来，进行了一次有类于在瑶山里的社会调查。我带了在这村子里收集到的有关农民生活的调查资料一起到了伦敦。

我根据这批开弦弓的调查资料写出的提纲，首先得到了当时我在伦敦的导师Firth的肯定，随后又得到Malinowski的注意，当即决定他自己亲自指导我编写以中国农民生活为主题的博士论文。当时我并不明白为什么我能获得这样顺利的学习机会。后来在有人看到我的论文后，向我提出了个问题：你怎么会在没有和LSE接触之前，就走上了功能学派的路子？那时我才明白我从史禄国那里学来的这些东西，着重人的生物基础和社会结构的整体论和系统论，原来就是马氏的功能论的组成部分。我当时只觉得马氏所讲的人类学是我熟悉的道理。我们相见以前，已有了共同的语言。

回到我第一节里提出对社会的两种看法，我在这个阶段还没有做出明确的选择。原因也许在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除了第一种看法之外，还有第二种看法，和两种不同看法的区别。这表明我在理论上不够敏感，也就是功底不深。

我对史、马两位老师理论上的特点直到现在也不敢说已经了然。我听说史禄国后来看到了我那本《江村经济》时曾经表示

过不满意的评论。我模糊地感觉到在他的理论框框里，我这本书是找不到重要地位的。但由于我没有吃透他的理论，我还不敢说哪些方面引起了他不满意的反应。

对马氏的理论我多少有一些捉摸。按他已经写出来的有关文化功能的理论，按我所理解的程度来说，基本是属于我上述的第一种看法。马氏的功能论的出发点是包括社会结构在内的，文化体系都属于人用来满足其基本生物需要及由生物需要派生的各种需要的手段。这一点是他一直坚持的，同时他也承认文化的整体性，就是说人为了满足其需要而创造出的文化是完整的。说是完整就是就完备而整体的。它必须满足人作为生物体所有全部需要，本身形成一个整体，其各部分是相互联系和配合的一个体系，简单说是整体论和系统论。

他提出这一套理论是有其历史背景的，他是个人类学中主张实地调查的先行者。他长时间住在 Trobriand 岛的土人中间，学会土语，直接参与土人的集体生活。他深深觉得要理解一个群体的生活必须从整体上去观察他们怎样分工合作，通过有系统的活动来维持他们的生活，也就是满足他们的需要，而人的一切需求都是从人作为一个生物体而发生的。食色性也，是从人是动物的这个属性上带来的。从这个基本的生物需要出发，逐次发生高层次的需要，如维持分工合作体系的社会性的需要等等。他用这个理论来批判当时在人类学界盛行的文化传播论、历史重构论等等，因为这些理论都是把文化要素孤立起来，脱离了人而独立处理的。比如当时就有些学者把图腾信仰脱离他所发生的具体群体而研究其起源、流动和在人类整个历史发展中的地位等等。他以当时盛行在欧洲的人类学作为靶子，针锋相对地提出功能论、整体论和系统论。这在人类学学科史上是一次革命性的行动，使人类学的研究回归到科学的行列。

三

马氏自己称他的人类学理论是功能学派。他的所谓功能，就是文化是人为了满足其需要而产生的，所以都是有用的手段，文化中各个要素，从器物和信仰对人的生活来说都是有功能的，功能就是满足需要的能力，简单说就是有用的。功能这一词是英文 function 的译文。这词在英文中原有两个意义，一是普通指达到目的所起的作用，二是在数学里的函数，如果说甲是乙的函数，甲变乙也随着要变。马氏称自己是功能学派，实际上是一语两义都兼有的。但在叙述他的理论时却常强调第一个意义，比如他在论巫术时就强调它在支持实际农作活动的节奏和权威的作用，用来批判过去认为巫术是未开化的人思想上缺乏理性的表现，是一种前科学或假科学思想的产物。19 世纪在欧洲人类学充满着当时通行的民族优越感，把殖民地上的土人看成是未开化的野蛮人，把土人的生活方式看作是一堆不合理的行为。功能论是针对这种思想的批判，但是这种理论走到极端，认为文化中一切要素都是有用的，又会给人以存在就是合理的印象。这个命题在哲学上常受到批判，在常识上也和社会的传统中颇多对人无益而有害的事实不能协调。至于把满足生物需要作为功能的基础更是不易为普通人所接受。因之当马氏的功能论在人类学中盛极一时之际，就有不同的看法出现。而且就出现在也自称是功能学派的阵营里。最突出的是曾到过燕京大学讲学的 Radcliffe-Brown。

布朗也是主张实地调查而且主张文化整体论和系统论的人类学者。但是他认为功能的意义不必挂上有用无用的鉴别上，更不应当和生物需要挂钩，他把功能意义做数学中的函数来讲，那就是把功能的含义去掉了马氏所强调的一半。当时我们这些年轻的

学生，经常把他们两个看成是在唱对台戏的主角。对我这个对理论缺乏敏感的人来说，在这场争论中除了看热闹之外，并没有认真思考加以辨别，而实际上却被这个争论带进了我在本文开始时所述对社会的两种看法的迷阵里。当我接触了功能派的先锋法国涂尔干的著作之后，对第二种看法发生了兴趣。他比较明确地把社会看成本身是有其自身存在的实体，和生物界的人体脱了钩。

我在医预科和在体质人类学课上受到的基础训练和社会文化和生物挂钩原是比较顺理成章容易接受的。但是我对社会的看法却被马、布的争论所动摇了，特别是联系到在瑶山和在开弦弓的实地调查的经历，使我逐渐倒向布氏的一面。我在初步进入社区的实地调查中所得到的感受值得在这里回忆一下。

当我踏入一个社区时，我接触到的是一群不相识的人。我直接看到的是各个人在不同场合的行动举止。这一片似乎纷乱杂呈的场面里，我怎样从中理出个理解的头绪呢？这时我就想到了社会行为是发生在社会所规定的各种社会角色之间，不是无序的而是有序的。如果我从这个角度去看在在我面前展开的各个人的活动，就有了一个井然的秩序。不论哪一家，我们如果用父母、子女、亲戚、邻居等社会角色去观察这些似乎是杂乱的个人行为，就可以看到在不同人身上出现重复的行为模式，比如不论哪一家，母亲对儿子之间相互的行为都是类似的，成为一种模式，而这套行为模式却不同于妻子对丈夫，甚至不完全相同于母亲对女儿之间的相互行为。我在实地调查中才理解到一个社区中初看时似乎是纷杂的众人活动，事实上都按着一套相关的各种社会角色的行为模式的表演。再看各种社会角色又是相互配合，关关节节构成一个网络般的结构。从这个结构去看这社区众人的行为就会觉得有条有理，一点不乱。而且这个有条有理的结构并不是当时当地的众人临时规定的，而是先于这些人的存在，就是说这些人从小在生活中向一个已存在的社会结构里逐步学习来的。这就是

个人社会化的过程。这个结构里规定的各种角色间的相互行为模式也是个人在社会中生活时不能超出的规范，一旦越出就有人出来干涉，甚至加以制裁。也因之在一个外来的调查者所能看到的经常都是些按照社会模式而行为的行为，有时也可以见到一些正在或将会受到制裁的超规行为。作为一个人类学者在实地调查时，通常所观察到的就是这些有规定的各种社会角色的行为模式。至于角色背后的个人的内在活动，对一般的人类学者来说就是很难接触到的。

我的社区调查不论在瑶山或在江村，现在回头来看，是不够深入的，还是满足于社会角色的行为模式，因而影响了我对社会的看法，把它看成了自成格局的实体，表达得最清楚的是我根据讲课内容编出的《生育制度》。

我本人的具体经历也影响了我学术观点的形成，所以在这里得补充几句。我是1938年离开伦敦的。那时，我国的抗日战争已进行了一年，我的家乡已经沦陷，原在沿海的各大学都已迁入内地。所以我只能取道越南回国，到达昆明，在当时的云南大学和由清华、北大、南开联合的西南联大工作。实际上，我到了云南，立即继续我的社会调查，接着以罗氏基金对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的资助在云南大学成立了一个社会学研究中心，由于避免轰炸，设立在昆明附近呈贡的魁星阁，普通就称魁阁。从这时起，我的学术环境是相当偏僻和孤立的。除了少数原来的师友外，和外地及国外的社会学界几乎隔绝。不仅我们在当时和自己这个小圈子之外的思想很少接触，而且没有收集和储藏过去社会学书籍和资料的图书馆，我们对国内外过去的社会学遗产也得不到运用。这种缺乏消息交流对学术思想的发展确是一个很大的限制。现在回想起来，就能看到这种特殊环境的确对我自己学术思想有很大的影响。影响之深不仅是当时孤陋寡闻，而且造成了自力更生，独树一帜。一切靠自己来的心理，一直发展成为我后来不善

于接受新的社会学流派的习惯。

1943 年我虽则有由美国国务院的邀请参加了当时所谓“十教授访美讲学”的机会在美国住了一年，但是我却利用这时期，忙着编写魁阁的调查成果。在美国几个大学的同行协助下写出了 *Earthbound China* 和 *China Enters the Machine Age* 两书。说实话，我并没有用心去吸收当时国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新思潮。比如我在哥伦比亚见过 Linton，在芝加哥见到 Redfield，在哈佛商学院见到 Elton Mayo，我在编写上述两书时都得到了他们的关切和具体协助，但是我对他们的著作却没有深入的钻研。除了我回国后翻译过 Mayo 的一本著作外，对其他几位老师的著作并未认真阅读。至多是吸收了一些皮毛，为我已在胸中长成的竹子添些枝叶。

我在老朋友面前无需掩饰，从 40 年代后期起，直到 70 年代结束前一年，我在国际的社会学圈子里除了两次简短的接触之外是个遗世独立的人物。

四

回到我在昆明这一时期。我们在魁阁研究工作是按照《江村经济》所走出这条路前进的，这条路我们称之为社区研究。社区这个名词是我这一代学生在学时所新创的。其由来是 1933 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的毕业班为了纪念派克教授来华讲学要出一本纪念文集，我记得其中有一篇是派克自己写的文章需要翻译，其中有一句话“community is not society”，这把我们卡住了。原来这两个名词都翻成“社会”的，如果直译成“社会不是社会”就不成话了。这样逼着我们去澄清派克词汇里两者的不同涵义。依我们当时的理解，社区是具体的、在一个地区上形成的群体，而社会是指这个群体中人与人相互配合的行为关系，所以挖空心

思把社字和区字结合起来，成了“社区”。

社区这个概念一搞清楚，我们研究的对象也就明确了，就是生活在一个地区的一群有社会关系的人，社区可大可小，一个学校，一个村子，一个城市，甚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至可以是团结在一个地球上的整个人类。只要其中的人都由社会关系结合起来，都是一个社区。有了这个概念，我们实地观察的对象也有了一定范围。我当时就提出可以在瑶山进行民族集团的社区研究，也可以在各地农村里进行社区研究。在 1933 年这种社区研究就在燕京大学学生里流行了起来。我到了昆明还是继续走这条路子。

还应当提到的是魁阁研究工作标榜的特点是比较方法与理论和实际结合。在接受派克社区研究的概念和方法时，同时是由吴文藻先生为首提出的社会学中国化的努力方向。燕京大学的学生就是想通过社区研究达到社会学的中国化。社会学中国化其实就是社会学的主要任务，目的是在讲清楚中国社会是个什么样的一个社会。通过社区研究能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当然我们要说明中国社会是个什么样的社会，科学的方法只有实地观察，那就是社会调查。但是有人就质问我，我们的研究对象如是一个具体的社区，那也只能是中国的一部分，你们能把全国所有的农村城市都观察到么？社区研究只能了解局部的情况，汪洋大海里的一滴水，怎能不落入以偏概全的弊病呢？我们对此提出了比较方法和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对策。我在这里不能详细加以说明，好在我前年在东京的一个讨论会上发表的《人的研究在中国》的发言中已经答复了这个问题，这里不再重复了。

这里我想说的是社区研究的理论基础是直接和 1935 年到燕京大学讲学的布朗有关的。他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开讲的人类学课程，就称作为比较社会学。社区研究接纳了布朗对社区的系统论和整体论的看法。我想只有从每个社区根据它特有的具体条件而

形成的社会结构出发，不同社区才能互相比较。在互相比较中才能看出同类社区的差别，而从各社区具体条件去找出差别的原因，进一步才能看到社区发展和变动的规律，进入理论的领域。

魁阁的社区研究从 1938 年到 1946 年，一共只有 8 年，而且后来的三年由于教课任务的加重和政局的紧张，我自己的实地调查已经无法进行。所以魁阁的工作只能说是社区研究的试验阶段。这种工作一直到 80 年代才得到继续。

魁阁时期的社区研究基本上是瑶山和江村调查的继续。如果把这两期比照看看，这一期除了继承整体性和系统性之外，加强了比较研究同理论挂钩的尝试。先说比较研究。如果要从本人的经历中寻找比较研究的根源，还应当追溯于我在清华研究院里补读比较解剖学和跟史禄国学习的人体类型分析。我们既然已在内地看到了和沿海不同农村在社会结构上存在着差异，我们更有意地地在昆明滇池周围寻找条件不同的农村进行研究，用以求证我们认为凡是受到城市影响的程度不同的农村会发生不同的社会结构的设想。这种方法上的尝试，我在 *Earthbound China* 一书的最后一章里作了系统的申说。这不能不说是魁阁的《云南三村》比了瑶山和江村的研究在方法及理论上提高了一步。

比较研究的尝试在另一方面更使我偏向于本文开始时提出的对社会的第二种看法，就是把社会作为一个本身具有其发展的过程的实体，这种思路难免导致“只见社会不见人”的倾向，也进一步脱离马氏的以生物需要为出发点的功能论，而靠近了布朗对重视社会结构的功能论了。

五

魁阁后期，由于兼任云大和联大两校的教职以及当时政治局

势的紧张，我不便直接参与实地调查，所以有更多时间从事讲课和写作。也可以提到，当时直线上升的通货膨胀使个人的实际收入不断下降，而我又在 1940 年成了一个孩子的父亲。我们在呈贡的农村里赁屋而居，楼底下就是猪圈，生活十分艰苦。因之，我不能不在固定的薪金之外，另谋收入，我这个书生能找到的生活补贴，只有靠我以写作来换取稿费。我在当时竟成了一个著名的多产作家。大后方的各大报纸杂志上经常发表我的文章，我几乎每天都要写，现货现卖，所得稿费要占我收入之半。写作的内容，不拘一格，主要是我课堂上的讲稿和对时事的评论以及出国访问的杂记。这段时间里所发表的文章后来编成小册子发行，其中比较畅销的有《初访美国》、《美国人的性格》、《重访英伦》、《内地的农村》、《乡土中国》、《乡土重建》、《生育制度》、《民主·人权·宪法》等。

这许多为了补贴生活而写下的文章里，其实更直接暴露我的思想，而我的思想也密切和我的学术思路相联系的。现在回头翻阅一看，其中很明显地贯串着我在上面所说的向社会实体的倾斜。我的三本访外杂写，实际上是把英、美的社会分别作为各具个性的实体所谓民族性格来描述的。尽管其中我常用具体看到的人和事作为资料，我心目中一直在和中国社会做比较。比如找把住处经常迁移的美国城市居民和中国传统的市镇和乡村的居民相比较而以“没有鬼的世界”来表明美国社会的特点。文内尽管有人有事，而实际是把它们做文化的载体来处理的。

我在美国时特别欣赏 R. Benedict 的《文化模式》和 M. Mead 的《美国人的性格》，我根据 Mead 这本书，用我自己的语言和所见的事实写出了《美国人的性格》一系列文章，并编成一册。这里所说的社会性格都是超于个人而存在和塑型个人的社会模式。这不是把社会看成了超人的实体的思路么？我又写出了《乡土中国》一系列文章，也许可以说和《美国人的性格》是姐

妹篇，现在看来，这种涂尔干式的社会观已成了我这一段时间的主要学术倾向。

上面已提到这种倾向在理论上表白得最清楚的是在 1946 年完成那一系列《生育制度》的文章。我明确地否定家庭、婚姻、亲属等生育制度是人们用来满足生物基础上性的需要的社会手段。相反地，社会通过这些制度来限制人们满足生物需要的方式。这些制度是起着社会新陈代谢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是为了解决生物界中人的生命有生有死的特点和社会实体自身具有长期绵续、积累和发展的必要所发生的矛盾，而产生的社会制度。我说如果从以满足两性结合的生物需要作为出发点，其发展顺序应当是说由于要满足两性结合的需要而结婚生孩子，接着不得不抚育孩子而构成家庭，又由子孙增殖而形成亲戚，这种一环扣一环可说是“将错就错”形成的社会结构。如果反过来看由于社会需要维持其结构的完整以完成其维持群体的生存的作用，必须解决其内部成员的新陈代谢的问题，而规定下产生、抚养新成员办法，而形成了“生育制度”。这个制度并不是用来使个人满足其生物上性的需要，而是用婚姻和家庭等规定的制度来确定夫妻、亲子及亲属的社会角色。使人人能按部就班地过日子。这两种对“生育制度”的不同理解正好说明功能派里两派的区别。

我这本《生育制度》是在 1946 年和潘光旦先生一起住在乡间时完成的，他最先看到我的稿纸，而且看出了我这个社会学的思路，和他所主张的优生强种的生物观点格格不入。当我请他写序时，他下笔千言，写了一篇《派与汇》的长文，认为我这本书固然不失一家之言，但忽视了生物个人对社会文化的作用，所以偏而不全，未能允执其中。

他从社会学理论发展上提出了新人文思想，把生物人和社会人结合了起来，回到人是本位，文化是手段的根本观点。这种观点我们当时并没有会通。而且我们当时的处境并没有条件和心情

展开学术上的理论辩论。我把全书连着这篇长序交给商务印书馆出版后，自己就去伦敦访问。1947年回国，我和潘先生虽则同住一院，但却无心继续在这个社会学的根本观点上进一步切磋琢磨，这场辩论并没有展开，一直被搁置在一旁。经过了近半个世纪，潘先生已归道山，我在年过八十时才重新抬起这个似乎已尘灰堆积的思绪，触起了我的重新思考，这已是90年代的事了，留在下面再说。我这本《生育制度》实际上结束了我学术历程的前半生。

1947年在英国访问以及回国之后到1949年北平解放，这段期间从我写作上说我曾称之为“丰收期”，北平的《中建》周刊、上海的《观察》周刊和《大公报》经常有我的文章，但我所写的主要是时事评论，其中固然表达我对社会的基本观点，而且通过《观察》及三联书店出版了我在抗战时期所发表的文章的集子，一时流传很广，成了当时的一个多产作家，但是回头来看，这段时间，在学术思想上并没有什么新的发展。

六

如果限于狭义的学术经历来说，我觉得可以把《生育制度》一书来作为我前半生学术经历的结束。自从1930年进入社会学园地时算起到1949年解放，一共是大约20年。接下去的30年是一段很不寻常的经历，包括解放、反右和“文革”的中国大变革时期。这一段时期里我的思想情况在Current Anthropology杂志发表的1988年10月我和Pasternak（巴博德）教授的谈话记录中有比较直率的叙述，这里不用重复了。但是联系上面所提出有关对社会性质的根本问题时，我觉得有一些补充，说一说我近来才有的一点新的体会，足以说明我后半生学术思路的若干变化

的由来。我越来越觉得一个人的思想总是离不开他本人的切身经历。我从解放后所逢到的我称之为不寻常的经历，必然会反映在我其后的学术思想上，以致立身处世的现实生活上。我如果完全把这段时间作为学术经历中的空白是不够认真的。

在比较这一生中前后两个时期对社会本质的看法时，发现有一段经历给我深刻的影响。我在前半生尽管主张实地调查，主张理论联系实际，但在我具体的社区调查中我始终是一个调查者的身份去观察别人的生活。换一句话说，我是以局外人的立场去观察一个处在另一种生活中的对象。我自身有自己的社会生活，我按着我自己社会里所处的角色进行份内的活动。我知道我所作为是在我自己社会所规定的行为模式之内的，我不需犹豫，内心不存在矛盾，我所得别人对我的反应也是符合我的意料的，这就是说我在一个共同的社会结构中活动。尽管这个社会结构也在变动中，这种变动是逐步的，而且是通过主动能适应的变动。我并不觉得自己和社会是对立物。

但是在解放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自己所处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动，那就是说构成这个结构的各种制度起了巨大变动，在各个制度里规定各个社会角色的行为模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动。表演得最激烈的例子发生在“文革”的高潮中。作为一个教授的社会角色可以被他的学生勒令扫街、清厕和游街、批斗。这种有着社会权力支持的行为模式和“文革”前的教授角色的行为规范是完全相悖的。当然“文革”这种方式的革命是很不寻常的，但是在这不寻常的情景中，社会的本来面目充分显示了出来。我觉得仿佛是置身于一个目的在有如显示社会本质和力量的实验室里。在这个实验室里我既是实验的材料，就是在我身上进行这项实验。同时，因为我是个社会学者，所以也成了观察这实验过程和效果的人。在这个实验里我亲自觉到涂尔干所说“集体表象”的威力，他所说的集体表象，就是那“一加一大于

二”的加和大的内容，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社会的本质。这个试验证实了那个超于个人的社会实体的存在。

但就在同时，我也亲自感觉到有一个对抗着这个实体的“个人”的存在。这个“个人”固然外表上按着社会指定他的行为模式行动：扫街、清厕、游街、批斗，但是还出现了一个行为上看不见的而具有思想和感情的“自我”。这个自我的思想和感情可以完全不接受甚至反抗所规定的行为模式，并做出各种十分复杂的行动上的反应，从表面顺服，直到坚决拒绝，即自杀了事。这样我看见了个人背后出现的一个看不见的“自我”。这个和“集体表象”所对立的“自我感觉”看来也是个实体。因为不仅它已不是“社会的载体”，而且可以是“社会的对立体”。这个实验使我看到了世界是可以发生这种不寻常的社会结构革命性的变动。这种变动可以发生在极短的时间里，但是极为根本地改变了社会结构里各制度中社会角色的行为模式。为期十年的“文革”在人类历史上是一次少见的“实验”，一次震度极强烈的社会变动。我的学力还不够做更深入的体会和分析，但是我确是切身领会到超生物的社会实体的巨大能量，同时也更赤裸裸地看到个人生物本性的顽强表现。

从这次大震动中恢复过来，我初步体会是做个社会里的成员必须清醒地自觉地看到社会结构的不断变化，尽管有时较慢较微，有时较快和较为激烈。处在社会结构中的个人，应当承认有其主动性。个人的行为既要能符合社会身份一时的要求，还得善于适应演变的形势。学术工作也是个人的社会行为，既不能摆脱社会所容许的条件，也还要适应社会演进的规律，这样才能决定自己在一定历史时期里应当怎样进行自己的学术工作。这种自觉可说是一方面既承认个人跳不出社会的掌握，而同时社会的演进也依靠着社会中个人所发生的能动性和主观作用。这是社会和个人辩证关系，个人既是载体也是实体。

这点理论上的感受，虽则一直潜伏在我的思想里，在我“文革”后的公开讲话中也有所表达，但是还不能说已充分落实在后半生的学术工作中。“只见社会不见人”还是我长期以来所做的社区研究的主要缺点。

七

下半生的学术生涯，可以说从 1978 年开始，直到目前一共有 15 年。刚从“不寻常”的经历中苏醒过来时，我就想既然得到了继续学术研究的机会，就该把 30 年丢下的线头接下去，继续从事社区研究，而且这时我对社区研究本身的功能有了一些更明确的看法，正如我在和巴博德教授谈话中所说的，我们做的研究实际上是发挥人特有的自觉能力，成为自然演化的一种动力。人类社会是不断发展的，表现为生产力的不断增长。我们就得有意意识地把中国社会潜在的生产力开发出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个进化观点我是早就接受了的。解放之后我又接受了当时的马列主义学习，认识到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基本推动力。这种思想和我早日翻译的乌格朋的《社会变迁》中强调科技的发展也正相合。我的《江村经济》调查就是接受了我姐姐改革蚕丝生产技术的启发而进行的。所以我在 80 岁生日那天以“志在富民”四字来答复朋友们要求我总结我过去 80 年所作所为的中心思想。“志在富民”落实到学术工作上就是从事应用科学，所以我把调查看作应用社会学。这一个思路，我有机会于 1980 年 2 月在美国丹佛接受应用人类学会授予我马林诺斯基奖的大会上发表的《迈向人民的人类学》讲话时，得到公开发表的机会。

1981 年我又接到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我赫胥黎奖的通知，并由我的老师 Firth 建议，要我在会上介绍江村在解放后的变化。

为此我特地三访江村进行一次简短的调查。就是这次调查引起了我对当时正在发生的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研究兴趣。从那时起我就抓住这个题目不放，组织了一个研究队伍，跟着农村经济发展的势头，从江村一个村，扩大到吴江县的七个镇。然后一年一步从县到市，从市到省，从一个省到全国大部分的省；从沿海到内地，从内地到边区，不断进行实地观察，直到现在已经有10年多了。我每去一地调查常常就写一篇文章，记下我的体会。10年来已积了近40篇，其中大部分已收集在今年出版的《行行重行行》一书中。这一系列文章还在继续写下去，可说是我下半生的主要学术方向。

这一系列文章在理论上说是以《江村经济》为基础的。把社区的经济发展看成是社区整体发展中的一个主要方面，并和其人文地理及历史条件密切联系起来，进行分析。我看到在不同条件下社区发展所走的路子不同，于是我又应用比较观点分出不同模式，并提出“多种模式，因地制宜，随机应变，不失时机”的发展方针。更从城乡结合的基础上升到经济区域的概念，逐步看到整个中国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区位格局。这种社区研究是以农民自己创造的社会结构为出发点，分析这种结构形成的过程，它所具有的特点，并看出其发展的前景。这是实事求是的看法，而其目的是在使各地农民可以根据自身所处的条件，吸取别地方的经验，来推动自身的发展。所以可以说这种社区研究是应用社会学，一门为人民服务的社会科学。

回顾我这60年的研究成果，总起来看还是没有摆脱“只见社会不见人”的缺点。我着眼于发展的模式，但没有充分注意具体的人在发展中是怎样思想，怎样感觉，怎样打算。我虽然看到现在的农民饱食暖衣，居处宽敞，生活舒适了。我也用了他们收入的增长来表示他们生活变化的速度。但是他们的思想和感情、忧虑和满足、追求和希望都没有说清楚。原因是我的注意力

还是在社会变化而忽视了相应的人的变化。

翻阅我这段时间里所发表关于社会学的言论时，我看到我思想确是已经改变了一些原来对个人和社会关系的看法，我不再像在《生育制度》中那样强调社会是实体、个人是载体的论调，而多少已接受了潘光旦先生的批评，认识到社会和人辩证统一体中的两面，在活动的机制里互相起作用的。这种理论见于我在1980年所讲的《社会学和企业管理》及《与医学心理学者谈社会学》里。

《社会学和企业管理》是我在第一机械工业部的讲话，在这讲话里我提到了1944年我在哈佛商学院遇见的埃尔顿·梅岳教授，他曾在芝加哥的霍桑工厂里研究怎样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问题，做了一系列实验。起初他采取改变各种工作条件，如厂内的光线、休息的时间等，来测验工作效率是否有相应的提高，结果确是上升了。但梅岳认为并没有解决提高工作效率的关键问题。他接着再把实验倒过来做，一一取消了这些客观条件的改变，出于大家意料之外的，工作效率却依然上升。他从中得到了一个重大的发现，原来不是客观条件的改变促使了工作效率的上升，而是他的实验本身起了作用。因为工人参与了这个实验，自己觉得在进行一项有意义的科学工作，从而发现了自己不仅是一个普通拿工资干活的机器，而是一个能创造科学价值的实验者了。这个转变提高了他们的积极性。梅岳在这里发现了普通“工人身份”后面潜伏着一种“人的因素”，这个因素是工作效率的泉源，梅岳的“人的发现”改变了美国的工厂管理。联系我们所关心的问题来说，他是使社会身份，即社会规定的行为模式，背后这个一直被认为“载体”的个人活起来了。使行为模式变成人的积极行为的是潜伏在社会身份背后的个人。其实我们在舞台上评论演员时，总是看他是否进入了角色。进入了角色就发挥出演员的积极性，演好了戏，演唱的好坏还是决定于演员本人。明白这

一点，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也就明白了。

上面提到的第二篇讲话是我在北京医学心理学讲习班上的讲话。我最初的题目是《神兽之间》，意思是说人既是动物而又已经不是动物，人想当神仙，而又当不成神仙，是个两是两不是的统一体。社会总是要求“满街都是圣人”，把一套行为规范来套住人的行为，可是事实上没有一个人是甘心情愿当圣人的，即便是我们的至圣先师孔老夫子也是到了快死的 70 岁时方才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矩”。但是人又不能不在社会结构里得到生活，不能不接受这个紧箍咒，小心翼翼，意马心猿地做人，所以我用了 Freud 所说的三层结构来说明人的心理构成：一是 id（生物性的冲动）、二是 ego（自己）、三是 super - ego（超己），id 就是兽性，ego 是个两面派，即一面要克己复礼地做个社会所能接受的人，一面又是满身难受地想越狱当逃犯。Super - ego 就是顶在头上，不得不服从的社会规定的身份。我当时指出神兽之间发生的形形色色的矛盾正是（精神病）医生要对付的园地，神兽之间有其难于调适的一面，但是普通的人并不都是要挂号去请教精神病医生的。那就是说神兽之间可以找到一个心安理得做人的办法的。于是我得回到潘光旦先生给我《生育制度》写的序言里所提出的中和位育的新人文思想。

新人文思想依我的理解就是一面要承认社会是实体。它是个人在群体中分工合作才能生活的结果，既要分工就不能没有各自的岗位，分工之后必须合作，岗位之间就不能不互相配合，不能没有共同遵守的行为规则。有了规则就得有个力量来维持这些规则。社会是群体中分工合作体系的总称，也是代表群体维持这分工合作体系的力量。这个体系是持续的超过于个人寿命的，所以有超出个人的存在、发展和兴衰。社会之成为实体是不可否认的。但是社会的目的还是在使个人能得到生活，就是满足他不断增长的物质及精神的需要。而且分工合作体系是依靠个人的行为

而发生效用的，能行为的个人是个有主观能动性的动物，他知道需要什么，希望什么，也知道需要是否得到了满足，还有什么期望。满足了才积极，不满足就是消极。所以他是个活的载体，可以发生主观作用的实体。社会和个人是相互配合的永远不能分离的实体。这种把人和社会结成一个辩证的统一体的看法也许正是潘光旦先生所说的新人文思想。

我回顾一生的学研思想，迂回曲折，而进入了现在的认识，这种认识使我最近强调社区研究必须提高一步，不仅需看到社会结构，而还要看到人，也就是我指出的心态的研究。而且我有一种想法，在我们中国世代代这么多的人群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经历了这样长的历史，在人和人中和位育的故训的指导下应当有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不仅保留在前人留下的文书中，而且应当还保存在当前人的相处的现实生活中。怎样发掘出来，用现代的语言表达出来，可能是今后我们社会学者应尽的责任。对这个变动越来越大、全世界已没有人再能画地自守的时代里，这些也许正是当今人类迫切需要的知识。如果天假以年，我自当努力参与这项学术工作，但是看来主要是有待于后来的青年了。愿我这涓滴乡土水，汇归大海洋。

1993年7月24日

中央民族访问团追记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领导人深切关怀分散聚居在全国广大地区的少数民族。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派出“中央访问团”，分别到西南、西北、中南和东北各地区，深入少数民族群众，宣传共同纲领规定的民族平等、团结的政策，选择有条件的地方试行民族区域自治，并了解各民族的实际情况，听取他们的要求和意见，进一步密切中央和少数民族群众的关系。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为此从所属各委、部和其他部门抽调了大批干部，先后组成四个访问团。首先组建了以刘格平为团长的中央西南访问团，于1950年7月出访。紧接着组建了以沈钧儒为团长的西北访问团。1951年、1952年，又分别组建了以李德全为团长的中南访问团和以彭泽民为团长的东北访问团。每个访问团都以省为范围建立若干分团。每个分团还配备了文工队、电影放映队、医疗队和调查研究人员，携带了大批锦旗、礼品和药品等。访问团要力求扩大接触面，直接与居住在偏僻地区的少数民族同胞见面、问候。

国家领导人十分重视民族访问团的组建和工作。毛泽东主席、朱德和刘少奇副主席、周恩来总理都亲笔题词，制成锦旗，为访问团开道。这些锦旗送到各地少数民族同胞手里，都被视为最珍贵的宝物。毛主席的题词“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照亮了各族人民团结前进的光明大道。

访问团出发之前，周总理亲自召见大家，再三叮嘱，宣传民族政策要以身作则，要在自己一举一动上表现出民族平等。周总理不仅给大家讲民族政策，而且指明怎样为实现民族政策做工

作。他要大家记着少数民族过去是受过民族压迫的，要他们相信我们的政策，先得承担我们民族里曾经有过压迫少数民族的错误，向少数民族赔个不是。当时访问团里有些青年成员觉得承担不是自己犯的过失，有点委屈。周总理耐心向他们讲了以心换心的道理：真的团结必须大家一条心，任何一方心里还有疙瘩，团结就不牢固。我们赔个不是就得了人心。后来大家在访问实践中，才完全明白了这些道理。少数民族同胞看到“毛主席派来的人”，对他们有礼貌，平等相处，还为过去有些汉人对不起他们赔不是，就说听毛主席话的人是“新汉人”，“新汉人”和少数民族是一家人。事实证明，周总理是真正懂得以德服人、以心换心的人。邓颖超同志也亲自看望访问团成员，嘱托大家“多多了解各族人民生活疾苦，多多带回各族人民特别是妇女同胞的意见”。中央领导同志对民族工作的深切关怀，给访问团成员以莫大鼓舞。

访问团的工作，实际上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解放和建政工作的继续。解放军和地方干部的清匪、建政等工作，为访问创造了条件，并做出了贯彻民族政策的榜样。访问团得到了他们的大力协助和指导，使工作得以顺利开展。西南访问团抵达重庆后，西南军政委员会刘伯承主席和邓小平副主席亲自为全体团员作报告，讲述了红军长征路过云、贵、川时，怎样正确执行民族政策，得到各少数民族群众的拥戴和协助，从而顺利通过这些地区的切身经历，鼓励访问团成员积极工作。我本人当时是西南访问团的成员，听了报告深为感动，立志要为我国少数民族的发展贡献力量。

访问团每到一地，少数民族群众都纷纷从数十里、甚至百里以外赶来，迎接“毛主席派来的人”。成千上万的人聚会在露天广场上，风雨无阻，欢呼声震四周山谷，来往回响，经久不息。晚上放映电影时，火把接连从远处山头蜿蜒而下，像是条条火龙

从天而降，当银幕上出现毛主席时，万口争呼，山摇地动。事后还争相传诵看到了毛主席大救星。我记得在贵州毕节的一天晚上，我们看到不少观众衣不蔽体，当场便分送布匹、衣裤，双方都激动得热泪盈眶，相抱不放。这时真正体会到了“以心换心”的真情实意。

访问期间，像这样感人的事例不胜枚举。医疗队挨门上户为群众治病，有时半夜里还跋山涉水去救护急症病人，被称为救命恩人。在广西三江山区访问，正值当地闹饥荒，群众已断炊了。访问团立即组织送粮上山，山下少数民族同胞争相肩挑运送，一片友爱互助之情难以形容。

更使人难忘的是，访问团离去时，少数民族兄弟姐妹依依难舍的情景，真是唱不完的歌，跳不完的舞，喝不完的酒，说不尽的情。总的一句话，是要把“毛主席万岁”的呼声越过千山万水送到北京毛主席的耳边。少数民族同胞心向亲爱的祖国，使我们深切感到用真情实意牢牢结在一起的民族大家庭，千年万岁永不会分离。

少数民族青年大多能歌善舞。访问团里的文工团，在联欢会上和他们一起表演节目，还虚心学习少数民族歌舞，用他们喜闻乐见的形式表演民族友好团结的形象，使他们感受到民族平等参与的欢乐。许多爱好歌舞的少数民族青年男女坚持要求参加访问团的文工团，从而启发了访问团领导，做出筹建全国性民族文工团的决定。这就是后来民族歌舞团成立的序曲。

访问团在各地广泛宣传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同时选定重点地区进行实验。如在贵州清水江两岸苗族聚居区，访问团协助当地政府，建立了凯里苗族自治区；在广西的三江地区成立了龙胜多民族联合自治县等。这些试点，为全国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取得经验，鼓舞了少数民族当家做主的积极性，加强了民族团结。

新中国成立伊始，全国有多少民族，有哪些民族问题，还没

有人能做出明确答案。各访问团的调查组在现场对当地民族进行调查研究，使我们对全国少数民族的基本情况有了一个初步的全面认识。这是这次大规模访问的重要成果之一。通过调查发现各地少数民族自称的族名有几百个之多。由于在悠久的历史时期，各族人民长期流动和分散迁徙，在不同地区定居后，又过着不同程度的封闭生活，各自发展了不同的方言，因而有不少同一来源的民族，分出了许多支派，甚至互不承认是同一民族了。这种复杂情况就产生了“民族识别”的问题。综合各访问团调查的情况，可以初步肯定下来的不同民族有 30 多个，留下有待识别的还为数很多。

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程度同样十分复杂，有人甚至说，真像一部活的社会发展史，从原始部落社会，奴隶社会，到各种形式的封建社会都有，有些还有了资本主义因素。这许多不同起点的民族，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便产生了一个怎样处理不同情况的少数民族的发展问题。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因势利导，从实际出发，分别采取群众能接受的方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我们政策的基本精神，但首先需要了解各民族的历史和社会发展状况。访问团在初步调查了解的基础上，提出了继续深入调查研究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任务，成为 1956 年人大常委会组织全国少数民族历史调查工作的来由，也是后来建立民族研究机构的先声。

四个访问团，先后历时两年半的访问活动，据估计累计行程超过 8 万公里，几乎遍及全国的少数民族地区，不同程度上和各少数民族都有了亲切的接触。访问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地区之广，民族之多，是中国历史上所没有、也不可能有的。这是新中国民族工作的一项重大举措，对消除民族隔阂，建立民族友谊，加强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团结，增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凝聚力，起到现实和长远的影响。

农村、小城镇、区域发展

——我的社区研究历程的再回顾

我一生的学术工作是以农村调查开始的，其后进入小城镇研究，近年来又开始区域发展的探索，统称为一生社区研究的历程。流年似水，转眼已经 60 年了。当我进入 85 岁的时刻，似乎值得自己回头反省一下。由于我已在 1985 年发表过《社会调查自白》，1989 年发表过《四年思路回顾》，这次反省只能说是再回顾了，但一个人的思想总是多少有一条前后连贯的理路，所以还得从头说起，其中有一点重复在所难免。

我这一生有个主题，就是“志在富民”。它是从我学术工作中产生的，我的学术工作也是围绕着这个主题展开的。

1935 年偕我妻王同惠进入广西大瑶山调查瑶族农村，合写《花篮瑶社会组织》。1936 年在我家乡的一个农村里进行调查，后来写成《江村经济》一书。我在农村实地调查里从亲眼所见的事实产生了一种想法：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就是农民吃饭穿衣的问题，内忧外患使他们难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陷入不足温饱的极端贫困境地。当时的历史现实，促使我发生了尽力使中国农民脱贫致富的使命感，也为我后来一生“志在富民”的追求扎下了根子。

40 年代我曾在云南内地进行农村调查，与张之毅同志合写

成《云南三村》。其后，我曾应《世纪评论》之约，连续写了十几篇讨论中国农村社会特点的文章。这些文章分期连载后，集为《乡土中国》一书。我还在《大公报》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农村复兴的文章，后来被《观察》周刊社汇编成了《乡土重建》单行本。我在这本书里提出了农民温饱的“小康水准”、“现代工业技术下乡”、“乡土工业”等问题和想法，都是围绕中国农民脱贫致富这个主题做的文章。

全国解放后，50年代后期，我1957年重访江村。看到当时农业有了发展，粮食增产，感到高兴。但是，也看到副业被忽视了，乡村工业没有得到恢复，农民虽有土地可耕种，却只能搞粮食，手里没有钱花。市镇上的商品交换日益萧条，小城镇也萎缩了，这使我忧心忡忡。我在《重访江村》一文中建议恢复发展副业和乡土工业，在村子里办小型工厂，希望促进农民尽快富起来。

意外的政治运动打断了我这种发展农村经济的愿望。“反右”斗争中，我被划成“右派”，失去了继续进行学术研究的机会。从那时起直到“文革”结束，我这篇富民的文章做不下去了。

1966年到1976年的全国大动乱，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直到拨乱反正后的1980年，农民的人均谷类配额仅约有580斤。以这样只够糊口的粮食来维持农民全部生活费用，显然远远不够。何况各地产量并不平衡，大部分地区的农民所得远低于这个平均数，他们依然没有摆脱贫困状态。这样的情状，加上周边一些国家经济起飞势头的映衬，使中国农民实现温饱、脱贫致富的问题变得更加迫切了。

1980年，我恢复了名誉和正常生活，从1952年就被取消的社会学也得到了恢复，我有条件拾起被迫中断20多年的“为中国农民能富起来做点什么”的实践课题，重新开始农村调查。

我急切地想实地看看我曾经十分熟悉的江村经过这 20 多年风雨后的样子。1981 年，我三访江村，高兴地看到了江村当时全年人均收入已接近 300 元，位于全国前列。而在 1978 年，江村的人均年收入还只有 114 元。为什么这个村子的农民能在短短三年中这么快地富裕起来？事实就在眼前：家庭副业恢复了，集体小工厂办起来了。当地农村经济结构中出现了农、副、工互相结合的现实和进一步发展的趋势。

让我特别兴奋的一点，是在江村看到了我几十年前所想像的目标已经开始在现实生活中出现，而且今后中国经济的特点也显露了苗头。中国人口有 10 多亿，农村人口又占绝大多数，在这样的国情下，我认为多种多样的工业不宜集中在少数城市，而应当设法尽可能分散到广大农村里边去，我称之为“工业下乡”。工业下乡的意图，是使在国家经济结构中增加工业比重时人口不至于过分集中，甚至可以不产生大量脱离农村的劳动者，而在农工相辅、共同繁荣的基础上实现农村工业化，城乡一体化。这可能是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不同于西方工业国家发展模式的一个基本区别，也是我看到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可行道路。

江村的变化不是孤立的，家乡吴江县的各个集镇都表现出活跃的迹象，商品交换多了起来，城镇居民普遍增加。其中有名的吴江七大镇正在从先前冷冷清清的衰落景象里抬头挺胸，一股欣欣向荣的生机吸引着我。我看到了一种值得特别注意的变化，这就是由于乡镇工业办得好而富裕起来的乡村，农业收入所占的比例不断降低，绝对数字却在明显增长，增长速度也比工业不发达的乡村要快。这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事实，它向世界展示出中国在发展经济道路上的一个崭新特点：中国社会的工业化是在农业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的，它又反过来促进了农业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推动农业走上了现代化道路。

把这个特点和西方早期工业化的历史做一个简单对照，中国

乡镇工业的意义可以看得更清楚。在欧洲工业化初期，新兴的机器工业集中到了都市，农村却濒于破产，农民不得不背井离乡，涌进城市，充当新兴工业的劳动后备军。西方工业化的发展是以农村的萧条和崩溃为代价的，这是西方工业化道路的一大特点。中国当然也要顺应历史潮流，实现工业化，但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绝不可能走西方的工业化道路。我们不能想像上亿乃至数亿的农民涌入城市来发展工业，中国的工业化只能走适合自己特点的路子。农民在农业繁荣的基础上，利用来自土地的积累兴办乡镇工业。这种工业也以巩固、促进和辅助农业经济为前提，农副工齐头并进，协调发展。这条工业化道路已经切切实实地开始出现在我们面前。它不是从理论上推论出来的成果，而是中国农民在改革实践中的新创造。

在这个值得大书特书的变革中，由于乡镇企业的发展，在比较发达的地区，不论过去属于哪一类型的乡镇都先后开始走上了工业化道路，发生了以乡镇企业为基础的小城镇，而且生机勃勃，引人注目，令我感动。在社会发展现实的推动和启发下，我开始了调查研究小城镇的课题。

二

1982年以后，我的社区研究领域比三四十年代已经扩大。首先是从农村扩大到小城镇，提高了一个层次，把小城镇看成是城乡结合部，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研究的地域也从家乡的一个村扩大到吴江七乡镇，又到整个吴江县，再扩大到苏南地区。到1984年，我走出苏南，进入苏北，对苏南、苏北进行了比较研究。很明显，我这一时期研究地域的扩大有意无意地是顺着行政区域的层级进行的。有意思的是，对于特定行政区域内的经济和

社会现象的观察和研究，使我看到了超越行政区域的一种经济区域发展的事实，这就是说我的经济区域的概念在观察现实经济生活中开始发芽茁长了。

这要从“模式”这个概念的发生说起。

在对苏南、苏北的比较研究中，我看到苏北的乡村里工业化程度明显比苏南低，小城镇的兴起也比苏南慢。对于两地在发展上的差别，起初我以为是起步的先后不同。后来我意识到，地区间可以由于客观条件的不同而走上不同经济发展路子。在总结苏北调查的《小城镇——苏北初探》一文中，我把思想上酝酿的一个概念提了出来，这就是发展的“模式”。我具体提出了“苏南模式”这个名词。

模式这个概念是从发展方式上说的。因为各地所具备的地理、历史、社会、文化等条件不同，所以在向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采取了不同的路子，这是可以在实际中看到的。不同的发展路子就是我所提出的不同发展模式。“模式”这个新概念，来自于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客观历史事实。让这样的概念再回到正在成长的新事物中，用它来认识现实，也就能把问题说得更清楚一点。

比如，在对苏南模式所做的研究里边，我把位于江北的南通划到了苏南经济区，让它和苏州、无锡、常州并称，道理就在于南通有和苏、锡、常大体相同的经济发展背景和现实发展路子。苏、锡、常、通都位于长江下游，都是由于乡镇工业的兴起而进入工业化时期的。这几个地方乡镇工业的来历和发展机遇也类似。它们的前身是人民公社时期的社队工业，即公社和生产大队、生产队办的工业。公社和生产大队、生产队是集体经济的实体，它有权在社员的劳动所得中积累一部分资金，用来兴办集体公有的工业，叫社队工业。到80年代初江苏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苏南的农民没有把社队企业分掉。在改制过程中，乡和村的人民政府替代先前的人民公社和生产队管理这份

集体经济，通过工业保存下了集体经济实体，又借助上海经济技术的辐射和扩散，以乡镇企业为名而继续发展。苏、锡、常、通的乡镇企业发展模式是大体相同的，我称之为苏南模式。我从经济发展的模式出发把地处长江北岸的南通划进“苏南”的范围，从概念上说，我已把心目中的经济区域摆脱了一般的以江为界的地理区域。

1986年，我到浙江温州考察。温州以它明显有别于苏南的发展方式进一步启发了我，使我对“发展模式”这个概念有了更深入一步的认识，明确了它的意义是指：“在一定地区，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特色的发展路子。”这里所说的“地区”，既可能是在某一行政区域范围内，也可能包括几个不同行政区划的地域范围。但是在这时候，我还没有提出“经济发展区域”的概念。

客观发生的历史事实使我产生了“模式”这个概念。新概念的形成反映着客观实际的变化，是实践的产物，同时又成为认识工具，帮助进一步认识新生事物和促进实践变革。发展模式的概念把我的研究工作推进了一步，要求我从整体出发，探索每个地区发展的背景、条件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与其他地区相区别的发展特色，这就促使我进入不同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

各种模式之所以能相互比较，是因为它们是在一个共同的基础上出发，又向同一目标发展的。共同基础是我们传统的小农经济，同一目标是脱贫致富，振兴民族经济。80年代，各地农村先后进行了农业体制改革，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因此得到了支配自己劳动的自主权。他们在承包的土地上经营农业之外，可以主动从事其他生产活动，以增加收入，这就大大调动了农民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他们千方百计、千辛万苦、千山万水地去开辟生财之道。

各地农民居住的地域不同，条件有别，所开辟的生财之道必

定多种多样，因而形成了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同模式。我在观察和研究这些不同的发展模式时，没有忘记它们只是解决增加农民收入这同一个问题的不同答案。对各种模式进行比较研究，也就是要说明它们有什么不同和为什么不同。具备了这种知识，各地农民都可以因地制宜地选择生财之道，争取早日脱贫致富。

如前所说的苏南发展的路子，是通过公社这个集体经济的积累，有足够的资金一步到位地把工业引进了农村，借着农村体制改革的机遇，快速地发展起乡镇企业，带动了经济的整体发展。但具备苏南这样条件的地区并不多。那些在公社的集体经济实体解散后再要办工业的地方，就得从其他渠道取得兴办工业的启动资金了。温州人想出了另外的办法。

温州原来也是个穷地方，人多地少，单靠农业连温饱都难以维持。当地农民就大批到外地去打零工、卖手艺，如木匠、裁缝、修鞋、弹棉花等。一时浙江人满天飞，远到边区的小镇上都有他们的足迹。这些人省吃俭用，把在外地挣得的钱寄回家乡积累起来，成了后来在温州一带发展家庭工厂的启动资金，然后通过广大的运销网络出售家庭作坊的产品，形成了“小商品，大市场”。我把这个发展方式称作“温州模式”。

在河南民权县，我看到当地发展了庭院经济。他们有两条“龙”。一是果农专业户以农户为单位种葡萄，乡镇的集体企业榨汁发酵，县里的国营酒厂最终制成果酒。这条龙带动了两万户农民致富。另一条龙是纺织品抽纱，一根针，一根线，不用油，不用电，老人小孩都能干。初级成品分散在千家万户，县工艺品厂集中收去修整、漂白、包装出口。每个农民可以利用农余时间借助抽纱为自己每月增加收入八九十元。这种利用千家万户的劳动力，让他们不出院不出村就能增加收入、脱贫致富的路子，我叫“民权模式”。这也就是后来我在河南信阳所看到的所谓“公司+农户”，这可能是适合中原农业地区经济发展的一条路子。

到苏北调查时，我又了解到了另一种生财之道。徐州的农民组成建筑队，到外地承包工程。大庆油田的厂房建筑，多年来几乎全是由苏北农村的建筑队承包的，依靠这种劳务输出挣回的钱，成了苏北农村工业化启动资金。后来我又在安阳听说林县也有“10 万大军出太行”，北京有些大建筑工程就是他们干的。林县的建筑队已经在北京打出了名气。林县人说，他们 80 年代出太行，90 年代富太行。类似徐州和林县这种专业性劳务输出的富民路子，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模式。

在靠近福州的福清县，我还看到一种由侨胞投资兴办各种企业，甚至成片开发工业小区的发展方式。这些用现代设备和先进技术建立起来的企业，和国际市场密切相连，奠定了更为宽广的发展前途，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开出了一条新路。我称之为“侨乡模式”。

模式这个概念的产生和发展，直接反映出我走出苏南以后观察范围的逐步扩大，比较方法的逐步深入。起初我是用小城镇的功能，如农贸中心、行政中心、工业中心等来区别不同“类型”。后来我看到乡镇企业的发展使许多过去不同类型的小城镇在主要功能上逐步趋于一致，于是我提出模式的概念作为比较研究的主要依据，但是在对各种模式的比较中，我并没有追问由每一种模式所覆盖的地区有多大，划出各种模式所占的区域，这是因为当时我还没有明确“区域发展”这个概念。

三

我的研究跨出了江苏省界之后，分成两个方向扩大范围。一路是沿海从江苏到浙江，经福建到广东的珠江三角洲，进而接触到广西的东部地区。另一路是进入边区，从黑龙江到内蒙古、宁

夏、甘肃、青海、云南等地。在我行行重行行的实地调查过程中，越来越多的见闻和思索使我注意到经济发展具有地理上的区域基础。各区域不同的地理条件包括地形、资源、交通和所处区位等自然、人文和历史因素，均具有促进和制约其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因而不同地区在经济发展上可以有不同的特点，具有相同地理条件也有可能形成一个在经济发展上具有一定共同性的经济区域。这些区域又可能由于某种经济联系而形成一个经济圈或地带。

1987年我在甘肃调查时，注意到在甘肃和青海交界的祁连山两麓居民除汉族外还有一些人数较少的少数民族，如裕固族、土族、撒拉族、保安族、东乡族等，还有人数较多的回族。它们处在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之间，形成了一道夹在藏族与汉族之间的民族走廊，在经济上，正是牧业和农业的接触和过渡地带。当时，我从回族聚居的甘肃临夏越过省界到青海的海东地区，一查历史知道这一带正是明代以来茶马贸易中心河州的故地。对这一带的情况有了初步了解后我产生了一个想法：要发展这个地区的经济，大概只有利用它特有的历史传统，恢复它作为农牧贸易的基地，把临夏和海东联合起来，共同发展成为向青藏高原发展贸易的中心。我把这个想法同当时两省的领导讲了，得到了他们双方的赞同，我就向中央提出了两地建立一个经济协作区来发展农牧两大区域之间贸易的建议。这个建议在我的研究工作中标志着进入区域发展研究的开始。经济区域发展的概念丰富了我社区研究的内容。这使我意识到，80年代后期，以此为标志，我的研究工作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

在东南沿海和西北地区进行的实地调查，使我感觉到沿海和内地特别是边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已经十分引人注目。从全国一盘棋和实现共同富裕的观点来看，有必要重视这个事关全局的东西差距。同时，我也想把在50年代被迫中断的民族研究工作在

大西北的调查中继续下来。

中国的少数民族大部分聚居在中国西部地区，东部和西部的差距里包含着民族经济水平的差距。西部的发展离不开少数民族的发展，通过西部的经济开发和社会发展，可以使当地的少数民族进入现代文明，与汉族共享繁荣，这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课题。

我在青海、甘肃两省和宁夏、内蒙古两个民族自治区做了实地考察后，看到从青海的龙羊峡到内蒙古的托克托河段的黄河上游沿岸地区，正处在西藏、新疆、宁夏、内蒙古四大民族自治区的中心，是西部的经济文化相对发达些的多民族聚居区。我认为它们可以走共同的发展路子，就是利用黄河水量充沛、落差巨大和沿河资源丰富的优势，可以水电为龙头，发展原材料工业和深加工工业，稳定发展农牧业。加快这里的开发，可以带动附近各民族自治地区的发展，改变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落后的面貌，巩固民族团结，缩小东西部的差距。为此，我提出了“共同规划，有无相济，互利互惠，共同繁荣”的原则，并在1988年向中央提出了《关于建立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建议》。建议得到中央和两省两区领导的支持。这个建议是从广大区域出发来设想怎样推进经济发展的路子，可以说是区域经济这一概念落到实处的例子。

回想起来，80年代中期我曾研究过珠江三角洲的发展。这地区借助邻近香港的地缘优势普遍发展“三来一补”企业，与香港形成前店后厂格局的特点。我称之为“珠江模式”。珠江三角洲的快速发展得益于香港经济的扩散。表现出经济区域的特点，启发我注意到珠江三角洲这个经济区域的发展当中存在着的中心与腹地的关系。在1988年考察南岭山脉时，我把开发这一片瑶族聚居区的希望寄托在珠江三角洲的经济扩散上，提出了以香港为中心的三个环形地带的经济区域格局。后来我又在《珠

江模式的再认识》一文中提出港珠经济一体化的观点，开始考虑以香港为中心的华南经济区的整体发展，这说明我的经济区域概念又深化了一步。

1989年，我到黄河三角洲做实地考察，并参加了由民盟中央和山东省政府联合召开的“黄河三角洲经济技术和社会发展战略研讨会”。站在黄河三角洲广阔的土地上，我想到了世界各国著名河口的三角洲多数已发展成为现代经济区，我国的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也都已成为国内的经济发达地区。想着这些，我似乎亲身感受到脚下地层中涌动着巨人的发展动力，也更清楚地意识到黄河三角洲是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一块亟待开发的宝地。同时又想起我提出过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建设，接着再提出建立黄河三角洲开发区的问题，正好首尾相应。

从经济区域发展的角度去考虑这块宝地的开发，我发现有一个基本的概念需要讨论，就是黄河三角洲的地域范围问题。过去说的黄河三角洲，实际上是黄河口的概念。三角洲应当是包括河口的一个经济区域，河口不等于三角洲这个经济区域。一个经济区域必须有口有腹。因之，在我看来，可以考虑把稍为靠里一点的潍坊、淄博划入黄河三角洲。历史上淄博是齐国的首都，是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现在也是一座很有实力的城市。潍坊的实力也可以。有了有实力的中心城市，再加上两市的乡镇为腹地，黄河三角洲的开发就能更有力量。从地理上看，好像这两地离河口远了一点，但从区域发展要有中心城市带动来讲，是合乎实际的。看来在考虑黄河三角洲的开发时，把限于河口的眼界扩展到经济区域的眼界是有必要的。

1990年，我结合此前多次对长江三角洲所做的调查研究，继续思索这块地方的区域发展和上海的地位问题。浦东开放开发以后，我提出了上海走什么路子的问题，是搞深圳式的上海，还是建设香港式的上海？寻找这个答案，要顾及许多因素，我以为

应充分注意区域发展的大局和长远利益对上海的要求。

当时在大陆建设几个香港的设想已经提出来了。这使我想起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就提出在长江三角洲建设东方大港的方针，进而想起本世纪 30 年代，上海已成为东亚地区仅次于东京的第二大城市。包括 58 家外国银行分行在内的 168 家银行使上海成了亚洲的重要金融中心。当时占全国 50% 到 80% 的商品进口量和占全国 60% 的茶叶和猪鬃出口量又使上海成为我国外贸和商业中心。建国以后上海的经济地位虽已大不相同，但到 90 年代初期，我国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方向业已定论，上海在全国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势所必然的要起变化。何况上海四周长江三角洲这个腹地的经济技术发展水平也比改革开放之前有了很大的提高。如果上海浦东仍想像深圳那样吸引外资，以建工厂为主，哪怕是兴建一些高技术产业，它的扩散和辐射能力都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并可能在市场、产业结构等方面与江、浙乃至沿海城市发生矛盾，即使上海能起到窗口作用，也无法起到龙头的作用。当中国已经进入全方位开放时期后，比起窗口来，似乎更需要龙头。

由此看来，上海的发展宜更上一层楼，在更高层次上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观点出发，考虑成为长江流域的贸易、金融、信息、科技、运输中心。换句话说，使上海在经济上成为长江三角洲和沿江地带工农业商品总调度室或总服务站，成为一个具有广阔腹地的大陆香港。这也许是更可取的一条路子。以这个思路为底子，我于 1990 年提出了关于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的建议，后来又更具体地提出了以上海为龙头，江、浙为两翼，长江为脊梁，以“南方丝绸之路”和西出阳关的欧亚大陆桥为尾闾的宏观设想。

1991 年，我开始了以发展山区经济为重点的研究计划，首先走访了四川、云南两省交界处的大小凉山。根据考察所得，我

提出了“一点、一线、一面”的发展方针，即以攀枝花工业中心为启动力，联合凉山彝族自治州，开发成昆路一线的丰富资源，开辟通向东南亚的“南方丝绸之路”，推动西南云贵高原的全面发展。

到1994年，我在地矿部的支持帮助下，结合我先后在西北和西南贫困地区实地得来的资料，与中国地质科学院从事黄土研究和熔岩研究的专家们讨论了西北黄土高原和西南熔岩地区的扶贫开发问题，研究怎样配合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实施，加强对这两个区域的治理，尽快帮助这里的农民脱贫致富。在思路较成熟时，我向中央提出了关于西北黄土高原和西南熔岩地区扶贫开发的具体建议。

在这两套有关开发西南的设想里边，有我在长江三角洲开发设想中有关经济区域内容的延伸。但更重要的是表现出了研究取向上的相通之处，即以较小范围的区域发展联系上了更宏观的区域发展，经济区域这个概念就是这样逐步在接触实际中生长起来的。

四

中国大地上方兴未艾的区域间经济协作的现实，持续地推动着我对区域发展这课目的探索。在对东南沿海地区和西北、西南边区的发展情况有了较多了解并相继提出这些区域进一步发展的设想之后，我把重点放在过去了解较少的区域。一路是沿海岸线北移，经环渤海湾进入东北地区，考虑建立参与发展东北亚经济的基地问题，另一路是沿欧亚大陆桥由东向西进入中部地区，研究沿桥建立经济走廊的条件。

东北的情况。我在80年代中期开展边区研究的时候，曾对

黑龙江省有局部的了解，并想提出从内地吸收移民开发北大荒，为今后参与发展东北亚的国际大会战时充实实力的设想，但时机未到，并没获得当地领导的共识。几年过去了，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1991年，我有机会访问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着重考察了珲春市和珲春的长岭子口岸、距图们江出海口不远的边界和图们江口岸等地。我了解到，地处延边东部的珲春市具有图们江通海航行的悠久历史，早在1200年前就是我国东北地区海上丝绸之路的枢纽。清末民初时，当地居民一直利用图们江航道出海捕鱼和通商。1907年，清政府在珲春设立商埠，1909年又设海关总管，珲春成为中国进出日本海的一个重要贸易城市。可是在1938年，日军由于日俄冲突而强行封锁了图们江口。从此，中国人民被迫中断沿图们江出海航行达52年。图们江口“金三角”地区的重要政治地位和经济价值，被历史淹没半个世纪之久，东北地区的广大腹地的发展也受到很大影响，实在可惜。

我由此想到了行使图们江出海权、开发利用图们江口地区的重要战略意义。简要地说，这是行使中国主权、维护中国在日本海利益的需要，是进入日本海、确立中国在东北亚的地位、建立参与东北亚经济发展的基地、迎接21世纪的需要。这一点，从宏观的经济区域发展的观点可以看得很分明。图们江口位于东北亚区的中心部位，从这里起航到朝鲜的罗津港、俄国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港、韩国的釜山港和日本的新潟港，距离最近，也能缩短到加拿大温哥华和美国旧金山港的航程。这对促进中国外贸的发展十分有利。中国东北地区的外运港口，目前全部集中在辽东半岛，并已趋饱和状态。打通图们江出海口，不仅可以缓和东北地区的外运紧张状况，还可使全国外运港口和铁路运输布局得到改善。更为重要的是，在图们江口建设开放城市，并引导大连向“北方深圳”的样式发展，改善沿海地区对外开放的总格局。加上胶东半岛的烟台、威海这些据点，连成一体，形

成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又一个大的接轨站，依托东北广大腹地的建设，将使我们取得面向参与东北亚发展的广大空间。

从注意到参与东北亚的开发，我又看到了发展环渤海地区的重要性。环渤海地区是中国经济由东向西扩散、由南向北推移的纽带。我曾利用访问考察的机会陆续对环渤海湾的沿岸城市及其腹地做过实地调查，了解到环渤海地区具有独特的港群优势和广阔的腹地，有在国内密度最高的交通网络，有丰富的资源和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在占全国 5.1% 的国土面积上创造着超过全国 1/4 的工业产值。在第二轮改革开放高潮中，加快发展环渤海地区的战略任务已被写进了中共十四大文件。同时，随着改革的深化，华北地区经济运行的市场机制开始启动，原来受到行政区划局限的生产要素正在市场经济力量的推动下突破行政区域界限，走向联合与协作，形成综合力量，促进经济区域的发展，这都为环渤海地区的崛起提供了有利条件。

为了切实加快环渤海地区发展，我在自己所做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建议民盟中央与环渤海地区的省市府有关部门领导、研究人员以及民盟地方组织一起开会，专题研讨环渤海地区加快发展的自身优势、外部条件、制约因素和基本思路，并以此为框架向中央提出了加快发展这个地区经济的具体建议。

从 1992 年起，为了改变中部地区和沿海地区的发展差距，为了充实沿海发达地区的腹地，我把探索中部地区加快发展的路子作为重点研究题目，又接触到了新的情况，受到了新的启发，这使我能比以前更深一层地思索传统农业地区脱贫致富的路子和沿欧亚大陆桥地区的整体发展问题，提出了发展欧亚大陆桥经济走廊的设想。

改革开放以来的 10 多年里，东部沿海地区凭借其地缘优势，发展步子较快。到 90 年代初期，东部沿海地区的农民人均收入，要比中部地区农民人均收入高出大约一倍。在这样的差距下，中

部地区的农民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我很想知道，也想在扶贫实践当中和农民一起寻找下一个10年里让中部地区尽快赶上来的办法。我到苏北、山东找，到湖南、湖北找，到河南、河北找，找来找去，找到了两个旨在促进区域发展的经济协作区，找到了能使农民切实增加收入的庭院经济，和以此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当地称之为“公司+基地+农户”的路子。

我在苏北访问的时候，听说有一个淮海经济协作区，是苏鲁豫皖接壤地区的17个地市自愿组成的区域经济协作组织。他们从1986年起正式开始联合，打破条块分割的局面，形成横跨四省的协作网络，使这个区域的国民生产总值、工业总产值、财政收入、外贸出口额的增长在成立协作区后的数年里边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作为东部沿海腹地的经济欠发达地区，这样的成绩是令人鼓舞的。

接下来，我在邯郸访问时又知道有一个中原经济协作区。包括晋、冀、鲁、豫四省的15个地市，自1985年起自动联合起来，进行地市间经济技术协作。这是个农业传统悠久，人口、市镇密集，轻重工业并举，城乡市场广阔的区域，地处大陆桥中段，战略地位重要。这里的15个地市根据发展经济的需要自发组织起来，开展跨省界的区域协作，这里的干部有意识地组织群众走出条块分割，联手发展，这是值得关注和倡导的新生事物。

淮海和中原两个区域经济协作组织引起了我的浓厚兴趣。这两个协作区包括的这大片历史上以农业为主的地区，是否可以在从事农业和副业的个体农户的基础上积累起资金，走上工业化道路？对此，我不能说自己没有一点想法，但他们的现状怎样，他们已经做出了哪些探索，发生了什么样的效果，下一步怎么走更好一些？我所知道的还不多。同时我又看到中部地区能不能加快发展，不光是中部自己的事情，也是决定沿海地区能不能进一步加快发展的一个关键。如果中部作为沿海地区乡镇企业的市场

不能快点发展起来，沿海地区的下一步发展就会受到很大制约。

我在访问过淮海经济区大部分地市之后，于1993年到商丘参加了淮海经济区第八届市长专员联席会议。又在对中原经济区做了一些了解后，于1994年到濮阳参加了中原经济技术协作区第九届会议，并借与会机会对信阳、安阳、濮阳、焦作四市进行实地调查。再结合我以前在湖南洞庭湖区、湖北孝感、河南民权、河北沧州、山东无棣等地看到的例子，我脑筋里的思路比较清楚了一些。看来，在农业传统悠久的中部地区，从农业到发展工业之间要有一个过渡。这个过渡可能就是发展庭院经济，为广大农民切实增加收入，早日脱贫致富，积累资金，自力发展乡镇企业。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基础上，加快中部地区的整体发展，沿欧亚大陆桥建设一条沟通东西、平衡南北的经济走廊，需要尽早提上日程。

庭院经济，就是以个体农户为基础发展成为农林牧副渔任何一业的专业户、专业村。我在孝感看到了“一村一品”形式的庭院经济，以一家一户为基本单位，有的村养甲鱼，有的村养鸟，有的村编鸟笼，千家万户都富了起来。在民权看过的种葡萄，做抽纱，也是分散在千家万户。我到沧州、无棣去看，了解到当地的枣粮间作，也是大有可为。在麦地里间种枣树，发展果业，光是这一条，扩大规模，落到实处，一年就能创造几亿元财富。淄博临淄区有一个西单村，我在村里看到家家户户都有池塘，村里搞立体农业，生态农业。他们在屋顶上种水葫芦，用麦秆、玉米梗养牛，牛粪集中起来生产沼气，沼气渣用来养鱼，养鱼的水可以浇地种田做肥料，这样在庭院经济基础上搞起了多业并举、良性循环的集体经济。加上村办工业，1993年的产值已有十几亿，真是小农村做出了大文章。

庭院经济虽然还是在农业里边，却已不是传统的农业概念，而是跨到大农业的阶段上来了。大农业不是单搞粮棉油，而是农

林牧副渔全面发展，这就使农民致富的路子多了起来。农民手里有了钱，要买消费品；生产的东西多了，要卖出去；钱更多一点的时候，需要投资，用钱滚动来得到更多的钱，这样，流通就出来了，工业就办起来了。乡镇企业一开始就是农民自己在计划经济之外干起来的，它的启动资金不是向国家要的，而是农民从土地里边积累起来的，是通过把劳动力在土地上变成生产力挣出来的。可以说，庭院经济是促进乡镇企业发展的一支强大力量。淮海、中原两个协作区有 1.5 亿人口，每人增加几百元收入，就是几百亿元的大市场。庭院经济看起来小，力量却很大，看着不如大中企业气派大，却是广大农民增加收入、脱贫致富的好门路，显示出的是另一种气派，富民的大气派。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燎原的力量不是来自好高骛远，而是来自脚踏实地，尊重实际，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发展市场经济的伟力存在于千千万万的群众之中。

中部地区的经济协作已经搞了将近 10 年，打下了基础，积累了经验，现在要上一个台阶了。有机遇，也有条件。沿海地区的发展搞了十几年，沿江地区的发展也已经提出了好几年，中国北部沿大陆桥经济走廊的发展还有待提上日程。大陆桥虽然早就有，可是还没有被当作经济走廊去发展。陇海线通车已久，沿线的腹地并没有得到大的发展。现在，情况已经大不一样，南中国的发展迅猛，形势逼人，要求北方有相应的发展。长江三角洲的经济辐射借助长江进入中部，在不长的时间里就可能实现。中部和北部的发展，要求沿大陆桥建设经济走廊，一方面发展潜力强大的沿桥腹地，一方面作为东部经济技术向西转移和扩散的通道，沟通东西。不仅如此，这个经济走廊正贯穿黄河中游的广大腹地，西接黄河上游多民族开发区，东联黄河三角洲开发区，它可以带动整个黄河流域的经济大发展。而且可使北方经济既能从连云港东出，又能沿桥经河西走廊西进，去开发从中亚细亚到阿

拉伯的巨大市场。

淮海和中原两个协作区继续增强实力，连片发展，就是这条走廊的基础。加快这两地的经济区域发展，一边建设经济走廊，一边建起欧亚大陆桥的桥头堡，与全国各地形成承东启西、南呼北应的大格局，对于中国从本世纪末到下世纪初实现全国协调发展，人民共同富裕，应该是有益的。

至此，综合我一系列有关经济区域发展的设想，已接近了“全国一盘棋”的格局。写到这里，我似乎看到中国经济的两条龙，长江，大陆桥；还有两只虎，华南虎，东北虎，似乎看到了龙腾虎跃的局面，看到我们这个小农经济延续几千年的国家城乡一体现代工业化的前景。这是我一生梦寐以求的理想。

五

经济区域的研究是我近几年在实地调查和思考中提出的一个新课题，也可说是我的农村调查、小城镇研究的延伸。这个新课题至今还在探索的阶段，刚刚破题，许多方面尚需深入探索。

我在上面回顾了我自己逐步明确区域经济这个概念的过程。总的说来是我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看到地区间经济协作的需要，又在珠江三角洲看到香港这个经济中心所发生的作用，因而进一步产生发展围绕这中心的环形地带的设想。可以说是在我思想上开始对经济区域有了初步认识。以珠江三角洲的模式结合长江三角洲的现实，才使我觉得这里还缺少一个和香港相当水平的经济中心。因此想到提高上海的经济规格，希望它能成为长江三角洲的龙头，带动整个长江流域这条经济脊梁骨的发展，在长江流域形成一个经济高度发达的区域。这条思路又带着我看到华北和东北，以及横贯全国带动西北的欧亚大陆桥经济走廊，使我在这几

年里做一系列发展区域经济的建议。这是我个人提出这课题的来龙去脉。

经济区域是在人们经济生活中形成的，本身有一个发展过程。我们可以设想，在人类社会的原始时代，人们都是在自给自足的小群中生活。这种小群散居在广大的土地上，相互依存的地地区性的经济联系很微薄。即使社会发展到了小农经济阶段，若干以亲属为基础形成的农户，聚居在一地形成了村落，进行类似的采集、农耕和副业的生产活动，互通有无的交易还是极有限的。社会分工的发展，使各村各户才有交换不同产品的需要，而发生了“日出而集、日入而散、日中为市”的临时市场，就是在我们内地至今还可以看到的赶场或赶集。又经过了一段历程，才发生作为农副产品集散和销售工业制造品中心的市镇，它们各自拥有为其服务对象的若干农村，在我家乡称作乡脚，即市镇的腹地。经济继续发展，有些市镇上升为城市，有些小城市上升为中、大城市，直到特大城市。各级城市都拥有它的腹地，形成城乡相互依存不同层次的经济区域。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进入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农村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走上了城乡一体的道路。小城镇的兴建正进入高潮，中大城市都在发展和扩建。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成长，已使过去经济关系在不同程度上处于分割和疏隔的各层次行政区域，已日益感到协作和互补的需要而相互开放和联系了起来，而且已出现了超越行政界限的各种形式的协作和结合。我身处这个大势之中，从研究工作的实践里逐渐意识到区域发展研究的重要性。在这篇回顾中我试图具体地把这项课题在我思想中形成的过程，理出一条线索，也想借此作为今后研究工作的导向。

由于这个研究课题牵涉的范围较广，问题众多，我自己明白对这课题的认识还不够全面，概念也不够明确，对这篇回顾中已经冒头的许多问题还没有深入系统地追索。例如：经济区域和行

政区域怎样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经济区域内部的结构，如中心、腹地、口岸、道路怎样组合，又怎样安排？各层次的经济区域怎样形成和发展，它们又怎样受到自然和人文，即地理和历史因素的促进和约束？这些都是还需要研究的问题，像这样的问题还有许多。

今后进一步研究这些新的课题，我还是将继续采取我过去的实事求是研究方法。一切要以已发生的事实为基础，观察和描述“已然”。用可以观察到的事实为资料，进行比较和分析，探索在事物发展中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出设想，然后通过思考，引发出“或然”。最后以实践去检验其正确与否，经过历史的对证，得出“果然”或“不然”的结论。

我在经济区域研究这个课题上，还在观察和描述“已然”的阶段，但也在思考“或然”的发展。我已注意到 20 世纪后期世界经济发展中不断出现跨国家的经济共同体的理论和现象。欧洲共同体把欧洲一些独立的国家在经济领域里进行密切协作和共同规划，初步踏进了全面统一的门槛。接着北美、中美各国也已分别在部分经济领域中实行了联合和协作。近年来有关亚太经济区域的结合也已提到日程上。这许多国际间的大趋势都指向这个世界由于科技的发展，经济上全人类已密切地相互依存，正在走向联合，但还没有形成一个平等、和平、合作、团结的全球性共同体。洲级经济区域概念的提出，也许是走向这个共同体的一个起步。

我在这个世界规模的大趋势的影响下，不能不联系我们自己的国情，思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前景，因而注意到已经出现的形成我国国家规模的经济共同体的积极因素。在这种背景下，我提出这个区域发展的研究课题。这个研究课题，需要微观和宏观相结合，需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需要人文和地理相结合，看来和小城镇研究相比是个更大的问题。我从农村的微观研

究，进入小城镇的比较研究，经过 60 年的时间，提出了这个更大的课题。这个课题不仅要把全国的经济发展看成一盘棋，而且应联系着全球性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来思考，确是一篇不像是我这一生可以亲自写到底的大文章。这篇文章我算是破了题，但怎样做下去还需要认真探索，更需有志同道合的学人共同努力。我相信总有一天能看到我们国家作为一个具有实力的统一体，矫健地踏进全球一体的大社会。我也愿意为这篇大文章的写作付出我最后的一段生命。

回顾毕，情未已，墨有余，作短歌。歌曰：

老妻久病，终得永息。
老夫忆旧，幽明难接。
往事如烟，忧患重积。
颠簸万里，悲喜交集。
少怀初衷，今犹如昔。
残枫经秋，星火不熄。

1995 年 1 月 1 日

三 访 赤 峰

1984年8月，我曾到内蒙古赤峰市（原名昭乌达盟）调查过一次。今年7月我第三次访问赤峰，其间相隔11年，事前我了解到在这段时间里，赤峰的经济有显著的发展。单以工农业总产值说，1994年已达96.5亿元，比1983年增加了五倍多，而且工业产值已超过农牧业产值，达到6:4的水平。因此，我很想亲自去看看这个边区的发展情况。

这次访问虽因年老力衰，跑的地方比上次少了，但还是得到不少新的知识。下面就四个方面提出一些体会：一是恢复生态，二是农牧结合，三是乡镇企业，四是发展前景。



第一个是生态问题，我在第一次去赤峰访问时已经注意到，当时这个地区生态破坏的情况很严重。我生平初次亲眼看到一片片生命已被消灭的流沙。我记得在车上望见有人躺在沙丘上睡觉，觉得很奇怪，一问才知道，在沙丘上连蚊子都没有，是个不受任何打扰的好地方。当然，没有生命的地方是养不活人的。

后来苏赫同志告诉我赤峰附近发现了红山文化遗留的文物，那是五六千年前的东西。这样远古的时代，赤峰这片土地上已有农耕而且已有村落。接着他带我去参观文物展览馆，我见到了纪元前16世纪的铜器，大概相当于中原夏商时代，这里的居民已经有了与中原水平相当的文化。如果这个西辽河上游地区自古就是

一片荒凉的沙漠，我想是不可能那样发达的红山文化的。从考古学上的实据来看，大约在春秋时代，这个地区曾经发生过社会文化的很大变动。很可能从那时起，北方的民族引进了牧业。可是从有文字的记录中还可以看到，在 1000 多年前的唐宋时代赤峰还是松林茂盛的风景区。契丹民族在我国北方建立的辽王朝（907 - 1125），其政治中心上京和中京的故址都在现在的赤峰地区。当时这个地区不可能是一个沙化严重的区域。看来这地区生态破坏是其后 1000 年中的事，甚至是在 20 世纪后期的几十年中发生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制止边区生态破坏，一直是国家的重要政策，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胡耀邦同志提出的种草种树成了当时切中要害的急迫措施。

赤峰市是治沙的先驱。早在 60 年代中叶就成立了专业的研究所，开始切实地探索治沙的措施。经过了大约有 10 多年，到 80 年代初我来赤峰访问时，就看到了初具规模的太平地林网建设。这对我印象极深。1959 年时生活在一片沙化土地上的 4 个村 54 户人家，在 1965 年已成功地营造了大面积的农田防护林，把整片土地划成了 70 多个网眼，每个网眼有 200 亩农田。这个林带对林网内的农田起了防护作用。1982 年赤峰遭到 11 级暴风，全市灾情严重，而太平地却太平无事，赢得了附近人民对林网的信誉，从此不断扩大。今年我再次去访问太平地时，车子在林网里穿行，远远望去，看不到底，像是进入绿色海洋。前两年又从远处打了深井，用水泥渠道引水进网，扩大了几万亩农田。同行的同志还跟着向导到网边的沙区去观看正在兴建的新网眼。这是说林网的建设正在不断扩大中。这使我感到十分欣慰，因为我上次访问后曾说过，赤峰已找到了治沙的路子，但是路子必须延伸出去才能成为大道。现在林网建设在太平地推开了，但是我希望这个经验还应当推广到更大的范围里去，不仅在赤峰各地推广，在国内推广，还要推广到国外去。听说联合国已经注意到太

平地的成效，我非常高兴。

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最近说，中国北方土地的荒漠化每年高达 21 万平方公里。可见我国沙化面积还是在增长中，这条危害的沙龙还没有制服。我曾到内蒙古的阿拉善盟，在沙丘中坐车颠簸得坐不稳，两手紧握住拉手，身子还是在跳迪斯科舞。从沙丘顶上四望，看不到一棵树。治沙的工作还只能说刚开始，想起太平地的这一点经验，更觉得十分宝贵。

治沙应当看成件大事。我几次来赤峰，印象也越来越深。这是一项人类在地球上求生存的搏斗。回顾人类的文明史，人类制服自然的力量固然在近百年来有了飞跃的发展，但不能否认，就在这近百年来人对自然生态的破坏也是越来越严重了，甚至有人提出警告，如果还不即刻恢复生态的良性循环，这个地球已经不断在发出“养不活人类这样生存下去”的警告了。这是为什么近年来联合国已经把环境问题列入 21 世纪的重要课题的原因。

当然，赤峰在治沙和恢复生态平衡方面除太平地外还有很多好的经验，每个年代都抓住成功的典型在推广。在 60 年代开始的太平地的速生农用防护林之前，有 50 年代已开始的当铺地乡的农田保持林。其后，有 70 年代城子乡的丘陵山区农田保持林，80 年代敖汉旗的大面积植树种草、巴彦他拉半干旱沙化草场的改良建设。到 90 年代，在喀喇沁旗农区、翁牛特旗半农半牧区、巴林右旗牧区又创造了不同类型地区多元化的经验。如结合三北防护林的大面积生态治理工程中注意到经济效益问题，在山区推广生态经济沟，搞的是两松戴帽、两杏缠腰、瓜果梨桃遍山坡的立体生态建设。在牧区的小草库伦建设中，正在试点五荒（山、沙、沟、水、地）资源拍卖，提倡和动员一切集体和个人的力量，甚至动员外国投资者都来投入生态治理和经济林的建设。他们的做法既注意生态效益，也重视经济效益。

11 年前的巴彦他拉苏木草原站提供了半干旱沙化草场改良

建设的经验，他们建设了水、草、林、机四配套的基本草场，种树林网化，种植优质牧草和青贮，同时还采取了草原围封的措施。今天，这些经验正在不断推广。

这次我没有机会再去一一访问这些地区，但在考察期间，看到了《赤峰日报》关于巴彦他拉苏木连续7年牧业大丰收的报道，他们大小畜总数、总增率、出栏率、牲畜改良率、小畜总数和山羊总数均为全市第一。其基本经验还在于重视了畜牧基础建设，生态条件的根本改善和坚持科技兴牧，使畜牧业走上了稳步发展的道路。

在乌丹和大板时，我去看了在城镇附近的生态治理防护林建设工程。这是以机关干部和职工大会战方式，义务劳动完成的。他们利用春秋两季完成整地挖坑，第二年春天栽树，有松树、杨树、山杏还带上沙打旺，其规模和效益都是前所未有的。

我在此受到鼓舞的正是干部和群众积极进取的精神。在边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较为艰苦和困难的条件下，他们在与自然作斗争中始终保持着积极性，不断创造新经验，并推广取得成效。现在赤峰每年治理土地面积达200万亩，其中造林100万亩，水土流失和退化的面积每年也是200万亩，已经达到了损益相抵的好成绩。按现在的形势发展下去，治理的速度将占上风。所以我说11年来的发展，真正值得称道的是这种变被动为主动的进取精神。我希望赤峰的同志们再接再厉，开拓推广这种制服沙龙作恶的道路。这点成绩来之不易，是多少人30年辛勤劳动的成果，值得珍惜，但远远不够，还要向前再提高，再前进。

二

我在初访赤峰后所写的《赤峰篇》里把地区的民族问题联

系上了农牧业的矛盾，因为赤峰过去的一段历史使我看到这地区的民族矛盾的根子是在农牧矛盾。而农牧矛盾的根子是在争夺土地资源。当农业和牧业都处在初级阶段时，两者要利用同一块土地时会发生相互排斥的矛盾，不是你来我去，就是你去我来。这个往复循环在这地区的历史上可能已发生过多少次了。

牧业的初级阶段是指逐水草而居的放牧形式，就是牲畜依靠天然草地来饲育，牲畜自己在天然草地上找它的饲料。一块草地上的草吃完了就去另一块草地找草吃，就是所谓“逐水草而居”。牲畜跟饲料走动，人跟牲畜转移，形成了不能定居的流动放牧的生活。

农业的初级阶段就是粗放经营，放火烧林，利用原有地力广种薄收。一块土地的地力消耗尽时，换一块地再重复这种方式，即一般所谓刀耕火种。土地的肥力竭尽，地就抛荒，抛荒的土地就是最易沙化的土地。所以凡是这粗放耕植过的土地常留下一片沙化地，寸草不生，原来长草可以放牧的草地就这样被破坏了。因之这种开荒的农业是破坏牧场的力量，所经过的地带成了排除牧业的荒沙。赤峰在民国年代军阀混战中，成了生态的牺牲品。不少现在还没有恢复的沙化地带就是这样造成的。

解放后，这种破坏行为是停止了，但有限的并已在退化中的牧场，由于政策上鼓励增加牲畜数量，很快出现超载的情况。超载就是一块草场上的草不能负担过多牲畜的给养。超载的结果是草场退化，牲畜死亡。这种情况发生后，为了使草场能够有所恢复，只能设法限制牲畜在退化了的草场上放牧。所以一般都采取把部分草场围起来的办法，限制牲畜进入，就是所谓“草库伦”。这是我在11年前看到的普遍情形。

这种草库伦其实是一种不得已的消极措施，等待草场自然恢复它的供草量，时间上是漫长的，基本上靠天长草，草长大了再放牧。这是并没有改变牧畜靠自然生长的草作为饲料来养活的传

统方式。

为什么人不种植饲料来喂育牲畜呢？这是个根本的改革。我在60年前在英国学习时，在他们的农村里看到用小块土地种植萝卜，划地分界让所畜的羊在指定的范围里去啃食萝卜。羊群，饲畜，所植萝卜和土地都有一定的比例，预先做好计划。按计划供应牲畜饲料，牲畜也按计划育肥，一直到供应市场，屠宰后供市民消费。我从这个例子里才明白牧业可以从放牧发展为舍饲，从初级牧业向现代化牧场发展。

在中国我还没有看到过上述英国的那种企业化的牧场。但是在我的家乡，江苏太湖流域，却通行在农民家里把羊关闭在羊圈里由各家的孩子们去割草来喂育的方式，每家喂育的羊不过二三只。但由于各家都养，牲畜的总数也不少。这是一种我称之为庭院舍饲的方式，比放牧的方式是提高了一步。

我在初访赤峰时，还去参观过由联合国支持的韩丁兴办的示范牧场。在这个示范牧场里我看到有大片种植玉米的土地，这片土地上长的玉米就是用来喂牛的精饲料。这个示范农场为附近牧民所养的牲畜催肥。牧民在牧场上草长得好的时候放牧，秋季之后草场的草不够养活牲畜时，送到示范牧场里去催肥，就是用玉米地里所长的精饲料喂育、催肥之后卖走。我把这个事实上相当复杂的过程，浓缩作放牧和舍饲接力的方式。这启发我想到农牧是可以通过这个方式结合起来的。

后来我到甘肃临夏去访问，看到在我们传统的办法里也有这种接力方式，只是地域间的接力。在青藏高原上放牧的牲畜到秋季不断赶到平原上来，在临夏一带的农村里，把牛卖给农民，各家农民分别买几条牛在自己家里用玉米秸秆喂育，到牲口催肥后，在年终宰了在市上出卖。

这种放牧和舍饲的结合，其实就是农牧结合。符合中国的传统，而且可以在草场日益退化过程中，减少牲畜的数量对草地的

压力，既减轻超载的负担，同时使牧区附近的农民田上的秸秆得到最好利用，增加农民的收入。这种接力方式是值得推广的。

三

这次访问赤峰北部的大板镇时，看到当地正在推广的“小草库伦”。这和上面所说用来保护草地的草库伦不同。用来保护草地免得牲畜在已经退化的草地上再去吃草是一种消极性的措施，大板所见的“小草库伦”是另外一种新创造，实质上是牧区的庭院经济。每户圈出一定数量的土地，成为一个“草库伦”。这户牧民就定居在建筑在这个“草库伦”里的土房里，包括这户的住所和他畜养牲口的牛栏和羊圈，而且还有为冬天接羔用的暖房，用薄膜盖顶的可以加温的羊圈。在房屋和圈栏的四周，有一片大约有 10 多亩的农田，用来种玉米。我们去访问时牛羊都不在栏圈里，据说放到公共草场去吃草了。“小草库伦”里的玉米长得很旺盛，主人告诉我这些玉米就要用来为牛羊过冬时做饲料的。我当时就想到这不就是联合国资助的示范牧场缩小了的具体的基本“模型”么？夏秋公共草场上有草时牲口放出去，公共草场的草不够了，就回到“小草库伦”里靠精饲料喂养。我参观的时间有限，没有详细了解这种放牧和舍饲结合的具体办法，但是原则上是一致的。如果一旦公共牧场退化到不能供应这许多“小草库伦”里的牲畜自由放牧时，势必加重牧民在自己固定的土地上想法增加饲料的供应，不是会一步步走上英国式的萝卜喂养的企业性质的经营了么？

“小草库伦”是几年前才开始的一种牧民的新创造。就巴林右旗总结的经验看，小草库伦的主要作用表现在：一是适应家庭经营机制。每处投资 3000 元左右，国家投入 500 元，用于水利

配套，其余由个人投工和自筹。投资少、见效快，“国家投得起，群众建得起”，管理也方便，最重要的是牧民把它当成是自己的东西。二是有防灾抗灾作用。一处小草库伦就是一处“旱涝保收田”，一处可靠的防灾基地，使畜牧业生产增加了稳定性。三是小草库伦不仅能保证牧民的温饱，而且容易增加积蓄和促进再投资的积极性，加快脱贫致富。四是它改进生态的作用。一处小草库伦就是一个小生态圈，一片小绿洲，对改变局部地区生态环境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如一处按 15 亩计算，可产饲草料 1 万公斤左右，可节约天然打草场 100 亩。五是小草库伦实行水、草、林、机、料五配套，是集约经营的开始，促进了畜牧业和种植业的有机结合，协调发展。牧区种植业的发展，促进了畜牧业经营方式的变革。在抓好畜牧业的基础上，相应地抓青贮、加工、调制、饲喂等一系列配套措施。当地老百姓称之为“引种入牧”，即把种植业引进畜牧业。相应地在农业地区引进牧业称作“引牧入农”。

如果说 11 年前农牧结合还是一种设想，今天这里已作为一项致富工程在实施。市里规定农牧结合户要达到羊 20 只、牛 5 头、猪 10 口，家禽 200 - 300 只，牧业收入要占到总收入的 50%。翁牛特旗在推行此项工程时，根据本旗的实际，提出了东部大种，西部大养的发展战略，利用各地的资源优势，引种入牧，引牧入农，不搞单一经济而搞多种经营。实现东种西养，做到在牧区繁殖，农区育肥，实实在在走着农牧结合的路子。1994 年翁牛特旗农牧结合户达 1.16 万户，占全旗农牧户的 40% 左右。农牧结合户的人均收入比过去增加一二百元是没有问题的。

1984 年我曾访问过该旗半农半牧地区的黑塔子嘎查，总结当地群众改变农牧并存的状况，走农牧结合的道路的经验，提出“退耕还牧”的设想。以后我一直很关心他们的发展情况，北大研究所的师生曾做过追踪调查，这次随我一起去的同志又去了解

情况。他们看到近几年黑塔子的做法，一是利用贷款打了两眼机井，解决了耕种问题，使全村口粮得以自给；二是借用政府项目贷款把沙化的 3000 亩荒坡围封种草，若干年后可用以发展牧业；三是开办多种经营，利用低地开辟了一个鱼塘，每年可以收益 40 万元，这样稳定了这个嘎查的经济。从这个例子来看“退农还牧”的路子，在资金筹集、劳动力利用等方面困难是不少的，而且处处要依赖政府支持，短期间更难见成效。如果和上述的“小草库伦”相比，优劣是显然的。当然像黑塔子一类地方能否推广“小草库伦”还是要进一步加以研究。

在去翁旗乌丹的路上，我们参观了远大肉牛产业开发公司，他们现代化屠宰加工厂经过八个月的施工，即将验收投产。这是国家扶贫办所属的中国远大发展总公司下属的扶贫企业。他们总结多年的经验，把扶贫款集中使用，投资大的项目，这个项目是以肉牛屠宰加工为龙头，通过屠宰加工厂、饲料加工厂、育肥牛场、皮革加工厂等系列化项目建设，促进当地农牧结合，带动五六个旗县的千家万户农牧民，连片发展，以期根据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实现富民富县的目的。我深望这个目标能够实现。

回过头来看，赤峰市坚持不懈地开展以水利为中心的农田草原基本建设，防沙治沙，绿化造林和小流域综合治理，不断改善生态环境，发展农村庭院经济和牧区小草库伦，搞好放牧与舍饲的接力，牧区繁殖和农区育肥的接力，再有远大公司现代化畜产品加工企业的配合，加速牧业现代化进程是很有希望的。

四

赤峰怎样发展乡镇企业，对我还是一个新的课题。我记得上次访问太平地时曾一再提出如何利用林网的木材进行加工，发展

小型工业的问题。这次访问中很兴奋地看到太平地木材加工的企业已经办得很有成绩。他们不仅出售建筑业需要的各种初步加工的木材，而且有专门制造三合板的工厂和用三合板再加工的家具工厂，并且把伐木时和木材加工时得来的废料磨成木屑，加工压成薄板，作为家具的原料。总之，在林网上已做出了不少乡镇企业的文章。这是十分可喜的。

但是太平地的居民还没有想到田里的玉米，除了粮食之外还有秸秆一项，如果和牧业结合就大有文章可做。当我问他们玉米的秸秆如何处理时，他们的回答是“都烧了，当肥料。”我就接了一句：“你们把它变成了牛再烧，不是滋味可以更好么？”后来我在巴林右旗看到了“小草库伦”，恨不得回去要太平地的农民一起来看看。大板是以牧业为底子引种了农业，他们称之为“引农入牧”。太平地不妨以农业为底子引进牧业，“引牧入农”。在赤峰这个农牧交叉的地区，正是个引农入牧，引牧入农的好地方。

在我们访问赤峰前几天，内蒙古自治区正在召开发展乡镇企业工作会议。他们把乡镇企业提到发展内蒙古经济的重要地位。我听了当然心里十分高兴，因为我在11年前来访问时，在边区似乎还谈不上乡镇企业。90年代我听说赤峰开始重视乡镇企业了，这是个好消息。这次来访自然要看看乡镇企业。但是由于时间太紧，只能选择重点进行初步了解，留着这个课题给今后去深入研究。

我初步的印象是赤峰的乡镇企业起步较晚，真正起步是在90年代这五六年中。由于起步晚，没有赶上国家大力扶持乡镇企业这班车。尤其这几年国家财政紧缩期间，发展较晚的地区，在资金上受到的制约就显得更大。所以大家感觉到国家在政策上一刀切，对边区不够优惠，我很能体会各级干部的心情。我们可以把边区的实际困难多作反映，争取能得到一些比较宽松的条

件，但是我个人估计从这方面去打算是有难度的，不如思想上从依赖国家扶持，转到自力更生上来比较实际些。

不论怎么说，赤峰在发展乡镇企业上是有成绩的，在自治区内一直占有前列的地位，而且这几年发展也比较快。经过这次访问我得知赤峰全市 1994 年乡镇企业总产值已达到 85.4 亿元，比 1985 年增长 17.7 倍，总产值超过 10 亿元的旗县区有 4 个，总产值超亿的乡镇有 22 个、村 8 个。在产业结构方面，制造、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三大主导产业总产值占全市乡镇企业总产值的 86.7%。

乡镇企业近年来的增长速度高于市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约 10 个百分点。乡镇企业的入库税金约占地方财政收入的 15% 左右，乡镇企业就业人数占全市农牧区劳力比例达到了 30%。农牧民人均从乡镇企业得到的收入近 300 元（农民人均收入 1018 元，牧区 1092 元）。元宝山区、松山区、红山区、宁城县和喀喇沁旗都创造了很多好的经验。我这次访问过的翁牛特旗和巴林右旗也有很大的变化。

从已看到的情况来说，赤峰的乡镇企业向市场经济方向转变的苗头已经出现。和过去相比较，纯属原材料粗加工的企业已逐渐向一般消费市场制造商品的方向转变。引起我特别注意的是赤峰郊区和元宝山矿区正在发展的小型制造业已经以市场为导向，改变了乡镇企业发展初期的“三就地”形式。“三就地”就是利用当地原料，由当地劳动力来制造供应当地农民消费的商品的形式。也许这种初级形式在开始发展乡镇企业的阶段是不可避免的。自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针的提出和普及，乡镇企业很快扩大市场取得发展。

元宝山在全市是乡镇企业发展得最快的地区之一，产业结构已经明显地从依赖当地自然资源的阶段上升到原料深加工和依靠科技发展新产品的多元产业结构。它利用煤矿和热电厂所集中的

城市人口的消费需求，发展了一系列食品、运输、医药等服务行业，而且利用这些大企业里的科技人员，发展了高科技的企业。在比较短的时期里，出现了好几个亿元村和超出依赖当地原料的轻纺、医药、化工、电器等产业门类。使像我这样一别10年重游旧地的人，有一种新旧面貌突变的感觉。又使我感觉到起步晚固然是会吃亏，但同时可以是件好事，因为起步早的地方走过的弯路可以不再重复了。元宝山从矿区里分出来的新建区还不到10年，而现在已是边区少见的具有相当现代化面貌的小城镇了。居民的住宅和社会服务设施甚至可以说超过了苏南的老发展区的小城镇。

我曾特地走访宁城老窖酒厂。它原本是50年代建成的老企业，但是到了80年代走上了开拓市场的路子，很快地打开了国内外市场，依靠它产品的质量和效益，在全国轻工业系统中列入了先进行列。据酒厂的老板告诉我，他出的酒90%是销到外地去的，远到台湾和香港。他的拿手好戏是“创名牌”，就是充分利用信息世界的现代传媒把名牌亮出去。他说在广告上花1块钱可以在销售上收回10块钱。这种重视市场的意识，我在其他西部地区的乡镇企业家中见到的还不多。

在这里我不得不回想到在太平地参观纤维板厂时看到他们储存的成品几乎塞满那个相当大的仓库，当我问及产品的销路时，我得到“还好”的答案。两种经营意识，决定两者的发展能力。大家可以明白，不用市场作导向的企业是不会有广阔的前途的。但是要具有宁城老窖的“创名牌”的思想也许还要有相当长的时间。

我最近几年着重调查中部农业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从中得到一种启发。在发展乡镇企业之前必须先使千家万户的老百姓身边有钱。储存在老百姓口袋里的钱是发展乡镇企业最有效的资金来源。在我听取赤峰关于发展乡镇企业的讨论中，感觉到当前还

有不少人把国家的投资不足看成是边区乡镇企业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我是主张国家应当对边区做出特殊优惠政策的人，但同时觉得边区要发展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和中部地区一样，要千方百计使千家万户富裕起来，使老百姓身边有余钱。这是发展乡镇企业最可靠的资金。

怎样使老百姓口袋里有余钱呢？我在中部地区看到的办法就是切切实实发展庭院经济。各个地方总是有老百姓熟悉的传统副业和熟悉的简易手工业。从这个基础上帮助他们发展以家庭为单位的副业，养鸡、养鸭、编织、刺绣，会什么，做什么。只有一条，不使家里的劳动力浪费掉，一点一滴都要变成生产力，变成商品，变成钱。从一家开始，推到一村，更扩大到一个地域。即所谓一村一品，一地一个拳头产品，形成某种商品的生产基地。这个办法简单易行，富得最快。一个地方找到可以推广普及的家庭副业，在充实庭院经济的基础上，联村成片，建立适当的服务体系，在产前、产中、产后为各家各户进行所需的服务，特别是打通市场，实行农副工贸一条龙的结合，在一两年里每人平均增加三四百元收入是不难做到的。我不必在这里多介绍这种在中部各省正在实行的以庭院经济为基础的“富民工程”，因为在赤峰巴林右旗的大板我们所看到的“小草库伦”就是这种性质的尝试。如果在大板的“小草库伦”里再引进一些家家户户熟悉的家庭副业，加上集体的服务和有组织的流通，就成了现在中部地区正在推行的“富民工程”。我们不妨想一想，如果太平地林网里的玉米秸秆能变成牛羊精饲料。由各家各户去舍饲，一年能增加多少收入？这笔钱用来开办乡镇企业，不是比到北京去“跑部前进”可靠得多么？

五

最后，我想对今后发展赤峰市经济的战略作一些初步探讨，因为这个问题也是我在这次访问期间才提出的，还很不成熟。在这里讲一讲，可以让大家注意到这个比较大的问题，多作思考和讨论。

具体说，我是在大板时去看新修成的集通铁路时想到了赤峰在自治区全局中的地位。我还记得初访赤峰那年，大家正在议论从集宁到通辽的集通铁路。我当时就认为这是一条沟通自治区内部的经济大动脉。作为一个自治区，从包头或呼和浩特要来赤峰现在除了已通空航之外，必须绕道北京。这是很不方便的。东西之间有一条直达的铁路线可说是必要的。今年我来赤峰，听说这条集通铁路已经在过去的10年中修成了，对我来说是一件等待已久的消息，所以我特地安排个机会亲自在正式通车之前去看一看这条铁路。

内蒙古自治区的地域，东西横跨我国北部边区，东接黑龙江省，西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这个地形必然发生区内地形复杂经济多元的状态，区内交通成了一个大问题。过去用东林、西铁、南农、北牧，来描述内蒙古经济的多元状态是很生动和符合实际的。因此在今后的经济发展中必须应用经济区域这个概念，同时要强调不同区域间的流通以达到互补协作，所以首先要解决交通问题。

据说乌兰夫同志生前促成了草原列车的实现，尽管要绕道北京，东西两端之间（除了阿拉善）已有了铁路的通道。这是件大事。现在集通路已经建成，通车后，东西两端在区内已经有铁路连接了，这又是一大推进。

如果单独从赤峰这个范围看，集通铁路是从东到西横穿赤峰的北部，它在赤峰的中心站，就是巴林右旗的大板镇，从大板镇再向东到哲里木盟的首府通辽市，在通辽市就和草原列车接上了。这条路并不通过赤峰市（原昭乌达盟的首府）。大板镇和赤峰市之间还有一段大约 190 公里的路程，现在只通公路，没有铁路。如果在大板和赤峰市之间修一条不长的铁路，集通路也可以在赤峰市和草原列车接轨，南下通到北京和天津。从大板到赤峰市这一段交通正是使赤峰全市区的经济联成一体的关键性的空白。现在以公路来填补是远远不够的。

我在大板时已听到修筑大板到赤峰铁路的呼声，因而进一步考虑赤峰市在自治区全区经济中所处的地位。

作为一个经济区域来对待一个地区的发展的话，必须及时做出相应的规划。一个经济区域，按我的看法，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经济区域内要有它基本上一致的或互补的经济基础。在这基础上必须有相互联系的交通设施，可以说是区域的流通系统，靠这个系统使这区域的经济基础联成一个经济体系，进行互相流通。经济基础是由从事生产和消费的单位形成的。当前是广大群众的家庭（在农村里是农户，在牧区是牧户）。这许多家庭可说是这个经济区域的细胞。细胞之间通过经济分工合作、交流和服务而聚合成不同的社区集体，在行政系统里即村和嘎查等。若干社区集体中涌现出常说的第三产业如贸易、金融、餐饮、修理等服务性行业，即成为经济较发达的各个层次的中心，一般称作市镇。一个经济中心拥有它所服务的许多细胞，这些就是它的腹地。经济区域是有不同层次的，越发达的经济中心，它的层次也越是往上升级，它包括的地域也跟着扩大，拥有的腹地也越大，包括的基本经济细胞也越多。

从这些构成经济区域的条件来看具体的赤峰市，要进一步发展，交通设施是首先要加以推进的重要条件。通过比较先进的交

通设施才能把已经在自然经济里形成的经济细胞，即农户和牧户，联成具有适当服务体系的社区集体，更把它联系成更高层次的市镇，在这些市镇中发展工商业和第三产业，更形成一个地区更高一级的经济中心，相当于现在的拥有几十万人口的中等城市。当经济发展再进一步时，可以预期在自治区的范围内会出现一个拥有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成为自治区的经济中心。

赤峰市今后在这个经济区域的格局中取得什么地位，要看今后能达到什么样的经济水平。以我个人初步猜测，在自治区的东部地区可能形成一个一定层次上的经济区域。至于这个经济区域的范围多大和它的中心在哪里，现在尚难预测，但是现在的赤峰市，如果上述的铁道系统能够实现，可能是这个经济区域中心的优先选择。

还有一个问题应当及时考虑的是内蒙古自治区作为一个经济区域来看，还需要找到一个为它服务的出门海岸，就是一个向外吞吐的港口。从赤峰市打算，能越靠近这个港口越有利。究竟怎样选择这个港口则必须从国内的总格局来研究。在目前我只能提出这些问题，以供研究和及早考虑，还不能做出具体的建议。

我是一直关心边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这次来赤峰访问，一方面得到了很多新的知识，知道了以前不知道的事实，更重要的，受到深刻的教育，就是发现了许多我还无法作答的问题，推动我进一步研究和思考。我个人不容否认的是已经接近衰老了，能继续从事调查研究的机会越来越少了。但是我感到高兴的是已有年轻的接班人可以继续在我提出的问题上更深入地进行研究下去。我们一定会更加努力地工作，为边区的经济发达做出进一步的贡献。

毕 节 行

—

毕节是贵州省的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地处黔、川、滇三省交界的深山区，是个出了名的穷地方。这里居住着汉、彝、苗、回、布依、仡佬等 30 多个民族，少数民族总共 160 万人，占地区总人口的 26.36%。

对毕节，我应当说“早有所知”，这是因为刚建国不久的时候，1950 年，我作为中央访问团的成员到过毕节，把这个地区跑了一遍。大方、织金、纳雍、水城、赫章、威宁等地都去了。那个时候，毕节一带荒凉得很，汽车在路上跑半天，也难得看见一个人。地方偏僻，人穷，是我们国家穷苦的少数民族地区之一。穷到什么程度呢？我记得很清楚，没有吃的，我们带着米进村，分给村民吃；也没有穿的，访问团慰问演出，放电影，从山上下来看电影的人，不少妇女都没有衣服穿，我们访问团赶快用布给他们做衣服。耳闻目睹这种缺吃少穿的贫困情况，我心中很难过。从那时起，毕节这样的地方怎么能快点发展起来，一直是我的一桩心事。

转眼间 40 多年匆匆过去了，毕节现在怎么样了呢？80 年代以来，我又到贵州去过两次，因为日程紧，从贵阳去毕节的路又不好走，没有实现再去看看的愿望。好在民盟中央已经把毕节地区作为定点的扶贫地区，每年都去人，我还能不时听到些消息，知道一些那里的发展情况。但这毕竟是听说，而不是看到。我历

来的调查习惯是去做实地观察，要亲眼看到，直接问农民和基层干部，听他们讲，心里才踏实。所以，一直很想再去毕节。直到今年6月初，终于有一个机会，使我实现了重访毕节这个多年的愿望。

二

从北京到贵州省会贵阳，两千多公里，坐飞机用了不足三个小时。从贵阳到毕节，两百多公里，坐汽车去，竟用去一整天时间。这个对比，加上我回想起40多年前去毕节行路的难处，使我想到了，要解决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第一就是要解决交通和运输问题。

由于历史的原因，少数民族被挤到了深山区里。山川阻隔造成的闭塞，在历史上固然保护了少数民族的生存，现在却限制了少数民族的发展。要想富，先修路，这个道理在平原行得通，在山区更是重要。逐渐打通少数民族地区通向外界的道路，在条件比较成熟的地方加快打通，这实在是开发少数民族地区第一位的大事。

回头看看历史，这一点也很清楚。诸葛亮为什么能在西南一带站住脚，和中原地区的力量长期对抗？我认为因为他很看重交通，首先解决的就是交通问题。没有这一条，别的都谈不到，有力也使不上。诸葛亮动员很多人力在山上修栈道，这是他的一个创造。位于贵州西部的关岭县境内的关索岭上，至今还保存着较完好的5公里大栈道。《徐霞客游记》中记载道，“索为关公子，随蜀丞相诸葛南征，开辟南道至此”。除了修栈道，诸葛亮还发明了木牛流马。那时说的木牛流马，我认为就是今天的独轮车。栈道是道路，独轮车是运输工具，配合在一起，解决了军需给养

这个最大的问题。在克服交通困难的同时，诸葛亮还注意妥善处理民族关系，化解矛盾，让人口服心服，增强自己的力量，从而打出天下。我觉得诸葛亮最大的历史功绩就是这两条，一是解决交通问题，二是促进民族团结。

想起这段历史，我又联想起另一个历史人物，就是生于 600 年前的奢香夫人。她在历史上的功劳恰巧也是这两条，一是修路，再一个就是民族和睦。我知道彝族历史上有这样一个奢香夫人，我也尊敬这类为民造福的人，就在去毕节的途中专门去看了看奢香夫人墓，增加了对她的了解。

奢香夫人是元末明初人，她的彝名叫舍兹，在当地很受族人尊敬。奢香开始摄理贵州宣慰史一职时，刚满 20 岁。她深明大义，仁厚而有魄力，面对当时乌撒（今贵州威宁）、芒部（今云南镇雄）等地的土酋勾结，屯兵黔境、阻明军入滇以割据西南的局面，奢香夫人审时度势，亲赴乌撒、芒部，力劝诸土酋退兵，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终于使明军顺利进发云南，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当时，明廷派驻贵州的封疆大吏马晔，出于大汉族主义的偏见，骄纵蛮横，残害彝族人民，并视奢香为“鬼方蛮女”，总想开罪于她。一次借机挑起事端，“不分情由指令壮士裸香而笞其背，企图辱香激变，俟其反而后加兵镇压”。奢香属下四十八部头人得知奢香受辱，发动造反雪耻，奢香却极为冷静地当众揭露了马晔逼反的恶毒用心，避免了一场殃及贵州各族人民的战祸。后来，奢香夫人又远赴京师，即今南京，向明太祖朱元璋面陈真相后，约定回贵州勘山凿险，开置驿道之事。有了道路，朱元璋“经理南荒”就有了便利，也能促进彝族地区的发展。回到家乡，奢香就率各部上山开路，一条向西，经贵阳，过乌撒，达乌蒙（今云南昭通）；一条向北，经草塘（今瓮安县境）到容山（今湄潭县境），沿途设了龙场、陆广、谷里、水西、奢香、金

鸡、阁鸦、归化、毕节等9个驿站。这两条驿道纵横贵州，打通了和云南、四川、湖南的通道，有利于民族交往，稳定了西南的政治局势，推动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毕节通向贵阳的路，就是奢香在当时开出来的。驿道加驿站，形成交通的系统，解决了毕节通往外界的交通问题。所以我觉得，毕节能有今天，奢香夫人应该说是第一功。

三

诸葛亮和奢香夫人，一个打天下，一个治理地方，都抓住了两个最关键的问题，解决好这两个问题又是相互联系的。在历史上曾经处于隔绝状态的地区和民族，只有开通道路，才谈得上交往，人和人交往，物资和物资交换，思想观念也随之交往、交流，这样才有利于相互团结，有利于民族地区的发展。

说到底，民族关系不是空的，要从眼前的、脚下的事情一点点做起来，从人对人的具体帮助做起来。在战争时期，首先要帮助少数民族建立安全感，尤其是在冲突起来时，要力避伤害。当年刘伯承将军四渡赤水后折返贵州，进军安顺，就遇到有误解的彝族同胞，抢去枪支，还扒走战士的衣服。刘伯承为帮助他们了解红军，除了要全军保持秋毫无犯，还与彝族沽基部落领袖小叶丹叔侄歃血为盟，结拜兄弟，留下了一段民族关系的佳话。建国时期，安全感已不成问题，就要帮他们发展经济，改善生活。在交通还处于闭塞状态的地区，最重要的就是帮他们修路，为当地创造同外界接触、交往和合作的条件。

这次到毕节，第一个让我高兴的事就是当地的乡亲们已经自己干起修路的事情了，不是小打小闹，而是大干，一上来就修高等级公路。我从贵阳到毕节，走了一天的公路，路面既不平，路

宽也不够。临近毕节的时候，公路宽阔了起来，虽然还只是铺筑了土基、石基，尚未来得及压好路面，车子只能慢速行驶，但是这段高等级公路已经有了大致的模样了。同行的当地领导告诉我，这是当地群众自己出钱修的，一共集资 5000 万元，可修 40 米宽的公路 20 公里，是毕节有史以来通向外界的第一段高标准公路。他们在还较穷困的情况下，尽最大努力修起这段路，再往前实在没力量了。他们“希望能感动上帝，国家能帮助接着修下去”。

除了修公路，毕节的群众和干部也在为修铁路而努力。有一条国家拟议中的隆黄铁路，北起成渝铁路的隆昌站，南接贵昆铁路的黄桶站，在贵州境内要穿过毕节。毕节的群众懂得这将是沿线人民的温饱之路、造福之路，为了争取能使隆黄铁路列入国家“九五”计划，他们节衣缩食拿出钱来支持前期考察、勘测和论证工作。在少数民族地区、偏远地区、贫困地区，老百姓舍得减少吃穿，自己省出钱来找科研单位，帮助国家有关部门拿主意，这是不多见的。听到这些情况，看到毕节人民的干劲，我心里很不平静。我想，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党中央和国务院历来非常重视，毕节的少数民族同胞这一番诚心可鉴的艰苦奋斗，是应该而且能够感动上帝的。

毕节人民的发愤图强，既表现在修公路、修铁路上面，在生活当中也有了初步的反映。我去毕节市郊访问观音桥办事处塘房村的时候，就实际看到了少数民族同胞在生活上的提高。在苗族同胞家里，我看到他们已经住上了瓦房，屋里边墙上干干净净；锅里煮着猪食，是从前人才吃得上的东西。村里有个人办起了工厂，带动了一片，1994 年的人均收入到了 1200 元，超过了贵州的平均水平。这个企业是用老办法造砖，发动大家把劳动力变成物质财富。原来零零散散的劳动力组织起来，很快就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其中既没有很大的资金投入，也不需要很高的科学技

术。这可以给我们一个启发：现代化是目标，可是又不能一步到位，这就要求我们从实际出发，不脱离现在的生产力水平，找出群众能接受的、现在就能动手干起来的事情，把现有的资源变成财富。造砖的泥土，山上的石头、特产，零零散散的劳动力，这都是资源。我们的本钱还是在老底子上边，从这里起步，一步一步向现代化目标走过去。在这方面，增加劳动产值的潜力很大，但要都靠老百姓自己去想，他不一定想得好。这就需要政府出面，干部带头，出主意，想办法，为增加老百姓的收入提供服务。

四

说到资源问题，这是考虑毕节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在文章开头时说毕节是个穷地方，这个穷字，主要是指收入偏低，衣食住行的条件有待提高。如果说到资源，那就要用“富”这个字了。

水能资源——乌江水资源梯级开发规划的洪家渡电站就在毕节，东方电站的一部分也在毕节；

农业资源——毕节是全国四大烤烟产区之一，还盛产生漆、杜仲、天麻等，畜牧业也有优势，是国家南方畜牧业基地；

旅游资源——有被誉为“高原明珠”的威宁草海，有集世界岩溶之大成的织金洞，有举世罕见的百里杜鹃林带，都是当今旅游者所热衷的自然景观。

有这么丰富的资源，为什么至今仍有较大的贫困面呢？依我看，原因主要有三。一是生态条件差，山高坡陡，河谷深切，土地贫瘠破碎，自然灾害多，农业生产水平低下；二是社会发育程度迟缓，人口增长率偏高，教育程度偏低，经济文化落后；三是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最突出的就是交通，一无铁路，二无水

运，公路等级又低，致使毕节丰富的资源迄今为止还处于基本未开发状态。这样的状态，当然要严重制约经济发展。毕节地区1994年末人口总数为620万人，其中贫困人口200万，几乎占去1/3。这200万还生活在温饱线以下的毕节同胞，能不能随着“八七扶贫计划”的实施在本世纪末脱贫？我注意了毕节过去10年里的脱贫进度，算了一笔账，看来还不能不担忧。

1985年的时候，毕节地区8个县中有6个贫困县，贫困人口412.28万人，占6县农业人口的91.4%。到1994年，还有5个贫困县，贫困人口200万人，10年当中减少了212万人。平均每年脱贫21万多人。按这样的进度计算，毕节地区的彻底脱贫还需要10年时间。可是从现在到本世纪末，只有四年半不到的时间了，要如期完成“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看来是要大大加强扶贫力度，加快扶贫进度。我们要有足够的紧迫感，针对上述阻碍毕节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扎扎实实地做工作，而不能有丝毫懈怠。

要克服这三个方面的困难，需要做全面的努力。尤其是改善生态条件。提高社会发育程度，更是一个长期积累才能见效的过程。相比起来，现在更急需做，有可能做，并且做了就能牵动全面进步的事情，就是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首先解决交通问题。有了交通，毕节的资源可以开发，特产可以运出去，就变成宝贝，变成财富了。能把当地的资源变成钱，就有了自我发展能力，就可以进入良性循环了。

我想，在农业时代一直因交通闭塞、地处偏远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蕴藏着在进入工业时代过程中后来居上的巨大能量。一旦打开山门，铺上通途，这类地区将在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事业中发挥不可低估的作用。

时光流逝，离下个世纪越来越近了。我曾经说过自己有望在有生之年看到中国人民彻底告别贫困的话。希望犹在，这次毕节

之行，却更增加了紧迫感。我一生志在富民，努力不懈，垂暮之年，更要奋力。然毕竟八十有五，腿脚渐趋乏力，真希望通达毕节的火车早日开通，也好免我汽车颠簸之累，能乘火车再访毕节，再为毕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为当地同胞脱贫尽我一臂之力。

1995 年 8 月

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

1930 年我转学燕京大学师从吴文藻老师学习社会学。在他的指导和影响下，认识到要科学地认识中国社会，吸收西方人类学实地调查的方法和着重现实的分析是一条比较踏实可行的路子，因此我在 1933 年升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师从史禄国老师学习人类学。我在清华学习的两年，主要是学体质人类学。1936 年秋季我接着去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师从马林诺斯基老师学习社会人类学，1938 年在抗日战争期间返国。到达云南后即在内地进行农村调查，按马老师的功能观点和实地调查方法实行吴老师所提倡的“社区研究”，一直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在这以前，1935 年在清华研究院结业后，接受史禄国老师的建议去到少数民族地区实习一年。因而到广西大瑶山实地调查瑶族的体质和社会组织。这次实习可说是我民族研究的初次尝试。1936 年利用夏季回家乡休养的机会又在家乡江苏吴江的“江村”进行了一次为期近两个月的农村实地调查。

也许在这里我应当加一点说明，吴文藻老师所提倡的“社区研究”，用学科名称说实际上是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结合。社区是指人们在一定地区内经营共同生活的群体。它可以是人数较少，经济较简单，文化较低的原始族群，也可以是人数较多，经济和文化较发达的农村、集镇和城市。在这种观点下，社区研究可以包括我 1935 年的广西瑶族调查，1936 年的家乡江村农村调

查和后来 1939 年开始的云南内地农村调查。在这些不同的社区里所研究的对象和所用的研究方法是相同的。社区研究可说是贯穿在我这一生学术工作中的主线。社区研究这个名称、采用的研究方法和观点与中国传统的学科分类不完全一致，是否能为学术界接受是可以讨论的。为了避免学科名称上的争论，我今天采取以研究对象为区别把“社区研究”分成两个方面，一是民族研究，一是农村研究以及后来的城乡研究。在今天这个讨论会上我将限于略述我所从事的民族研究这一方面。

二

以我一生的学术经历来说，不同时期曾有不同的重点，有时是民族研究，有时是城乡研究。从个人选择研究对象来看，不仅决定于个人的兴趣，个人所处的客观条件也很重要。以我本人说，1936 年我在 LSE 学习时，我的导师建议我以江村调查的资料为依据写出我的博士论文，即后来出版的 *Peasant Life in China*，后来在云南的研究工作就偏于农村研究，一直到抗战结束。1949 年新中国成立，我的研究工作重点转向了民族研究。现在回想起来，这次转向主要是由于当时客观形势的改变，请允许我在这里多说几句。

新中国的成立在我国历史上是件空前的大事，全国社会结构起了重大变化，其中之一是民族关系的大转变，从不平等的关系转变为平等关系。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民族间的关系十分复杂，但是几千年来基本上没有变的是民族间不平等的关系，不是这个民族压倒那个民族，就是那个民族压倒这个民族。在这段历史里中国在政治上有过多次改朝换代，占统治地位的民族也变过多少次，但民族压迫民族的关系并没有改变。直到这个世纪的初

年，封建王朝覆灭进入了民国时代，才开始由孙中山先生为代表推行了五族共和的主张。又经过了几乎半个世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方出现各民族一律平等的事实，并在国家的宪法上做出了规定。从此我国各民族间的相互关系出现了一个新的民族平等的时代，现在已又经过了近半个世纪了。今天回想起我们中国这个民族关系的根本变化，如果针对当前世界上民族战争至今未息的形势来看，不能不承认民族平等是件有关人类共同命运的根本大事。在一个和平大同的世界里，民族平等是决不能少的条件。这个条件在我们中国首先实现，在人类历史上是应当大书特书的。

为实现民族平等，我们必须建立新的制度，在政治体制上我们要有一个有各族代表共同参加的最高权力机关，即人民代表大会。但是在开国初期我们还不清楚中国究竟有多少民族，它们叫什么名称和各有多少人口。

为了摸清楚有关各民族的基本情况，建立不久的中央人民政府于1950年到1952年间派出了若干“中央访问团”分别到各大行政区去遍访各地的少数民族（汉族以外的民族因为人口都较少，所以普通称作少数民族），除了宣传民族平等的基本政策外，中央访问团的任务就是要亲自拜访各地的少数民族，摸清楚它的民族名称（包括自称和他称）、人数、语言和简单的历史以及他们在文化上的特点（包括风俗习惯）。由于我本人学过人类学，所以政府派我参加中央访问团。这对我说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首先是我在政治上积极拥护民族平等的根本政策，愿意为此出力，同时我觉得采用直接访问的方法去了解各民族情况，就是我素来提倡的社区研究。因之我积极地接受了这项任务。我在1950年和1951年先后参加西南及中南访问团，并负责领导贵州和广西两个省的实地访问工作。这两年可说是我进行民族研究真正的开始。

在访问团的工作中，我有机会翻山越岭，穿林涉水，深入到

贵州和广西两省分布在各处的少数民族的村寨中去，和群众亲切联欢和交谈。在和众多的少数民族直接接触中，我才深切体会到民族是一个客观普遍存在的“人们共同体”，是代代相传，具有亲切认同感的群体。同一民族的人们具有强烈的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一体感。由于他们有共同的语言和经常生活在一起，形成了守望相助、患难与共的亲切的社会关系网络。总而言之，我理解到了民族不是个空洞的概念而是个实实在在的社会实体。同属于一个民族的人们的认同感和一体感是这个社会实体在人们意识上的反映，即一般我们所说的民族意识。民族意识具体表现在不仅对自己所属的民族有个名称（自称），而且别的民族也常用不同的名称相称（他称）。一般说，我们所接触的少数民族群众都知道自己属于哪个民族。为了答复中国有哪些民族的问题，我们认为首先可以从各地少数民族自报的民族名称入手。

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中，自报登记的民族名称全国总共有400多个。分析这张自报族称的名单发现其中有不少问题。有些自报是少数民族的实际上却是汉族，由于不同原因自认为或被认为是一个民族而且有一定的名称，例如广西的“六甲人”，湖南的“哇乡人”等。有些是某一少数民族的一部分，由于不同原因，被分成若干民族而且各有不同的族称，例如云南的“阿细”、“撒尼”、“阿哲”、“普拉”等都是彝族的分支。因之，我们不能直接根据自报的族名来决定他们是不是一个民族。我们必须对这些自报的族名逐一进行甄别。这是一项比较复杂的工作，我们称之为民族识别工作，从1953年开始起直到1982年告一段落，一共有30多年。经过我们识别之后还要和当地有关民族群众协商取得同意后，才由中央分批审定和公布。1954年确认了38个少数民族，1965年确认了15个少数民族，1982年又确认两个少数民族，至此一共确认了55个少数民族。加以汉族，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一共有56个民族。这些民族的正式名称，

按名从主人的原则，还要经过协商才予以正式确认。民族识别工作并没有结束，因为还有极少数族群的识别没有定论，这些疑案还要进一步研究才能做出决定。

三

民族识别工作牵涉到怎样才可以认定是一个民族的理论问题。我在上面已说过，从我在民族地区实地和少数民族接触中体会到民族不是一个由人们出于某种需要凭空虚构的概念，而是客观存在的，是许多人在世代集体生活中形成，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上发生重要作用的社会实体。对于民族的形成，所具的特征进行说明是属于民族理论的范围，所以民族理论是民族识别的依据和标准。在解放初我们可以用作参考的民族理论是当时从苏联传入的。当时苏联流行的民族定义，简单地说就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这个定义是根据欧洲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所形成的民族总结出来的。这里所提出的“在历史上形成”这个限词，就说明定义里提到的四个特征只适用于历史上一定时期的民族，而我们明白我国的少数民族在解放初期大多还处于前资本主义时期，所以这个定义中提出的四个特征在我们的民族识别工作中只能起参考的作用，而不应当生套硬搬。同时我们也应当承认从苏联引进的理论确曾引导我们从这个定义所提出的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文化的心理素质等方面去观察中国各少数民族的实际情况，因而启发我们有关民族理论的一系列思考，从而看到中国民族的特色。

先说有关“共同语言”这个特征。我已说过，我们所观察到的事实是，聚居在一起的少数民族是用相同的语言交谈的，没

有共同的语言也就不可能进行日常的共同生活。同时我们也看到他们的语言和其他民族的语言不同，汉人和不同民族的人不能直接用各自的语言通话。这是说各民族有各自的语言，不同的民族没有共同语言，要互相理解必须通过翻译。这一点是容易明白的。但是自认为是同一民族的人，如果来自不同地方，我们发现他们之间也有并不一定能直接通话的，就是说他们之间语言也有差别。这是在我们汉族中也常常可以遇到的情况。比如，我们苏州人初次碰到福建人或广东人，就通不了话，这是因为各地的方言不同。方言学起来并不难，因为这不过是各地居民口音不同，在语言的文法结构上和所用的字汇上基本是相同的。这里就发生了“共同语言”共同到什么程度的问题。这问题牵涉到语言学的专门知识。在语言学里按语言的差异程度分出语系、语族和语支。同一语支里还要分地区间的变异，就是方言。不掌握这门专门知识的人，单凭听觉不易分清差异到什么程度应该说是不同语系、语族、语支或不同方言。在进行民族识别工作时，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只有依靠语言学专家。幸亏我们的民族研究早就注意到少数民族的语言调查，所以当我们进行民族识别工作时，已有足够的少数民族语言资料提供我们参考。

从语言角度审核上述的民族名称自报名单，可以发现这张名单中有两种情况，一是所报不同的民族有不少语言是相同或相近的，另一种是所报同一民族中包含着不同语言。第一种情况比如广西的“布壮”、“布越”、“布雅依”、“布衣”、“布土”、“布雄”、“布依”等等讲的都是侗傣语系的语言，经过说这些话的人相互对话之后都同意他们所说的话是出于同一母语，所以自愿合并到壮族这个民族中去。第二种情况比如我 30 年代调查过的广西大瑶山的瑶族，大瑶山里就有三种不同的语言，第一种是属苗瑶语族瑶语支的勉语（盘瑶），第二种是属苗瑶语族苗语支的布努语（花篮瑶），第三种是属壮侗语系侗水语支的拉加语（茶

山瑶)。这些说不同语言的人虽各有自称，但都一致认同于瑶族。我们根据自愿的原则认定他们都是瑶族的一部分。瑶族在其他地方还有许多不同自称的群体，一起都称为瑶族。

这里应当说明的是我们并不把上述“定义”所提到的特征孤立起来对待，而认为必须和其他特征结合在一起，特别要考虑这些合并在一起的自报单位间的历史上的渊源关系，因为中国历史的一个特点是长时期中不同民族在不断的流动中有的被分散了，有的被孤立了，也有的在相互接触中融合了。在分分合合中形成了当前各族交杂分布在广大地域上的格局。我们这时要进行识别，必须采取历史观点和自愿原则。同时要承认这个复杂的情况，并不能用行政手段加以定论，所以凡是一时不易解决的事例，宁可存疑待决，不作武断。

至于“共同地域”的特征，我们在识别工作的实践中提出了“民族聚居区”的概念加以补充和修正。我们承认同一民族的人倾向于居住在同一的地区，但是不应把“同一地区”和“共同地域”等同起来，因为同一地区里可以有不同民族的人共同聚居在内。这个现象在中国特别突出，我们称这为“大杂居、小聚居”。据1982年人口普查的资料：聚居在全国民族自治地方的少数民族人口只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74.5%，约有1/4的少数民族人口杂居或散居在全国各地。总之中国各民族的居住形态并不是区划齐整，界限分明的，而是互相插花、交错杂居的，这是中国各民族间长期交叉流动和相互交往的结果。尽管如此，从民族人口分布上来看，同一民族聚居的倾向还是很明显的，尽管聚居区有大小，同一民族的聚居区可以分散在各地，甚至并不连接。在一个民族的聚居区内还可以有不同民族聚居或散居在内。

我们根据中国这个特点提出“民族聚居区”的概念，不仅在理论上有它结合实际的重要意义，而且在一定国家怎样处理民族关系上体现了民族平等的原则。我认为西方民族理论中把

“共同地域”作为民族特征和政治观念中把国家和领土密切结合在一起是分不开的。正因为这种概念，使民族要和国家结合成为民族国家，进而要求国家领土的完整，这不就成了当前西方民族纠纷连绵不断、民族战争至今未息的一个原因么？和西方的民族理论和民族关系相对照，我觉得我们以“民族聚居区”的概念代替民族定义中的“共同地域”为特征的认识是值得令人深思的。

我愿意在这里特别提出的是这个新的概念已经写进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总纲第四条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根据这条规定我们中国的少数民族都享受到自治的权利，同时所建立的自治地方内不排斥其他民族杂居在一起，甚至一个区域如果有若干人数相当的少数民族共同聚居在内，可以建立多民族联合的自治地方，同一少数民族可以有不相连接的好几个自治地方。

接着可以就上引前苏联流行的民族定义中的第三个特征“共同经济生活”提出一点意见。我们经过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加以检讨后，也认为这是不符合我们国情的。我已说过前苏联流行的民族定义是总结欧洲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情况。当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在欧洲确曾出现过建立民族共同的统一市场的趋势，而实际所形成的的是一个超越国界的殖民主义市场，暂且不论这个包括殖民地在内的民族国家市场是否能说是现代民族的特征，即以西方现代民族来说一个民族内人民的经济生活能否说是“共同”也是一个问题。这个“共同经济生活”显然包含着许多不共同的层次，或说是阶级，甚至有人说是两个民族的矛盾共处。无论如何，我们不能照搬“共同经济生活”来作为中国少数民族的特征。一般说，中国少数民族在解放时大多是处于前资本主义的小农场耕种和草场放牧的经济状态。至多我们大体上可以说中国少数民族在解放前只有相同或相似的（而不是共同的）经济生

活。

在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生活方面可以提出来注意的是它们之间，特别和汉族之间的密切关系。历史上汉族凭借其在经济和文化上比较国内其他各族为先进的优势，已经长期深入到其他民族聚居的区域，建立了沟通各民族的经济渠道。汉族聚居的商业据点分散在几乎所有的少数民族聚居区里遍布全国，构成了巨大的经济流通网络，起着汉族吸收和传播各族物质和精神文化的作用，逐年累月地把各族捆成一个高层次的共同体，这就是我在下面将要提出的中华民族。

最后让我们说一下关于“共同文化特点的共同心理素质”。这也许是在前苏联流行的民族定义中最重要的一個特征。但正是这个特征我们最不容易捉摸。以我个人来说，至今还是没有甚解。有一段时间我们笼统把它看成是少数民族所有的那些特殊的风俗习惯，而且常被他们视作超俗的、不允许触犯的、带有神圣性质的象征。这种理解固然容易观察，但又似乎和上述定义中的意义还有点出入。

在捉摸这个特征的意义时，我特别注意到心理素质这几个字，想从人们心理方面去看民族意识是怎样形成的。这个思路就引导我在理论上进一步探索。在探索过程中我回想到早年在社会学里学到的 in-group 或 we-group 一词。In-group 或 we-group 就是指我们把周围所接触到的各种人一分为二，一是自家人，二是陌生人，简单说是把人己之别用来区别不同的群体，而且用不同的感情和态度来对待这两种群体。凡是和自己同属一个群体的，即是自家人，相互之间痛痒相关，休戚与共。自家人的认同意识就发生了共同的使命感和共同的荣辱感。In-group 或 we-group 不就是“认同意识”所产生的么？民族不就是一种 in-group 或 we-group 么？从这条思路，我找到了民族这个群体的心理素质，认为所谓民族心理素质其实就是民族认同意识。民族认同意识并

不是空洞的东西，我们每个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反省中体会民族认同意识是什么，因为当今之世每个人都有自己所属的民族，都有民族意识。

以上是我结合民族实际对民族理论的一些思考。民族实际是因地因时而变化的，我们对民族的认识也应当根据实际的变化而不断发展。中国的现实给了我们学习民族理论的好机会。

四

在这几年民族研究实践中，我对我国在民族这一方面的特点有了一点认识，同时也体会到民族是在人们共同生活经历中形成的，也是在历史运动中变化的，要理解当前的任何民族决不能离开它的历史和社会的发展过程。现况调查必须和历史研究相结合，在学科上说就是社会学或人类学必须和历史学相结合。看来不仅是我个人的体会，也是当时从事民族研究的学者以及领导上的共同认识。

1956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组织一个科研队伍对中国各少数民族进行一次全面的社会历史调查。参与这项调查研究的工作人员前后总共超过1700人，分别在不同地区的少数民族中进行实地调查，并反复分组分批进行研究讨论。从1957年开始，60年代中期告一段落，一直到改革开放的初期1991年才结束。调查结果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出版“五种丛书”，除一本综合性的概况介绍外，包括少数民族的志、史、语言的专刊和实地调查资料的汇编，全书共计403册，8000万字，这项大规模的民族研究工作历时30多个年头，其中虽则因“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停顿过10多年，从其成果来说，应当说是我国民族研究的空前创举。

这次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我只参加了开始的一段，负责筹备、组织和开始时在云南省的实地调查。1957 年我被召回京，不久就受到政治上反右斗争扩大化的影响，被迫停止社会调查工作。1966 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我的正常社会生活都受到冲击，直到 1980 年才公开改正我的政治地位和恢复我正常的社会生活。从此我获得了学术上的第二次生命，到目前已有 16 年。合计起来，若从 1935 年瑶族调查作为我学术生命的开始，至今已超过 60 年，其中由于政治原因丢掉了 23 年，真正把时间主要花在学术工作上的至目前为止约 30 多年。我在第二次生命中，尽力想一天当两天用，把丢掉的时间捞回来，这个愿望固然不坏，能否实现，还得看天命。

在我得到学术上的第二次生命时，正值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国民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社会各方面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我身逢盛世，使我的学术工作又发生了一次新的定向。起初我还打算用我这第二次生命继续把民族研究做下去。但在 1981 年为了去伦敦接受赫胥黎奖章，我听从老师 Raymond Frith 教授的建议，准备利用这机会向校友们讲一点我家乡农村解放后的情况，因此我又回到家乡的农村做了一次短期的访问。这次访问中我深深受到当时农村发展热浪的刺激，促使我决心追随这个历史性转变的大潮流，把研究重点转移到农村社区研究，接着上升到小城镇研究，直到最近又上升了一步，对经济区域的形成和中心城市的勃兴发生了研究兴趣。因此在最近这 10 多年中民族研究多少被挤掉了一些，虽则我心里对民族研究旧情未衰，恋恋不舍，有机会还常到少数民族地区去拜访我的老朋友。

当我参加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时，我心里怀着一系列问题有待研究。这些问题一直挂在心上，我虽则 1957 年以后已无缘在实地调查中寻求答案，但并没有在思想中抹去。困惑我的主要问题是汉族对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发展发生过什么作用和怎样

去看待包含汉族和国内所有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

在我开始参加民族研究的那一段时间里，我们一提民族工作就是指有关少数民族事务的工作，所以很自然地民族研究也等于是少数民族研究，并不包括汉族研究。回想起来这种不言而喻的看法是在中央访问团时期已经形成了。中央访问团的实际任务就是向少数民族讲清楚在新中国他们已有当家做主的权利，即宣传民族平等的政策。因之访问团只访问少数民族，并不访问汉族。这样的任务决定了工作的程序也以一个一个少数民族为对象分别进行访问。在我们组织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时，也是同样安排，最后还是以一个少数民族为单位编写出各族的历史，55个少数民族各有一本简史，共55册。初看来这种体例倒也是顺理成章的，深入推考一下，使我想到了这种分民族写历史的体例固然有它的好处和方便的地方，但是产生了我上述的困惑。

我的困惑出于中国的特点，就是事实上少数民族是离不开汉族的。如果撇开汉族，以任何少数民族为中心来编写它的历史很难周全。困惑我的问题，在编写“民族简史”时成了执笔的人的难题。因之在60年代初期有许多学者提出了要着重研究“民族关系”的倡议。着重“民族关系”当然泛指一个民族和其他民族接触和影响而言，但对我国的少数民族来说主要是和汉族的关系。这个倡议反映了历史研究不宜从一个个民族为单位入手。着重写民族关系固然是对当时编写各民族史时的一种有益的倡议，用以补救分族写志的缺点，但并没有解决我思想上的困惑。

我不是专攻历史学的人，但对过去以汉族为中心的观点写成的中国的历史一直有反感。怎样能跳出这个观点来写中国历史呢？说起这个问题，在我从中央访问团回来后参与筹备中央民族学院的工作时已经有所自觉和考虑。当时我建议聘请一批历史学家、语言学家、民族学家来民院执教，并推动民族研究。这个建议得到领导上的同意，而且确是向这方面走出了一步。不久我又

建议在课程里应当有一门综合性地介绍各民族历史的基础课时，却找不到愿意承担讲课的人，因为许多历史学专家，并没有讲授这门课的准备，过去确是从来没人从民族的角度有系统地讲过中国通史。最后我无可奈何，只有自己上台试讲了。这个课程只讲了一个学期，写下了一本讲义，最后还是不能不知难而退，没有继续下去。这本讲义并没有外传，束之高阁，因而在“文革”期间得以保留了下来。

1989年夏我到威海暑休，当时已年近80岁。出于我对民族研究的留恋，老问题又涌上心头。我带了这本幸存的讲义，打算利用这近一个月的余暇，重新把这20多年里的思考结合这本讲义，整理出一篇文章来，这时我正接到Tanner讲座之约到香港中文大学作一次学术讲演。我打算就用这篇文章作讲稿。这篇文章的题目是《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在这篇文章中我初步走出了郁积多年在民族研究上的困惑，也提出了一些值得继续探索的观点。

这篇讲话的主要论点第一是：中华民族是包括中国境内56个民族的民族实体，并不是把56个民族加在一起的总称，因为这些加在一起的56个民族已结合成相互依存的、统一而不能分割的整体，在这个民族实体里所有归属的成分都已具有高一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即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这个论点我引申为民族认同意识的多层次论。多元一体格局中，56个民族是基层，中华民族是高层。

第二个论点是形成多元一体格局有个从分散的多元结合成一体的过程，在这过程中必须有一个起凝聚作用的核心。汉族就是多元基层中的一元，由于它发挥凝聚作用把多元结合成一体，这一体不再是汉族而成了中华民族，一个高层次认同的民族。

第三个论点是高层次的认同并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层次的认同，不同层次可以并存不悖，甚至在不同层次的认同基础上可以

各自发展原有的特点，形成多语言、多文化的整体。所以高层次的民族可说实质上是个既一体又多元的复合体，其间存在着相对立的内部矛盾，是差异的一致，通过消长变化以适应于多变不息的内外条件，而获得这共同体的生存和发展。

这几个论点是我从研究中国民族的现状和历史的实践中得到的。也可以说，经过了多年探索和思考得到的一些不够全面的认识。在这种认识里中华民族、汉族和少数民族都各得其所，分属于不同层次的认同体，尽管我们在语言中都用民族同一个名词，但它可以指不同层次的实体。汉族和 55 个少数民族同属于一个层次，他们互相结合而成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是 56 个民族的多元形成的一体，高一层次认同的民族实体。如果把具有多元一体格局的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如实地摆清楚也就是一部从民族观点描述的中国通史了，也可以说就是我在民族研究领域中悬想已久而至今没有能力完成的一个目标。

五

我总觉得一个人的思想观念是在接触实际中酝酿和形成的，理论离不开实践。我这篇“多元一体格局”的根子可以追溯到 1935 年广西大瑶山的实地调查。同时我觉得只有实践也是不够的，还须从已有的理论中得到启发和指引。我在大瑶山的实践中能看到民族认同的层次，再联系上中华民族的形成，其间实践固然重要，但潜伏在我头脑里的史禄国老师的 Ethnos 论应当说是个促成剂。

在上面讲到民族语言时我已提到我在 1935 年在大瑶山的瑶人中已看到有说不同语言的集团：说瑶语的盘瑶（自称勉）、说苗语的花篮瑶（自称炯奈）、说侗语的茶山瑶（自称拉加）等。

1978 年重访瑶山时，瑶族简史的记载结合了我当地的查询，使我对这地区瑶族的历史有了一些初步认识。据说在 14 世纪以前，瑶族的先人早就生活在南岭山脉一带。从用汉文记载的史料来看，这地区的民族斗争自明代就日益激烈。到 15 世纪末明王朝曾调兵遣将对当地土著民族发动了一次著名的战役，战争就发生在今金秀瑶山附近的大藤峡这一带。当时的土著民族，主要是瑶族，他们从此被赶入山区，形成了“无山不成瑶”的局面。30 年代我所调查的花篮瑶就在今金秀瑶山，当时称大瑶山。金秀瑶山里现在的瑶族居民是不同时期从山外迁入的。这些从不同地区迁入这个山区的人，都是在山外站不住脚的土著民族，进山之后这许多人凭险恶的山势，得以生存下来。他们为了生存不得不团结起来，建立起一个共同遵守的秩序，即维持至解放时的石牌组织。对内和平合作，对外同仇敌忾，形成了一体。山外的人称他们为瑶人，他们也自称是瑶人，成为一个具有民族认同意识的共同体。在我的心目中，也成了一个多元一体的雏形。

后来我和各地的少数民族接触多了，对各少数民族的历史知识也多了些，又联系上汉族本身感觉到由多元形成一个很像是民族这个共同体形成的普遍过程。再进一步看到当前我们所认同的“中华民族”也并不例外，于是在我思想里逐渐形成了解决我在上节里所提到的民族研究里的困惑的一条思路。50 年代初我在民族学院试讲民族历史概论时，就用这个初步形成的思路写下了一本试用性的讲义，1988 年写出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为题的 Tanner 讲座的讲稿了。这是我思想上的一次探索，提出了一些值得反复论证的初步理论性的意见，还没有到成熟的阶段。

1990 年国家民委召开一次学术讨论会，评议我这篇讲稿。不少学者专家分别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用从其他少数民族的历史资料引证多元一体这种格局。大家共同承认这是一个新观点、新体系和新探索。这次讨论会的论文后来编成《中华民族研究

新探索》一书，1991 年出版。

重读我这篇讲稿，我觉得理论上值得进一步论证的是以民族认同意识为民族这个人们共同体的主要特征，进而引申到民族认同意识的多层次性。为了追溯我自己这个思路的渊源，我首先想到的是初学社会学时学到的 we-group 或 in-group 的概念。W. G. Sumner 在他的名著 Folkways 一书里指出了人们行为规范存在着两重性，对自己所属团体内部的同情和对外界团体的怀疑和仇恨，也就是具有我们老话所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成见。前者他称作 in-group，后者称作 out-group，即团体有内外之别。后来又有人用 we-group 来称 in-group，意思是凡属 in-group 的人相互间认为是自家人，用“我们”这个认同的词来相称，所以可以说是个认同的群体，我觉得民族就是属于 we-group 或 in-group 的一类。所以我把民族认同意识作为民族这种群体的心理特征。

我又想起初学人类学时读过史禄国老师的一本名称 Ethnos 的小册子，那还是在 1934 年。后来史老师又把这本小册子收入他的巨著 Psycho-mental Complex of Tungus (1936) 作为一章。Ethnos 这个拉丁字很不容易翻译，它多少和我们所说的民族有密切关系，但是直译为民族似乎还有点问题，尤其是在史老师的理论里，Ethnos 包含着一大套丰富的含义。Ethnos 在史老师的看法里是一个形成 Ethnic Unit 的过程。Ethnic Unit 是人们组成群体的单位，其成员具有相似的文化，说相同的语言，相信是出于同一祖先，在心理上有同属一个群体的意识，而且实行内婚。从这个定义来看 Ethnic Unit 可说是相当于我们所说的“民族”。但是 Ethnos 是一个形成民族的过程，一个个民族只是这个历史过程在一定时间空间的场合里呈现的一种人们共同体。史老师研究的对象是这过程的本身，我至今没有找到一个恰当的汉文翻译。Ethnos 是一个形成民族的过程，也可以说正是我想从“多元一体”

的动态中去认识中国大地上几千年来，一代代的人们聚合和分散形成各个民族的历史。能不能说我在这篇文章里所写的正是史老师用来启发我的这个难于翻译的 Ethnos 呢？

如果我联系了史老师的 Ethnos 论来看我这篇“多元一体论”，就可以看出我这个学生对老师的理论并没有学到家，我只从中国境内各民族在历史上的分合处着眼，粗枝大叶地勾画出了一个前后变化的轮廓，一张简易的示意草图，并没深入史老师在 Ethnos 理论中指出的在这分合历史过程中各个民族单位是怎样分、怎样合和为什么分、为什么合的道理。现在重读史老师的著作，发觉这是由于我并没有抓住他在 Ethnos 论中提出的，一直在民族单位中起作用的凝聚力和离心力的概念。更没有注意到从民族单位之间相互冲击的场合中发生和引起的有关单位本身的变化。这些变化事实上就表现为民族的兴衰存亡和分裂融合的历史。

回顾我民族研究的经历，已有 30 多年没有深入少数民族中去实地调查研究了。像上面提出的那些问题，看来我今生已难于亲自去研究了，因此我只有指望年轻一代有人愿意接下去继续我在这方面的探索。这正是我建议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把民族凝聚力这个问题列入他们今后研究课题的原因。

1996 年 8 月 20 日于北京北太平庄

小民族 大家庭^{* 1}

这几天，在佳木斯和同江的同志们的帮助下，我看到了自己多年来想看的東西，有很多感想。趁今天这个机会，和大家谈谈心。我想分三点来谈，一是我的来意，二是我们国家这个民族大家庭怎样对待小民族，三是要帮助像赫哲族这样的小民族发展，不能离开区城经济的发展。

先谈第一点。我在家里排行最小，知道当小弟弟的好处，也知道小弟弟的难处。后来我参加民族工作，对小民族有同情心。想来看望小民族的同胞，比如人数只有几千人的赫哲族，是我多年的心愿。这个话要从 50 年前说起。开国的时候，我是清华大学的教授，是个知识分子。我是在解放前参加民主运动，同共产党合作。解放后，我代表民盟参加了第一次全国政协会议。这个会议制定了共同纲领，成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我也进入了周总理领导的政务院，是文教委员会委员。1950 年，李维汉同志把我从文教委员会商调到民族事务委员会，同时参加中央访问团。这个事情说明，我是通过参加民族工作进入到革命队伍里的。当时，我们国家有多少个少数民族，分布在什么地方，他们的历史怎么样，现状怎么样，都还不很知道，需要搞清楚。中央访问团的任务，就是到全国各地去调查。我们带了很多东西去访问少数民族，把东西送给他们，把新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直接交给少数民族。我是中央访问团的副团长，去了西南和

* 本文是作者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同江市访问过赫哲族聚居地后与当地干部座谈时的讲话。

中南两个大区。当时我们一直访问到少数民族同胞的家里，把国家的少数民族政策交代到少数民族兄弟本人。这是周总理亲自布置的工作。周总理讲，这是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的一个新事情，是改天换地的事情。从民族之间的恃强凌弱，转变到大小民族一律平等。现在看来，这也是全世界的一个新事情。

我很高兴有机会参加周总理直接领导下的民族工作。可是到“反右”以后，没有条件再做下去了。一直到1980年，我得到了“改正”，才又得到机会，接上了50年代工作的断头。到现在，又做了20年。加上以前的工作，我做民族工作大约有30年。这30年里，我接触比较多的是西南地区。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的情况，我还很少直接地接触。我想自己快90岁了，最后一段时间里边，需要了却一件心事，要到没有去过的少数民族聚居地访问一次。赫哲族是我国最小的少数民族之一，我很想看看赫哲族同胞的生活情况。我是汉族，属于最大的民族。大小应该见见面。“反右”以后。我一直有此心愿，现在要补课。到赫哲族同胞家里拜访一下，问他们好，表示各族人民大团结。如今我这个愿望实现了，欠下的这一课补上了，我也可以交账了。说起来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心愿，这个心愿的形成却离不开各族人民的平等和团结这个大背景。

周总理说过，中国的民族政策，我们历史上没有，世界上也没有。新中国成立后，出来了民族大家庭中兄弟民族一律平等的概念。现在看来，这个概念越来越重要了。最近欧洲科索沃的战争，就是因为民族不平等，不团结。这样的局部战争有可能引起世界大战，人类毁灭也有可能。西方国家到现在还不能解决的问题，我们50年前已经解决了。50年来的历史证明我们做的是对的。这样的政策不光我们适用，将来也会适用于全世界。西方有个亨廷顿，写了一本《文化冲突论》。他认为民族之间文化不同，一定是要冲突的，不会团结的。他代表的这种思想，同我们

是根本抵触的。我相信，世界上各族人民要向前发展的话，会走我们的路，不会走他们的路。这个话不能空讲，要拿出事实来，做出样子来。

第二点，大小民族一律平等，这是个关键。大的不应该欺负小的，小的要争口气，赶快发展起来。在民族大家庭的支持和帮助下，各个水平不同的小民族逐步提高到同一个水平。这是个愿望，相信是个可以实现的愿望。新中国成立 50 年来，我们为实现这个愿望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很明显的效果。我也见证了这个历史过程。最近 20 年来，我利用在政协、人大工作的条件，在国内到处跑，访问了不少少数民族地区。除了西藏和台湾，各省我都去到了。没有到西藏，但到过甘南藏族自治州，看到了藏族同胞生活水平的提高。

第三点，黑龙江我来过好几次，去过黑河、大小兴安岭，拜访过鄂伦春族同胞，也去过镜泊湖。这次有机会来到佳木斯、同江，看到了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三江平原这么广阔的农耕土地。过去说是北大荒，我说应该叫三江宝地。我在来这里的火车上想了一个问题：我们的土地这么广阔，这么肥沃，我们到底用了多少？我认为用的还只是一点儿，潜力还很大。缺的是什么呢？缺的是人的因素。这么好的大片土地，没有配上足够的人力。现有的人力也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这块宝地能给我们国家提供的财富，我们还没有拿到。现在我们最大的任务，就是集中人力，想各种办法，把这块宝地真正开发出来。赫哲族同胞居住在三江平原。赫哲族的发展不是孤立的，要在三江平原的发展中谋划、推动和实现赫哲族的发展。我觉得应该看得大一点，不要离开三江平原的发展来讲当地少数民族的发展。也就是说，要发挥民族大家庭的力量，大哥哥要帮助小弟弟。不是单单发展哪个小民族，而是要把整个三江平原发展起来。

我从走上学术道路以来，用了 60 多年时间做调查，积累了

一些心得。第一步，农业要发展，离不开副业的配合和工业的发展。为此我提出了发展乡镇企业的问题。从农业到副业，从副业到工业，出来了乡镇企业。第二步，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之后，我提出了小城镇建设的问题。现在小城镇建设已经成了我们国家搞现代化的一个方向。第三步，小城镇的发展离不开农村和城市的配合，我又提出了区域发展的问题。城市要发挥辐射和带动作用。没有中心城市的带动，农村也发展不起来。进入了市场经济之后，这一点更清楚了。没有一个中心，一个市场，很难带动腹地的发展，农产品也只能停留在生产粮、棉、油的初级阶段上。要想进入多种经营，改变农产品结构，就要有市场的需求，有工业的带动，有中心城市的辐射。三江宝地要发展，需要树立区域经济的概念。

现在你们这里修建同江到三江的公路，是发展区域经济不可缺少的硬件设施。有了交通网络，就可以加快人的流动，物的流动。你们现在走的路子很好，可以叫绿色食品之路。这是充分利用这块宝地，充分开发农业资源的路子。全世界都在要求没有污染的食品，三江平原可以提供丰富的绿色食品。这里地处边境，对外交往方便，地缘优势得天独厚，可以大力发展绿色食品，包括粮食、蔬菜、山珍、野菜等等。我在浙江横店集团访问时，这个集团的老总说他想在东北买一块地。这说明有眼光的人看到了这块宝地的开发价值。这可能是开发三江平原的一条路子，这个路子还会继续扩大。不光是国内投资，还会有国外投资。

佳木斯地处三江平原的中心，要定个位，要发展成为一个地区性的中心城市，发挥经济辐射和带动作用。我最近几年在做京九铁路的题目，想法是发展沿线地区的中心城市，我说是“穿糖葫芦”。现在你们修同三公路，也有了“穿糖葫芦”的交通条件。要考虑发展中心城市的问题，方向是像沪宁铁路的苏州、无锡、常州、镇江一样，带动沿线地区发展。发展中心城市的一个

要点是搞起一些支柱产业，要有几个上亿元产值的大企业。在三江平原地区，要想办法充分利用农业资源，引进科技，加工再加工，这是最根本的。同时要注意城镇规划，优先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如路、水、电、通讯等。没有这些条件，企业发展不起来的。这是政府要做的事情，是硬件。有了硬件，再搞软件，如教育、文化、卫生等，使离土离地的农民聚居到城镇上安居乐业，享受现代生活。这些都搞起来了，一个地区的发展就有了眉目，一个新的佳木斯就出来了。不要丢掉自己的优势，一切事物的发展都离不开已有的基础。原有的传统优势，加上现代科技手段，可以产生新的力量。做事情要有人，要靠科技，靠知识分子，大力吸收知识分子。吸引人的办法多种多样。要出主意，想办法，这是考验我们地方干部的一个题目。市场经济要有名牌，你们发展名牌的基础不错，有三江平原，有赫哲族。这个最小的民族发展起来，是我们民族平等的一块牌子，可以展示我们和睦的民族大家庭。同江发展起来，饶河发展起来，都可以是个样板，是个窗口，亮亮相，和对岸的俄罗斯比一比。你们底子很好，住在金山上面，完全可以发展得很好。同江的书记希望我 10 年后再来看，我也希望能再来。

1999 年 11 月

“兴边富民行动”好^{* 1}

春节前，国家民委的同志来看我，邀我参加“兴边富民行动”新闻发布会，并就担任领导小组的名誉顾问，征求我的意见。感谢同志们的关心和信任。耄耋之年，动手做事已经力不从心，却很乐意为后来人敲边鼓、跑龙套。所以，名衔，我领受，由于其他原因，没有能够到会看望久违了的第一线的民族工作的同志们。请代问同志们新春好！

现在，西部大开发这个世纪大题目已立起来了。各地、各部门竞相抓紧研究怎样切题、破题，力争拿出一流的佳作。中央提出总体构想之后，需要有若干的专题规划，以有目标、分阶段地逐步推进和实施。我看，“兴边富民”是可以起到这种作用的专项规划和配套工程。兴边富民，是全国的事情，但首先是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事情。国家民委发起这项行动是应该、也是适宜的，于国于民都做了件有意义和有益的事。

中国形成多民族统一国家已有 2000 多年了。在 2000 多年的时间里，有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天下未乱边先乱，天下已定边未定。观边疆治乱兴衰，可知国家统一与边疆的稳定与否有着密切的联系。古代称边疆作“四裔”，称边疆少数民族作“四夷”。总的看，中国历代王朝对边疆和边疆少数民族多采用羁縻怀柔政策，“因俗而治”，“一仍其旧”。就是汉、唐、元、清强盛时期，也都无力实行直接统治，无法做到全国政令统一。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实行的是民族压迫制度，采取的是民族歧视政策。直到解放

* 本文是作者为《中国西部概览》丛书所写的总序。

初期，边疆少数民族仍然保存着各种各样的政治制度和各种各样的社会经济形态。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领导了一场社会革命，从而引导边疆各民族共同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帮助边疆地区发展经济文化，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成就。

人类跨入新的千年、新的世纪，中国正在走向空前的大统一，中华民族正在实现伟大的复兴。在我们朝着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迈进，着力提高国际竞争力和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时候，加快边境地区的发展，实现富民、兴边、强国、睦邻，不仅十分重要、十分必要，也是完全可以办得到的。

“兴边富民行动”应当抓住两个中心词做文章。一个是“边”。我国陆地边境的绝大部分地区，都在少数民族地区。“边”有时也是资源，是优势。在海上交通兴起之前的1000多年里，陆路交通发挥了主导作用，正是通过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把亚欧大陆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紧紧地连在了一起：我国边疆各少数民族都为促进中西交流和创造灿烂的中华文明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实践表明，只有开放，才能活边，最终才能兴边。当前，应当更加重视发挥少数民族在对外开放中的优势，通过沿边的大开放，促进边疆的大开发，实现大发展。必须看到，我国西部面对的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比东部面对的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更有潜力，而且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

另一个是“民”。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富民才是根本。边民富，才能边防固。我一向认为，民族地区的发展必须包括少数民族的发展，不能离开少数民族的发展讲民族地区的发展。我们既要深入发动少数民族参与边疆的开发和建设，又要通过开发和建设，加速他们的现代化进程。特别是对那些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我们过去往往采取照顾的办法，他们的生活虽有保障，但失去传统的生产手段之后，没有找到靠劳动来从事生产的新门路，容易引起精神生活的衰颓。所以说，一个民族，不论大

小，要发展繁荣，就必须有一个坚定的经济基础；一个民族要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持其民族特点，就必须善于利用自己特有的优势来发展经济，不然的话，这个民族是要走向衰亡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发后进地区的过程中，对土著民族搞“保留地”。实际上，这是玩弄殖民主义者搞“国民动物园”的老一套。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是谋求所有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历来是马克思主义与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分水岭。

如果把“兴边富民行动”往广、深、高三度延伸和展开，开创民族工作新局面的历史机遇，就摆到面前来了。我算得上是一名老民族工作者，建国后一段时间还有幸参与民族工作一些大的活动，在这之后，民族研究一直是下工夫下得最多的学术领域。我以为，半个世纪以来，民族工作有两次大的发展机遇。第一次机遇是新中国成立和民族地区的解放。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在民族地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引导各民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民族工作的底子，不能说全部，但主要地来自于这个时期的探索与实践。这个时期堪称民族工作的黄金时期。现在，民族工作又迎来了第二次发展机遇，这就是西部大开发。这次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逐步消除事实上的不平等和缩小发展差距，最终实现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我相信，抓住西部大开发的机遇，围绕西部大开发的大局，既继承前人，又勇于创新，既志存高远，又脚踏实地，民族工作一定能够再创新的辉煌，为全局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身逢盛世太平，又看到民族工作事业后继有人，我由衷地高兴和欣慰。真诚祝愿“兴边富民行动”取得成功，祝愿民族工作不断迈上新的台阶！

2000年1月

积极拥护、支持西部开发大战略^{* 1}

前些时候，我听说中央统战部要组织各民主党派，为开发大西北这一大战略献计献策，就向王兆国同志报了名，争取在晚年的时候，能为这个我瞩目多年的大会战出点力，学点知识。

前天来到西安后，一直在想。这个研讨会上我讲点什么呢？这时，陕西省民盟的同志送给我一本名为《西部大开发》的书，这本书以江泽民同志关于西部大开发讲的“江八条”做序言，在八条里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我国当前加快东西部地区发展步伐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时机已经成熟，不抓住现在这个有利时机，不把该做的事情努力做好，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这段话恰好给我参加研讨会出了个题目，我就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讲对“加快东西部地区发展步伐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时机已经成熟”这句话的认识和体会。

现在，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个新千年也已经开始了，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把我们带进了信息时代；中国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到世界经济的竞争中，然而要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我们的力量比起发达国家来还不够强，所以必然抓紧时间赶上去。

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我国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综合经济实力大大加强了，同时也为下一步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个现代化建设是从东南沿海地区开始，逐步向中部推进，今天这一势头已经发展到了西部，这是大势所趋。西部的同志要牢牢抓住这个机遇，趁势而上，不然就像江泽民同志

* 本文是作者在“陕西省实施西部大开发高级研讨会”上的发言。

说的会犯历史性的错误。

这20多年来，我国经济实力的提高，说到底就是因为提高了生产力。依我的经验看，我们能做到这一点的关键就是“工业下乡”、搞农村工业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获得了第二次学术生命，有机会亲眼目睹工业下乡的全部过程——中国乡镇企业的崛起。跟着这个发展形势，我先是在东部沿海地区，后来到中部地区，又到西部地区看，从农民那里学到了许多致富的办法，看到了办乡镇企业使农民摆脱了贫困。同时我也看到，中部和西部地区所以发展得不如东部地区快，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西部地区的乡镇企业还没有充分发展起来。我认为这一原因到现在还没有过时。

我最早接触西部问题，可以说是在1935年到广西大瑶山搞实地调查开始的，解放后又搞过一段时期的少数民族工作，所以一直很关心我国少数民族聚居的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情况。1984年，我注意到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拉大的问题，就想到西部地区看看，听说甘肃的定西是“陇中苦甲天下”的地方。我性子急，那年的9月，就到那里去考察了。后来连续8年，每年去甘肃一趟，做一些实地调查研究，这些考察使我增加了许多知识，提高了对西部地区的认识。1988年，我和民盟的同志根据甘、宁、青、内蒙古两省两区沿黄河两岸地区的具体情况，向中共中央提出“建立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建议，这个建议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赞同。

那些年除了去甘肃，还去了包括陕西在内的西北各省区做一些调查。我了解到陕西这个地方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由于历史的原因，国家在这一地区，不仅投入了大量资金，而且像西安、宝鸡这些地方还聚集了大批优秀的科技人才。但是这些优势并没有完全发挥出来。自从经济体制改革以来，那里不少设备闲置着，一些科技人员无事可做。当时我在宝鸡看到许多国营大企

业和乡镇企业联合起来，共同发展的例子，所以我提出：怎样使已经存储在西北的巨大经济能量释放出来，是这个多民族地区发展的推动力。

今天的研讨会上，各位专家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我们除了要尽力争取国内外投资，建设好基础设施，努力发展高新科技产业，搞好节水农业之外，我要说：办好乡镇企业，还是发展陕西经济重要的一条路。从东部地区的经验看，乡镇企业是农民致富的一条路子。农民富起来，事情就好办了。现在，苏南的每个县市都有一两个拥有上亿元、几十亿元资产的乡镇企业集团，这些企业集团都是20年来从小企业发展起来的，它们为小城镇的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20年来也有企业垮台了，分化成小的家庭企业。我在苏南看到最大的、家庭工业最集中的地方，是吴江横扇镇。这个镇几乎家家户户都织羊毛衫。产品做出来以后要卖出去才行，于是出现了一批经纪人，他们把羊毛衫推销出去。农村里最缺的是有这种本事的人。

当然，现在办企业比改革开放初期困难得多，要求也高得多，这就更需要我们政府下力气搞好服务。陕西科技力量雄厚，要把这股力量释放出来。科技人员不能够只满足于在刊物上发表论文，应该用我们的知识为老百姓致富做些实事。

我在东部地区，特别是江、浙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看到那里的农村富了，农民口袋鼓了起来，小城镇像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小城镇的繁荣又推动了乡镇工业的进一步发展。这个现象使我从长期以来侧重于对农村的研究，进一步延伸到对小城镇的研究。1996年我参加了中共中央统战部组织的，全国各民主党派、工商联领导人和民主人士到京九铁路沿线地区的考察活动，得益匪浅。这次活动使我进一步认识到中等城市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由此，我萌发了沿京九路“穿糖葫芦”的想法，简单地讲就是摸摸清楚，沿京九铁路有哪些已经具备，或者再加把劲

就能对周边地区起到辐射带动作用的中等城市。于是我和民盟的同志一起访问了河北衡水、山东聊城、河南商丘、江西南昌……最后到了广东的惠州。考察了这一串中等城市以后，我们向中央有关部门提出了关于加快京九铁路沿线中等城市建设，以带动周边地区发展的建议。这次来西安，一进潼关我就注意，一路上似乎没有看到类似衡水、南昌这样比较发达的中等城市。八百里秦川要有几个中等城市来带动发展才行。东部和中部有许多建设中小城镇的成功例子，它们的经验可以供给我们学习、参考。

自从西部大开发以来，人们对自己资源的利用谈得很多，但对人文资源的开发讨论得少。其实，西部地区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蕴藏着丰富的人文资源。陕西是中华民族文化发祥地之一。周秦汉唐等 14 个王朝在这里建过都，经历了 1000 多年，给这一地区留下了无数的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不仅仅为我们开发旅游业提供了资源，而且还代表了中国文化。我在访问甘肃的农村时，见过一些普通农民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这件事给我印象很深，说明这些地方有着厚重的文化底蕴。美国总统为什么要选西安作为访华的第一站？日本首相为什么要到敦煌？就是因为这些地方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心。

前不久，我的一位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的学生，申报了一项题为《保护、开发和利用西部人文资源，再创西部灿烂文化艺术》的科研项目。她要我当这个课题的学术指导。我认为，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应该是立体的，其中不仅是经济的开发，还应包括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现在人们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这一问题已经有点认识了，但是对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有深刻认识的人并不多，目前还没有专门的人做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应该把这项工作加到西部开发这个大战略里去。所以我就答应了她的要求。我虽然年纪大了，做不了什么具体事，但还能为他们出出主意、开开路。

细想一下，这个课题包含了很深刻的内容，我曾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同那里的专家们一起讨论过，我的发言已经整理出来，感兴趣的同志可以找来看一看。今天结合西部开发问题讲一点意见。

西部开发已经成为一个热点，大家讲得很多了，但都偏重于物质和经济问题，对西部人文资源和文化艺术注意得不够。然而外国人似乎注意到了，所以像我上边讲的，美国总统、日本首相要来这里。记得在我读中学的时候，有一批中外科学家，组织了一个考察团到西北考察。他们在西北发现了许多自然资源，也发现了敦煌和丝绸之路上的许多古代文物和古代艺术。考察团里有个叫斯文·哈定的瑞典人，他通过那次考察写了很多文章，引起轰动，出了名。但是我们自己却忽视了西北，在历史上存在着看不起西部的观念，现在要纠正过来。西部不仅在自然资源上有它的优势，而且在人文资源上，因其气候干燥、地处偏僻、交通不便，受现代文明的冲击少，所以传统文化资源保护得相对完整，这是前人留给我们的一笔巨大财富。在开发西部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大声疾呼：要注意对古代文物和传统文化的保护，千万不要为了眼前的一点小利，而牺牲了几千年遗存下来的宝贵财富。

我们呼吁保护人文资源，是为了更好地开发利用它，让资源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了这个目的，就要搞清楚我们有多少资源，这些资源都是些什么，它们有什么价值。对于这些，现在我们心中还没有底。去年我去大同访问，那里有一个著名的云冈石窟。大同的同志告诉我，因为现在煤的市场不太好，想开辟旅游业来代替煤的生产。这个想法很好，可是要游客来游览，首先自己要讲云冈的历史和艺术价值搞清楚，讲出个道理来，要不然别人怎么来看？人文资源和自然资源一样，要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所以我非常支持中国艺术研究院搞的这个科研课题。

最后我想强调一句：西部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在开

发西部的时候，必须发扬各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不要看不起少数民族，它们的文化也有很多好的、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我们要帮助它们把好的东西发掘、整理出来，帮助它们发展。同时，在经济建设中，一定要照顾到少数民族同胞的利益，让他们在西部大开发的进程中，同全国人民一道富裕起来，过上现代化的生活。

前年，《瞭望》的朋友给我出了一个题目：东西部社会的均衡发展。这个题目说着了我多年的梦想，这个梦就是要把西部发展起来，使我国东西部经济和社会能够均衡发展，实现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繁荣。今天参加这个研讨会，是表示我对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积极拥护和支持，并希望我的梦想尽快成为现实。

2000年6月17日

论西部开发中的文化产业

今天中外学者集聚一堂，进行有关文化艺术交流与文化产业问题的探讨与研究，能出席这样的一个国际性的会议，我很高兴。在当今时代，可以说文化产业是一种新型的朝阳产业，为什么这样说呢？人们常讲的三大支柱产业包括农业、工业、服务业。其中农业为第一产业，制造业为第二产业，服务业为第三产业，农业社会是以第一产业为主导，工业社会则是以第二产业为主导。但当人类社会进入信息时代以后，第三产业的比重开始增加。在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社会中，人们将重视知识的消费，将重视文化艺术和体育的消费。在这样的社会里，文化产业和高科技产业一起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

所以，我认为有关文化艺术交流和文化产业的国际研讨会，能在中国的北京召开，也标志着中国的社会正在迅速地产生变化，正在从注重消费物质到同时注重消费知识的方向迈进。中国有着 5000 年的文明史，在这漫长的文明史中，积淀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尤其是我国的西部，可以说是一个传统文化艺术的宝库，因此，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发展文化产业，是大有用武之地。我之所以谈到我国的西部，是因为目前我们国家正在进行举世瞩目的西部大开发，在西部开发的过程中，我们不仅是要注重高科技产业与其他产业的开发，还要注意到其文化产业的开发。也就是说，在我国的西部不仅有着丰厚的自然资源，还有着丰厚的可以发展文化产业的人文资源。

而且，西部的文化和艺术的确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探讨、研究和发掘的。中国许多的最早的灿烂的文化艺术都是在那里得到蓬

勃发展和繁荣的，在这里我们几乎能找到所有中国美术、音乐、舞蹈，甚至戏曲、诗歌发展的源头。而且，西部的文化除了有汉族文化之外，还有众多的少数民族文化（中国的少数民族大部分都集中在西部），从其发展的广大的空间和悠久的历史中我们能看到多元一体的、由多种民族的广大群众创造的文化的相互接触、相互融合和各自发展的演化经过。

我一直很关心西部的发展，但多年来所关心的多是如何发展经济的问题，因为我一生的目标就是“志在富民”。而西部有很多地区不久前还是我国最贫困的地区，我希望能够发展这些地方，帮助这些地方脱贫。但我以前只看到西部贫穷的一面，却没有看到它富有的一面，没有看到它有那么丰富的人文资源是可以开发和利用的。但我现在已经开始注意到了这一点，实际上这也是一个事物发展的必然性，它意味着人的思想感情已经开始产生变化了，也就是说，当世界的物质生产发展到一定地步以后，人们就要开始重视精神的生产和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人们才发现我们面对的不仅有自然资源，还有宝贵的人文资源，这是在我们的感情产生了变化，物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才能看到的。在经济落后时期，人们不大可能会认为人文活动留下的各种遗迹和文化艺术传统是一种资源。这就是说，是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人们对人文资源的认识，反过来，对人文资源的认识也将促进人们对经济发展的更深一步的认识。人们将认识到经济的发展并不是我们的唯一目的，经济的发展只能解决我们生存的基本问题，但如何才能生存得更好，更有价值，使自我价值的发挥得到更宽阔的拓展，并从中发展出一种新的人文精神，是需要在原有的人文资源的基础上，用文化和艺术的再发展来解决的。在这里面不仅有一个物质的问题，还有一个精神的问题，这就是人文资源的价值所在。

开发和利用人文资源不仅能产生新的人文精神，同时也能创造新的经济价值，因为现在的人们不仅需要丰厚的物质享受，也

需要高尚的精神享受。那是一种比吃饱穿暖更美好的生活，是一种需要了解各种文化历史知识，需要得到各种艺术享受的生活。这一切正蕴藏在丰富的人文资源中，要靠我们去提炼和表达。

记得还是在我读中学的时候听说有一个西北考察团在西北考察，其中还有一个瑞典人叫斯文·哈定，那时我只是觉得西北很神秘，有很多有趣的生物和民俗文化，但没有看到它对中国文化发展的意义，也没有看到它在今后中国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对西部的文化艺术我们注意得不够，但外国人却注意到了，克林顿访华的第一站就是西安，还有一个日本首相到敦煌去了。西安也好，敦煌也好，引起了外国人的注意，那是因为它代表了一个文化的中心呀！我们都说我们是炎黄子孙，那个时候我们中国文化的中心，就在西北。前面我已经讲了，还在我小的时候，瑞典人斯文·哈定，就到西北做了大量的考察，并在世界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但我们中国人自己却忽视了西北，那是因为最早的交通是陆路，从西汉开始到唐代，通过丝绸之路，打通了中外及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所以那里非常的繁荣，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中心。但后来文化发展到了沿海，那是因为水上交通比陆路交通更方便。可是现在又改变了，有火车和汽车了，有飞机了，陆路交通也变得很重要了。所以，西部又有了一个新的发展机会。在过去的一段历史里，看不起西部的观念比较深，现在我们要把这个观念纠正过来。尤其是在人文资源上，西部保存得比内地好，一是因为它的气候干燥，文物容易保存；二是因为过去它交通不便，地方偏僻，受现代文明冲击很少，传统文化资源保护得相对完整。但在这西部大开发中弄得不好，就会把这些重要的人文资源破坏掉。所以在西部开发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大声疾呼，要注意对古代文物和传统文化的保护，要只是为了一点小的眼前的经济利益，而牺牲了我们几千年文化遗存下来的一些宝贵财富，那就得不偿失了。

国家现在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号召，这是对的。但是在开发的过程中不要只看到西部贫穷落后的一面，而忘记了西部的另一面，也就是它所具有的、丰富的人文资源这一方面。在早些时候中国人是不重视这些人文资源的，但是外国人重视它，他们到这里来考察，还偷走和抢走了我们的许多珍贵文物。首先是我们不懂得自己的家产值钱，不知道自己有这么珍贵的财源，没有认识它嘛。我们这代人是很苦的人，因为在旧中国我们的经济落后，在国际上没有地位。我出生在 1910 年，也就是辛亥革命的前一年。我的一生主要看到的是中国人贫穷的一面，所以，让中国人富起来，是我这一辈子的最大愿望。同时我也认识到，首先要把生产力发展起来，没有经济基础，其他的东​​西就谈不到。比如，西部有许多珍贵的文物，但却没有几个像样的博物馆，有许多宝贝无法好好地陈列出来，向世界展示。这就是因为我们的财力不够。有了宝贝不能表现出来，不能宣传出去。但在这 20 年当中，中国的经济有了发展了。农民的收入也有了提高，西部虽然还是比较落后，但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西部许多宝贵的传统文化艺术，是几千年中华文明替我们流传下来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源，切实地说，在西部地区的这一广阔的时间和空间里，产生过很多不同的民族、不同的优秀人物，他们共同创造了这个文化的、人文的资源就在这里边。之所以称之为资源，就是因为它不仅是保护的，而且，还是可以开发和利用的，是可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所发展、有所作为的。因此，在开发西部的热潮中，我们一方面要发展它的经济，繁荣它的市场，使西部的发展和内地平衡，甚至超过内地。与此同时，还要保护和发扬其传统的文化艺术，尤其是民间的文化艺术。

人文资源和自然资源不一样，自然资源是天然的，而人文资源却是人工制造的，是人类从最早的文明中一点一点地积累、延

续和建造起来的，它是人类的文化、人类的历史、人类的艺术，是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财富。人文资源和自然资源一样，有很多是属于不可再生的，一旦被破坏掉，就永远无可挽回。

另外，我们今后还要多普及历史和考古方面的基础教育，不仅是在书本上学，还要带学生多到博物馆看看，让他们通过这些认识我们国家的历史，知道哪些是我们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西部现在发现的文物古迹已经很多，但还有没有尚未发现的文物古迹呢？这都很难说，就像当年的敦煌也是偶然被发现一样，当年看守敦煌的王道士就是因为不懂得那些文物的价值，所以把许多珍贵的国宝都很便宜地卖给或送给外国人了。因此，我们先要提高我们的认识，提高人们的素质，提高大家在文化历史方面的修养，只有这样人们才会自觉地去保护我们珍贵的文化遗产。我认为传统的文化在我们国家是有基础的，这种基础存在于广大的民众之中，我们要把它保持下去，并进一步培养起来，这是第一点。

我想讲的第二点是，我们对于人文资源的态度，首先要宣传，要让老百姓知道，这些是宝贝，是有文化价值的，甚至还是有很高的经济价值的。在干部里面也要加强教育，干部很重要，有些群众碰到了珍贵的文物却不认识，干部要有这方面的知识，不要让群众随意丢掉或破坏掉。尤其在西部大开发期间，在进行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时，很可能会无意中发掘出一些古文物或要破坏掉一些古文物，包括一些古建筑，我们尤其要注意。比如我在甘肃曾看到一块当年中原皇帝给西藏王的令牌，就是在收破烂的废品堆里无意中发现的。这一类的东西一定还很多，只是我们没有发现而已，有时候因为我们不懂所以也就在我们的眼皮下溜过去了。就像20世纪初的斯坦因等一些外国探险家，到中国西北考察拿走了我们的不少文物，虽然是一种强盗行径，但他们却帮助我们发现了这些东西，知道了这些东西的价值，所以，在历

史上他们还是有功的。中国传统的文人，大多是坐在书斋里看书的，不会深入到下面去考察，不会到活生生的社会生活中去体验，去了解事物真正的本来面目，所以对书斋以外的许多事情都不太了解。今后我们改变一下我们传统的做学问的方式，要提倡真正地深入到生活中去，到广大的农村中去，在这些地方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好东西。我们的知识是从哪里来的呢？我认为决不会仅仅来自书本，而是在实践中，在实际的生活中产生我们的知识。对中国的历史也不要光看书本，要到博物馆去看一些真正留下来的实际的东西，我们对它的认识才会更深刻，更全面。

第三点，要开发西部，一定要注意民族问题，要发扬各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不要看不起少数民族。他们的文化也有很多好的、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我们要帮助他们发掘出来，帮助他们发展。汉族看不起少数民族，西方看不起东方，这都是不对的。应该用平等态度对待各民族、各国家的文化。我们认为西部曾有一度是中国文化的中心，是中国文化先进的代表，但后来其经济落后了，其文化地位也跌落下去了。但其实不是它的文化从此落后了，而是我们对它后来的文化认识不够了，主要是我们认为它不是主流的文化，就不再去认识它。我们现在搞的人文资源的开发，就是要重新去认识它、理解它、发掘它。对于西部文化艺术的考察，前人已经做过了不少的工作，其中包括考古学界、人类学界、民族学界、艺术学界等。这些考察是非常重要的，为今天的考察和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但以前的考察和研究大多还是仅仅停留在对历史事实的记录、观察和描述上，在从文化的角度上进行进一步的理论总结和深入研究方面还是做得不够的。今后，我们要加强这一方面的研究，补上这一课。

前两年，我去了大同，那里有一个云冈石窟，现在煤的市场不太好，大同就想开辟旅游来代替煤的生产。这想法是很好的，可是要人家来看，首先自己要将自己的历史搞清楚，讲出个道理

来，要不然别人怎么来看？对云冈石窟日本人倒研究了不少，出了一本书我看了，就是说，我们的财产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别人却知道了。人文资源和自然资源一样，要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李四光就是一个例子。还是在我读大学的时候，就听说中国没有石油，我也相信这一点，后来李四光提出了中国有石油，并且，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我们下一步就是要到西部去了解我们的家底，发掘蕴藏在西部的人文资源，为西部的文化和艺术的发展做贡献。

人类社会发展到了 21 世纪，我们不要光看到物质经济的发展，也要重新认识人文资源，要回头看到这种资源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另外还要利用这些原有的资源给我们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来服务于我们新的生活，这里面有很深的学问。西方经济高速发展的结果，只是强调了人同物的关系，但却把人同人的关系、人同自然的关系给丢掉了。现在西方人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正在局部局部地把它恢复起来。人和自然的关系，包括了人同自然生态的关系，人同自然资源的关系；而人同人的关系，则包括了人同人文历史的关系、人同人文资源的关系。

人文资源虽然包括很广，但概括起来可以这么说：人类通过文化的创造，留下来的可以供人类继续发展的文化基础，叫人文资源。我们要好好地利用这些人文资源，让它变成我们丰富的生活资源。大的我们不讲了，就讲音乐、美术、舞蹈、戏剧等这些艺术活动，就是为了满足我们的感情需要，通过我们的大脑、眼睛、嘴巴来表达、传送和接受人类的各种的感情，也就是通过我们的器官来欣赏和接受各种不同的微妙的心理感受。人通过艺术吸收外界的东西，刺激和丰富我们的感觉，帮助我们从各个方面去认识世界，让我们感受到大自然中的或人类情感中的许多美好的东西。而这种感受的辨别，这种审美观念的形成，很多都是从小培养和从传统的文化中潜移默化中形成和习得的。所谓美和不

美，实际上既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但作为人的存在，总是向往美的，向往精神享受的。所以，将来人类的物质发展了，吃饱了，穿暖了，就要讲究吃好，讲究穿漂亮。这个吃好就不仅要讲究营养，还要讲究味道、讲究气氛、讲究形式、讲究食具等等，就连吃也可以成为一种文化和一种艺术了。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人类首先要讲究生存，要活下去，才能讲究生活。我们以前要解决的都是生存问题，现在我们要逐步地解决生活问题。生活和生存是不同的。

我们的艺术家同志们要有一个荣幸感，就是今后的世界不是一个完全靠科学技术的世界，而是要用科学技术来促进我们的艺术发展，让人类的社会朝一个精神和物质两方面都得到共同发展的方向前进。我们可以利用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来站在传统的根基上，发展我们新的艺术，让我们民族艺术的根成长起来，同时，把中国丰富的人文资源发展出来、开辟出来。贡献给全世界，这是我的一个梦想，我希望这个梦想有一天能实现。

2000年6月

创建一个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 1}

我很高兴能在有生之年，来参加这个会议，原因是我和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很早就有关系。过去因为各种原因没有能出席会议，很高兴这次会议能到我们中国来召开，也就给我这个老人一个很好的机会，能够亲自参加了。在这里，我祝贺这个会议能够开得很成功。

我是 20 世纪早年出生的人，现在已经年过九十，我大部分的人生历程是在 20 世纪度过的，我很高兴，有幸能够坚持到上个世纪的终结，看到新世纪的降临。

回想起来，我是在 1933 年从燕京大学毕业后，接受我的老师吴文藻先生的建议，进入清华跟从史禄国（S. M. Shirokogoroff）教授学习人类学的。当时吴文藻先生就认为，要做中国本土的社会文化研究，必须得有人类学的基础，要用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社会并改造中国的社会学。他提出，要创立一条社会学中国化的道路。在清华大学研究院，我很有幸地得到了史禄国教授的培养。他是俄罗斯上一代传统学术训练出来的世界级的人类学家，以研究通古斯民族闻名于世。史禄国教授继承了欧洲人类学的悠久传统，他的研究范围非常广，包括体质、语言、考古以及当代各民族文化的比较研究。他给我的培养和训练没有按计划完成。我只是在他的亲自指导下，学完了人类学的第一个阶段，即体质人类学的基础知识（他给我规定了三个学习阶段：

* 本文是作者在“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IUAES）中期会议”上的主旨发言。

第一阶段学习体质人类学，第二阶段学习语言学，第三阶段学习社会人类学)。当然，这期间除了体质人类学之外，我还学到了他严谨的科学治学态度以及对各民族在社会结构上各具特点、自成系统的认识方法。后来我才意识到，从史禄国那里学到的着重人的生物基础和社会结构的整体论和系统论，原来就是马林诺斯基功能论的组成部分。从清华学习人类学出来后，我在大瑶山和江村做过田野调查，然后就转到了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师从马林诺斯基和雷蒙德·弗思学习社会人类学。这段历史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人类学家都比较清楚。如果从跟史禄国正式学习人类学算起，我和人类学打交道已经有将近 70 年的历史了。在这 70 年里，我贯彻了吴文藻先生的主张，把人类学的学习和研究包括在社会学的范围之内，把社会学和人类学密切地联系和结合起来，我的学术道路一直贯穿着这个原则。当然，由于种种原因，我的学术研究曾经有过间断。但总的来说，我一直没有离开这条学术道路。这条道路就是用人类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来研究当代中国社会的变化，这是我始终如一的学术追求。同时，我总认为人们的思想必然受到当时社会文化的影响，所以我这一生的思想也必然反映了这一时代特点，打上了时代的烙印。这也是我们常说的个人的经历总离不开世界的变化。

我出生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一个小城镇，一个有着浓郁传统的知识分子家庭。我最初受到的教育和我的家庭有着很大的关系。我的父亲是旧社会的一名秀才，科举制度被废除后，他被选派到日本学习教育专业。回国后，他是中国第一批主张摆脱旧教育制度，创立新教育制度的知识分子之一，这个新制度就是从日本借鉴的，西方传来的教育模式，当时称作“新学”。我是从我母亲最早开办的幼儿园里出来的，当时叫作“蒙养院”，它是中国最早具有现代教育意义的幼儿教育的模式，这是我一生的出发点。从这里开始，我按照当时的教育制度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一

直到同西方接触，到了英国，于1938年在伦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告一段落，这是我一生中受教育的时期。接下来是中国的动乱时期，也就是抗战和国内战争时期，这是我一生中的第二个时期。当时，日本人打到我的家乡，我只能到大后方昆明来从事教书生涯，这个阶段一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革命成功才结束。此外，我真正的第二次学术生命是从1980年开始的，到现在正好20年。这20年我的收获比较大一些，也可以说是成熟时期。从现在开始我进入了这段时期的后期了。

我这一生经历了20世纪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各个时期。可以概括为两个大变化和三个阶段。我把它称作“三级跳”。第一个变化是中国从一个传统性质的乡土社会开始变成一个引进西方机器生产的工业化时期。一般人所说的现代化就是指这个时期。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时期，也是我从事学术工作最主要的时期，即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在这一时期我的工作了解中国如何进入工业革命。从这一时期开始一直到现在也可以说一直到快接近我一生的最后时期，在离开这世界之前我有幸碰到了又一个时代的新变化，即信息时代的出现。这是第二个变化，即中国从工业化或现代化走向信息化的时期。就我个人而言，具体地说，我是生在传统的经济社会里，一直是生活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当引进机器的工业化道路还没有完全完成时，却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信息时代，以电子作为媒介来沟通信息的世界的开始。这是全世界都在开始的一大变化，现在我们还看不清楚这些变化的进程。由于技术、信息等变化太快，中国也碰到了一些问题，第一跳有的地方还没有完成，而第二跳还在进行中时，现在又在开始第三跳了。中国社会的这种深刻变化，我很高兴我在这一生里都碰到了，但因为变化之大我要做的认识这世界的事业也不一定能做好。因为时间变化得很快，我的力量也有限，我只能开个头，让后来的人接下去做。这是我的一个背景。要理解我

作为学者的一生，不能离开这个三级跳。

我所有的学术研究，都是和中国社会变化的大背景联系在一起的。从1935年开始，我因受吴文藻和史禄国两位老师的影响开始了实地调查的研究方法。我最初研究的是作为中国少数民族的瑶族。从这时起我就已经把社会学和人类学结合起来了。在过去的学术界，往往把少数民族的研究看作为人类学的专利，少数民族研究在中国后来发展成民族学的一部分。当然这种学术分类与名称曾引起了各种讨论。对我来说，从人类学开始的用实地研究方法来研究我们中国的社会与文化，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学术道路。从这一点来说，自我从瑶山调查开始一直到现在进入对大都市社区建设与发展的研究，都是一贯的。今天讲这一点，是想说明我一生的学术生涯和这次会议的主题“都市民族文化：维护与相互影响”相联系也相符合。因为我是从中国少数民族实际生活研究起到上海和北京等大城市进行社区研究，这个过程本身说明了这个变化。这个实际的客观的变化同一个社会的发展的趋势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社会的第一跳是以我们中国各地不同民族的农村生活为基础的。我是生长在江苏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小城镇里。它最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7000年前的良渚文化，这个文化开始有了农业和家庭手工业。在考古学上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个时期村落的生活。这就是我们第一跳的基础，也是我们乡土社会基本的性质。那个时候从全国讲，文化形式上也有很大的不同，已经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基础。多元文化逐步交流融合，成为多元一体。这里也就开始了我研究的第一个阶段，我写的《花篮瑶的社会组织》这本书可以作为代表。从中看出它和以我们家乡为代表的汉族社会文化的区别以及它是如何受到汉族的影响的情形。

我第二阶段的研究，是从中国7000年前的良渚文化到近代以来开始快进入工业化时期的一个中国农村的变化，可以我的

《江村经济》为代表。代表一个传统的文化基础、社会组织，面临着—个全新的科学技术和机器生产的早期的冲击，这也是我对《江村经济》的定位。这是我们现代化开始的原初的形态，这是第一步。接下去代表这个时期我的重要著作是《云南三村》。这里反映了内地农村不同于沿海农村的特点。这便是我们的现代化最早的过程，从地域上讲是由东向西、从沿海到内地的。我的《江村经济》讲的是沿海地区的农村，开始了工业化。而《云南三村》却描绘了比较原始形态的乡土社会。1938年底，我从伦敦回国，当时，日本人打到我的家乡，我们只能到大后方昆明来从事我的教书生涯。我在离昆明100多公里的地方，进行了与江村所处条件不同的农村类型——禄村的调查。禄村受现代工商业影响较小，没有手工业，几乎完全靠土地维持生计。通过对禄村的调查，我看到了与江村不同的土地制度。这是我第一个时期第二阶段的工作，这阶段到1949年才结束。

1949年之后，我就开始参加民族工作。这也是我进入新中国后第一期的工作。新中国的建立引起了中国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民族关系和民族政策的变化。为了实现民族平等，在政治体制上我们成立了一个有各族代表共同参加的最高权力机关，即人民代表大会。但是在开国初期，我们还不清楚中国究竟有多少民族，它们叫什么名称，各有多少人口。为了摸清有关各民族的基本情况，建立不久的中央人民政府于1950年到1952年间，派出了若干个“中央访问团”，分别到各大行政区去遍访各地的少数民族，摸清他们的民族名称、语言、历史以及社会文化上的特点。由于我学过人类学，所以政府派我参加西南和中南两个访问团。我代表中央人民政府访问了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我花了足足两年时间在贵州、广西分布在各处的少数民族村寨中进行实地访问考察，在和众多的少数民族的直接接触中，我深深地体会到民族是一个客观而普遍存在的“人们

共同体”，是代代相传、具有亲切认同感的群体。

在对少数民族的状况了解的基础上，我直接参与了新中国民族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这一段从学术上讲是我第一期学术工作的延伸，是《江村经济》和《云南三村》的延伸。我具体的研究对象也从汉族为主的农村转移到少数民族地区——一个更复杂更多样化的领域。这便是从 1950 年到 1957 年我主要从事的少数民族的调查研究工作。

1957 年之后，由于众所知道的政治上的原因，我的学术工作停止了。一直停止了 23 年。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我才恢复工作。从那时起到现在，是我的第二次学术生命。这段时期是中国社会变化最大的时期。恢复研究后，我做的工作之一，就是总结了我几十年来的民族工作，1988 年在香港中文大学的特纳（Tanner）演讲中，发表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我从中华民族整体出发来研究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及其规律，提出了“多元一体”这一重要概念。我在这篇讲演中指出：“中华民族”这个词是指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 11 亿人民，“它所包括的 50 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它们虽则都称‘民族’，但层次不同。”中华民族的主流是许许多多分散独立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连接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

事实上多元一体理论并非单纯是关于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理论，也是我对中国社会研究的一个总结。56 个民族及其所属的集团是社会构成的基本单位，因而从另一个方面勾画出多元社会的结合和国家整合的关系，是多元和一体的关系。

在现代社会，人类学越来越关注人类社会和人类生活所遇到的或所面临的最现实的问题。因此，人类学的功能不仅在于“回顾与展望”或者“解释”，还在于“参与和创新”。记得

1981 年我在英国接受赫胥黎奖时的演讲中，就曾经强调“人类学必须为群众利益服务”。这种“学以致用”的思想一直贯穿在我的学术研究中。我认为知识分子的本钱就是有知识，有了知识就要用出来。知识是由社会造出来的，不是由自己想出来的。从社会得到的知识应当回报于社会，帮助社会进步，这就是“学以致用”。“学以致用”本身就是中国的传统，意思就是说，得之于社会要回报于社会。我是跟着中国这一传统进行我的工作的，这也是我的志向。这志向并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而是跟着中国的传统学来的。但是我是通过吸收新的知识来把传统精神贯彻出来，我希望这样做，做得如何我自己不敢说。于是抱着这一理想，我的学术研究，从一而终地和全体人民的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综合起来说，在中国范围内用人类学的实地调查方法可以解决过去没有解决的很多问题，包括农村发展、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这些大的问题。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我复出后，一直到现在，围绕着这一目标，我已经做了 20 多年，我还要继续做下去。这一段工作我主要的研究体现在《行行重行行》一书中。因为受身体条件的限制，我已经不可能在具体的地方长期进行观察和访问，只能主要依靠各地群众和干部提供的情况和委托陪同我去考察的助手分别下乡或下厂去进一步了解情况，以及通过在当地进行的各种访问和座谈来取得一些感性知识。所以，我也只能根据别人的第二手材料，来介绍我曾经直接访问、看到的地方的情况，当然这不是严格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工作了。在这里，我的特点是结合第二手材料和访问的材料进行类型式的比较研究，即 typology（类型学）的方法。对于同一时期的不同类型的研究，可以看到一个社会的动态，特别是在现代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如何改变的。在这一阶段中，我主要提出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发展两个主题。可以说在 50 年代以前我的类型比较研究主要局限在农村。虽然在 40 年代末，我已经注意到了农村的调查不能只限于农村

本身，也应考察经常与农村社区发生关系和制约作用的城镇。不过由于内战的爆发和之后的社会学学科的被取消，我对于城镇的调查和研究，一直到 80 年代才开始。我提出“小城镇，大问题”等题目，目的就是在于解决农民的出路问题。而小城镇的发展和乡镇工业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我从 30 年代起就指出了农村社会的发展在于农村工业化，即依托于本土社会文化优势的“草根工业”，让农民先富起来。而这个大的变化是在 80 年代以后才发生的。乡镇企业的出现和发展，使农民得到了很多非农就业的机会，使得农民的生活发生了质的变化。记得在 1983 年开始的小城镇研究中，我就提出了“类型、层次、兴衰、分布、发展”的 10 字提纲，成为研究小城镇的出发点。在此基础上，1984 年提出了经济模式的概念。在我看来，所谓经济模式就是“在一定地区，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特色的经济发展的路子”，进而引导出不同经济模式的比较研究，如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等。这些模式本身和这一地区的社会文化基础有着一定的关系。我认为，任何经济制度都是特定文化中的一部分，都有它天地人的具体条件，都有它的组织结构和理论思想。具体条件成熟时发展成一定的制度，也必然会从它所在文化里产生与它相配合的伦理思想来做支柱。有的国外同行，如日本的社会学家鹤见和子教授认为，我的这些研究是“内发型发展论”的原型。

现在这些不同的模式也在变化之中。“苏南模式”是从人民公社中发生出来的，由社队工业变成乡镇企业的。这是第一个变化。第二个就是温州模式，是小商品大市场的模式，即把乡镇工业结合到市场经济里面，这是第二个大变化，也可以说是过渡阶段。现在为第三个阶段，是发展时期，即珠江模式，吸引外资利用外资提高科技含量来发展经济。这三个模式是互相连接起来的，有一个内在发展过程，现在苏南模式也正在改变，向着珠江模式发展了。

在这一时期，我以“下活全国一盘棋”为出发点，在注重沿海地区研究的同时，从80年代中期开始，更大程度地关注内地和边区的发展，特别是边区少数民族共同繁荣的问题。我曾经提出一些多民族的经济协作区的计划，有的已经在实施之中。如黄河中上游西北多民族地区、西南六江流域民族地区、南岭民族走廊地区、武陵山区山居民族地区、内蒙古农牧结合区等。在对这些区域进行综合性研究的基础上，我试图将民族研究与民族地区现代化的实际相结合。在边区民族经济的发展中，应该强调因地制宜，注意民族特点。如果总结我的研究，可以说从80年代中期开始，我的研究工作重点从沿海转到边区又到内地。从东南移到西北，从农村小城镇转到民族地区。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我们应该强调西部和东部的差距包含着民族的差距。西部的发展战略要考虑民族因素，而民族特点是一个民族从历史过程中形成的、适应其具体的物质和社会条件的特点。中国社会的民族特征，从历史上开始就在不同民族的交错地带，建立了经济和文化的联系。久而久之，形成具有地区特色的文化区域。人们在这个区域中，你来我往，互惠互利，形成一个多元文化共生的格局。我所提出的经济协作的发展路子，就是以历史文化区域为出发点的。

从实际讲，我的理论和方法还没有脱离最早期的人类学的理论的训练，我只是把这些理论和方法应用到正在变化中的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研究中。去年我90岁时，把我以前写的文章，收集起来，出版了我的文集——《费孝通文集》（14卷）。这既是我个人经历的记录，也反映了时代在我身上发生的变化。

从今天这个会的主题来讲，并没有离开我的研究范围。因为我的目的是了解中国，中国就包含多民族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这一点不去多讲了，大家有兴趣可以看我已经写出来的东西。在提出这个看法之后，各方面都有反应。作为过程来看，多

元一体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个过程也同时表示各民族的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

我们讲都市人类学，就是要强调中国多元文化的主体在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上发生的变化。对于都市人类学的研究，我觉得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是中国各民族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如何工业化、城市化。从生产本身讲，是如何从农业和手工业的基础发展到机器化，在这一阶段，第三跳还没有跳，这就是要研究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基本方向和基本理论是符合大多数民族的发展过程的，也包括占人口大多数的汉族。比如我研究的领域、地区也放大了一些，各民族从不同的起点出发，如何共同发展到现代社会的过程，在这方面内容更丰富了。第二我要想说的是，中国城市的特点不是单一民族的城市，是多民族构成的城市。这就存在一个问题，即不同文化的人在同一个城市中，如何和平共处在一个政治经济组织里面，一体化（多元一体）是如何完成的。这不仅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也是一个当今的概念。

这里面又包括了两个大问题：发展的问题和和平共处问题。

一是发展问题，现在我们叫西部大开发。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成分多，大部分少数民族人口集中在西部地区，西部的现代化过程必然包括少数民族的现代化过程。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都市研究中赋予了民族文化多样的内涵。在都市化过程中，如都市开发如何依托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以及少数民族移民都市后的文化适应等，都是民族地区现代化过程中的新问题和新现象。所以，我们都市人类学应该包括这一部分，这是我的理解。不能像过去的人类学那样，满足于描述静态的本土性的原初的文化，必须要看到它的变化。文化的变迁应该成为以后人类学研究的主题。这又让我回想起我的老师马林诺斯基。1998年，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所举行的“21世纪：文化自觉与跨文化对话”的国际学术系列讲座上，我曾经提交一篇《读马老师遗著

文化动态论 书后》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我谈了我阅读完马老师这部晚年著作的体会。最初，人类学的研究是以封闭的简单社会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其比较也是在简单社会之间进行的，这也是马老师那个时代的中心研究工作。同时，他也是这一学科科学的民族志方法的奠基人，在早期，他也主张人类学应在封闭的社区中进行调查和研究，进而来揭示社区的文化功能。30年代末期，马老师基本写完了他描述和分析西太平洋岛土著人的那几本巨著。之后在走访非洲东部和南部的殖民地时，他看到的正是一个在发生文化巨变的大陆，他也看到了当地文化与外来的殖民地文化互动的生动情景。他认为研究人类社会文化的学科必须跟上形势的发展，他把文化的动态研究看作“现代人类学的新的任务”。马老师的《文化动态论》是在30年代末40年代初写的，1945年，在他逝世后三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出版到现在已快60年了。他在去世前，所提出的问题，就是 dynamics of culture change，这一文化动态论适应于世界各民族的变化，他预先看到了，给我们指出了方向。我们这一代的人类学家以及我们下一代的人类学家，如何能接上他所开创的事业，这是我们当代人类学的一个主题。

二是和平共处问题，就是多民族在城市中共同的政治经济组织的框架之内能和平共处，继续发展。如果不能和平共处，就会出现很多问题，甚至出现纷争。实际上这个问题已经发生过了。过去占主要地位的西方文明即欧美文明没有解决好的问题，在这几年逐步凸显出来了。事实上也发生了很多的地方性的战争。最突出的是科索沃战争，这一类战争还在不断地发生。从人类学角度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的巨变，科技、交通的发展，已使人类不能像简单社会那样处于相互隔绝的境界之中，人类的空间距离也日渐缩小。然而就在人类文化寻求取得共识的同时，大量的核武器、人口爆炸、粮食短缺、资源匮乏、民族纷争、地

区冲突等一系列问题威胁着人类的生存。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原有的但一直隐蔽起来的来自民族、宗教等文化的冲突愈演愈烈。自1988年以来，全世界爆发的武装冲突，除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战争，都是由内部民族问题而引起的。有的研究者曾作过统计，从1949年到90年代初，因民族冲突而造成的伤亡大约为169万，数倍于在国家间战争中死亡的人数。诸如苏联解体后，一些民族的主权与独立问题，非洲的索马里和苏丹、亚洲的缅甸和斯里兰卡、南斯拉夫的克罗地亚、塞尔维亚、波黑及科索沃问题等。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社会正面临着—场社会的危机、文明的危机。这类全球性问题所隐含着的潜在危机，引起了人们的警觉。不同学科的学者正在寻找形成种种危机的根源，期盼发现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作为科学的人类学也正在以传统的研究领域和技术为基础，扩展自身的研究视野，试图探索出解决现代社会诸问题的方法，并从比较社会与文化的视角来解决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问題，引导人们适应现在和未来变化的轨迹。

这个问题，看来原来已有的西方的学术思想里还不能解决。而中国的传统经验以及当代的民族政策，都符合和平共处的逻辑。事实上我们的方向已经有了，而且已经向前走了一步了。我们的民族政策已经走过了50年。对于这些问题也希望引起我们国际的人类学家的关心，共同研究这其中的理论上的发展等。

21世纪的脚步声已依稀听到，人类正在匆匆构筑21世纪的共同理念。不同的国家、民族、宗教、文化的人们，如何才能和平相处，共创人类的未来，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

刻在孔庙大成殿前的“中和位育”几个字代表了儒家文化的精髓，成为中国人的基本价值取向。这种“中和”的观念在文化上表现为文化宽容和文化共享。记得11年前，在日本东京为我召开的80岁生日的欢叙会上，我在展望人类学的前景时，提出人类学要为文化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

下大同”做出贡献。这就是意味着人类学应当探讨文化的自我认识、相互理解、相互宽容和世界多元文化之间的共生理念以及达到“天下大同”的途径。事实上，如果我们再往回看呢，这是在中国的传统的经验里面所一直强调的“和而不同”思想的反映。

对于中国人来说，追求“天人合一”是一种理想的境界，而在“天人”之间的社会规范就是“和”。这一“和”的观念成为中国社会内部结构各种社会关系的基本出发点。在与异民族相处时，把这种“和”的理念置于具体的民族关系之中，出现了“和而不同”的理念。这一点与西方的民族观念很不相同。这是历史发展的过程不同即历史的经验不一样。所以中国历史上所讲的“和而不同”，也是我的多元一体理论的另外一种说法。承认不同，但是要“和”，这是世界多元文化必走的一条道路，否则就要出现纷争。只强调“同”而不能“和”，那只能是毁灭。“和而不同”就是人类共同生存的基本条件。

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都已被纳入到全球化的世界体系中。但发端于西方世界的全球化浪潮，在非西方世界接受西方的文化的同时，也应当通过自身的文化个性来予以回应。过去很多观点认为，随着全球化特别是少数民族移居都市后，在民族文化和文化认同上会逐渐丧失个性，事实却非如此。事实上，全球化与地方社会之间有一互相对应的逻辑关系。说到这里，我想起了我近年来在很多场合提到的“文化自觉”的问题。“文化自觉”是当今时代的要求，它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且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讲，文化自觉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提倡“和而不同”的文化观的具体表现。

在人类即将进入 21 世纪的今天，我们聚集在一个有着悠久文明，有着占世界人口将近 1/4 的多民族文化和平共处的中国，

来讨论“都市民族文化：维护与相互影响”这一会议的主题，确实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我相信中国思想中的这种“和而不同”的理念，也一定会赋予这一会议主题以新的内涵。

2000年7月28日

故地重游多新见

自从中共中央提出开发西部大战略以来，西部各省区纷纷召开研讨会，商讨各自的发展大计。8月17日我应邀到昆明参加“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建设第二次高级研讨会”。云南的同志要我谈一点意见，我想，我的确应该讲点什么，因为我对云南有着特殊的感情。



1938年我在英国完成学业乘船回国时，抗日的烽火已燃遍中国，日本侵略者已经打到湖南、广东一带，我只好从越南的西贡登陆，辗转来到当时抗日的大后方——昆明。这时，吴文藻老师已经在云南大学建立了社会学系，我就到系里任教。后来又与燕京大学合作成立了一个社会学研究站，我带着站里的几个年轻人，到农村和工厂去搞实地调查。我和张之毅去了昆明西面100公里远的禄丰县的一个村子搞实地调查。这次实地调查，实际上是在实现我在英国的导师马林诺斯基所定下的研究路子。在通过我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答辩时，马老师认为我的文章只是描绘了中国江南一个农村的农民，从生产到消费过程中物质生活长卷的开始，他要我回国后慢慢再深入，继续描绘这幅长卷的其他画面，包括信仰、风俗等意识形态方面的、高层次文化内涵的文章，他甚至为我想好了第二本书的名字：Earthbound China，意思是“泥土里生长的中国”。回国的路上，我就一直在想怎样

能够尽快实现老师的话。

到昆明后，恰巧，我的一位信奉天主教的姨母正在禄丰传教；还有一位老家在禄丰的燕大同学也在昆明，经他们介绍，我就到禄丰去了，住到那位同学的亲戚家。我在那里做了一年的调查，写了《禄村农田》这篇文章。

我在《江村经济》里描写的江村，是我国江南一个农副业发达，并且工业已经渗透进去的农村；而禄村，是处在相对封闭的内地，农民基本上就靠土地讨生活，那里没有工业、没有商业，只有一些贩盐的彝族商人经过。完成禄村的调查后，我还想搞清楚像禄村这样一个没有工业、没有商业的地方，怎样会发展到有工业，有商业，这个过程是怎样的？经过十几天的寻找，我和张之毅，在易门找到了一个盛产竹子，并且有一些以竹子作为原料的土纸制作业、竹器编制业的村子；这是一个在传统手工艺基础上发展起手工业的村子。我们把在这里调查后写的文章叫《易村手工业》。后来又在玉溪附近看到已经是一个以织布为家庭手工业的村子。有一些资本家买来织机，放到农民家里织布，然后把布收回来再卖出去，这些布再贩运到昆明。可以看出，这里已经发生了初期的资本主义。经过调查，张之毅写成了《玉村农业和商业》一文。

通过对这三个村子的实地调查，我们比较清楚地看到了农村经济发展的一条具体的路子。1943年在访问美国时，我把这三篇文章结集译成英文出版，书名就用马老师的 Earthbound China（后来出中文版书名为《云南三村》）。因此，可以说完成学业后，我是在云南开始了学术研究活动。

1939年我又结了婚，我的女儿是在呈贡出生的，在昆明组成了一个家庭。

这段时期，国内局势错综复杂。国民党统治下，政治腐败、民不聊生；战场上搞假抗日、真反共。在这种局势下，我和潘光

旦、闻一多、曾昭抡等一些朋友，凭着一股爱国的正义感，积极主张抗日，反对分裂，反对独裁，同时，积极支持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我们的活动代表了当时广大的知识分子的心声，在学生中也产生了影响。1945年我加入了民主同盟，从此开始了新的政治生命。

1946年发生了李闻惨案，我也被列入了国民党的黑名单，被迫在朋友们的帮助下离开了昆明。结束了在云南8年难忘的生活。

云南是我学术生命、政治生命和家庭生活的新起点。所以，我把云南当作我的第二故乡。

解放后，我做过一段时期的民族工作。50年代初，西南地区刚刚解放，中央组织了一个访问团，分几路到全国各地慰问少数民族同胞。我是访问团成员之一，去了贵州和广西，虽然我没有来云南，但是通过这次访问活动，使我亲身感受到少数民族同胞生活的艰苦。

1956年，我到云南参加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工作，曾到德宏并沿洱海跑了一圈，这次调查使我学到了不少知识。比如在剑川，我看到许多由于地震而暴露出来的地下遗留的历史文物；在洱海边看到那里的佛教与内地的佛教有许多不同之处。当时我就想过，从剑川到洱海这一带的文化可能是南诏以来留下的，很想追踪调查，可惜后来我没有机会再继续研究下去。但是，这一段时期的工作，使我能够比较深刻地了解云南少数民族的历史和他们的生活，写了不少有关少数民族的文章，说了一些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话。因此有些人说我是个“比少数民族还少数民族”的人。

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我没有机会再来云南了，早年去过的地方都没有再去。直到70年代末，我获得了第二次学术生命后，才有机会再次访问云南。

二

这次利用开会前的时间，我乘车到大理和丽江去了一趟。一路上参观了大理白族自治州博物馆和大理古城，重游了崇圣寺的三塔，在严家大院品尝了白族同胞的“三道茶”；在丽江，主人以纳西族最高礼遇的“三叠水”招待我，特别是听了纳西古乐，勾起了我许多回忆。不过，我年岁毕竟大了，不可能看得很细。但一路“乘车看花”还是浮想联翩，我觉得云南的人文资源太富饶了，建设民族文化大省，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是别的省份不能比的。但是，怎样利用好这份先人留下的遗产，更好地为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我想就一路看到的、想到的谈一些看法。

我想云南作为民族文化大省，每个州应该有一个民族的特色标志，这一点上大理和丽江做得比较好。50年代搞调查时，我在大理住在下关一个招待所里，这个招待所是当时最“现代化”的建筑物了。这次来到下关，看到那里高楼大厦林立，已经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城镇，下关的建设，避免了现代化的力量侵入附近的大理，古城保留下来了。丽江也是这样，他们把新的建筑物建在古城旁边，古城里保留下了大片明清时代的民居建筑，那些融合了纳西、白、汉等民族建筑艺术特色的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的建筑，给古城带来了无限的魅力，吸引了无数的国内外旅游者。

旅游业是一项所谓后工业时期发展起来的产业，只有人们解决了吃饱、穿暖以后，有余力提高生活质量时才会兴起。改革开放以来，经过短短的20年，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加强，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有很大一部分人过上富裕的生活，旅游成了时

尚。对于一个长期贫穷落后的中国来说，这么急剧的变化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我曾经说过，我的一生就像一个三级跳远运动员那样在跳远，第一跳是跳进了“乡土时代”，第二跳跳进了“工业时代”，现在是从工业时代开始跳到“信息时代”、“后工业化时代”的第三跳。在前两跳里，中国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又经过发展乡镇企业、小城镇建设、发展区域经济的阶段，从一个以农业生产为主的传统乡土经济，进入了工业化的现代国家。当前，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开始了实现第三跳，进入信息时代，后工业化的时代，我们与世界各国的联系更加密切了。但是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我们还没有很好地完成向工业时代的第二跳。不过，现在可以抓住西部开发的大好机遇，加速发展，两跳并作一跳，提前跳进信息时代。

怎样才能加快完成两跳并作一跳呢？依我的经验看，除了积极争取国家的帮助之外，还得要走“富民”这条路子。云南有着如此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旅游资源，正可趁西部大开发之势，大干一场，特别是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打好旅游这张牌。

这次重游故地，我在大理喜洲镇、严家大院，在丽江黄山民族旅游村的农户家里，都欣赏到有着浓郁的白族和纳西族民族特色的艺术品和歌舞表演，当地的老百姓因为旅游业的发展而增加了收入。但是，这些地方热热闹闹的市场氛围，使我感觉到现代商业化的气息正在挤进来，当初洱海边那种清新、静宁、朴素的韵味已经不容易找到了，自然景观依旧，早年的感受全无。以我个人来说，我是很怀念那种气氛的。我的这种感觉，其实就是新兴的旅游业如何做到与传统文化相统一的问题，这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

此外，从大理去丽江路上经过的鹤庆，看到白族同胞的手工艺制作业，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鹤庆县在大理的北部，白族占总人口的56.6%。从明清时期以来，这里的白族同胞开始从

事金、银、铜首饰和器皿的制作，流传至今。1996年丽江地震波及这里，在恢复重建时，这里的基础设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为今天旅游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我去参观了鹤庆新华民族旅游村里的一个工艺品交易市场。在一个店铺前，我看见一位年轻的白族姑娘，正专心地在一把铜壶上雕刻花纹，见我走进店里，她连忙站起来招呼，在她的柜台里和货架上，摆满了造型各异的铜制器皿和银制首饰。市场的负责同志告诉我，他们这里几乎家家是工场、户户是作坊，现在旅游的人多了，买卖好，老百姓收入增加，去年全村人均收入达到3000多元。我问他：这里的产品除了卖给旅游的人以外，还有什么销路？他说还销到西藏。

在回宾馆的路上我在想，新华村的白族同胞，家家户户利用传统的手艺，生产精美的工艺品，使这里形成了一个能满足少数民族饰物的市场，老百姓也增加了收入，这是一条使老百姓富裕起来的路子。但是，就目前的情况看，我感到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比如可以在现有的基础上，同他们一起深入地研究消费者心理，满足少数民族对装饰品的需求；努力拓宽传统的销售渠道，扩大市场；改进制作技术使产品多样化。总之鹤庆大有文章可做。

三

世界已经进入了信息时代，在这样的形势下，民族文化该怎么办？我想还是要实行改革开放，接受新事物，要向前看。我一直是提倡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但是要怎样才能把它保护好，这个问题需要好好研究。

这次在云南，一路上同地方上搞文化工作的同志交谈，感到省里上下对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利用已经做了大量工作，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在丽江我听到纳西族一位搞象形

文字的老专家讲，丽江政府对保护、发掘东巴文化非常重视，不仅成立了东巴文化研究所，建了文化博物馆，今年还要出版 100 卷关于东巴文化的大型著作；同时还鼓励老百姓，特别是年轻人穿民族服装，在学校里进行“三语”教学，即除了学习汉语、外语之外，学生还要学习纳西语言和文字。

老专家的一番话，使我想起两年前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一次人类学、社会学高级研讨班上，一位鄂伦春族学生提了一个问题：在当今科技迅猛发展的现代社会里，一个只有 5000 人的小民族，居住在偏僻的深山里，生产力比较低，怎样才能生存下去？也就是说，在现代社会里，对于那些“小”的少数民族，是要保存“人”呢，还是要保存“文化”？我们知道，文化是人类创造出来为自己服务的一套物质和精神设施，人是本，文化是手段。拿文字来说，它是一种符号，而且变化得很快，有的文字已经死亡。纳西族的象形文字是一种比汉族甲骨文还古老的文字，其使用范围已经极狭窄了。现在要学生除了学汉语、外语，再去学它，有什么实际用处？学生的负担是不是太沉重了？当然，我们要培养一批专家来研究东巴文化，包括它的文字，但是普遍推广就不现实了。

纳西族是我国西南地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民族，以保留了古老的东巴文化而闻名于世，东巴文化又是因为保存了已有几千年历史的东巴教而得名。东巴教崇拜祖先、崇拜自然，教徒称“东巴”，即“智者”的意思，他们集巫、医、学、艺、匠于一身，是纳西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也是各种祭祀仪式的主持人。

我在玉川寨观看了一场“祭天”仪式的表演。仪式在一株高大的古树举行，现场香烟缭绕、鼓声咚咚，几位身穿法衣的东巴，随着鼓声，口念经文，舞动着手里的各式法器。作为一个人类学、社会学者，我看了觉得很有意思，因为这种古老的仪

式，表现了古人对自然的崇拜，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意识，这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的一大特征：讲平衡和谐，讲天人关系；承认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不与自然对立。这与西方那种以我为中心，掠夺自然为我所用的观念是截然不同的。可以说，纳西族的“祭天”，意义是深刻的、积极的。但是，在观看仪式的整个过程里，我总感觉到树底下弥漫着一股迷信的气氛。在丽江纳西东巴文化博物馆，当我在展馆里看到表现东巴祭祀的各种真实场景原封不动地摆在那里时，不由得又产生了这种感觉。

我想这里面有一个如何对待保护、利用人文资源的问题。我们不能用主观主义的态度，也不能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去取消民族文化。但是，保护不是无选择的、原封不动的保存，要有鉴别、有取舍，就是我们常说的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对于大量历史遗留下来的东巴文化，不以个人的好恶，而用科学的态度进行讨论、研究，把那些进步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有益于民族发展的好东西总结出来，然后考虑用什么形式来宣传、展览和演出。我们要把好的东西拿给人家看，先要自己搞清楚什么是好的，要能够讲出来，这就需要培养一批高水平的、懂得自己民族文化的人才。

其实这个工作已经有人在做了，并取得了成功。我在丽江听了一场纳西古乐的表演，很受启发。据介绍，纳西古乐是由大型古典乐曲《白沙细乐》和《洞经音乐》两部分组成。《白沙细乐》是纳西族古老的音乐套曲，关于它的起源，一说是源于“元人遗音”，一说是“创自民间”。不论怎么说，这种音乐起源是久远的；《洞经音乐》则是明清时期传入丽江的，它的一些乐曲被中国音乐界的专家认定为“中原唐宋遗音”。丽江的宣科先生动用现代音乐知识和手段，整理、发掘出这些古乐，并且组织了十几位老艺人，用古老的乐器，演奏出古朴典雅的乐曲。他们的演出，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并且走出了国门。几年来，应邀访

问了英国、比利时、荷兰等国家，他们的表演一度轰动了欧洲。此外，还在香港艺术节和北京上演，获得高度评价。当然，宣科先生的那种根据来路不同的听众，临场发挥，以插科打诨式的幽默的语言，在活跃的气氛里，把古老的乐曲的内涵传达给听众的报幕技巧，也是乐团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还要指出的是，宣科先生能用一口地道的“英国腔”英语和用欧美游客喜欢的那种幽默语言，讲出中国古乐中的内涵，这也是他的一种难得的才能。

我想，云南要建成民族文化大省，开展旅游业是其中主要内容之一，这就要求我们要查清楚我们到底有多少家底，要进行一个人文资源概况的考察、整理，要把这些地方的历史和艺术的价值搞清楚、讲出来，才能吸引游客来看、来欣赏。赶紧培养出这方面高水平的人才是当务之急，这是云南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在丽江的时候，纳西族同胞曾经用“三叠水”来款待我，每一“叠”都有突出的菜肴。现在中央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我想这就如同宴席上丰盛的“第三叠”菜开始了。希望云南能把“菜单”上的菜做出来，让人们品尝到好的东西。

2000年9月

民族生存与发展^{* 1}

很高兴来参加第六届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并负责第一讲。我自开始教书以来，讲课时不喜欢跟着稿子讲，今天仍是这个老习惯，先发讲稿，请大家认真地读并给予批评，我则利用这个机会做一个即兴发言。

去年是西北民族学院建校 50 周年，我来到这里，当时很高兴，建议把第六届研讨班办到西北地区，以配合西部大开发的形势。第一届研讨班是在 1995 年办的，至今不到 10 年已办第六届，这是同行们热心支持的成果，也可以说是时势发展的需要。我看到手册中已把前五届的主题内容做了归纳，第三届、四届的论文集也相继在最近出版了，走一步是一步，这是我们人类学学科发展的一个过程，有着里程碑的意义。

国际和国内时势的发展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 21 世纪全球居民已经开始了更频繁的接触和交流，走上了一条被称为“全球化”的道路；二是在近 300 年的时间里，中国在世界上的文化地位和政治地位发展迟缓，已从领先退居到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但是在 20 世纪的后 50 年中发生了巨变，在进入 21 世纪时刻，我们处在了急起直追并努力赶上发展前沿的关头，人们看到了中华文化复兴的苗头，在这个新的世纪里，中华民族有能力为地球上的人类开辟一条新的发展道路。这是我为中华文化的定位。

人的思想是由时势造成的，也反映了所处时势的地位。因此

* 本文是作者在“第六届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的讲演。

我们发生了“文化自觉”的要求，文化自觉就是生活在某种文化之中的人们的自知之明，目的就是在争取文化发展的自决权和自主权。我们这些社会学者和人类学者召开的这类高级研讨班就是这种客观形势所决定而自觉组织起来的。加强人类学的研究，是文化自觉的要求。这种要求来源于客观历史的发展，这个历史的要求推进了我们。我们到这里参加这个班是自觉自愿的行为，但也是客观形势所造成的。我是一向主张“从实求知”和以知识来创新推进实际的人，凭着这种信念，我不顾年老，从千里之外赶来参加这个研讨班。

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是随时代发展而变化的，我在每一届研讨班上的讲话，反映了我这个人的思想变化。当我们进入 21 世纪的时候，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感受，比如年龄不同的人对时间的感觉就不一样，小的时候，盼着吃年夜饭，觉得时间过得那么慢，而现在似乎眼睛一眨，半年就过去了，时间过得越来越快，这一方面是我这个年纪的人的感觉，另一方面说明中国近来变化之快也确是惊人，是全世界人们所意想不到的。我们希望在 21 世纪里中国能够有更大的变化、更快的发展，实现我所说的从乡土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信息社会的“三级两跳”。早年我搞的江村和云南三村的调查都属于农村乡土社会的研究；后来又提出工业下乡、提倡发展乡镇企业，希望用工业化来改变乡土社会的主张，这个工作一直搞了 50 年。

80 年代初，我获得了第二次学术生命，接受了重建社会学（也应当包括人类学在内）这门学科的任务，至今又过了 20 年。那时我去美国访问，看到他们已经用计算机处理数据资料了，计算机也比北大当时用的的小得多，整整差了一代。可以说那时世界已经进入了信息时代，这就是我所说的第二跳。这几年我们也热闹起来，大家写文章不用笔了，连我写文章的办法也起了变化，可以把我的讲话录下音，然后整理成稿打印出来，再让我修改，

而且可以多次修改，效率提高了。有时候还可以把讨论会的情况录下音，整理出来，吸纳了大家的思想，文章也集体化了一些，已不是属于一个人的思想了，这也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变化。

这几年有两个问题常常萦绕在我心里，那是 1998 年第三次高级研讨班上一位鄂伦春族的女同志向我率直地提出的一个问题：“人重要还是文化重要？”这是她在看到自己民族的文化正在受到重大的冲击，而日渐消亡时，产生了只有先把人保住，才提得到民族文化重建这个问题。她提出的这个问题很深刻也很及时，因为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一些根底不深、人数又少的民族，免不了会发生这个似乎是耸人听闻的问题。由此，又使我记起在大学念书时读到的一本英国人类学者 Peter Rivers 写的，名叫《文化的撞击》（Clash of Cultures）的书。这本书写的是澳大利亚土著居民怎样被消灭的故事，他说在一个文化被冲撞而消灭时，土著人也就失去了继续活下去的意志。我在英国留学期间（1936 年至 1938 年），曾在报上读到澳大利亚南端 Tasmania 岛上的最后一个土人死去的消息，对我震动很大，成了在心头一直挥之不去的烦恼。

1979 年我赴加拿大讲学时，曾参观访问了加拿大的印第安人保留地。看起来保留地里的印第安人的生活不错，有房子，有电视，还有汽车，虽然导游说这是二手货，是摆样子的，但是，看起来这个民族在政府的财政补贴下保存了下来。然而，管理印第安事务的官员告诉我，这些印第安人经常酗酒、打架，非正常死亡率很高。他们生活没有目的，主要是安身立命之道没有了。

我 1987 年考察呼伦贝尔盟和大兴安岭时，去拜访了鄂伦春族同胞。看到我们的政府的确是在尽力扶持这个民族，他们吃住都没有问题，孩子上学也不要钱，但这个民族本身还没有形成一个有生机的社区，还没有达到自力更生的状态。当我读到美国亨廷顿的《文化冲突论》时，不能不激发起我的思考：文化和民

族是会被消灭的，这是过去发生过的历史事实，但是我不能平静地接受这个历史事实。令人吃惊的是，那些标榜提倡个人自由的西方文化，怎么能够容忍一些民族和文化消亡的事实发生在当今这个时代！西方某些人主张种族消灭论，现在世界上很多地方还在打仗，南斯拉夫、中东地区战火不断，战争中动用了飞机、导弹，互相残杀。我们主张民族平等、共同富裕。当然，由于自然条件和环境的改变，还可能造成一些民族在生产能力和谋求职业方面出现了某些不适应，比如政府分给了某个少数民族同胞土地，但是他们不会种，怎么办？我一直在想：我国万人以下的小民族有10多个，它们今后在社会的大变动中如何继续生存下去？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扩展开来，实际上就是在全球一体化以后，中华文化该怎么办。这是个大问题，虽然这个问题，目前还不那么急迫。但是在现实生活里，某些小民族保生存还是保文化的矛盾已经发生了。

因此我提出了“和而不同”的民族秩序论。心里想，我们中国当前所走的路子和所执行的政策，是同西方的路子唱反调的，我们主张民族平等、民族自治，首先就要保证民族生存，反对消灭民族。

我有幸在第二次学术生命里，得到继续从事民族研究工作的机会。在这20年的“行行重行行”里，我尽可能地到各地访问，去拜访我国的少数民族同胞。我到过生活在黑龙江兴安岭里的鄂伦春族和甘肃青海交界处的裕固族、撒拉族、土族等少数民族地区，我能体会到他们的处境和困惑。跨入信息社会后，经济、文化变得那么快，一些小民族就发生了自身文化如何保存下去的问题。在这种形势下，不采取办法来改变他们原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是不可能的了，问题是如何改变？我前年又到黑龙江去访问赫哲族，了解一下人数比较少的少数民族的具体情况。赫哲族长期以来本是靠渔业生活的，现在传统的渔业越来越不景

气，因此地方政府一方面努力改善环境，保护渔业生产，尽可能地帮助他们安排好生活，开辟新的生产门路，如利用鱼骨做成艺术品、装饰品，拿到市场上去卖；另一方面分给他们土地耕种，想帮助他们改变生活方式，改变文化，但是他们却把地转租给汉人或是找打工的汉人来种。这说明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的过渡并不那么简单。小民族要生活下去和解决贫困问题，需要有一个复兴的计划，这种计划必须在扎实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才可能做出。这应该是社会学、人类学者的任务。

我从东北回京后，向国家民委提出加强对小民族的研究的建议，这个建议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重视，现在由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牵头，与中央民族大学、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合作组织了队伍，开展了 22 个 10 万人口以下的“人口较少民族”的调查。调查的第一期工作已结束，正在进行第二期的工作。我想，在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决不能坐视小兄弟面临困境而无动于衷，我们有力量帮助他们在当今这个变化激烈的世界里继续生存与发展下去，允许他们在文化走向的问题上有自主权和自决权。我们中国的社会学者和人类学者还可以做跨国的比较研究，拿我们的民族政策与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的民族政策做一个比较，看看中国提倡的民族平等、共存共荣的政策与西方民族政策究竟有什么不同。我们要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做出一个实实在在的榜样来，走出一条新路，这是中国社会学、人类学者要做的事。这件事做好了其意义不仅是在国内，而且对今后的世界也有重大意义。

在座的有来自各个民族的学员，希望大家来共同思考和关注这样一个民族文化应该如何发展，发展的目标是什么这个重大的课题。在全球文化发展和交融的时代，在一个大变化的时代里，我们如何生存和发展？怎样才能多元化并存的时代里，真正做到“和而不同”？我已经 90 多岁了，想做的事很多，但已力不

从心。新一代长成，老一代交班，希望新一代更快更好地成长起来，把研究工作继续下去。

答会上提问

刚才大家提出了很多问题，很好，我把它们归纳起来，总的讲一讲。

我过去多次来西北，关心西北的发展问题，为此也提出过一些建议和看法。这次能参加研讨班，也很希望能了解一下现在的情况。政府政策的形成，不是凭空而来的，先是有客观的需要，以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依据，10多年来大家都在努力“呼吁”，大家的呼吁，得到中央的重视，才会有今天西部大开发的政策。现在西部大开发的方向、目的清楚了，有了政策条件，还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才能做很多的事情。如何贯彻落实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把事业做成功还要靠群众，靠每一个人的努力。

首先要做好的是交通。这次我是乘飞机来的，在飞机上没有问题，下了飞机就难走了，从机场到兰州的路还没有修好，老年人就吃不消了，这是很实际的问题，路不好，是无法招商引资的，举这个例子，大家就体会了。

其次，发展西部要有重点，要抓住若干据点和中心点。从兰州到嘉峪关的一段，我看中了河西走廊、金川、白银，这些地方通过多年的建设，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比如对白银市的发展有相应的支持政策，完全可以发展成为一个工业特区。

河西走廊在新疆、青海、内蒙古和宁夏诸省区之间，这个地区如果能够用好祁连山的水，发挥移民的作用，将会大有希望。此外，培养工业发展所需要的技术人才是当务之急，关注当地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也同样重要。第一位的任务是培养人，培养有

现代科学知识的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在这方面有什么工作需要我做，我很愿意出力。

抓重点同时不能放弃基础，西部不能忽视农业的发展，发展要靠人去推动实施。靠有头脑的人去做，所以我还要再次强调，人是最根本的。必须有意识地培养和提高人的素质，让他们有条件来接受先进的文化，能够加入到现代化的事业中去。就民族工作来讲，更要抓住这个关键来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要看到传统的谋生之道正在改变，原来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现在山上的树没有了，河里的鱼没有了，在这种情况下，有人问是保命还是保文化。依我看，文化是为了人才存在的，有人才有文化，文化是谋生之道，做人之道。因此我们要利用一切可用的自然条件来发展经济，提高经济实力。少数民族也一样要靠自己的努力来发展，自身的文化不够用就引进。我们中国的少数民族有一个优势，那就是有国家的政策在扶持，有 13 亿兄弟民族的相互帮助，大兄弟帮小兄弟。经济发展要人人动手，一点一滴地积聚财富，即所谓原始资本积累。有了钱有了力量如何用？工业和商业怎样相结合？兄弟民族各有所长，按特长有所分工，优势互补，比如撒拉族人善于种水果，他们的瓜果之乡有了产品要有办法卖出去。历史上回族就是善于经商的民族，临夏和海东地区是明朝的茶马市场，是中原地区和西北进行物资交流的地方，是一个商业中心，历史上就有“东有温州，西有河州”的说法。所以我曾建议甘青两省的合作，发挥这里自然和人的条件，建设现代化的商业中心。当时为了向藏区运送商品，我还联系南京的企业向这边支援卡车。有了卡车需要人开，还要培养司机，所以要发展，重要在培养人。现在临夏的商业已有发展，回族出了大力气。他们的底子比较好，学习得快。最困难的是人数很少的“小小民族”，一定要帮助他们维持生产基础，但关键也在于培养人。我相信这些“小小民族”是能够做到的。我认识一位撒拉族农民，

他看到了种果树的好处，就动手去做，动员全家开荒种果树，取得了很大成绩。

人类学就是要通过思想唤起人们的觉悟，唤起“小小民族”的觉悟，做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我到过新疆的吐鲁番，林则徐在新疆时发掘过地下水，我们今天就可以他为榜样，用现代化的知识开发自然条件，促进经济发展。新疆大学要建设好一个民族学的中心，关键也在有人才。光有机构没有人不行，要培养教师办系建中心，要人要条件，搞得不好是要误人子弟的。你们自己要好好做，北京大学出力搞协作，帮助新疆建设师资队伍。我们这次来西北地区办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如果你们做得好，我身体健康活得多，想再到新疆去办一次这样的研讨班。

西部开发本来就是一个大梦想，我一生做过很多梦。我和我的前妻王同惠在学生时期就翻译了《甘肃土人的婚姻》，当时她就说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能写土族的书，而要外国人写。我们就是在那时下决心要努力去认识中国，自己把道理搞清楚。现在你们有条件有能力去做了，就应该认真去做。这就是所谓“文化自觉”，需要我们对我们的文化层层解剖，有所分析和认识。

我这几天在看第三届研讨班时外国同行做的系列讲座的论文，很多问题他们都讲出来了，例如爱斯基摩人怎样进入工业化的。我很羡慕你们年轻人，现在你们的条件比我们年轻时好多了，简直不能同日而语；而且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想做而不能做，一直到平反后才开始动手做。你们现在条件好了，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自己要真正努力。

实现民族政策，不能等，不能靠，要自己去做。民族的先进分子要看到自己的责任，中国社会是一个上有祖宗，下有子孙的社会，我们不能在自己这一代把事情搞坏了，没有尽到责任。希望大家珍惜机会，振兴民族，共同富裕。

2001 年 7 月

又一次访问定西

经过近两个小时的飞行，我们搭乘的飞机降落在兰州机场。出机场登上中巴车，汽车很快就驶上了不久前才通车的高速公路。我抬头向窗外望去，路两旁目力所及的黄土高坡上，显出淡淡的一层绿色，定睛细看，原来那满山的绿是贴着地皮长出来的青草和已经成活的树苗；公路边上栽的柳树、槐树、杨树有的已经长得老高；远处山顶上成片的松树也显得郁郁葱葱。接待我的甘肃省人大的同志指着那片绿高兴地告诉我：这几年省里下大力气抓生态建设工程，5年来完成公益林建设654万多亩、退耕还林645万多亩。我们现在看到的路两边的树和草，就是你每次来都要问到的兰州市南北两山绿化工程实施的结果。今年老天爷帮忙，雨水多，你看这些山头都绿了。可是水仍然是个大问题，目前虽然有部分山头已经可以引水浇灌，但是树苗的成活率还不是很很高，天一旱，山上的草就会枯死……

今年的8月底，我又一次踏上甘肃的黄土地，算起来，自1984年起，我是第十一次访问甘肃了。那一年，我在家乡农村搞调查工作，听说甘肃的定西县是个干旱贫困的地方，历史上有“陇中苦甲天下”的说法。我很想亲自去看一看。当年的9月，我就抽时间到定西访问，从此与这片黄土地结下了不解之情。

—

定西县的确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干旱地区，我在那里第一次看

到一家人全年的用水，就靠积存在水窖里的雨水供应的状况；第一次看到为了减少水分蒸发而压了一层卵石的地里，从石头缝里长出庄稼的奇特现象。这里气候恶劣，高寒干旱，广袤的黄土坡上，光秃秃寸草不生，死气沉沉，沟壑纵横，水土流失严重，生态恶性循环，灾荒不断。然而在毗邻定西县的靖远，我却看到因为有抽水站把黄河水抽上来进行灌溉，开辟出了大片的水浇田。人们说，只要有水，黄土地上就不难形成生机勃勃的绿洲……

我第一次访问定西县的时候，听说这里还有 $2/3$ 的农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乡镇企业刚刚起步，整个地区乡镇企业的数量少、技术低、规模小。定西的干部群众虽然憋着一股劲要摆脱贫困，却苦于在这个大部分地区只适合种草，而不适合种粮的地方，还没有找到一个突破口和有效的路子来改变这种传统的以农为本，以种植业为主的封闭自给性经济结构。当时我听说定西地区胡麻的种植面积很大，胡麻籽用来榨油以后，杆子几乎都当柴草烧掉了。这种胡麻实际上是亚麻的一种。那时亚麻制品很流行，我就想按照家乡的办法，帮助定西办个亚麻厂，于是请了哈尔滨亚麻研究所的专家来帮忙。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亚麻厂并没有推广开来。那么定西应该走怎样一条路才能摆脱困境呢？这个问题一直挂在我的心头。

后来我每次到甘肃，只要有时间总要去定西看看。令我感到振奋的是，每次去定西，都能看到定西人一步一个脚印地在向前走。

这次来甘肃，已经到了兰州，当然要去定西看看。按照日程安排，8月31日早上我们出发去定西，天下着大雨，为了保证安全，我们乘坐的汽车放慢了行驶速度。同行的同志说这是我第七次去定西了。汽车一进入定西境内，眼前看到的景象就让我感觉到定西又有了变化——周围的山比前几年更绿了；进了县城，城里的楼房多了，马路也整齐了、干净了，两旁的树更高了。

在县政府的会议室里，定西的同志告诉我，近年来他们抓住了西部大开发这个历史机遇，以实施退耕还林工程为契机，遵循自然规律、科学规律和经济规律，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大力调整农村经济结构，探索出了一条发展生态经济战胜贫困的路子。他们根据多年的经验，制定了一套大力发展马铃薯、畜草、中草药、食用菌四大支柱产业的规划，用这四大支柱产业来带动一批相关企业的兴起，促进了定西产业结构的调整。

拿马铃薯来说。定西是我国马铃薯主要产区之一。近年来全县按照菜用薯、高淀粉薯和专用薯三大类型的布局，马铃薯的种植面积稳定在 60 万亩以上，总商品量达到 40 多万吨，产值 1.89 亿元，销售收入达 1.56 亿元，农民从马铃薯产业中平均每人可以获得 365 元的纯收入。由于马铃薯种植业的发展，全县建起了 50 多家马铃薯淀粉加工厂，年加工能力达到 3 万多吨；另外还建了一条薯条专用生产线，年产薯条 3000 多吨。定西生产的“鲁家沟”牌、“金宇”牌马铃薯、“环宇”牌精淀粉和“金大地”牌薯条，已经完成了商标注册的全部手续。定西县打造马铃薯产业品牌的优势已经初见成效，他们正在朝“贸工农一体化，产加销一条龙”的方向努力。

马铃薯也叫土豆，既可做菜又可当粮，人人爱吃。我第一次听说西北的土豆质量好，是镇江一个养鳊鱼的企业老总告诉我的，因为鳊鱼的饵料是用土豆加工的，所以土豆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养鱼的效益，但是用普通的土豆做饵料质量达不到要求，不能用。他为了寻找优质土豆，费了很大力气才在宁夏的固原找到他所需要的优质土豆。土豆不仅中国人喜欢吃，还是西方人主要的传统食物，日常生活中离不开它。记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曾在德国住过几天，那时在德国，各种土豆制品是最高级的食物。因此可以说土豆是世界性的粮食资源。定西的土豆质量好，但是知道的人还不多，要广为宣传，让人人皆知，扩大定西马铃

薯的知名度，抓住国内市场，而且还要开发出更多的土豆制品，发展土豆食品的加工业，提高附加值，向世界市场进军。

此外，对他们说的畜草产业已经成为定西的四大支柱产业之一这件事，特别引起了我的兴趣。因为 20 年前我刚到定西，就听说定西在贯彻种草种树、治穷致富的方针，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种草种树恢复生态环境这样的大事，还没有和农民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成为致富的手段。所以当时有农民诘问动员他种草的干部：草不能当饭吃，你还叫我种，难道让我吃草吗？农民说这样的话，是因为他们受着当地的社会经济结构和生活、生产习惯的制约，还不能够把“草”通过发展畜牧业，转化成可以吃的“肉”，他们还没有在种草上得利。

定西县历届领导，虽然遇到了种种困难，但是仍然坚持不懈地带领全县人民实施“种草种树”的方针。到了 2000 年，他们更是抓住国家实施退耕还林工程建设的大好时机，认真落实各项政策，使工作进行得更加扎实了。比如 2000 年至 2002 年，全县累计兑现补助粮 2410 万公斤，生活补助费 482 万元，种苗补助款 1260 万元，不折不扣地落实国家退耕还林的政策，使农民从中得到好处。另一方面他们在推行退耕还林政策的同时，还以舍畜养殖为切入点，积极引导农民走草畜一体化的路子，利用牧草大力发展小尾寒羊、肉牛和奶牛的舍饲畜牧业，取得了种草和畜牧双发展的好成绩。目前定西多年生牧草面积达到 27.3 万亩，年产优质牧草 30 多万吨；可加工为饲料的豆科灌木林保存面积 45 万多亩，年产优质饲料 10 万吨以上。与此同时，舍饲畜牧业也得到大力推广，目前已建成草畜转化示范点 45 处、标准化圈舍 5300 间；畜禽存栏 103.6 万头（只），年产肉类 1.3 万吨、禽蛋 300 吨、鲜奶 400 吨；畜牧业产值达到 1.31 亿元，从牧业中，农民人均增加收入 395 元。由于畜牧业的带动，定西目前有了中、小型畜产品加工企业 8 家，而且有一家已经获得了进出口和

自由报关权。农民从种草 + 舍饲畜牧业中得到了好处。

畜草业成为定西县的支柱产业之一，说明他们已经找到了解决“草不能当饭吃，你还叫种”这个矛盾的突破口，走上了正确的路子。也可以说这是我国实施退耕还林政策所取得成绩的一个具体例子。

经过定西干部群众的长期努力，如今定西已经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贫困面已经由 20 年前的 70% 下降到 4.2%。全县经济综合实力有了较大提升。定西的同志告诉我，再过几天定西地区升格为定西市的牌子就要正式挂出来了。

离开定西的时候，雨还在下着。回去的路上我们顺便拜访了岷口镇岷口村农民王明家。这个村紧靠高速公路旁边，由于交通方便，到了马铃薯收获的季节，这里就成了一个马铃薯交易的大市场，于是就有人在这里建淀粉加工厂，办起了企业。这个村的农民靠着交通和地理位置的优势，搞运输、做生意，日子过得越来越富裕。王明告诉我，他家有 4 口人，5 亩耕地，其中 3 亩退耕还林种了树，2 亩种马铃薯，退耕还林的 3 亩地，每亩一年可以从政府那里领到 200 斤粮食和 20 元的补助。家里还买了一辆汽车跑运输，年人均纯收入 2100 元。他家富裕了，盖了这座 243 平方米的二层楼，家里彩电、电话、家具样样都有。说话间，主人端出了一大盘刚刚蒸熟的、香喷喷的土豆和老玉米，热情地要我尝一尝他们的土特产。临别时，王明特意要我到厨房参观他的“自来水”，原来他在水窖里安装了一个电动抽水机，用水的时候，插上电源，水窖里的水就抽上来了。水窖就在院子的地底下，有 50 立方米。站在院子的雨地里，他拉着我的手说：“你老人家这么大岁数还打老远跑来看我们，老天爷都高兴啊，下了一天雨。”他又指着大门边的地上一个打开了盖子的洞口接着说：“这是水窖的进水口，你瞧，这雨水流得多欢！”大家听他说得好，都乐开了。

告别了岷口村的老乡们，汽车又驶上了高速公路，望着车窗外淅淅沥沥下得越来越小的雨水，我心里真希望老天多下一些，让这里家家户户的水窖都盛满清水，让这里的黄土高坡披上绿装。突然，快速行驶着的汽车猛地放慢了速度，打断了我的思绪——司机说，前面有塌方，路被堵住了。果然，当司机小心地绕过出事地段时，我看到紧靠公路的黄土坡上被雨水冲出了几道深沟，冲下来的黄土堵住了高速路的半边。看来我的多下几场雨的“愿望”，还有考虑得不周到的地方。

定西人民为了战胜干旱，顽强奋斗，坚持不懈地实施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和综合开发，到目前为止已经治理水土流失面积1996平方公里，治理程度达到60.4%；建成了集雨节灌水窖8.73万眼、“121”工程水窖9.6万眼，全县人畜饮水的困难基本得到解决。但是从定西的现状来看，定西人还没有摆脱靠天吃饭的境况。

经过长期的不懈努力，定西县在治理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的工作上，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要完全做到把这一方水土保持住，把生态环境改造好，就像万里长征刚刚走了第一步，还有许多艰巨的工作要做。

在离开甘肃的前一天，我的老朋友洛桑灵智多杰副省长来宁卧庄看望我，送给我一本由他和兰州大学、甘肃农学院几位教授一起撰写的《甘南藏族自治州生态经济示范区研究》。洛桑告诉我，甘南藏族自治州素有“中华水塔”之称，是青藏高原重要的水土涵养地，也是黄河、长江上游水资源涵养区。著名的白龙江、黄河、大夏河、洮河以及120多条大小支流从境内流过，年补水资源量为254.1亿立方米，仅在玛曲县境内就能给黄河补充总流量45%的水。但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由于雨量减少等自然原因和生态环境被破坏，白龙江、洮河、大夏河的流量分别减少了20.6%、14.7%和31.6%，甘南地区补给黄河的水量减

少了5%左右，直接影响了黄河水量；水土流失的面积已由8000平方公里扩大到现在的11560平方公里，增长了45%；甘南州缺水草场面积扩大到670万亩，占全州草地面积的17.4%；缺水人口达18万人，占全州人口的28%……

因此洛桑他们呼吁，为了保护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保护黄河，必须采取紧急措施，通过实施禁牧休牧轮牧、建立放牧-舍饲制度和草畜平衡制度，来恢复和提高草原生态和生产效能，减轻生态压力。看来，甘肃省遏制生态环境继续恶化，实现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良性循环的任务还十分艰巨。

我的家乡在江南，那里河道纵横、湖泊遍布，水是太普通不过的东西了。但是从定西回来之后，“缺水”和干旱所引发的种种问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我也了解到，从全国来看，我国水资源总量约2.8万亿立方米，人均不足2220立方米，约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4，有专家预测，我国在2030年前后将出现用水高峰，届时需水量将接近可用水量的极限。所以说我国是一个水资源严重短缺的国家。

当前，我们国家已经对这一问题给予十分的重视，近年来像三峡、南水北调这样的大规模治水工程相继开工，与此同时还大力开展对于节水农业和节水技术的开发与研究。这使我想起多年前在一次全国人大会上，我曾看到的一份文件，是几位专家提的建议，虽然时隔长久，建议文本已找不到了，但是建议的大意我还记得。作者列举了大量数据，说明我国云贵高原上的六条江河（大渡河、金沙江、澜沧江、怒江、雅砻江、岷江）水资源极其丰富，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是可以把水输送到黄河上游，以调节黄河水量。

我不是这一行的专家，对这个建议说不出什么意见，只能凭常识谈谈自己的一些想法。六江水量丰沛，横断山脉地势险峻，要将这里的水翻山越岭送上黄河，其技术难度、耗资之巨可想而

知。时隔多年，当今科学技术的进步，已不可同日而语，我们国家在水利建设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技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而且我们的国力也已经具备了兴建大型工程的实力。我想如果现在再来审视这个“六江调水”的建议，我们一定能更审慎地对工程效益、经费筹措以及它对环境保护、生态保护方面将会发生的影响进行科学的论证。如果“六江调水”能够实现，地处黄河上游的西北地区缺水的现象将可以得到缓解。

二

通过多次的访问，甘肃的“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除此，甘肃的“人”也一直牵动着我的心。

也许是因为曾经做过一段少数民族研究工作，所以对我国的少数民族同胞，有着一股割舍不了的情谊。记得那个时候，我曾经有一个愿望——在一生中，能够亲自上门拜访我国所有的少数民族兄弟。这个愿望一直留在我的心里。

长期以来我对西北各民族很不熟悉。而甘肃省境内聚居着蒙古、藏、回、哈萨克、撒拉、裕固、保安、东乡等多个少数民族，到了甘肃怎能放过登门拜访他们的机会呢？所以一到甘肃，我就尽量安排时间到少数民族地区走一走。我在陇西走廊拜访过那里的藏族、回族、撒拉族、保安族、东乡族；又到祁连山山麓问候了几户裕固族牧民。通过这些访问增加了我对西北少数民族的了解，也引起我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些思考。

甘肃的西南角有个甘南藏族自治州，这地方西连青藏高原，海拔超过3000米，不适合农耕而适宜放牧，甘肃省内的藏族大多聚居在这里。我们知道西藏虽然是西藏自治区，但是有一半以上的藏族同胞是生活在自治区以外的青藏高原上。从历史上看，

汉族和藏族最早发生交往的地方，就是现在的甘青地区，早在七八百年前，甘南就已经是汉藏茶马互市的中心。据了解，时至今日，甘南进藏的商道还是畅通的。1985 年我访问甘南的时候就想过，当前我们正在大力推进改革开放，搞现代化，要想在相对封闭的青藏高原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一步必须使商品流通起来，对于商品经济程度很低的青藏高原来说，如何打开一个缺口，让商品流通起来，是首先要做的事情。我认为可以很好地利用甘南这个条件，使它成为“藏族现代化的跳板”。可是商品是要人来传递的，有什么人能够适应青藏高原特殊的地理条件，把商品送上去呢？在甘南我一时还找不到答案。

第二年，我去了定西以后，再到临夏回族自治州住了一周。时间虽短，却找到了前一年留下来的问题的答案。

临夏南接甘南，是甘肃省回族聚居的地方。一般人们认为，西北地区的回族是在 13 世纪蒙古军队西征的时候，大批中亚和波斯、阿拉伯的穆斯林随军队或自动迁徙到了东方，他们主要是以驻军屯牧或以工匠、商人、掌教、官吏等身份散居在西北各地，临夏一带的回族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中国的回族大多是以大分散小集中的格局与汉人杂居，回汉人民密切交往，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回族在生活 and 语言等各方面都受到汉族的影响，但是他们还坚持信奉伊斯兰教和保持某些民族习俗。所以说，中国的回族是具有中国特点的民族，中国的伊斯兰教也是具有中国特点的宗教。回族以善于经营著称，多从事牧业或者运输业、手工业、小商业。

改革开放以来，回族同胞发挥了他们善于经营的优势，外出经商、打工，在拉萨、乌鲁木齐、广州、南京等地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拉萨那条由几百家临夏人的商店组成的“临夏一条街”早已名闻全国。我在访问临夏的时候，走访了好几户普通的回族家庭，他们都有跑藏区做生意的经历，那时临夏的民间就拥有卡

车 1000 多辆，估计全州 6 万个外出经商的人当中，大部分都在藏区活动。当我了解到这些情况以后，心中豁然开朗，这不就是那支能把商品送上青藏高原的队伍么！如果我们政府的有关部门，能够引导、扶助他们把这种经营做好做大，那么对推动青藏高原与外界的农牧贸易的发展，必然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倏忽间，10 多年过去了，我心里一直记挂着临夏的这支民间运输队。这次甘肃之行，没能再去临夏，失去了一次亲自去看望他们的机会，只能在这里遥祝他们事业顺利。

我还曾经访问了甘青地区喇嘛教的圣地拉卜楞寺。拉卜楞寺不仅是一个僧众祈拜神明的寺院，还是一所喇嘛教的高等学府，它下设六个学院，在神学、天文、历算、医药、艺术等学科上都有专业设置，是一个保持、研究和传播、弘扬藏族文化的重要的地方。在那里我还亲身感受到普通藏民对于宗教无比虔诚和真实的感情的流露。看到他们不顾一切地拥上来，伸过头，要求拉卜楞寺的嘉木样大师摩顶的情景，我不由得产生一个愿望，希望能够向他们所信奉的神明祈求，允许他们现在就得到他们后世才能得到的“报应”，这个报应就是让千千万万藏族同胞能够过上富裕的日子。同时我心里冒出了这样一个念头：要是有位神明，能够通过这座神圣的庙宇，把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传授给藏族同胞，使他们能够尽快赶上社会进步的步伐，那真可谓善莫大焉。

解放以后，我国消灭了民族压迫，宪法上明确规定了民族平等、互相团结的基本原则，各民族共同繁荣和进步是我国长期以来一贯奉行的国策。上世纪 70 年代末，我国又吹响了向现代化进军的号角，东部沿海地区迅速的崛起，拉大了东西部发展的差距，而西部边区恰恰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的加剧，必然会影响到国家的建设和长治久安的大局。我们还可以从苏联的解体、美国的“9.11”事件和国际上所发动的反恐战争等近年来国际上发生的种种事件中，看出民族问题已经

成为世界上一个突出的矛盾了。因此研究和解决民族问题应当是一项非常重要而紧迫的工作。

通过与甘肃以及其他地区少数民族同胞的接触、交往，我对中国的民族问题和对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和设想。比如在裕固族牧民的帐篷里，我听到了肃南群众如何在牧业改革中，克服困难取得了较大的进展。这个事实使我产生了以振兴甘南和肃南的牧业，架起一座青藏高原的少数民族和中原地区的民族联系的桥梁，把科技知识送进藏族地区的设想。又比如1987年我到青海的海东地区访问，看到这地方与毗邻的临夏一样，是历史上茶马贸易的中心，那里的撒拉族也同回族同胞一样，是打开青藏高原封闭大门的一支力量。同时我也在调查研究中逐步认识到，一个地方商品经济的发展，必须要有大的基础来支持，因此在我的脑筋里产生了区域经济这个概念。于是我提出建立海东、临夏经济协作区和在甘肃、青海、宁夏、内蒙古四省区建立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建议。

我们常说，没有中国农民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同样，没有中国少数民族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也不能说已经完成。由于历史上的原因。我国的少数民族大多分布在自然条件比较恶劣的西部地区，长期以来处在相对封闭的状态中，经济上也相对落后。在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中，还存在着东西部不平衡的问题，但是我们应该努力缩小这个差距，特别是对少数民族地区，要给予更大的关心和帮助。我相信我国的少数民族同胞能够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实行改革开放，与发达地区在互利互惠、互相平等的合作下，同全国人民一道共同前进。我提出关于发展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一些建议，目的是希望这些建议能够在我们党和政府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时候，提供有益的参考。这也是一个社会工作者应尽的责任。

这次甘肃之行，时间短，去的地方也少，但是一路上的所见

所闻，已经使我感受到在国家西部大开发的方针指导下，甘肃省的经济建设又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看到了我多年来惦念的心事，有了着落的基础。这些年来，由于贯彻了党的改革开放的各项政策，甘肃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定西县广大的干部群众，更是跳出了传统的思维模式，找到了根治贫困的新思路，思想上的大变化取得了大效果，从此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但是，我们的目标还没有达到，尚需不断努力克服困难，不断向前走。

记得 1998 年我第四次去定西的时候说过：定西是个穷地方，所以我多次地来。这一次来和我第一次来，感到定西的变化太大了。要是定西以后的变化还是这样大，我也就可以不再来了。如今定西的乡亲们已经把定西建设得越来越好，它的变化之快、之大，可以用“突飞猛进”、“日新月异”等等这样的词汇来形容，它的变化令我这老人目不暇接。

所以，我可以“不再来”了。

2003 年 9 月

后 记

费孝通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民族学家、人类学家，他毕生致力于“从认识中国到改造中国”，始终孜孜不倦地探索中国社会。1935 年费孝通与新婚妻子王同惠一起赴广西大瑶山调查，不幸以一伤一死而结束，在中国学术史上留下了悲壮的一页。大瑶山调查是费孝通实地研究的开始，也是他民族研究的起点。1950 年费孝通参加中央访问团到民族地区调查访问，并担任了贵州分团和广西分团的团长，深入贵州和广西两省的少数民族地区，历时两个年头。1952 年他被任命为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1955 年到贵州进行民族识别工作，1956 年参加人大常委会组织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

改革开放以后，费孝通重新焕发了学术活力。先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和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国家民委顾问、北京大学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名誉校长等职务。他受中央委托，承担起恢复社会学学科的繁重任务。1984 年在初步完成江苏省的小城镇调查后，他又将研究的重点转向到边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率先提出了“边区开发”的思路。他不顾年事已高，五上大瑶山，七下定西，走访了许多少数民族聚居区，从东北呼伦贝尔草原森林，到南方海南岛黎族村寨，以至海拔 3000 多米的甘南藏区，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费孝通在他 90 岁高龄时，深情地回忆道：“我算得上是一名老民族工作者，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间还有幸参与民族工作一些大的活动，在这以后，民族研究一直是下工夫下得最多的学术

领域。”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是费孝通民族研究的基本立场。他总是怀着深厚的感情，关注少数民族的发展问题。经过20多年的实地调查研究，费孝通的边区开发理论越发具体和深刻。他把东中西部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放在中国现代化的整体上来考察，号召以智力、劳力、财力“三力支边”，提出了“以东支西，以西资东，互惠互利，共同繁荣”的设想；他积极支持国家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格外关心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推动国家民委提出的“兴边富民”工程。

费孝通认为，我国民族的形成有自己独特的道路，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构想。他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这一理论更加巩固了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文化认同基础。21世纪中华民族将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新时代，费孝通又及时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概念，主张在世界多元文化的比较中自觉，在文化自觉中认同，在文化认同中走向自强和自立。

在费孝通、王同惠大瑶山调查70周年之际，由国家民委主办、中央民族大学承办的“费孝通民族研究70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我作为费孝通先生培养的“边区开发”方向的社会学博士，荣幸地承担起编辑《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新编》的任务。我和学生们一起，从十六卷的《费孝通文集》中挑选出111篇计90多万字的民族研究文章，按照时间顺序进行编排。因为70年前的大瑶山调查成果《桂行通讯》、《花篮瑶社会组织》和其他相关文章汇编为《六上瑶山》而单独成书，因而事实上本书只收集了费孝通1951-2003年间的民族研究文章，如果将这两本书结合起来阅读，基本上就包括了费孝通所有的民族研究成果。

这本《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新编》的出版，首先要感谢国家民委的高度重视和中央民族大学在多方面的有力支持，也感谢费老女儿费宗惠、女婿张荣华的信任，感谢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编辑们的辛勤工作。我的学生田丽霞、闫力、李海峰、李凤想、张巍、姜韦珏、杨春霞等人参加了录入、校对等大量工作，在此对他们的辛勤劳动也表示感谢。

徐 平

2006 年 8 月 30 日于北京大有庄